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三卷

上册

第二国际

1889—1914

〔英〕G. D. H. 柯尔著

商务印书馆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三卷 上册

第二国际

1889—1914年

〔英〕G. D. H. 柯尔 著

何 瑞 丰 译

俞 元 开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1年·北京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Volume III, Part I
SOCIALIST THOUGH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
By G. D. H. COLE
LONDON, MACMILLAN, 1956

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三卷上册

〔英〕G.D.H.柯尔 著

何瑞丰译

俞元开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6 $\frac{7}{8}$ 印张 402 千字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6,200册

统一书号: 2017·252

定价: 2.10元

目 录

前 言	1
导 言	3
第一章 第二国际的初期	11
第二章 第二国际的后期	47
(I) 1900年——巴黎。(II) 1904年——阿姆斯特丹。(III) 1907年——斯图加特。(IV) 1910年——哥本哈根 ^① 。(V) 1912年——巴塞尔。(VI) 1914年——维也纳和巴黎，第二国际的崩溃。	
第三章 英国——工党成立前的社会主义	113
(I) 费边社会主义的起源。(II) 新工会运动及其背景。(III) 独立工党。(IV) 罗伯特·布拉奇福德和《时代号角报》。	
第四章 英国——工党和大动荡的局面	191
(I) 工党的兴起：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H·G·威尔斯。 (II) 费边社会主义——韦伯夫妇，肖伯纳和华莱士。(III) 大动荡的局面：工党及其领袖；工团主义和凯尔特社会主义。	
第五章 德国：关于修正主义的论战	262
第六章 修正主义论战后的德国：外表和实际	310
第七章 1905年以前的法国	335
第八章 1905年以后的法国。统一社会党和工团主义者。饶勒斯和索列尔	366

^① 原文作阿姆斯特丹，这显然是作者弄错了，应该是哥本哈根，译者按实际情况把它改了过来。——译注

第九章	1905年以前的俄国	403
第十章	第一次俄国革命	454
第十一章	波兰——罗莎·卢森堡	497
附：	主要人物表	529

前 言

v

本卷在撰写的时候是很难下笔的，因为社会主义已经传播到这么多国家，而且其中许多国家的资料在我所懂得的几种文字中又很缺乏。虽然我希望我所叙述的绝大多数要点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我无法指望谬误和判断不确之处都已得到避免。凡是能办到的，我总是请教我所认识的专家，承他们热忱作答，使我纠正了许多错误。H·N·布雷斯福特先生又一次通读了本卷全文，给我很大教益；社会主义者国际书记尤利乌斯·布伦塔尔先生不仅校阅了全卷，而且惠借了许多其他地方难以看到的书籍和报告，均此深志谢意。谈到借书，我还应该深切感谢雷蒙德·波斯盖特先生、H·L·比尔斯先生、C·A·麦卡特尼先生、新西兰的K·J·斯科特先生和弗洛伦斯·布雷德菲尔德小姐。我的妻子校阅了本卷的某几章，并且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我还应向其他许多人士申谢，他们为本卷的某些章节提供了资料和帮助，特别是详细的材料和传记细节。詹姆斯·约尔先生对于有关第二国际的一节曾惠予帮助，特此志谢；此外我要感谢：J·F·赫拉宾先生、莫里斯·雷奇特先生、A·J·彭蒂夫人、迈克尔·奥克斯肖特教授和约翰·马洪先生（英国）；莫里斯·多曼热特先生和米歇尔·格罗齐埃先生（法国）；尤利乌斯·布朗塔尔先生和吉尔特拉德·马加齐拉夫人（奥地利）；托马斯·巴罗格先生和K·齐吉提先生（匈牙利）；H·G·申克博士（波希米亚）；沙尔·巴比埃先生、马克斯·韦伯教授、汉斯·汉钦先生和瑞士消费合作社联盟（瑞士）；雷内·莱纳德先生（比利时）；封·韦斯博士、A·C·吕特尔教

授和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荷兰); 保尔·汉森先生(丹麦); 古斯塔·
vi 兰根费尔特先生、巴尔姆斯提尔拉男爵和 J·W·埃姆斯博士(瑞典); B·兴达尔先生(挪威); R·H·奥伊提农先生(芬兰); L·瓦里亚尼先生(意大利); L·波波夫先生(保加利亚); V·童古兹先生(南斯拉夫); 马约里·普兰特小姐、伊赛亚·伯林先生、库斯科瓦-普罗科波维奇夫人、鲁道夫·施莱辛格博士和亨利·柯林斯先生(苏联); H·W·奈德勒博士(美国); C·A·弗莱明先生、E·M·希金斯先生、N·S·林拉文先生和劳埃德·罗斯先生(澳大利亚); 鲇泽岩雄教授(日本); 弗朗西斯科·A·德·伊卡萨大使(墨西哥) 以及戴斯蒙德·克罗莱先生、K·J·斯科特先生和 E·G·辛普森小姐(新西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克罗莱先生曾惠借其有关新西兰劳工运动的尚未出版的大作, 对我的确很有帮助。希金斯先生也曾将其有关澳大利亚的尚未发表的资料借给我。

最后, 我的两位秘书罗莎蒙德·布罗德利夫人和奥德丽·米勒夫人相继承担了处理我的手稿的繁重工作, 并且在许许多多其他方面予我以帮助, 特此志谢。

G·D·H·柯尔

1954年9月于牛津

导 言

XI

我在本书的第二卷中论述了 1850 年前后到 1890 年前后这段时期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发展,也就是说从 1848 年欧洲各国革命失败时谈起,一直谈到了社会民主党或工党已经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和一些欧洲以外的国家成立时为止。本卷将继续往下谈,即从 1889 年(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第二国际建立时谈起,一直谈到 1914 年 8 月欧战爆发时为止。在第二卷所涉及的时期中,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中心论题。那场斗争在 1889 年并没有结束,只是在这个阶段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了,而且论战的双方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整个西欧已经以社会民主主义的面貌出现,并且已经体现在一系列全国性政党的组织中。这些政党有的积极从事选举活动,力图通过合乎宪法的道路建立议会实力;有的则由于选举权限制过严,难望在选举中获胜,于是便进行鼓动和示威,要求成年男子选举权甚至成年人选举权,旨在步前者的后尘。在此期间,无政府主义正深受工会运动发展的影响,部分地体现为革命工团主义(这是最初名称,后来简称为工团主义),从强调“直接行动”的作用出发,把总罢工当作武器,反对采取议会行动。社会民主党人也曾提出并利用总罢工作为贯彻选举制改革的武器。在俄国,1905 年的革命实际上就是以这种形式开始的。但是,奥地利和比利时用来迫使当局进行选举制改革的总罢工则跟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俄国革命主义者的“社会性”总罢工完全不同;奥地利和比利时的总罢工,其用意并

XII

有效的议会行动扫清道路。因此，这种总罢工是社会民主党指挥下的有纪律的行动，而不是富于战斗性的积极分子把工人主体争取到革命行动中来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即使是这种有限的罢工形式，也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反对；他们的党力量最为强大，组织最为完善，远远超过了其他社会党；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既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声誉卓著的捍卫者，又曾胜利地抵制了俾斯麦利用反社会主义者法摧毁它的尝试，因而威信也最高。当第二国际诞生时，德国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仍然有效，可是第二年便被废除了，于是德国的党便得以放手在德国的国土上合法地重建组织，并于1891年通过了新的爱尔福特纲领。这个纲领对其它国家的社会党的政策具有重大影响。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完全统一的，并且有效地指挥着德国的工会运动，后者在名义上独立于前者之外，但却忠实地服从前者的领导，因而德国的党在新的国际中，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都是一支最最强大的统一力量。在影响和实力方面仅次于德国的是法国的党，但是在1889年，法国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分裂成为若干敌对的派别。在法国，不但有对立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有对立的工会运动；甚至在对立的党于1905年在国际的压力下统一起来的时候，工会运动仍然丝毫不愿意接受社会党的领导。在第二国际的历次大会上，法国的各个代表团一直有尖锐的分歧，而德国人则几乎始终代表一条坚强的统一战线。

地位次于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是俄国人，虽然俄国人没有群众组织，同那些可以公开合法地进行组织工作的国家不能同日而语。实际上，在1905年以前，俄国人在第二国际的活动中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甚至在这一年以后也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内部分歧。这种内部分歧不仅存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而且也存在于社会民主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但是俄国人

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革命主义者，面对着专制的沙皇政权，别无其他出路。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确曾有过一个议会——杜马，但其选举条件却堵死了社会主义者赢得强大代表权的一切机会，而且从任何角度来看，杜马的权力也是非常有限的。在沙皇俄国，根本不可能按德国或任何西方国家的形式建立一个以走议会道路为主的社会党。再者，虽然参加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一直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者，但是他们自己的处境却同支配第二国际议程的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如此不同，以致在多次讨论中他们都很难发言。他们参与讨论的最重要的一次是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当时列宁和罗莎·卢森堡设法修正了一项有关社会党人在国际战争中应采取什么态度的决议。

结合英国的世界地位来看，英国社会主义者在第二国际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因为他们非但陷于分裂，而且在发展强大的政治运动方面也迟迟不前。英国职工大会虽然派了代表参加第二国际，但是并没有在国际的活动中起重大作用，而且简直没有认真对待参加国际这件事。工党在加入国际的英国支部以后也是无足轻重的。社会民主联盟和凯尔·哈迪的独立工党把它们之间的争吵从国内带入国际领域，这两个组织在英国代表团中平分秋色。凯尔·哈迪主张以总罢工反对战争，这使他在1905年以后成了一个主要人物，可是此外就没有其他英国代表为人瞩目了。海德门尽管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对德国的威胁持激烈见解，因而未能起主要作用。英国人由于未能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他们的工会运动在效忠于国际阶级斗争方面落后于人，因而在国际中不断受到指责。

在较小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奥地利和比利时人最为活跃。维克多·阿德勒和艾米尔·王德威尔得都是国际上的杰出人物。奥 XIV

地利人主要追随德国的领导,但是对反对派的态度要和解得多;比利时人的地位最适于在条顿族和拉丁系各族人民之间进行调解,在工会与合作党同政党究竟处于何种相对地位这一问题上尤其如此。意大利人就象法国人一样,内部始终是分裂的,荷兰人也是这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的社会党人当时还没有上升到1918年以后所取得的那种重要地位。代表西班牙人的只有帕布罗·伊格列西阿斯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小党,这个党忠诚地追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巴尔干半岛各国只有一些规模很小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大部分受到严重迫害,其中最重要的组织——保加利亚的党则分裂为壁垒鲜明的敌对宗派。美国人也同样分裂为德·里昂派和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双方的信从者人数既不多,影响也不大。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只是时断时续地露面,对第二国际的活动影响很小。辩论通常主要是德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和比利时人的事;英国人,意大利人和荷兰人起着次要的实质性的作用;至于俄国人,则只是偶而参加,有所影响而已。

本卷的内容必然主要是分别叙述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情况,因为在1889到1914年期间,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主要是沿着国家的路线发展的。每个社会主义政党和每个工会运动,一旦加强了地位,取得了一定成就,而且组织也初具规模的时候,便都碰到了本身所特有的问题,并且都着手去满足其潜在支持者的要求和维护他们的利益。这实际上是赢得选举胜利和使工会运动成为一支坚强的谈判力量的必要条件;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虽然有时出于勉强,但也不得不承认有必要让每个国家的政党按照其工作所

xv 必须依据的条件,放手制定其政策和纲领。第二国际自始至终都只不过是各国社会主义集团的松懈联盟,对其成员的约束力非常有限。事实上,只有在意见大体上一致的时候,国际才能在政策问题上作出强制性决定,而且在号召采取积极行动时,也总是小心翼翼地拟

定决议，以便至少能取得主要代表团的同意。它尤其不敢冒犯在票决时行动一致的德国人，他们纪律严明，团结统一，虽然无力使自己的意见永远得以通过，但实际上却几乎享有无限制的否决权。

在第二国际的初期，讨论的范围很广泛，没有一个是突出的。接着就由于米勒兰事件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事件本身是德莱福斯事件引起的，争论的是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是否正当的问题；由于考茨基巧妙地起草了一个通常以他的名字为名的文件才避免了分裂。随后国际的注意中心就转移到促进社会主义者团结的方面去了，特别是促进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团结。1905年，当法国的各个派别经过劝导联合起来，而俄国的革命则于同年被镇压下去的时候，国际的主要注意力又转移到帝国主义大国之间日益增长的战争危机方面。1914年以前，国际一直关注这一问题，并曾夸口可以扭转各主要国家工人效忠自己祖国的立场；到了1914年，这种不实之词终于被戳穿了，而国际作为一个组织也随着欧战的爆发而彻底瓦解了。

随后，作为欧战的一个后果，发生了1917年的俄国革命；而在共产主义于俄国奠定基石以后，重建共同的社会主义者国际的可能性就消失了。因为新型的共产主义完全否定了组织松散的联合机构，这种机构在“自己存在、也让别人存在”的基础上，使得见解很不一致的团体实际上能够在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内共存。民主集中制的新信条，不仅在每个国家中，而且在国际上，都跟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内以国家为依归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所发展起来的议会社会主义完全不能相容。此外，这些政党经过战争以后，选举力量大部分都大大加强了，因而根本无意于放下议会权力不去追求，^{xvi}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世界革命。因此，当俄国人正忙于建立第三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工具时，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则着手重建一个以1914年解体的组织为楷模的国际。奥地利人及其在所谓的

维也纳“第二半”国际中的协作者曾作过尝试，打算把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拥护者纳入一个共同的组织，结果无效；无效并不是偶然的。只有集中控制的国际才能适合共产党人，然而也只有松驰的联盟性的国际才能符合那些志在按宪法规定夺取议会权力的社会党的需要。因为争取选民群众时，必须把提出各项直接要求的号召力最广的纲领放在首位，这些要求必然因国而异，而且凡是既有广泛的选举权又有责任代议制政府的地方也正是革命性可能最缺乏的地方。只要具备这些条件，走议会道路的社会党都势所必然地主张发展“福利国家”，而不主张发动彻底的社会革命。它们也不能让自己的国际主义观点比基本选民更浓厚，因为要取得政权，就必须赢得基本选民的支持。

所有这一切今天看来要比四、五十年前明显得多了，那时革命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还能够在一个共同的国际中进行活动。1914年以前，选民遍布各阶层，同时又有充分的责任代议制政府的国家是很少的，其中有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此外就寥寥无几了。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享有广泛的选举权，但是没有责任制政府。俄国人则两者俱缺。意大利人快到1914年的时候才扩大了选举权。在西班牙和不少其他落后国家，则选举名单以至选票都可以由当局操纵。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之间就不可能清楚地划出一条分界线来。

XVII 在俄国，甚至连温和派也不得不走革命的道路；而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则都不可能成为单纯的立宪主义者，因为他们都必须面对不能单凭宪法手段去推翻的专制政权。虽然德国和奥地利的党实际上都是改良主义的党，但是两党都一直宣称信仰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而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王朝都垮了台以后，革命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之间才有了明确的分界线，并且把世界工人阶级运动分割为两个无法调和的成分。这样，也就为法西

斯主义而不是为世界革命敞开了大门，而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相信，没有这种世界革命，他们自己的俄国革命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曾为本卷的定名思考很久，最后决定把它叫作《第二国际》，因为我找不到真正令人满意的书名。虽然我很想把议会行动与直接行动这个主题放到书名中去，但“社会民主主义与工团主义”这个名称似乎又太狭窄了。“革命还是改良？”这个名称是不能用的，因为我已经说过，1914年以前，在革命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之间是无法清楚地划出分界线的。我所选用的书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所强调的完全是组成国际的那些政党，而把工会以及整个工人阶级运动的其他组成成分排除在外。然而，这毕竟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好书名了，而且无论如何它确实准确地显示了我所要包括的时期。当然，在少数情况下，我发现有必要回溯到1889年以前去，或者是把某一个运动的历史叙述到1914年以后。如果上天假我以年的话，下一卷大概要把这部历史写到1939年。



第一章

1

第二国际的初期

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结束的时候，主要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楷模的社会民主党——至少是它的雏形——已在一些欧洲国家存在；看来这些党在一个新的国际中联合起来的时机已经来临。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分裂以后，它在欧洲的残余组织已经转移到拒不接受马克思的独裁领导的工联主义者手中。但是如前所述，这个工联主义（通称“无政府主义”）国际在七十年代已经逐渐消失了。1877年，它在比利时的韦尔维埃召开了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就在同年为重建一个包括各方的国际而召开的根特社会主义者统一代表大会以前不久。在根特代表大会上，无政府主义者和主张采取政治行动的人之间又恢复了习以为常的论战。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投票中被击败了；大会决定在韦尔维埃设立一个国际联络与统计局，持有各种见解的组织都可以参加。但是这个机构从未实际成立。面对着大会上所出现的无法调和的分歧，主张政治行动的多数派抛开无政府主义者，自行召开了一次会议，并设立了一个联合局，指示它另行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关于采取这一行动，同无政府主义者集团决裂的决定，其签署人中有西萨尔·德·巴普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前者曾经是工联主义国际的领导人，后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其它签署人还有苏黎世社会民主党领袖赫尔曼·格雷利希，路易·贝特朗和其他几个比利时人；此外还有米兰的T·查纳德里（他已经与意大利同道决裂），匈牙利的列奥·弗兰克尔，法国的安德列·伯

尔,以及英国代表约翰·黑尔斯和马尔特曼·巴里两人。

这种发展预示着第二国际的到来。但是,在根特成立的联合局尽管于1881年在瑞士的库尔召开了另一次国际代表大会,而事情却到此就告终了。李卜克内西和路易·贝特朗分别作为德国和比利时党的代表来到库尔;法国工人党和美国社会主义劳工党也都派有代表参加:前者派的是前巴黎公社委员边诺阿·马隆和茹尔·约弗兰,后者派的是木工兄弟会的书记P·J·麦克吉尔。但是大会大部分成员是瑞士德语区的代表,其中包括忠贞的老战士日内瓦的J·P·贝克尔。此外,俄国的保尔·阿克雪里罗得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大会;到会的还有少数几个代表流亡集团的波兰人。英国或荷兰,西班牙或意大利,都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未被邀请与会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忙着在伦敦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会上建议成立一个明确的无政府主义国际。

库尔代表大会上的辩论虽然涉及的范围很广,但是所得出的结论却是建立社会主义者国际的时机尚未成熟。除了德国以外,其他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一个组织完善的社会党,只有比利时的党正在向组织完善的方向发展。德国当时仍在实行反社会主义者法,因而在国际方面不能率先行动。在法国,茹尔·盖得的工人党还在草创期间。根特代表大会在一个难得遇到的意见协调的时刻曾决定组织一个工会国际,并且决定应为此召开一次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但实际上并没有人着手召集。这种工会国际也不是德国人所希望的,因为它既不能把无政府主义者拒之于会外,也不能不让反对工人阶级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温和工会主义者与会。因此,在库尔代表大会以后便再也没有举行过代表大会;建立新社会主义者国际的想法虽然从未放弃,但被无定期地搁置起来了。

不过,复苏国际的企图不久又在法国人的带领下重新抬头。
3 法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在八十年代初期迅速地恢复起来,但却分裂

成很多敌对的集团。1882年，盖得的工人党已经建全起来，并且远远地走在工会运动的前面。可是盖得及其马克思主义同道却遇着保尔·布鲁斯所领导的可能派的挑战。可能派于1882年组成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而且在工会方面拥有自己的一大帮追随者。1883年，可能派首次在巴黎召开了一个国际劳工代表大会。正象这10年间所召开的大多数法国劳工代表大会一样，这次代表大会也是成分混杂，代表各种不同倾向的各种产业工人团体和政治团体都参加了。大会的意义并不在于所取得的任何成就，而仅仅在于大会的召开反映了当时存在的这样一种感觉：为了改进工人的工作条件，特别是为了缩短工作周，各国蒸蒸日上的工人阶级运动应该使各自在这方面的要求协调一致起来。这个目标在第二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更加明确的系统说明，第二次代表大会也是由可能派主持的，1886年举行于巴黎。到了这时，主要的问题已经变成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同时采取行动以实现8小时工作日制。争取8小时工作日制的运动在美国已经开展了一个很长时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熟练工人利用“淘金热潮”所造成的劳工不足的有利形势，早在1856年就以总罢工为威胁手段赢得了8小时工作日。这种让步做法不久便推广到其他州，但由于没有得到法律批准，未能遍及全国^①。七十年代末期，曾有人为普遍贯彻8小时工作日制而进行鼓动；1885年当局制定法律，规定对妇女和儿童实行这一制度。澳大利亚代表约翰·诺尔顿出席了巴黎代表大会，使大会知道了这些成就；大会也关切地注意了美国的发展。在美国，8小时工作日同盟是在伊拉·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先后成立的，后来又在经济萧条中瓦解了。但是到了1883年，劳工骑士团又把8小时工作日制列为其近期纲

^① 见本卷第855页及以下。

4 领中的一条,而且在1885—1886年还举行过多次地方性罢工为实现这一制度进行斗争。在巴黎代表大会上,布鲁斯派人物维克多·达尔提出了一个报告,吁请制定国际劳工法律来实施这一要求。达尔的报告得到他的可能派同道西蒙·德勒尔以及代表比利时社会党出席大会的爱都阿·安西尔和西萨尔·德·巴普的大力支持。后两人建议成立一个以8小时工作日制为首要目标的国际劳工组织,并且力主在1889年召开另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以便成立这个国际劳工组织,同时作为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巴黎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建议,并委托法国可能派的党负责筹备工作。唯一反对这个提议的是英国代表,他们并不怀疑缩短工时的好处,但反对为此而制定法律,并在投票表决这一主要议案时弃权。法国代表在开过这个国际代表大会以后立刻就去参加他们自己在里昂举行的劳工代表大会;会上带头争取8小时工作日制的是雷蒙·拉维涅(1851—1930年)和波尔多的安东尼·茹尔德,并且有让·杜尔摩亚发言予以支持。在里昂的大会上,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制而进行的鼓动和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总罢工联系起来。当时有人大力主张,如果各国政府或雇主拒绝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工人就应该举行总罢工促其实现。这个方针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多数人主张先只停工一天,同时举行一系列示威游行,向雇主和当局提出要求。然而少数人却坚持认为,不能指望各国政府会作出让步,而示威游行也只有在教育工人采取更富有战斗性的行动方面起作用。

我们将在下面的某一章中谈到^①,在这以后,法国工会便日益关心为举行总罢工而进行准备的主张。有些人认为这是工人起义的第一步,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不诉诸“资本主义”国家而强行取

① 见本卷第340页及以下。

得经济让步的武器。到了 1888 年，这个同 8 小时工作日制的要求⁵有明显联系的运动已经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而且人们也正在为 1889 年初同时停工一天而大力进行准备。

当时还曾为召开另一次国际劳工代表大会进行了安排。这次代表大会 1888 年举行于伦敦，出席会议的有英国职工大会的代表，也有约翰·伯恩士、安尼·贝赞、汤姆·曼恩、凯尔·哈迪等社会主义者。英国职工大会曾不顾它所设立的议会委员会的反对，派了代表参加 1883 年和 1886 年的国际代表大会，而议会委员会则终于不得不屈从大多数代表的愿望。当法国人要求议会委员会担任 1888 年国际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时，委员会最初坚持要把这个问题提交职工大会全体会议去考虑，并且发表了一个小册子大力批评大陆各国工会不稳定和不可靠。当代表们不顾议会委员会的反对而责令其筹备这个国际集会时，委员会就草拟了一份章程，旨在把社会主义团体摒于会外，使之成为纯工会的集会。这一步骤阻止了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联盟，以及欧洲大陆的各社会党出席大会；但并未能排除那些可以从工业团体得到代表委托书的社会主义者出席。德国人被彻底摒除了，但是比利时人、法国人和荷兰人却大批地出席了，此外还有两个丹麦人和一个意大利人——米兰的康士坦丁诺·拉查礼。会议是混乱无绪的；由于没有正式报告，所以不容易弄清楚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大会所通过的主要决议无疑是主张在国际上进行鼓动，以争取制定 8 小时工作日制的法律；同时大会决定 1889 年举行国际博览会时在巴黎召开另一次代表大会，以便建立一个旗帜鲜明的国际组织。

1888 年伦敦代表大会的步调同前几次代表大会不一致，这是因为英国职工大会的领导人坚持尽可能把大会开成一个非政治性的会议。这种作法当然触怒了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德国人、比利时人和法国的盖得派。结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他⁶

们的盟友也着手筹备1889年在巴黎另行召开自己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而法国的可能派则为伦敦大会已经决定召开的国际劳工代表大会发出了请柬，但不再受英国工会领导人强加的章程上的限制。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于是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在海牙召开了一次会议，希望使两个互相对立的代表大会联合起来；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反极权主义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协商宣告破裂。结果双方都举行了代表大会，而且都就争取制定8小时工作日制法律通过了差不多完全相同的决议。这种一致的作法大体上是由美国人的影响促成的。美国有两位代表——都是印刷工人——参加了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美国人虽然没有派代表参加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但是后来担任海员工会书记的休·麦格雷戈却曾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并且还转达了美国人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成了最后决议的基础。

这时，美国的8小时工作日运动的领导已经由劳工骑士团转到美国劳工联合会手中了，后者正由塞缪尔·龚帕斯建成一个强大的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1888年决定为8小时工作日制发动一个新的运动；办法是每一年都由一种工业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争取8小时工作日制的罢工，罢工的工人由开工的行业给予资助，直到每一种工业都依次举行了罢工，从而普遍取得了让步时为止。把“五一”这一天定为发动进步工人运动的节日的想法并不新奇；但是这一回看来是从美国方面传来的，并且似乎是作为美国劳工联合会已经决定采取的行动的直接结果而列入了两个巴黎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中。实际上，在这两个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法国工人在1889年2月就已经第一次同时举行了争取8小时工作日制的示威游行，这一行动在大多数工业中心都得到了热烈的响应。7 当时决定，以后把五月一日定为劳动节，并决定把8小时工作日制作为直接要求放在首要地位上。在那次为讨论团结问题而在海牙

召开的后来宣告失败的会议上，人们曾担心德国人慑于俾斯麦的进一步镇压措施会拒不同意这项建议；他们的发言人威廉·李卜克内西事实上确曾坚持每个国家的运动必须能够自由地使自己的行动适应本国的条件，决不要让每个国家都保证在国内举行罢工。在这一点得到承认了以后，德国人也就接受了这项决议。

1889年巴黎的两个代表大会都有很多代表参加，法国人在这两个大会上都占压倒多数。可能派在兰克里大街举行的大会人数比较多，代表超过600人，其中法国代表就占500多人。马克思主义者在佩特雷尔大厅举行的代表大会有391人出席，其中221人是法国人。参加后一集会的外国人比较多，有81名德国人，22名英国人，14名比利时人，8名奥地利人，6名俄国人，荷兰、丹麦、瑞典、挪威、瑞士、波兰、罗马尼亚、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葡萄牙、波希米亚和保加利亚等国也派来了较小的代表团，此外还有美国、阿根廷和芬兰的来宾列席。毫无疑问，有一些小代表团只是徒有其名而已，是由很小的脱离原国籍的流亡集团所委托的流亡分子组成的。尽管如此，这次代表大会仍然聚集了一大批欧洲各国新出现的社会党的领袖。德国人中有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他们已经是老资格了；还有爱德华·伯恩斯坦，当时他还没有以“修正主义者”出名，但已经由于在新闻事业方面卓具成就而名闻遐迩了；此外还有工会的主要组织者卡尔·列金、巴伐利亚的领袖格奥尔格·海因利希·冯·福尔马尔、已经成为德国劳工立法专家的赫尔曼·莫尔肯布尔以及克拉拉·蔡特金等。法国人中有茹尔·盖得、爱德华·瓦扬、沙尔·龙格和保尔·拉法格（后两人是马克思的女婿）、蔡费兰·卡麦利纳、雷蒙·拉维涅以及维克多·若克拉尔等。塞巴斯蒂安·福尔也作为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发言人出席了大会。

比利时人是由西萨尔·德·巴普和爱都阿·安西尔率领出席的，后者是著名的根特前进合作社的主要创始人。奥地利人由维克多·阿德勒率领，而匈牙利人则由列奥·弗兰克尔率领；帕布罗·伊格列西阿斯和何约塞·梅萨来自西班牙，S·帕尔姆格林来自瑞典；彼得·拉甫罗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代表俄国人中的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倾向。多美拉·尼文海斯来自荷兰，他很快就倒向无政府主义。不过，有一些意大利人在两个代表大会上都露了面，其中包括安德里亚·科斯塔和老加里波的派兼巴黎公社社员阿米尔卡尔·契普里阿尼；比利时工党的声誉日隆的艾米尔·王德威尔得也是如此。没有参加这个代表大会的主要有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它很不相称地侧身于反对者阵营，但恩格斯对这一点却深为满意。

出席佩特雷尔大厅代表大会的英国代表团是一个很奇特的团体。在社会民主联盟同社会主义联盟之间的争执中，恩格斯支持后者，并且尽力使大部分英国代表都出自后者。因此，首席代表威廉·摩里斯发现自己所领导的团体中的大部分人都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矢志主张的议会方法。这批人中有弗朗克·基茨和阿瑟·托卡蒂之流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有马克思的第三个女婿爱德华·爱威林及其妻子爱琳娜·马克思·爱威林；此外不久前建立的苏格兰工党也派来了R·B·肯宁汉·格雷姆和凯尔·哈迪，这就使意见更加分歧了。

在兰克里大街举行的那个对立的代表大会上，没有德国代表参加，而法国人不论就参加的人物和人数说来，都占压倒优势。英国代表团中的杰出人物是H·M·海德门和约翰·伯恩士。代表意大利的是F·S·墨林诺，还有科斯塔和契普里阿尼。法国代表中有保尔·布鲁斯、让·阿勒芒、J·B·克雷芒、维克多·达尔以及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演说家约瑟夫·托特利埃。由于害怕在回国时受到

警方的注意，有一些外国代表的名字没有透露。其中后来为人所知并曾起过主要作用的有：来自俄属波兰的波勒斯劳夫·利曼诺夫斯基、丹麦人哈拉尔德·詹森、荷兰人威廉·修伯特·伏列根、葡萄牙的F·V·德·康波斯以及美国人W·S·王德莱和P·T·克罗莱等。

从上面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大会要比对方卓越得多，因而很顺利地就把对方赶出了舞台。正是由于这一点，上述几次为第二国际成立扫清道路的国际代表大会便大部分被人遗忘了。随着被人忘怀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整个运动在早期阶段曾同争取8小时工作日制斗争，同美国在这一斗争中的主动作用有密切关系。实际情况是：建立新国际的运动主要是美国人和法国人发起的，其工会主义色彩当初至少同社会主义色彩一样浓厚；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这一运动接了过去，从根本上改变了运动的性质，使之成为那些承认政治行动的重要性，而且只要环境许可就通过议会进行主要斗争的社会党走向国际联合的一个步骤。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德国人是在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者法废除的前夕，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赢得1890年帝国议会选举的巨大胜利的前夕主动采取行动的。

在佩特雷尔大厅最后一天的大会上，代表们就这次代表大会所决定采取的行动通过了一项决议，其实际内容如下：

定期举行大规模示威，其方式是：所有国家和所有城市的工人议定于同一天同时要求政府当局制定法律把工作日缩减为8小时，并把巴黎代表大会的其他决议付诸实施。

鉴于美国劳工联合会1888年12月在圣路易斯召开的大会上已经选定1890年5月1日为举行类似示威的日期，兹将这一天定为国际示威日。

各国工人必须在本国具体情况所构成的条件下完成这一次示威

行动。

这项决议的最后一段是在德国代表团的要求下加进去的，它不愿保证采取罢工行动，实际上它不愿保证采取任何可能引起反社会主义者法复苏的行动；这项法律除非国会同意其延长，否则将于1890年到期失效。

如前所述，兰克里大街的代表大会也通过了一项措辞大体相同的决议，其近期纲领的头一条就是要求“由国际法规定8小时工作日为最长的工作日”。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在德国编定和印行的佩特雷尔大厅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中，虽然载有决议原文，并声称它是由雷蒙·拉维涅代表法国工会全国联合会提出来的，但是并没有刊登辩论内容，也没有指出这项决议具有任何特殊意义。事情很清楚，德国人把关于8小时工作日制和1890年5月1日同时采取行动的決定看作是比较次要的问题。

尽管如此，1890年5月1日仍然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日子。许多国家以及其中的很多城市都举行了争取8小时工作日制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广泛的停工不仅在法国发生了，在奥地利、匈牙利，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以及在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美国也都发生了。但是英国的工会仅仅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以避免任何停工，认为这样做就够了。在一些地方，工人们仅限于举行有秩序的示威游行和集会，但是在无政府主义者闹得很凶的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却发生了一些同军警激烈冲突的事件。甚至在5月1日以前，就有许多新闻记者和积极分子被控以煽动暴乱的罪名而遭到逮捕，其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准无政府主义者尤其多。特别是在法国，出现了激烈的意见分歧。可能派的右翼及其工会方面的支持者反对停工，并敦促其追随者满足于举行和平游行，向政府当局递交请愿书，然而让·阿勒

芒所领导的左翼则要求举行一次总停工。这是可能派的党发生分裂，各个持反对态度的集团在阿勒芒的领导下组成新左翼革命社会党的原因之一。

1890年的“五一”运动只有在美国直接取得了实际成果。很多工人组织——特别是木匠组织——赢得了8小时工作日制。在以后几年中，由于美国劳工联合会遵循每年春天把一个特殊工种的工人投入运动的政策，又有许多工人组织取得了胜利。在另一些情况下，工人虽然还没有赢得8小时工作日制，但实现了9小时工作日制。

事实上，1890年开始的国际工人示威运动已发展成为一年一 11 度的经常性活动，这是显示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前所未有的最壮观的表现。1890年，德皇召开了考虑“国际劳工立法”问题的会议；1891年5月，罗马教皇发出了劳工通谕。这两件事显然同当时普遍提出的制定社会性法律（特别是制定关于8小时工作日制的法律以及取缔有害健康或危险的劳动条件的法律）的要求有关。德皇的倡议并没有带来实际成果，因为在柏林召开的各国政府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社会问题”毕竟被彰明昭著地提到舆论面前来了，旧时代的基础——经济自由主义——已经严重动摇。

九十年代初期的工人阶级运动由于各种思想的冲突而深受干扰，当时的思想冲突决不单纯是左右两派之争，也不是两派同中派之争。不论在策略问题上还是在目标问题上，都同时发生了许多场论战。其中一场论战是关于政治行动的，它不仅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改良主义政治家和那些相信劳资协调而不主张由国家制定法律的人之间。另一场论战与此有关，但决不是一回事，问题的中心是工人运动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前面已经谈过，马克思主义者坚

决主张通过集权化的政党采取高度纪律化的政治行动，把工会当作补充力量和从事竞选活动的辅助性机构，小心翼翼地把政策掌握在党的领导手中。他们希望通过选举和宣传控制国家的立法机关，但是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并不认为，选举上的胜利——即使赢得议会中的多数——必然会改变国家的基本性质。他们一直认为，选举上的胜利只是为某种性质的革命铺平道路，而革命的结

12 果则将是推翻现存的国家，而由一个工人或人民的新国家来取代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有自己的近期纲领，其中关于工业立法的要求越来越占重要地位。不过他们大都仍然把这类改革看作是必须在怀有敌意的国家中夺取的东西，而不是在国家向民主制过渡的进程中予以实现的东西。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马克思主义者同其他人一样，每当想到“国家”的时候，都本能地认为它是最高行政当局而不是立法权威。在德国和俄国，“国家”就意味着政府；至于议会，则凡是存在的地方，它都被看作是一个制约国家的因素而不是最高权力机关。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差不多各地都是这样看法，只有瑞士（也许还有丹麦）除外。即使在法国，情况也基本上是这样；法国的第三共和国继承了拿破仑第二帝国的很多传统，因而很难指望议会或参议院带头搞社会革新。

这种对待国家的态度实际上阻碍了德国社会主义者从利用议会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这个角度去制定纲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讨论德国社会民主党1890年以后的方针的一章中还将谈到^①。在考茨基或李卜克内西看来，在国家保持现状的条件下，国家控制并不意味着社会化，而仅仅意味着把更多的经济大权移交给一个跟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结盟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最高行政当局。只有经过革命的改造，国家才能成为可用的工具，使工人得以

^① 见本卷第287页及以下。

通过人民资产的民主管理而推进自己的事业。因此，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只有在完全独立于任何其他政党以外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社会民主党人即使是为了实现某些眼前的要求而打算同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实行任何种类的联合或在政府中搞合作也是错误的。诚然，这些观点不久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遭到了福尔马尔和伯恩施坦之流异端分子的挑战，但是在1889年，这种挑战还没有明确提出，而且即使提了出来，也有整套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来对付它。

法国的局面则不同，因为法国受议会控制的程度要大得多。跟 13 德意志帝国不一样，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感到有义务去维护共和国这个政治结构，以防止专制或君主反动势力复辟。当德莱福斯事件和米勒兰事件出现而直接引起捍卫共和国的问题，并使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敌对派系的危急年代里^①，这一点便成了关键性的问题。德国人没有共和国可捍卫，也没有真正的议会制度。法国人则有之，甚至连那些鄙夷议会的人对于共和国的号召也不是同样充耳不闻的。然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德莱福斯危机的高潮期间仍然拒绝同资产阶级共和派合作，甚至还要说资产阶级政客的吵吵闹闹同自己无干。布朗基派自然是赞同他们的；饶勒斯、马隆以及独立社会党人断然持反对意见；而布鲁斯派（即可能派）则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派系。

不过，法国工人阶级运动中的矛盾要比上述分歧所说明的复杂得多。德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卷土重来的时候，虽然能够提供少数愿意效命搞暗杀的人，可是作为一种影响群众意见的势力来说实际上已经消灭了；不过在极左翼始终有一个反议会的小集团存在。德国的工会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受到

^① 见本卷第353页及以下。

了严格的纪律约束，只有基督教或自由派（希尔施-敦克尔派）所主持的较小集团除外。但是在法国，无政府主义则以多种形式（从“用行动宣传”的派别到无政府工团主义）出现，形成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盖得派使工会跟着党走的企图也只取得了局部的成就，而且还靠不住。可能派领袖保尔·布鲁斯起初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并且始终反对中央集权，但是他已经从无政府主义转而提倡市有化社会主义行动；他的信从者中已经有很大一批温和派，这批人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又反对日益壮大的革命工团主义运动。当让·阿勒芒率领左翼脱离的时候，可能派就成了一个右翼社会主义政党，但仍保留一些工会方面的关系。当时同可能派结盟的独立社会党人跟可能派的不同之处在于，独立社会党人主要是一批领袖人物所组成的议会党团，并没有形成一个以任何实力雄厚的地方组织为后盾的运动。

德莱福斯事件的发生和由此而对共和国造成的威胁，才使人们把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共和派合作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这以前的那几年中，使法国人分裂的重大问题是政治行动和劳工行动的相对作用问题。盖得派和布朗基派可以跟其他集团联合起来，一致要求8小时工作日制，并希望工人利用五一节来显示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团结；但是关于适当的示威方式或所应追求的直接目标，却没有达成真正的协议。布鲁斯派、马克思主义者、布朗基派以及工团主义者在要求劳工立法方面，也可以取得一致意见，尽管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对这一点也表示反对。但是布鲁斯派所要求的只是和平游行和派代表去见政府当局；盖得派的主要意图是利用这个时机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赢得支持；布朗基派（至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始终梦想把示威行动变成起义；而工团主义者则把每一个五一节都首先看成是总罢工的演习，一俟工人的思想作好充分准备，总罢工就会导致社会的改变。当然，上

述一切只是极其简略地说明当时的舆情，事实上各个敌对集团内部的思想都是十分混乱的。不过有一点始终是确实无疑的：法国的情况同德国不一样，始终存在着若干支强大的势力，这些势力不准备接受任何方面——右派、左派或中派的政治领导，只期待从工会运动而不是从任何政治党派得到鼓舞。这些集团对国家也是敌视的，但其理由同德国人不一样。德国人认为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即将由无产阶级的中央集权国家所取代，因而敌视之，而法国人之所以反对国家，则仅仅因为它是国家，于是只要它存在，便目之为人民的敌人。这些集团充其量只把国家看作是工人可望依靠有组织的阶级力量从中取得让步的机构，而不是——远远不是——到时候可以把它改变成表达自己的集体意志的机构。 15

那么，五一节示威游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为了向政府当局请愿并显示工人阶级的团结吗？这是一种看法。是用罢工行动强迫资方和政府当局让步吗？这是第二种看法；顺便说一句，这是大大影响欧洲当时事态发展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看法。是为了号召工人支持社会主义者，不到赢得议会多数，掌握国家并把它改变成为工人的国家就不罢休吗？这是受德国鼓舞者的影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第三种看法。是为了训练工人采取规模越来越大的罢工行动，同时又通过每一次罢工从私人雇主、市政当局以至国家本身赢得让步，而无需参加议会行动，或不致在议会的花招和妥协中迷失方向吗？这是人数日益增多的工团主义者所持有的第四种看法。还有，是为了同军警发生冲突，让工人不仅为罢工，而且为成为彻底的革命者受到锻炼，从而为举行爆动性总罢工，摧毁国家，创建未来的自由社会扫清道路吗？这是第五种看法，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看法。最后，是直截了当地为了尽量滋事捣乱，尽量激起破坏性的愤怒情绪，以便达到……难于说清道明的目的吗？这是不折不扣的无政府主义的看法，其内容是要建立一个彻底摆

脱政府，甚至不受工会专制统治的社会，不但要根除资产阶级统治而且要彻底消灭资产阶级道德。当然，持最后这种看法的人只是少数，但毕竟有这种人，而且在少数无政府主义者的据点中，这种看法还使主张五一示威的人同那些一心指望“用行动宣传”的地下小集团挂上了勾。

1890年并没有举行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不过1891年8月来自15个国家的337名代表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大会，却由于16 1890年和1891年五一节示威游行的成功而大受鼓舞，因而决定每年都庆祝五一节，并且庄严地决定以庆祝五一节来争取达到下述三项目标：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施加压力，在广大范围内推进国际劳工立法；明确宣布各国工人维护国际和平的意愿。这次代表大会还进一步决定，在五一节那一天，“除无法实行的地方以外，所有各地”的工人都应该停止工作。

把“劳动节”同和平的要求明确地联系在一起，这似乎还是第一次。这个新目标主要是在德国人的倡议下提出来的，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希望“五一节”具有政治性，而不单纯具有经济性，并且希望利用这个节日强调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反对帝国主义者贩卖战争的行径。德国人自豪地向工人兄弟们诉说，自己怎样抗议了兼并阿尔萨斯-洛林的事件，并将继续抗议这一点；同时又说，自己怎样投票反对德国的帝国主义预算，怎样希望同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共同奋斗。毫无疑问，德国人还认为，如果能使“五一节”指向这个目标，他们就可望摆脱责任，不必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制采取罢工行动，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对采取罢工行动没有准备，而且担心这种行动会使国内刚刚取消的法律压制重新恢复。

事实上，德国人极不愿意承担任何义务，使自己卷入罢工行动中。我们已经谈过，德国人坚持在1889年的决议中列入一项条

款，让各国自由决定其参加国际“五一节”示威的方式。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他们同英国代表联合提出一项建议，主张把全部庆祝活动从“五一节”移到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不必举行罢工，当然也就完全放弃美国劳工联合会最初提出的计划，按照这项计划，需要为实现8小时工作日制而举行罢工，不仅是罢工一天，而且是需要罢多久就罢多久，直到取得胜利为止。不过，美国的计划始终没有被欧洲各国的运动所采纳；美国计划的 17 基本办法是每年选定一种工业，由这种工业提出当前的要求，而由其他继续开工的行业给予帮助，支持罢工。欧洲的计划与此不同，它主要是在法国制订的，主张举行仅限一天的总罢工，这一天的群众性示威的矛头首先是针对政府当局。这也需要停工，而且停工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虽然时间只有一天。因此，在罢工权利受到任何法律限制的地方，这就造成了辞退工人和采取合法报复行为的机会，而大多数国家又都有这种法律限制。在法国的倡导者看来，这项计划的一个优点是号召工人起来公开反抗束缚他们的不公正法律。

与此相反，德国人和英国的工会领袖则根本不愿意煽动工人去反抗法律，主张在“五一节”那一天只举行完全合法的和平示威，借以显示工人阶级的团结，示威时完全不扰及工业，也丝毫不破坏任何合同或者集体协议。但是他们无法说服法国人和奥地利人，事实上也无法说服大多数其他代表团。法国1891年的示威群众在一些地方同警察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①，而且在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等等国家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凡是发生这种冲突的地方，工人们都群情激昂，大多数人都无比坚决，誓把“五一节”定为示威游行的日子，决不让步。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① 在阿韦纳附近的富尔米地方，军队和宪兵向一个广场上的示威群众开枪，结果击毙10人，击伤的更多，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有一点迁就了德国人和英国人，即同意只在罢工行动不被认为是“行不通”的地方才举行罢工，这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领袖认为“行不通”，这个国家就不必举行罢工。但是他们却坚持“五一”这个日子；并且坚决认为，示威行动一般说来应该包括在选定的那一天不上工。

18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对于前一年在柏林举行的各国政府劳工立法问题会议的失败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代表大会把这次失败当作证据，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基本上是反动的，并警告工人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当然，这也就提出了主要手段究竟应该是劳工行动还是在议会中赢得胜利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仍然象以往一样分歧。作为工会组织的代表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一小撮无政府主义者在表决中失败了，但是他们决没有从此销声匿迹。无论如何，即使没有他们，马克思主义者同另一些人之间的分歧也就够大的了；前者完全相信组织严密的政党的力量，而后者则认为工会能起创造性的重要作用，并一心向往利用总罢工集中显示工人阶级团结的机会。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在社会民主党人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争执上用了大量时间，很多代表对浪费这么多宝贵时间表示不耐烦；他们花了组织上很多钱，不远千里前来参加大会，希望能把实际成果带回给自己组织中的成员。后来在1893年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以及在1896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上，也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前面已经谈过，所有这些早期代表大会的组成成分都是不确定的。这些代表大会通常被称为“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但有时又被称为“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代表大会”，例如1896年就是这样；至于哪些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以及工会有权参加大会的问题，则没有人过问。在德国，工会问题并没有引起麻烦，因为工会在卡尔·列金的领导下，同社会民主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工会的代表实际

上是社会党代表团的一部分。德国人的麻烦，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来自半无政府主义的左翼。这一派人以柏林《社会主义者》的编辑古斯塔夫·兰道尔和H·威尔纳为领导，只是由于最初没有对代表委托书进行审查，他们才得到了与会机会。根据这些早期代表大会的安排，委托书的审查工作主要是由各国代表团自己去作，然后由各代表团向一次全体会议提出报告，说明它承认或者否定了 19 哪些人的与会资格。在代表大会上，可以对这种报告提出质疑，但它通常是得到承认的，虽然并非总是如此。德国人有一种对付闹事的少数派的强硬办法，那就是不让他们参加代表大会。其他代表团就无法用这种高压手段来处理问题。例如法国人就总是存在尖锐的分歧，而在重大问题上，往往又分成几乎势均力敌的两个方面。这倒不是因为只有两个集团存在（事实上集团很多），而是因为分歧归根结蒂总是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的分歧。这种情况同政治行动主义者与劳工行动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是不同的，因为政治行动主义者本身就存在尖锐的分歧。布朗基派和盖得派反对可能派，也反对以饶勒斯和米勒兰为首的那一批主要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独立社会党人；阿勒芒派则越来越脱离可能派而靠近革命阵营。工会主义者也至少分裂成为三大派，即温和派、盖得派和工团主义者；其中有相当多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他们有些是拿着工会的委托书前来的，另一些则是各种具有社会主义称号的团体派来的代表。法国人的情况始终很混乱，表决的票数总是很接近。当时还没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多数敢于拒绝承认反对者的代表资格。在1896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上，法国人只好以两个独立的代表团参加大会，双方都要求全体会议予以承认；饶勒斯、米勒兰和维维安尼以独立社会党人下院议会团体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除了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以外，拒绝向任何人交验代表委托书；关于接受他们与否的问题引起了很大争执，最后大会全体还是接受了他们。

英国人所遇到的麻烦也不少。社会民主联盟在1889年的惨败以后，实际上仍然得以参加历次代表大会，但是它始终未能象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居于领导地位。当8小时工作日制已经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职工大会就被推选负责1888年伦敦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尽管职工大会的议会委员会态度冷漠，但是整个职工大会显然依旧是英国工人最有代表性的组织，而且只要代表大会所关心的主要是8小时工作日制和国际劳工立法之类的问题，就必然要让职工大会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国际代表大会在英国举行的时候，筹组工作和发出请柬的责任就必然主要落在职工大会的身上。但是在这个阶段，职工大会议会委员会或是职工大会本身，就象美国劳工联合会一样，都当然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组织。在参加历次国际代表大会的英国职工大会（或其愿意与会的所属工会）的代表中，有少数人是社会主义者，但其中大部分都是“自由党-劳工派”的工会主义者；这些工会主义者感到大会的讨论不大对胃口，而且也往往完全不能理解。在支持或是反对政治行动的问题上，他们也投赞成票，但是他们的意图跟德国人、奥地利人或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布朗基派都完全不同；这些人坚持“政治行动”必须由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来采取，同资产阶级政党不发生任何关系。当然，英国的独立工党同社会民主联盟一样，也采取这个方针，但是这个党直到1893年才建立，在这以前只有一些地方性的“独立劳工派”团体，其中包括1888—1889年建立的苏格兰工党。1893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联盟投向无政府主义并渐趋消亡，英国代表团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即社会民主联盟，独立工党和职工大会，其余的代表是费边社社员和几个小团体的成员。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每当遇到批准谁该参加会议的问题时，英国代表通常几乎是有求必应，承认所有的与会权。但是在实质性问题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站在“政治派”一边，投票反对劳工行动的鼓吹

者；而在提出改良还是革命的问题时，他们就象法国人一样分裂成为左右两派。

在其他大代表团中，奥地利人的社会民主党几乎完全是按照德国人的榜样在1889年的海因菲尔德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奥地利人虽然允许捷克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代表团内部作为一个单独的团体存在，但是代表团却往往是以几乎完全一致的阵容出现的。维克多·阿德勒博士已经是奥地利人的主要发言人；奥地利出生的卡尔·考茨基在起草他们的纲领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他的妻子露意莎·考茨基在维也纳的妇女中是一位杰出的领袖。匈牙利人连同克罗地亚小组单独派了一个以列奥·弗兰克尔为首的代表团，弗兰克尔以前在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中活动，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瑞士人就不大团结了，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准无政府主义者已经丧失了以前的优势，瑞士人的两个主要组织——格留特利联盟和工会联合会——同蒸蒸日上的社会民主党配合得很好。其中的杰出人物是老一辈的卡尔·毕尔克利和晚一辈的赫尔曼·格雷利希；这两个人都属于格留特利联盟，后者在社会民主党内也很活跃。此外，还有社会民主党的罗伯特·赛德尔。工会联合会的代表中最杰出的是奥古斯特·墨尔克；还有汝拉无政府主义者的死对头、年迈的比埃尔·库勒里医生也重新当了代表，出席大会。

比利时人在统一自己的工党的过程中，同工会和合作社密切联系，已经不再倾向“工联主义”方面。其中的新人物有：爱德华·范·贝佛伦、爱德华·安西尔和艾米尔·王德威尔得，还有他们在议会中的主要代表路易·贝特朗，这些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而决不是亦步亦趋地追随德国人。但是他们都坚定地赞成政治行动，尽管比利时的选举限制重重，使他们难望在议会中获胜。他们认为工会和工人合作社在党内应该具有发挥独立作用的地位；他们的“国家社会主义”观点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淡薄得多。无政府

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集团依然存在，特别是在煤矿方面，但是这些集团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另一方面，荷兰的无政府主义或准无政府主义流派却仍然居支配地位，以多美拉·尼文海斯和克里斯蒂安·康奈利逊为荷兰社会主义联盟中的杰出人物。当1896年的伦敦代表大会明确宣布排斥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候，以这两人为首的大多数荷兰代表终于退出了代表大会，留下了5名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前者指责这个党不过是德国人的尾巴。这个党的领导人是H·H·范·柯尔、P·J·特鲁耳斯特腊和W·H·伏列根。

瑞典代表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党主要以德国的党为楷模，但是工会的势力较大。他们1893年没有派任何代表团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但是1896年，担任议员的贾尔马·布兰亭和属于运输工人工会的工会领袖查尔斯·林德利却能在大会上代表迅速壮大的社会民主运动发言。挪威人通常总是满足于由社会民主工党派出一名代表。另一方面，丹麦人则由那个同工会有密切联系的社会民主党派出了阵营坚强的代表团，双方在同一个代表团中相处得很好。他们的主要发言人是工会的J·詹森和社会民主党的P·诺德森。

在欧洲的另一端，意大利人彼此仍在激烈争吵。他们一般总是派出包括许多不同流派的大型代表团。前面已经谈过，1889年他们在两个对立的代表大会之间摇摆不定。安德里亚·科斯塔同无政府主义者决裂以后，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社会党，1892年又同其他一些团体联合组成统一社会党；米兰的菲利浦·屠拉梯和罗马的恩利科·费里教授两个新进人物加入了康士坦丁诺·拉查礼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教授一边。同这些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者相对抗的是力量仍然很强大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它们在工会中有追随者，从本国穿过法国一直到巴塞罗那都建有联系。后一集团的主要发言人是阿米尔卡尔·契普里阿尼，他

有时以意大利代表身份，有时又以法国代表身份出现。他自称代表人民总联盟的拉丁支部说话，当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想要排斥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候，他一再提出抗议。意大利最大的无政府主义巨头埃里科·马拉特斯塔从一开始就置身于新国际之外，虽然他至少在国际中出现过一次。

西班牙派出的代表很少。其政治领袖是帕布罗·伊格列西亚斯，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建立了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同他一道出席的通常至少有一位西班牙总工会的代表，这个工会同社会主义工人党有联系。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参加大会。 23

我们已经谈过，在1889年的巴黎代表大会上，俄国有好几个派别的代表参加，从民粹派的理论家彼得·拉甫罗夫和民意党的约瑟夫·倍克到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阐释者乔治·普列汉诺夫都有。普列汉诺夫是1893年苏黎世代表大会中唯一的俄国代表；但是在1896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上，却有7名俄国代表，除了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妻子芮丽叶以外，还有社会民主党人保尔·阿克雪里罗得和维拉·查苏利奇。当时在接纳马克思主义团体所拒不接受的柴可夫斯基和费里克斯·沃尔霍夫斯基等其他代表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普列汉诺夫终于在大会上报告了俄国地下社会民主运动迅速发展的情况，并且把民粹派当作旧时代的残余，一脚踢开。

波兰始终有自己的代表团。1889年，领导代表团的是费里克斯·达辛斯基、斯坦尼斯拉夫·孟德尔逊和马莉·茹可夫斯卡，还有来自斯拉夫同盟波兰支部的列奥·温尼亚斯基。在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达辛斯基和孟德尔逊得到斯坦尼斯拉夫·格拉布斯基和其他一些人参加到自己的阵容中来。在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波兰共有13名代表，除了达辛斯基以外，还有3个重要的新人物，

即波兰社会党的约瑟夫·毕苏斯基和J·莫齐奇以及代表波森和布雷斯劳的波兰人的罗莎·卢森堡。这些波兰代表团代表波兰全国各地——俄属波兰、奥属波兰和德属波兰出席会议。他们当中向东倒向俄国的一派人同宁愿倒向德国的另一派人之间已经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民族主义色彩较浓的一种社会主义（皮尔苏茨基后来成了它的声名狼藉的代表人物）之间也存在着严重分歧。他们中有一些人是美国以及伦敦和巴黎的波兰人集团派出的流亡者。在国际早期的辩论中，他们根本没有起很大的作用；大体上说来，在各个主要代表团的争执中，他们的处境是很困难的。

在巴尔干半岛国家中，罗马尼亚总是有自己的代表团，代表主要来自社会民主党。保加利亚人已经存在对立的宗派，1893年他们的代表是克里斯提安·拉科夫斯基和N·C·加布罗夫斯基；但是24 是在1896年的伦敦大会上，拉科夫斯基则领导了一个单独的代表团。塞尔维亚也派了一位代表参加苏黎世大会，但是没有派代表参加伦敦大会。在1893年的苏黎世大会上，有一名澳大利亚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但在1896年，澳大利亚人却请爱德华·爱威林当他们的代表。澳大利亚的工会或者工党都没有自己的真正代表；至于新西兰，则甚至没有人自称是它的代表。

最后，我们要谈一谈美国人。如前所述，有两个美国工会人物参加了1889年的可能派代表大会，第三个美国人则是参加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列席代表，此外还有一些散居在美国各地的外国移民团体的代表参加了后一会议。美国劳工联合会虽然在两个代表大会上都传达了口信，但是并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其中的任何一个会议。在后来举行的几次代表大会上，总是有美国代表，但是他们并不是来自美国工人的主要组织。来自美国的杰出人物是社会主义工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丹尼尔·德·里昂。同他一道参加

苏黎世大会的还有纽约中央劳工联盟的路易·桑尼阿和纽约犹太工会的阿布拉罕·卡汉。1896年,桑尼阿再一次出席大会,这一次则代表德·里昂派的行业与劳工联盟;同他一道前来出席大会的有社会主义工党的马修·马奎尔和代表一些散居各地的工会团体的其他5名代表,其中一些人的与会权发生了争议。这时,社会主义工党由于内部的斗争而陷于分裂,新的美国社会党还没有出现。

在第二国际初期举行的所有这些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党人享有最后决定权,因为他们了解自己的要求,而且行动时抱成一团。他们在表决中一再击败无政府主义者,要后者退出大会,并且声言同后者没有共同之处。然而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办法摆脱无政府主义者。虽然许许多多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愤然同第二国际断绝关系,但是总有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回到国际中来,同时抗议说,同是一家兄弟,所要求的不过是一个“自由的”国际,向所有致力团结工人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的人敞开大门,即向所有资本主义的敌人敞开大门。马克思主义者则说,除此以外,总还有那么一些多情善感的白痴被无政府主义者侈谈的兄弟之情所欺骗,要求人人都能自由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也总有那么一些人虽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们对社会民主党人所信赖的纪律严明的党或选举活动都感到厌倦。当时很难结集一个多数派去排除这些中间集团,而且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愿意整个地驱逐这些中间集团。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在自己充分控制了每个国家的代表团和支持代表团的运动以后,把某些中间集团争取过来,然后再逐个国家地对付其余的集团。他们的策略是不断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使国际把政治行动当作必要的武器,承担采取政治行动的义务,并且抓住所出现的一切机会,把对手中任何碍手碍脚的集团赶出大门。

然而,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使来自公开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或伪装得很不巧妙的社会主义团体的无政府主义者,其委托书

可以拒不承认，但是却无法阻止那些得到工会提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再回到代表大会中来。只要一个国家的中央工会组织能发挥作用，并同社会民主党有密切联系，或是从属于这个党或其他具有类似观点的工党，这种困难就不会出现。但是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这样的组织。法国就有若干个代表不同倾向的彼此对立的工会团体，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也是这样。在英国，职工大会倒是把各个工会联合在一起了，但是它本身就是新旧工会运动这两种对立倾向的逐鹿之所，而且全英国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来领导工会。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历次代表大会，甚至对那些有全国性中心组织的国家，也是既接受中心组织派来的代表，也接受个别工会派来的代表；还没有人知道怎样才能给工会下一个适用于世界各国的明确定义，从而说明其代表委托书是可以接受的。在争取8小时工作日制斗争中，显然有必要取得最广泛的工会支持，并且让工会在历次代表大会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这样做，就不可能不一方面让那个反对建立社会党或工党的英国自由党劳工派参加，另一方面又让那些指责议会行动是欺骗和背叛行为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

26 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总是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尽全力追求一个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国际，就必然会丧失历次代表大会所得到的工会支持的大部分；但是他们又不能轻易地容忍代表大会被当作宣传无政府主义或工团主义的讲坛。事实上，当无政府主义者重新掀起的暴乱浪潮席卷整个欧洲，而各地的反动派又抓住一切机会把社会党人跟刺客和扔炸弹者混为一谈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就更加不能容忍后一种做法了。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前来参加代表大会是无法防止的；他们来了以后，要制止被冒犯的社会民主党人耗费大会时间去开脱自己，说明同无政府主义者煽动革命的论调毫不相干也是办不到的。因此，代表大会就一

次接着一次吵得不可开交。

在 1893 年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争吵的结果是通过了一项决议，其英文正文如下：

一切工会以及一切承认有必要组织工人和采取政治行动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均得以参加代表大会。这里所说的“政治行动”，是指工人阶级的组织竭尽所能利用或掌握政治权利与立法机构以增进无产阶级的利益并夺取政权的行动。

关于这项决议的含意，事实上也就是关于这项决议的正文，后来发生了争执。这项决议的用意显然是排除那些不支持用政治行动去赢得议会代表权并夺取政权的非工会组织。对于工会这一衡量标准就不适用了。然而要是一切工会均得以参加代表大会，那么不仅对任何能够取得现存工会——不管它多么微不足道——提名的人要敞开大门，表示欢迎，甚至对专门为参加大会而组成的工会所派来的代表，也得敞开大门，表示欢迎。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和全国性工会的中心组织都辩解说，决议所指的仅仅是真正的工会；但是什么样的工会才是真正的工会呢？有些人说，真正的工会必须是一个保证采取政治行动的工会，哪怕是只做到主张劳工立法的程度也行，理由是任何工会如果做不到这一步，就决谈不上关心国际事务。但是，甚至连这一点也无法接受，因为英国职工大会 27 议会委员会就不打算让它的一些反对 8 小时工作日制制的成员被摒诸大门之外。于是，“一切工会”这几个字究竟何所指，含意始终无从肯定，而有一些身分可疑的代表也就得以偷偷地钻进了大会。

我们不妨通过实例谈一谈 1896 年伦敦代表大会中人数众多的英国代表团的组成成分。在 476 名代表中，来自工会的不下 159 人，另有 26 名来自地方的行业与劳工理事会，2 名来自妇女工会同

盟，还有3名来自妇女工业理事会。社会民主联盟派来了121名代表，独立工党派来了117名，费边社的代表是22名。3名代表来自威廉·摩里斯的铁匠社会主义协会，3名来自布里斯托尔、牛津和伯克郡的地方性社会主义者协会，还有3名是约翰·特雷弗的劳工教会联盟派来的。代表们提出要取消资格的只有伯克郡社会主义者协会的代表，该协会只有4名会员，倒派来了2名代表。英国代表团允许它派出一人而拒绝了另一人。

当然，英国代表团是很庞大的，因为代表大会是在伦敦举行的。在1893年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英国代表共有64人，而其来源则复杂得多。社会民主联盟派出代表8名；刚刚成立的独立工党5名，苏格兰工党2名，费边社5名，另有5名来自各地方性社会主义者协会。有1名代表来自伦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其成员主要是外国人；有1名来自一个具有社会主义观点的生产合作社；还有1名代表来自犹太工会和社会主义者协会。在工会方面，职工大会委员会和矿工联合会各派出代表4名，达勒姆的矿工工会自行派出2名，煤气工人工会派出3名，其他工会总共派出16名。地方性行业理事会派出代表6名，妇女工会同盟派出2名。有一两个无政府主义者，如C·W·莫布雷之流，以工会代表身分参加了大会。

同法国和意大利代表团的复杂情况相比，英国代表团就算不了什么了。前两个代表团的成员往往每人都持有好几个团体的委托书，如果某一份委托书遭到拒绝，就出示另一份。法国代表来自对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对立的全国性工会联合会，来自学生团体和地方性工会，来自社会主义刊物，来自地方性工团和全国性工团联盟，来自职业介绍所和宣传团体。参加1896年代表大会的还有来自独立社会党人议会团体的代表。这些代表简直无法加以归类，因而无从说明他们主要代表什么团体或为谁说话。

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上首先提出讨论的问题是苏黎世决议。汤姆·曼恩和凯尔·哈迪都要求广泛容纳不同意见，饶勒斯和海德门则持相反意见。荷兰代表尼文海斯对苏黎世决议的正确性提出质疑，认为象克鲁泡特金这样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是优秀的社会主义者，尽管某些无政府主义者并非如此。不久之后就以保守党候选人身份参加议会竞选的英国棉纺工人混合工会代表詹姆斯·毛德斯莱说，英国支部支持苏黎世决议。接着就以国家为单位进行了表决。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波希米亚、保加利亚、丹麦、德国、匈牙利、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国、西班牙、瑞典、瑞士以及美国一致投票赞成重新确认苏黎世决议。法国代表以57票对56票、荷兰以9票对5票投了反对票。意大利人两边票数相等，因而弃权。英国人以223票对114票投票赞成决议，表决是在审核代表委托书以前进行的，所以任何人只要自称是代表就可以投票。然后各国代表团便举行会议来审核与会代表者的资格，有少数人被排除出去。我们已经提到，在法国独立社会党人的地位问题上曾经发生争执，又一场争执则是由于一个波兰人被摒诸会外而引起的。另在意大利的报告问题上也引起了争吵。路易斯·米歇尔自称持有意大利代表委托书，而马拉特斯塔则加入法国代表团出席大会。当时的大会主席海德门裁决说大会已经作出排除无政府主义者的决定，于是有几个人在提出抗议以后退出了大会。荷兰代表中大多数人是准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最后宣布，同意接受主张议会行动的少数派的主张。法国代表提出把自己的代 29
代表团分成两个独立部分的要求，米勒兰获准发言，表示赞成。在表明两个法国集团将平均占有分配给法国的委员会名额以后，他们的建议在有正反两种意见的情况下获得通过，法国多数代表投票反对。大会已经举行了四次，还没有取得建设性的成果。不过，由大会本身组成的各个政策委员会还没有把报告准备好，因而浪费

一些时间也许就没有多大关系了。

大多数委员会的报告在拟就以后，都没有多少内容。当时没有时间去弄清楚在各国不同的环境中实施建议会遇到什么复杂局面，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通过一般性原则，而具体的建议则只作为少数派的报告提了出来，而且大都几乎未经讨论就被否决了。比如土地委员会宣布，土地应该社会化，但又承认无法就方法问题取得任何一致的建 议。它只能建议采取积极步骤去组织农业无产阶级，而把制定纲领的责任留给各国自己。政治行动委员会（报告人是当时属于社会民主联盟的乔治·兰斯伯雷）宣布，赞成工人阶级采取政治行动去夺取政权，也赞成用立法和行政手段去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该委员会说，利用这些手段是为了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要求“摆脱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普选制（其中包括妇女解放、第二轮投票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所有民族实行全面自治，消灭殖民地剥削”。它号召所有受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的工人“同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站在一条战线上，组织起来，推翻国际资本主义，建立国际社会民主制”。

这个报告使持工会委托书出席大会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托特利埃、接着是瓦扬和饶勒斯起而反对。然后，英国自由党劳工派对报告中所提出的政治独立的要求表示反对，而独立工党的彼提·古朗则为这一要求辩护。接着倍倍尔代表德国的党发言，费里则代表意大利人说话，两人都为独立的要求辩护。在英国自由党劳工派和某些其他方面的修正案被否决以后，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一报告。

在下一次会议上，悉尼·韦伯提出了教育委员会的报告，报告总结出7项决议，远比大多数其他报告详尽。这些决议要求每个国家的“政府当局”规定一套“完整的公众民主管理的教育制度”，“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学校向所有儿童免费供给午餐；学生离

校年龄最低是 16 岁，半工半读的教育应进行到 18 岁；提供奖学金和生活津贴；雇用童工应严加限制，并制定严格的国际工厂法典。即使是就先进国家来说，这一切都带有几分空想性质，但是并没有人提出严重的质疑。凯尔·哈迪觉察到这个报告隐藏着一个意图，即打算牺牲其余的儿童去培养聪慧的儿童；克拉拉·蔡特金回答说，委员会肯定无意让所有的儿童不分能力高下一律受大学教育，这时哈迪也否认自己有这样的意思。当时就这个报告的英文、德文和法文本之间存在的所谓出入曾发生争论；会议通过了哈迪提出的一项修正案，删去报告中所提到的“奖学金”字样，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这个字眼显然含有资产阶级的意味。然后，根据法国的动议，删去了有关提供免费午餐和生活津贴的整个一句话，理由是没有必要深入细节，而且 1891 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已经宣布国家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向所有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潘克赫斯特夫人使大会删去了韦伯所用的“逐渐”字样，而代之以“尽速”；然后大会就通过了这份报告。

接着由社会民主联盟的 C·A·吉布森提出组织委员会的报告。这份报告建议代表大会成立常设国际委员会，选派责任书记，并确定会址，从而使代表大会本身成为永久性组织。报告要求代表大会成立临时委员会拟定全面的计划，并向下届代表大会提出报告。此外，报告还建议在每个向外移民或接受移民的国家建立专门机构，以保证移民不致同工人阶级运动脱节。报告还特别建议在移民离开本国以前，向他们分发资料性小册子，并在他们到达移入国时，由该国（特别是大西洋彼岸的国家）的工人阶级组织为他们安排一个欢迎会。大会批准以伦敦为第二国际的会址，并且通过了这份报告；但是代表大会最后散会时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去成立所建议的委员会，后来也没有下文。有关组织问题的讨论中途被打断，以便听取战争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而这一报告又引起如

此冗长的辩论，以致组织委员会的建议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

战争问题委员会一开头就断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对立，而不是宗教或民族的对立。委员会说，各国的工人必须取得政权，旨在把“资产阶级的工具”——各国政府——所掌握的制造战争的手段剥夺掉。委员会要求“在废除常备军的同时建立国民军”；建立仲裁法庭以解决国际争端；“在政府拒绝接受仲裁法庭裁决的情况下，战争与和平问题直接由人民作最后决定。”

在讨论中，R·M·潘克赫斯特博士建议删去“国民军”字样，但是被否决了。贝尔福特·巴克斯建议补充说明，仲裁法庭的裁决应该是最后的；这一点得到了同意，虽然桑尼阿宣称，仲裁“完全是中产阶级的糖蜜”。然后巴克斯又试图删去关于交由人民作出决定的要求，但是瑞士的格雷利希力主保持原句，结果得到了胜利。最后，大会一致通过了经过修正的报告。

接着提出了经济与工业委员会的涉及面非常广泛的报告。这份报告一开头就概括地宣布赞成“生产、运输、分配和交换资料的普遍社会化；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所有这一切都应交由一个充分民主的组织去管理。报告强调，这一点越来越有必要，因为“普通的工会或孤立的政治行动无法遏制”日益发展的垄断企业。委员会主张建立某种国际机构去监督托拉斯和联合企业以及它们的政治阴谋，并“通过全国性或国际性立法”使托拉斯和联合企业社会化。报告接着说，造成危机和失业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妨碍人类充分利用迅速增长的生产力，并且明确表示，“从经济观点着眼”，煤矿、钢铁工厂、化学企业、铁路和其他大型工厂“都已经达到了国有化和社会化不会造成困难的阶段”。因此，报告呼吁全世界工人“立刻在本国全力要求采取明确的措施实行社会化、国有化和共产化”。

报告的下一节讨论了工会的职能。报告说，对保卫工人和改进工人的条件来说，工会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工会的斗争“只能减轻而不能消灭劳工所受的剥削”。要消灭剥削就要夺取政权，并利用政权制定法律。工会应该帮助弄清楚这样一点：“只要工人阶级的组织仅仅是政治性的组织，它也就是不完整的和不全面的组织。”但是经济斗争也要求劳动阶级采取政治行动。“为了保持工人在公开的劳资纠纷中从资方得到的任何利益，都必须用法律把这些利益肯定下来；由于采取了立法措施，其他场合下的斗争就可能成为多余的事。”

经济与工业委员会在提出上述比较一般的主张以后，就谈到了比较详细的建议。委员会要求“废除一切关税、消费品税和出口保险费”，并要求制定国际性劳工保护法。关于后者，委员会建议把当前“治标性的鼓动”限制在三项具体要求上，其中首先是8小时工作日制的要求，此外还有充分的结社权和废除血汗制。然后委员会引述了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国际劳工立法的8项要求，接着又回到工会问题上来，力主各国工人“在自己的国家组成全国性的工会，以免组成独立的或地方性的小组织而浪费力量”。委员会规定，“政治见解上的分歧不应该成为在经济斗争中采取单独行动的理由；另一方面，由于阶级斗争的性质，劳工组织有责任教育其成员认识社会民主主义的真理”。委员会接着号召工会接纳妇女，并且保证“同工同酬”。最后，委员会建议：“在每个国家建立中央工会委员会”，作为国际组织的基础；“一旦发生罢工以及闭厂拒工和抵制行动时，各国工会应根据自己的能力互相支援”。

这就是经济与工业委员会的多数派报告，是由德国人莫尔肯布尔提出，并由社会民主联盟的哈里·奎尔奇建议予以通过的。少数派的报告很短，提请大会注意接连几届法国劳工代表大会——

1892年的马赛大会、1893年的巴黎大会、1894年的南特大会和1895年的利摩日大会——主张总罢工的声明，并号召各国工人“研究这个应在下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的重要问题”。这样，关于总罢工的大辩论就产生了，而且在以后几年中占去了第二国际的大量时间。应该指出，这个问题在1896年提出时，并没有特别提到防止战争的事。这一点是经济与工业委员会少数派报告内容的一部分，是作为“解放的方法”提出来的。伦敦代表大会几乎没有经过讨论就否决了少数派的这份报告，而多数派的报告则只经过一些次要的修正就为大会所通过，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修正案是由潘克赫斯特博士提出的，规定“凡是在没有私人提供就业机会的地方，就应该由公家以合理的工资提供就业机会”。另一项修正案是由爱德华·爱威林代表澳大利亚提出的，并经大会通过，修正案号召工人组织不要求制定限制外国移民的法律；还有一项修正案是由瑞士代表A·福奎斯提出的，它重申了一项决定，即继续举行五一节示威，“以争取法定的8小时工作日制和抗议军国主义为其主要目标”。

最后讨论的是英国独立工党J·布鲁斯·格莱西尔提出的其他事项委员会的报告。报告肯定了“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地方性与全国性的公共集会与结社自由等基本权利”。报告要求大赦政治犯，抗议警察制造事端的做法。此外，报告要求取缔私营职业介绍所，并且普遍建立市政当局或工会主办的免费职业介绍所。报告最后说，关于提交其他事项委员会讨论的国际用语问题无法提出报告，委员会提请代表大会表明在英文、法文或德文中希望采用哪一种语文。这一点代表大会没有来得及表明意见。

代表大会最后讨论了下一次代表大会的安排。李卜克内西代表国际执行局提出了一项提案，原文如下：

大会议事程序委员会受权负责拟定下次代表大会的请柬，专门敦请下述各方面人士参加：

(1) 力求以社会主义产权和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产权和生产方式，并把立法和议会行动当作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必要手段的组织的代表。

(2) 虽未积极参加政治斗争，但已宣布承认有必要采取立法和议会行动的纯工会组织，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不在被邀之列。

报告的下一段建议成立代表委托书审查委员会，凡是对由各国代表团自行组成的委员会的决定有异议时，可以向该委员会提出申诉。社会民主联盟试图修正李卜克内西的草案，旨在使代表大会进一步成为社会民主党代表的集会，但遭到否决。一位英国工会代表——建筑工人工会的W·史蒂文森抗议，工会是根据一些虚假的说法被拉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它们在英国代表团中没有发言权，只能听旁人长篇大论地“探讨那个象千年至福一样渺茫的理想社会”³⁵。代表大会举行了一些仪式，并通过了李卜克内西的报告，接着就结束了。

我相当详尽地叙述了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的进行情况，旨在使人们对第二国际早期会议的情况有一个概念；当时第二国际规模初具，正在形成一个以刚露头角的社会党为基础的政治性集会。

我们将看到，那些在1914年以前使第二国际陷于分裂的大问题，在它早期的几次代表大会上几乎已经全被提了出来。只有排除无政府主义者的那场斗争在1896年以后就差不多结束了（不过“政治行动派”同工团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仍然很激烈），除此以外，1896年辩论的问题到了1914年仍在辩论中；或者说，如果不是由于战争的爆发使原定在那一年举行的代表大会没有开成，这种辩论还会进行下去。早期的代表大会同后来的代表大会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从1900年开始，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在第二国际的辩论

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而且往往把前期居于显要地位的劳工立法问题推到相当靠后的地位上去。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如下事实：1900年以后，有一些国家的选举权有所改变，因而社会主义者就有可能在议会中取得足够的席位，从小团体变成强大的政党，而各国议会也就被迫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程序以适应这种局面。1914年，参加第二国际的国家仍然有一些没有能够建立这样的政党，因而依旧不得不在议会外进行大部分政治活动。但是总的说来，到了1914年，社会主义所带有的议会色彩要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浓得多。

当然，在受到这种影响的国家中，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不妥协性也随着这种改变而有所下降，从而使这些国家同那些仍然受专制统治的国家之间的分歧更加尖锐。1896年以前，改良主义作为一种倾向虽则显然是存在的，但是还没有明显地成为一种向马克思主义挑战，从而在国际上造成壁垒分明的对立态度的学说体系。³⁶ 费边主义是英国的一种学说，可能主义是法国的一种学说；德国的修正主义当时还没有形成，虽然南德的改良主义已经形成。在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由于战胜了无政府主义，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同工团主义者的斗争则刚刚开始。

第二章

第二国际的后期

37

(I) 1900年——巴黎

从表面上看，1900年巴黎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主要以三件事出名，那就是对米勒兰事件所引起的危机的处理^①，关于成立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决定，以及在一些问题上——在一些不久之后即引起尖锐分歧的问题上——所取得的表面团结。这次代表大会是在这样的时刻召开的：当时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已经在德国人中间激烈地展开，但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或者说，在国际上还没有同社会党人参加非社会党政府的问题分开。后一问题引起了某些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实际政策问题，但引起的方式是促使中派坚定地同革命者站在一边去反对入阁派，从而形成一种人为的左派多数。在反对米勒兰类型的改良主义者的斗争中，有些社会民主党人寄希望于建党，要使党的力量很快就强大到足以控制本国议会的程度，这种人自然倾向于革命的左翼，因为他们看到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会妨碍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得到发展。毫无疑问，这种联盟很可能使社会民主党人在立法方面取得他们当时还无望单独取得的进展；但是如果在不太遥远的将来真有望赢得明显的社会民主党多数，那么同资产阶级左派结盟，而把赢得多

^① 1894年法国陆军部发现军事泄密事件，犹太籍军官德莱福斯被诬告入狱。查明真相后反动派拒绝重审案件，引起法国广大人民反抗。政府不得已改组内阁，由瓦尔德·卢梭任总理，并收买独立社会党人米勒兰入阁以欺骗人民，是为米勒兰入阁事件。——译注

数的机会白白扔掉,那似乎又是愚不可及甚至是背叛的行为了;在这个阶段,哪怕仅仅是为选举而结盟(只有为决选的胜利而作出的结盟安排除外),那似乎也是愚不可及甚至是背叛的行为。在大多
38 数德国人看来,重要的任务是把党建设成为一支群众性的选举力量,所有其他的考虑都必须从属于这项任务。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极高的威信和极大的影响,因而它坚持这一个看法的立场就具有很大的分量。在德国人中间,这不仅是左派和中派的观点,也是许多追随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尽管巴伐利亚和巴登的南德改良主义者并不持有这种见解。德国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虽然在反对倍倍尔和考茨基的斗争中是盟友,可是并不是同一回事。一个修正主义者完全可能象考茨基那样强烈反对米勒兰主义,而且事实上也累见不鲜,因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很可能妨碍党采取一条到时候可以赢得自己的多数的路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工党就决不愿参与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的活动,因为它希望到适当的时候由它自己取得政权。恰恰同这个情况一样,大多数德国人在1900年也坚决反对入阁。可以中肯地说,在帝国的政治中,德国人本身实际上并没有遇到任何这样的问题,因为当时并不存在很快有人邀请他们参加帝国内阁的前景。不过在某些邦里,他们实际上倒的确面临这个问题,而且改良主义又不同于修正主义,其力量来自邦的政治而不是帝国的政治。

在有人参加第二国际的其他大多数国家中,社会党都远远不能象德国的党那样指望甚至设想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即使赢得这种支持,也远远不能指望哪怕是在众议院取得多数议席。但是许多党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断赢得选票和议席的成就着了迷,往往把德国党的选举政策当成榜样,希望有朝一日这种政策也能使自己取得德国党很快就要取得的成就。在许多社会党看来,首要任务似乎是取得普选权,就帝国的选举来说,德国人根本没有进

行任何斗争，俾斯麦就把选举权交了出来。事实上，它们只有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帮助下才有希望以合乎宪法的方式取得这种权利，因此它们就必然会支持那些在议会中为这种权利而努力的资产阶级改革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没有受这种需要的怂恿³⁹而赞成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因为它们认为争取选举改革的斗争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在议会内，资产阶级政党必然会领先，因为在目前的选举制度下，资产阶级政党掌握着大部分议席。但是在社会党人看来，实现选举改革的前景主要取决于在议会外究竟用多大力量来不断进行鼓动和群众示威，以及在办得到的地方举行短期的示威性总罢工。在大多数国家中，社会党人即使是应邀参加资产阶级控制的联合政府，扩大选举权的机会也不会显著增多。他们倒不如投票赞成资产阶级政党在外界的压力下可能被说服而提出的最进步的措施，而不是去参加自己实际上必然会成为妥协的一方的联盟，从而挫伤自己发动的超议会运动的锐气。

由此可见，组成一个强大的多数派去反对入阁主义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建立有朝一日能够赢得明显多数的社会党的可能性，显然取决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全面团结，或者是接近全面的团结，因此把反对入阁主义的斗争推向极端是不适当的，原因是怕右翼拱手退出。因此，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的目标是拟定一个提案，一方面正式表明反对米勒兰主义以及可能提出的同资产阶级结盟的几乎所有其他各种论调，同时又不真正把大门关死。向米勒兰表示和解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要避免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最危险的分裂，跟饶勒斯和解却是必要的。米勒兰甚至同自己的党商量就擅自采取行动，显然是逾越了不可逾越的限度；而饶勒斯虽曾支持米勒兰，但其态度是有保留的。当时由考茨基承担下一项草拟文件的任务，其措词既要使中派感到满意，并解除极左派的武

装,同时又不致于把右翼赶出第二国际,也不致于使饶勒斯丧失立足处。

在巴黎代表大会上,艾米尔·王德威尔得雄辩滔滔地提出了一项议案,其内容正是考茨基所草拟的:

40 在现代的民主国家中,无产阶级政权的赢得不可能是突击的成果,只有经过长期耐心的活动,在政治上和工业中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使无产者的肉体和精神获得新生,并在市政和立法机关中逐渐赢得席位,才能得到这种成果。

但是凡在政治上实行集权制的地方,就不可能以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赢得这种成果。不能把社会主义者单独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当作是开始赢得政权的正常方式,这种做法决不是别的而只能是在紧急形势下临时采取的权宜之计。

至于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这种紧急形势是否存在,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代表大会没有必要对此作出决定。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危险的试验只有经过统一的党组织的批准、而且担任部长的社会党人自始至终是党的代表,才可能带来好处。

如果社会党人不征求党的意见而擅自就任部长,或不再是党的代表,那么他参加政府就非但不能加强无产阶级,反而会削弱无产阶级,非但不能有助于赢得政权反而会推迟之。

代表大会宣布,如果党组织认为有关政府在劳资纠纷中表现了偏袒的态度,社会党人就必须退出资产阶级政府。

这个提案最后以 29 票对 9 票通过,表决是以各国代表团而不是以代表个人为单位进行的,每个代表团有两票投票权。只有两个代表团——比利时和爱尔兰——一致投反对票。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和美国的代表团内部意见不一致,各投一票反对票,一票赞成票;其他代表团一致投票赞成这个提案,当然它们的队伍中有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在辩论中,赞成提案的主要发言人是王德

威尔得、饶勒斯、安西尔和奥艾尔，反对提案的主要发言者是费里、盖得和瓦扬。当时属于左翼的意大利代表费里提出了一项由盖得起草的修正案，其内容如下：

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再次宣布，无产阶级不论是用和平方式还是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都需要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权。 41

因此，只有在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议会议席这一形式下，只有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大会才允许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大会禁止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对此社会党人必须抱坚决反对的态度。

除了措词不同以外，这个盖得-费里修正案不过是把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在米勒兰事件以前差不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政策规定了下来。不过，在这一事件发生以前，这个问题并没有以实际形式出现过。而在这一事件果真发生的时候，它之所以使法国社会主义者陷于分裂，主要倒不在于究竟是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问题，甚至也不在于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结盟总的说来是否相宜的问题，而是在于保卫共和国的问题；当时普遍认为共和国由于德莱福斯案件而陷于危险之中。米勒兰本人为了借激进派内阁之手实现他所希望的社会改革，无疑赞成参加激进派内阁。不过只有少数人主张这种方针。饶勒斯一开头虽然为米勒兰辩护，但是他辩护的根据是，社会主义者在共和国处于危急之际必须团结在共和国周围。不过在辩论的过程中，他实际上就抛开了米勒兰，而继续站在共和国的立场上为入阁问题进行辩护。在采取这一方针之后，他反对盖得派就有了坚强理由，后者所采取的是一种奇怪的态度，认为德莱福斯案件同社会主义者毫不相干，同时认为他们所必须对付的究竟是哪一种非社会主义政权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不过，以在野的身份支持激进派政府而不实际参加政府，是有可能群策群

力地保卫共和国的。实际上，这正是饶勒斯和布鲁斯的追随者所做的事情。但是，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却从来没有深入讨论过这是不是所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就表面来看，会上争论的仅仅是关于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万无一失地谴责米勒兰而不必担心内部发生分裂。但是大会无法做到对所有参加政府的行为一概加以谴责⁴²的地步。如果一概加以谴责，法国就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党，而且很可能在其他地方——例如比利时和英国——引起很多麻烦。必须把大门敞开，以便在形势紧迫的关头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不仅仅是以在野的身份支持之。但是，为了顺应舆论的主流，就必须附加严格的条件，把实际入阁之门尽可能开得小一些，而且为了不扩大争论的范围，最好是根本不谈以在野的身份支持政府的政策是否有道理的问题。我们很难认为真有人相信，允许社会党人在紧急状态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那些条件严格说来是行得通的，因为这些条件恰恰同内阁制政府的成规惯例相抵触，会使任何一个当上部长的社会党人根本无法跟他的同僚相处。参加大会的代表也不可能认为，普列汉诺夫坚持加进去的条款是易于解释的，这一条要求任何担任部长的社会党人在政府解决劳资纠纷不够公正时辞职。试问政府是否公正又由谁去下断语呢？这些条件的用意并不在于行得通，而在于尽可能反对入阁主义，但又要避免在国际内部造成严重危机，引起分裂。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肯定反对入阁主义，但是还是把团结的要求放在前面，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

讨论了米勒兰事件以后，巴黎代表大会便转而讨论帝国主义殖民地问题。荷兰人范·柯尔提出一项议案，使第二国际承担义务，不仅保证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方法同资本主义大国的殖民扩张主义政策作斗争，同时保证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发起组织社

会主义政党的工作，并同这些政党进行最充分的合作。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明确的反帝国主义议案被一致通过。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的代表都借此机会谴责英国在南非战争中所表现的帝国主义作风。几年以后，殖民主义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的⁴³行列中有了辩护者^①，比利时人在承担建立刚果自由邦^②的责任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分歧，荷兰社会主义者在东印度群岛问题上也发生了争论，而这些意见上的冲突后来也都在第二国际的辩论中反映了出来。但是在1900年这些争执还没有由于各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日益加剧而表面化，社会党人仍然有可能几乎全体一致地全力谴责殖民主义。

在巴黎代表大会上，接着出现的一场大辩论是关于反军国主义的，发动者是罗莎·卢森堡。以达辛斯基为首的加里西亚^③代表团，再一次对罗莎·卢森堡作为波兰代表的资格提出质疑，但是大会支持了她的与会权。罗莎·卢森堡的发言主要值得注意的是，她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危机可能不是由于经济崩溃而是由于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而爆发。从纯经济观点来看，她说这番话的时候，资本主义正在非常迅速地发展，特别是在德国和美国，因而她显然并不是估计资本主义会由于内部崩溃或由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而很快死亡。实际上，她说资本主义的统治“也许会维持一个长时期”，但是它的丧钟迟早是要敲响的，这一点极其可能是由于专搞剥削的大国之间发生战争而造成的；她还说工人最要紧的是不断进行国际活动，以便为那个决定性时刻的到来作好准备。为此，这项决议敦促各社会

① 见本卷第80页。

② 见本卷下册第十六章。

③ 加里西亚(Galicia)原为奥匈帝国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属波兰，今分属波兰和苏联。——译注

党联合起来进行反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所建议的方法包括：第一，在所有国家组织并教育青年进行阶级斗争；第二，各国社会党人在议会里投票反对一切海陆军预算和一切形式的殖民地冒险事业的开支，第三，每当国际危机有发展的危险时，便在所有国家同时组织抗议和示威运动。

44 这项决议也是全体一致通过的，大部分社会党人竟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多么快地面临民族团结与国际团结这两大号召之间的尖锐矛盾。当时的威胁还没有紧急到足以迫使巴黎大会上的代表弄明白自己最后究竟应当效忠于哪一方，他们还在从容不迫地设法利用一些符咒来驱散这种威胁。接着他们又通过一项决议，谴责 1898 年的海牙和平会议是一个无耻的骗局，理由是会议是由公然追求帝国主义目标的政府所派的代表组成的，而且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剥削者侈谈裁军、国际仲裁以及战争法规的人道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巴黎代表大会在最后阶段开始辩论以总罢工反对战争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引起了很大的注意。由于时间不足，巴黎大会上的讨论是不充分的，但是当时处于极左翼的白里安还是得到机会以鲜明的色彩鼓吹总罢工，同时列金也得到机会大力声言德国工会的反对态度，并且预言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必然会遭到失败。白里安这次为总罢工辩护时，不仅把总罢工当作防止战争的手段，而且主要把它当作一场革命的开端，这场革命将使各地的无产阶级能够夺得生产资料，并以生产资料的长期占有为基础建立新社会。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三国的左翼以及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支持他，但是绝大多数人却宁愿把整个问题暂时搁下，留交各国党进行更充分的讨论，然后再作集体决定。

巴黎代表大会剩下的一项重要决议在第二年导致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建立，执行局设在布鲁塞尔，由比利时人维克多·谢尔

维担任第一任书记。执行局设有两个主要机构：一个是国际委员会，由各国支部任命的代表组成，另一个是国际议会委员会，负责协调各国议会党团的行动。执行局还设有一个由国际委员会选出的书记处，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代表国际发言，并且根据大会所通过的决议采取必要的行动。不过，书记处并没有权力命令各国党采取任何具体行动。事实上，既然大会本身对各国党并不享有强制权力，而只能设法说服它们按照大会的决议行事，因而书记处也就不可能拥有这种权力。但是设立书记处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其所做的工作而言，这也是使各国支部更为密切和更为连贯地保持接触的实际尝试。从此以后一直到1914年，每当危机反复出现时，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在影响社会党的政策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不过，更加密切的接触并不能解决看法上和政策上的基本分歧，而且担心作出任何引起分裂的事情的害怕心理也经常起作用，因而便把实际行动限制在已经取得协议的折衷方案的范围以内。国际议会委员会甚至更不中用，因为每个国家的党组织都声称有权最后决定政策的是它们本身而不是议会党团，而且每个议会党团受策略问题的影响更甚于整个党，策略问题因国家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

从上面可以看出，巴黎代表大会除了建立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以及在有关“入阁”的问题上取得一个折衷方案以外，主要值得注意的是它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使它外表上的战斗性显得比实际情况大得多。在考茨基的提案获得通过以后，大会便让代表们考虑殖民地和军国主义的问题，只是在讨论到批准总罢工为革命武器的实际问题时才被打断。德国修正主义者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当时还没有成熟，不能在国际间进行讨论，因为它们主要仍然是德国人的内部问题。直到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下一次代表大会时，这些问题才占显著地位。

(II) 1904 年——阿姆斯特丹

1904 年，下一届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这时修正主义取代入阁主义而成了主要的问题。从伯恩施坦发表几篇引起争论的文章起，一直到 1903 年社会民主党召开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冲突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并且同米勒兰事件所引起的辩论纠缠在一起，只是在德国人的眼里，这场冲突的重要性超过了后者。在 1899 年的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对伯恩施坦的活动提出了温和的指责^①；后来在 1901 年的卢卑克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谴责。谴责体现在一项决议中，决议虽然批评了伯恩施坦的方法，但又小心翼翼地不对伯恩施坦所下的结论作出判断。只是在 1903 年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才最后明确地谴责修正主义；甚至到这时，党也是以压倒的多数所通过的一项决议提出谴责的，在压倒的多数中有大部分首要的修正主义者。到最后摊牌时，象伊格纳兹·奥艾尔、沃夫冈·海涅和赫尔曼·舒德库姆等站在修正主义方面的著名人物，也属于投票支持正式决议的 288 名代表之列；只有少数人——仅仅 11 名——投了反对票。要求团结一致的愿望如此强烈，也就是说少数派愿意接受多数派决定的要求如此强烈，只要多数派不驱逐他们，或者不使他们无法在党内立足，他们就接受多数派的决议。在德累斯顿大会上，投票是公开进行的，每个代表在投票时都报了自己的姓名。这样做是为了使决议具有庄严宣言的性质，党的领袖们号召全党接受这个宣言。

德累斯顿决议，在得到法国盖得派的赞同并由他们当作社会

^① 见本卷第 285 页。

党人的行动准则而提交第二国际批准以后，很快就在德国以外出了名；决议起草时措词是很慎重的，既明确地谴责了修正主义，又刚好留下一点余地，使修正主义者得以留在党内。罗莎·卢森堡和左翼从1899年开始，在整个争执过程中一直企图把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驱逐出党，但未获成功。倍倍尔随时准备对右翼滔滔不绝地攻击一通，并准备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革命信仰。他也准备从最近逝世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⁴⁷的著名小册子《决不妥协！》中摘引更坚决的言论，宣告对修正主义者的任何让步都会对社会主义的前途造成致命伤。事实上，倍倍尔不得不在听众中造成一种极端革命的印象，以便孤立极左翼和右翼，并防止罗莎·卢森堡及其一伙使党陷于分裂。他的发言确保了这样一点：如果分裂势难避免，那么只有极左翼的一小批人会脱党而去，而且这种行径也会被广大党员看作是没有道理的。他知道右翼是不会分裂出去的，因而他便设法使左翼无法脱党，否则就必然要丧失其大部分影响。1903年，倍倍尔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名振一时；第二年，他带着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所赢得的荣誉去参加国际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大会，并能在那里重奏凯歌。

我并不是说，倍倍尔采取这种路线就是态度不老实，正如同考茨基并非不老实一样。他们两人都老实地不赞成伯恩施坦的态度，也老实地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倾向。倍倍尔完全出自内心地相信，党的正确政策是决不对现存德国政权作任何妥协让步，也决不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以便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建立社会民主党选民的明确多数，并在帝国议会中建立足够强大的地位，迫使不负责任的帝国政府无法继续存在。实际上，倍倍尔完全心口如一地认为，建立一个强大到除赤裸裸地诉诸武力以外就无法对付的社会党反对派去对抗德皇和统治阶级，正是

把德国引向革命的途径。至于在做到这一点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他并没有佯不知以为知。要是德皇和统治阶级果真决定动手，社会党人岂不是必须以武力还击吗？不过，我倒认为倍倍尔显然估计到德皇和统治阶级到时候不敢诉诸武力，而会让革命通过合乎宪法的方式发展，或者至少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发展。姑不论倍倍尔是否有这种想法，他始终认定，他本身以革命者自许这一点同主张党集中全力争取通过议会方式赢得多数的做法绝无矛盾之处；而且这也正是他用来击败伯恩施坦和罗莎·卢森堡，并以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名义把党的主体团结在自己周围的政策。

德累斯顿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谴责了整个修正主义的立场：

修正主义者力图改变我党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几经考验、累战累胜的策略，大会最坚决地谴责这一图谋。修正主义者妄图以迎合现存秩序的做法来代替战胜敌人以夺取政权的政策。采用这种修正主义的策略必然会使我党质变。我党目前的工作是迅速把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改变为社会主义秩序，换言之，就革命一词最精确的含意来说，我党是真正的革命政党。如果采用修正主义政策，我党就会变成一个仅仅满足于改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党。

此外，大会谴责任何掩饰当前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从而使我党变为资产阶级政党仆从的企图。

这段话看上去一目了然，使得修正主义者很难投票赞成对自己进行谴责。促使他们投赞成票的原因是，他们虽然受到了谴责，但并没有被开除出党，甚至也没有被剥夺发言权，因而仍然可以伺机再起，即使不能打着修正主义的旗号，至少也可以偃旗息鼓地提出自己的大部分想法和建议，更何况许多改良主义者实际上就始

终没有用过修正主义这个名称。奥艾尔、舒德库姆和其余投票赞成德累斯顿决议的人，都可以说自己从来没有自称为“修正主义者”，这个称号是别人加在他们头上的。有别于修正主义的改良主义无疑也受到了含蓄的谴责，但并没有明确地予以取缔。当时十分清楚，只要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愿意在行动上遵守多数的决定，倍倍尔并无意把他们逐出党外。倍倍尔对改良主义者仅仅提出了一个警告，即他坚持帝国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必须接受党代表大会的指示，放弃任何违反代表大会公开表明意志而自行其是的权力。倍倍尔确曾向右翼发言人沃夫冈·海涅指明，除非他愿意在这方面服从党的纪律，否则就会被驱逐出党。不过，倍倍尔非常了解帝国议会中人数颇多的右翼议员是不敢公然违抗党纪的，因为右翼人物无疑知道如果那样干，党机构很快就会叫他们大多数人丧失议席。1903年以后，“改良主义者”所抱的唯一希望就是避免使用“修正主义者”这个名称，悄悄地对党内出现的具体问题大做文章。他们很有把握地在期待，对于当初全盘端出来而被扣上异端斜说的帽子遭到否决的大部分东西，党不久就会回过头来，逐一予以肯定。右翼一如倍倍尔和考茨基本人，看出团结是必要的，而且比倍倍尔和考茨基看得更清楚：从长远着想，团结意味着温和，也意味着把任何真正革命的行动无限期地推迟下去。

就是这样，倍倍尔和考茨基便满载着荣誉于1904年到达阿姆斯特丹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人们认为他们光荣地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修正主义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并率领党宣扬了革命政策，反对了各式各样的入阁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妥协主张。他们到达那里时，就象原先决心不让自己的党发生分裂一样，也下定决心不让第二国际发生分裂，他们所无法十分肯定的是能否诱导那些抱有改良主义信念的国际同志在团结的名义下投票反对自

身。无论如何，这一点正是他们希望不冒分裂的危险而尽可能做到的事。但是他们也非常清楚，米勒兰事件所激起的情绪是不会轻易平服下去的；而且不少法国和其他国家代表对于做出任何让步，听任自己的对手打着国际的金字招牌任意搞改良主义是不会轻易感到满意的。事实上，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不得不设法达到两个几乎不可调和的目标：一方面使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重申自己的革命信念，另一方面说服互相敌对的派系——特别是法国的敌对派系——团结成为兼容所有派系的全国性统一政党。倍倍尔得设法使盖得和饶勒斯和解，并且劝说世界上所有的——或者是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主义、政策和其他一切方面都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当作楷模。

实际上，这项工作并不完全象表面上那样困难。倍倍尔至少可以指望第二国际中有两个多数派政党坚决反对分裂，同时也愿意费一番周折去支持德国人的立场。这两个党是奥地利和比利时的党，分别由维克多·阿德勒和艾米尔·王德威尔得领导，两人都已经是第二国际中的著名人物。在这两人中，王德威尔得很可能最最同情改良主义者。这不仅是由于他在气质上倾向于改良主义，而且也是由于比利时党的处境所造成的。特别是在1904年，比利时党刚从争取选举改革的总罢工^①中败下阵来，这就促使该党认真考虑纵使不能同自由主义者实际结盟，至少也要看看有没有可能同他们在选举中进行合作。在奥地利，这个问题并没有以任何类似的方式出现^②，可是阿德勒本质上是一个调和主义者，肯定会把团结的要求看得更高，而不主张不惜引起分裂也要强调革命信念的做法。在其他重要的代表团中，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团肯定会发生分歧——它们历来如此。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人大概会

① 见本卷下册第十六章。

② 见本卷下册第十二章。

追随德国人；普列汉诺夫和俄国人在这一问题上也很可能是这样。危险就在于有一些小党会过分热衷于强调自己的革命信念而不知留有余地，同时对自己的不妥协态度有造成分裂的危险这一点会无动于衷。这些党需要小心对付，而且要用能够劝使右翼容忍的革命言词去尽量加以抚慰。

德国代表们到达阿姆斯特丹时，能够向大会说明自己的成就的还不仅限于德累斯顿决议。在1903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他们的选票从总选票的18%增加到24%，议席则从32席增加到55席。可以肯定，即使有了这一切，他们还必须走一段漫长的道路才能以合乎宪法的方式夺得政权。不过对于那些相信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的人来说，这种成就却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而且无疑也给其他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德国人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必须对付的最重要对手——饶勒斯却拒绝顶礼膜拜。饶勒斯很清楚他自己的政策没有在大会上获得通过的希望，主要的斗争将在那些一心想强行通过德累斯顿决议和那些只希望冲淡这个决议的人之间进行。不过他认为没有什么理由不把自己的意见谈出来。于是他一方面称颂德国社会党人的团结及其最近在选举中所获得的胜利，同时又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政策，而且非但不象他们自己所相信的那样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反而是最软弱中的一个。他之所以指责他们软弱无能，是因为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一个未来的胜利之上，而没有作出任何事情去改进德国工人的实际生活条件，或减少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受的压榨。他指责他们在德累斯顿决议中用革命的词句掩饰他们在当前行动中的无能。接着他又追溯他们软弱无能的根源在于德国的无产阶级缺乏任何革命传统，并就此提醒德国人说：他们甚至没有象法国人已经作到、其他国家的人民正在争取做到的那样，通过不懈的斗争赢得普选权，他们的

普选权是上面恩赐的。他又提醒说，凡是未经斗争而得到的东西，都可能由那支恩赐之手把它取回去，“赤色”萨克森的普选权没有经过抵抗就废除了，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断言：德国人的革命主义是口头的而不是行动的革命主义，他们一方面抱着这种不现实的革命主义，一方面又不理解议会行动取得成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也就是说，德国的党迷恋于革命的词句，没有能够从它日益壮大的议会力量中得到任何真正的好处。饶勒斯着重指出，德国人正打算借德累斯顿决议用一个自相矛盾的政策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束缚起来，这种政策甚至于使他们自己的行动也归于徒劳。他声称：在那些通过过去的斗争已在很大程度上实行民主

52 制的国家，同那些仍然遭受专制统治的国家之间，左右方针政策的条件必然有很大出入。他说，把前一类国家中所有非社会主义政党统统当作一个反动集团看待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其中有些政党对于社会党人当前纲领中的一大部分措施是愿意支持的。他认为对于具有伟大革命传统的法国，对于具有民族和宗教分歧问题的比利时，以及对于具有悠久的代议制政府传统的英国，德累斯顿决议的陈规是完全不适用的。饶勒斯并没有说，凡是适用于这些国家的也会适用于德国或俄国；他所主张的是，要让每个国家自行制订适合本国条件的战略和战术。他并不要求德国人去做他本人希望法国人去做的事，而只是要求他们在行动中就象在词句中一样显出更多的战斗性，并且要认识到仅仅赢得帝国议会的多数（如果他们确曾赢得的话）并不足以使他们成为德国的主人。德国人谴责饶勒斯和那些赞同他的人抛弃了阶级斗争。饶勒斯就把法国人团结起来保卫共和国所取得的具体成就同德国人在萨克森甚至连已经到手的东西都没有能保住的情况做了对比，从而回敬了德国人。他说：法国的学校已经从教会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世俗界已经成为共和国的基本力量，沙文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已经被击

败，和平事业已经取得进展，社会立法和工业立法也得到了一些真正的进展。饶勒斯极力攻击在德莱福斯事件中拒不为保卫共和国的事业出一点力的盖得派，并且谴责他们固执地墨守已经过时的布朗基主义而不去支持工人的日常斗争。

饶勒斯的发言是一篇洋洋大观的精心杰作。倍倍尔起而作答，他的发言在口才上决非饶勒斯之匹，但同大多数代表所要听的东西却更加合拍。倍倍尔一开头便断言德国政府是欧洲最坏的政府（过了一会儿他又把土耳其和俄国列入这一类，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德国社会党人当然是共和主义者，并且羡慕法国人的共和制度。不过，他们是社会主义共和主义者，不会为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抛头颅，洒热血”。接着他又提到美国和法国这两个共和国运用 53 国家权力破坏罢工和枪杀罢工者等不光彩的史迹。他说，资产阶级共和国始终是资产阶级保卫自己利益的靠山。他接着说，谈到工人的直接利益，在社会立法方面法国落后于德国，其赋税制度要反动得多。倍倍尔不承认德国人在投票赞成有益的治标性立法的问题上拒绝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同时宣称制订已经使工人受惠的法律的功劳完全属于社会党人，而当局之所以同意进行改革则是因为害怕社会党人日益强大的力量。他说：德国社会党人并不反对投票赞成良好的法律，不论是谁提出来的都一样，他们所反对的是越出这种投票范围而同非社会主义政党结成任何联盟。倍倍尔辩解说：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不论处于哪种环境下，也不论存在什么地区差别，德累斯顿决议对他们说来都是一个正确的南针，因为它强调了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基本对立。与此相反，饶勒斯的政策则会腐蚀无产阶级，并会混淆问题的性质。饶勒斯坚持认为德累斯顿决议是前后矛盾的，因为它导致人们否定政策，并徒劳无益地企图把革命的言论同议会方法结合在一起。倍倍尔否认这一点，他说德累斯顿决议恰恰做了所必须做的事情，在严

格服从革命目标的条件下，允许进行治标性的活动。除了含蓄地点破以外，倍倍尔并没有回答饶勒斯所抨击的德国人在萨克森的选举权被剥夺以后未起而抗议的问题。不过，实际上倍倍尔用反问的口吻回答了这一点，他问饶勒斯是不是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还处于少数党地位的时候就应该举行起义；他还说他无法理解饶勒斯所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取得最近的选举胜利之后就应该有所作为以扩大影响。他说社会党人有条件等待，直到取得选举上的胜利。他着重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开除一个人出党，哪怕是极端的修正主义者，这对赢得多数党地位的前景具有重大意义。他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坚持少数要接受多数所规定的纪律。他们所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把人开除出党，不过团结缺少不了有纪律的行动，否则党的纲领就无法有效地实施。

在倍倍尔发言以后，维克多·阿德勒提出了一项他和王德威尔得取得协议并得到奥地利和比利时代表团支持的折衷修正案。阿德勒-王德威尔得修正案主要在两点上跟德累斯顿决议不同：第一，修正案删去了明确排斥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的字样而代之以一个正面的宣言，宣言指出目前以阶级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为基础的以赢得政权为目标的战术必须维持不变；第二，修正案没有宣布完全禁止参加“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政府，而只是重申1900年考茨基决议中所提到的警惕这种入阁主义所带来的危险。在提出这项修正案时，阿德勒着重指出，把任何国际纪律强加在各国社会党头上会带来种种危险。他说各国的运动目前已经有足够的办法来约束自己。

投票表决时，赞成阿德勒-王德威尔得修正案的是21票。反对的也是21票，因而修正案未能通过。就稍作修改的德累斯顿决议案进行表决时，结果是25票赞成，只有5票反对，12票弃权。投

票当然是按国进行的，每个国家有两票投票权。只有澳大利亚的两票反对这个决议，其余投反对票的少数代表是，法国一名、挪威一名、英国一名。弃权的有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和阿根廷的代表。

看一看修正案的表决结果，可以更好地了解真正的意见分野。

阿德勒 - 王德威尔得修正案的表决结果

55

赞 成				反 对			
阿根廷	2	法国	1	保加利亚	2	法 国	1
澳大利亚	2	挪威	1	德 国	2	挪 威	1
奥地利	2	波兰	1	匈牙利	2	波 兰	1
比利时	2			意大利	2		
丹 麦	2			日 本	2		
英 国	2			俄 国	2		
荷 兰	2			西班牙	2		
瑞 典	2			美 国	2		
瑞 士	2			其 它	2*		

* 大概是塞尔维亚和亚美尼亚，它们各有一名代表出席大会。

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在投票表决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以前，已经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社会党，“原因是只有一个无产阶级”，同时强调所有社会党人的基本责任是“根据国际历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原则，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努力实现这种团结。由此可见，在表决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以前，这项决议就已经表明不应排斥任何集团，至少说，在接受代表大会对德累斯顿决议所下的定论的条件下，不应排斥任何集团。事实上，德累斯顿决议所采用的激烈词句并没有挡住法国的各个派系第二年在在这个决议的主要反对者饶勒斯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入阁的问题暂时没有造成障碍。当约翰·伯恩士1905年参加英

国自由党内阁的时候,并不存在纪律制裁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摆脱了第二国际及其英国支部的管辖。德累斯顿-阿姆斯特丹决议的革命性词句已经是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可是奇怪的是这些词句却未能有效地阻止德国或其它地方不断倒向改良主义。

除了因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争论而引起的问题以外,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还有其他重要问题要讨论。特别是亨利埃特·罗兰-霍斯特代表荷兰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把总罢工当作无产阶级斗争武器的问题。她连同报告提出了一个体现报告要点的提案。提案说,真正全面的总罢工是无法实现的,因为那会使工人以及所有其他人都挨饿,任何广泛的罢工如果要取得胜利,必要的条件是无产阶级具有强大的组织和自觉服从的纪律。提案接着说,这种突击行动并不能使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不过主要工业部门的广泛罢工却可能是实现重大社会改革或保卫工人阶级权利不受反动派侵犯的最有效办法。提案接着就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总罢工”的宣传提出警告说,这种宣传有使工人脱离真正的不懈斗争的倾向,也就是有脱离政治行动、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的倾向。提案号召工人发展自己的阶级组织,加强本身的团结,因为一旦政治性罢工有必要而且有利时,其成败就取决于这些条件。

亨利埃特·罗兰-霍斯特发言以后,接着就以法国人为主提出了反驳,另有两名德国代表各自支持一方。柏林的弗莱德伯格博士代表很少发言的德国劳工行动派少数提出了一项提案,对于过分强调议会行动表示惋惜,同时强调工人阶级在工业领域采取直接行动的重大意义,这特别是因为这种行动对于工人阶级的心理有很大影响。他惋惜荷兰代表团的提案有扩大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鸿沟的趋向。他还号召放弃议会道路而集中力量“提高无产阶级的知识和道德水平,并进行经济斗争”。这项提案

是以“德国工会自由联合会”的名义提出的，没有得到支持。同是来自柏林的罗伯特·施米特对这项提案提出了意见，说它是“泡沫”。他一方面肯定德国工会已经赢得了很多有益的让步，一方面又说德国工会反对被总罢工拖入政治，“那里不是工会该去的地方”。他说在过去一段时期，德国只有一小批人赞成总罢工。弗莱德伯格只有资格代表这批无足轻重的少数人说话。

在法国人当中，让·阿勒芒、阿尔伯特·威尔逊、阿德里安·麦斯利耶尔以及阿里斯泰德·白里安支持赞成总罢工的反提案，或者至少是要求对其可能性进行更充分的调查。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乌斯提诺夫站在上述法国代表一边，说荷兰代表团的报告在反对使用暴力这一点上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荷兰代表威·修·伏列根支持荷兰代表团的提案。他说：所有发言赞成总罢工的人似乎都轻视议会行动，而凡是赞成总罢工的人又只能在 57 工人阶级组织软弱的国家里找到，而不能在工会运动强大的国家里找到。白里安在其措词谨慎的发言中仅限于要求做进一步的调查。他问道：如果反动派政府企图剥夺社会党人的选举权，或是镇压他们的运动，那么除了总罢工以外又能拿出什么别的可以利用的武器来呢？他要求反对总罢工的人不要放弃人们在心理上支持的武器而置工人阶级的感情于不顾。奥地利的海因利希·比尔强调既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对总罢工的看法，又不能把总罢工这一政治武器抛弃掉。他又强调在政治上运用这个武器时必须有坚强的组织和认真的准备，他还说这个问题没有再行研究的必要。进行表决时，法国的主要提案以 34 票对 8 票被否决，而荷兰的提案则以 36 票对 4 票得到通过，3 票弃权。

关于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的其他议程无需多述。德国社会党的社会服务和劳工立法专家莫尔肯布尔提出一项报告，要求对失业、疾病、工伤事故、老年和其他意外事件提供保险。报告力主

对遗产和大宗所得征税，用来支付这些事业的费用，而其管理工作则应交由代表受益者的组织去办。利物浦码头工人工会的詹姆士·塞克斯顿企图通过一项修正案，取消工人捐款的规定，但是没有办到。荷兰的伏列根责备莫尔肯布尔把报告的大部分用于宣扬德国的办法，而这些办法在德国以外主要只得到反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但是会上提出的所有修正案都被否决，报告得到了通过；投票反对报告的是英国、美国和西班牙的代表以及法国的一个派别。

大会还讨论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荷兰的范·柯尔提出一项全面的提案，要大会保证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措施和这些措施所需的一切开支。提案接着声明反对帝国主义在各殖民地所掌握的一切特权或贸易垄断权，谴责帝国主义压迫被奴役的民族，提案还提出措施，主张通过公共工程、保健事业和不受教会影响的学校去改进这些民族的生活状况。提案要求“根据各有关民族的发展状况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自治，而以彻底解放作为努力争取的目标”。提案最后要求议会对被奴役地区的剥削进行监督。这一提案经大会一致通过；大会还在意大利代表罗西的动议下决定设立殖民局，配合布鲁塞尔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进行工作。

在出席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一位是印度领袖达达巴伊·瑙罗吉，他是印度国大党的创立者和主席，被邀请在费边社代表S·G·霍布森之后发言。霍布森原已提出一项提案，强烈谴责英国对印度的掠夺，说这种掠夺是印度遭受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他号召英国工人支持印度人民在英国的主权管辖下实行自治。达达巴伊·瑙罗吉完全赞成霍布森的发言，同时指责英国践踏了把印度人当成兄弟民族看待的诺言，指责它派了大批官吏骑在印度人民头上，并对印度的自然资源进行了无法容忍的掠夺。他吁请与会代表对印度人民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表示同情。霍布森的

提案在代表的热烈赞成下被通过。主席范·柯尔以主席身分强调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已经遭到第二国际的明确谴责。

关于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我们还剩下一件值得一书的事情。这件事同不久前爆发的日俄战争有关。作为日本代表出席大会的片山潜同普列汉诺夫一齐登上讲坛，两人庄严地握手，旨在郑重表明两国的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两个帝国的专制政府。

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由于排斥了修正主义并促使各国社会党人取得内部团结，因而常常被称颂为第二国际鼎盛时期的标志。然而，上述两个受到热烈欢呼的决议事实上是相当矛盾的。如前所述，坚持各国社会党内部的团结就意味着任何持社会主义见解的有实力的团体都不能加以排斥或任其留在党外，尽管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可以排除，因为他们任何情况下都不隶属于政党。但让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留在各国的社会党内，就不可能使他们缄口不言，因此德累斯顿决议便只能是纸上谈兵，而不能付诸实行。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所带来的是高度的团结而不是高度的纪律。法国的各社会主义党派于1905年合并，以饶勒斯为领袖团结在一起，在大会上提出德累斯顿决议的盖得则牢骚满腹地坐了第二把交椅。英国人把许多自立门户的团体组成了统一的第二国际英国支部，努力做到合作，而不多事磨擦。就事实而言，保加利亚人顽固地抵制了统一，俄国人也是这样，只是在1905—1906年的实际革命过程中实现了有限度的统一。不过总的来说，社会主义者团结的政策还是得到了发展，受到打击的不是改良主义者而是自封的革命主义者，他们不久就分裂为左中两个敌对的派别，而原来的中派革命主义者则越来越依靠右派给予支持。

(III) 1907年——斯图加特

从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到1907年在斯图加特召开下一届代表大会，相距的时间是三年。在这两次大会的间隔中，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了，也随即失败了，革命所造成的巨大骚动也随着时间消失了。俄国所发生的事件使得重提总罢工又有了新的现实意义，因为大罢工在俄国的革命运动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并且使左派迫切地要求考虑把总罢工当成政治武器利用，特别是在德国甚至要求把总罢工当成德国革命的序幕。在这个运动中，罗莎·卢森堡以双重身份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她既是德国左派的活跃领导人，又是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结盟^①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活跃领导人。到了1907年，由于德国工会采取了越来越谨慎的态度，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反改良主义多数已经开始瓦解。在法国，饶勒斯已经确立了自己在统一社会党中的领袖地位，而维克多·格里甫埃勒所领导的工会采取战斗性劳工行动的伟大时期也已经到来。在英国，往昔无足轻重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已经以工党的新名称作为一支拥有30名下院议员的强大选举力量出现。于是英国人的党就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算作工人阶级的大党，尽管它并没有以明确的社会主义为基础。1907年，奥地利人在选举权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得以选出87名代表到帝国议会中去。与此相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非但没有能乘胜前进，在1903年获得选举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赢得帝国议会多数的目标，1906年反而在议席上(虽然不是选票上)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是因为冯·毕洛夫玩弄手腕，使社会民主党人成了似乎是反对德国在1905—1906

^① 见本卷第504页及以下。

年的国际危机中进行扩张的人，从而失去了中产阶级的支持。

事实上，根据 1906 年的阿尔赫西拉斯条约所暂时平息的摩洛哥危机^①来看，欧洲的国际风云已远非昔比，更加紧急；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第二国际的活动已开始受欧洲各大国之间的战争危机——特别是英德两大帝国主义对手之间的战争危机所支配。俄国一方面由于败于日本之手，一方面由于革命造成了混乱，暂时置身事外。但是法国却拿出一笔钱来帮助斯托雷平推行他的经济发展计划，以便挽救沙皇俄国，英国也在较小的程度上援助了沙俄。这时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之间的那场于 1914 年实际爆发的战争已经有了兆头。在这种情况下，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跟历次大会不同，已不大关心理论上的分歧，它更加关心的是这样一个实际问题：社会党人应采取什么行动去防止战争，一旦防止无效而战争实际爆发，又怎样去对付各个会员党所面临的那种非常困难的局面。这个问题当然不能同理论上的争论分开，因为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问题、以及改良主义与革命主义问题的争论是彼此密切相关的。但在战争危机临头之际，这一切问题都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考虑。当前所要考虑的主要已经不再是争论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理论孰是孰非的问题，也不再是辨明劳工行动和议会行动在作为进行日常阶级斗争的工具或争取逐步改良的工具时孰好孰坏的问题。事情已经很明显，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随时都可能直接面对一个巨大的危机，而有关修正主义和改

^① 19 世纪末，法国大力侵略摩洛哥，与德国殖民利益发生矛盾。1904 年英法订立密约，英承认法在摩洛哥的地位。第二年德皇威廉二世乘军舰在摩洛哥的坦吉尔登岸，会见国王，并当众发表演说，表示愿意帮助摩洛哥独立。当时法国因形势不利，暂时屈服。第二年在阿尔赫西拉斯开国际会议，英国竭力帮助法国，结果名义上维持摩洛哥独立，但实际上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经济利益，使法国地位得到巩固。这事件虽然暂时得到平息，但不久之后德法又为此事引起冲突，结果德承认摩洛哥为法国保护国。——译注

良主义的讨论却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政策来指导国际在这种形势下怎样采取行动。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议程明确地显示了社会主义者所必须面对的局势变化。这次代表大会原打算主要讨论社会党同工会之间的正确关系的问题，而到开会时虽然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辩论，但它被贬到次要地位上去了，主要的辩论是围绕着殖民主义和战争问题进行的。社会党人必须作出决定：究竟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已公开宣布的与资本主义国家为敌的态度，即使在祖国受到攻击时也把保卫国土的全部义务置于不顾，抑或是承认保卫国家的义务高于自己的反政府态度，有必要在政府的监督下实际履行卫国的义务。社会党人还必须确定：是否准备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携手合作以防止战争；是否应该支持资产阶级关于实行国际仲裁和签定裁军协议的计划；是否准备在战争威胁日浓或战争已经打响时分别轻重，确定互动干戈的帝国主义大国的罪责。他们还必须考虑：是否应该把侵略战争和自卫战争区别开来，是否应该把大战的爆发当作掀起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或停止各国内部冲突的信号。

62 他们也必须确定：究竟是真正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还是准备容忍甚至支持缺乏资源的国家分享殖民扩张的掠夺品或利益的要求。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德国国土上召开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历来一直认为德国不适于作召开社会主义者国际会议的地点。这是因为德国有那么一支警察力量，代表有被逮捕乃至被引渡给本国政府的危险，而当那些有欠圆通的代表畅所欲言时，会议的议程也有在当局的严令之下被迫中断的危险。但是到了1907年，德国人准备承担风险，举行这次代表大会，而地点当然不是在普鲁士，而是在气氛较为自由的符腾堡。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也下定决心冒这场风险。结果真有一名代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

哈里·奎尔奇——由于所谓污辱德国政府的罪名而同警方发生了纠纷,并被驱逐出境,尽管大会提出了抗议。不过除了这一偶然事件之外,代表大会并没有受到干扰。事实上,德国当局对于代表大会的议程可能并没有感到恼火,因为议程似乎表明,一旦爆发战争,法国和俄国的工人阶级所造成的麻烦可能远远超过德国。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辩论的主题是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最后大会几乎一致通过了一项著名的决议,明确地规定了各国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运动在战云密布或战争实际爆发时所应负的责任。这项接近一致通过的决议是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几经努力的结果,大会在接到不下4项对立的提案和一些修正案以后,设立了这个特别小组委员会。提出那4项主要提案的人分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倍倍尔,法国统一社会党多数派代表瓦扬和饶勒斯,另一个法国集团的代表盖得,以及极端反爱国主义派代表古斯塔夫·爱尔威。爱尔威的提案很短,直截了当地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唾弃“资产阶级和官方形形色色的爱国主义,因为各种爱国主义无不谎话连篇,胡说什么全体国人是一个休戚与共的集体”。提案号召工人发动一场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统一斗争,而且除了为建立——或在建立以后保卫——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以外,就拒绝拿起武器。提案还号召所有公民用武装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一方的宣战行为。⁶³

茹尔·盖得的提案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专门为反对军国主义而发起运动表示相反意见,认为这会使工人阶级脱离自己的主要任务;为剥夺资本家的权利,使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而夺取政权。提案说,为反对军国主义而特别发起一场运动就会妨碍社会主义的宣传和扩充自己的实力,唯一既不流于空想又不带有危险性的反军国主义运动的形式,就是发动一场组织全世界工人以摧毁资本主义的运动。提案接着宣称,当前社会主义者必

须为缩短服役期限而奋斗，必须投票反对一切军事预算，同时投票赞成武装全体人民以代替常备军作为防止国际冲突的手段。

瓦扬和饶勒斯的提案一开头便宣称，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实质上是国家有组织的武装，是资产阶级用来在经济和政治上牢牢控制工人阶级的。提案接着说，一个国家只有攻击另一个国家及其工人阶级，攻击国际工人阶级，才能对那个国家的独立造成威胁；受攻击的国家及其工人阶级有无上的义务抵抗这种攻击，保卫自己的独立和自主，从而也有权依靠所有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提供支援；社会党所遵循的纯防御性的反军国主义政策，要求党努力通过普遍武装人民的方法去解除资产阶级的军备并武装工人阶级自己以达到这一目的。提案的第二部分规定国际团结是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首要责任，并且提醒他们要在每年五一节庆祝这种团结，同时还要宣布维持国际和平，作为履行国际团结责任的第一个必然结果。接着提案回顾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和国际社会主义者议会委员会在俄国发生革命和帝国主义邻邦对沙皇俄国提供援助以镇压这次革命的形势下所采取的行动。提案接着号召工人通过社会主义者在全国范围和国际范围内组织秩序井然和准备良好的联合一致的行动来实现这些决议；这种联合行动要求在每个国家——首先在有关国家——集中工人阶级和社会党的全部力量利用议会干涉、公众鼓动、群众示威以至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等一切手段来防止和阻挠战争。

最后要谈的是倍倍尔的提案，它首先断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总的说来是世界市场竞争的结果，每个国家都在寻找新市场，奉行奴役外国人民和侵占其领土的政策。提案说，民族之间的偏见助长了战争，这种偏见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蓄意在文明国家之间培养起来的。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实质，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被消灭，或是当军事技术的发展在人力和财力方面所付出的大

量牺牲以及军备武装所激起的反抗情绪驱使人民抛弃这种制度的时候，战争才会终止。工人阶级天生是反对战争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人阶级首当其冲，身受战争之害，同时也是因为工人阶级所要实现的目标同战争是互不相容的。工人阶级的目标是以社会主义观念为基础，建立一个最后将实现各民族团结的新经济制度。提案接着强调，所有工人，特别是工人的议会代表，有责任全力以赴，展开斗争以反对陆海军军备，同时要着重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特性以及驱使资产阶级维持国家之间的对立的种种动机。全体工人必须拒绝为这类政策提供任何财政支持。其次，提案声明赞成以民主方式组织国防体系，把所有能拿起武器的公民都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实际保证，使侵略战争根本无法爆发，同时推动各国 65 消除对立。提案的最后一段规定：如果战争有爆发的危险，各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议会代表就有责任竭尽全力利用自己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来防止战争的爆发；如果他们的努力无效而战争终于爆发，则应使战争尽快结束。

这4项提案的一致之处和分歧所在都值得注意。除了爱尔威的提案外，所有提案都要求建立某种类型的民兵或人民武装来代替常备军，似乎都把这种武装当作防止战争——至少是防止侵略战争的保障。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反对这个建议，因为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征兵制。他们没有能使这一建议从最后通过的决议中删去，但是得到了一个口头保证，即建议并无意强迫他们在自己的国内支持义务兵役制。

瓦扬-饶勒斯的提案和爱尔威的提案都提到了可以把总罢工（爱尔威的提案的提法是“武装罢工”）和起义当作反对战争的手段，然而盖得的提案和倍倍尔的提案却没有提到这两种手段，只是盖得的提案为否定它们的价值而提到了它们。盖得的最后武器是“社会革命”（并未对这一概念作进一步说明），不过这并不是专门

用来反对战争的。倍倍尔的提案只说要“尽一切可能”，而没有具体提到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只是不厌其烦地两次强调社会党人的议会代表在反对战争中的特殊作用，因而这似乎是暗示反军国主义的斗争主要应采取议会的形式。

只有瓦扬-饶勒斯提案肯定了保卫祖国，抵抗外来侵略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又提出其他国家的工人有义务群策群力支援被攻击的国家。只有爱尔威的提案明确地否认这些义务。倍倍尔的提案含蓄地承认卫国是一种义务，并且区分了侵略战争和自卫战争。盖得的提案则没有作这种区别。

66 倍倍尔的提案谈得最深，断言战争的起源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竞争。盖得的提案也强调了资本主义与战争的关系，宣称资本主义一日不废除，战争就会继续发生。瓦扬-饶勒斯的提案除了确认历次代表大会涉及这一问题的决议以外，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缄默。爱尔威的提案对于战争的起因也只字未提，仅仅号召工人除了在阶级斗争中举行起义以外，要拒绝拿起武器。

在宣扬国际工人阶级团结方面，除了爱尔威的提案以外，就要算瓦扬-饶勒斯的提案说得最明确，不过盖得的提案也包含着这一点。倍倍尔的提案则只字未提。

除爱尔威的提案外，没有一个提案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行动方针。瓦扬-饶勒斯的提案提到了所有的斗争方法，但并没有强调其中的任何一种。这个提案与其说是主张运用总罢工这一方法，倒不如说是拒绝完全排除这一方法。倍倍尔的提案除了主张在议会中采取反对行动以外，并没有明确谈方法问题。然而，又只有倍倍尔的提案明确谈到了万一防止无效而战争实际爆发时社会党人负有什么义务；他的提案只是告诉工人“要采取行动促使战争尽快结束”——这当然不是什么明确的意见。瓦扬-饶勒斯的提案叫工人“阻挠”战争，但是这究竟是指战争实际爆发之后的局面，还是指即

将爆发之时的局面则没有说清楚。

因此，所有这4个提案都有严重的弱点。爱尔威的提案由于根本行不通，实际上可以不予考虑。在代表大会上，差不多没有人支持它。盖得的提案是那种蒙上脑袋就以为万事大吉的提案，可谓见其提案如见其人。这同他认为德莱福斯案件不值得社会党人大惊小怪或采取任何行动的看法如出一辙。实际上，这个提案不过是盖得派的老调重弹：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瓦扬-饶勒斯的提案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毫不含混地肯定了保卫国家的义务，这正是德国人完全赞同但又不便启齿的问题。提案的弱点在于把各种方法都一一推荐了出来，实际上也就等于一个也没有提。提案有条件地赞成把总罢工当作一种手段，这是有意同德国代表对立。最后，倍倍尔提案的核心是断言战争主要是帝国主义的对立竞争的产物，但是这番议论对于用什么方法去防止战争却丝毫没有帮助。⁶⁷

上述4个提案在大会上提出以后，便发生了长时间的辩论，辩论是由倍倍尔开始的，继他之后发言的有：爱尔威，特洛克列特，瓦扬，饶勒斯，福尔马尔，王德威尔得，维克多·阿德勒，罗莎·卢森堡，鲁塞尔·斯马特，意大利的弗朗兹·魏斯，布兰亭，施尤，科斯塔，挪威的叶普森，阿根廷的古得列夫斯基，亨利埃特·罗兰-霍斯特，以及美国的E·E·卡尔。接着大会决定成立小组委员会，旨在尽可能拟定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提案。小组委员会由王德威尔得担任主席，成员有倍倍尔和福尔马尔（德国），阿德勒和斯卡图拉（奥地利），饶勒斯和盖得（法国），安德里阿斯·施尤和T·鲁塞尔·斯马特（英国），费里和科斯塔（意大利），罗莎·卢森堡和皮斯特兰宁——后者代表社会革命党（俄国），约翰·锡格（瑞士），以及布兰亭（瑞典）。在辩论过程中，收到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答复了福尔马尔针对他所说的一些话，极力主张开展特别的反

军国主义宣传，包括在士兵中进行宣传。当时卡尔·李卜克内西正由于他那本著名的反军国主义小册子而受审^①。辩论结束时，罗莎·卢森堡，列宁和马尔托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针对倍倍尔的提案提出了某些修正意见。其中比较重要的几项，其意义首先在于增列了军国主义的军备竞赛一项，以补充倍倍尔认为战争的起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竞争这一点；其次在于强调必须以社会主义与各国人民和衷共济的观念以及阶级意识教育青年；第三在于以下列文字修改了倍倍尔提案的最后一段，使方向更加明确：

如果战争有爆发的危险，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有责任竭尽全力利用自己认为适当的一切手段去防止战争，这些手段必将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程度和整个政治局势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有所发展。

68 如果经过大力防止而战争依然爆发，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有责任进行干预，旨在使战争尽快结束，同时应全力以赴，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发动处于最底层的人民去力促资本主义统治的早日崩溃。

著名的斯图加特决议的正式文本是根据小组委员会未予公布的辩论内容拟定的。就象王德威尔得在提出时所指出的那样，决议太长了，原因是要把各个草案（爱尔威的草案除外）中那些已取得协议的段落都包括进去，又要应付决议所容忍的各种反对意见，结果就拉得太长了。决议一开头就确认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然后便述及倍倍尔关于战争的经济起因的说法，并附加上俄国人就军国主义对立竞争所提出的补充意见以及倍倍尔关于民族主义偏见的说法。决议说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实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消灭后，

^① 见本卷第 326 页。

或是当战争所造成的负担和牺牲使人民抛弃资本主义战争时，才会终止。决议保留了关于工人是战争的主要受难者和天生的反对者那一段，也保留了关于工人及其议会代表有责任反对军备和军备所需的拨款那一段……谈到这里决议就转到俄国人关于教育青年人那一点上去了。接着便是极力主张以国民兵代替常备军并说明国民兵会成为防止侵略战争的保障那一段。

接下去的一段话强调，按“死板的公式硬性规定”所应采取的行动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行动必然会随着时机和各个党的背景的不同而有变化。决议接着叙述了自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展开反军国主义和反战斗争以来，无产阶级实际上做了哪些事情，其中特别提到了法绍达事件以后的英法关系^①、摩洛哥危机时期的法德关系、奥意两国关系、奥意社会党的里雅斯特会议、瑞典挪威分离时期瑞典社会党人向挪威所提供的援助以及1905年俄国革命的国际影响。决议提请注意，第二国际有必要更加强有力地协调各国社会党的活动。序言部分的最后一段强调：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可以认真地执行国际仲裁，用以取代资产阶级政府的那种软弱无力的做法。这样，各族人民就可以受到普遍裁军的利益，被军备和战争所吞没的巨大资源就可以用来发展人类的文明。

决议的最后两段规定工人在战争的威胁下或战争实际爆发时所应尽的责任。

如果战争有爆发的危险，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有责任在积极从事协调工作的国际执行局的帮助下，竭尽全力利用自己认为最适当的一切手段去防止战争，这些手段必将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程度和

^① 1898年，苏丹的法绍达地方发生起义，英国派兵前往镇压，但是法国已先于英国出兵该地，两国几至动武，后来法国作了让步。这是两国争夺殖民地的表现之一。——译注

整个政治局势的演变而有所不同。

如果经过大力防止而战争依然爆发，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有责任进行干预，旨在使战争尽快结束，同时应全力以赴，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发动处于最底层的人民去力促资本主义统治的早日崩溃。

由此可见，在涉及行动的最后段落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遂了自己的心愿，第二国际的各个党不仅正式保证要竭尽全力防止战争，同时还保证在战争一旦爆发时，要竭尽全力立即结束战争，并且要利用时机采取行动使资本主义垮台。在最后通过的决议中，并没有谈到总罢工或起义的问题，这正是德国人设法取消的。但是由于俄国人所作的补充，行动方案远远超过了单纯的议会抗议，而倍倍尔的草案所明确提出的却只有议会抗议。总罢工并没有被排斥，这个手段被不声不响地放过去了，起义也是一样，可以认为它事实上已经隐含在最后一段中了。

70 决议的最后形式似乎使人人都感到满意。甚至连爱尔威也投票赞成，他跳上一张桌子表示热忱拥护。代表们确实感到自己不失英雄本色，做了些不凡的事情，同时又没有笨拙地提到会使德国同志跟政府发生麻烦的起义问题，从而让他们感到为难。然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其余议程，却对大会通过这项主要议案时所表现的全体一致的真实性投下了一些疑云。特别是关于殖民问题的辩论使态度上的分歧暴露了出来，这种分歧在战争的实际威胁面前，显然会导致严重的纠纷。荷兰代表范·柯尔作为大会殖民委员会的报告人，大力主张制定积极的社会主义殖民政策。他说：历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那种消极反对殖民主义的决议丝毫无补于实际，社会党人在实践中必须承认殖民帝国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他说人类有史以来始终存在这种帝国），社会党人必须拿出具体的建议，改善对待当地居民的态度，开发自然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为

全人类造福。他向反对殖民主义的人问道，就实际情况来说，他们是否真正打算不论本国人民多么需要殖民地的资源都一概不取。他引用倍倍尔的话说，殖民事业发展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①，并且提出荷兰社会党人在改进殖民地人民生活条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殖民委员会中少数派的发言人格奥尔格·累德堡反对这种见解，他全面地攻击了殖民主义，强调指出要求帝国主义国家倡导为殖民地人民谋福利的政策是荒唐可笑的。这场争论使德国人发生了明显的分裂，爱德华·大卫、伯恩施坦连同其他一些人出面支持范·柯尔。当这个问题提交全体代表大会表决时，少数派以 127 票对 108 票险胜多数派，于是第二国际正式表示反对殖民主义，宣布“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由于其本质必然会导致奴役和强迫劳动，也必然会在殖民政权的统治下毁灭当地人民”。决议声明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开化”使命不过是一个幌子，用来掩盖它剥削和征服的欲望，资本主义非但远远没有发展殖民地的生产力，反而由于使 71 殖民地人民陷于受奴役和贫困的境地而破坏了他们的自然财富。决议指出殖民主义增加了军备的负担和战争的危险。决议号召各国议会中的社会党人始终不懈地坚持反对现有的全部殖民地中普遍存在的农奴制度和剥削制度，要求进行改革以改进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时时警惕地维护当地人民的权利，并且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教育当地人民争取独立。

关于殖民问题的议案，最后就以这种毫不妥协的形式无异议地获得通过，只有荷兰人弃权，不过这说明主张殖民政策的人遭受了严重的挫败。在投票表决修正案时，失败的一方包括德国人（他们内部虽有尖锐分歧，但投票时却是全体一致的）、荷兰人、丹麦

^① 我想这句话是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说的。

人、奥地利人、瑞典人、比利时人、以及南非人。胜利的一方有俄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西班牙人、澳大利亚人、日本人、美国人、阿根廷人、芬兰人、以及挪威人等。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代表意见是分歧的。瑞士代表弃权。

这些辩论说明当时出现了双方人数十分接近的意见分野。关键问题在于代表大会究竟应该正式表示从原则上反对殖民主义，还是应该说明它所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实际殖民政策，并不是“从原则上永远谴责所有殖民政策，因为在社会主义政权下，殖民政策可能是一项文明的使命”。大卫希望大大地向前迈进一步，说明“代表大会肯定社会主义需要整个世界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注定要为人服务的，要把各种肤色和语言的民族提高到最高的文化水平，因此大会认为，从这一角度出发，殖民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运动所追求的文明的总目标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不过，支持大卫的建议的人寥寥无几，殖民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只希望不要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一概予以谴责。

有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讨论的还有三个报告，即关于各国社会党与工会的关系的报告，关于妇女问题的报告，关于移民问题的报告。

72 关于各国社会党与工会的关系的辩论，大体上已正式转变为这样一个问题：在每个国家中，党的中央组织和工会的中央组织之间是否应该有组织上的联系。除了丹尼尔·德·里昂所领导的坚持经济斗争先于政治斗争的少数持异议的人以外，代表们普遍同意，工会必须能够自由地进行日常的经济斗争，不受党的干预，而党在政治领域中也必须具有同样的自主权。代表们还同意：工会必须摆脱行业公会的自私自利的观点，本着阶级斗争的精神去处理自己的事务，但是鉴于在经济领域中团结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对

于工会会员强加任何政治考核或者坚持工会会员个人应该同时是党员的做法都是轻率的。与此同时，有些代表团——包括比利时人和瑞典人的代表团——赞成工会集体隶属于党的制度，而另一些代表团，特别是德国代表团，则反对这种正式的隶属关系，赞成由个人结成实际上的合作关系，而无需形式上的联系。法国代表团的多数成员认为这两个方案都不能接受，并根据法国总工会的政策坚持工会完全独立的原则。他们也相信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会和党有必要共同努力，但是又认为在法国要实现社会主义还必须尊重法国总工会的工团主义观点。

在这些不同意见的背后，还潜伏着更深一层的分歧，即关于工会运动的职能的分歧。就整个问题提出报告的比利时代表路易·德·勃鲁克尔说：虽然党和工会本身各有必须自主处理的工作，但是双方之间却有一个巨大的日益增长的共同行动领域而无法严格地划归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特别是创建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伟大任务也包括在这个共同的领域中。这个观点立即受到德国和奥地利代表的攻击，他们主张工会只管经济斗争，创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党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代表团多数成员的看法当然是同德·勃鲁克尔一致的。当时辩论双方所争持的在很大程度上 73 是关于总罢工的问题，不过也有其它问题。德国工会不久前刚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反对以总罢工作为工会运动的方法，并且规定如果要使用这种方法，那就必须由党而不是工会负责发动，因为总罢工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另一方面，法国的多数派（只有盖得派持异议）认为总罢工既是政治武器，也是经济武器；法国总工会认为在这两个领域中运用这个武器是它的份内事。由于德国和奥地利代表拒绝接受法国的草案，德·勃鲁克尔撤销了引起争论的那几段文字，采取折衷办法，提出了一个无损于任何一方的提案。提案强调必须使工会充满社会主义精神，但又不发展到妨害

工会团结的程度；提案宣布赞成工会在经济领域中有自主权，赞成党与工会保持诚挚友好的关系，但又不提及赞成或反对任何统一的组织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法国代表团中的多数派宣读了一项表示恪守工会完全独立这一原则的声明，接着大会通过了一项事先已取得协议（德·里昂派除外）的决议。但是分歧仍然存在，不仅存在于法国代表和其余代表之间，也存在于德国代表和比利时代表之间；与其说决议达成了任何真正的协议，倒不如说它掩盖了一个基本分歧。因为争执的关键在于：究竟是应该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大业完全当作党的事，而把工会仅仅当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手段呢，还是应该把党和工会当作创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伙伴。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妇女选举权问题的辩论是一次国际社会党妇女会议的继续，会议为全体代表大会准备了一项提案。引起争论的问题倒不是妇女是否应该有选举权，关于这一点所有代表团意见都是一致的，而且历次代表大会也都通过了明确的决议。主要的问题在于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究竟是应该在本国内发起争取包括妇女选举权在内的普选权的运动呢，还是基于策略上的理由而应当象奥地利人不久前在一次著名的运动中所作的那样，⁷⁴ 首先要求成年男子选举权。此外还存在着一个次要问题：对妇女选举权附加财产或其他条件的建议究竟是应该当作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而予以接受呢，还是应该指出这类建议有利于资产阶级妇女不利于劳动妇女而予以拒绝。在后一问题上，关于有限选举权的所有建议遭到全体代表的反对，只有一部分英国代表除外。克拉拉·蔡特金要求各国社会党将来开展选举改革运动时，应该从相同的条件出发，既要求男子选举权，也要求妇女选举权。原先在妇女会议上通过的提案就是由她提出的，后来在委员会上取得协议的提案也是由她提出的。维克多·阿德勒为奥地利

党在最近一次运动中没有提出妇女选举权要求的做法进行了辩护。接着大会通过了一项修正案，承认选定一个明确的日期普遍开展选举权运动是行不通的，但是坚持这种运动一旦发起以后，就应该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同时为男女两性提出要求。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最后讨论了移民问题。这方面的主要困难是由于大多数澳大利亚代表、一名南非代表和若干名美国代表希望排除有色人种入境而引起的，他们的理由是有色人种的移入会被利用来降低白种工人的生活水平。其他代表团虽然认识到这个论点很有分量，但是并不打算接受以种族或肤色为理由阻止任何移民的主张。不过，这些代表团完全愿意表明立场，反对蓄意运入大批移民以破坏接纳移民国家的工人生活水平，为此，他们准备要求官方对入境移民进行管理，同时要求改善运载移民的船舶的条件，防止航运公司和商业机构进行欺骗性宣传鼓吹移民。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强调，必须对移民工人进行教育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同时要向他们提供跟本地工人相同的工资、工作条件、以及社会与经济权利。

我们可以看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涉及很广的范围，做了大量 75 的工作，但是从社会党国际政策的观点着眼，除了那项有关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的决议以外，大会为解决问题所做的全部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在有关军国主义和战争的问题上，大会的确取得了重大的协议，尽管到了 1914 年要根据大会的勇敢词句采取行动时，却证明它那表面上的一致既缺乏实践自己宣言的意志，也缺乏实践自己宣言的力量。事实上，大会听任罗莎·卢森堡和列宁驱使它作了一个大大超过它真正准备履行的保证。但是俄国的领袖们改变了倍倍尔原提案的词句，却没有本领改变那些名义上赞成他们的政策的各国社会党的真正态度。

(IV) 1910年——哥本哈根

1910年，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举行于哥本哈根，这次代表大会引人注意的是，它重新讨论了举行总罢工以反对战争的问题，而这也正是德国人至少是希望自己已经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的问题。事先拟定的会议议程把社会党和合作运动之间的关系放在优先讨论的地位上，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就党和工会的关系所作的讨论相呼应。议程还安排着重讨论劳工立法和社会立法的整个问题，其中包括有关失业者的规定。这些都是议程上的主要新问题。此外，还准备讨论究竟已经采取了哪些步骤和将要采取哪些步骤来执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的决议中的各项条款。关于工会问题也准备作深入讨论，着眼于了解执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所提各项建议的情况。此外，还要讨论所属各党派和团体交来的涉及特殊事项的许许多多提案。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共分五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负责一个主要问题，有一个委员会负责处理提交讨论的其他事项。正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一样，大会以前举行了一次特别妇女会议和一次社会主义者国际议会委员会会议。在第二国际的杰出人物中，奥古斯特·倍倍尔因为病重没有出席；德国代表团的领导工作由艾伯特和列金共同担任。

在斯图加特大会和哥本哈根大会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各大国继续扩充军备，特别是英国和德国在海军军备方面的竞赛已经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摩洛哥危机再度出现；法德两国之间发生了“意外事件”，并已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西班牙人也投入了大规模的殖民战争。在法国控制的领地中不断发生战争。在东欧，奥地利人由于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地而引起了危机；俄国、

奥匈帝国和德国在近东地区的逐鹿已经愈演愈烈。在俄国，由于法国的支援和斯托雷平的经济政策，沙皇的权威得以暂时恢复，但是革命力量正在集结，准备东山再起。土耳其和波斯都已经经历了真正的革命，而中国则正处于爆发革命的前夕。

在劳工问题方面，突出的事件是1909年的瑞典总罢工，瑞典工会在这次行动中被大企业主的联合力量所挫败。瑞典人在斗争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援，特别是没有得到英国工会的充分支援，这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因此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关于工会问题的讨论，大部分都集中于考虑如何使各国的工会运动不仅内部巩固，而且也能在大规模的劳资纠纷中更有效地彼此支援。会上谈了很多关于资本主义托拉斯和联合企业在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发展情况，也谈了资本家日益走向建立强有力的集中机构以对付工会的趋势。这些动向都被看作是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迹象，要求工会方面采取对策。当时对国际工会书记处深为不满，因为它仅仅起了新闻机构的作用，而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去实现产业工人力量的国际团结。然而，除非工会国际准备采取行动，否则就很难看出社会党国际能够有什么办法改进这种局面；而且这一点又由于德国人和法国人在工会的职权以及工会所应采取的方法等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因而前景看来很暗淡。奥地利的工会问题^①也存在着严重麻烦，那里有一部分捷克人坚持搞自己的民族工会运动，脱离多民族的工会组织，而奥地利人一直保持这种组织，甚至在他们的社会党已经分裂成为代表奥匈帝国各民族的一系列民族政党以后也是这样。尽管安东宁·涅米克慷慨陈词，呼吁让捷克在工会和政治活动中独立行事，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几乎仍然一致反对他，同时强烈谴责把一个国家——不论它多么复杂——的工会分裂为

① 见本卷下册第十二章。

自立门户的民族运动的任何企图。大会声言，任何这类分裂行为都将削弱工人在日常斗争中的经济地位而招致灾难；除这种意见以外，还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对任何足以使民族主义势力在工人阶级运动中得到加强的因素。

在工会问题上展开的辩论，并没有得出实质性的结论。代表们再一次正式宣布，他们坚信每个国家只应该有一个工会运动，也只应该有一个党，作为工人阶级团结的维护者。他们责成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尽可能提供任何援助以促进工会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团结；不过执行局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就。毫无疑问，社会党人喜欢夸大资方在成立反工会联合组织和托拉斯化方面的团结，而德国的正统派领袖们，特别是考茨基，则坚决相信资本主义的托拉斯化和大规模企业正在迅速地为社会社会主义铺平道路。社会党人往往一时说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工人的权益是一种日益严重的威胁，一时又说各国资本主义集团之间日益加剧的对立竞争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就社会党和合作运动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正式讨论，也多少是不得要领的。主要的问题在于社会党人是否应该着手建立党的合作社，作为帮助工会进行劳工斗争，并向社会党提供集会场所和经济援助的机构。但是这样干（比利时、法国北部以及意大利的一些地区在很大程度上都这样干了），就必然会引起其他方面——如基督教、自由党或中派——起而效尤，成立对立的合作社。而这正是代表大会所不愿见到的。看来大多数代表都明确，正如同只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社会党和一个兼容各方的工会运动一样，每个国家也只应该有一个人人能参加的统一的合作运动以体现工人阶级的团结。社会党人希望这个合作运动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动力，至少以阶级斗争的精神为动力。他们希望合作运动独立自主，就象他们承认工会在经济领域必须

独立自主一样，不过他们也希望运动同各国的党和工会在行动上协调一致。实际上，他们希望一举两得：一方面防止基督教和其他党派的对立的合作运动得到发展，一方面使统一的合作运动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同盟军。

当然，这一点实际上是不可能办到的。比利时人以及持相同看法的人，根本不打算放弃自己的社会党合作社，正象他们不打算放弃自己的社会党工会一样。在法国，盖得派也坚决地相信社会党合作运动的优点。另一方面，主张统一的合作运动的人也同样坚决。不过在当时，除非以政治上的中立为基础，否则就不可能建立统一的合作运动，因为这种政治上的中立是跟社会党人的如下主张不相容的：在工人阶级的共同斗争中，合作社应该是社会主义运⁷⁹动和工会运动的伙伴。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人也另有自己的看法。正如同他们对工会运动的职能采取一种严格的拘谨看法一样，他们也倾向于把合作运动看作是一种争取工人阶级当前利益的运动，而不是肩负社会改革任务的运动——他们把这项任务完全留给了社会民主党。因此，他们能够收起那种企图使合作运动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性质或从任何政治角度加以利用的野心，虽然他们也希望在劳资纠纷中偶尔把合作运动当作工会的同盟军。事实上，德国的合作社主要是由拥护社会民主党的人组成的，党同这些人的关系很好。总的说来，这种情况使德国的社会党人感到满意；而且他们也能象往常一样，以冯·埃尔姆^①为主要发言人，使代表大会深受他们的观点的影响，从而确保最后通过的决议中决不会出现与之相矛盾的东西。

上段所谈的主要是消费合作运动的情形，这是与会代表最关心的一种合作运动。至于生产合作运动和农业合作运动，情况则

^① 见本卷第 325 页。

有些不同。当时农业合作社所关怀的主要仍然是取得信贷的问题，社会党人同这种合作社没有什么接触，因而几乎没有讨论到自己对这种合作社的态度。生产合作运动同工会的关系——如果不是同社会党的关系——则要密切得多。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都有实力强大的生产合作运动，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运动同工会有密切联系，其中还有一些合作社是在工会的主持下经营的。在这个领域中，出现一个由其他方面主持的规模庞大的敌对运动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而统一的问题也就不那么重要了。生产合作运动的问题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多加讨论，会上所关心的主要是消费合作运动。

诚然，哥本哈根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划归合作运动的80 任务中列入了这样一条：“教育工人完全独立地管理自己的事务，从而帮助他们为实现交换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民主化和社会化做好准备。”决议中的这项条款使得列宁出面提出一个修正案，主张只有在资本家的财产被剥夺以后，经过发展，合作社的社会化和民主化的职能才能予以承认。列宁的建议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最后确定的决议删去了盖得对于“中立”合作运动的抨击，也删去了所有直接提到生产合作运动和农业合作运动的字句，而这正是法国人希望特别予以承认的运动。最后决议着重指出，合作运动本身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同时警告社会党人提防那些反对这一目标的合作运动者。在说明这两点以后，决议就集中强调，贸易盈余不应全部当作红利分配给购买者，而应拨出一部分用于发展合作生产和教育事业；决议还强调，有必要就合作社社员的工资和劳动条件同工会取得协议。然后，决议规定，每个国家的各种合作社是否利用自己的资源直接支援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供这种支援，应由各合作社自己决定。决议敦促所有社会党人和工会主义者积极参加合

作运动，“以便在运动中发扬社会主义精神，并防止合作社不履行教育和团结工人阶级的任务。”

在劳工与社会立法委员会中，讨论是从失业问题开始的。首先由莫尔肯布尔发言，他的发言内容非常反动，虽然主张由国家制定一种失业救济制度，但是反对劳动权的概念。这激起了腊姆齐·麦克唐纳和哈里·奎尔奇的反对，不过奥地利的布劳恩却支持莫尔肯布尔，布劳恩说按公平的工资实现劳动权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实现的。“能消除失业现象的不是取得劳动权，而是 81 消灭资本主义。”关于怎样才能最妥善地解决失业者生活维持费的问题，有很多争论；有些人说应该完全由资方负担，因为“劳动后备军”完全是为了资方的利益才无工可做的；而另一些人则希望这笔费用应该一部或全部由国家的总税收来负担。最后决议要求“政府当局制订一套全面的强制性保险制度，交由工人组织管理，其费用由生产资料占有者负担”。决议还提出以下各项要求：定期精确地统计失业人数；充分发展公共工程，向受雇工人发给标准工资；经济危机时期为失业基金提供特别补助；领取救济金的人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建立工会办理的或工会与雇主共同办理的职业介绍所；制定法律减少劳动时间；在全面的强制性保险制度建立以前，向工会失业救济金提供补助。在讨论的过程中，代表们建议公共工程的动工时间和分配应能抵消劳动需求量的波动。

劳工与社会立法委员会在讨论了失业问题以后便着手讨论一般的劳工与社会立法问题。最后决议强调指出，各国现行的劳工与社会立法都是不充分的，并进而列举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法定的 8 小时工作日制，禁止雇用不足 14 岁的童工，禁止夜班劳动（特殊情况例外），每周至少有 36 小时的连续休息时间，废除实物工资制，保证结社权利，与工人代表合作监督工农业劳动等。接着决议详细论述了官方的国际劳工立法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微不

足道，接着便要求各国建立“机构，以保证对伤残老弱和丧失工作能力的人提供充足的生活资料，对产妇和婴儿提供足够的帮助，
82 保护孤儿寡妇和失业者免于匮乏”。然后决议提请注意农业和林业工人特别缺乏劳动保护的情况。决议最后要求每个经济部门的工人都不断进行宣传，并建立强大的政治与经济组织，以便战胜有产阶级的抵制，制定有效的法律以保护工人的权利。

所有这些都是露骨的改良主义主张，并没有由于害怕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而缄口不言。当然，这些要求本身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其中有许多点自第二国际成立以来就是它的纲领的一部分。此外，在提出这些要求时，也同时断言在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它们是永远不能充分实现的。尽管如此，在语调方面仍然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变。第二国际的发言人从直接向资本主义世界提出改良要求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的成分增加了，而对资本主义国家抱革命性敌对态度的成分却大大减少了。至少德国人的情况是这样，尽管法国人不大相同。说来相当奇怪的是，对于资产阶级政府大献殷勤的危险性，英国人似乎比德国人更加注意。

往下我们要谈谈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一场最重要的辩论，即关于战争问题的辩论。这次讨论本打算主要考虑应采取什么积极步骤去贯彻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特别是应采取什么态度去对待国际仲裁和裁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压倒多数的代表都支持这样的要求：所有国际争端应一律提交国际仲裁，并应为此目的设立常设性机构。大会还一致同意，第二国际应通过其议会代表和群众运动，竭力促使各大国达成裁减军备的协议。代表们的发言很多也提到，必须一方面主要依靠工人阶级的运动，同时又利用可能在资产阶级中争取到的对这些建议的支持。大会特别强调有必要达成协议，裁减海军军备，主

要是英德两国之间必须如此。德国人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特别报告，说明他们在帝国议会中就这个问题提出质询，同时说明德 83 国政府拒绝了阿斯奎斯^①所提出的就削减海军军费问题举行会议的建议。针对德国拒绝这项建议的立场，许多代表主张英国拒不放弃在战时捕获商船的权利，而大会则大力主张放弃这一权利。意大利人（发言人是莫尔加里）竭力要求集中讨论一个问题，同时力图说服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号召所有社会党的议会党团在各国议会中提出建议，要求把全部军备削减 50%，这一要求应以群众示威游行作后盾，并且每年重复一次，直到实现时为止。但是，这个计划遭到代表们的否决。

瓦扬和凯尔·哈迪在英国工党和独立工党以及法国社会党的支持下，联合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引起了巨大分歧，其内容如下：

大会认为，在一切用于预防和阻止战争的手段中，特别有效的是工人总罢工，尤其是战争工具（武器，弹药，运输工具等）供应工业中的工人总罢工；此外还有以最积极的方式出现的群众鼓动和群众行动。

这种重提总罢工问题的作法，使那些希望这个问题已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得到最后解决的代表大感头疼。凯尔·哈迪在开场白中清楚地说明，他并不是建议由一个国家的工人单方面采取行动，他所设想的是各交战国的工人同时停工不干。他还声明，他所考虑的并不是由所有工人举行总罢工，而是主张首先拒绝生产军火或运输部队和装备，用以停止战争物资的供应。凯尔·哈迪缄口不谈他所主张的这种罢工将成为武装暴动的序曲，他的发言听起来好象他脑子里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在举例说明自己的

^① 当时的英国首相。——译注

论点时谈到,英国煤矿工人举行一次罢工,这一行动本身就足以使
84 战争活动陷于停顿。他的这个经过修改的建议,就象法国人或罗
莎·卢森堡的那些更加极端的方案一样,并不能取悦反对总罢工
的人。累德堡虽然属于德国左翼,但也象列金一样,不愿意考虑凯
尔·哈迪的建议。德国人的主张虽然得到其他一些代表团的支持,
但是除非它能赢得接近全体一致的赞同,否则是无法列入大会的
决议的,因为代表大会不征得各国党的同意就无权向它们发号施
令。不过讨论的过程表明,如果要断然否决哈迪-瓦扬的修正案,
就必然会引起很大的不满;于是艾米尔·王德威尔得很快提出了一
项建议,主张把这个问题留交下一届大会作进一步考虑。反对
的一方接受了这个建议,主要决议得到一致通过,只字未提把罢工
行动当作防止战争的手段的问题。然而,甚至连这个折衷方案也
有人反对,只是反对者终于被说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而已。德国
和奥地利代表分辩说,只要提到在面临战争时采取罢工行动,哪怕
只是提到第二国际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虑,都可能使那些国家的
社会民主党被控以叛国罪,从而给各国政府以可乘之机,取缔它们
并没收它们的财产。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绝不愿意由于他们所完全
反对的政策而面对这种危机;不过他们终于被说服,接受了这样的
看法:仅仅答应在将来的大会上考虑这个问题并不会使他们遭
到这种危险,特别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已不止一次地经过讨论。他
们勉强接受王德威尔得的建议,倒不是由于他们有意改变自己反
对哈迪-瓦扬建议的立场,而是因为他们不愿驱使法国和英国的代
表脱离国际单独实行这个建议。

把任何有关罢工行动的字样删去以后,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所
通过的决议,把反对战争的主要责任放在各国议会中的社会党人
的肩上。决议号召他们投票反对所有陆海军拨款;要求所有国际
85 争端一律交付强制性仲裁;争取普遍裁军;作为走向裁军的一步,

争取签定限制海军军备和废除捕获商船权利的公约；争取废除秘密外交，要求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国际条约一律公之于世；最后，争取所有各民族实现自治，并使他们能防御战争袭击和一切压迫。所有这些建议大都同非社会主义和平运动的纲领几乎完全相同，也许只有最后一项关于所有民族实现自治的建议是个例外。

接着，哥本哈根决议重申斯图加特决议中的两个主要段落，明确规定工人阶级在面临战争威胁时和在战争实际爆发时所应负的责任。决议指示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在面临任何战争威胁时都要力促有关国家的社会党采取共同行动，如果任何社会党有所拖延或犹豫，就应召开该局和国际议会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予以解决。

在处理了这个问题以后，哥本哈根大会还有一些提案要讨论，其中大都是由于新近的事件而提出的。大会通过了一项措词强硬的决议，要求废除死刑，并指责资产阶级政党放弃了反对死刑的运动，而且日益加剧地在阶级斗争中把死刑当作对付工人的武器。连同这一问题，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抗议一些国家最近破坏避难权的事件，尤其是俄国，还有其他国家——包括英国——都发生这类事件。决议对阿根廷寡头政府的所行所为提出抗议，该国政府为了本国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利益，在普选中弄虚作假，并且煽起“党派叛乱”。决议以强烈的措词谴责日本迫害社会党人的行为。决议对西班牙社会党人和卡塔罗尼亚工人表示深切同情，他们由于反对政府在摩洛哥的冒险行为而遭到野蛮的迫害。决议对费雷被处决一事提出强烈抗议，而对伊格列西亚斯当选为西班牙议会议员则表示祝贺。决议严厉谴责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工会的压制政策，而对土耳其刚刚掀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则表示欢迎。决议还号召巴尔干半岛各国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并在彼此之间建立密切的谅解，把这种谅解当作抵抗各大国正在巴尔干区域推行的资本

主义殖民政策的最好办法。决议严厉谴责俄国政府在芬兰施行的高压政策，并指责各大国无耻地支持沙皇政权破坏它对芬兰人提出的保证。最后，决议谴责俄国政府对波斯革命以及对土耳其所进行的武装干涉，号召欧洲各社会党竭尽全力制止沙皇政权的反动行为。

这一批决议适足以说明，到了1910年，第二国际所深切关怀的冲突是多么广泛。大会还意识到，仅仅通过决议提出抗议并无助于大大推进事态的发展，同时也意识到，甚至连它诱导各国议会中的社会党人根据它的决议大力采取行动的力量也是很小的。各国往往都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务，凡是它们认为不可能赢得群众大力支持的、甚至还可能引起普遍反对的问题，它们都不愿意去处理。为此，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对于各国社会党在执行大会决议方面所应负的责任正式提出了如下意见：

大会承认要为贯彻执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制定标准的指示是困难的，因此大会宣布：各国社会党有权决定采取行动的方式和时机。

然而大会坚持，各国党有责任竭尽全力贯彻执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在每次国际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应准备一份报告，说明各国党在执行历次代表大会决议方面所采取的行动。

总的说来，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显然意味着一次向右转的转变。它虽然重申了斯图加特决议关于战争的主要条款，但是并没有予以澄清，也没有说明除了在议会中表示抗议以外，是否真正有意根据这些条款采取行动。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相比，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所做的一切使自己更接近于同资产阶级和平运动等同起来；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就劳工与社会立法以及失业问题的讨论，比以
87 前的历次代表大会的讨论显然更富于改良主义色彩。关于合作运

动它没有规定出什么明确的政策。在重新讨论工会运动和社会党的政治活动时，它仅仅重申了每个国家只应有一个党和一个工会运动的信念。对我这样一个在45年以后研究这次会议议程的人来说，我所得到的印象是：这个运动意识到自己面临全世界许多地区的危机日趋严重的局面，而对自己是否有力量成功地应付这种局面则非常没有把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尽管话说得很豪迈，但是在1910年就显然可以看出，剑拔弩张的欧战一旦真正爆发，很难指望他们进行任何有效的抵制，虽然他们十之八九会竭尽全力把第二国际的政策一直执行到战争实际爆发时为止。至于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态度就更难预测了。在工业领域，法国工会的战斗精神已经盛极而衰；在英国，凯尔·哈迪是否有足够的群众支持去推行他的反战政策，还是个问题。布拉奇福德和海德门已经同英国社会主义者的主体闹翻了，并且已经发起运动，要求武装起来抵抗德国的威胁；工党虽然看上去站在哈迪一边，但是哈迪在工会中究竟能获得多大支持，往最保守处说也是值得怀疑的。即使在1910年也不难看出，一旦战争爆发，国际就会塌台，不过当时总还存在几分希望，但愿它能在缓和危机方面起一些作用。

(V) 1912年——巴塞尔

1912年11月在巴塞尔召开的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实际上与其说是一次代表大会，还不如说是一次示威大会。555名代表前往开会不是去共商大事的，而是去显示社会党的反战统一阵线。召开会议的原因是，巴尔干半岛战争爆发，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联合起来摧毁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残余部分，并予以瓜分。大会召开的时候，战争的结局已定。土耳其的部队在色雷 88
斯被保加利亚人所击溃，在马其顿被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门的内

哥罗的联合兵力所击败，而在西部则被希腊军队所击败，希腊的海军使得土耳其人无法从安纳托利亚派遣部队去增援占领军。胜利者瓜分土耳其欧洲省分的过程已经开始。

这场战争打响时，欧洲各大国并没有直接插手干涉。但是这些国家对战后的处理肯定不会置身事外，而且如果其中任何一国认定自身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战争仍有蔓延的危险。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最为担心的莫过于这个问题，因而他们一心想的是拟定一个解决方案，让巴尔干半岛各国人民今后得以友好相处。社会党的领袖们认识到，要防止巴尔干半岛的骚乱为互相敌对的、各自追求本身利益的大国进行干涉敞开大门，最有希望的办法在于说服巴尔干各国在一个共同的联盟中携起手来，捐弃前嫌，联合一致，抵抗任何外国发动的侵略。在前一阶段，当战争还没有真正爆发时，国际一直在大力要求巴尔干各国结成联盟，而且由于担心触发燎原战火而力促各国反对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保加利亚社会党“宽派”领袖萨卡索夫从一开始就勇敢地采取了反对保加利亚扩张主义者的路线，并成为拥护巴尔干联盟政策的斗士。在所有巴尔干国家中，社会党人的力量都太薄弱，不足以对大局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他们只能提抗议——当时民族主义深得人心，方兴未艾，在这种局面下，甚至连提抗议也是非常危险的。

主持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王德威尔得，在巴塞尔大会召开期间患病，由爱都阿·安西尔代表他担任主席。除了王德威尔得一人而外，这次大会可以说是一个群贤毕至的大会，一个显示口才的场合，所有主要的演说家都参加了。斯图加特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战争的决议，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曾得到重申，这一回又以各种热情的表示再度予以通过。大会告诉代表们说，每个社会党都大声疾呼地呼吁了和平，并竭尽全力防止战争的蔓延，因而都符合决议的精神。大会号召他们利用“一切适当的手段”继续这项良好的工

作。大会声称，“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已经成了和平的基本保障”——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说，这种恐惧心理对于防止大国积极干预巴尔干半岛冲突已经起了作用。人们有理由怀疑，这种恐惧事实上是否起了大作用；不过对社会党人来说，相信它起了很大作用倒是令人鼓舞的。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工人运动既然并不强大，自然也就谈不到通过罢工行动或武装起义来制止战争的问题；而且也没有人建议其他国家的工人应该起而罢工以迫使它们讲和或截断它们的供应。第二国际所能做的无非是敦促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社会党人采取坚强的路线，以阻止本国政府向奥地利或俄国提供任何帮助，因为这两个国家显然是最可能干预巴尔干半岛冲突的国家。没有一个社会党人真正愿意阻止巴尔干各国分割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或者对土耳其抗抵力量的崩溃感到惋惜。社会党人所希望的是防止巴尔干战争转变成欧洲大战。虽然最明显的危险在于奥地利和俄国可能直接卷入战争，但是社会党人心目中的最大恐惧莫过于：要是这种情况果真出现，法国、英国和德国便都会被拖过去。他们最担心的是英德对立的结果可能使这两个国家参加敌对的双方。为此，代表大会要求英德两国的社会党人采取共同行动，促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得到和缓。

当巴塞尔大会召开的时候，巴尔干战事还处于第一阶段。直到大会闭幕以后，获胜的各国才由于分赃不匀而发生争吵，它们非但没有建立第二国际所赞许的巴尔干联盟，反而在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打得你死我活。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大国也没有90直接插手干涉。结果媾和了，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希腊在罗马尼亚的支持下，夺去了保加利亚人的一部分胜利果实，并让土耳其人恢复了一小部分失地。1912和1913年虽然躲过了世界大战，但是延缓期是很短的，而且社会党人拥护和平的立场同取得这个喘息机会究竟有多大关系，也是大可怀疑的。各国社会党在议会内外

都尽了最大努力去提出抗议和举行示威,但是老实说来,它们并没有力量免除这两场灾难。在西方国家中,它们既没有力量、也缺乏意志去发动革命防止战争,革命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防止战争的手段。即使是在俄国,革命也不是为了防止战争而出现的,它是战争所造成的后果。

(VI) 1914年——维也纳和巴黎, 第二国际的崩溃

社会主义者国际按原订日期应于1914年8月在维也纳举行全体代表大会。但是6月28日,奥地利皇储弗朗兹·斐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暗杀。经过多途径的外交谈判以后,奥地利政府终于在7月23日向塞尔维亚提出了最后通牒,其措词如此之激烈,以致对方根本不可能接受它;过了5天,继最后通牒之后,又对塞尔维亚宣战。如果德国人不保证在俄国人一旦驰援塞尔维亚时(事实上俄国人必然会这样做)就支援奥国的话,奥地利人是不会采取这一行动的。如果德国人与奥匈帝国联合起来对付俄国,那么法国就不大可能袖手旁观。至于法国,它会转而指望英国的支援。事实上,德国在8月1日对俄国宣了战,并于第二天向比利时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允许德军过境进攻法国。比利时人坚持其得到各国保证的中立立场,而且又同英法两国取得谅解,于是便拒绝了德国人的要求。这样一来,德国政府就在8月3日对法⁹¹宣战,驱兵进入比利时领土。第二天,即8月4日,英国以比利时的中立遭到破坏为由对德宣战。8月5日,奥匈帝国对俄宣战;8月10日,法国对奥匈帝国宣战;两天以后,英国也跟着对奥匈帝国宣战。德国在8月4日就已经侵入了比利时,而英国军队则于9日就已经开始在法国登陆。8月13日,奥地利军队侵入塞尔维

亚，而俄国人则于16日侵入东普鲁士。20日，德军占领布鲁塞尔，26日开始了坦能堡战役，并在这一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俄国人。奥地利军队在塞尔维亚暂时被击退，但是到了9月5日，德国人距巴黎已经不足10英里之遥，只是被及时地阻挡在那里罢了。大战已经在许多战线上展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非但没有采取任何一致的行动去制止战争，反而分裂成为许多互相争斗不休的集团。

在大战实际爆发以前，第二国际的维也纳代表大会最初迁往巴黎，随后就明确地放弃不开了。但是在7月15和16日，法国社会党在巴黎召开了一个非常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其他国家的一些领袖，其中有来自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鲁巴诺维奇，有来自比利时的安西尔和沃特尔，有来自荷兰的伏列根，以及来自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由于意识到危机迫于眉睫，瓦扬在饶勒斯的支持下，重申他以前提出的举行国际总罢工以防止战争的要求。马赛尔·桑巴同意他们的主张，而盖得及其信从者则一如既往，坚决反对这一要求。盖得说，这样做就会使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国家灾难临头，而且肯定会使社会主义和人类的文明遭到破坏。举世为之惊讶的是，以前的反军国主义极端派的领袖古斯塔夫·爱尔威也支持盖得的主张，理由是没有办法保证在每个国家都采取一致的罢工行动。尽管遭到这些抨击，大会仍以微弱的多数赞成“在各有关国家同时组织国际总罢工”。

几天以后，即7月29日，在奥地利已经向塞尔维亚宣战之后，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92人中有：法国的饶勒斯、盖得、瓦扬、桑巴和让·龙格；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伯利安和涅米克；俄国的鲁巴诺维奇；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得；意大利的莫尔加里；以及英国的凯尔·哈迪、布鲁斯·格莱西尔和邓·伊尔文等人。德国只派来一名代表，即社会民主党主席兼该党议会党

团主席胡果·哈阿兹，不过罗莎·卢森堡作为波兰代表也出席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哈阿兹的动议，原定于8月23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决定于8月9日在巴黎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会议上，维克多·阿德勒在涅米克的赞同下宣称，对塞战争在奥地利深得人心，因而奥地利社会党人要采取任何行动反对这场战争是非常困难的，尽管他们曾对致塞最后通牒中的激烈措词提出过抗议。这番话显然预示，奥地利社会党的领袖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去反对对塞战争，他们有求于其他社会党同志的不过是采取行动限制战争的范围，特别是防止俄国插手干涉。这些暗示并没有受到欢迎；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委员转向哈阿兹，要他宣布德国社会党人的意图。不久以后就被撤去德国党领导职务的哈阿兹，叙述了他的党已经采取什么步骤反对德国参战和抗议奥地利政府的顽固态度。他让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同事们了解到，即使俄国人对奥宣战，德国社会党人也将反对德国干预其事，而且尽管有人已经替德国政府向他们打过招呼，他们仍将拒绝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胜利结束后立即举行的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哈阿兹又当众重复了这一声明，同时也谈到了德国正在举行的盛大的反战示威。哈阿兹受到群众的热烈欢呼。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所通过的决议，号召各有关国家的工人运动不仅要把反战示威继续下去，而且还要加强，同时还要坚决要求
93 用仲裁办法解决奥塞冲突。决议宣称，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工人要尽一切可能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前者应劝使法国政府阻止俄国进行干预，后者应劝说德国政府节制奥匈帝国。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在7月30日上午又举行了一次会议以后就闭幕了，代表们回国汇报所作出的决定。第二天，以饶勒斯（他仍然相信和平是可以挽救的）为首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前往会见法国

总理——前社会党人维维安尼，企图敦促他进一步采取步骤约束俄国；维维安尼并没有接见他们；代表总理接见他们的副国务部长对他们根本帮不了什么忙。就在同一天晚上，仍然没有死心的饶勒斯在一家饭店中同《人道报》的一些同事共进晚餐，这时他竟被一个青年反动分子暗杀了。

杰出的演说家和社会主义运动精神上的领导人饶勒斯之死，不仅对法国、而且对世界各地的社会党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尽管他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其他国家中崇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人存在尖锐的分歧，但是他几乎受到举世的尊敬和仰慕。甚至连激烈反对他的罗莎·卢森堡也很崇拜他，而且同他私交很厚。在法国，他的地位高于其他政治领袖，同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关系一直很好，他费尽苦心不去开罪他们。诚然，他在第二国际中曾大力维护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也极力鼓吹法德两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友谊，也曾竭尽全力去改善法德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促进国际仲裁的事业。他的突然死亡使得法国社会党人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因为盖得和瓦扬的声望都不够高，不足以接替他的位置。

即使饶勒斯活了下来，他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十之八九也无能为力。大局已定，事态正朝着那个把欧洲五个最大的强国卷入一场战争的方向发展。俄国已经决定对奥进行干涉；德国政府已经 94 决定对俄宣战，事实上就在饶勒斯死去的第二天，德国政府就对俄宣战。尽管哈阿兹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说了大话，但是德国社会党人——就象奥地利社会党人一样——真正起来卓有成效地反对本国政府计划的前景是不存在的。饶勒斯可能使局势发生变化的地方，并不在于他能防止战争，而在于战争爆发以后他能指导法国社会党人的行动，也许还能影响其他人的行动。常有人说，如果饶勒斯当时还活着，他会象盖得和瓦扬两人实际上所作的那样，拥护

保卫国家抗击德国的事业。这种看法大概是正确的，但是他也可能争取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从而显示比盖得和瓦扬更加明智。他争取和平的机会，只有到后来，也就是在德国未能迅速取得胜利以后，本是会到来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如果1916年以后他仍然在世，他本可能使局势真正发生变化。

就当时来说，他的逝世使法国社会党人在德军开入比利时企图进攻巴黎以前，一直陷于瘫痪。不过，在7月31日晚上，还不能明显看出大局已经无可挽回地决定了。当时，英国政府仍然在设法阻止俄国人；德国虽然已决定对俄宣战，但还没有实际提出。那些不久就要拼个你死我活的国家的社会党人还在进行磋商。

8月1日，即饶勒斯被暗杀的后一天，赫尔曼·弥勒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使者抵达巴黎。他由比利时的昂利·德·曼陪同，目的不是为了提出任何明确的建议，而是交换情报。弥勒告诉法国社会党人说，德国的党就投票表决军事预算所应采取的态度，还未作出决定。他说，党肯定不会投票赞成军事预算，但有弃权的趋向。他说明，在许多德国人看来，未来的战争主要是德国同俄国野蛮制度的斗争；他坚持，一旦战争果真爆发，罪责主要不在德国人身上，而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身上。当然，这是德国政府正式要求权利，假道比利时进军以前的事，但也仅仅是一天以前的事。弥勒在巴黎说话的第二天晚上，比利时就收到了德国的最后通牒，而且限于12小时以内作出答复。这一步的后果是比利时社会党人几乎完全一致地支持国家进行抵御，而且两天以后，也就是8月4日，又使英国参了战。

同一天，德国帝国议会就军事预算进行表决，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致投票赞成。这并不说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在党的会议上，111名社会党议员中有14人投票反对军事预算。但是，以党的领袖哈阿兹为首的少数派，不得不向党的纪律低头。党责成哈阿兹

(他曾提出辞呈,但未被接受)发表正式演说,赞成他本人所反对的政策。甚至连不久以后就公然违抗党纪的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次也向这一政策屈服了。

我们可以为德国人说一句,在俄国人明显地打算对奥匈帝国开战以支持塞尔维亚之前,德国人曾在宪法范围内尽最大努力去防止冲突区域的扩大。他们的报纸竭力反对德国进行干涉;他们举行规模巨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以拥护和平。但是在任何阶段都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打算越出遵守宪法规定提出抗议的范围。他们始终强烈反对发动罢工以制止战争威胁的建议,也始终反对掀起暴动以示反抗的全部主张;他们在第二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曾十分明确地表明这种立场。但是在1914年7月的局势下,大规模示威肯定是没有用处的。毫无疑问,奥地利政府在送出致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以前,曾征询德国的意见,并且得到保证:如果俄国参战,德国决不坐视。在估计德国工人阶级可能作出什么反应时,德国政府可以依靠工人阶级的领袖和一般工人中间的反俄情绪的力量,并且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即使出现最糟的情况,社会民主党人的主体也只会提出抗议,而不会发动叛乱或举行罢工来阻挠动员工作或妨碍战争的供应。至于对比利时采取的行动,德国政府可以辩解说:如果德军不开入比国,法国就会开进去,因为它是法国进军德国的捷径。这个论点即使是错误的,也仍然可以从当时所知的英、法、比三国军事领袖所进行的讨论中找到一些依据。这并不说明德国人师出有名,但有助于解释德国社会党人所持的默许态度,尽管这决不足以证明他们的这种态度是正当的。至于法国人,在德国军队横扫比利时人以后,几乎马上就面临大军压境的前景,根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因此,大多数人都立刻起来报效国家。

1914年7月,俄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战罢工和示威。但是俄

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使是团结一致的，在1914年也无力对沙皇的战争政策进行有效的抵制。更何况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团结一致的。当俄国政府决定支持塞尔维亚人去对付奥地利人的时候，俄国掀起了一股亲斯拉夫浪潮，在德国对俄宣战以后，这股浪潮更加高涨。不仅是很多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连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老前辈普列汉诺夫，当时也转变态度，拥护俄国的爱国主义。但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不论是俄国国内的还是象列宁一样流亡在外的——仍然坚定不移地反对战争；不过只有极少数人同意列宁，把战争当作发动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手段，或者说，只有极少数人准备接受列宁的失败主义政策，把它当作一个革命信条。

关于奥地利的情况，如前所述，几乎从奥地利皇储被暗杀的时候起，维克多·阿德勒就认为群情激愤，敌意太深，社会党人无法有效地反对政府的政策。奥地利社会党人确曾抗议政府的毫不妥协的态度，并曾要求通过仲裁办法解决同塞尔维亚的争端。不过，他们从一开始就说，奥地利有权要求塞尔维亚提出保证和给予赔偿；他们反对政府仅仅是由于政府做得太过火了。在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存在着以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为首的人数不多的少数派，甚至在其他国家已卷入战争的时候，他们仍然反对战争，只是在当时这个少数派无能为力罢了。

至于五大国中最后参战的英国，由于德国入侵比利时，主张采取积极行动以制止参战的问题便一劳永逸地被推向一边了。英国的领袖们在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回国以后，成功地说服了第二国际英国支部组织反战示威，示威时发表演说的有凯尔·哈迪和阿瑟·汉德逊等人。但是当时始终不存在真正打算越出示威的范围采取行动的问题：凯尔·哈迪关于利用罢工阻挠军队和战争物资调动（事实上，他只是主张把这一行动当作国际一致行动的一部分）的主张，甚至根本没有人加以考虑。有一些

人寄希望于英国政府劝阻俄国和德国不加干预的尝试；还有一个少数派则希望英国甚至在德俄两国进行武装干涉时也袖手旁观。不过，这仅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少数派，它的基础是独立工党和一部分英国社会党人。英国社会党的领袖海德门，长期以来一直鼓吹武装起来反对德国；掌握工党最后控制权的工会，在面对德军假道比利时进攻法国的事实时，绝大多数都携起手来，支持战争。即使比利时的中立没有受到侵犯，英国的工会大概也会采取同样的路线。但是，事态发展得太快了，根本来不及彻底讨论这个问题。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1914年参战的五大国中，还没有一个国家由于存在一个保证尽最大努力防止战争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而使局势直接发生重大变化，或者说这个运动并没有能约束政府不采取陷国家于战争的政策。人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这主要由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党人负责，因为他们两国的政府完全错了：奥地利人的错误在于没有留出同塞尔维亚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余地，而德国人的错误则首先在于保证支持奥地利人，继而在于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人们一眼就看出：奥地利和德国是侵略者；如果第二 98 国际的政策应该认真贯彻，那么制止奥地利和德国参战的责任就在于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党人身上，而他们双方竟同样可鄙地没有尽到这份责任。毫无疑问，沙皇政府也表现出顽固不化的态度；但是在俄国，社会主义还只是一个地下的反抗运动，社会党人在1914年除了象往常一样以外，根本无力做更多的事情。当时除开真正掀起革命以外，就无法制止沙皇政府；而革命又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直到后来，战争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和灾难才为革命开辟了一条道路。至于法国和英国的社会党人，在7月和8月初的那些性命交关的日子里，我们又能指望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呢？他们的政府，不论在较长的时期内犯有什么过错，对于战争危机的造成毕竟是没有责任的。在那个风云紧急的半个月里，所能要求于英法

政府的不过是尽量运用自己的力量约束德国和俄国，以便使冲突局部化，并迫使奥地利政府接受仲裁或调停。

当然，在我们纵观整个局势的时候，不应该认为这一切似乎都是由于奥国皇储被杀引起的，而应该把这一切看作是一场错综复杂的国际冷战的最后阶段。这场冷战已经进行了多年，而且一直在不断恶化，社会党的领袖们长期以来就怀着日益不安的心情对这场冷战进行研究。在奥塞争端的幕后，隐藏着帝国主义在巴尔干半岛争夺的漫长历史，这不仅牵涉到俄国和奥匈帝国，而且也牵涉到德国和英国。在这场争端的背后，也隐藏着英国和德国——富有的大国和“贫困”的大国——在几乎遍及全世界的范围内争夺殖民势力的斗争。除此以外，在西欧还必须加上1870年战争在阿尔萨斯-洛林所留下的隐患。德国的社会党人在遭到攻击，说他们支持德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时，往往反驳说：在欧洲当时的局势下，“侵略战争”和“防御战争”这些字眼已经失去了意义，即使能指出“侵略者”的话，责任也不在于直接的“侵略者”，而在于所有大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已经使一切有关国际道德的说法变成了纯粹的欺人之谈。他们抓住英国拒不同意修改海上封锁权的立场、英法两国同反动的俄国结盟的问题、以及德国有“在世界上获得有利地位”的合法权利问题大做文章。这些论点虽不能说服德国社会党人中间的顽强的少数派，但是其中已有足够的东西使人相信，所谓英国参战完全是为了保卫“小而勇敢的比利时”这一对立的论点不过是露骨的伪善论调。

于是，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多年以来一直在指责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外交政策，并说英俄联盟是对和平的威胁，到了1914年，他们更深深怀疑英国的政策，认为这种政策背着人民使英国卷入战争。他们要求英国政府即使在俄国和法国卷入战争的时候也保持和平，而且要准备好，一有机会就出面调

停。但是，面对德国的立场，面对德国社会党人没有出面反对本国政府的情况，他们也就很少希望说服英国工人的主体了。英国的工党和工会，不同于独立工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团体，仅仅一只脚踏进了第二国际，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大辩论很少参加。当时，工党甚至并不以社会主义政党自居；在第二国际中，英国始终被目为政治上落后的国家，而德国社会党人则一再被当成光辉的榜样同工党作对比。尽管凯尔·哈迪主张举行总罢工以反对战争，但是欧洲大陆上并没有人认真指望英国工人会采取这一行动，单就反战问题而言，英国也没有人指望做到这一点。再者，工党在议会中的地位显然太薄弱，即使它是团结一致的，也不能在议会中取得多大成就。剩下的办法就只有举行群众示威了。但从德国挥军前进的时候起，始终反对战争的社会党人也就完全丧失了发动群众走上街头的力量了。实际上，从那个时刻开始，英国的社会党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是：自己的人数很少，究竟是准备在敌对的舆情占压倒优势的条件下继续反对战争，还是在英国实际上同德国侵略者作战的时候起而报效国家，或是至少尽最大努力阻止德国获胜。 100

在这个问题上，独立工党本身的意见就不一致。一部分党员在该党的主要工会人物 J·R·克莱恩斯的领导下转变了态度，全力支持战争行动。以菲利浦·斯诺顿为首的主体保持该党反对战争的态度，只是在这个问题上一时还不能有多大作为。在它的两个杰出人物中，凯尔·哈迪由于感到幻灭，心力交瘁，于 1915 年 9 月患病故去；至于腊姆齐·麦克唐纳，他在辞去工党的领导职务，让位给阿瑟·汉德逊以后，一方面攻击格雷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又声称，战争一旦打起来就必须打赢，至少不能打输，于是拒绝反对征兵运动。

当时在法国，茹尔·盖得和马赛尔·桑巴两个社会党人于 8 月 26 日参加了维维安尼的改组内阁。在比利时，艾米尔·王德威

尔得已于8月4日参加内阁。在英国,工党直到1915年5月才参加内阁,原先在1月被任命为枢密顾问官的阿瑟·汉德逊这时改任教育大臣;而另外两个社会党人——威廉·布雷斯和G·H·罗伯茨,则受命担任次要职务。在其他交战国中,社会党人只是通过革命才参加政府的——在俄国是1917年,在德国和奥地利则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

第二国际在1914年7月的布鲁塞尔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会议以后就不再能成为集体表达国际社会主义政策的工具了。它已经不可能再以任何形式在比利时领土上继续存在了,其残余部分不得不到一个中立国家去寻求避难所。它的书记比利时人卡米尔·惠斯曼斯(生于1871年)把总部迁移到荷兰,设法从这个有利地位同中立国和交战国中的参加第二国际的党保持联系。早在1914年9月,美国社会党人就写信给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建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此后不久,又从意大利和其他中立国收到了这种建议。1915年1月,中立国的社会党人在哥本哈根举行了一次会议,要求执行局“一俟情况许可,就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无论如何不得晚于和谈开始时”。1915年2月,协约国社会党人一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会议在伦敦举行;同年4月,中欧国家社会党人会议在维也纳举行。中立国家社会党人的第二次会议1916年7月于海牙举行,并要求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召开一次会议。意大利和瑞士的社会党人于1914年9月在卢加诺曾经举行过一次联席会议,瑞士的社会党人罗伯特·格利姆开始为召开一次反战社会党人的国际会议而奔走。1915年3月,主要在克拉拉·蔡特金的推动下,在伯尔尼举行了一次国际社会党妇女会议,会议发表决议要求立即结束战争。在这次会议上,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列宁的影响下,分裂出去了,他们要求同“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决裂,并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这时,格利姆会同意大利社会党的莫尔加里,继续努力说服第

二国际的领袖们，把第二国际所属各党团结在一起。在遭到拒绝以后，意大利社会党人便决定抛开他们，自行其是，并且召开了一次会议，其目的并不在于成立一个新国际，而在于重新建立国际联系，推进争取和平的共同行动。正是从这一活动中产生了1915年9月的齐美瓦尔德会议，一般认为这次会议是第三国际的前身。列宁在这次会上建议立刻成立新的国际，但是不论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还是在以后于1916年4月举行的昆塔尔会议上，都未能达到这一目的。这两次会议的与会者虽然都是反对战争的，但是革命者与和平主义者却齐集一堂，其中有追随列宁，希望把国际战争转变为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国内革命战争的人，也有仅仅希望说服各交战国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人。在这两种持极端态度的人之间还有形形色色的工团主义者和左翼社会党人。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法国代表梅兰和布尔德朗（同属法国总工会）同德国代表格奥尔格·累德堡和阿道夫·霍夫曼（同属社会民主党少数派）签署了一项联合友好声明，其中包括对德军进犯比利时的谴责（由累德堡亲自执笔）。托洛茨基，同格利姆和荷兰的亨利埃特·罗兰-霍斯特一道，起草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主要宣言，列宁在自己的建议以19票对12票被否决之后，也在宣言上签了字。

因此，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使形势急转直下以前，在恢复社会主义国际行动的问题上，就已经有两个对立的运动开始形成：一个是仍然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保持联系的中立国社会党人所主持的运动，另一个是瑞士-意大利集团在采取反战态度的社会党和社会党少数派中发起的运动。第一个运动由瑞典的贾尔马·布兰丁和荷兰的彼得·特鲁耳斯特腊所领导的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委员会掌握，这个运动进行了一番尝试，企图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凭借俄国人的帮助，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一次社会党和平会议，希望交战国双方的社会党都能参加。第二个运动在摆脱了和平主义分

子以后,就为布尔什维克开辟道路,让他们好在俄国取得胜利以后紧跟着就建立第三国际。关于这方面的发展情况必须留待本书下一卷去叙述。

目前只有一点需要指出:1914年第二国际的崩溃虽然使当时的许多社会党人感到震惊,但是各大国政府却能够预见到这一点,而且也无疑预见到了这一点,因而它们没有怎么理会社会主义者的威胁就诉诸战争了。在斯图加特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十分清楚,除非各大国政府被吓唬住,误把示威行动当成决心进行抵制的表现,否则第二国际根本就没有有一项可能有效地制止战争的一致政策。在一切有关国家中,除了英国以外,当时都实行义务兵役制;甚至在敌对行动开始之前,就有很大一部分社会党人有义务随时应征入伍。只有各社会党准备劝告党员拒绝应征入伍,才能对战争进行有效的抵制。但是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除了爱尔兰和少数极端分子以外,旁人甚至从来没有谈过。人们把后备役军人应征入伍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他们一旦应征入伍,其余的工人如果起而阻止战争活动,就会被指责为置同志于不顾;除非新兵愿意发动兵变,否则工人就会束手无策。面对各主要社会党的众所周知的态度,斯图加特大会所通过的、并由哥本哈根大会和巴塞尔大会予以重申的决议,即使不谈它的语意含混不清,也成了一纸具文。

第三章

104

英国——工党成立前的社会主义

(I) 费边社会主义的起源

在本书第二卷中，英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差不多一直叙述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只有费边社的情况留待本卷来叙述。这样安排的理由是：费边社虽然成立于1884年年初，实际上比社会民主联盟采取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的时期还早，但在1889年年底出版《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以前，它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它对社会主义思想发生影响的时期大致就是在1889年开始的，当时新工会运动正在伦敦煤气工人和码头工人的罢工中出现。费边社会主义，只是在《费边论文集》出现时，才成为一种明确的理论体系。我们不能结合社会民主联盟或威廉·摩里斯的社会主义联盟来研究费边社会主义，而必须结合1893年由凯尔·哈迪领导成立的独立工党以及新工会运动来研究它，新工会运动的杰出领袖是约翰·伯恩士、汤姆·曼恩和本·提勒特。

在费边社最初成立的时候，的确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它日后可能要占重要地位。1883年冬，有那么一批人，几乎完全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其中大多数人同工人又很少接触，居然决定建立一个采取社会主义立场的社团，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同样不容置疑的是，也只有这样一个团体才能发展成为费边主义者实际形成的那种社团。但是在一开始，没有迹象说明费边社的明

确观点和政策将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迹象说明，费边社可能比其他同类团体更长久地存在下去，这类团体几乎纯粹出于偶然的机
105 由少数无名人士组成，他们不满于现存的社会基础，老在摸索改进社会的方法。实际上，形成费边社的那个团体的原始意图跟后来从这些意图中发展出来的费边主义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费边社是摆脱原计划而产生的结果。这段过程是这样开始的：1883年，有一个名叫托马斯·戴维逊的人，绰号“游方学者”，在伦敦住了一个时候；按照他的老习惯，他聚集了一批门徒，其中大多数是青年男女，他向他们建议成立一个“新生活同志会”。

托马斯·戴维逊(1840—1900年)的父母是小农场的佃农，乃弟约翰·莫里逊·戴维逊曾著《劳动史》一书，并曾在苏格兰劳工运动中起过作用。托马斯·戴维逊最初在本村，后来在昂德尔和阿伯丁任教。他辞去了教职，为探求哲学而漫游四方。在罗马他同教皇进行了长时间的晤谈，并向教皇推荐一部阿奎纳斯著作的新版本；接着他着手编辑和翻译“博爱兄弟会”的创始者安东尼奥·罗斯米尼(1797—1855年)的著作。移居美国以后，他成了夏令讲学运动的先驱人物，每年定期组织夏令营来研究哲学、宗教和社会问题。他那具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哲学，内容混乱，令人困惑难解，无法加以概述。其中包括这样一种见解：社会的进步取决于个人的新生，改进世界生活方式的途径在于由一群群个人保证按照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的崇高理想来生活，并在可能的时候为此目的建立公社，如果这一点作不到，就应一面继续从事自己的正常职业，一面实践自己的理想。“新生活同志会”的目的在于探讨公社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同时研究美好生活的条件。戴维逊在所创办的伦敦同志会还没有很好地开始活动的时候就前往美国，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团体。随着这个有魄力的人物的离去，伦敦
106 同志会的成员不久就决定分道扬镳。以帕西伐尔·A·恰布为首

的一部分人把新生活同志会一直维持到 1898 年，并在该会存在期间持续出版月刊《播种时节》，恰布后来以美国伦理教会的领袖而知名，当时是地方行政委员会中的一名职员。新生活同志会的会员中有几个著名人物，如心理学家赫夫洛克·艾利斯（1859—1939 年）、慈善家亨利·S·索尔特（1851—1939 年）、爱德华·卡本特尔（1844—1929 年）、约翰·弗朗西斯·奥克舒特（1860—1945 年），以及詹姆士·腊姆齐·麦克唐纳等都是。新生活同志会的另一集团有爱德华·皮斯、弗兰克·波德莫尔（1856—1910 年）、赫伯特·布兰德（1856—1914 年）、弗雷德里克·克德尔和约翰·亨特尔·瓦茨（死于 1924 年）等人。这个集团从新生活同志会分离出去，于 1884 年初创立费边社。费边社社员最初不足 12 人，他们对戴维逊建立公社的主张表示怀疑，希望有一个更加具体的社会改革纲领，同时承认自己对将来应该采取什么路线还无从肯定，因而认定需要时间进行讨论和思考，然后才能系统地提出一套政策来。在波德莫尔的建议下，他们采取了“费边”这个名称，意在说明，在采取行动以前还要更加仔细地思考一下。也许他们当时想到了约翰·盖伊的诗

“不要反对我止步不前：

象费边一样，有利于我的是拖延，……”

但是他们后来选作“社铭”的并不是这两句诗，而是两段所谓引文。实际上，这两段引文看来出自波德莫尔之手。

“因此，无可否认，此人长时间地同人商议，不得时宜地拖延（许多人这样认为），结果倒保障了共和国所有的人，保障了他全体同胞的安全。

适当的时机是必须等待的，就象费边和汉尼巴打仗的时候那样，那时尽管有许多人谴责他贻误戎机，他还是极其耐心地等待。然而当战机到来的时候，又必须象费边那样狠狠地打，否则等待是徒劳无益的。

因此，当初选用费边这个名子，并不说明费边社员预见到社会主义本身需要分阶段地逐步实现，而只是说明他们打定主意从从容容地去拟定正确的方法和政策。人们很容易把当初提出的这种想法当作渐进主义，其实这一概念并不包含渐进主义。事实上，渐进主义看来是在费边社成立很久以后才作为悉尼·韦伯的独特贡献传到费边社的。

费边社跟新生活同志会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矛盾存在。事实上，同志会中有少数人一直同属两个组织，其中有为《费边论文集》撰稿的威廉·克拉克，有赫夫洛克·艾利斯以及在费边社执行委员会中积极工作多年的 J·F·奥克舒特。但是这两个团体各走各的路，各自吸收自己的成员。不久以后，费边社就出版了第一本小册子《穷人何其多？》，作者是费边社当时唯一的工人社员、住宅油漆匠 W·L·菲利普斯。第二本小册子《费边宣言》也是在它成立的第一年出版的，作者是一位才华卓越的新社员乔治·肖伯纳(1856—1950年)，他不久介绍另一新人悉尼·韦伯(1859—1947年)加入费边社。这两个新社员使费边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费边社原是一群热心追求真理的人组成的小团体，并不十分引人注目，肖伯纳和韦伯共同着手把它变成一支具有新颖而又非常现实的社会理论的强大精神力量。

1884年，肖伯纳28岁，在伦敦已经住了8年，以写小说为主，但因无人愿意出版，靠不时撰写新闻稿为生。1882年，部分由于听了亨利·乔治的演说，受到启发，肖伯纳成了社会主义者，不久他自己开始发表演说，并在街头进行宣讲。在这个阶段，他受无政府

主义的吸引，并同尚未清除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民主联盟有联系。当时他正在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满脑袋装着各种观念，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社会主义立场。悉尼·韦伯下了一些功夫使他皈依了渐进社会主义，不久以后，这位不知疲倦的鼓吹者又把这种社会主义种子播在费边社充满探讨精神的基本纯洁的处女地上。

悉尼·韦伯于1884年参加费边社时年25岁。他是殖民部的一名职员，思想非常有条理，记忆力惊人，热忱拥护社会正义。在这个团体的其他人中间，爱德华·R·皮斯27岁，弗朗克·波德莫尔28岁，悉尼·奥利维尔25岁，约翰·弗朗西斯·奥克舒特24岁，格雷厄姆·华莱士在1886年加入费边社时28岁。后来又有一些年纪较大的男男女女加入，但是费边社的主要创始者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对社会主义深感兴趣，但是除了悉尼·韦伯这个突出的例子以外，都还完全不能肯定社会主义的意义是什么。¹⁰⁸

费边社成立的那一年通过了一项议会改革法案，把1867年经过扩大的城市选举权推广到全国，这就使英国的选民（爱尔兰除外）从300万人增加到500万人。此外，这一年也是社会民主联盟发生大分裂的一年，威廉·摩里斯和大多数执行委员脱离联盟，另行成立了社会主义联盟。分裂以前，有一些费边社社员也是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分裂以后，仍有少数费边社社员留在社会民主联盟内。但是1885年，当依靠“托利党的黄金”搞竞选的社会民主联盟候选人遭到惨败的丑闻被揭发时^①，费边社便随着别人一起大嚷大叫地指责社会民主联盟。肖伯纳虽然继续在社会民主联盟的支部发表演说，但是他同威廉·摩里斯的关系比他同海德门的关系要密切得多。1885年，费边社除了发表了肖伯纳的一篇讽刺短文

^① 见本书第二卷第413页。

以外，什么也没有出版；翌年出版了一本 12 页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了两种对立的社会主义观点供读者参考。克鲁泡特金的合作者夏洛蒂·威尔逊夫人（她留在费边社多年，几乎是该社唯一代表无政府主义的人物）阐释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的“自由社会主义”；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则是翻译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一篇文章予以说明的。在举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以前，还从历史上叙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作为导论。但是这本小册子并没有明确肯定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给读者留下的总印象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没有形成，但是到时候却可能从中产生两大派别，一派是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者，另一派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从而重演长期以来使大陆社会主义者发生倾轧的分歧。在这两个流派之中，费边社并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因为小册子的目的是提供资料，而不是作出结论。

1886 年，失业问题已经开始引起骚动，约翰·伯恩士是运动的实际领袖，费边社员很少参加，但是他们倒的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提出报告，其中最活跃的成员是韦伯和波德莫尔。结果，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引起很大争论的报告：《失业劳工的官方组织》。关于这份报告，我在本书第二卷中已经提到^①。这份报告，包括一些很奇怪的建议，把征兵制也列为一种可以用来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在费边社内部第一次引起轩然大波。报告发给了各社员；在一次社员会议上，主张把这份报告当作费边社论文发表的建议遭到了否决。否决的原因很可能非止一端：关于国家种植烟草的计划可能触犯了一些人，而提出义务兵役制的建议无疑又开罪了另一些人。此外，整个文件还有一种强烈的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的观点，

^① 见本书第二卷第 415 页。

这正是费边社当时还不能接受的东西。悉尼·韦伯为费边社写出的第一篇大作就这样碰了壁。但是第二年,当他发表《社会主义者应注意的事实》一文时,影响便大大地恢复了。这一作品是一系列资料性宣传短评中的第一篇,这些短评对确立费边社踏踏实实从事工作的声誉起了很大作用。《社会主义者应注意的事实》一文,就其最初写成的形式而言,其重要性与其说在于韦伯对贫富悬殊问题搜集了令人信服的统计数字,还不如说在于它主要从非社会主义的权威方面引证资料来为社会主义找依据,同时说明社会主义并不是旨在推翻现存社会的革命运动,而是已经在资本主义内部发生作用的各种趋势的合乎事理的必然发展。在这篇引人注目的短评中,韦伯所特有的如下看法已经完全表现出来了:社会主义是顺应当前趋势的结果,而不是扭转当前趋势的剧变;因此可以预计,社会主义的出现不会是突然发生革命性变革的结果,而是不断进行改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突然中断的进化过程的结果。在《社会主义者应注意的事实》一文中,这一概念只是含蓄地提了出来,而没有正式说明,但是隐含之意已经很明显了。

在第一篇真正表明费边社观点的论文出版两年以后,接着又出版了《伦敦人应注意的事实》和《伦敦人应注意的统计数字》;这两篇论文都是韦伯在成立伦敦郡议会的时候写的,目的在于为进步派候选人进行宣传。在此以前,肖伯纳在1887年还写了《真正激进的纲领》一文,对自由党最近采用的新纲领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批驳。在这篇短评中,费边社提出了以下各项要求:实行成人男女选举权、为议员付薪、对不劳而获的收入征税、实行8小时工作制、把铁路收归国有,并以此构成一套全面的当前要求,“以便使真正的激进党,即新工党——一句话,也就是讲求实际的社会党有事可干”。

肖伯纳的这本小册子是由一个特别组成的机构——费边议会

同盟，而不是由整个费边社主持出版的。当时之所以这样安排，是由于费边社的社员中仍然有人反对议会行动，其中有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有的是革命者，二者都认为议会竞选势必导致腐化。由此可见，尽管发表了《社会主义者应注意的事实》一文，费边社仍然认为整个问题还有待讨论。不过，很快就显然看出，费边社大多数社员都站在韦伯一边，费边议会同盟被不声不响地放弃了，说得更恰当一些，同费边社的全盘工作合并了。

第二年，即 1888 年，悉尼·奥利维尔(1859—1943 年)为费边社写出了第一篇有关经济学理论的论文，题名《资本与土地》。这篇论文主要是攻击亨利·乔治那一派人的，旨在说明，资本象土地一样，也是一种反社会的垄断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从生产者身上榨取“租金”。当然，这是人们早已熟悉的社会主义论点，海德门和其他社会民主联盟领袖曾经多次提出。不过，社会民主联盟的领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概念来说明这一问题的，而费边社则干脆运用李嘉图的地租说，把亨利·乔治应用这种学说的范围从土地扩展到其他资本货物上去，说它们全都可以产生占有者从人民的劳动中榨取的租金。正如韦伯在《社会主义者应注意的事实》一文中曾引证穆勒和杰文斯，用以说明社会主义论点的真实性，奥利维尔也引证了李嘉图及其继承者。

费边社在“现实社会主义”方面的下一篇论文是悉尼·韦伯所写的一篇短论，其中包括“8 小时工作日制法案”的全部草案。这个短论发表于 1889 年；同年年底，费边社出版了它的第一本书，即肖伯纳所编的《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这本书一直到目前，每隔一个时期就再版一次。它第一次使费边社真正拥有广大群众，并使它成为宣传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这种社会主义跟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迥然不同，跟威廉·摩里斯和社会主义联盟的半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共产主义”也大相径庭。这本书是根据

7位论文撰稿人在1888年秋冬两季发表的一系列演讲汇编而成的。这些演讲的总方针经过7人的密切磋商后才确定下来，全书由肖伯纳编完，他向大多数共同撰稿人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而且自己也写了两篇。这7位作者是：肖伯纳、悉尼·韦伯、格雷厄姆·华莱士(1858—1932年)、安妮·贝赞(1847—1933年)、威廉·克拉克(1852—1901年)、悉尼·奥利维尔和赫伯特·布兰德。

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社会主义的基础”，肖伯纳写了题为“经济基础”的论文，韦伯的题为“历史基础”，克拉克的题为“工业基础”，奥利维尔的题为“道德基础”。第二部分讨论“社会组织”，其中包括两篇论文，一篇是华莱士写的“社会主义下的财产”，另一篇是安妮·贝赞写的“社会主义下的工业”。最后，在“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的标题下，由肖伯纳写了一篇“论过渡阶段”，另由赫伯特·布兰德写了一篇“展望未来”。布兰德对于“渗透”到自由党内去的可能性非常怀疑；当时他用“赫伯特”的名字为《星期日纪事报》写文章，已经以活跃的政治记者著称了。值得注意的是，布兰德在费边社主持下所写的论文中用到“渗透”一字时，具有轻蔑的含意。

爱德华·雷诺兹·皮斯(1857—1955年)从1890到1913年一直任费边社书记，从1884到1939年任该社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是那个后来演变成费边社的团体中最后仅存的一个；他在所著《费边社史》中以如下一段话谈到了《论文集》的主张：

《费边论文集》以人人都懂的通俗语言为社会主义作了说明。它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并不以德国哲学家的玄想为依据，而是以我们日常在周围可见的社会进化为依据。它接受有声望的英国教授所讲授的经济学；它在我们现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地基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厦；它证明 112
社会主义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由于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变化，这一阶段是必然要到来的。

由此可见，费边论文的撰写者同卡尔·马克思一样，宣称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以经济进化论作为自己满怀信心地作出预言的依据。费边主义者对历史的解释同马克思的解释一样，也是从经济观点出发的，而且也同样强调经济权力集中的趋势。肖伯纳和威廉·克拉克在《费边论文集》的文章里到处提到这种趋势，例如提到：托拉斯和联合企业正在迅速发展；小规模生产者已经过时；资本主义集中的必然后果是，生产资料、分配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这也就是说，资本家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为向人民共有制过渡创造了条件。马克思主义者同费边主义者的区别，并不在于其中的一方承认而另一方否认，在经济力量的强制作用下，走向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两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认为社会革命是过渡的必然形式，而费边主义者则持如下看法：随着进化过程发展到顶点，社会主义就注定会出现，这一过程已经迈过很长一段路程，在民主选民日益加强的压力下还将继续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选民大众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务，摆脱私人地主和私人资本家的羁绊，以往选民一直允许这两种人单纯作为所有权的报酬榨取各种形式的“经济租金”。

我们已经谈过，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包含两种不同的因素，两者的结合构成一种统一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整个社会变化过程的基础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即人在生产技术知识的帮助下用以创造财富的物质资源。要利用这些“生产力”，就必须有社会组织；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一种最适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生产知识的特殊经济机构出现。而这种经济机构本身，又必须利用足够的强制力来保证人们服从那些被定为指挥者和主要受惠者的人所规定的法规，才能得到维持和保障。社会的政治机构，加上它的法令和强制执行者——法官、警察以及作为最后手段的武装部队——构成了这种维持经济秩序的机制。因此，按照马克思

的说法，国家实质上是经济统治阶级用来强制被统治者的工具。由于任何统治阶级除了向比它更强大的力量低头以外，永远不会把权力让给任何人，因而要改变国家所体现的阶级统治制度，唯一的方法就是自下而上地进行暴力革命，其结果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取得胜利，并按照新统治阶级的心意建立一个新国家来保卫体现它的理想的新经济秩序。当然，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根本的经济条件——即“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旧经济制度过了时的的时候，才可能发生这种革命；新统治阶级将是一个由于其本身更适于组织社会的经济生活而被选定来掌权的阶级。新阶级之所以能获得胜利，并不是由于它具有获胜的抱负，而是由于生产的物质条件使它必然会获得胜利。因此，马克思学说中的第二个因素是，断言历史过程是由一系列阶级斗争构成的，而且从一个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每次都必然以阶级力量的革命性转变为其特色。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二部分遭到费边主义者的全盘反对，其彻底程度就象他们完全赞成另一部分一样。诚然，费边主义者并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提出一套能普遍应用的历史理论。他们所关心的只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开始的那个阶段，特别是注意产业革命以来的时期。他们笼统地假定说，一直在先驱国家英国发生的事情，当时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正在发生，或者注定要发生，因而他们的大部分论点和证明都是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引来的。费边主义者就象 1891 年起草爱尔福特纲领的考茨基和其他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深信不疑，资本主义大联合企业的发展注定要消灭个人企业，并且相信托拉斯化的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得走向公有制的道路更加方便，因而也就是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但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化的过程涉及政治革命，工人阶级的胜利将意味着建立一个新型国家来体现战胜者的阶级力量；而费边主义者则不是从阶级斗争或革命的角度去看待社会和

经济变革的过程，他们的出发点是由选民大众施加压力，以民主方法逐步渐进地改变制度。他们认为选民大众会越来越坚持申张社会正义的各项要求，并且相信除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以外，就没有任何东西足以保证生产资料被用来实现可能达到的最高福利水平。

实际上，费边主义者在考虑社会主义的进展时，出发点主要并不是单纯的政权，而是为理智的信念所激励并为实现社会正义的道德感所鼓舞的政权。他们并不轻视政权，但是他们并不象马克思那样，把政权单纯看成是经济必然性所产生的力量，理想对它不能起任何实际作用。他们从选民大众的压力以及熟知客观情况的舆论的影响这一角度来看待政权，而不是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待政权。他们认为，社会立法方面以及舆论的逐步变化方面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充分地证明了这些形式的压力是有效的。毫无疑问，他们认为这种进展之所以能取得，完全是由于工业制度获得了发展的缘故；在这一点上，他们同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断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完全否认，那种在马克思主义中构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灾变论实际上是从经济史观中推演出来的，他们甚至否认这种理论同经济史观不矛盾。他们论证说，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先进社会中的支配力量，并不是由于突然猛烈地推翻封建制度，并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来代替它，而是通过一个长期渐进的渗透到旧制度中去的过程，从而分阶段地把旧制度改变成某种本质上不同但又符合工业社会的经济要求的制度。难道不能预料社会主义会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吗？难道社会主义事实上不是已经明显地按照同样的方式在发展吗？

过了很久以后(1910年)，悉尼·韦伯为《剑桥现代史》有关十九世纪趋势的那一卷撰稿，他在自己所写的那一章里最为明确地提出了上述论点；后来费边主义者把这一章重印成小册子，叫作

《走向社会民主主义》。这一章所陈述的理论，同《费边论文集》所提出的理论实质上是一回事。基本上说来，这种理论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在民主议会制的监督下进行集体管理和集体规划。这种理论把如下两种趋势结合起来，构成一种统一的学说：一种趋势是社会将由一个向民主选民负责的政府加以管理的政治趋势，另一种趋势是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将实行集中规划的经济趋势；韦伯所阐释的理论对这两种趋势表示欢迎，认为它们将汇成巨流，通向一个最足以称为社会主义的目标。

但是，费边主义者并不象人们往往所设想的那样，强调国有化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他们最为重视的倒是一切形式的“租金”的社会占有，而以赋税作为实现“租金”让渡的主要工具。虽然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费边“基本纲领”——这是要求新社员遵奉的社会主义理论简述——都正式宣布反对为公众所接收的资产阶级财产支付偿金，可是肖伯纳在《费边论文集》中却已十分明确地说明，为什么应当为每个财产被没收的所有者个人支付偿金。他争辩说，如果国家不为接收一个人的财产或其财产的一部分支付偿金，而又让其他人继续占有财产，那是不公平的，英国的舆论永远不会赞成这种作法。如果社会主义要分阶段逐步实现，那么正确的作法就应当向财产被剥夺的个人付出偿金，而所需款项则应该用取自全体财产所有主的税款来支付；这样才会使公众得到真正的好处，而不会由于徒具虚名的所有权让渡而实际上却让群众背上不断付出利息的负担。这种支付偿金的办法不会要公众拿出任何东西，它只是让整个有产阶级为没收的“租金”平均负担利息。

费边主义者从亨利·乔治实行“单一税”的主张出发，论证说 116 其他形式的资本同土地一样能产生一种从生产者身上取得的“租金”，这种租金交由公众享用是既公平又得当的；与此同时，他们仍

然认为地租是一种突出的不劳而获的收入形式，主张由公众占有。不过，他们并不希望实行土地“国有化”，把土地交给国家占有和控制。每当《费边论文集》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提出理由说，土地应该交由地方或者地区的公共机构占有，而不是交给全国性的公共机构占有，不依靠强大而完全民主化的地方机构的帮助，就不可能朝着社会主义大踏步前进。《费边论文集》实际上是在1888年写出的，是年保守党政府建立了民选的郡议会取代原先由治安官掌管的不民主的郡司法制度；论文撰稿者一个接着一个对郡议会法表示欢迎，认为它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主要的基础。他们认为，遍及全国各地的新郡议会和市议会最适于接受“租金”税的收入，并宜在不久以后成为城乡土地的所有者。此外，对“租金”征税也会使郡和市议会掌握大笔款项，它们不仅需要利用这些款项来支付地方政府和社会服务事业的开支，而且要用它来取代工农业方面的私人投资，因为私人投资必然会减少。这样，当租金税日益接近百分之百的时候，郡议会和市议会就会逐步成为各种形式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提供者。

实际上，费边主义者也希望把某些工业和公用事业交由国家占有和控制，比如铁路以及由于技术原因而需要作为国家垄断企业加以经营的其他公用事业。此外，他们还说，凡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由私人大托拉斯拥有的工业，国家应该直接地把它接收过来，在公共管理下继续作为国家垄断事业经营下去；这些论文撰稿者有时谈起来似乎希望这种托拉斯化的过程能很快进行下去。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明确地认为，大多数工业应逐步转入地方或地区的公共机构手中，而不是转入全国性的公共机构手中；他们大力强调，郡议会和其他地方议会必须建立新的生产企业去同资本家直接竞争，他们预计效率更高的公营企业会一把各个领域中的资本家很快赶跑。他们说，公营企业没有租金或利息的负担，因而

很容易以贱价压倒牟取利润的对手^①；它们也能提出最低工资限额和最低劳动条件标准，把较好的工人全都从私营工业中拉出来，最后使谋利者根本找不到任何劳动力。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重提路易·勃朗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拉萨尔在六十年代提过的主张。除了铁路之类的基本公用事业以及由私人托拉斯与联合企业控制的工业以外，论文撰稿者在设想社会化过程时，其着眼点主要不是接管现有的企业，而是逐步没收“租金”，以之为兴办新企业的公共资本。他们坚持，“租金”税的收入必须大部分用作资本进行公共投资，而不能当作可以花费的收入用于消费。

在论文撰稿者的思想里，这些赞成郡营和市营企业的论点同当代社会主义者关于“劳动权”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这种要求为主的失业骚动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方面，这些论点同路易·勃朗也有密切关系，他曾紧紧结合“劳动权”的要求提出建立“国民工场”的主张^②。论文撰稿者要求新的郡议会为失业者提供工作，首先是通过发展公共工程来提供，例如建筑公路、桥梁、学校、医院、住宅以及建立公用事业，然后通过建立郡议会自办的农场和工厂来提供。他们指责“救济工厂”，这类工厂雇用失业工人时根本不考虑技术条件，也不管是否适当，目的仅仅是让他们有工可做，而不是单纯领受救济金。论文撰稿人坚持郡和市议会必须提供与失业工人条件相适合的工作，凡需具备新条件者，必须进行训练。此外，有一个主张在《费边论文集》中又重新提出来了，即建立农村公社，用最新式的机器和技术进行集体耕作，并在这些郡和市议会农场的周围建立辅助性工业和公社服务事业。这个建议起源于罗伯特·欧文和傅立叶，还

① 这种想法在赫茨卡所著的《自由的土地》一书中也曾出现。见本卷下册第559页及以下。

② 见本书第一卷第十五章。

有些东西则来自彼得·克鲁泡特金的一个想法：在农村移民区，以普遍可用的电力为基础，把农业和工业重新结合起来。

如果工业或公用事业由于技术原因的确需要交由全国性而不是地方性的机构经营时，《费边论文集》的撰稿人就赞成把实际的管理工作交给公共管理局或管理委员会，其性质同目前的市自治机构非常相象。贝赞夫人在《社会主义下的工业》一文中驳斥了工人应当有权管理企业或选定经理人员的说法，主张由选举产生的公共当局来管理工业，公共当局应当任命管理委员会，并且直接或通过管理委员会任命实际负责的经理人员和监督人员。她的文章的整个重点是，必须使工业成为全体公民而不是任何一部分人的财产和企业；至于“工业民主”的概念则被一下子抛到脑后去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记住，国家管理被认为是例外情况，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大多数类型的工业都应该由市政当局或郡议会（在某些情况下由较小的地方当局）管理，而不由国家部门或国家管理委员会来管理。他们所设想的典型社会主义雇主是地方性或地区性的民选机构；他们还往往认为，甚至连全国议会，当它的经济管理职能与监督职能增加时，其工作方法也必然会越来越接近于地方议会。有人说，早期的费边主义者基本上是主张国有化的人，他们希望把所有的工业都收归政府部门来集中管理。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凡是由于技术条件，或是由于一种工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达到的托拉斯化程度，需要实行集中管理时，他们并不反对集中管理，但是他们仍然把民主制的顺利运行需要在地方自治中打下巩固基础这一点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也把地方性或地区性的公共机关接收土地所有权和大多数类型的工业企业的管理职责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费边主义者在1889年对新建立的郡议会寄与很大的希望，把它当成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工具，回顾起来是相当可笑的。然而

我们应该记住，费边社的论文撰稿者是一批伦敦人，他们把大部分希望都寄托在新建立的伦敦郡议会上，而且很快就在制定政策上对这个郡议会中的进步派起重要作用。伦敦的进步派路线并不是费边主义者制定的，而是在郡议会成立很久以前，随着伦敦激进改革运动发展起来的。费边主义者曾投入这个运动；后来被目为他们所特有的政治理论的“渗透”政策，实际上主要是联系首都的事务拟定出来的。他们相信渐进主义，相信社会主义是一种已经在积极起作用的趋势，由于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必然过程，它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惯性动力。这些信念促使他们致力于利用现存的机构，而不是去建立新的机构。他们——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认为伦敦改革运动是一个随时可以利用的工具，比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比起任何其他脱离当前趋势去搞革命而不从事进化变革的团体，都更可能产生积极的成果。我们始终应该记住，撰写费边论文集和制定费边政策的时期，是在1889年煤气工人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掀起新工会运动以前，而且除了零星的几个地区以外，也是在争取独立劳工代表权的运动形成以前。如果费边社成立于——比方说——1890年，而不是成立于1884年，那么费边主义就很可能

是另一个样子了。事实上，当新工会运动以及1893年在独立工党内联合起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兴起的时候，伦敦的费边社领袖们正好在郡议会中完全投身到进步派的联盟关系中去了。因此，他们都本能地敌视任何企图在伦敦建立独立工党，从而要破坏这种联盟关系的行动。与此同时，一个运动，既然它致力于宣传一种同费边主义非常相似的非教条主义社会主义，费边社的领袖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就不得不同它打交道；他们也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伦敦地区十分流行的进步派路线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并没有类似的东西存在。比如在北部和中部的的大多数工业城市以及苏格兰，自由党人绝不愿意同社会主义者在市政事务上建立任何伙伴关系，而且

以老式的“自由党-劳工派”工会主义者和合作运动者为一方，以新工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为另一方，两者之间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当费边主义的影响在1889年以后扩大到各地的时候，费边社地方分社不论多么赞同论文撰稿者的理论，也无法接受其中牵涉到在市政事务上同自由党人结盟的那一部分。1889年以后成立的大多数费边社地方分社，之所以会在几年以内消失，合并到独立工党中去，并且心情舒畅地向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展开斗争，其原因就在于此。此外，费边总社在政治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是暧昧不明的，它一方面在伦敦郡议会中同进步派人物结成联盟，而在全国范围内对独立工党的支持却又是半冷不热的。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整个过程中，费边社的领袖们大都把“渗入”独立工党当作是自己的使命，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设法渗入自由党，但并不积极投身于争取独立劳工代表权的运动。

在伦敦，悉尼·韦伯从1892年起就作为伦敦郡议会中的进步派委员，积极从事活动。费边主义者的影响主要是在教育方面，他们首先是通过技术教育委员会发生影响的，1902年教育法案颁布以后，又在取代伦敦学校管理委员会的地方教育局中发生影响。在九十年代，就我所见，他们并没有特别要求实行市有化，
121 他们肯定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同自由党进步派分子发生争执。事实上，除了在教育方面以外，伦敦郡议会中的费边社员所作出的事情或者打算作的事情，似乎很少不是伦敦激进分子在他们出现以前就已经在J·F·B·弗思（1842—1889年）的领导下提倡过了的。同全体郡议会委员以及其中的进步派委员相比，费边社员始终是一个很小的集团：在第一届郡议会中根本没有费边社社员，而在1892年以后的郡议会中也只有六七人左右。当时他们会发现很不容易说服进步派人物奉行市有化的进步政策，不论他们为此下多大工夫。不过看起来，他们当时似乎并没有为此下这番工夫。

当然，他们曾经主张对一些公用事业，如自来水、电车、码头等等，实行某种形式的市有制；但是在他们以前，弗思和激进派都曾提出过这种主张；而且他们在说明自己的理由时，总是小心在意地指出：在其他大城市，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公用事业都已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市有化了，这些城市并没有象伦敦这样等待很长时间去建立行之有效的地方政府机构。除了教育问题以外，韦伯在伦敦郡议会中的主要活动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财政改革问题，其二是有关导致 1899 年建立首都市议会的讨论。一般说来，伦敦郡议会中的费边社员，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倒不如说是激进派。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发展教育和改革地方税制，而不是市有化；甚至在他们确实赞成实行公有制的自来水问题上，他们也倾向于建立首都自来水管委员会，而不主张由伦敦郡议会直接管理自来水事业。韦伯的著作《伦敦市政计划》(1891 年)并不比弗思在许多小册子(由市政改革联盟在七十和八十年代发表)中所写的内容有多大进步；而伦敦改革联盟大部分也只是重复弗思及其一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提倡的东西，伦敦改革联盟成立于 1892 年，是进步派的宣传机构，从成立起一直到 1898 年，都由汤姆·曼恩担任书记。费边社在伦敦市政的活动中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市有化问题上，而是放在改善首都公用事业(这可能牵涉到市有化)以及更公平地分 122 摊这些事业的费用上。就全国性的问题来说，他们首先打算社会化的是企业所产生的“租金”，而不是企业的管理工作。这倒不一定是一种批判性步骤：事实上，韦伯为伦敦的教育事业所做的工作是十分突出的。不过，这一事实同所谓费边社员是伦敦进步派社会政策的主要鼓舞者的说法也的确是完全不相符的。

我们前面已经谈过，费边议会同盟在 1887 年发表的小册子《真正激进的纲领》建议把铁路收归国有，但是除此以外并没有进一步包括任何关于公有制的建议。纲领在经济方面的主要要求是

对不劳而获的收入征收累进税。费边社在同年早些时候所通过的“基本纲领”中宣布,它主张“将土地和工业资本从个人和阶级的所有制下解放出来,委之于社会,以谋求大众福利”。“基本纲领”接着说:“费边社还力求把便于社会管理的工业资本移归社会管理。”但是关于这类资本的社会管理应该采取什么形式,以及土地和其他种类的资本的所有权交给社会以后怎样加以处理的问题,都没有作任何说明。至于社会所有制究竟是地方性的、地区性的、还是全国性的,也没有作出定论。“基本纲领”的重点并不在于社会管理,而在于把剩余交给社会,费边主义者统称这种剩余为“租金”,而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名词“剩余价值”。“基本纲领”明确规定“费边社……力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力求取消个人由于私人占有而以地租形式取得他人因使用其土地而付出的代价,以及因土地的优良土质与位置而付出的代价”。这句话就其本身来说,似乎是直接响应亨利·乔治的说法,说得更确切一些,也许是响应跟亨利·乔治的早期宣传大体雷同的土地国有论者的说法。^①但是在费边社的“基本纲领”中,这句话是夹在一些话的中间出现的,它的前面有主张“土地和工业资本”公有的开宗明义的宣言,它的后面则是一些不

123 那么明确的话,谈到“把便于社会管理的工业资本”交付社会管理。费边主义者在1887年对土地所有权的态度是明确的,把土地所有权看作是占有一般意义下的“租金”的关键。他们也同样明确地认为,其他形式的资本就象土地一样,也为所有者提供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租金”的东西——即马歇尔在不久之后称之为“准租金”的东西。但是关于土地成为公共财产以后如何管理的问题,他们的态度就含糊不清了,至少是不愿意把这方面的任何言论立为信条。他们比肖伯纳在为《费边论文集》撰写头一篇文章中所表现的

① 关于亨利·乔治对土地国有化的态度,参看本书第二卷370页。

态度要犹豫得多，肖伯纳断言：作为占有者对社会普遍征收赋贡的来源，土地和资本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关于跟土地不同的资本，费边社的“基本纲领”是这样说的：“由于过去生产资料被垄断，工业发明以及剩余收入转变为资本的过程便主要使有产阶级发了财，而工人则只有依靠有产阶级的许可才能谋得生计。”此外，“基本纲领”接着又说，如果所建议的向公有制过渡的措施付诸实现，“租金和利息便会附加到劳动的报酬中去，现在依靠他人劳动过活的有闲阶级就必然会消失，实际的机会均等将通过经济力量的自发作用得到保持，而个人自由所受的干涉将要比现行制度所带来的少得多。”因此，在“基本纲领”中，“租金”一词只用于土地；谈到资本，费边主义者用的是“利息”。但是到了《费边论文集》写成的时候，论文撰稿人就明确地指出，地租和资本报酬——即范围更广的一种租金——差不多是同一回事。肖伯纳在阐释社会主义经济的时候写道，“用通俗的话来说，一种产权加上一个农场，我们就把它称为产生地租的土地，而另一种产权加上一条铁路，我们就把它称为产生利息的资本。但是从经济观点着眼，在它们一旦变成收入的来源时，两者就没有区别可言了。”事实上，在同一篇论文的其他地方，肖伯纳的确对一般租金和纯经济地租作了区别，后者相当于土地肥力和位置上的差别所带来的利益。他说纯经济地租——即李嘉图下了严格定义的地租——必须归公众所有，用作124经济发展的资源；而所有其他租金则可以用来增加生产者的收入。但是，这种鲜明的区别并没有列入费边社的主要学说。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费边社“基本纲领”中，费边主义者谈到，在地主和资本家的不劳而获的收入被没收以后，“经济力量的自发作用”将会使“机会均等”得以普遍存在。听起来，这似乎是说，他们预计将来竞争性的企业会继续下去，不过由于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带来的垄断特权，竞争会成为公平的事。但是，他们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这种想法，还不明确。他们的想法也很可能是这样的：在土地和资本公有以后，个人就会按照能力和贡献的大小得到报酬，这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从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完全社会化经济的过渡时期中所应有的情况非常相似。

无论如何，费边社的论文撰写者说得十分明确，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为大众利益而经营的企业由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公共机构掌管，其经理和管理人员将付给足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才的高额薪俸。在开始阶段，这意味着用高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薪金把人拉过来，至少也是支付任何必要数额的薪金，使得国营企业的职位在考虑了工作的风险和保障方面的差别以后，能够象私营企业所能提供的任何条件一样令人向往。不过，费边主义者认为，随着国营企业显示出它的高效率，资本主义企业所能提供的待遇就会越来越差，而国营企业支付高薪的必要性也就会逐渐减少。我们已经谈到，他们估计国营企业无需为资本支付利息，因而一方面能付出高于资本家所能付出的工资，同时又照样能逐步把他们赶出企业之外。同样的道理，国营企业也能在必要的时候一直为优秀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提供优厚的薪水。

125 由此可见，这种认为国营企业有能力出高价把私营企业的人拉过来的想法是以这样的假定为依据的：国营企业不仅能证明自己有较高的效率，而且可以从征自地租或其他不劳而获的收入的税收中无息地取得资本。费边主义者在这个阶段所设想的社会化过程，主要并不是对现存的有产者进行赎买，使有产者成为债券持有人，从公共当局得到不劳而获的收入，而是利用征自财产的新赋税作为无息资本，创办新的国营企业。凡是从私人业主手中买下的企业，肖伯纳确曾主张对业主支付偿金。但是偿金并不是用发行公债的办法去支付，而是用为新建国营企业提供资本的那种赋税去支付。费边主义者在“基本纲领”中强调，社会取得土地和资本

时，将“不付给偿金，不过对财产被没收的个人并非不能付给社会认为适当的救济金”。当他们提出这种说法时，他们心里所想的，看来并不是拒绝对下述个别资本家支付偿金：由于公众的利益，这些资本家的企业被列为尽快接管的企业，需要及早予以没收。看来他们心目中的主要接管形式是，对根据所有权而取得的收入征收越来越高的税额，同时通过新建国营企业的竞争逐渐地把资本主义企业赶下台去。资本家显然不会由于被征收的税额越来越高而得到任何补偿；同样，他也不会由于在公有制下所创办的无息企业的竞争断送了他的利润，或是由于国营企业的优越的工作把他的工人吸引走而得到补偿。

谈到这里，费边社的“基本纲领”中只有两段还没有提到。其中的一段出现在整个文件的开头处，它是这样短短的一句话：“费边社由社会主义者组成。”另一段是最后的一段，它规定：“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即中间各段所说明的目的），“费边社注重传播社会主义观点，并推广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本社致力于全面传播个人和社会在经济、道德与政治方面的关系的知识，以求达到这些目的。”这样，费边主义者就公开说明了他们信赖民主方法以及政治和社会教育，同时也说明了他们认为道德和政治方面象经济方面一样重要。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的出现，一方面要靠说服人们采取社会主义观点，另一方面要靠以不断发展生产技术与管理技术为基础的推动社会化过程的历史力量。正如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一方面把社会主义看作必然的趋势，同时又把它看作要靠教育和宣传工作去推进的事业，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他们跟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历史的解释是渐进主义的，而不是革命主义的，因而他们设想社会主义将分阶段逐步实现，而不是通过一个阶级打败另一个阶级的突然胜利来实现，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将通过传播民主主义信仰而不是通过暴力来实现。

相当令人惊奇的是，费边社的“基本纲领”制定于1887年，当时显然没有经过多少讨论或争议，而且在1905年以前完全没有改变，直到这一年才作了一项修正；此后一直到1919年才由执行委员会作了实质性的修改，并由悉尼·韦伯提出在年会上通过。1905年的修正是由于当时的男女平权运动而提出的，只是明确声明费边社将致力于“确立男女平等的公民权”。事实上，费边社从成立的初期开始就把男女平等当作奋斗的目标，但是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初期的费边社员只准备首先要求成年男子选举权，而把成人选举权留到下一阶段，等到舆论比较愿意接受这种选举权的时候再提出。到了二十世纪，这种态度已经不能再为男女平权论者所接受，其中有许多人坚决主张授予妇女以同等的参政权，否则就反对进一步扩大男子参政权。费边社在男女平权论者的攻击下让步了，
127 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要求修改“基本纲领”的尝试都失败了；这倒不是由于纲领的措辞被认为是完全令人满意的，而是由于每一项修改的建议到头来都没有能够就修订方案取得一致意见。甚至连1919年的修正也没有改变基本内容，那次所作的实质性修改主要是公开表明支持工党和社会主义者国际；1919年以后，纲领又有20年之久没有作进一步修改。最后到了1939年，费边社同1930年成立的分支机构——新费边研究部合并，这时“基本纲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关于社会主义信仰的一段非常简单的声明^①，列在

^① 1954年，有关社会主义信仰的第二条（这一条自1939年以来迄未修改过）条文如下：“本社由社会主义者组成。因此，其宗旨在于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即通过社会经济资源的集体所有制和民主管理制保障机会均等，并废除个人和阶级的经济力量和特权。本社力求采取政治民主的方法来达到这些目的。本社主张最充分的平等公民权，凡保证致力于实现本社的宗旨与目标，并推进本社工作的人，不分性别、种族或宗教信仰，均得参加本社为社员。本社属于工党。本社举行集会、讲演会、讨论会、座谈会和夏令讲习会，在全国和国际范围内提倡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出版书籍、小册子和期刊，并采取任何其他适当的方法，以促进社会主义，并根据社会主义方针教育群众。”

改组后的费边社社章中。

在1890年以前，费边社是一个人数很少但很活跃的团体，主要是由伦敦人组成的，不过在一些地方城市和苏格兰也零星有一些社员，还有少数社员住在国外。1890年，社员总数只有173人。但是到了1891年春季，就增加到361人，此外还有一些费边社地方分社作为独立机构建立起来，其社员并不当然属于总社。翌年，总社本身有社员541人，1893年进一步增加到640人。这时，地方分社也不少于74个，此外在伦敦地区还有一些地方组织。在地方分社中，有24个在兰开夏和柴郡（大部分是基于一次宣传讲演运动而成立的）、14个在约克郡，还有7个分布在北部4郡。英格兰中部地区各郡有8个分社，威尔士和蒙默思郡有4个，苏格兰3个，爱尔兰2个。其余的分社广泛地分布在英国各地，此外还有1个在澳大利亚，1个在印度。总社不为分社的行动负责，不过也曾登录有 128 哪些分社存在，并且在1892年举行过一次仅有的会议，有14个分社派代表参加，代表1,100名左右社员。

费边社的活动向各地发展的过程没有多久就结束了。到了1894年，虽然新建立的分社很有几个（包括渥太华的1个），但地方分社的总数却只剩下53个了。第二年的年度报告说，“现在地方分社除开少数几个以外，都是名存实亡。”1896年，有13个费边社地方分社派代表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但是分社的数目继续减少，到了1900年只剩下了8个，其中还包括牛津、剑桥、格拉斯哥、阿伯里斯威思的四个大学费边社。唯一重要的地方分社在利物浦，所有其他大城市的地方分社都不复存在了。就在这一时期，总社的社员人数却在1899年增加到861人的最高峰，此后有些波动，有几年趋于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它更加严格，开除了不履行义务的社员。1904年，即下面一章^①所叙述的复兴时期

^① 见本卷第222页及以下。

快要到来的时候，社员人数为 730 人。

费边社地方分社的骤兴骤衰是很容易解释的。它们在《费边论文集》出版以后很快就建立起来；它们的兴起一部分也是由于在伦敦码头工人罢工以及新工会运动发展以后，社会主义思想迅速得到传播。地方分社的衰落则是 1893 年建立独立工党的直接后果；这个党成了新潮流的政治代表，它或是把费边社的地方分社吞并了去，或是吸收分社的大多数社员，使分社的活动陷于停顿。伦敦的总社对分社的建立本没有起什么作用，而当独立工党似乎为地方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中心时，总社也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维系地方分社。总社的领导人对各地方费边社员纷纷离去、加入工党的情况并没有表示遗憾。事实上，他们还感到如释重负，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自由地执行自己的“渗透”政策而不会遭到什么反对，也可以自由地同伦敦郡议会中的自由党进步派分子合作。我们已经谈过，许多地方分社反对这一政策。1893 年以后，虽然费边社还继续为独立工党拟定社会计划，撰写社会主义短论和讲演，对独立工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但是把新的改良主义社会主义建成全国性运动的主要工作却转到独立工党的手中去了。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调转头来，谈谈独立工党；我们还要对某些社会力量的性质和实力作一番评价，这些力量在凯尔·哈迪的领导下团结了起来，使“新工会运动”的抱负在政治上得到表现，这些力量还从罗伯特·布拉奇福德的《时代号角报》得到鼓舞，建立了对开创独特的英国型社会主义运动十分重要的同志关系。在谈完这些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提费边主义者。

(II) 新工会运动及其背景

当亨利·迈尔斯·海德门发起建立民主联盟的时候^①，要在

^① 关于社会民主联盟的情况，参看本书第二卷 387 页。

英国组织一个颇具规模的社会党，或者哪怕是一个仅限于鼓吹工人阶级当前要求的工党，时机都是不够成熟的。工会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迅速发展（在这方面约瑟夫·阿奇和农业工人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以后，到七十年代后期便衰变为仅仅保护占少数的熟练工人的组织。面对着失业和物价不断下跌的局面，这批熟练工人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一份就心满意足了。追随第一国际的英国人消散了，几乎没有留下踪迹。“左派”的政治领导权已经落到约瑟夫·张伯伦和查尔斯·迪尔克的手里，他们当时正在尽最大努力使自由党激进化，不仅宣传激进的政治观点，而且宣传激进的经济观点，其中既包括主要通过市政措施去实现的社会改革，同时也包括对有钱人征收累进税的步骤。物价的下跌虽然使某几类工人吃了亏（尤其是煤矿工人，他们的工资同煤价紧紧相联），而且由于失业而造成了穷困的局面，但是在职工人却因此而可以买到比较廉价的食物。平均说来，生活水平实际上无疑是上升了，至少对熟练工人说来是这样。结果是，产生强烈不满情绪的地区就有了一定范围。在煤矿，在非熟练工人居住的贫民区和下层工人阶级的住宅区，在任何受到严重失业打击的地区，都发生了骚乱，但是工人阶级并没有普遍产生反抗情绪，技术工人工会也无意于领导任何表现这种情绪的运动。既然没有任何对群众具有号召力的运动存在，工人中间的个别不满分子就往往皈依查尔斯·布莱德洛的无神论共和主义。如果他们还没有走向极端，就往往参加激进俱乐部，支持张伯伦和迪尔克跟辉格党作斗争，以促使自由党民主化。

1881年，当民主联盟创立时，平均货币工资虽然比七十年代头5年所达到的水平低了几点，但对那些充分就业的人说来，实际工资事实上是增加了。在技术工人中，只有3%—4%的人失业，问题根本不严重。非熟练工人的恶劣处境无疑是令人吃惊的，大城市

的贫民区尤其如此，但是他们的情况肯定不比10年以前更糟，事实上也不比这一辈人所能记忆的任何时候更糟。由于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下跌，失业人数又多到足以使工会不敢招惹麻烦的程度，于是政治行动而不是劳工行动看来就大有前途了，而市政改革也就成了仅次于政治行动的可取步骤。因此，张伯伦的号召力非常强大，特别是对那些尚未取得选举权的人，当时他正在为这些人提出要求，力主把1867年为城市居民赢得的户主选举权扩大到乡村地区去，其中当然包括广大矿区和许多自治市以外的工业中心。此外，张伯伦不但是市政改革运动的领袖，而且也是政治激进派的领袖，因而对各郡和各自治市的工人都很有号召力。

然而不出几年，形势就完全改观了。在张伯伦使1884年的选举改革法案得到通过，从而使郡区选举大大民主化以后，他就同自由党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闹翻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同一个选举改革法案使爱尔兰国民党人完全控制了除北爱尔兰以外的所有爱尔兰选区，从而把一个强大的爱尔兰党送进了英国议会，而且没有这个党的支持，自由党人就休想维持自己的政权，哪怕党内的辉格分子和激进分子保持团结也吧。当时不能容忍爱尔兰自治的不但有辉格分子，而且也有张伯伦派。自由党统一派由于这一问题而退党的行动^①，使得张伯伦以扩大的选举权为基础领导组织一个倾向于激进主义的统一自由党的前景完全归于破灭，而且还造成了一片混乱，为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试问，在

^①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爱尔兰由于受英国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起而反抗，成为英国政治中的突出事件。执政的自由党曾经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平息这一运动，但没有取得成效。1886年，自由党再度执政，迫于没有爱尔兰议员的支持就无法在议会内取得多数，于是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这时以张伯伦为首的反对派坚持维护帝国的统一，反对爱尔兰自治，自称“自由党统一派”。他们退出了自由党，同保守党一起投票否决爱尔兰自治法案，造成了自由党的分裂。——译注

实际领导政治激进主义的领袖由于爱尔兰问题而同一些反动的辉格分子一道退出自由党，从而使该党丧失一大部分趋向激进政策的动力以后，一个优秀的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追随张伯伦走自由党统一派的路线，那就意味着放弃自由主义而采取另一条道路，其实质决不是更纯粹的激进主义，而是同托利党人结成反爱尔兰联盟，至于支持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则是传统激进派信条的一部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这个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留在自由党内，那就意味着继续使自由党激进化，而其条件则要比在张伯伦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差得多。这种左右两难的处境由于如下事实变得更加困难了：在1886年，唯一可以代替张伯伦出任激进自由主义领袖的查尔斯·迪尔克由于纠缠在一件离婚案中而退出了政治舞台。清教徒的英国在当时甚至根本不会考虑有可能让一个竟然闹这种纠纷的人出任领导。于是自由党激进派就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局面，至少是缺乏任何真正具有广泛号召力的领袖。其中的大多数人暂时坚守激进俱乐部；大多数旧工会领袖则继续努力，劝说自由党采取一种先进的足以吸引有组织的工人的纲领，但是他们的成就极少，因而遭到人数虽少但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无党派左翼分子集团的日趋猛烈的抨击，这些人指责自由党是资本主义的政党，顽固不化地相信自由放任主义。 132

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局势演变中，另一个重大因素是一再发生严重的失业。工会所统计的失业百分率（主要是失业的熟练工人）从1882年的2.3%和1883年的2.6%增加到此后三年的8.1%、9.3%和10.2%。然后又回降到1887年的7.6%、1888年的4.9%以及1889和1890年的2.1%。由此可见，从1884到1887年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现象，而且非熟练工人中的失业者比这些数字所揭示的要严重得多。这几年的头一年，就在商业衰退出现的同时，选

举权有了很大的扩展，而激进运动则由于张伯伦的背离和迪尔克的突然消失而发生了分裂。领导失业骚动的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联盟的成员并没有能使许多人改变信仰，接受他们那两派对立的社会主义学说；但是这两派的确共同使社会主义思想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查尔斯·布莱德洛激烈反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非但没有阻挠，反而助长了这种发展，因为这是极好的宣传，吸引了大批听众，如果没有这种宣传的帮助，社会主义理论是不容易传播到听众那里去的。布莱德洛派和社会主义者在维护公共集会和游行的权利方面成了盟友，不仅在伦敦方面如此，在其他城市也是如此。警察制止游行的企图使他们的联盟更加巩固，并使许多布莱德洛分子抱着同情的态度听取社会主义者的讲演，这些讲演人在诉诸失业工人时，改变了教条主义论调，而专门谈眼前的疾苦。约翰·伯恩士（1859—1941年）在这个阶段带头宣传简单明了的社会主义，而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布莱德洛过去的主要合作者安妮·贝赞这时改信社会主义，并把许多激进分子带走。人们向迪尔克发出的一片叫嚷声使得以前具有某种非国教信仰的人感到厌恶，并且加强了自由党资本家的不信任，这些人鉴于经济萧条正忙于削减工资。失业者所受的苦难、济贫法的贯彻失当、以及政府对提供充分救济的要求无动于衷，这一切都激发了许多中产阶级成员的社会意识，这些人原先对“社会问题”很少关心。这些人中间有牧师，也有华尔特·贝赞这样的小说家，而最重要的则是广受欢迎而人数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其中为首的是某家体育报纸的一个撰稿人，笔名是“从不昏睡的人”，真名是罗伯特·布拉奇福德。

事实上，布拉奇福德及其友人 A·M·汤普森也属于改变信仰，皈依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伙。这批人之所以投身政治，是由于受到失业纠纷以及工人阶级的苦难遭遇的推动；失业纠纷对揭示工

人阶级的苦难遭遇起了不小的作用。费边主义者虽然人数太少，不可能在失业骚动中起任何重大作用，但是对贫富悬殊现象却提供了一大批事实材料和数字，让讲演者和新闻记者可以有效地加以利用。构成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英国新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社会思想和情感在经济萧条结束以前就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而商业复苏则为 1889 年工会的骤然大发展廓清了道路。

那一年的“新工会运动”实际上是失业所促成的社会主义的产儿，而心慌意乱的自由党则是它的助产士。商业复苏在全国各地解放了那些在萧条期间不断聚集的力量。1887 年，商业仍然不振，本·提勒特(1860—1943 年)就已经在各个码头开始组织伦敦茶叶搬运工人和普通工人协会。安妮·贝赞则领导了伦敦火柴女工的罢工，这是她在 1888 年无意之中鼓动起来的。同年，有相当一部分矿工对利用按市价调整工资的制度，把他们的工资同煤价联系起来而一再予以削减的做法感到恼火，于是便以废除按市价调整工资制，发给生活工资的要求为基础，建立了英国矿工联合会。新工会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伟大时代，当时工会运动曾在城市非熟练工人以及农业工人中间广泛展开，只是好景不长，到了经济繁荣期終了时就在这两类工人中几乎完全消失了。新工会运动同它的前身不同，因为领导这次运动的 134
的新人物大多数是社会主义者，至少就他们要求政府负责授予“劳动权”这一点来说，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还要求法定的最低工资和法定的 8 小时工作日制——后一要求更为迫切，因为人们普遍认为，通过这种办法可以在那些寻找工作的人之间平分现有的就业机会。

1885 年，参加职工大会的工会会员人数只有 50 万人，到了 1890 年，就达到将近 160 万人，加入工会的总人数，包括工联理事会在内，从 631,000 增加到 1,927,000。其中一部分是一下子突然

增加的；翌年，人数就急剧下降。但是 1889 年的工会复兴毕竟使工会的力量增加了一倍，而且保持了下来，有大批人加入了原有的工会，并建立了许多新工会，这些新工会在后来的经济衰退中虽然减少了会员，但设法保存了下来。

这些新工会基本上是谈判组织，并不兼具互助性质，这主要是为了适合那些无力每星期缴纳高额会费的工人，因而不能提供多少福利。其中有许多人把这种贫乏情况当作是一种好处，指责旧工会的互助救济活动，说它是旧工会缺乏战斗性，无视非熟练工人的要求的主要原因。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联盟的演说家们长时间以来就在这个问题上大发宏论。海德门派攻击同业工会是垄断组织，一心保卫同整个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排外性行会利益，并认为这种工会是那些力图团结工人组成阶级政党的人的死敌。凡是在工会进行劳资斗争的地方（比如东北地区的煤矿工会以及约克郡的机械工人与纺织工人工会），社会主义联盟盟员都表现出更加愿意站在工会一边。但是他们也激烈谴责工会的现任领导。他们同社会民主联盟的主要不同之处，实际上就在于他们不相信竞选和拥有一个有纪律的党的好处。旧工会的大多数领袖仍在设法说服自由党激进化，尽管张伯伦已经背叛也是这样，这就为旧工会运动同新工会运动之间的对立增加了一个原因，后者的领导人主要是一些已经脱离自由激进主义的人物，或者是在张伯伦的背叛已经破坏了自由激进主义以后才活跃起来的人物。

然而，新工会运动并不是一支统一或团结的力量。码头工人、煤气工人、挖掘工人的新工会以及其他以前几乎没有组织的工人集体，它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几乎完全是已经信奉社会主义的人，或是愿意接受社会主义者所宣传的劳工独立论的人。另一方面，矿工和纺织工人中的工会运动则已经根深蒂固；新会员的来归和新政策的采纳并没有使旧领袖丧失地位。矿工联合会推行了一项

新政策，即要求采用最低工资限额，废除按市价调整工资的作法，实行 8 小时工作制，大部分旧领袖都接受了这一政策，但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从属关系。同样，棉纺工人经过这一运动也提出了更强硬的改进工厂立法的要求，但是仍然坚持同业工会主义，并始终拥护自己的领袖。另一方面，在工会运动软弱得多的约克郡，毛纺和绒纺工人事实上则是在新领袖的领导下组成新工会并参加斗争的，这些新领袖远比旧领袖愿意接受工人阶级新理论的政治含义。在某些煤矿区，尤其是在苏格兰西部以及南威尔士的部分地区，由于工会力量薄弱，新人和新思想比较容易取得领导地位。至于矿工联合会，尽管当时正在要求国家为它的会员制定法律，但是凯尔·哈迪却无法使它拥护社会主义或者独立的劳工政治行动。兰开夏的社会主义者也无法说服大多数棉纺工人相信，他们既然提出制定工厂法的要求，这在事理上就需要他们脱离为自己的雇主所牢牢控制的自由党。

实际上，煤矿业和棉纺织业是处在新旧工会运动之间的工业。除了达勒姆和诺森伯兰的熟练采煤工人工会以外，大多数矿工都 136 支持法定的 8 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制，但是他们继续选出他们的领袖以“自由党劳工派”身份进入议会，并且投票选举那些愿意对他们的经济要求给予某种支持的自由党候选人。棉纺工人之间的分歧较大，但是总的说来，他们追随仍然依附自由党路线的领袖，并且把立法方面的要求同工业方面极为温和的政策结合起来。矿工和棉纺工人大体上赞成国家对劳动条件的管理进行更多的干涉，但是他们并不是轻易相信任何种类的社会主义的人。

因此，拥护社会主义和独立劳工代表权的事业的大多数新工会主义者，如果不是新建工会初露头角的人物，就是旧工会中的少数派，这些旧工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希望说服自由党整个转变过来，支持温和的工人阶级纲领，并逐步推行政治激进主义。有些新

工会主义者曾在社会民主联盟或社会主义联盟中受过锻炼，或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失业骚动中经过风雨。有些新工会主义者曾追随布莱德洛和安妮·贝赞参加宗教与教育分离运动，或是在土地归还同盟之类的团体中积极活动。还有少数人受过斯图尔特·赫德兰姆或其他基督教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影响。但是大多数新工会主义者，包括一些第一流的人在内，都是新进人物；他们从没有积极参加过以前的任何运动，但是随着新劳工独立运动的形成，他们感到了时代的动荡，有了社会觉悟。这些男男女女多半都是年轻而热忱的人，根本无需摆脱自己从未效忠过的自由党路线。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的确非常需要一种志同道合的意识，需要一种敢于尝试新生活方式的进取精神。这种新生活方式远远不限于接受号召，为了纯经济目的，甚或为了经济和政治双重目的而共同奋斗。

1889年以后，掀起新社会主义运动的男男女女，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或政治的信条。但是，他们的这种需要决不是人人一样的。在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有两种思想脉络交织在一起：一种是清教徒式的，非常严肃，往往流于吹毛求疵；另一种反抗当前世界的单调乏味和苦难重重。有后一种思想脉络的人决心做到欢乐舒畅，根本不在乎清教徒对他们的一言一行所表示的鄙夷态度。凯尔·哈迪和菲利浦·斯诺顿虽然在气质和态度上大不相同，但是都属于前一类；他们在成为社会主义者以前，都是戒酒会会员和义务布道者，后来都把原先所信奉的低教会派的清教徒的严格精神带进社会主义。罗伯特·布拉奇福德和时代号角联谊会是一类人的领导者，这一类人当然也同样受道德热情的驱使，但是他们的改革运动所针对的是痛苦而不是罪恶；他们同有罪的人交朋友，把他们争取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而不是要求他们悔改，做受人尊敬的人。就个人来说，第二类人的杰出领

袖是一些一尘不染的没有罪恶的人，肯定不比清教徒更有罪。但是他们最怕“圣人”，最怕道貌岸然的派头，他们认为这种派头使那些同自己一道搞社会主义运动的清教徒失去了人情味，特别是在帮助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者的时候。有些信仰社会主义的同志谴责酗酒的恶习，并且指责穷人不中用而又胡花乱用，不顾将来；他们不把这些恶习归罪于整个制度，不说穷人有一颗纯真的心。听到这种论调，时代号角派就感到很愤怒。布拉奇福德后来决非偶然地成了一个热忱拥护决定论的人，并且写了《没有罪》一书，论证人类之所以犯罪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而是在一个任凭竞争与自由放任主义的邪恶理论摆布的世界中，所受的培育和所处的环境的必然后果。十八世纪法国的伦理学家曾经有过这样的看法，罗伯特·欧文也有过同样的见解；关于人的性格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的信念，正是通过欧文传给后代的宗教与教育分离论者和理性主义者的。布拉奇福德由于贫困而降到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去，他出身于搞艺术的波希米亚人的较低阶层。他当过军人，并且喜爱军人，也喜爱那些生活习惯跟国教以及非国教教徒都有很大距离的平民。他非常乐于向人家宣称，他所喜欢的是男男女女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他们所应有的品质——这并不妨碍他非常成功地掩饰对剥削者或上等人的爱好。在私生活中，他的品行也非常令人尊重，比起他由衷感到厌恶的清教徒也毫无逊色。时代号角派喜欢宣扬及时行乐的好处，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欢乐大都来自品茶和品咖啡，而很少来自酒类；他们也直言不讳地谴责工人不关心政治，听起来就好象他们以前没有断然证明这不是工人的过错一样。

时代号角派的杰出领袖布拉奇福德和独立工党的领袖凯尔·哈迪虽然都具有最崇高的理想，而且彼此的理想又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始终无法相处在一起。布拉奇福德误以为哈迪是一个扫兴的人；哈迪也同样错把布拉奇福德看作是轻浮的人、社会主义道

路上的绊脚石，因为他引起了最应该争取的人的反感。事实上，哈迪很有幽默感，并且同布拉奇福德一样，看到人家高兴自己心里就喜欢，只要他们保持清醒就行；布拉奇福德还有几分遁世思退的气质，有时候还会一阵阵地产生郁郁寡欢的愁闷心情。尽管如此，哈迪所代表的是清教徒传统，而布拉奇福德所代表的则是反击这样传统的潮流。当然，如果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实际上就必须同时争取这两种类型的人，即既争取清教徒，也争取反对他们的人。但是用同样的方法或者由同样的人去争取是不容易办到的。

还有大批人介于清教徒和“欢乐的英国人”之间，而不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类。其中有一些专门的读神者，他们喜欢“从不昏睡的人”对宗教所进行的攻击；不过由于缺乏幽默感，他们又反对他用轻松的笔调去写严肃的问题，其情况简直就象那些对他的“反宗教”观点感到吃惊的人反对他这样写一样。还有一些人是老工人阶级激进派和老社会主义者，他们同意布拉奇福德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场，但又不满于他反对革命和不相信有可能飞跃地实现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观点。还有些团体同意布拉奇福德热衷于教育和群众文化事业的态度，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139 认为新文化必须以坚决否定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为基础。最后，还有一些单纯追求新福音的人，他们既不是清教徒，也不是反清教徒；既不是抱定宗旨戒酒的人，也不是一心以酒为乐的人；既不喜欢乱搞男女关系，也不为此感到震惊；既不信奉宗教，也不反对宗教；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改良主义者。总之，他们是一批普通的男男女女，生平第一次加入工会，他们以赞许的态度倾听社会主义演说家指责邪恶的贵族、地主和资本家，对于演说家希望以什么样的人来代替这些人的问题，则既没有任何明确的概念，也没有意识到有此需要。

但是，有一点决不容忽视，在新工会运动和新社会主义运动形

成的时候,非国教教义在一大部分工人阶级中仍然非常盛行,因而清教徒教义也是这样。但在伦敦以及在其他大城市的贫民窟中这种势力最微不足道;在每个大城市中,总有一部分劳动人民奋力摆脱了这种势力,他们痛恨自命不凡的非国教教徒比痛恨国教教会尤甚。这些人是宗教与教育分离运动的骨干,这个运动渊远流长,可以追溯到理查·卡莱尔,甚至可以追溯到汤姆·潘思的信从者。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分裂成为布莱德洛派的共和主义者、海德门的社会民主联盟盟员、社会主义联盟的无政府主义者或准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彼得·克鲁泡特金和夏洛蒂·威尔逊周围的集团。所有这些集团的人数都相当少,但是很活跃,有时也懂得怎样鼓动“衣衫褴褛的”贫民窟居民走上街头。从另一方面说,他们虽有许多人是手艺工人和旧工会会员,但在熟练工人的主体中势力却很小。

甚至在大城市,非国教教派也只是在“境况较好的”工人阶级居住区有强大的势力。它在同业工会和合作社中地位也很稳固。谈到灵魂问题,它具有“来世”观点,拯救人类的灵魂不下地狱在它的传道工作中仍占重要地位,只是再也不象十九世纪初期那样经常使信徒对今世的痛苦现象抱漠视态度。非国教教派势力最强大的地方不是大城市,而是大城市外面的工业区,特别是煤矿区,这140些地区主要是接受了这派或那派卫理公会会员所宣传的福音。正是在这些地区,非国教教会_{对政治和社会舆论的形成起了最大作用,而且也是整个家庭和社会生活结构中的关键因素。因此,矿区是最不容易脱离自由党的从属关系的地区,这种从属关系同非国教团体是密切相关的。}

在城市,非国教教堂也是社会生活、宗教仪式以及政治与社会从属关系的中心,只是不那么独揽一切而已。在这些城市,个人或家庭同非国教教会脱离了关系以后,往往就象置身于敌对的世界

中一样，使人有莫知所从、孤独无援之感。这种被遗弃的人，哪怕是出于自己的主动而遭到遗弃，也希望在某个小到可以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的团体中找到“归宿”、找到志同道合的情谊。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除此以外还希望这个新团体能以大致相似的形式模拟他们所习惯的一些宗教仪式，比如在一起唱歌，在一起听讲演，参加某种共同的礼拜仪式等。约翰·特雷弗（1855—1930年）所倡导的劳工教会运动曾经主要在兰开夏和约克郡的“境况较好的”工人阶级居住区中风行，这个运动设法以最严格的形式满足了上述需要，办法是组织劳工礼拜仪式，唱伦理性赞美诗，并以半讲演半布道的方式读经和进行讲解。这一切都使原先上教堂的善良人物心里感到妥帖自在，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聚会的中心去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在星期日带着全家一同前往参加。但是另有许多人需要一种新的同志关系，而不是一个代替教堂的所在；这些迷途的羔羊中有许多人从罗伯特·布拉奇福德所写的亲切感人的文章中得到了部分满足；这些文章起初发表在《星期日纪事报》上，后来《纪事报》不再让他畅所欲言，他便创办《时代号角报》发表自己的文章。“时代号角运动”举办了许多社交活动，如合唱队、自行车俱乐部、远足俱乐部、时代号角童子军等等，这些都是布拉奇福德同大批读者建立非常亲切的个人关系的直接产物。许多新近转变信仰的人在“时代号角运动”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关系，产生了共同生活的感觉，这正是他们所不能缺少的。

141 但是，还有许多人觉得时代号角派太喧嚣了；而且不久以后，随着布拉奇福德逐步发挥了自己的看法，这些人又认为这个派别过于反对宗教，过于反对体面尊严，在政治上也过于走极端。因为改变信仰而拥护社会主义和独立工党的人，即使是抛弃了一些旧信仰，也决不是全都抛弃了他们的教堂，或者不再信教了。对于这些上教堂的社会主义者来说，1893年在凯尔·哈迪的领导下联合

组成独立工党的地方工会、劳工理事会以及其他类似的团体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归宿。当然，这并不是说独立工党主要是由上教堂的人组成的，也不是说大部分上教堂而又投票拥护劳工的人一概属于独立工党。独立工党的目的是要在最广泛的基础上，把一切主张劳工在政治上独立于其他政党，并以某种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人都组织起来。但是对于那些改变了政治立场而又没有完全放弃宗教信仰，并把大部分清教徒精神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凯尔·哈迪领导下的独立工党特别具有吸引力。哈迪所提出的问题是：《一个靠每星期一英镑过日子的人能当好基督教徒吗？》这是一篇讲演稿的讲题，曾以小册子的形式广泛流传，它说出了这些社会主义者所要说的话。因为对哈迪来说，社会主义始终是登山宝训^①式的政治理论，传播这种福音要以上帝的名义进行，并且要假定有一个眷顾全体人类的上帝存在，只要人们互助，上帝就会帮助他们。实际上，除了提法以外，哈迪的理论和布拉奇福德的理论并没有多大差别。但是这种提法本身就构成了很大差别。

我们决不可认为，这意味着布拉奇福德和哈迪是两个截然分开的运动的领袖。恰恰相反，布拉奇福德有若干年一直是独立工党最活跃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有很多社会主义者同两个集团都有关系。比如说，布雷德福的F·W·约维特有很多年一直为两方面出力，而并没有感到这种作法不当。但是，哈迪拥有自己的机关报——《劳工领袖》，始终不喜欢时代号角派，而布拉奇福德不久以后也不再参加独立工党的活动，原因是哈迪和独立工党的其他主要领袖拒绝了他的如下政策：即使在有社会主义候选人参加竞选的时候，社会主义者也决不投票选举任何非社会主义候选人。

^① 据新约“马太福音”第5、6、7章记载，耶稣医治好了许多病人，有许多人跟着他走。于是他就登上一座山给大家讲天国的道理，教人怎样为善。——译注

142 《时代号角报》日益成为一个自由行动的社会主义机关报，只忠于它本身的信从者，而不忠于其他人，每当布拉奇福德认为有责任领导信从者奔赴任何目标时，该报都希望他们紧紧跟上。

理想主义社会主义者爱德华·卡本特尔(1844—1929年)同前面所叙述的所有团体都没有关系，但同所有的团体(或者说几乎是所有的团体)都很友好，他的自由诗《走向民主》(1883年)在最风行的时候不仅在英国而且在美国和东方都脍炙人口，大受欢迎。卡本特尔的生涯开始时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并在该大学担任基督教社会主义者F·D·摩里斯的副牧师。4年以后，即1874年，他放弃了研究员和副牧师的职务，成为新建立的大学教学扩充运动的讲学者。1877年，他第一次访问美国，并且遇到了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华尔特·惠特曼。《走向民主》的写作方式主要是从惠特曼那里学来的，也基本上反映了惠特曼的思想。1886年^①，他主要由于健康原因放弃了讲学活动，在谢菲尔德附近定居下来，寄寓在一个工人阶级的朋友艾伯特·费尼霍夫家里，写作《走向民主》。1882年，他的父亲去世，他继承了几千英镑遗产，不久他就把其中的一大部分拿了出去。他用钱帮助社会民主联盟创办了《正义》。他在德比郡买了几英亩果园，地点仍然靠近谢菲尔德，不久又兼制凉鞋。卡本特尔访问美国归来，就热衷于提倡“简朴生活”，辛辣地抨击所谓“文明”，成了一个坚定的空想主义者。他完全相信，为时不久人类就将屏弃“文明”生活的谬误，并以社会地位完全平等为基础，在简朴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中求得和平与团结。他确信，如果人类恢复同大自然协调的简朴生活方式，疾病就差不多会绝迹；在人类知道怎样消除财产以及大规模生产不必要的东西所造成的各种弊端以后，爱就会变得纯洁起来。

^① 从上下文看，这个年代显然有误。——译注

卡本特尔终其余生一直忠于自己在一些散文著作和《走向民主》的续篇中所表达的理想。他最著名的著作有《英国的理想》(1885年)和《文明的起源及其救治办法》(1889年)。他的后期著作主要是讨论东方哲学并阐明自己对艺术创造的看法,其中包括《从 143 亚当峰到象岛》(1892年)、《创造的艺术》(1904年),以及讨论两性问题的著作《爱情的成熟》(1896年)等。1916年,他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我的生平和梦想》。虽然卡本特尔除了通过写作以外没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他对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新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却并不是不重要的。多年以来,他一直欢迎社会主义者(特别是从谢菲尔德去的)以及从许多国家前去拜访他的人到他家作客。他并不是一个创造系统学说的人,就其基本思想来看,与其说他是社会主义者,还不如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期待强制性的政府完全消逝,出现一个自由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能从手头的工作中得到乐趣,一切不必要的劳苦工作都会消逝。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所谓的“怪人”,但是那些了解的人都热爱他,尊敬他。他那种过分乐天的唯心主义哲学排除了一切怀疑,满足了许多新近相信平等理论的人的强烈要求;他在印度的影响甚至比在英国更大。随着工党的兴起,随着社会主义发展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运动,他的著作所激起的那种心潮平息了,他的影响也消逝了。但是有一个时期,他算得上是一个重要的二流倡导者,尽管他始终不是一个领袖人物。

甚至到了今天,卡本特尔的社会主义歌曲“起来吧,英国!”在无数集会上仍然为人所歌唱,使人回想起社会主义运动初期高昂的乐观主义情绪,虽然他的《走向民主》再也没有什么人诵读了。

这一节叙述的目的在于略略分析一下导致1889年“新工会运动”骤然兴起的力量,同时也在于分析随着这种骤然兴起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情感和看法,竟使得一大批人纷纷投入“独立劳工”

事业，并改信了一种根本不同于大陆社会民主党人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分子所信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但是，除了本章所讨论过的各个工人阶级集团以外，还有一批实力雄厚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团结在工人的一边，并且为大体相同的情绪所推动。在这个集团中，费边社并不是唯一的，但是它所发挥的作用最大，远远超过了旁人。在分析独立工党的新社会主义本身¹⁴⁴的实际内容以前，我们还必须回顾一下具有英国特色的费边社会主义理论早期阶段的发展情况。这首先是悉尼·韦伯的劳绩，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一套全面的社会主义哲学。这种哲学的基础不是马克思的学说，而是一种混合的理论，其中包括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重新阐释的边沁派功利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杰文斯的经济学，还有根据科学精神除去革命内容的唯物史观。

(III) 独立工党

英国争取“独立”劳工代表权的运动，是在1893年建立的独立工党内部形成的，为工党的组成铺平了道路。这个运动开始时是一些分散的地方运动，旨在反对在自由党内建立劳工派集团。“自由党劳工派”集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67年议会改革法案颁布以后所建立的劳工代表权同盟，而首次获得胜利则是在1874年，当时有两位矿工领袖——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和托马斯·伯特当选为议员。他们两人同职工大会书记、石匠亨利·布劳德赫斯特在1880年的选举中一同取得了胜利。在这次选举中，查尔斯·布莱德洛也当选了，但被下院取消了席位，此后他在争取以席位确认权代替宣誓就职仪式的长期斗争中，曾在1881年、1882年和1884年一再当选。亚历山大·麦克唐纳死于1881年，当时曾进行竞选，企图保住

他所出缺的席位，可是失败了。1884—1885年，有两项法案扩大了郡区选举权，以有利于工业区的方式重新分配了席位；在1885年举行的选举中，除了布莱德洛和来自苏格兰高地的两名小农场佃农的代表以外，还有6名矿工和5名其他工会领袖当选。这11名工会议员在自由党内构成了一个正规集团，人们殷切希望自由党人会转而采取某种能保证取得劳工支持的激进主义。不过在这个时候，自由党因爱尔兰自治问题发生了分裂，明显的标志是张伯伦退党，激进派联盟瓦解。这个危机同八十年代中期因失业问题而引起的骚乱正好同时出现，骚乱大大增加了社会主义在工业地区的影响。在1886年因爱尔兰自治问题的危机而举行的大选中，6名矿工议员有5名保持了议席，但是5名其他工会议员却有3名丧失了议席，而赢得的新议席却只有两个。这一挫败使得职工大会改变了主意，根据丧失了议席的达勒姆区矿工领袖约翰·威尔逊的建议，在1886年建立了一个劳工选举委员会，原先职工大会一直否决要求从事劳工代表权运动的提案。1881年以后，旧的劳工代表权同盟就消失了，新的劳工选举委员会最初是作为职工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建立起来的，但是第二年就改为独立的劳工选举协会，打算主要通过各个地方的工联理事会进行工作，但它有权在自己认为适当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地方组织。 145

劳工选举委员会是根据职工大会中的一些集团的联合投票而建立起来的，所有这些集团都主张不论是否同自由党人联合，工人阶级都应进行政治活动。但是它实质上成了“自由党劳工派”的团体，因为大多数工会领袖不顾张伯伦的叛离，仍然牢牢地依附于格莱斯顿的党，而自由党人自然也尽最大努力去保持工会对它的支持。事实上，施纳德霍斯特和自由党的中央组织当时正在尽最大努力劝说态度勉强的自由党地方协会接受工会候选人去竞选那些没有他们的支持就岌岌可危的议席。劳工选举协会的政策是

让地方工联理事会或者矿工联合会之类的其他工会团体提出工会候选人，然后敦促自由党地方选举协会接受他。如果自由党选举协会予以拒绝，劳工选举协会下一步就要求各地方的自由党人对自由党所提出的候选人和工会所提名的人进行投票表决，双方保证支持获票最多的一人。如果这一点被接受，而工会方面的人又
146 获得胜利，他就正式成为自由党和激进派联合提名的候选人。反之，如果工会方面的人在自由党人的票决中失败了，或者自由党人拒绝举行投票，一般说来劳工选举协会就撤回自己的候选人，以免选票分散而把议席白白送给保守党人。实际上，这种作法意味着“自由党-劳工派”的候选人只为矿工选票占优势的选区以及少数其他选区所接受，但是由于大多数自由党地方协会的强烈反对，这一作法不可能取得很大进展。1885年，除了矿工以外，当选的5名工会人物中有3名代表东伦敦选区，1名代表伯明翰选区，还有1名——约瑟夫·阿奇——代表西北诺福克的农业选区。1886年，由于张伯伦的分裂而在伯明翰落选的布劳德赫斯特当选为西诺丁汉的议员。其他3名获胜的工会议员都是在东伦敦区选上的。北部工业城市的自由党人不愿把席位让给工人，哪怕他们是自由党人也罢。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中间产生一种日益敌视自由党人和劳工选举协会的情绪，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了；张伯伦派的分裂行动使这批工人感到震惊，而失业骚动以及新工会运动初期的宣传鼓动则使他们觉醒过来。在政治方面，1888年以前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这一年，中拉纳克郡的自由党现任议员退休，举行补缺选举，詹姆斯·凯尔·哈迪（1856—1915年）被提名为矿工候选人，他是埃尔郡矿工工会的领袖，还领导着一个运动，争取使苏格兰矿工团结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联合会。哈迪的名字被提交自由党地方协会，可是没有被接受。于是，支持哈迪的人要求自由党选民进行投票，但

这一点也被拒绝了。劳工选举协会出面斡旋也没有效果。施耐德霍斯特代表自由党总部赶来,也没有能说服当地的自由党人,于是私下向哈迪提出下次大选时保证在其他地方给他一个议席,同时在他担任议员期间每年付给 300 英镑的生活津贴。哈迪拒绝撤销提名;尽管劳工选举协会全国总书记 T·R·思雷尔福尔施加压力要他接受这些条件,他也全盘拒绝了。劳工选举协会撤回了对哈迪的支持,于是哈迪便作为一个独立的劳工候选人进行竞选,获得 617 票,而自由党人为 3,847 票,保守党人为 2,917 票。丢开“自由党 - 劳工派”或社会民主联盟而自搞“独立劳工”政治活动,正是从这里开始的。¹⁴⁷

凯尔·哈迪在参加中拉纳克郡竞选的时候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党人。那时他 31 岁,由于在西苏格兰的矿工中奔走活动,力图掀起工会运动,已经成了知名的工会领袖。这需要面对煤矿矿主的激烈抵抗,进行顽强的斗争;哈迪曾经受到抵制和迫害,如果不是他能写些主要介绍矿区情况的新闻报道文章在埃尔郡的报纸上发表,以稿酬来养活自己,他的境遇就更差了。1886 年,他担任了埃尔郡矿工工会书记,年薪 75 英镑。翌年一月,他创办了自己的月刊《矿工》,同年出任新成立的苏格兰矿工联合会书记,并被提名为矿工候选人竞选北埃尔郡的议席。他还就这一问题在埃尔郡矿工示威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主张成立“工党”;在自由党协会拒绝支持他的时候,他就采用了劳工选举协会的方针,要求自由党选民投票表决。他还说,他将“尽力设法在选区的每一个城镇和乡村中成立一个劳工选举协会分会”。但是当中拉纳克郡的议席出缺时,他就接受邀请去竞选那个议席去了。

有迹象说明,凯尔·哈迪当时虽然还是自由党人,但在 1887 年就已经把自己看成是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了。这一年,他作为苏格兰矿工代表团的团员前去伦敦,趁此机会会见了恩格斯和爱琳

娜·马克思等人,并且同社会民主联盟发生了接触,有意加入这个组织。但是伦敦社会民主联盟分子的那种以啤酒为乐和不尊重上帝的作风触犯了他的清教徒精神。他是一个劝人戒酒的绝对禁酒主义者和低教会派的积极教徒;他虽然已经抛弃自己的神学教条主义,但仍不失为一个基督教徒,主张绝对禁酒的人。他回到了苏格兰,并没有实现加入社会民主联盟的企图,也没有割断同自由党的关系。但是,在《矿工》月刊上,大量刊登社会主义者、土地国有论者和其他反叛分子的来稿;他自己的文章已经宣称资本主义眼看就要崩溃。

苏格兰工党从中拉纳克郡的选举活动中诞生了,许多进步运动的成员都在这个政党内联合了起来。小农场佃农领袖约翰·默多克主持筹备会议,小农场佃农的一个议员加文·B·克拉克医生(1846—1930年)担任副主席。1886年在拉纳克郡以激进派身份赢得议席的“社会主义地主”R·B·肯宁汉·格雷姆(1852—1936年)担任主席;格拉斯哥的爱尔兰人约翰·弗格森(1836—1906年)担任另一名副主席;亨利·乔治派的苏格兰土地归还同盟盟员J·肖·马克斯韦尔(1855—1928年)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哥的社会主义者乔治·米奇尔担任司库。哈迪本人除了已经担任的许多职务之外,又加上了书记的职位。社会主义联盟苏格兰各支部的残余力量则团结在J·L·马洪周围。他的纲领中有:铁路和其他形式的运输事业国有化,建立国家银行体系,货币发行由国家垄断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此外还提出了8小时工作日制、劳动权以及其他更直接的要求。哈迪及其集团大力展开工作,在苏格兰各地组织支部。

这时,亨利·海德·钱皮恩(1859—1928年)在“托利党黄金”那场风波中同社会民主联盟吵翻了,积极投身于劳工代表权运动。1887年,他创办了一个刊物名为《常识》,这个刊物不久就发展成为

《劳工选民》；同时他参加了伦敦地区的劳工选举协会，力图使协会脱离自由党而独立。1886年，在伦敦成立了一个首都激进派联合会，作为一个同正统的伦敦自由党 - 激进派联盟对立的组织，自由党全国联盟把这个组织以及它的对立团体一起接受了下来。1888年伦敦郡议会成立以后，就立刻产生了一个迫切的问题：新机构中是否应该有一个“进步派”联盟。费边主义者和约翰·伯恩士的追随者都赞成这个方案。伯恩士自己成立了一个巴特西劳工联盟，于 149 1889年退出社会民主联盟；同年他当选为伦敦郡议会议员。钱皮恩虽然在1888年被社会民主联盟开除，因而也不在盟内，但是他反对“进步派”联盟，积极争取在伦敦掀起一个建立独立劳工党派运动。他还大力鼓吹8小时工作日制。哈迪已经把他的《矿工》月刊改名为《劳工领袖》，但他发现自己没有力量再办下去，于是就同钱皮恩的《劳工选民》合并，并担任该报驻苏格兰记者。但是1890年，钱皮恩同伯恩士、曼恩以及提勒特发生了争执，《劳工选民》因而停刊。该刊的地位被约瑟夫·伯吉斯(1853—1934年)的《工人时代报》所代替，伯吉斯立即着手使他的刊物成为全国争取建立独立劳工党的运动的中心。不久以后，《工人时代报》就出版了一些地方版，满篇刊载工会和劳工问题的消息，成了新运动的第一个销路很广的机关报。

这是1889年发生那几桩大事以后的情况，那些事件对全国各地的工人阶级輿情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伦敦煤气工人取得了胜利，接着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又取得了更加辉煌的胜利，这就推动了非熟练工人展开新工会运动。伦敦煤气工人领袖威尔·索恩(1857—1946年)和彼提·古朗(1860—1910年)前往约克郡各地旅行，组织煤气工人工会分会。新工会运动迅速扩大到许多行业，其中包括组织得很差的毛纺织与绒线纺织业。兰开夏的《棉纺厂时代报》的主人约翰·安德鲁(1850—1906年)在1889年创办了一

家《约克郡工厂时代报》，由约瑟夫·伯吉斯担任编辑；第二年，这个刊物又在伦敦出了一个刊物，即《工人时代报》。这时，默西河畔和泰恩河畔以及其他地区的码头工人工会也组织了起来，其中有一些扩大成为许多行业的非熟练工人都能参加的工会。工人阶级的活动非常活跃，不久就在政治上引起了反响。1890年底，布雷德福附近曼宁汉地方的纺织工人，在 W·H·德鲁的领导下举行罢工，其特点是没有工会组织的罢工工人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经过这次事件以后，布雷德福工会成立了，由德鲁担任主席，奉行一种富于进取精神的政治独立政策。伦敦码头工人领袖本·提勒特以及罗伯特·布拉奇福德被提名为独立的劳工候选人，同现任自由党议员竞选布雷德福的议席。几个月以后，在科恩瓦利城成立了类似的工会，汤姆·曼恩被选为候选人。索尔福德劳工选举协会在一个月以后同独立派联合了起来；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伦敦工联理事会成立了自己的劳工代表权同盟。翌年初，布拉奇福德和约翰·特雷弗率先建立了曼彻斯特区独立工党；与此同时，伯吉斯在《工人时代报》上向所有支持独立工党的人呼吁，要他们报上名来，以便所有愿意伸出支援之手的人能互通信息，并能在各自的地区建立起拟议中的政党的支部。这个呼吁获得了很大成就：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机构就此建立了起来，并于第二年派来代表成立独立工党。1892年6月，伯吉斯集团在伦敦成立了独立工党，由肖·马克斯韦尔担任书记，力图使伦敦委员会成为全国独立工党的筹备机构。苏格兰人和北部的人反对这个建议，他们坚持新的党应该在他们的充分合作下组成。他们劝使哈迪（1892年7月被选入议会，代表大伦敦区的西南哈姆区）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职工代表大会上起来带头，号召组织筹备会议。大会决定1893年1月在布雷德福召开全国会议成立独立工党。

在1892年的大选中，6名矿工再次当选为“自由党-劳工派”

议员,另有4名具有同一政治信念的工会人物当选。在苏格兰,肯宁汉·格雷姆落选了,但是G·B·克拉克医生作为激进派保持了议席。在爱尔兰,有3名劳工议员当选,其中包括爱尔兰土地同盟的迈克尔·达维特(1846—1906年),但是达维特被取消了议员资格。在英格兰,独立工党取得了第一次胜利。约翰·伯恩士赢得了巴特西的席位,凯尔·哈迪则在西哈姆区当选。海员领袖约瑟夫·赫夫洛克·威尔逊(1859—1929年),在米德尔斯布勒同自由党和托利党的对手进行了一场三角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但随即同自由党人言归于好。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伯恩士和哈迪在议会发出新党的呼声了。但是伯恩士退缩了。哈迪表示愿意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但是伯恩士对哈迪并无好感,并且深深陷在伦敦郡议会的进步派联盟中。这样就注定由哈迪单独代表日益强大的运动的要求,出面维护失业者的利益和法定8小时工作日制。许多著述家谈到哈迪到达下院的情况,说他穿着工作服,戴一顶布便帽,乘着一辆游览马车,里面坐满了码头工人,其中还有一人吹着颇遭体面人非议的短喇叭。这个场面并不是预先安排好的,同哈迪的作风不大相称,因为他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人,根本不愿出那种风头,虽然他不惜在一个严肃的场合中大吵一通。不久,为了抗议下院草率处理一次矿场事故,他果然大吵了一通;当他认为没有更好的办法为自己的问题大造舆论时,他随时准备再闹一场。但是他的吵闹是情绪激动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他喜欢华而不实的行动。他自始至终是一个严峻而苛求的清教徒;虽然他偶而也能象任何人一样尽情享乐,但是他对自己认为是轻率的事情或愚蠢的革命空谈都极为厌恶。他以极端分子著称,而实际上却始终是一个温和派,决心集中精力于当前的改革,对于那些相信社会主义能够突然通过暴力革命而实现的人是难以容忍的。

1893年1月,由哈迪担任主席的筹建独立工党的大会,是由一

批成分复杂的男男女女组成的，有些代表来自苏格兰工党（该党不久就并入了这个新组织）；有些来自若干地方劳工联合会和类似团体（例如布雷德福劳工联合会、曼彻斯特独立工党以及在《工人时代报》的主持下组成的若干地方性独立工党）；有的来自少数社会民主联盟支部；有的来自伦敦费边社；还有的来自 1889 年出版《费边论文集》以后成立起来的费边社地方分社。与会的还有少数工会团体和一两个其他团体，如爱德华·爱威林（1851—1898 年）的 8 小时工作日同盟。肖伯纳代表伦敦费边社在一开始就宣布说，费边社总社不打算同新的党合并，决心继续执行把社会主义思想渗透到目前的各个政党中去的政策。费边社的代表证书之所以受到质疑，一部分就是根据这个理由，一部分则是由于费边社员在伦敦市政中同自由党人结成联盟，而这一点正好同大多数地方代表的见解相抵触，他们在自己的市议会中正同自由党人进行着斗争。在这一问题上，伦敦以外的大多数费边社地方分社都反对肖伯纳，并转而加入了独立工党。

开始时，独立工党打算成为一个联盟组织，主要以地方劳工联合会为基础，工会和其他劳工与社会主义团体都可以参加。不过工会抱敬而远之的态度，而社会民主联盟的各支部则拒绝放弃它们原来的从属关系。独立工党在成立以后的几个月内就成为一个设有支部的全国性组织，各地的劳工联合会和类似的团体都承认自己是党的支部，接受布雷德福会议所设全国管理委员会的管辖。从此以后，要使工会从事独立的工人政治活动就不得不另觅他途，这条途径就是说服工会成立联合政党，让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会团体得以通过这个政党采取共同行动。这个目的，经过 7 年的艰苦努力，在说服职工大会召开会议设立劳工代表委员会以后，才算达到。在此期间，劳工选举协会存在到 1896 年就结束了，它是逐渐失势的，原因是若干所属地方组织或是参加了独立工党或是元气

耗尽而解体。1895年的大选使矿工议员的人数从6名减少到5名，自由党-劳工派其余的议员从4名减少到3名，其中包括赫夫洛克·威尔逊。伯恩士和克拉克医生都连选连任了，3名爱尔兰人也都重返议会，其中包括代表南梅沃区的议员达维特。凯尔·哈迪在西南哈姆区尽管没有自由党人的竞争却落选了。此后，独立工党在下院就再也没有议员了。它曾为28个议席展开竞选，其中8 153个在兰开夏和柴郡，7个在约克郡，7个在苏格兰，但是它连一个议席都没有争取到。社会民主联盟有4名候选人，还有4个社会主义者在各种地方团体的支持下竞选。1895年，新工会运动丧失了它在1889年和以后几年所赢得的许多地盘，只能勉强维持下去。尽管独立工党成立了，但是独立劳工运动却再也没有取得进展。许多老一辈工会领袖，如乔治·豪威尔(1833—1910年)，都预言新工会很快会消逝，而“自由党-劳工派”联盟会重新恢复。

尽管九十年代初期的惊人进展没有能保持下去，但是新社会主义却逐渐渗透到旧工会中去了，在接连举行的几届职工大会上，社会主义者得到了越来越大的支持。1895年，当反对新工会运动的浪潮达到顶点时，职工大会听取当时已经完全脱离新政治运动的约翰·伯恩士的意见，决定开除各地的工联理事会，同时决定只有实际在自己的行业中进行工作或者担任工会职务的人，才可以当选为代表。作出第一个决定的表面理由是，工联理事会的会员资格同职工大会所属工会的会员资格重复，而实际的动机却是清除在工联理事会的代表中力量很强大的反叛分子。有一个时候，这种改变是收到效果的，表现在恢复了老一辈领导人的权力。1893和1894年，职工大会通过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决议，甚至还投票赞成设立一笔基金，以支持工会候选人，只是职工大会议委员会以工会没有给予有效的支持为理由，没有执行后一决定。从1895到1898年，类似的提案却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甚至到了1899

年，职工大会还否决了一项设立中央政治基金的建议。然而就在这一年，社会主义者终于说服代表们投票赞成一项提案而重新得势，这项提案责令议会委员会邀集工会以及其他劳工团体和社会主义组织于第二年举行会议，成立劳工代表委员会。

新社会主义运动在 1895 到 1900 年这一时期表面上虽遭到挫败，而实际上却取得了进展，其原因主要是它在地方政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独立工党在伦敦受到进步派联盟的阻挠以后，便在各个地方推行一种反对两个旧政党的政策，并能在一些地方议会中取得立足点，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竭力要求进行当前的改革，比如改善学校条件，推进市建住宅和清除贫民区的计划，为当地的失业者提供工作，以及提高地方议会雇员的极度微薄的工资等。这种“现实社会主义”的政策使它得到了越来越大的支持，同时也说明了它是一个改良的党而不是一个革命的党，它有长远的社会主义理想，也有一个对这样一些人具有吸引力的当前纲领：这批人既反对社会民主联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满意自由党以半冷不热的态度对待该党 1892 年的纽卡斯尔纲领中比较进步的部分。当时，劳工代表充其量不过是各个市议会中的小小的少数派，在 1888 年建立的郡议会中则简直就没有劳工代表。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议会中劳工代表的人数甚至更少；在工业地区的学校管理委员会和贫民救济委员会中，劳工代表倒比较多。但是他们在很多场合所起的作用，却超过了他们在住宅委员会和处理其他社会问题的委员会中所实有的代表人数。这种地方工作使得独立工党的领导人出了名，而且往往为取得以后议会斗争的胜利铺平道路。费边社尽管专心致志在伦敦郡议会中搞进步派联盟，但是它提供了有用的统计资料，也提供了解释各个地方议会的权力和如何制定方针政策的小册子，因而对全国各个地方当局的劳工成员都有很大帮助。

促使独立工党在九十年代后期增强势力的第二个因素是，它的支部积极主动，为罢工运动提供了帮助。1897年，混合机械工人联合会的雇主以工会干涉“管理职权”为借口闭厂拒工，联合会为此进行了抵抗，但迄无成果，这时独立工党的支部曾大力提供帮助。155 第二年，南威尔士发生矿工罢工和雇主关厂拒工的事件，独立工党的地方支部也给予了帮助，这使该党在这个地区得到了一个巩固的据点，当初这个地区根本没有派代表参加该党1893年的成立大会。1900年哈迪之所以在默瑟尔选区当选，就是由于他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从此以后，南威尔士很快就成了运动的主要据点之一。

在地方政治中，独立工党在大多数地区都是同时跟两个旧政党展开竞选，不过它的代表在当选以后往往能够同其他进步分子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合作。在全国政治中，独立工党直接面对的问题是，在它没有自己的候选人参加竞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大多数选区，对选举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当布拉奇福德及其集团在1892年成立曼彻斯特区独立工党时，他们在党章中列入一条，不仅规定党员必须断绝同其他政党的一切联系，而且禁止他们在任何选区投票选举任何非社会主义候选人。这样就势必要求大多数党员在新工会运动还不能在他们所住地区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前，根本就不去投票。在布雷德福独立工党成立大会上以及以后的一个时期里，曼彻斯特方面的人曾力争“第4条”（以其在曼彻斯特独立工党党章中的次序得名）被接受为独立工党的全国政策。在这方面他们失败了，独立工党全国会议所通过的政策是，独立工党党员断绝同其他政党的一切联系，在市政选举中应该根据本地支部的决定投票，在议会选举中应根据党的全国会议所作出的决定投票。在1895年的大选中，最后这条规定受到了考验；当时全国会议还决定雷厉风行地执行“第4条”政策。不过，据说这个决定遭到普遍忽

视,许多独立工党党员都投了托利党的票。

关于独立工党党员只有在该党或其他社会主义候选人参加竞选的地方进行投票,否则就放弃投票权的政策,该党所作的解释是这样的:独立工党不惜放弃它在大多数选区影响选举的机会,决心打破旧的自由党-劳工派联盟,决心使工人放弃他们效忠旧的激进主义的传统作法。原来当时有这样一个严重危险存在:如果准许党员或支部在没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竞选的地方把票投给较好的候选人,那就会为相邻的选区达成合作协议开辟道路;根据这种协议,自由党人就会建议他们的支持者在某个地方投劳工候选人的票,以酬答另一个地方的互惠行动。如果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在某些地方拒不投票选举自由党-劳工派的候选人就行不通了,而独立工党和自由党-劳工派的鲜明界限也就有遭到破坏的危险。独立工党的领袖之间意见相当分歧,以至“第4条”不能列入党章,但是在1895年,拥护“第4条”的人占了上风。独立工党党员得到准许和鼓励,可以把票投给社会民主联盟或其他独立的社会主义候选人;1900年,罗契台尔甚至有一个候选人是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联合提名的。独立工党的“第4条”政策以及作为正式方针而采取的较宽的政策,都是由于下定决心不同自由党人或在自由党的赞助下出而竞选的工会人物打交道才提出的。

尽管独立工党在选举方面采取了这种坚决的态度,但就它的当前纲领和政策而论,它从一开始就肯定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第4条”的主要鼓吹者布拉奇福德,在曼彻斯特区的独立工党制定这一条款时,就兼任曼彻斯特费边社主席,他就直言不讳地抨击社会民主联盟的革命观念。他坚决认为,革命即使是可以实现的,也不可能带来好处,因为社会主义者根本没有准备好用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教育为建立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备条件是极端重要的;他对赢得议会席位远

不如他对进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宣传那样感兴趣。事实上，独立工党内部的真正分歧在于，一方面有人主要从议会议席的得失来考虑问题，而另一方面则有人怀疑，在社会主义者还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舆论作后盾，足以防止他们受制于议会的传统和竞选的紧急需要的时候，就把他们送进议会是否明智。威廉·摩里斯在创办社会主义联盟的时候就有类似看法，认为竞选议会议席的时机还不成熟。独立工党的左翼在看法上并没有走得那么远，因为其成员大都承认必须走渐进的道路。不过他们对议会中的妥协作法是颇具戒心的，因而坚持他们的候选人必须坚决保证不同其他政党进行任何联系，不同他人成立任何可能损害社会主义的纯洁理论的竞选互惠协议。然而，他们对市政活动的腐化影响却远没有那么大的戒心，尽管在这方面他们也坚决反对同任何非社会主义者达成竞选协议。比如说，布雷德福市政工作的先驱人物弗雷德·W·约维特(1864—1944年)就曾对下院的工作程序同市议会的工作程序作出严格的区别，后者的行政委员会中就有各党派的成员进行合作。他非但不认为地方政府的委员会制度具有一种危险的趋势，会在日常的行政合作中模糊党派的界限，反而维护市政制度，认为它比全国议会的制度要优越得多，并且要求议会按照市政制度进行改革。不过，他也坚决反对党派间在市政上达成协议，其程度就象他反对党派间在议会中订立协议一样。所有的独立工党领袖都认为，将来的重大任务是教育工人阶级严格遵守政治独立的理论。

在1893年的布雷德福会议上，一部分代表希望在新党的名称中加入“社会主义”字样，其中为首的两人是苏格兰代表，一个叫乔治·卡森，另一个叫罗伯特·斯米利(1857—1940年)，后者是矿工联合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杰出人物。大会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否决了这个建议，但独立工党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这一点是决没有任何怀疑的。布雷德福会议曾明确规定党的目标

是争取实现“一切生产资料、分配资料和交换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决议最初用的字眼是“集体或公社所有制”；但“或公社”等字样含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味道，显得很不当，后来被删掉了。约翰·林肯·马洪(1866—1933年)曾力图说明，党的目标不过是“确保劳工的利益在公共机构中享有独立的代表权并得到保护”，而无需承担宣扬社会主义理论的义务；马洪的这一企图遭到了惨败。另一项决议规定，所有独立工党候选人在当选以后有义务同“社会主义独立议会党团”的多数进行合作，“以谋取劳工利益，而不必考虑这样做对任何党派是否适当”。

就社会主义作这些说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些说明使新成立的党充分保证把全面社会化当作最后目标。事实上独立工党认为，唯有作出这种保证，才能把它的追随者同“自由党-劳工派”和旧式的工会主义者鲜明地区别开来。就本身的信仰作这番说明，党就可以放手集中大部分力量来提倡当前的主要社会改革，特别是8小时工作日制、劳动或维持生活的权利以及法定的最低工资限额。在开始阶段，8小时工作日制是坚持最力的要求，同时提出的还有如下要求：政府当局应采取措施减少失业人数，保证改善失业者的待遇，特别是市政当局和济贫机关应作此保证。关于改善住宅、改良教育、为儿童提供医疗照顾以及向在校儿童供给午膳等要求，在独立工党的地方宣传中也赫然出现了。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独立工党宣传家，在鼓吹有别于破坏性地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改革时，往往把如下两种改革区别开来：一种是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实行的改革；另一种是他们认为除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无法实现的改革。因此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完全有可能为某些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并以足够的温饱条件维持其余失业者的生活。但是他们却把失业现象本身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现象。比如说，清

除贫民窟而不对贫民窟的地主提供偿金，并由市政府来建筑住宅，就可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要整个消除工业城市的污秽和令人厌恶的环境，就必须以那种共同努力追求美好生活的制度去取代追求利润的动机。但是究竟哪些改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现，哪些改革又无法实现，却始终没有划出明确的界线。原因是这样的：既然进行次要的改革就可以作出这么多事情来解除贫困，既然社会主义者又没有及早实现重大结构改革的希望，于是这条明确的界线也就无需划出了。说来奇怪，在这种情况下，空想主义居然在改良主义者中间重新抬头；这批改良主义者一面发起运动，反对某些具体的弊端，并要求采取相当温和的措施来进行立法或行政改革，一面又在勾画乌托邦的图景。 159

虽然布雷德福大会把社会化当作衡量新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但是鼓舞党的力量却是伦理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当时所强调的是穷人的苦难，也就是社会成员中的弱者所遭受的本来可以避免的苦难。很大一部分人民在污秽和贫困的条件下过着半饥饿的生活，这些情况被揭发出来以后，使组成独立工党的男男女女感到非常愤慨，而1889年非熟练工人的骚动就象一根火柴，把这种受苦受难的经历燃成熊熊大火，照亮整个社会舞台。独立工党党员有志为“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者”进行斗争的心情远比他们愿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行斗争的心情更为迫切。他们对熟练工人改善本身处境的努力并不非常关心，当然每当这种工人卷入罢工或闭厂拒工的斗争时，他们总是给予支持。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大批加入新工会的被压迫者，以及这批转变态度投入共同斗争的人所出身的那个庞大的阶级。他们十分愿意相信费边社社员告诉他们的话：社会化的工农业的效率将怎样大大超过现在，人人都参加的集体劳动又将如何轻而易举地生产出足够所有人享用的东西。但是，他们之所以需要社会主义，说到底，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的

效率高,而是由于社会主义能带来社会正义。

毫无疑问,自由党-劳工派也需要社会正义,而且是从道德出发而信仰自由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新工会主义者的政治观点,把非熟练工人的特殊要求放在首位,他们在每一点上都强调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事务。自由党-劳工派所代表的大都是已经具
160 备完善的组织的行业集团,集体协议的权利已经得到了相当可靠的承认。他们主张对不劳而获的收入征收重税,特别是对地主和那些没有真正参加生产的其他有钱佬的不劳而获的收入征收重税。但是他们直接争取的主要目标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这种目标使他们同激进派结盟而不是同支持新工会运动的人结盟。新工会主义者和自由党-劳工派都希望自己同资本主义工业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得到更充分的承认。但是,“旧”工会主义者要求这种权利是为了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利益,而不是对整个工人阶级施行一种“新政”。另一方面,“新”工会主义者感到不能忍受的是,非熟练工人要求同熟练工人居于平等社会地位的权利由于受到某些限制而被否定了;新工会主义者认为,出于非熟练工人的更加迫切的人生需要,无论如何也应该特别支持他们的要求。与此同时,独立工党党员也迫切希望不去重犯社会民主联盟的错误:不必要地冒犯那些跟自由党-劳工派领袖有所不同的旧工会会员。事实上,独立工党有很大一部分支持来自旧工会中比较年轻的会员。独立工党党员大都坚信,必须把矿工和棉纺工人等久已确立的集团争取到独立工党方面来,如果可能,还要把它们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而矿工和棉纺工人也需要通过立法去加强他们的谈判实力。独立工党有不少态度积极的党员同旧工会有联系,并为开展新工会运动和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在旧工会中进行斗争。这些态度积极的党员曾在非熟练工人中帮助建立新工会,即使在那时他们的目的也不在于建立一个同旧工会分庭抗礼的敌对

工会运动，而是要使旧工会接受新思想，并向旧工会会员证明：他们的真正利益并不在于无视技术不断变化的形势仍然坚守自己的垄断地位，而在于团结非熟练工人共同投入一个运动，以确立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最低标准，要坚信这些受压迫者在这方面越是得到提高，工人和资本家在工业收入中的分配额也才会普遍得到改善，国家越是干预最低标准的制定工作，雇主就越是没有办法利用非 161 熟练工人去破坏熟练工人工会的集体谈判力量。

当初，社会民主联盟往往不仅指责旧工会的自由党-劳工派领袖，而且也指责工会本身，说它们违反整个工人阶级的愿望，是宗派垄断的化身；而独立工党人士则在指责这些工会领袖的同时，着手拉拢这些工会的成员，并且向他们提出了一份道德感染力和经济吸引力兼而有之的纲领。这份纲领没有提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而只是集中提出一些要求，保证不仅在“革命”以后、而且在眼前就会取得成果。这样一份纲领不仅打动了工人，而且也打动了中产阶级的同情者；这些同情者出于社会正义愿意出来支持他们，但是不愿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而抛弃基督教道德，他们受过培育，把这种道德当作社会行为的必要基础。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独立工党的领袖中工人和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杂然相处。除了哈迪担任主席以外，1893年成立的原全国管理委员会包括这样一些人：彼提·古朗(1860—1910年)、爱德华·爱威林(1851—1898年)、布雷德福的W·H·德鲁、格拉斯哥的乔治·卡森(死于1923年)、约瑟夫·伯吉斯(1853—1924年)和凯瑟琳·圣约翰·康威(1868—1950年)。后者是詹姆斯·布鲁斯·格莱西尔的妻子，毕生为独立工党的社会主义工作。管理委员会的书记原是詹姆斯·肖·马克斯韦尔(1855—1928年)，1894年由汤姆·曼恩接任；本·提勒特和曼彻斯特的弗雷德·布罗克赫斯特(1866—?)在同一年加入了委员会，但提勒特不久就退出

了。R·M·潘克赫斯特博士（死于1898年，系妇女参政运动领袖、独立工党积极分子埃米林·潘克赫斯特的丈夫）于1896年当选为委员会委员。这一年，詹姆斯·腊姆齐·麦克唐纳（1866—1937年）在一个议席的竞选中是得票次多的竞选者，1897年他赢得了那个议席。1898年，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和詹姆斯·布鲁斯·格莱西尔（1859—1920年）当选为议员。菲利浦·斯诺顿（1864—1937年）到1899年才当选，F·W·约维特（1864—1944年）到1901年才当选。哈迪担任主席到1900年，后由格莱西尔接任。1903年，斯诺顿接替了格莱西尔，1906年，麦克唐纳又接替了162 斯诺顿。1897年，曼恩不再担任书记，接替他的是普雷斯頓的约翰·彭尼（1870—1938年）。总的说来，委员会中的中产阶级人数增加了，随着斯诺顿和麦克唐纳的出现，它的影响无疑也大大加强了。当然，大多数地方领袖仍然是工人，而大会的代表也多半是男女劳动者。独立工党从一开始就有一批实力相当雄厚的中产阶级支持者，它的大多数支部至少也有一些这样的人。独立工党的论调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在工业地区能够吸引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主体的是独立工党，而不是社会民主联盟；费边社则主要是伦敦人组成的，它的社员主要来自自由职业者而不是整个中产阶级。

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麦克唐纳还是斯诺顿，在独立工党的开创阶段并不活跃。开始时，哈迪几乎具有不容置疑的领导地位，主要助手是曼恩和古朗，有一个时候还有提勒特。1893年，该党选出了一个庞大的委员会，但是由于经济原因，第二年又把人数削减了。此后一直维持较小的规模，直到1906年才再次扩大。除了全国一级的工作人员以外，选举都是按地区进行的；地区机构在维持地方各支部的团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独立工党最初几年的进展相当缓慢，原因是新工会运动正好在它建立的时候开始衰落，使它受到了影响。然而它毕竟在年轻的工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受到时代

精神感染的青年中吸收了一批党员，这批党员虽然谈不上人数众多，但至少可以说很有影响，而且他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人数。

在初期，独立工党的巩固据点在克莱德河上的兰开夏和约克郡以及西部的苏格兰煤矿区。它在其他地方，比如莱斯特和诺丁汉，也有少数坚强的组织。它在伦敦的力量并不很强大，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它在威尔士才开始有追随者。特别是在兰开夏和伦敦，社会民主联盟同独立工党对立，在苏格兰双方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对立。当然，这两个组织始终没有成为大党，无法同德国或奥地利的党相比拟，甚至连比利时或法国的党也比不上。

(IV) 罗伯特·布拉奇福德和《时代号角报》

163

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跟法国的运动不同，没有出现什么杰出的新闻人才。凯尔·哈迪虽然一生大部分时间干这一行，但是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多大才能。他的《劳工领袖》笔调总是非常严肃，没有多少幽默感，只有在他非常感动或者叙述童年的轶事时，他的作品才略有起色。威廉·摩里斯是不得已才搞新闻工作的，他的《公益报》确有佳作，但决算不上一个好刊物。哈里·奎尔奇在社会民主联盟的《正义》上发表过词锋犀利的抨击文章，但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鉴别力。约瑟夫·伯吉斯所办的《工人时代报》对于发动支持独立工党的热潮起了很大作用，但他是一个文笔粗糙的作者，无力取得读者的好感。安妮·贝赞既有新闻才能又有讲演才能，在布莱德洛所办的《全国改革者》上对新闻事业作出了主要贡献。她在《连锁》上显示了从事社会主义写作的才能以后就退出了运动，成了见神论和印度民族主义的鼓吹者。除非我们把肖伯纳（他在确立剧作家的主要地位以前，多半是靠写音乐和戏剧方面

的评论文章而获得地位的)也计算在内,否则在我们目前所讨论的时期内,就只有一个人主要以社会主义新闻记者出名,并且靠写文章而不是靠讲演在政治上赢得许多追随者;这个人就是罗伯特·布拉奇福德(1851—1943年),他所办的《时代号角报》创刊于1891年,经过许多曲折变迁,一直发行到1935年。

布拉奇福德所著的《欢乐的英国》,最初是在《时代号角报》上连载的,销路远远超过当时的其他社会主义著作。《虚无乡消息》——当然还有《费边论文集》——的销路同它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在英国市场上,这本书甚至比亨利·乔治所著的《进步与贫困》——最足以同它竞争的对手——还要多销许多册。这本书的一便士版本也许是销数如此巨大的部分原因。但是在考虑出这种版本以前,它就已经证明是很有吸引力的了。事实上,甚至在写出《欢乐的英国》或是创办《时代号角报》以前,布拉奇福德就在大众新闻的写作方面具有独创一格的地位。

164 就社会出身来说,罗伯特·布拉奇福德出身于“无从划分的阶级”,而不是出身于工人阶级或者中产阶级。他的父亲是一个游方喜剧演员,在他两岁的时候就死去了;他的母亲是一个女演员,一个意大利血统的剧作家的女儿;这位剧作家在少年时代曾以海军见习生的身分参与尼罗河战役。罗伯特·布拉奇福德在童年时代随同母亲和哥哥浪迹四方,从一个剧院到另一剧院。当他11岁、他的哥哥蒙塔古13岁的时候,布拉奇福德夫人在哈利法克斯定居下来,当裁缝为生。罗伯特·布拉奇福德14岁进刷子行当学徒,一直干到20岁。后来他逃到伦敦,有一个时期靠干零活糊口,1871年参了军。他在军队里呆了6年,升到军曹。经过一段暂短的间歇以后,他在诺思维奇的韦弗航运公司当记时员。那是1878年的事。1880年,他同相爱多年的情人——哈利法克斯的萨拉·克罗斯利结了婚,以后终生钟情于她。

布拉奇福德从军的经历是他成长的主要原因。他原是一个相当富于幻想而勤奋好学的青年，对粗暴行为避之唯恐不及，在社交场中显得很腼腆。但是他却喜欢军队中的那些战友，尽管他们好酒贪杯、庸碌无能，把摩西十诫大都置之脑后。他退伍时深信不疑，一般所见的男男女女都有一颗纯洁的心，他抱着一股热忱，立志从事启蒙工作，解除他们在知识上的蒙昧状态，而不自封高明或冒充学者。从此以后，他总是把平民——特别是工人——看作是穿便衣的军人，而原谅其中最不体面的人所犯下的过错，因为他把这些人当成军人看待了。他描写军人和军营生活的文章最为出色，也最自然。他在自传中对军营生活所流露出的爱好远远超过了他对自己为社会主义所作的全部工作。他的社会出身、童年的贫困遭遇、以及那一段军人生涯，这一切都使他深切同情“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者”，而不是同情体面的工人阶级。他在私生活中是一个最值得尊敬的人，但是他对那些把体面当成一种美德的人却往往非常厌恶。这种看法使他在那些原先接受非国教教义并具有非国教思想方法的古板社会主义者当中，得到了邪恶的使徒的恶名，但是除非把同情有罪的人和痛恨自以为善良的人也算一种罪恶，否则他便是清白无罪的。 165

布拉奇福德的写作尝试最初是从军人的故事和随笔开始的，他早期写的报纸文章发表在英格兰北部无名报纸的幽默栏中。当他同曼彻斯特的新闻记者兼剧作家亚历山大·马托克·汤普森（1861—1948年）会见时，他的机遇就来了；汤普森立刻成了他的挚友和仰慕者。汤普森在爱德华·赫尔顿所办的《体育纪事报》的编辑部工作，在赫尔顿买下了发行多年的体育报纸《贝尔氏伦敦生活报》的时候，布拉奇福德便通过汤普森在该报得到了一个职位，而放弃了他在韦弗航运公司的工作。后来赫尔顿创办《星期日纪事报》，布拉奇福德最初为该报写社论，后来又写特写，这使他出了

名。说得确切一些，这些文章使布拉奇福德所署的笔名“从不”（“Nunguam”）出了名。这个笔名原来本是“从不昏睡的人”（“Nunguam Dormio”），是从《贝尔氏生活报》以前的一位作家那里借来的。在1885年创刊的《星期日纪事报》上，布拉奇福德不再为幽默栏和体育栏撰稿，而改写社会问题的文章。他强烈地为那些受到社会制度残害的孤苦无告的牺牲者辩护，尤其是为贫民窟的儿童辩护；他还为这些儿童成立了一个“灰姑娘俱乐部”^①，给他们东西吃，让他们玩游戏，而不进行道德的说教，免使他们感到扫兴。当他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他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但是，他阅读威廉·摩里斯和亨利·乔治的著作以及社会民主联盟和费边社的出版物，受到了影响，逐渐改变了立场。对他产生更大影响的是，他访问了曼彻斯特的贫民窟，同时自由党和托利党的辩护士为当前制度所作的辩解也激起了他的反感；最重大的影响莫过于他同亚历山大·汤普森以及不久之后追随他创办《时代号角报》的那批同人所建立的友谊。事实上，他所经过的历程也正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最后几年许多男男女女所经过的历程；他的思想的全面转变来得恰如其时，使他能够在煤气工人和码头工人的反抗运动的骚乱中宣布自己的信仰。第二年，他奋然出面支持曼宁汉纺织工人的罢工^②，这一行动使他被邀作为布雷德福劳工联合会的独立劳工候选人竞选布雷德福的议席。他非常不安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演说的才能，而且也很不愿意参加议会的斗争。

布拉奇福德同《星期日记事报》的关系到1891年就告终了，这一年，赫尔顿由于不喜欢社会主义，终于对自己的主要撰稿人的顽

① 灰姑娘是欧西民间传说中受继母压迫在灰堆里拾煤渣的美丽姑娘，后来经神仙搭救嫁给了一个王子。——译注

② 见本卷第159页。

强态度表示反对。布拉奇福德拒绝改变自己的论调，辞去了待遇优厚的职务，暂时在伯吉斯的《工人时代报》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汤普森和爱德华·弗朗西斯·费伊（1854—1896年）同他一道辞了职，同时还把 R·B·萨瑟斯（1870—1950年）带走了；费伊是《时代号角报》集团中的“粗鲁的人”，萨瑟斯当时是一个办事员，后来撰写通俗社会主义宣传品出了名。他们当时几乎是分文莫名，因为布拉奇福德刚刚为演出一个自己所写的剧本而贴光了积蓄。但是他们在 1891 年 12 月毕竟出了《时代号角报》的创刊号，当时他们想得天花乱坠，而计划却独付缺如。销路一开始的时候比较广，后来稳定在 3 万份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可观的了，但还不足以带来很大利润。创办人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汤普森继续以写剧本为生，其余的人也部分地依靠他赚来的钱维持生活。1892 年初，布拉奇福德放弃了他的议员候选人资格，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花在这方面，于是正当独立工党成立的时候，他却定下心来从事编辑工作。

常常有人说，罗伯特·布拉奇福德所办的《时代号角报》所争取到的社会主义信徒，比凯尔·哈迪的独立工党所争取到的多得多；人们还说，最初发表在该报专栏中的《欢乐的英国》是自有社会主义通俗宣传读物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品。这两种说法显然都无法得到证实，只是人们的看法而已。然而有一点倒是毫无疑问的：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罗伯特·布拉奇福德是最受欢迎的社会主义作家，声誉远远超过其他人，他的读者比肖伯纳或威廉·摩里斯的都要多得多。后者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和特殊的工人有吸引力。凯尔·哈迪也有大批人拥护，但他主要是通过演说得到拥护的，从 1892 到 1895 年则是由于当了“代表失业者的议员”而得到拥护的。

布拉奇福德不是一个演说家，他出现讲台而能免遭失败，完全是因为他的著作使他成了一个很受欢迎的英雄；不管他说什么，他

的听众总是十分高兴地向他欢呼表示响应，哪怕演说的大部分内容根本没听到也是这样。他掌握一种艺术，善于同读者建立亲切的个人联系，纵使读者从来没有见过他也是如此；因此，只要能见他一面，也就成了一种值得怀念的经历。此外，他在《时代号角报》的集团中虽然是无与抗衡的左右一切的人物，但是他却有那种本领，能用他个人的作风去打动忠心拥护他的那一批合作者，因此《时代号角报》集团的全部撰稿人都成了读者的朋友，读者把他们当兄弟一样看待，怀着十分赞同和兴致勃勃的心情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古怪的行径。读者和作者成了一个共同团体的伙伴。这批伙伴感到无比喜悦，因为他们正在心情激奋地共同工作，要向自己和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者远远不是那种一心要为共同的利益而限制个人自由的不通情理的家伙，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知道怎样享乐，怎样欢欣鼓舞地揭示，当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时候，“欢乐的英国”就会成为人所共有的财产。

布拉奇福德作为一个作家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但是就社会主义思想的一般意义来说，他对这种思想的贡献却几近于零。他既不是一个理论家，也不是一个策划者；他对社会主义理论既没有贡献任何创造性的思想，也没有打算作出这种贡献。在这类问题上，他是一个大众化宣传家，他把别人的思想整理出来，使得一般男女一看就懂；对肖伯纳的微妙笔触或悉尼·韦伯探究事理的逻辑严谨的论断，甚至对威廉·摩里斯那种比较感人但本质上仍属文学和艺术的风格，普通的男男女女都无法产生共鸣。事实上，布拉奇福德的社会主义思想来自他深为推崇的摩里斯的成分比任何其他人都多；但是摩里斯的美好生活的概念到了他的手里，就变成了“奥德姆^①的约翰·史密斯”更加容易理解的东西了。这位

① 曼彻斯特东北部的棉纺业中心。——译注

“约翰·史密斯”是一个假想的工人，为人正派，心地善良，但是所知不多，思虑也有欠精细；布拉奇福德讨论“欢乐的英国”的公开信正是以这种工人为对象的；这本书发行了上百万册，得到这本书的“约翰·史密斯”必然远远超过得到任何其他社会主义著作的人数。¹⁶⁸

布拉奇福德的创造性并不在于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在于他坚信不疑，凡是 he 感兴趣的东西都能使“约翰·史密斯”十分感兴趣，从而使启发诱导全人类的工作成为实际可行的事。当他创办《时代号角报》的时候，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在短短的几年内使英国的工人阶级都信仰社会主义。这当然是过分自负的想法，即使他远远超过自己实际所达到的程度，是一个伟大得多、说服力也强得多的著述家。但是，由于他恰好在适当的时机全力以赴，他确实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即使后来他发现自己能鼓舞人而不能同样地领导人，因而感到灰心丧气，他的著作仍然是站得住脚的；尽管他后来认为连自己著作中的精华也不值一顾，悲叹自己竟然听任自己的宣传家素质压倒日夜渴求的文学家的素质，情况也仍然是这样。

布拉奇福德虽然没有赋予“约翰·史密斯”以聪明才智，但是在向他发表公开信的时候也决没有把他当成趣味庸俗或蒙昧无知的人。布拉奇福德指望他在旁人唤醒他注意政治对他自己和对他的伙伴的生活发生什么影响时，能够认真对待政治；此外，还指望他能对美的吸引力发生反应，不仅能看到环境的丑恶，而且能看到那些当作美好的事物提供给他的东西，大多是徒有其表的浮夸。他对大自然的美当然应该爱好，同时也当然应该认识到扩充和加深自己理性和审美的感受能力是十分重要的事。事实上，布拉奇福德最不可能让自己去迎合一般人的庸俗趣味，总是设法使“约翰·史密斯”欣赏布拉奇福德自己所欣赏的事物，并且使他争取更多的

机会去享受明智的人所想望的东西。布拉奇福德自己爱好文学和纯理论的东西，他喜欢书，他的趣味非常广泛，对亨利·詹姆斯、狄更斯·莎士比亚、布朗宁和华尔特·惠特曼都很崇拜。实际上，布拉奇福德对文学的志趣远远超过他对政治的志趣；他卷入政治是同他的本性大相违背的。在他的手札中充满了感叹之词，埋怨自己被迫写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文章，而不能发挥自己写小说或其他文艺性比较强的作品的才华。

布拉奇福德把《欢乐的英国》的读者“约翰·史密斯”设想成这样一种人：此人尽管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是能够象他自己一样发展有素养的鉴赏能力和知识方面的兴趣；此人也能从事政治活动，这倒不是由于对政治有什么爱好，而是感到起而削平一切不平之事是对自己的义不容辞的号召。这是一种履行普通义务的号召：消除人类一切可以消除的疾苦以及腐蚀人类品质的弊端。这是被周围的悲惨现象所激怒的理想主义者对自己的理想主义所发出的号召；布拉奇福德相信每个正常的人身上都存在这种理想主义，因为不管他在一些著作中曾怎样极力坚持人的性格完全是环境的产物，同时指责当前的社会环境是造成卑鄙和邪恶行为的根源，他都无法想象其他人就其本质来说跟他自己有多大不同，或者对使他深受感动的东西无动于衷。

布拉奇福德参加费边社时就是社会主义者，并且多方利用费边社论文所提供的材料攻击资本主义和收入分配不当的现象。实际上，他的社会主义基本上是温和的，尽管在他看到苦难和公然违反正义的事例而感到义愤填膺的时候，往往会用很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欢乐的英国》，后来在《英国人的英国》和社会主义小说《魔术店》中，他详细说明了一个理论：集体所有制是使分配公平，使生产力提高的必要手段。但是，关于将来怎样管理社会化的公用事业的问题，他却很少谈到，只是说有些公用事业要进行国

营,但是大多数事业最好由地方来管理,这恰恰是《费边论文集》所提出的意见。同费边社员一样,他对扩大市有企业寄以很大的希望,并且坚信国营公用事业由于没有利息和利润的负担,取价很容易比资本家对手低廉,并将享有大规模经营的全部经济利益,而不会考虑采用限制性办法去保持高昂的价格。布拉奇福德觉得那些“约翰·史密斯”集体地为自己劳动时,无疑会感到更加满足,也会劳动得更好。关于生产者实行工业自治这类的问题;他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集体主义者,毫不怀疑,生产效率低是竞争所造成的浪费以及资本主义垄断的限制作用所造成的;他也毫不怀疑,在最多不超过8小时的工作日的限度内,就完全能生产出足够所有人消费的产品,不久以后工时数还可以大大减少。 170

布拉奇福德还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使他同那些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相信自由贸易有若干优点的社会主义者发生了齟齬。他坚持这样一种见解:每个国家都应该能养活自己的人口;并依靠自己的生产来满足自己的大部分需要,对外贸易应该减少到很小的程度。他讨厌大工业城市,喜爱农村的美,确信工厂制度会损害健康和幸福,而且会破坏美;他完全相信,只要土地利用适当,并且应用现代的集约耕作技术,英国很容易养活它的全部人口。他一再不厌其烦地援引克鲁泡特金和当时已被人遗忘的其他权威人士的有关言论;有人反驳说,输入粮食要比在国内生产更多的粮食便宜;他回答说,粮食的价格并不是最后的标准,在看到这种便宜的同时,还必须想到那些不得不生产出口物资以偿付粮价的产业工人的悲惨境遇和恶劣的健康状况。他还谴责说:竞争性出口贸易的后果是驱使每个先进国家的产业工人去压低其他国家中的工人兄弟的工资;资本主义出口贸易的趋势是牺牲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利益去培植帝国主义。最后,布拉奇福德常常提出一旦发生战争

就有挨饿的危险这一点为理由，坚持自己所主张的英国在粮食方面应该自给自足的论点，因为他在看到德国特别可怕以前，早就习惯于从军人的角度去看问题了。

实际上，布拉奇福德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其出发点主要是“欢乐的英国”和一个由自由的集体主义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世界，所有这些国家都能依靠自己的资源独立生活，所交换的仅仅是遇必
171 要时就可以弃而不用之的剩余物资或奢侈品。他所设想的大规模生产的好处往往以国界为限；他认为国际贸易同各国之间的对立竞争，同一个国家剥削另一个国家的现象是分不开的，这在每个国家内也会导致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国家观，无疑也是他的公开信对其读者“约翰·史密斯”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原因，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所关心的主要是“英国人的英国”，而远远不是如何把全世界整顿就序，尽管他们随时准备热情欢呼国际工人阶级兄弟般的情谊万岁。

布拉奇福德在早期的著作中，包括早期的《时代号角报》和《欢乐的英国》在内，关于个别基督教徒的恶行劣迹写得很多，而关于基督教本身却写得很少，至于反对基督教的意见则只字未见。然而到了后来他却卷入了有关宗教问题的激烈争论。开始他毫不含糊地站在那些否定基督教神学的真实性的人一边。接着他又转而支持另外一些人，这些人以严格的决定论为基础，攻击那种坚持人类要对自己恶行负责和犯罪必遭天罚的整个概念。布拉奇福德的这些理论主要是在两本著作中加以发挥的：一本是《上帝和我的邻居》（1903年），另一本是《没有罪：为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者呼吁》（1906年）。在这两本书中，他主要谈的是社会的宗教和宗教信仰方面。在《上帝和我的邻居》一书中，他虽然一开始就说他不相信基督教是真实的，但是他最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否认上帝有权不根据一个人本身的过错，而根据据说是由万能的上帝本身所

创造的世界的过错来惩罚人的罪。他的话是这样说的：

(一) 关于上帝的问题：如果上帝不存在，如果上帝并不是一个能够回答我们的祈祷的慈爱的天父，那么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就不能存在。

我并不是要说是否有一个上帝存在，而只是否认有一个能回答祈祷的慈爱的天父存在。

(二)和(三) 如果自由意志不存在，那么人就不可能对上帝犯罪，因而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就不能存在下去。

我否认有自由意志存在，也不承认人有可能对上帝犯罪。

(四) 如果耶稣基督对人类的“得救”并不是必需的，那么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就不能存在。

我认为人类要得救而不下地狱或不犯罪，并不需要基督。

172

(五) 我并不断言也不否认灵魂是永生的。关于灵魂我一无所知。关于这一点，除了我自己所知道的以外，古往今来谁也无法告诉我更多的东西。^①

布拉奇福德的论点本身是十分简单的。他发现周围的环境充满了苦难和不平，同时他又听到那些自称为善良的基督徒的人说，这些邪恶的事必须当作上帝的意志来接受。他还听到他们颂扬上帝的父爱，宣称上帝是万能的。他不禁问道，如果上帝真正是慈爱而万能的，那么为什么上帝要使世界充满这种苦难和不平呢？如果上帝知道这一切，那么为什么他不立刻消灭这种现象呢？他听到基督徒指责犯罪，于是便问：如果上帝是万能的，为什么又要使人具有犯罪的天性，而不仅仅赐给他行善的动力呢？对于这些问题他找不到圆满的答复，于是便得出结论说：首先，我们并没有确

^① 引自《上帝和我的邻居》第122页。

实可靠的理由相信上帝是存在的；即使上帝果真存在，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是万能或慈爱的。他认为善良的人根本不需要得到神的宽恕；他也认为如果罪人之所以具有犯罪的天性是上帝造成的，上帝就没有理由去惩罚或者宽恕罪人。最后，正象罗伯特·欧文等前人一样，他断言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是不能负责的，因为他们的行为决定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他还断言，由于宇宙受着法则的支配，而人又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人的行为必然是预先决定了的，其情况就如同其他自然物体一样。由此可见，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人的行为是迫于环境的驱使而采取的。

根据这一切，布拉奇福德得出了宽宏友爱地宽容他人的道理，事实上他在把这番道理发展成为一种哲学以前，早就采取了这种态度。在军队里，他按士兵弟兄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他们；虽然他们的生活方式同他自己的不一样，他仍然喜欢他们；在他们惹出麻烦的时候，他就设法帮助他们，而不是对他们说教，或者去改造他们。在那个阶级，他已经感觉到，他们之所以成为那个样子是天性和教养造成的；而且认为，在他们作错事或者陷入麻烦的时候，教养应该比天性负有更大的责任。他曾想改造环境以改造环境的牺牲者的行为。十八世纪伟大的哲学家曾把一切流弊都归咎于违反自然的社会结构，并且设想只要人按照自然的律令改组他们的社会制度，一切都会好起来；正象这些哲学家一样，布拉奇福德也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样样事情都会好起来。

当然，这就使他面对这样一个矛盾的思想问题：如果人的行为是严格地受非社会主义的环境所决定的，那么劝人接受社会主义又能有什么作用呢？于是他便提出如下说法来摆脱这个难题：人的行为是受自我利益支配的，一旦能使工人理解社会主义的好处，他们的自我利益就会明确地指向社会主义。这样就必须承认：如果不理解什么对自己有利，人的行为就无从决定，而且启发人去认

识自己的共同利益，就可以影响人的行为。但是，正象其他相信必然论的乐观主义者一样，布拉奇福德也看不到这一点。他之所以看不到这一点，是由于他希望为那些作了错事的人辩护，说什么人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听任自己接受一种十足的必然论学说，这就使他自己说服同胞改邪归正的努力完全失去了意义。

在为上述必然论作辩护时，布拉奇福德本着当时的时代精神，曾大大利用了达尔文主义，也曾大力诉诸反对神学和唯心主义概念的科学。但是在往日的乐观主义精神减退了以后，他就越来越依靠决定论，并日益增多地利用理性主义的论点。当初，他非常希望能说服“约翰·史密斯”为他们本身的共同利益而采取明智的行动；这种希望越是减少，他就越是找一些话来安慰自己的呼吁没有取得成效。他断言，工人的主体对号召无动于衷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上帝和我的邻居》与《没有罪》这两本书，就是在布拉奇福德不再能以命定的社会救星自居，不再认为单凭一支笔不出几年就能使工人阶级完全改信社会主义之后写出来的。

在这种幻想消失以前，他曾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同劳工教会¹⁷⁴运动的创始人约翰·特雷弗(1855—1930年)密切合作；在很多热心的新人物纷纷参加工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那几年里，劳工教会运动在英国北部曾迅速发展。特雷弗曾在唯一神教会担任牧师，在他应邀前往曼彻斯特的一个非国教教会去以前，曾在伦敦担任经济学家兼牧师菲利浦·威克斯提德的助手。在曼彻斯特，劳工运动的新潮吸引了他，使他放弃了唯一神教的信仰，并建立了一个自由思想的劳工教会，在这种教会里，改信社会主义的人能找到一个共同相处的团体和一种同他们所放弃的非国教教会非常相近的礼拜仪式，以填补他们割断亲密的交往关系以后所留下的空缺。特雷弗为这批人诵读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以代替圣经；他请社会主义运动和新工会运动的倡导者发表长篇讲演以代替讲

道；他用大家所熟习的曲子填出劝善歌和颂曲以代替传统的赞美诗。不久，就另有一些教会以特雷弗的教会为榜样建立起来。威克斯提德和其他著名进步人士提供了帮助，一方面捐款，一方面到教堂去向新教友发表演说。为儿童而设的主日学校开办起来了；“教会”最初大都要租用会堂，后来就有了自己的房屋，这些房屋还作为聚会场所供许多其他劳工团体利用。特雷弗创办了报纸《劳工先知》(1892—1898年)作为运动的机关刊物。1893年，成立了劳工教会联盟来统筹地方教会的工作。这一运动蓬勃发展了几年，特别是在兰开夏和纽克郡，后来就开始衰退了，新的劳工教会不再成立，原有的一些垮了台。不过，有些教会存在了一个很长时期，甚至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也许还有少数几个一直存在到今天。是不是确实有，我不能肯定。我认为，这个运动之所以在最初几年以后就丧失了原动力，主要是因为皈依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新人不再象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老人那样迫切地需要它。社会主义和新工会主义一旦成为地位稳固的运动以后，参加运动的大多数人在精神上就无需再经历那个同过去截然中断关系的阶段。有许多人继续留在各种非国教教派的教会里，并把主日午后联欢会和兄弟联谊会(各个教派用以保持工人阶级信徒的组织)当作沟通政治与宗教的桥梁。还有一批人属于年轻的一代，他们抛弃了宗教仪式，同时又不感到需要另找某种东西代替它。劳工教会运动实质上是那场伴随新工会运动和独立工党的突然出现而发生的社会动乱的一部分；在那个阶段，布拉奇福德在共同的人道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能够同特雷弗密切合作。有一个时期，劳工教会和时代号角派的追随者大部分是兼有两重身分的。1889年以后那几年出现的热潮终于消失了，这两部分人也随之减少了。不过，事实证明时代号角运动比较持久，因为在人们对取代纯宗教的社会主义宗教的需要已经大部消失以后很久，时代号角运动的社交

活动仍然吸引着青年人。

如前所述,《时代号角报》于1891年12月创刊。翌年5月,已经担任曼彻斯特费边社主席的布拉奇福德和约翰·特雷弗联合组成了曼彻斯特区独立工党,在布雷德福会议以后,该党并入了全国性的独立工党。在这个阶段,时代号角派并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该报仍在摸索自己的道路,同读者交朋友,并为创办该报的集团培养一种集体性格。时代号角派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有组织的成分出现,是1894年出版了《欢乐的英国》一书以后的事。这一年成立了时代号角社童子军,时代号角社的第一个自行车俱乐部也在伯明翰成立了,此后又成立了许多个。1895年,第一辆时代号角社宣传车在马路上出现,这是抄袭亨利·乔治的追随者已经用过的巡回宣传法,但是主要的时代号角社宣传车运动是在许多年以后,即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才出现的。

《时代号角报》的那一批作家,除了罗伯特·布拉奇福德以外,还有这样几个人:他的哥哥蒙塔古·布拉奇福德(1849—1910年),他是诗人,也是时代号角社合唱队的主要推动者;亚历山大·汤普森,他担任很大一部分编辑工作,对待一切困难始终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爱德华·弗朗西斯·费伊,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豪放不羁的爱尔兰人,几乎能就任何事情写出讽刺幽默文章来,他完全不能有条不紊地作好任何一桩事,但是对侮辱和严厉攻击一切道貌岸然的人倒很在行。《时代号角报》在成立的最初几年曾痛遭社会主义队伍中的清教徒的非难,这主要是费伊造成的,而不是布拉奇福德或汤普森造成的。这个集体中的第五个人R·B·萨瑟斯最初只是办事员,但很快就取得了作家的地位。过了不久又有一批新人加入,诸如:朱莉叶·道芬(死于1947年),她是妇女版主编,尽管该报的创办人绝大部分是男性,她却使得这家报纸在妇女中很有影响;汤姆·格鲁姆,自行车俱乐部以及其他迅速扩大到工业区各地的辅

助组织的领袖。不久，阿尔伯特·尼尔·莱昂斯（1880—1940年）就带着他那些写得非常出色的描写下层生活的小说加入了，其中最优秀的作品是《阿瑟的生平》，写的是东伦敦的一个咖啡摊的故事。罗伯特·布拉奇福德本人最喜欢写书评，而不喜欢写政论。只有在他直接向“奥德姆的约翰·史密斯”发呼吁时是个例外；甚至连这些呼吁也不能长期使他感到满足。他更感兴趣的是写有关军人的小说，其中如《漂亮的姑娘》等的确非常出色；此外就是写他的军中生活回忆，后来他喜欢抓住有关人类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理论和基督教信仰中不合逻辑的地方进行攻击。

总的说来，时代号角派是一个个人色彩很强的集团，在新劳工运动中始终未能找到一个明确的地位固定下来。他们之所以同哈迪和独立工党领导方面发生分歧，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独立工党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而布拉奇福德则始终主要从国家出发，而且主要以一个军人的眼光去看问题。在他说英国能够养活自己的人口、并力主英国不依靠进口粮食的时候，他所强调的始终是一旦发生战争就有挨饿的危险。这使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感到恼火，他们认为这种论调很可能增加战争的危险并加强国家主义情绪；自由贸易论者也对这一点感到不快，他们对布拉奇福德悍然把国际劳动分工的主张抛到一边去的做法深为恼怒。最初，布拉奇福德的国家主义和军人观点并没有大大影响他对“约翰·史密斯”的号召力，事实上还可能有所帮助。但是当他在南非战争中反对布尔人的时候，时代号角社的一般成员中就发生了严重分裂，其中许多人认为对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进行战争是经济帝国主义的例证，因而支持反对这次战争的激进劳工分子。在费边社内，也发生了类似的分裂，肖伯纳所著的《费边主义和帝国》造成了好几次影响重大的退社事件。在恢复和平后，这些裂痕大部分愈合了；在二十世纪，当舆论发生了转变，从而为1900年自

由党的胜利打好基础的时候,《时代号角报》又恢复了它的影响,有一个时候甚至还大大扩大了它的影响。后来《每日邮报》指派布拉奇福德前往德国报道德国陆军演习的情况,他回到国内,深信德国有侵略的意图,而英国则没有对付侵略的准备。由于他的这种看法,更加严重的分裂终于发生了。他写了几篇文章,后来重印成小册子,名为《德国真相》(1910年);这本小册子销路很广,在工人阶级运动中受到了非常猛烈的抨击。独立工党和一大部分工党党员则无情地攻击他支持托利党,而没有考虑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是防止战争的工具。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是社会党国际中的领导团体,被推崇为世界上最先进和组织最良好的社会党;再者,布拉奇福德的“反德论”是得到报酬才在艾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所办的那家主张侵略扩张的《每日邮报》上发表的,因而就更加引起人们的愤慨了。

布拉奇福德和《时代号角报》在这一争论中受到打击以后就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姑不论布拉奇福德关于德国的说法是否正确,《时代号角报》的销路以及时代号角社和围绕在该报周围成长起来的其他辅助团体,总是要依靠劳工运动左派的支持,而不是依靠右派的支持。但左派即使不是积极的和平主义者,基本上也是国际主义者。虽然《时代号角报》的魅力十分强大,可以保持住热忱分子的核心,但是该报毕竟丧失了许多热忱较差的读者。时代号角派仍然继续进行社会活动,而且仍然拥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但是布拉奇福德实际上已不再写社会主义文章了,他的政治影响也消失了。《时代号角报》在原来的那批人(或其中留下来的人)的掌管下维持了下来,渡过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来费边社-工 178
党政治家欧内斯特·戴维斯接办了该报,企图把它办成一种认真讨论社会主义政策的报纸,但是始终未能恢复它的销路。最后,《每日先驱报》的出版者奥达姆斯通讯社接办该报,把它又恢复成

为一种通俗的报纸，旨在吸引广大的读者，后来由于打不开销路，终于在1935年停刊了。在停办以前，它早就无足轻重了。

布拉奇福德一直活到1943年，以92岁的高龄去世。但是他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几乎完全是在1889到1906年（自由党在这一年重新执政）这一时期作出的，也就是说主要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作出的。当时，他远比任何人都更加出色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新信徒最乐于响应的两种号召中的一个：高高兴兴地生活。凯尔·哈迪以及继之而起的腊姆齐·麦克唐纳和菲利浦·斯诺顿等人则提出了另一种号召：严肃地生活。有一些社会主义者，例如F·W·约维特，可以同时响应两种号召，但是这两个集团的领导人却始终不能相处。到了最后，清教徒赢得了胜利，这主要是因为当两个集团原先所共同反对的自由党—劳工派联盟于1906年以新的形式卷土重来时，独立工党远比时代号角社更易于适应新的局面。时代号角社——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反对单调生活，并为“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者”的利益主持正义的运动，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非国教教义的继承者，也不是有组织的工人要求工会权利的坚决支持者。

第四章

英国——工党和大动荡的局面

(I) 工党的兴起：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

H·G·威尔斯

在本卷前一章中，我们已经谈到，独立工党如何把海德门的社会民主联盟推向一边而成了主要的团结核心，新工会主义者纷纷来归，脱离自由党而以“社会问题”为政治活动基础的前自由党分子也日益增多地相继来归。同社会民主联盟一样，独立工党也自称是社会主义团体，但是它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它所提出的号召肯定是伦理性的；它的宣传主要以如下要求为基础：采取集体行动消除可以防止的人类疾苦和生命浪费，并且尽可能采取一切办法保证人人从小到老都有公平的机会，能够过上温饱而愉快的生活。独立工党最常用的口号是实行8小时工作制，制定最低工资限额和保障劳动权；与此同时，它还要求改善住宅和卫生条件，提供更好和更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男女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

独立工党类型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范围广泛得多的运动的一部分；后者大体说来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是极力反对工业社会明显积弊的运动，它特别反对这样一种鲜明对照的现象：整个英国社会的财富在迅速增长，而伦敦及其他大城市的大部分居民却过着骇人听闻的贫困和悲惨生活。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揭发这些现象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

180 年代，查尔斯·金斯莱和其他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梅休兄弟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曾揭露过，但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在那个时期，有两个因素不利于广泛地启发富有者的社会觉悟，也不利于从下层发动任何反抗运动。一个因素是生活景况的实际改善，这大体上并不是由于国家的干预，而是由于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显著有利的地位。当时，熟练工人的经济状况改善了，中层和中下层阶级的人数增加了，而且增加的人必然大部分来自下层阶级；此外，那些先后在欧文主义运动和宪章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团体的领袖又都退出了革命活动或准革命活动；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者”仍然处在悲惨的境地中的事实。饥饿的四十年代已经过去；熟练工人正忙于建立自己的工会和合作社，根本不大注意非熟练工人的悲惨处境，而中产阶级中有可能出面反抗的分子也不再感到形势逼人，需要对那批迫于饥寒起来造反的人表示同情和支持。情况看来相当好，根本不必为取得更快的发展而走向极端。总之，安然自得的情绪代替了前几十年对社会产生怀疑的态度。

第二个因素是有一种宗教观占了支配地位，它同欧文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主要强调每个人应当对自己的得救负责，并且使笃信宗教的人完全愿意把苦难看成是惩罚个人罪恶的神意安排。许多人的境况都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社会习惯也随之在改进，于是在奔向富裕繁荣和体面生活的竞赛中跑在后面的人便很容易受到责难，说他们的不幸是自己造成的；而在实际情况同这种论断显然不符的时候，就会退一步作出一个聊以自慰的结论：善良的穷人在来世总会以某种方式得到补偿。此外，按照流行的经济观念不难证明帮助穷人往往是弊多利少的事，因为这会损害他们自力更生和进行生产的意志，而这两者都是国家繁荣的依据。

在这里我们必须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会产生这

种情绪，而是为什么这种情绪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改变得如此迅速¹⁸¹。一个因素是在张伯伦背叛以后，自由党内的激进派的动力衰退了。另一部分答案就要到这样一种现象中去寻找：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出现了严重的失业现象，损害了人们对经济日益繁荣的信心，因为这一点使人们注意到有很大一部分城市居民过着极其悲惨的朝不保夕的生活，而且也很快使查尔斯·布思等统计学家着手提出事实和数字，令人信服地驳斥了人们认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罪恶的想法，并且使人们特别明显地看到穷苦儿童和老年贫民的凄惨状况。在揭发这些情况的同时，也鲜明地暴露了一大部分城市居民对教会疏而不亲的关系，实际上这部分居民已经疏远了他们同较宽裕的阶级的一切友好关系。在一个宗教意识很浓的社会里，这种疏远的感觉至少象揭露物质条件的贫困一样，也激发了一部分富有阶级以及工人阶级中一部分景况较好的人的社会觉悟。其效果是访问贫民窟竟成了一种十分时髦的事，足以影响部分大学师生，同时也促使工人阶级的许多鼓动者去组织非熟练工人，并再一次提出制定最低工资限额，实现有限工时制以及享有劳动权的旧口号。在同一种动力的驱使下，大城市的贫民区建立了布道团和新居民点，而约翰·伯恩士、威尔·索恩、凯尔·哈迪、赫夫洛克·威尔逊和汤姆·曼恩等人也展开了组织新工会的活动。动力是一样的，它是一种强大的伦理性动力，在一个不仅自称充满基督精神，而且自夸所掌握的创造财富的科学和技术雄居世界首位的社会中，这种动力驱使人们起来清除他们认为人所不能容忍的积弊。

总之，动力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从中产生的思想和政策却大不相同。就帮助激发自己的同胞的社会觉悟的大多数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来说，他们就没有考虑到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或没有阶级的社会。恰恰相反，其中大多数人的目的并不在于熔化各¹⁸²

个阶级，而在于恢复那些由于都市化和工业化的生活方式日益发展而遭到破坏的人伦关系，从而使各个阶级协调起来。对这些理想主义者来说，比方说，对托因比庄园居民点和其他居民点的创始人来说，贫民窟找不出高尚的人士担任人民的天然领袖是件很糟糕的事。他们把每个贫民窟都看成一个没有乡绅（如果这样说太生硬的话，就可以说没有具备高尚教养的男女人士）的村庄，人人都为日常生计而奔走，没有人可以承担穷人自己不能进行的救济和组织工作。正象俄国早期的民粹派曾经打算通过到农村去的运动来填补社会的鸿沟一样，这些理想主义者在阿诺德·托因比和托马斯·希尔·格林的启发下，也希望到贫民窟的居民中去，但是由于英国是一个已经走向政治民主，允许言论和结社自由的立宪国家，因而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以革命者的身分到那里去。他们以调和者的身分前去，如果不是一无例外，至少大多数都希望通过宗教（某种社会基督教）找出一种方法越过阶级障碍，重建社会关系。这些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政见，从托利党社会改革家到形形色色的伦理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自由党人，属于希望说服党认真对待社会问题，维护被压迫者的利益的那一派。这一运动的思想背景错综复杂，难以理解，在华尔特·贝赞爵士曾风行一时的社会小说《各色各样的人物》（1882年出版）一书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

以上所谈的主要是在比较古老的大学中所形成的振兴社会道德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新运动。当然，这只是范围非常广泛的潮流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全国各地有许多中产阶级集团都感受到了同样的动力在推动它们，其中主要是青年人，他们觉得社会正在号召自己去从事某种社会服务。其中有些人投身于这种或那种慈善活动，或是参加了地方公共团体的服务工作，这些团体大部分当时仍然不是以政党为基础选举出来的。有些人在自由党的地方

机构内找到了活动的机会，他们力图推动这种机构更全面地支持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纲领，还有较少的人成了“托利民主党人”。¹⁸³但是在各个地方，至少是在工业区，有一批实力坚强的少数人由于对两大党感到失望，倒向社会主义，成了独立工党地方支部的成员。就许多改信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有的在同旧政党决裂时就一并丢掉了宗教信仰；还有一种更常见的情况是，宗教信仰削弱了，但宗教情感中的道德动力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只是摆脱了他们同国教或非国教教会的关系。我们已经谈过，这种半脱离宗教信仰的人感到过去从宗教团体中得到的那种伙伴情谊必须继续保持。于是有人成了劳工或伦理性教会的教友，另一些人则在独立工党本身或时代号角运动中满足自己合群求友的伦理性要求。这样，在新成立的独立工党组织中便出现了一种阶级混杂的现象，这跟主要从旧大学中发起的自上而下的阶级调和运动完全不同，但又有其类似之处。因为在独立工党和时代号角报的组织中，不同阶级的成员（主要是较贫穷的中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和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是以平等的身份聚集在一起的，他们非但不谋求阶级调和，反而鼓吹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把需要当作分享共同劳动产品的首要根据，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当然，这两种越过阶级障碍而结成集体的方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人同时受到了两种动力的推动，因而感到左右为难，有些人则没有看出两种动力之间的差别。但是大体说来，差别是存在的。

就那些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人来说，他们往往认为自由党人已经没有什么指望，因为他们所组成的党是最极端的放任主义资本主义的党。一般说来，在工业中心，在自由党的资方同工会工人常常公开发生争执的煤矿区，这种感觉比伦敦、比主要由住宅区构成的城市，或者比农村，都要强烈得多；在后面这些地区，自由党经¹⁸⁴

常成为反对根深蒂固的保守党优势的主要力量。在这种地方，自由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往往结合在一起，因为两者都没有多大希望取胜，至少单靠自己没有希望取胜，大学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某些方面，伦敦的情况特殊，因为这里的自由党人和社会主义者曾经联合发起改革首都市政的运动。1889年，伦敦郡议会成立，改革首都市政的要求得以实现，这时就出现了强大的诱因，诱使原先进行合作以实现这一改革的集团团结起来，把成果拿到手。伦敦的新政府从一开始起，就必须在党派的基础上办事，这方面唯一的问题是应该有多少政党。如果自由党同劳工方面彼此斗争，其结果就几乎必然是托利党取得统治地位；然而只要联合组成进步派，而且团结一致，就十分有希望雄居首位。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保守党在全国当权时，由它组成的内阁就肯定会十分厌恶这一局面。这就大致说明了为什么——就伦敦郡议会而言——大多数劳工方面的人物都支持进步派，而各个地方的独立工党支部则力求使独立劳工方面的候选人当选为市议会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成员。这也大致说明了费边社为什么采取渗透政策，因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费边社（基本上是一个伦敦的组织）的主要渗透对象就是伦敦郡议会中的进步派。

在大多数工业区的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地方团体中，有很大一部青年男女积极分子正在转变态度，支持独立劳工代表权和伦理社会主义运动的事业，而且到处都有少数其他阶级的男女人士同他们携手共进。但是年纪较大的人的情况就不同了，其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坚守年青时代同自由党建立的关系；国教与非国教教会势力的衰退对他们的影响也要小得多。由于工会大都由这些年纪较大的人主持和领导，而合作社更是如此，因而社会主义者和新工会主义者想把工会和合作社整个争取过来支持独立劳工代表权的努力就没有取得多大成就。事情很清楚，要使工会或合作社作为

有组织的团体投入独立劳工运动，唯一的希望就在于不要求这些团体公开表示信仰社会主义，不把劳工独立的要求提高到让这些团体同自由党路线完全决裂的地步。当然，有些社会主义者完全不准备作出这种让步，认为作出这种让步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事业。大多数独立工党领袖完全认识到，没有有组织的工会的支持，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议会党团——实际上，要建立一个起作用的劳工议会党团——是存在种种巨大困难的；而且就这些独立工党领袖的基本思想来说，他们是伦理性渐进社会主义者，而远远不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因而认为很值得对凯尔·哈迪所说的那种“劳工联盟”作出许多让步。年复一年，哈迪及其集团一直在职工大会里埋头工作，力图说服它的所属工会建立一个独立于自由党路线之外的工党，而不是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他们终于说服职工大会责成其议会委员会为此目的而同社会主义者举行会议，但又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建立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政党，或者在一开始就坚持接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他们在道理上就说不过去了。再者，即使他们这样干了，也只会少数几个新工会加入这个党，而大多数工会则很可能被直接赶回自由党的怀抱中去。

事实上，1900年设立劳工代表委员会的那次会议虽然有很多工会代表参加，但一同被邀参加会议的合作运动的代表却坚持置身事外，而且有许多工会虽其代表投票赞成建立劳工代表委员会，事后却没有参加这个委员会。特别是矿工没有参加，他们通过地方组织一直保持着同自由党的联系，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在自己所控制的煤矿地区强制自由党-激进派联合会接受他们提名的候选人的办法取得了部分成功，同时也是由于矿工通过非国教教会同自由党建立的联系特别牢固。常常有人说，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命运之所以有转折是由于塔夫·维尔裁决，它使工会相信必须有自 186

己的人和自己的政党在议会中替自己说话。这项法律裁决判定铁路员工混合工会对于本身在一次罢工中使塔夫·维尔铁路公司遭受的损失付出巨额赔偿费。这显然危害了以罢工的最后权利为基础的整套集体协议办法；工会不得不采取自认为最可能起作用的行动去推翻这一裁决。要作到这一点有两种办法：一是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一是在自由党内大力推行一个运动，确保那些在这个问题上保证支持工会要求的候选人当选。实际上，工会两种办法都采用了，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诚然，就实现这个眼前的目的来说，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作法对工会无疑是再好不过的了。不过，如果说由于出现了塔夫·维尔裁决，工会运动除了转过来支持劳工代表委员会以外就别无其他办法推翻这一裁决，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塔夫·维尔裁决起作用的地方在于它加强了人们的如下想法，从而使人们支持劳工代表委员会，这种想法认为现存社会秩序在执法施政方面对工人是不公平的，建立一个独立的工党是消除这种偏向的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事实上，1900年的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成立时工会给予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成立后的第一年年底，该委员会所属的工会成员只有353,000人，而工会会员的总数则将近200万人，其中140万人属于职工大会。“新”工会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差不多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它们的会员人数并不太多，会员超过2万人的只有铁路员工混合工会和煤气工人工会，前者有会员6万人，后者有会员48,000人。在第一年加入委员会的工会中，会员超过2万人的唯一另一个工会是全国靴鞋业工人工会，会员共32,000人。矿工、纺织工厂工人、机械工人和锅炉制造工人等工会都没有加入，不过

187 机械工人和纺织工厂工人工会已经在考虑要加入；而且在此后的两年内，两个工会实际上都加入了。到了1903年，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工会会员人数增加到873,000人，矿工仍然没有参加，他

们通常在地方上的自由党-激进派联合会的赞助下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进行竞选。直到这个时候，这艘新船才可以说是已经顺利地下了水。

即使是这样，要组成一个政党还距目标很远。劳工代表委员会只是一个委员会，每个成员仍保留着处理自己的事务的充分权利。每个所属集团，不论是社会主义团体还是工会，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并自负竞选费用。当时根本没有一笔集中的基金去资助候选人，甚至也没有集中的经费去从事任何宣传或组织活动。委员会连一个纲领也没有，只是断言“任何一方，只要它当时正致力于制定直接有利于工人的法令”，委员会就愿意同它合作。当时也根本没有任何受委员会控制的地方组织存在。有一些地区虽然存在着地方劳工代表委员会或工党，可是全国性的委员会并没有承认它们的从属关系，也没有它们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会议。只有在地方工联理事会加入了委员会的那些地区，委员会才有正式的地方机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一部分是由于劳工代表委员会欢迎工联理事会参加，而工会则宁愿通过工联理事会、不愿通过更易于受社会主义团体控制的地方劳工代表委员会进行工作；另一部分原因是独立工党认为，地方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建立将威胁到它自己的地方机构的势力。这样，左右两翼便形成了阻力，把发展有效的选区组织的道路堵死了。

不久事情就很清楚，劳工代表委员会没有某种有保障的收入作后盾，就无法取得进展。1901年，这个问题就已经被提了出来，当时费边社提出建立一笔中央基金的建议。独立工党由于担心自己的地位，于是便同工会的右翼联合起来否决了这个建议。第二年，煤气工人和码头工人又提出了这个建议，这一次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拟定计划。1903年，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会议同意每年向每个所属机构的会员征收一便士的会费。不久以后成为

188 党组织的主要缔造者的阿瑟·汉德逊希望征收 4 便士，石匠工会的保罗·韦格希尔建议征收一先令，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得到很大支持。

不过，即使一便士也比一文不名强。这笔钱虽不能使劳工代表委员会资助自己的任何候选人，但是有了这笔钱倒的确有可能为那些在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支持下选出的议员支付每年 200 镑的生活费。后来就利用发给这笔津贴的机会实行一种“党内宣誓”的制度，使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保证，在当选后按照劳工议会党团多数的决定投票，否则就辞去议员职位。当时议会议员是没有薪金的，不得不依靠支持他们竞选的组织愿意拿出的补贴。工会可以用两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让他们在工会中领取薪金；一是靠一笔专用的政治基金向他们支付津贴。但是独立工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经济非常拮据，除非能找出某种提供经费的办法，否则就很难提出适当的候选人。这种新安排的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迈出的第一步，要把当选的劳工代表委员会代表结成一个党派，尽管为说服 1903 年的会议采纳一个纲领而作的一系列努力都遭到了否决。电机工人工会要求发表一项宣言，声明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各项活动以承认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社会化为基础。杰克·琼斯代表西哈姆工联理事会提出了另一项建议供会议选择，这项建议要求这一运动保证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会议对这两项建议都持否定态度；当琼斯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拟定一个一致同意的纲领时，凯尔·哈迪起而反对，于是这个建议也被否决了。会议最多只同意劳工代表委员会的议员在下院组成一个独立的“集团”（还不是“政党”），并有自己的议会领袖。

在把劳工代表委员会逐步变成政党的过程中，甚至连这些温和的步骤也使委员会失掉了 1900 年当选的两名议员中的一个，这

名议员就是铁路员工混合工会的理查德·贝尔，他在补缺选举中 189

坚决支持自由党候选人，甚至同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相对抗，在这个问题上终于在1904年同劳工代表委员会决裂。这时，劳工派议会集团又多了以下3名新议员：织工工会的戴维·沙克尔顿、费边社和制桶工人工会的威尔·克鲁克斯以及翻砂工人工会的阿瑟·汉德逊。汉德逊于1903年担任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司库，他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他在自己当选的那个选区中原是自由党的代表；在该区议员退休时，自由党的地方选举事务委员会欺骗了他，使他不能继任，于是他便设法把自由党协会中很大一部分追随者带了出去。他使这批追随者成为一个以广泛的个人会员为基础的地方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核心，这在实际上就开创了这样一种新的作法：成立直接为党工作而不仅仅为党所属的一个组织工作的个人组织，来支持新产生的党。威尔·克鲁克斯在伍尔威治也采用了类似的作法，但是由于独立工党和工会的反对，直到汉德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完全改组了工党，并最终使党完全承认地方工党是党组织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以后，这种作法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采用。在1914年以前，这种改革是行不通的，因为它遭到许多工会的反对，也遭到独立工党和一些地区的工联理事会的反对。这三个集团从不同的观点出发，都担心党的指导机构的壮大。

如前所述，社会民主联盟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劳工代表委员会。但是由于没有能使委员会采纳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团结的基础，第二年便退出了。此后，联盟便在海德门的领导下单独活动。1903年，苏格兰有一部分盟员退了出去，以丹尼尔·德·里昂的美国组织为蓝本，成立社会主义工党，而且也象德·里昂派一样，主张一种极端形式的产业工会主义，要把所有工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庞大的、分部门的工会，并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在共同的指挥下，在工业和政治两个领域中展开斗争。社会主义工党在格拉斯哥和某些

190 其他苏格兰城市树立了相当大的势力，不过它始终几乎完全是一个苏格兰运动。它坚持了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克莱德地区的机械工厂中起了很大作用，对1915年采取造反立场的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作出很大贡献。战争结束以后，它的大多数成员参加了共产党。

在社会主义工党退出两年以后，又有一批人退出了社会民主联盟。这批人以C·L·菲兹吉拉德为首，退出后主要在伦敦和兰开夏组成了英国社会党。英国社会党主张奉行一种彻底的社会主义不妥协政策。它认为劳工行动对实现社会主义是没有用的；它一面断言必须采取政治行动，一面又反对一切治标性的纲领，坚持一个议员候选人除非主张立即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否则就不值得投票选他。由于英国社会党本身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而劳工方面或社会主义者方面所提出的候选人又没有一个符合它的要求，于是该党领袖便力劝自己的支持者不要投票，而去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社会主义教育，以求培育出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力量。英国社会党始终是一个小组织，主要在伦敦从事活动。社会民主联盟由于有这样几批人退出而削弱了力量，在大多数地区把地盘输给了独立工党；但是在1906年以前，独立工党本身的进展也很缓慢。

在这些年里，费边社也没有什么生气。在新旧世纪之交，它支持南非战争，因而势力大为削弱；对于南非战争，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都是反对的。费边社支持这场战争的态度主要表现在肖伯纳的《费边主义和帝国》这篇论文中。他在这篇论文中指出：奥兰治和德兰斯瓦这两个布尔人共和国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双方都毫不关心南非当地居民的福利；由于没有一个世界国家或世界联邦把这两个共和国接管过去，强迫它们根据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管理自己的事情，因而对付它们的最好办法只能是由英帝国予以兼

并,强迫它们更有效地传播文明。“我们当前的问题是,怎样让这个世界由实际上具有国际规模的大国加以整顿……这样的大国瓜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不过是时间问题,不论你是抱着赞同的态度还是遗憾的心情,这都是必须面对的事实。”文章又说,“认为一个国家有权任意处置自己的领土,而不考虑世界其余地区的利益的概念,从国际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从二十世纪的观点来看,是站不住脚的,就如同认为地主有权随意处理自己的地产而不考虑邻居的利益的概念站不住脚一样。”文章又说,“妨碍国际文明传播的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必须消灭。”

实际上,肖伯纳的意见是说,应该把世界看作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有效地开发全世界的资源应该看得比一切有限的国家权利更加重要。他的论点是,在二十世纪应该把国家主义看作是过时的东西,人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但是他也根据强权政治的观点争辩说,不论你是否喜欢,将来都掌握在大国的手里,大国在发展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必然会把小国一脚踢开;他还满怀信心地宽慰自己说:“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大国都必然会为整个文明的利益进行统治。”关于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他说“象金矿之类的富饶资源以及依靠这类资源建立起来的强大武装力量,听任它们不负责任地掌握在边疆居民的小社团手里,根本不符合共和国的利益。从理论上说,这些资源和武力应该国际化,而不是英帝国主义化,但是在世界联邦正式成立以前,我们必须接受现有的最负责任的帝国联邦,由它们代替世界联邦”。肖伯纳还含蓄地为瓜分中国辩护,当时这是一个讨论得很热烈的问题,其理由跟他后来反对爱尔兰独立的理由相同。他赞扬德国在推进对外贸易时所采取的帝国主义政策。他最后说,“从这一切所得出的教训是:英帝国政府最迫切需要的不是保守主义,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帝国主义,而

是智慧和政治学。”

192

当然，肖伯纳的论点使一些人感到震惊，其中包括某些费边社社员。半个世纪以后，这个论点也使我震惊不已；事实上，费边社在这个问题上的整个立场都使我深感遗憾。但是肖伯纳得到韦伯夫妇的大力支持，费边社召开会议对他的草案表示意见时，绝大多数人也都支持他的政策。以 H·W·马辛汉为首的少数费边社社员退了社，不过他们只是一批曲高和寡的人。罗伯特·布拉奇福德和《时代号角报》集团的大多数领袖所采取的方针大致同肖伯纳一样，为此而丧失的支持力量则比费边社多得多，因为《时代号角报》集团的追随者天生是左派，而且天生地反对宣扬帝国事业的使徒。在此以前，费边社社员很少注意国际事务，大多数人都具有改良主义者的气质，他们远比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更易于接受肖伯纳的“效率第一”的论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从更有效地组织起来以谋求福利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而他们用来对待国际事务的则又往往是这样一个概念：在专家的技术和知识的指导下，建立一个有计划和有秩序的世界社会。特别是韦伯夫妇，在他们力图用社会主义思想渗透当时的各个党派时，他们在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帝国主义分子中所得到的响应比较大，而在旧式保守党人或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旧式自由党人中所得到的响应则比较小。他们在自由党中的朋友是格雷和霍耳登，而不是格莱斯顿派；至于在保守党人中，同他们最为志同道合的是米尔纳之类的人。他们同意肖伯纳的意见，把民族主义看成是过了时的赘物，把大国目为进步的必要工具。

肖伯纳和大多数费边社社员在南非战争问题上是以反对布尔共和国的“反动民族主义”的面貌出现的，而当时仍然支持自由党的伟大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1858—1940年）却以一部重要的著作《论帝国主义》（1902年）提出反对意

见。霍布森在早年同 A·F·马默里合著的《工业生理学》(1889年)中已经发表了经济危机的“消费不足论”；他主张民族主义，认为世界国际主义必须以此为基础。他谴责帝国主义；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是歪曲滥用民族主义的结果：一个民族国家只要把自己的统治权或主权扩张到具有不同传统或生活方式的其他民族身上去，就会产生帝国主义。霍布森把殖民主义同帝国主义截然分开，认为前者采取的形式是把移民送到没有人烟的地区去，让他们在那里重建祖国的生活方式，例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部分地区的英国殖民地就是这样，而帝国主义——例如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中所见到的帝国主义——则是让移民们在传统习惯和生活方式都跟自己根本不同的居民中成为统治阶级。他提醒人们注意：第二种殖民开发方式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英帝国与其他帝国的附属国和领地的面积和人口有了迅速增加，这种帝国主义扩张方式本质上是竞争性的。他说，民族主义中根本没有什么因素需要阻挠世界各族人民和平共处，或妨碍他们通过相互的贸易和交往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但是帝国主义却具有侵略和掠夺的本性，它既主张集中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又主张这种力量同每个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统治阶级结成联盟。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并把对立的帝国主义国家从势力范围中排除出去，帝国主义不仅直接通过本身，而且也间接通过它所造成的对立矛盾，导致军备的不断积累和战争危机的日益增加。帝国主义使大国产生统治小国的野心，同时也激发了受到威胁的各国人民的民族精神，特别是世界上不发达地区的民族精神。在霍布森看来，帝国主义是掠夺成性的，它主要由两种因素构成：(1)先进的资本主义技术；(2)各族人民的消费力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受到限制，因而引起贪得无厌地追求新市场的欲望。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正在把世界引向一场两败俱伤的斗争，这场斗争由于把世界推入毁灭性极大的战争，

因而很可能摧毁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胜利果实。

194 由此可见，霍布森把他从消费不足论出发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同他对帝国主义所提出的谴责联系起来。但是，他在这个时期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激进派，仍然希望能够使自由党奉行重新分配收入的先进社会政策，扭转现代资本主义的消费不足的趋势，以求在国内消费力的提高消除了夺取新市场的需要以后，彻底改变帝国主义的倾向。在南非战争问题上，霍布森是一个“亲布尔分子”，在国内事务方面，他也最坚决主张奉行彻底的激进政策。尽人皆知，他的《论帝国主义》一书对社会主义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受其影响的不仅仅是英国，也不主要是英国，而且还有所有参加第二国际的政党。这本书对列宁的影响特别大，列宁本人所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写于1916年）主要是根据霍布森的研究写出来的。

后来，霍布森反对1914年的世界大战，并且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党路线而参加了工党，但是在1914年以前，他始终被看作是激进派人物。他的消费不足论在所著《工业制度》一书（1909年）和其他著作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在自由党的经济学家中引起了很大争论，其中大多数人都傲慢地否定他的理论。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J·M·凯恩斯部分采纳并重新阐述了他的学说，他的经济思想才越来越多地得到承认，甚至在社会主义者中也是这样。即使是到了这个时候，霍布森也没有得到他作为“新经济学”的先驱者所应享有的荣誉。他生性谦虚恬退，除了通过著作以外，并没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但他同费边社员一样，完全有资格被推许为“福利国家”的先驱理论家；除此之外，他还享有一个最高的荣誉，他是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作彻底和毁灭性的揭露的第一人。

1903年，约瑟夫·张伯伦掀起了争取改革关税和建立帝国优

惠制的运动；费边社再一次要求肖伯纳帮助阐明社方的态度，结果是写出了《费边主义和财政问题》（1904年）一文。在这本小册子¹⁹⁵中，肖伯纳既攻击了自由贸易，也攻击了关税改革，并提出一个计划来代替这两项主张，其内容是：实现铁路国有化以发展帝国贸易，提供免费航运以推进出口事业和巩固帝国的经济关系，改进领事机构的组织，建立广泛的技术教育制度以提高工业效率。这个计划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就被费边社员采纳了，尽管格雷厄姆·华莱士等少数主要社员为此退出了组织。事后看来，肖伯纳的小册子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显然预料到张伯伦所发起的运动席卷全国，但根本没有看到自由党即将获得选举胜利，也没有看到工党同自由党结成半联盟关系，将作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而兴起。实际上，在肖伯纳和韦伯夫妇的影响下，费边社员对时代的征兆竟盲无所见而令人不可思议。他们对劳工代表委员会没有表现很大的兴趣，也没有寄予很大的希望（这倒是一个并非不自然的错误），他们也没有看到自由党内部正在复兴，全国舆论也正在普遍向左转。

这种向左摆的动向在开始时同由于南非战争而引起的矛盾有很大关系。同年晚期，随着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建立，《雷诺兹新闻报》（当时由W·M·汤普森任编辑）发起召开一次反战人物的民主大会。会上成立了全国民主同盟，同盟得到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和自由党的各种人物的支持。汤普森任主席，劳合·乔治任副主席，汤姆·曼恩任书记；积极的赞助者有约翰·伯恩士、苏格兰矿工工会的罗伯特·斯米利和挖掘工人工会的约翰·华德等人，还有乔治·豪威尔和矿工联合会的桑姆·伍兹（当时任职工大会书记）之类的“自由党-劳工派”老一辈人物。全国民主同盟肯定是一个激进派组织，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它要求普选权、议员支薪、废除上议院，并要求实现传统的激进派纲领的其余部分，此外它还制订了一项广泛的社会改革纲领。有一个时候，全国民主同¹⁹⁶

盟远比劳工代表委员会令人瞩目。但是由于它同自由党有联系，又拒绝接受社会主义纲领，因而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要集团——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不同它靠拢；在南非战争引起的问题平息以后，它也就随之逐渐失势，但是它在自由党重新确定左倾的方针方面毕竟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而大大抑制了劳工独立运动。这无疑是一个因素，使自由党在1906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并使劳工代表委员会随着沾了光。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工党，其人数之多足以在政治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这个党虽然宣布要独立，但当时仍然同自由党人有密切的关系。

自由党在1905—1906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巨大胜利，这使费边社的领袖和其他许多人都感到意外。自由党路线原先一直被社会主义者谴责为腐朽的和过时的，这时受到重新抬头的激进情绪的影响，突然以一种包罗甚广的社会纲领的形式再度出现。自由党内阁以议会中的绝大多数议席作后盾，由一些激进派人物担任要职。工党共有30名议员，在下院的表决中不占重要地位。就表决来说，自由党的力量是绰有余裕的，并不需要工党的支持。但是工党却同自由党人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它的大多数议员都是在自由党选民的支持下选出的，否则他们就没有当选的希望。工党议员中只有3人——西布雷德福的F·W·约维特、切斯特—勒—斯特里特的J·W·泰勒和格拉斯哥的G·N·巴恩斯——在同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反对者的三角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还有一名工党议员——C·W·鲍尔曼——是在德特福击败一名托利党人和一名非正式的“自由党—劳工派”候选人而当选的；而凯尔·哈迪则是在具有两名候选人的选区麦瑟尔击败一名正式的和一名非正式的自由党人而获胜的，这个选区没有托利党人参加竞选。其余的人都是在自由党选民的支持下选出来的，尽管同自由党并没有公开的协议。同这种情况相反，当然也有许多自由党人在工党

选票的支持下当选；这种情形有的出现在每党只提一名候选人的双候选人选区，有的出现在工党候选人没有参加竞选的普通选区。这样选出的自由党人有许多都保证支持工党所赞成的特别措施，尤其是推翻塔夫·维尔裁决。两党都主张自由贸易，主张爱尔兰自治，反对在南非雇佣华工，赞成通过一项旨在使荷兰和英国移民取得和解的联合方案去解决南非问题；两党都预料到上院会进行阻挠，并且准备加以应付。由于工党当时并没有宣布遵奉社会主义，也没有用社会主义纲领参加竞选，因而便有很多因素使双方团结在一起，而从实际政治来说又没有什么东西迫使他们分手。当选的多数工党人物是工会主义者，其中大多数无疑是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但是有许多人同实力仍然很雄厚的、以矿工代表占主要地位的“自由党-劳工派”议会党团根本没有划清界限。¹⁹⁷

新议会成立的第一年，工党取得了两次显著的胜利。它迫使自由党人撤回了自己在处理塔夫·维尔裁决上所采取的折衷办法，并且制定了完全赞同工会要求的劳资纠纷法案；此外它还说服下院通过了 F·W·约维特所提出的法案，授权地方当局斟酌情况，为在校贫苦儿童提供免费午餐。工党在塔夫·维尔裁决问题上之所以取得胜利，是由于大多数自由党候选人在竞选时曾提出保证，使政府感到无法食言。约维特提出的法案之所以能得到通过，则是由于它只是一项由地方政府斟酌情况予以执行的法案。选举以后，工党便正式采用了“工党”这个名称，它在取得上述初步成就以后，发现自己的作用实际上只限于支持自由党政府的措施，这些措施涉及社会改革的广泛领域，诸如改进工人赔偿法案、在劳动繁重艰苦的行业建立劳资协议会、为小学生进行体格检查、对老年人进行收入调查后发给养老金、在煤矿中实行 8 小时工作日制和改善安全条例、建立劳工介绍所等等，此外还有建立南非联邦以及向议员支付薪金的措施。不久以后，工党又发现自己支持劳合·

198 乔治 1909 年提出的著名的“土地税”预算,后来又支持他同上院进行斗争。此外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也有一场斗争从幕后出现,即将来临,它在这场斗争中必然要同政府站在一边。

同这些促使工党支持政府的因素对比,议会中并没有出现任何足以使两党分裂的重大迫切问题。然而,社会主义者对自由党-工党合作的政策却有很大反感。工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凯尔·哈迪的独立工党脱胎而来的;而独立工党之所以能取得进展,主要是由于它指摘自由党人,要求工人割断同自由党人的联系,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结果竟然只是得到一个仅仅给自由党多数壮大力量的党,这显然是事与愿违,很不对胃口。此外,在补缺选举上很快就发生纠纷。得意洋洋的自由党人不愿约束自己,少提候选人,而把更多的席位让给工党人士;工党的领袖则不愿开罪自由党方面提供支持的人而危及自己所据有的议席。凡是进行三角竞选的地方,工党的结果往往都很不如意;而在同托利党人进行直接的斗争时,却有两名自由党-劳工派的矿工赢得了议席。有一次,一名工党候选人——煤气工人工会和独立工党成员彼提·古朗在贾罗同自由党、保守党以及爱尔兰国民党的对手进行一场四角斗争,结果赢得了议席。在莱斯特,当老自由党-劳工派人物亨利·布劳德赫斯特于 1907 年去世时,他在这个双议席选区所空出的席位没有遭到工党的反对,就归了自由党,这大概是因为如果在那里同自由党人斗争,就会危及詹姆斯·腊姆齐·麦克唐纳所占有的另一个席位。同年最最重要的补缺选举是在约克郡的科恩维利城进行的。那里有一个年轻的无党派社会主义者维克多·格雷森(1881—?)在没有党派正式赞助的情况下参加竞选,结果当选了,这主要是由于他提出了改善失业者的待遇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富于进取精神的社会主义纲领。

这的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竞选。1906年就业情况很好，但是第二年就严重恶化；凯尔·哈迪和议会中的其他工党议员力图促使政府采取行动，结果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当时工党已拟就劳动权法案，但是得不到便利条件予以通过；左翼社会主义者为之哗然，抓住这个问题指责党在要求实现工人阶级的权利方面因循苟且。格雷森在科恩维利城被接受为候选人，是违背工党里的独立工党领袖和其他领袖的愿望的。他是一个年轻的神学学生，25岁，口才很好，为人也富有吸引力，但是没有多大恒心，也没有什么品德。他加入了独立工党，但是同领导闹对立。在独立工党的著名议员中，只有菲利浦·斯诺顿到科恩维利城去支持他。在他以“工党党员和社会主义者”候选人的身份当选后，他在议会中的地位立刻就引起了纠纷。他拒绝签署“党员誓言”，因为这会迫使他按照议会党团多数的决定投票。于是工党议会党团便拒不承认他的地位。他公然反抗下院的议事程序，要求下院优先考虑失业工人的权利问题，闹了一场风波。下院中止了他继续参加会议的权利，他便抽身周游全国，鼓动人们反对工党对自由党千依百顺的态度。

这时，上院以法院身份在奥斯本裁决中裁定工会没有合法的权利从事政治活动或为政治活动提供经费，从而给工党一个严重的打击。这一裁决挖掉了工党的财源，同时也挖掉了拥有独立议会党团的矿工联合会的财源。当时还没有实行议员支薪制，现任工党议员都遭了殃。事情很明显，只要工党参加大选，它的处境就会很不利。奥斯本裁决的一个后果是导致矿工联合会作为一个团体参加了工党，旨在推翻这一裁决；但是采取了这一切步骤之后，前途仍然未可乐观。多年以来，工会实际上一直在花钱进行政治活动，这一权利并没有受到质疑。上院主要是根据工会法案授予工会的权力的狭义解释作出裁决的，但一部分也是根据法官所持有的工会的政治活动违反“公共政策”这一看法。这一看法的部分基

200 础是，工党所规定的签署“党员誓言”的规定违背议员向选民负责的精神。这一裁决冷不防给了工党和工会一个打击。签署“党员誓言”的作法被正式废除了，但无补于实际，因为裁决仍然有效。在这个时候（即 1910 年），因劳合·乔治的预算案而引起的争执使工党在同一年里接连两次投入大选，竞选时的条件使它在财政上既无力竞选许多议席，同时又被迫争取自由党的支持，以图通过法律废除奥斯本裁决。同自由党搞竞选合作的政策，纵使实际上会毁灭党也不得不继续下去，而在此期间，工党支持者中的反对合作的情绪却正在上升。

经过这两次选举，工党在名义上比以前强大了，因为矿工联合会在 1909 年加入了党，但是实际上由于它丧失了一些议席，经济又拮据不堪，它的力量反而稍有削弱。1911 年，议员支薪制成为法律，减少了工党的困难，但是并没有消除它们。从某一方面来说，工党的地位本应得到加强，因为自由党人丧失了许多议席，以至将来不得不依靠工党和爱尔兰人的支持。但是实际上，这只是增加了工党的依赖性，因为在制定法律，把奥斯本裁决推翻以前，它不能坐视自由党政府被人击败，而且它也受到约束，必须支持有关削减上院的权力、允许爱尔兰自治以及改革选举制的立法。

在 1910 年的两次大选中，工党又同自由党结成非正式的竞选联盟。在 1 月份当选的 40 名议员中，有 39 名没有自由党的对手，第 40 人也只有一名非正式的自由党人同他竞选。到了 12 月，在 42 名当选的议员中，有 3 名没有对手，其他 39 名只有托利党人同他们竞选。所有工党或社会党候选人，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只要是进行三角竞选，都败下阵来。维克多·格雷森在 1 月份的选举中丧失了自己的议席，并没有新人出来取代他的地位，宣扬左翼政策。只要同上院的斗争继续下去，就不可能把其他问题提到重要地位上来。于是，对工党的所作所为和物价水平日益上

涨的现实深怀不满的情绪,就不得不到议会以外去寻求发泄途径。这一点独立工党感触尤深,许多独立工党党员正由于没有能把工党转变成为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组织而感到恼火。这些心怀不满的人开始同社会民主党合作,这是社会民主联盟1908年改用的新名称。《时代号角报》的支持者也待机而动。1909年,这些人在曼彻斯特成立了社会主义者代表委员会,发起运动,力求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在其他城市也成立了类似的团体。1911年,在一次社会主义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英国社会党,该党由整个社会民主党、以布拉奇福德为首的时代号角报集团的大部分成员、以及相当一部分独立工党退党分子组成。实际的情况是社会民主党吞并了其他人,因为布拉奇福德不久就同这个新团体决裂,开始发起重新武装英国以对付德国的运动,而独立工党则没有任何杰出的领袖。布拉奇福德在《每日邮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危言耸听的文章,阐述自己的新方针,后来又印成小册子广为流传,这种新方针使他同左翼断然决裂,同时也破坏了时代号角报集团在劳工运动内部的势力。就在英国社会党成立的时候,发生了罢工和工业骚乱,而党也就马上在这一事件所引起的新问题上发生严重分裂。

这些年以来,费边社也一直在经历危机。1903年加入费边社的H·G·威尔斯在1906年大选以前就开始要求执行新政策。他要求费边社尽全力大批吸收社员,重新建立全国的地方分社,并且出面宣扬一种新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基础是吸收现代科学的经验并用以解决社会问题。1905年,他出版了《现代乌托邦》一书,提出了成立一个虔诚的武士团的想法,由这些人担任人类的组织者和保卫者;有一个时候,他似乎希望把费边社变成这样一个武士团,由他亲自领导。在某些方面,威尔斯的思想同肖伯纳的思想很相近(肖伯纳也是一个宣传专家执政的人),同韦伯夫妇的思想也很相近。但是威尔斯的运动需要有一批新领袖来代替费边社的“老派”,

于是尖锐的个人冲突就发生了。威尔斯首开其端，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费边社的错误》，接着又使费边社指定人员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去考虑改革该社基础和政策的问题。他的一些建议被接受了，包括发展费边社地方分社的建议。这个计划出现之时，正值工党1906年的胜利刺激人们对社会主义广泛地发生了兴趣，于是费边社总社和地方分社的人数急剧增加。但是威尔斯的计划有很大一部分是完全行不通的。他要求费边社创办一个大量行销的刊物，成为一个大规模发行书籍和小册子的出版者，并且发动一场远远超出其财力的组社运动。他很不善于讲演，在辩论中总是让肖伯纳占了上风。不久，他就对这场显然只有少数事遂了心愿的运动感到厌倦，而且当费边社仍在讨论他的建议时，就一下子脱离了这个组织。事实上，“老派”非常慎重，并没有以最后表决相逼。这批人始终愿意采用这样的作法：采纳他的一些建议，暂时不对其他建议作出最后决定，然后又在执行中把所采纳的建议加以修改，除去其中刺人的成分。在许多论点，威尔斯的计划含糊不清，而且常常改变立场，使得“老派”在这方面占了便宜。费边社内的威尔斯派在其领袖抛弃了费边主义时立刻就瓦解了，并且有一个新的费边改革运动代之而起，但是这个运动并没有得到更好的成就。威尔斯有一个建议是：费边社在组织了自己的地方分社以后，就应该改组成社会党，提出自己的议员候选人。当时还有成立“中产阶级社会党”之说，这个党应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讲求效率和有秩序的科学施政方法的理论，使中产阶级转而信奉之。另一方面，取代威尔斯派地位的新费边社改革派坚决主张，费边社应该清除自由党-劳工派分子（其中有少数人担任自由党议员），应该同工党完全结合为一体，并且应该完全放弃传统的费边渗透策略。

费边社内的这两起反抗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是给该社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威尔斯闯进社来使它的社员人数大大增加；而

第二批改革者则对费边社和独立工党发展更密切的合作关系起了很大作用，在地方政府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方面尤其如此。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的一个联合委员会在这两方面进行了某种活动，有助于在劳工运动内部传播费边社的思想和政策。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费边社员从一开始就是独立工党政策的主要策划者，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毫无疑问，《费边论文集》和《费边论丛》以及费边社在哈钦森信托会的主持下派到各地发表巡回演说的人在以下两个方面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是为英国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事实、数字和建议；一是使他们放弃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概念，而接受渐进主义的学说，并转而主张在现存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监督下扩大公营企业。不过，渐进主义的概念从一开始就包含在独立工党的整个政策中。促使工党主要强调最低工资限额、8小时工作日制和劳动权的，不是费边社而是新工会运动。向独立工党灌输强烈的道德观念，要它坚决维护“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者”的权利的，更不是费边社。在促使独立工党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品质这一点上，布拉奇福德和哈迪所做的工作比威尔斯或肖伯纳多得多。在那个阶段，费边社社员所鼓吹的是效率而不是对同胞的友爱，他们倾向于认为布拉奇福德和哈迪之流是愚蠢的感伤主义者。只是到了后来，特别是在比阿特里斯·韦伯（她在1909年以前根本没有参加费边社工作）的影响下，费边社社员才成为“全国最低文明生活标准”的主要代表者。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年)主要以小说家著称，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期，作为一个普及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来说，他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最为擅长的是运用那种根据切身经历所获得的洞察力去描写他所出身的中下层阶级的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尤其长于描写那些通过综合工艺学校、技术学院 204 以及其他主要从研究自然科学入手的学术机构而得以接受高等教

育的人的生活和思想。虽然他在晚年写了很多关于有所成就的富人的作品，但是他在这种人中间始终不那么自在；他所描写的“高等生活”始终带有他早年在母亲身边所受的教养的痕迹，他的母亲是英格兰南部的一个豪门巨户的管家。威尔斯也从来没有真正理解工人阶级或工会运动。他写短篇小说的才华过人；以科学奇迹为主题的长短篇小说，诸如《隐身人》或《神的食粮》等等，也是特别富于才气的著作。在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中，关于井然有序的社会的概念占据支配地位；他眼见“小人物”一生被糟蹋和受挫败，而井然有序的社会则会把这种现象一扫而空。他对“小人物”怀有深厚的同情，“小人物”为自己所受的教育所限制，无法理解复杂的社会，他们在这种社会中横遭打击和捉弄。这就使威尔斯热衷于群众教育，他在《世界史纲》和《生活的科学》之类的著作中就流露出这种热情。这也使他赞扬由领袖、组织者和教育者组成的忠实于本身事业的团体所起的作用；他认为这批人会把世界整顿得井井有条，其方法不是建立任何专制的制度，而是使世界更加适合于可能具有种种奇想和怪癖的普通人。他对这方面的描写十分有趣而又体贴入微。威尔斯的著作贯穿着要求秩序的热情，这同他自己的杂乱无章的思想与行为形成奇妙的对照。他极不善于同任何团体合作，他老是跟同事闹翻，然后又满怀希望地另走新路。尽管如此，在他发挥自己的最大能力的时期，他对培育社会主义者却是一个极有影响的人物。他的黄金时代始于1896年，终于1911年。1896年，他写出杰出的喜剧《幸运的车轮》，创造了自己的英雄——“小人物”，当时骑自行车郊游之风正达到高潮。而在1911年，他出版了《新马基雅维利^①》一书，其中除了许多废话以外，对

^①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年)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作家，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财产关系是政治的基础，把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道德看作是积极活动的桎梏。在他看来，强力是法权的基础，因此他抛开道德来谈政治。他在成名之作《君主论》一书中认为，当权者应该完全摒弃道德，

悉尼·韦伯和比阿特里斯·韦伯作了刻薄而又有趣的讽刺。他的一系列主要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写出的，从《期待》（1901年）、《正在塑造中的人类》（1903年）、《现代乌托邦》（1905年），一直到《代替旧世界的新世界》（1908年）等都是，而后²⁰⁵面这本书肯定是自布拉奇福德所著《欢乐的英国》一书问世以来在英国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著作。在同一时期，他写出了出色的社会小说《爱情和鲁维轩先生》（1900年）、《吉普斯》（1905年）、《托诺-本盖》（1909年）以及最出色的《波利先生的生平》（1910年）。从《世界史大纲》一书（1920年）开始，又是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威尔斯著作的社会主义性质少了很多，但仍然忠于世界秩序的思想。接着他陆续不断地写出大量小说和探讨教育的著作，差不多直到去世时为止。他的另一部“乌托邦”小说《未来事物的面貌》（1933年）以及透露真情的《自传试作》（1934年）都是他晚年的著作。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在《琼和彼得》（1918年）一书中阐述的，但是他的许多著作都贯穿着这种思想。他的最优秀的短篇作品之一是一篇费边短论《靴子的不幸》（1907年），在这篇著作中他谴责了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浪费和损失。这本书出了许多版，是他对社会主义宣传最有影响的贡献之一。

威尔斯写出最优秀的著作的时候，正是大批中层阶级青年转而信仰社会主义的时候，这是高等教育普及的结果，特别是通过夜校而得到普及的结果。他完全清楚对这批公众应当说什么话，他对这批公众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同布拉奇福德对九十年代的公众的影响相比。不过，布拉奇福德虽然也影响了许多中产阶级读者，他写作的主要对象却是比较聪明的工人；而威尔斯的读者虽然也包括许多工人，但主要却是职员阶层以及既读他的小说也读

采取纯粹的权术，为了达到统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是由此而产生的。——译注

他的小册子的教育程度较高的阶级。此外，威尔斯主要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新闻记者，他需要很长的篇幅来发挥自己的见解，他虽然是写短篇小说的高手，但对写短篇论文却没有特别的才能。除了短期打入费边社的政治活动以外，他在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或劳工运动中并没有起过作用。他徘徊在这个运动的周围，但是由于他的个人主义气质太深，始终无法接受任何一个组织的工作。

威尔斯同肖伯纳在费边社内的冲突，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为这是个人之间的冲突而远非思想上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与其说肖伯纳是在维护一项原则，倒不如说他在护卫韦伯夫妇以对付攻击者。威尔斯在《费边社的错误》一文中发起攻击，主要是抨击费边社满足于小手小脚的作法，而没有为自己进行宣传，也没有设法吸引大批社员。他大声疾呼地说：“培养社会主义者，你就能实现社会主义，舍此别无他途”；“老派”并没有否定他的计划，不仅努力增加社员，建立费边社地方分社，而且还出面支持建立“中产阶级社会党”的主张。根据设想，这个党完全不同于费边社所加入的工党。当整个事件随着威尔斯于1909年退出费边社而告结束时，这个建议也就再无下文。

在这些年里，费边社除了内部斗争以外，并没有多大作为，这主要是由于它最活跃的人物悉尼·韦伯一直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伦敦郡议会的工作上，同时他还同比阿特里斯·韦伯一道为1905年成立的济贫法委员会的少数派报告准备材料。1909年发表的这份著名的报告包含着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险计划，计划是韦伯夫妇作为“渗透行动”中的一个实际尝试而精心拟定的。在这个报告上签字的有比阿特里斯·韦伯、委员会的两名劳工代表——木工与细木工混合工会书记乔治·兰斯伯雷和F·W·钱德勒，还有当时担任圣·保罗教堂的领俸牧师，后来担任伯明翰主教的H·鲁塞尔·威克菲尔德。为了替这些建议展开活动，韦伯夫妇还特别成立了

一个组织：最初称为“全国废除济贫法运动促进委员会”，后来改称“全国防止贫困委员会”。他们吸收了大批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参加组织，其中包括许多地方政府当局的积极成员。他们的主要建议是：废除济贫法，并消除“贫民”地位所带来的污点；把最初成立于1834年的济贫局的职权移交给市议会或郡议会，并同目前已由这些当局掌管的公共卫生和其他职能合并。在这个基础上，报告建议建立全面的社会服务事业以照顾老幼、病残以及无法找到工作的人。报告说：所有这些服务事业的组织方式应该使受救济的人不至丧失政治或社会权利；应该把这些服务事业看作是社会对其成员应尽的义务，而且应该由民选的地方当局进行民主的管理；经费应由公共基金中拨付，其中一部分来自地方基金，另一部分来自中央财政部门的津贴。关于失业问题，报告建议对失业者发给相当于生活工资的生活维持费，不过当局有权在适当情况下坚持重新训练工人担任其他工作；报告还建议，为了减少周期性的失业，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应该制定兴办公共工程的计划，以便在繁荣年代停止施工，而在萧条时期则扩大施工。

济贫法委员会的多数派报告也建议进行重大改革，但是同少数派雄心勃勃的计划相距甚远。济贫法委员会少数派的报告的确是一个里程碑：它破天荒第一次对福利国家的概念和政策作了全面详细的规划；它比1942年的贝佛里季报告更为全面，所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后者在许多方面都重复了它的主张。这两个报告的基本差别在于，英国在这段时期中实际上已经根据强制性保险原则发展了一套广泛的社会保险计划，而少数派报告当初则否定这个原则而主张实行一个完全依靠一般税收来提供经费的计划。后来，劳合·乔治效法俾斯麦的社会立法，提出了1911年的全国保险法案，并且在少数派报告的支持者千方百计的阻挠下获得了通过；这时上述原则问题几乎立刻就成了严重的争论。

208 韦伯夫妇的努力立刻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出版了这一报告的普及本，销路很广；他们的全国防止贫困委员会创办了一种名为《十字军》的刊物，由克利福德·夏普（1883—1935年）主编，这一刊物成了《新政治家》的前身，《新政治家》是他们在1912年创办的，主编也是夏普。全国防止贫困委员会还发表了大批小册子和特别报告；费边社主要社员的大部分活动都转到全国委员会中来了。自由党政府中的地方政府大臣是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约翰·伯恩士；人们曾经希望他会支持韦伯夫妇的计划。事实上，他受到手下官员的影响，对这个计划极力表示反对。于是，他同韦伯夫妇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伯恩士当时主要考虑的是他在1909年提出的住宅和城市规划法案，这是现代城市规划立法的开始。伯恩士说只要改进现行法的执行工作，就能大体上实现韦伯计划中的可取部分，而且代价不会太大；他也主张实行强制性保险制，而反对社会保险事业的经费全部或主要由一般税收拨付。尽管韦伯夫妇设法使他们的全国委员会赢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是自由党政府却不愿意接受他们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社会主义性质太浓了，需要的费用太大了，不对它的胃口。政府没有采用这一计划，而是着手准备另一个健康保险计划，加上一个限于在少数选定的工业中实行的试验性失业保险计划。当这些计划根据1911年的全国保险法案成为法律的时候，韦伯夫妇的计划显然遭到了失败，至少暂时是这样。

劳合·乔治的全国保险计划使劳工运动发生了明显的分裂；当时常有人说这个计划“挫败了韦伯夫妇”。根据这个计划，工会、互助会和资产阶级的保险公司都可以设立经政府备案的社会服务部门来管理政府所提供的保险补贴款项，其行政管理费用也靠政府拨付。许多工会认为这是扩大影响和增加会员的机会，因而都赞成这个计划。特殊选定的工业中的工会根据类似的安排也取得了管理失业救济金的权利。其他行业中的工会则得到补贴以补充

自己的失业基金。这样一来，就使工会舆论的主体对政府的方案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则激烈地指责这些方案；以希莱阿尔·贝洛克（1870—1953年）为首的一些自由党人也附和他们的指责；这些自由党人认为，由资方作为政府的代理人从工资中强制扣除保险费的办法是走向“奴役国家”的危险步骤。贝洛克的著作《奴役国家》（1912年）详细发挥了他用来反对劳合·乔治法案的论点。他说，国家以资方为代理人强迫工人从工资中拿出钱来支付本属公共服务事业的费用，从原则上说来就是错误的。其后果会使资方享有一种惩治工人的权利，这个初步步骤很容易被用来作为基础，据以制定一套总制度，把工人纳入国家编制，强迫工人在资方的控制下进行劳动。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菲利浦·斯诺顿在议会中带头反对劳合·乔治的法案；费边社发表了一本名为《论保险法案与工人》的小册子，参加了这场争论，重申工人无需缴纳保险费的理由。乔治·兰斯伯雷及其伦敦东区的追随者也积极表示反对；有一些独立的社会社会主义者在补缺选举中就主要从保险问题出发参与竞选。但是，由于工会领袖大力支持这个法案，反对意见也就必然归于无效了。全国防止贫困委员会一直存在到战争期间，此后就逐渐衰亡，而韦伯夫妇也随之转移了自己的主要精力，把《新政治家》办成一个熟悉情况的社会主义舆论刊物，并建立一个费边社研究部，通过该部对工业管理问题开始一项新的抱负远大的研究工作。不过，关于这些发展情况最好留待后面的某一章去论述，因为它们同工业界的一场大动乱关系很密切，从1910年开始，这场大动乱使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在日常实践和社会主义思想方面都面临一种新的形势。

(II) 费边社会主义——韦伯夫妇，肖伯纳和华莱士

在前一章中，我们曾经略略叙述过悉尼·韦伯、肖伯纳和他们

210 的合作者在《费边论文集》中所提出的渐进社会主义的新政策。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更全面地评价韦伯夫妇和肖伯纳在社会主义思想方面所作的贡献的时候了。这三个气质很不相同的人在一起合作，的确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韦伯夫妇尽管在一起密切合作了许多年，但对待社会主义问题的态度却是很不相同的；肖伯纳尽管同他们确实很相投，但在气质上却属于另一种更加不相同的思想类型。悉尼·韦伯在对待他所抓住的任何问题时，头一个想法就是怎样找出一个在行政上办得到的解决方案；至于基本的哲学道理，除了极少数本质上很简单的概念以外，他是不愿多加考虑的。他完全相信，当今世界的大势是走向社会主义，而且相信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对发展的主流采取对立的革命立场。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加速趋势的发展，而趋势在他看来是不可抗拒的，但也是可以使之加速或延缓的，也可以把它引导到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去。他具有通常称之为“文官”的头脑——那就是每有想法必从需要什么机构使之实现这个角度着眼的习惯。除了涉及发展趋势的问题以外，他从不发生任何怀疑或者在精神上感到犹疑不决。这并不意味着他悍然不顾他人。恰恰相反，当他认为有希望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也能很耐心地同他们打交道。不过，他对空想家感到不耐烦，对自己无法使之成为实际计划的理论也不感兴趣。

比阿特里斯·韦伯的哲学家气质要强得多。事实上，开始时她是一个社会学家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在最早期的著作中，她所关心的是批判正统经济学和斯宾塞派社会学的不足之处，而不是任何解救社会疾苦的理论。她坚信不疑的看法是：经济学作为一门抽象的科学而言，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过分偏颇，需要把它纳入一种充分考虑人类行为的非经济因素的更加全面的“社会科学”中去。此外，悉尼·韦伯考虑问题时本能地从国家和市政行动以及

公共行政当局的角度出发，而比阿特里斯·波特却本能地大力强调非官方行动和组织，甚至在成为韦伯夫人以后也是这样。她在²¹¹结婚以前所写的早期著作《英国的合作运动》(1891年)中就显示了这一点。她拉悉尼·韦伯共同写出了研究工会运动的著作(《工会运动史》〔1894年〕和《工业民主制》〔1897年〕)，后期又合著了关于合作运动的著作(《论消费合作运动》〔1921年〕)。他们合著的地方政府历史丛书是两人共同兴趣的产物，悉尼·韦伯认为民主地方政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共行政结构的必要基础，而比阿特里斯·韦伯则把民主地方政府看作是公共的和私人的社会行动两者之间的桥梁。

在有些方面，比阿特里斯·韦伯不如悉尼和蔼可亲。她出身于最上层的资产阶级企业家家庭，她的父亲是一家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是一个相当有势力的金融家，而悉尼却出身于职业知识分子的下层。比阿特里斯生性很傲慢，对于被她斥为蠢材的人态度往往粗鲁得令人难堪。与此相反，悉尼倒一点也不傲慢，能够比较轻易地以宽容对待傻瓜。实际上，除了偶而间断以外，比阿特里斯也锻炼自己宽恕傻瓜，不过勉为其难的神情往往显而易见。

肖伯纳被韦伯吸引住了，而且一直不可思议地受之控制，他也同样热情地同比阿特里斯合作，不过他的态度始终同他们两人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基本上说来，他既不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社会管理的问题，也不认为是一个使社会适应人类需要的问题，而认为是一个效率和方便的问题。韦伯注意管理问题，坚持管理人员进行工作时必须在民主监督下遵守有利于工作的纪律。从根本上说，肖伯纳根本不管什么民主不民主，他希望由专家们来主持一切，不仅要让他们当执行者，而且也要让他们当政策制定者。只要独裁者能让专家放手去干，他也不惜去赞扬独裁者。不过在肖伯纳的社会主义中，还另有一种思想存在，那就是有则全有、无则全

无的绝对观点，这同韦伯夫妇讲求实际的实验主义相距很远。这一点表现在肖伯纳所坚持的如下看法中：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唯一允许的收入分配原则是绝对平等的原则。这就会使收入跟为
212 劳务提供的任何形式的报酬完全脱离关系，而且要完全依靠非经济的刺激因素去促使人们完成必要的劳动。肖伯纳并没有把这一点当作立即采取的措施提出，因为他也把自己训练成了渐进主义者。但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理论来说，他在相信斯大林主义的不平等学说以前，在这一点上是毫不妥协的。他希望立刻向不劳而获的收入开火，他把这种收入笼统地称为“租金”。他希望通过占有这种社会剩余，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但是他始终没有认真地就过渡时期如何进行社会工作这一问题系统地提出过任何计划。到那时，租金已经社会化，而实行跟生产性劳务完全分家的平等收入制的时机又没有成熟。实际上，他支持韦伯的如下要求：实行全国文明生活最低标准，并把这一实施当作过渡时期的一个阶段。但是他对过渡时期的兴趣远不如韦伯夫妇那样浓厚，他从来没有从社会民主教育这一角度去考虑过渡阶段，而这个问题却始终始终是悉尼·韦伯所优先考虑的。

实际上，肖伯纳就象他以前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对于没收“租金”以及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并归公共管理所能得到的直接经济效益持有一种夸张的看法。他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整个生产不足的根源，同时也是生产不应该生产的东西，有钱人进行毫无益处的消费，从而造成巨大浪费的根源。在他看来，只要把“租金”社会化，并且用来重新装备工业和公用事业，为普通人民造福，就可以毫无困难地生产出足够的东西，为人人提供资料，让人人都可以过美好的生活。正因为有这种看法，他便很少注意在变化了的条件下组织生产会引起哪些问题。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实行社会化以后，物资稀少的现象就会告终，因而在他看来，寻找新的刺激因

素使人努力工作的问题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事。

韦伯夫妇写出了《工业民主制》一书，这是对日益壮大的工会运动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在此以前，始终没有人把工会运动当作社会管理问题进行过科学的研究。不过，他们一直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研究工会，并对那种从“生产者”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方法相当怀疑。特别是比阿特里斯，她总是从消费者一方去看工业问题。她对生产合作社运动抱极端的批判态度，认为这只是一种比较民主的利润分摊形式，仍然受谋利动机的摆布。她的热情完全倾注在消费合作社方面，认为消费合作社能够代表作为消费者的全体公民的需要，而不是代表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她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者需要工会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同时她也具有想象力，能够预见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会需要这种保护；但是她和悉尼完全不同意这样的主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应该让工人通过生产者所选出的管理当局自行管理。在他们看来，所谓工业民主制就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代表、地方政府代表以及消费合作运动中的代表，在生产管理方面向全体人民负责。事实上，他们认为国家主要是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包的消费者组织，而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他们对“工人管理”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兴趣，直到1914年以前劳工发生骚动的年头，他们才被迫面对这个问题。这时，他们在一本名叫《工团主义意味着什么？》（1913年）的小册子中所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完全不赞同的。他们非常不喜欢法国工团主义学说中的柏格森和索列尔派论调，他们也同样反对直接行动的全部理论。他们创造了一个名词，当他们同工业行动主义者展开辩论时常常使用：他们说所需要的是“谨慎节制的自由”。这个名词是蓄意用来激怒直接行动派的，直接行动派则用希莱尔·贝洛克的指责来回敬，说韦伯夫妇真正的目的是建立“奴役国家”。

韦伯夫妇并不相信大多数工人希望参加所属工业部门的管理

工作，也不相信能够信赖工人为了总体利益对工业进行有效的管理。他们坚持必须毫无保留地承认工会作为劳资谈判机构的地位，但是他们又希望工会作为守纪律的机构而不是作为反抗的机构采取行动。他们十分尊重工会工作人员，而且坚持担任这种工作必须接受充分的训练，特别是参照那些要求工会修改其传统方法的日新月异的工业技术接受训练。悉尼·韦伯在所著《今日的工厂管理者》(1917年)和《工会条件的恢复》(1918年)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韦伯夫妇尽管赞扬消费合作运动的成就，但是也看到了合作运动由于其民主管理机构没有能适应运动取得成就后必然会达到的规模而有落后的危险。在《论消费合作运动》一书中，他们就革新合作社的管理方法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但是他们的计划始终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

在1914年以前的那段时期，韦伯夫妇主要以鼓吹官僚主义国有化和市有化的优点而著称，这个名称也许是很不应该加在他们头上的。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他们以工团主义和工人管理学说的主要批评者的姿态出现，同时也是由于费边社（他们名符其实地被认为是该社的领袖）在这个时期正积极大力鼓吹公有制。不过事实上，费边社这一阶段的活动同H·G·威尔斯闯进社来以及年轻的社员竭力反对“老派”而要求采取更富进取精神的社会主义政策有更密切的关系，韦伯夫妇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1911年以前，韦伯一直忙于济贫法运动，根本拿不出许多时间来注意任何其他问题。后来，他们确实通过费边工业管理研究会积极地抓起这个问题，该委员会后来成了费边社的研究部，往后又成了工党研究部。不过，他们研究这个问题的角度远远不是武断地赞成在文官机构的控制下实行工业国有化，而是热衷于探讨其他可能性，特别是尽量为市有企业、地方企业以及合作社企业留

出余地。他们对于建立公立企业公司的计划也没有任何成见，韦伯²¹⁵对于首都自来水管理局和伦敦港务管理局就没有抱任何成见，只要这种企业公司最后向民选代表所组成的民主管理机构负责，而其组织也同政府控制下的经济规划总方式相配合就行。悉尼·韦伯在他于1916年为费边社所编辑的《如何负担战费》一书中发挥了这些概念。

在强调必须尽最大可能发展市有企业而不发展国有企业时，韦伯夫妇——实际上还有整个费边社——完全认识到地方政府目前的管辖范围在许多情况下都不适合经营现代技术条件下的主要公用事业。1911年以《费边市政计划》为名发表的一系列费边社短论，所谈的几乎完全是伦敦的事情。其中包括有关煤气、电车、自来水、码头和市场的市有化问题的建议，同时还有关于接收市基尔特的财产以及修改地方税制的办法。这一系列短论的最后一篇以《供公共当局参考的劳工政策》为名比较全面地概述费边社的政策。此后，费边社源源不断地出版了许多小册子，涉及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其中一部分是关于伦敦的，其他部分则几乎把每一种类型的地方政府的工作都包括在内了。在特别谈到的问题中，有以下各项企业的市有化问题：酒类买卖（1898年）、牛奶供应（1899年）、当铺（1899年）、屠宰场（1899年）、面包房（1900年）、医院（1900年）、火灾保险（1901年）、泰晤士河上的轮船（1901年）以及电力供应企业（1905年）；此外又出版了一本泛论《都市贸易》（1908年）的小册子和肖伯纳所著的《都市贸易常识》（1904年）一书。与此相反，在1910年以前，主张把某一具体公用事业收归国有的，则只有《为爱尔兰建设国营铁路》（1899年）这本小册子。后来，费边社中主张国有化最热心的艾米尔·戴维斯发表了《论国家购买铁路的问题》（1910年），劳森·多德发表了《国家保健事业》（1911年）（在保险法案提出时出版）。1913年，H·H·施洛塞尔（即后来的法院

院长施列塞尔)为矿工联合会写了一本小册子,其中包含由文官机构主持煤矿国有化事务的法案草案条文。此外还有 C·阿希莫尔·
216 贝克写的一本论《公营和私营的电力供应》(1913年)的小册子。上述各篇短论并不足以说明特别注重国营企业而不注重市营企业。

1905—1906年,费边社员发表了一系列短论;这些短论的总名称为《新七国论丛》。在这些短论中,他们企图解决由于市府辖区不适于经营主要公用事业而产生的问题。第125号短论名为《分区实现市有化制度》,费边社员在其中提出了一个计划,准备组成七个左右通过选举产生的地区当局来实现这一目的,分阶段授与这些当局以庞大的行政职权,并在其他方面就需要在较大地区内进行协调的工作对较小的地方当局进行监督管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悉尼·韦伯由于支持1903年的教育法案而被进步派解除了他在伦敦郡议会中的举足轻重的主要职务,而比阿特里斯·韦伯也开始了她在济贫法委员会中的工作。结果,他们的主要精力就不再放在地方政府方面了。在围绕 H·G·威尔斯而展开的费边社斗争中,他们没有起主要作用,宁可让肖伯纳代表“老派”去进行大部分的论战。自威尔斯插曲结束直到1914年,费边社内部竭力鼓吹国有化政策的主要人物,不是韦伯夫妇而是艾米尔·戴维斯(1875—1950年)。他在《塑造中的集体主义国家》(1913年)一书中特别鼓吹了这一点,这本书后来改名为《经营企业的国家》。利奥·契奥萨·孟尼爵士(1870—1944年)所著的《财富与贫穷》(1905年)是这个时期最起作用的宣传著作之一,他还以《国家的财富》(1914年)和《国有化的胜利》(1920年)两书对国有化问题作出了贡献。

直到1918年以后,韦伯夫妇才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出现在《英国社会主义联邦宪法》(1920年)一书中,他们在书中建议设立两个平行的议会,两者都由普通选民以民主方式选出,一个处理政治事务,另一个处理社

会事务。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了一项奇怪的建议，其内容同西萨尔·德·巴普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所提的建议十分相似，主张建立一套以固定的地方单位为基础的地方政府制度，这种单位可以在不同地区内联合起来兴办各种公用事业，这样就可以选用适当的地区兴办每一种公用事业；或是选用一个单位兴办某几种事业，选用另几个单位兴办另一些事业，还有一些事业则由许多单位组成的大区来经营。同一批代表应该作为本选区的直接代表参加所有联合机构。这个计划遭到了严厉的抨击。批评者的论点是，实际上不可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来划分两个议会各自的范围，而且掌握最高财政权的那个议会——也就是有权筹款和控制开支的议会——也必然会对另一个议会享有无上的权力。至于地方政府计划，批评者说，根据所经营的事业而不断改变其组织成分的机构永远也不会养成整体合作的习惯，而这些机构的效率却必然要取决于这种合作；再者，实际权力也会落在一些官员手里，那些应该由民选人员作为消费大众的代表加以控制的公用事业实际上就操在这些官员手里。韦伯夫妇很少打算或者根本没有打算回答这些批评。看来情况似乎是，在发表了自己的计划，发现所得到的反映很坏以后，他们就对它失去了兴趣。可以肯定，他们晚年几乎从未提到这一计划。

《英国社会主义联邦宪法》，大概就是韦伯夫妇针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以及主张某种形式的职业代表制的不同人物所作出的答复。职业代表制的概念，也就是关于独立的工业议院（也许想用它来代替目前的上院）的概念，当然绝不是什么新颖的设想。在战争年代里，这个概念在英国再次出现。当时，这个概念并不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而是那些希望以阶级利益协调为基础实行某种工业自治计划的人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作出的答复。提出这个概念的通常形式是，要求成立一个同等地代表劳资双方的

工业议会，在某种情况下还增设“公正人士”代表公众；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则是根据“一议员一票”的原则组成代表基尔特的议会或者议院。韦伯夫妇对两个计划都无分轩轻地表示反对，他们坚持这两个拟议中的议会都必须以“消费者”的普选权为基础。这个主张既没有满足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没有满足阶级协调论者，同时也遭到议会政治家的反对，后者认为它破坏了议会不可分割的主权。韦伯夫妇关于地方政府的建议似乎是比较阿特里斯的高明主意，据她的日记记载，她是在听取 H·G·威尔斯的讲话时想起的。

毫无疑问，韦伯夫妇当时既由于威尔斯站在准技术统治论的立场上鼓吹公共企业而受到影响，同时也由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攻击官僚主义的集体主义而受到影响。他们认识到官僚主义的工业管理是危险的，希望在实际可行的范围内由消费者对社会化的工业和公用事业进行最大限度的监督。他们尽管作了一些让步，但是仍然坚持国家适于作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者。他们从来没有制定过任何明确的行政管理计划。韦伯夫妇对这一问题长期感兴趣，他们始终没有就这一问题提出计划就多少令人感到奇怪了。我想他们曾经做过尝试，但是失败了，于是便留待他人去详细拟定通过国营企业公司实现国有化的方式；保守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实际上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赫伯特·摩里逊在 1930 年提出伦敦运输业社会化法案时又从保守党手里接过这种方式。

我根本不打算在本章里讨论韦伯夫妇思想的后期发展，他们后期的思想是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关于苏维埃共产主义的长篇文章为中心的。关于费边思想令人诧异地同共产主义相结合的情况以及列宁主义建设的情况，最好是放在本书第四卷中去讨论；在那一卷里我们还必须讨论肖伯纳对出现独裁者的反应。就目前来说，我们所关心的主要是韦伯夫妇和肖伯纳 1914 年以前的

思想发展情况，尽管为了完整地交代韦伯夫妇战前的态度，有必要把他们的情况一直叙述到二十年代初期。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说：韦伯夫妇 1914 年以前主张市有化的程度无论如何要比他们主张国有化的程度大得多；此外，费边社更加强调国有化的趋向主要也不是由于他们的影响，而是由于 H·G·威尔斯以及他以后的艾米尔·戴维斯的影响。 219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肖伯纳的地位就难于确定得多。他曾多年担任费边社出版物的主要撰稿人，自许为韦伯夫妇基本思想的忠实阐释者，但是实际上他总是提出自己的一套十分不同的主张。如前所述，肖伯纳的主导思想首先是这样一个意向：没收根据土地或资本所有权而获得的他统称之为“租金”的收入，并把它用之于公众；第二是这样一个愿望：在经济上走向完全平等；第三是这样一个信念：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任何集团或国家无权阻止他人充分开发集团或国家所拥有的任何生产资源，为此只要能增加全人类的总财富，先进的文明国家就完全有权把自己的意志施加于落后的民族，不考虑民族或某一部分人的权利。上述第三个概念直接促使他坚持，控制事物的最高权力应该由那些最了解如何取得这种成果的人去掌握。肖伯纳并不仅限于希望专家承担实际的管理工作，他反复提出的一个论调是，政治应该是专家的事情，参加政治的任何权利都取决于是否具备参政的条件，而不应推广到那些不愿意劳神费力去得到充分知识的外行人身上。肖伯纳对愚蠢的人是不宽容的，而他又认为大多数人都是愚蠢的。那些脑筋迟钝或能力有限的人总是不愿别人逼得太紧或是沦为古怪的聪明人的牺牲品；对于这种愿望，肖伯纳丝毫不抱同情。

如果说韦伯夫妇影响了肖伯纳，使他成了她们夫妇许多思想的通俗解释者，那么肖伯纳也影响了韦伯夫妇，在对待帝国和民族问题的态度上尤其如此。有很长一段时间，韦伯夫妇对这类问题

没有多大兴趣，实际上他们对英国以外的任何问题都是这样。韦伯夫妇的社会主义是专门为英国而设想出来的，他们并没有打算去弄清楚这种社会主义对其他国家的什么问题具有什么含意。他们对“国际”也从来没有多大兴趣，但是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是自觉的国家主义者，他们肯定不是这样的人。这是由于他们在1914年以前专心致志于研究英国的制度和英国的问题，以致没有时间注意任何其他问题。另一方面，肖伯纳对于自己是爱尔兰人而不是英国人的身份，对于自己客居异邦的处境总是非常在意。但是这一点非但远没有使他成为一个爱尔兰爱国者，反而使得他本能地具有一种非国家主义的看法。他对自己的国家受教士操纵把持的政治十分鄙夷，而对农民的头脑则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厌恶感；他往往把所有落后民族都看作是低级的爱尔兰人，有必要清除他们的原始迷信思想，诱导他们接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当韦伯夫妇真正开始注意国际问题的时候，他们首先在南非战争问题上，后来在更广泛的帝国问题上，接受了肖伯纳的许多看法。他们象肖伯纳一样，对于作为一种情感而存在的民族主义是不同情的。他们在维护先进国家专横地统治原始民族的权利方面始终没有象肖伯纳走得那么远；但是整个说来，凡因帝国主义问题而发生意见冲突时，他们总是站在肖伯纳一边。

肖伯纳跟韦伯夫妇不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家来说，并没有真正的重要地位。他只是在希望通过赋税消除不劳而获的收入，并把这一笔收入用来发展公用事业时，赋与了“租金”这个词以特殊的意义，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创见。他所著的《为平等辩护》一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新内容，它跟“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老说法主要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保留了货币收入，使货币收入平等，而不是一种直接走向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概念。在这种社会中，人人都可以尽量取得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而不必付钱；肖伯纳凭常

识就把这种空想否定了，认为这是在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条件下都无法实现的。他坚决主张由最明事理的人来指挥一切。这种看法也不是什么伟大创见，只是用不同的文字重复圣西门派的学说而已。肖伯纳是一个出色的理论阐释者和短篇论文作家。只要他有明确的论点可以提出，他就能用一目了然的笔调提出之，而韦伯夫妇——特别是悉尼·韦伯——则最善于为明确的论点提供素 221 材。但是肖伯纳在陈述自己的论点时，其效果却根本不是很清楚的，例如他的《知识妇女用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释义》（1928年）一书就是这种情况，因为除了一些很有限的普通概念以及那种阐释他人思想的高明手法以外，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主见。

在韦伯夫妇和肖伯纳之下，费边社的主要思想家是格雷厄姆·华莱士，他不久就发现费边社越来越教条主义，同自己的志趣不合而退了社。华莱士晚年对职业组织的利己主义深恶痛绝，认为这些组织是自由和进步的死敌。这种看法贯穿在他所写的《我们的社会传统》（1921年）一书之中；由于这种看法，这本书具有他的后期著作所特有的否定性质。华莱士的真正贡献是在早期作出的，特别是在第一本理论著作《政治中的人性》（1908年）一书中作出的。常有人说，从那本早期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有可能写出一部真正伟大的著作，但是他用尽一生的余年并没有能写出这部书。在《伟大的社会》（1914年出版）一书中有某种迹象说明他正在安下心来写这部书，但是甚至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在动摇不定，没有能沿着真正建设性的道路发展自己的思想。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他认识到并以犀利的笔法叙述了一般政治行为中的大量非理性因素（这一点以前已经有人说过，即使还没有人说得这样透辟）。不仅如此，作为一个主张在政治实践中必须加强理性因素的理性主义者，他还曾设法探讨怎样才能加强这种因素，而且也曾想出提高政治和社会教育效果的办法。他的观点是边沁派的观点，

认为政治的最高目的就是使人快乐，人人有权在社会的总结构中按照自己的性情追求幸福。这种看法应该成为出发点，据以考虑以下各点：二十世纪的社会必须在多大程度上使个体成员接受标准行为方式；集体行为方式怎样才能在总的格局中得到自由发展的余地；怎样改革教育，使之在制定社会行为方式的过程中增加理性因素；这一切怎样才能由人民自己以民主的方式去完成，而不是使人民在优越人物的统治下或既得利益阶层的压力下去完成。

222 但是华莱士并没有执行这个宏伟的研究计划，而仅仅是建议这样做，他始终没采取任何实际步骤去实现它。我认为，单就一堂课来说，他是我所听到的最发人深省的授课者；但是在听完他所讲授的一堂课以后，我就得出结论，他不可能继续保持这种启发性，因为他在第一部著作中已经耗尽了那种从实际出发去观察人类的动力，此后就满足于反复玩味他从这些令人赞叹、但又不够充分的接触中所得到的灵感。

《政治中的人性》和《伟大的社会》这两本书合在一起，重新阐述了费边社式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放下了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出面干涉，以防止大众受苦，并通过集体手段积极增进大众幸福。不论是韦伯夫妇还是肖伯纳都从来没有明确说明过这个概念，虽然它是他们为费边社所写的许多著作的基础。华莱士既是集体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这是他的一大优点。不幸的是，他缺乏毅力去完成那项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完成的伟大的脑力工作。

(III) 大动荡的局面：工党及其领袖：工团主义 和基尔特社会主义

人们常常说，英国在 1910—1914 年处于“工人骚动”的时期。

的确,这几年的标志是:爆发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罢工,工会会员人数迅速增长,而新思想和新政策也在酝酿中。在为劳合·乔治的预算案而上院进行的斗争中,在为爱尔兰自治问题而同托利党的坚强力量发生的冲突中,工党都是跟在自由党后面走的。由于在支持工人阶级的要求时瞻顾不前,工党受到了许多指责,而工会领袖也由于拒绝支持跨行业工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激进罢工政策而不断遭到攻击。当时后两种人大声疾呼,要求工会合并成更全面的组织,以便把同一工业部门的所有工人纳入一个工会,而且要求这种工会联合成一个关系紧密的联合会,甚至组成一个“大工会”。同时,他们也严厉谴责了分别跟雇主们签订期限不同的合同,从而使工会无从采取共同行动的政策。举行“声援性罢工”的理论也被提了出来。这种理论大力主张,凡是发生劳资纠纷的企业交出或收进的“禁止受理货物”,任何工人都不应该过手。整个工人阶级应该根据“伤我一人即伤我全体”的原则组织起来并采取行动。 223

同这些要求一并加以宣扬的还有一种“工人控制”说;这种理论主要是从法国工团主义者那里得来的,同时也来自世界产业工人协会。这种理论宣称,工会(倒不如说是应该取而代之的跨行业工会)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在工资制度下保护其成员的利益,而在于废除“工资制”或“工资奴役制”,从资产阶级手里取过工业控制权。这种理论认为国有化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予以否定,甚或全盘反对之,理由是它会使工人依然故我,沦为工资奴隶,只是国家取代私人雇主成为工人的主人罢了。1912年出版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矿工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它以公然反抗的口吻提出了“矿山是矿工的矿山”的新理论,反对国有化的主张;这个小册子是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的一个非官方改革委员会出版的,该联合会同采矿公司——特别是坎布里安联合企业——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冲

突。当时各种各样的跨行业工会主义和工团主义集团都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各执一见，莫衷一是。有些集团把全部信心都寄托在革命的劳工行动上，对一切缺乏革命性的“政治行动”都嗤之以鼻。另一些集团虽然把直接行动放在首位，但是不肯完全放弃议会方法，而希望由一个革命的社会党来代替“自由党劳工派”的工党。还有一些集团则追随德·里昂的路线，要求建立一个革命党，在这个党的领导下掀起革命的产业工人运动。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国家
224 基尔特运动，它的计划是以工会为基础，成立国家特许的工人基尔特，在经过改造摆脱资本家控制的国家的监督下，作为公社的代理机构接管工业的经营管理权。国家基尔特派最初是一批知识分子。以 A·R·奥尔雷奇的《新时代》作为他们的机关刊物。直到 1912 年前后，他们才开始吸引了工人阶级的追随者；而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运动则主要是在 1914 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工会和社会主义集团在思想和运动方面所发生的这种骚动现象，是范围更广泛的骚动的一部分。这种现象是在埃米林·潘克赫斯特夫人的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所领导的战斗性妇女参政权运动爆发以后出现的。潘克赫斯特夫人的联盟早在 1903 年就开始推行一种战斗性较温和的政策，对政治集会进行干扰；到了 1906 年又掀起一个运动，专门找内阁大臣和政党政客的麻烦并破坏财产，以抗议当局一直拒绝给予妇女参政权的作法。劳工发生骚动时，爱尔兰的动荡局面也日益加剧，而托利党的政客和将军们则宣称：他们不会参与迫使爱尔兰新教徒服从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事，也不会参与分裂联邦的活动；同时又宣布：如果北爱尔兰人叛乱，他们将拒绝进行镇压，甚至会站在他们那一边作战。与此同时，国际局势也日益紧张，危机一再出现，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造成产业工人的骚动中，物价不断上涨而工资又没有相应增加这一事实也起了作用。1906 年以前，塔夫·维尔裁决压制罢工

行动,严重地削弱了工会的谈判力量。就在这一年,劳资纠纷法案获得通过,从而恢复了罢工权利,但是往日郁集的不满情绪仍需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爆发为大规模的劳资纠纷。1906年以来,罢工一直在增加,但由于1908—1909年的工业衰退而受到了抑制,直到1910年才形成为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广泛要求。1911年是关键性的一年,大罢工在海员和水运工人中间象燎原大火一样蔓延开来,铁路工人也爆发了全国性罢工,南威尔士的煤矿中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翌年,矿工举行了全国大罢工,而伦敦的运输工人则在第二次斗争中遭到了失败。1913年,英国没有发生一件突出的劳资纠纷,但是在爱尔兰却发生了都柏林大罢工——或者说闭厂拒 225
工。这象征着劳工队伍的内部冲突和劳资之间的阶级冲突。到了1914年,甚至在战争快要爆发以前,工人骚动的浪潮似乎在减退,但是在伦敦的建筑业中却仍然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而原先在1911年和1912年的斗争中发挥过主要作用的三个集团则采取步骤,组成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的三边联盟,旨在同时提出要求,并保证在没有取得一致同意时决不复工。然而,这个联盟直到战争结束以后才开始发生作用,后来在1921年惨遭失败的斗争中瓦解了。

这场大动乱发生的时候,正是自由党政府由于同上院进行斗争而丧失了最初的锐气的时候,也正是自由党政府拟订全国性保险计划作为新社会政策的时候;此外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也正是它表示要授予工会以参加执行这一计划的权利,从而间离工会领袖和社会主义者的关系的时候。并不是所有工会领袖都赞成劳合·乔治的计划;除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之外,也还有许多普通工会会员反对这个计划以缴款为基础的做法。但是,这个计划毕竟得到了足够的支持,致使工人无法集中力量进行反对;事实上,只有左翼展开了机动零散的反对活动。劳合·乔治所提出的

主要从雇主和工人每星期的缴款中分别拨出“9便士和4便士”的办法，自有其吸引人处；只有左翼认真考虑了希莱尔·贝洛克的预言：强制扣除工资的做法是“奴役国家”临头的先兆。尽管如此，保险法案由于疏远了左派，因而成了促使工会主义者走向战斗性的劳工行动的一个因素。

226 这些年的大罢工是“官方性质的”，这也就是说，大罢工是在正规的领导下由工会号召举行的。但是，随之也发生了多次规模较小的罢工，其中有许多是突然举行的，事先并没有得到工会的正式批准。除了都柏林在1913—1914年所举行的那次罢工以外，工会在大罢工中所争取的是久已确定的目标：即承认工人在劳资协议中的谈判权、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许多规模较小的劳资纠纷也是为了同一些问题而引起的，因为当时仍然有许多雇主拒不承认工会；劳资谈判在大多数工业中仍然是地方性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同个别的公司打交道。但是也有许多劳资纠纷是为了一些不那么常见的问题而引起的，例如反对不得人心的领班或经理的罢工、反对“鼓动分子”的专制或欺骗行为的罢工、非直接有关的工人所举行的声援性罢工以及反对雇用非工会会员的罢工等。甚至还有一次被大多数报纸激烈地指责为“争取酗酒权利的罢工”，这次罢工是由于辞退一个在工余时间喝醉酒的机工而引起的。评论员们指出，工人中间存在一种维护个人和集体权利并要求社会平等的新精神；这使既定秩序的维护者感到恼怒。雇主们抱怨说，工人们完全越出了正当的范围，干涉了纪律和管理问题；有些雇主要求采取强硬措施以压制这些暴发户，而另一些雇主则在自由党政府的鼓励下谋求促进“劳资和平”的办法。

我们这里所关心的只是这场骚乱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如前所述，在自由党政府活动的初期，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传播，独立工党和费边社都因此得到了好处。社

会民主联盟在其他左翼团体的支援下，发展成了英国社会党；人数很少但力量很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开始从克莱德河畔发展到一些城市，特别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些城市。工党虽然还没有表示拥护社会主义，但已参加了社会党国际的工作；在公众看来，它至少是一个社会主义组织。但是，英国根本不存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庞大的社会党，甚至连法国那样大的党也没有。英国所有的社会主义团体都很小，工党虽然从参加党的人数来说规模很大，但几乎没有独立的组织，也简直没有进行任何宣传。在任何地区，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宣传任务都落在社会主义社团的地方组织身上——大部分落在其中最强大的独立工党的地方组织身上。独立工党内部对于工党在议会中的行动是非常不满的；这种情况在 227 一部分人分裂出去参加英国社会党以后也同样存在，并不稍减于分裂之前，而且外来的新思想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独立工党是工党的实际创始者，同工党关系密切，独立工党的领袖大部分也是工党的领袖，威望很高，这使得大多数追随者只能发发牢骚，而不能有其他表示。

在 1906 到 1914 年的议会和全国，工党的主要领袖是凯尔·哈迪、腊姆齐·麦克唐纳、菲利浦·斯诺顿和阿瑟·汉德逊，除了最后一人，这些人也都是独立工党的领袖。第二流人物中有布雷德福的 F·W·约维特和曼彻斯特的约翰·罗伯特·克莱恩斯（1869—1949 年），这两人也是独立工党的领袖；此外还有伍尔威治的威尔·克鲁克斯和机械工人工会的乔治·尼科尔·巴恩斯（1859—1942 年），他们同独立工党也有关系。乔治·兰斯伯雷不能算作党的领袖，他曾辞去议员职位以便作为妇女权利的维护者重新竞选，结果失败了；此后他就成了同《每日先驱报》有关的一个反抗集团的中心人物，这家报纸当时绝不是官方机关报，而是出言不逊的反抗性左翼报纸。在妇女中间，杰出的人物是玛丽·R·麦克

阿瑟（1880—1921年，在私人交往中她的称呼是W·C·安德逊夫人），她是全国女工联合会奋发有为的书记，而且同她的丈夫一道在独立工党中活动。在工会主义者中，主要从事工会活动而不大从事政治活动的最为杰出的人物有：炼钢工人工会的约翰·霍奇（1855—1937年）、矿工工会的罗伯特·斯米利（1857—1940年）、码头工人工会的本·提勒特（1860—1943年）以及铁路工人工会的比较后进的J·H·托马斯（1874—1949年）——这是一个混合体，其中斯米利和提勒特是左翼，霍奇和托马斯是右翼。

在所有这些领导人中，凯尔·哈迪（1856—1915年）的威望远远高于他人。他曾先后为建立独立工党和劳工联盟而奔走；他意志坚定，目标专一，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是1906年工党领袖的当然人选，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项工作是极不愉快的。议会那种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的作风和他的气质不相投，他生性喜欢斗争，当他为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者进行斗争时感到最愉快。虽然为工党奠基的折衷方案主要是他拟定的，但是他始终不喜欢这个方案。他非但很不信任自由党人，而且也很不信任听从劝说自称为“工党党员”的旧式自由党-劳工派，以及那些热衷于搞党派活动的新政客。但是他却非常忠于自己所缔造的党和党内的同志。1907年，他获准辞去领导职务，这时他感到高兴多了；相继接任领导的人是D·J·夏克尔顿（1907年），阿瑟·汉德逊（1908—1909年）和G·N·巴恩斯（1910年）。到了1911年，领导职务由腊姆齐·麦克唐纳接任，以后连年当选一直到1914年，最后这一年他由于对战争的看法去职，由汉德逊接任。

哈迪本质上是一个传播信仰的人和宣传鼓动家，而不是一个议会领袖。他那朴素的口才适合于在讲坛上发表讲演，但是除了激于义愤，畅所欲言的时候，他并不适于在议会里讲话。他非常痛恨残酷和压迫，从思想上来说，他是从伦理的角度去看待一切社会

问题的。哈迪的社会主义就象布拉奇福德的社会主义一样，是一种友爱和正义的福音，同情普通大众的疾苦，淳朴地相信大多数男男女女就其本质来说是善良而正派的，在一个不容许压迫和被压迫的社会中是能够永远过幸福生活的。如前所述，他不同于布拉奇福德的地方在于他是清教徒，非常轻视轻浮和放荡的作风，具有非国教的宗教思想——这种思想尽管抛弃了神学教条，却是虔诚敬神的，总是把不良行为当作“罪恶”看待。哈迪承认阶级斗争是一个事实，也许还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尽管他吸取了马克思主义中一些关于资本主义和历史发展的概念，他的思想却始终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他并不迷恋于斗争，也不从那种排斥伦理观点的科学方法的角度去看待斗争。他之所以向往社会主义，是因为他相信社会主义能增进人类的幸福，而在一个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并为谋求利润而加以利用（或是弃置不用，或是加以滥用）的社会中，人类是得不到幸福的。与此同时，他希望229尽可能改善贫寒者的处境，尤其是失业者及其家属的处境。促使他以极大的热情奔走呼吁的是劳动权，其次是最低工资限额和8小时工作日制（他称之为休息权利）。煤矿中的工伤事故使他极为愤怒；他完全倾向于把这类事故归咎于唯利是图的老板不肯花钱去确保劳动安全。

除了上述一切以外，哈迪还是一个热诚的国际主义者，但是他所热衷的是防止战争，而不是煽起国际反抗运动。他的国际主义不同于罗莎·卢森堡，主要并不在于呼吁全世界的工人抛却国界，团结一致。他的主张中也有这个因素，但这并不是为了发动世界范围的革命，而是为了防止战争。在哈迪看来，战争是一场规模巨大的煤矿惨剧，同样是帝国主义剥削者贪得无厌的结果，他们为了追求利润不惜在战争中牺牲人类的性命。他大力反对帝国主义，所著《印度》（1909年）一书主要是揭发资本主义的竞争对印度工

艺的破坏以及税吏和高利贷者对农民所造成的损害。他对被奴役人民的疾苦抱有一种本能的同情,而对那些准备维护帝国,把它当成一种手段,借以利用廉价的殖民地劳动力以谋取利润的人则报以鄙视。

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精微奥妙之处,哈迪并没有多大兴趣,也从来没有试图描绘一幅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清晰图景。他对自己晚年所遇到的那些造成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争论,除了涉及战争与和平这一重大问题以外,大都抱超然态度,而只是继续宣传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所宣传的同一套理论,只有对党的忠诚才阻止他进行宣传,这时他宁愿缄口不言。但是一涉及到战争危机,他就不得不说话了。仅仅由于感到如果不有所作为以防止战争就等于背叛,他便成了力主举行总罢工以反对战争的鼓吹者。1914年,大战爆发,他对这场浩劫本身以及“国际”因面临战争而崩溃的事实,都确实感到心力交瘁。这时,他已经是一个疾病缠身的人,不能有多大作为。我认为大战爆发这一事实加速了他的死亡。

230 妇女问题也使哈迪深为烦恼。下院的多数议员本保证支持妇女参政运动者的要求,但后来又一推了之,这使她们大为忿怒,哈迪对此深表同情。他对妇女问题的看法很象乔治·兰斯伯雷,但是他不能象兰斯伯雷那样采取行动,因为他认为自己必须忠于独立工党和工党的同志。在他的心目中,妇女问题只是一个简单的公理问题;好斗分子曾指责他背叛这个事业,他感到非常难过。

腊姆齐·麦克唐纳(1866—1937年)在1914年以前的危急年代担任工党的领导,他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同哈迪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两人都是中产阶级父亲和劳动妇女的私生子,但是成年以后他们却好象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级。哈迪基本上始终是一个工人,尽管他在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很久以前就以新闻工作为生。而麦克唐纳在身心和举止上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他的声音宏

亮，仪表堂堂，看上去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领袖，因而他的动摇和犹豫往往不为人所注意。他的谈吐和仪表给人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人们往往错把他言论中经常出现的模棱不实之词当作渊博深奥的表现。当然，从思想倾向上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的才智并不是第一流的。他就自己所了解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写了一本书：《社会主义和社会》；此书不折不扣地是一本二流著作，内容充满了生物机体的类比，实际上没有什么其他东西。这是那个时期的典型产物，里面到处都重复照搬赫伯特·斯宾塞的话和通俗的科学词汇；这一切都用来说明社会是一个由生理器官所组成的有机体，这些器官对社会的共同生活分别发挥自己作用。麦克唐纳把社会行为的趋势说成是一种不可抗拒地走向这种有机统一的趋势，到此他的思想就停住了，结果便形成了一种最粗糙的进化论，对于发展过程中所需克服的敌对力量几乎毫无认识。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具备伪科学的外形，但无疑是伦理性的。然而，他的伦理观却完全缺乏凯尔·哈迪的伦理观所具有的生命力——即对社会正义的热情和对压迫凌辱的憎恨。

麦克唐纳后来所写的《社会主义与政府》一书要好得多，因为 231
在这本书里他主要是写施政的方法而不是基本概念。他无疑是一个干练的议会政治家，而且在他自己所设想的信念的范围内，对于哪些事情办得到、哪些办不到是有鉴别力的。他最为拿手的几件事中有一件是攻击比例代表制，还有一件是维护议会方法，反对约维特之流的评论者，这些人主张以地方政府行政为蓝本来改革议会。但是，就麦克唐纳的思想素质着眼，即使在他最出色的时候，他也决不是很高明的，因为他的思想既不鲜明，又不精确。他喜欢含糊其词，不愿意作出明确的然诺，甚至对 1914 年的战争态度也不是明朗的。他攻击导致战争的外交，但是对战争实际爆发时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则闪烁其词。后来，这种暧昧不明和优柔寡断的

习性在他身上越来越严重。1929到1931年，他担任第二届工党政府的首相，这种习性表现得最为突出。

麦克唐纳是一个爱虚荣的人。正因为如此，他很不好共事。当事情出了毛病时，他总是把过错推在别人身上；当事情顺手时，他又把功劳归于自己。他最爱接受奉承，但又很难赏识共事者的优点。在他过人的品质使他爬上最高地位以前，除了少数人以外，大家都没有看清这些缺点。而在爬上去以后，这些缺点就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特别是在他同阿瑟·汉德逊的关系上。麦克唐纳还有一个缺点，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势利之徒，对于贵族阶级五体投地，总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地属于这个阶级。

阿瑟·汉德逊（1863—1935年）跟哈迪和麦克唐纳都很不相同。他没有虚荣心，但也同样缺乏哈迪的那股热情。他是一个坚定而正直的社会改革者，组织能力很强，他所抱定的目标相当有限，而实现的决心却十分坚定。他出身于工人阶级，在他所属的工会——翻砂工人工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在他那个阶级里是一个极富代表性的人物。他终身是一个非国教教徒，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从自由党路线转向工党路线，并不是因为他改变信仰，相信了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他深信工人需要一个独立的政党来坚持自己的要求。虽然他和悉尼·韦伯一道设计了“新型”的工党（该党从1918年起就公开宣布遵奉渐进的社会主义），但他始终不是一个地道的社会主义者。他不从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角度去看未来，也不从社会基础的革命性变化的角度去看未来，而是从逐步建成一个福利国家的角度去看未来，这个国家需要大大加强国家的干涉和监督。他对制订劳动保护法和扩大社会保险事业很感兴趣；他对这些具体改革的兴趣要比对未来事物的任何幻景的兴趣大得多。到了晚年，他表现出了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但是这种国际主义决不具备特别的社会主义性质。对他说来，这个

问题始终主要是缔结裁军条约、接受国际仲裁以及向理智之士发出呼吁的问题，而不是动员全世界的工人去反对战争的问题。在工会事务方面，他耐心而又坚持不懈地鼓吹劳资和解。

作为一个领袖，汉德逊的伟大品质在于他忠于党，并且在为党工作的时候愿意不考虑自己。跟麦克唐纳不同，在做了错事的时候，他愿意承担应负的责任，而在取得成就的时候则愿意让别人充分享有荣誉。最易于使他发怒的事首先是他所认为的不忠诚的行为。在放弃了过去那段为自由党工作的经历以后，他就完全献身于自己所加入的新党。

从气质上来说，在上述三人中，汉德逊最适合自己的实际生活环境。他希望拯救社会底层受压迫的人群，使大部分工人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并给予他们更多的保障；但是他并不愿意激烈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对社会地位没有野心。他喜欢参加非国教教会的集会，也喜欢同星期六下午看足球的人群厮混在一起。他既不求名，又不求利，也不作任何与本来面目相去很远的非分之想。在他看来，只要得到社会立法的帮助，他所企求的东西对他人说来就不会是过分珍贵或高不可攀的东西。他说话时并没有口 233 才，但很善于把问题说清楚，也能以有效的方式把愚蠢或粗心大意的对手驳倒。他个人完全没有吸引人的力量，而且我认为他也根本不相信这种力量。他同悉尼·韦伯的关系非常好，在这些方面，悉尼·韦伯跟他很相象。尽管他有种种局限性，工党得力于他的地方仍然非常大，而他却最不愿意因此而要求给予回报。

菲利浦·斯诺顿（1864—1937年）同上述三人都不同。他是一个毅力非常强的人，始终在同严重的身体缺陷作斗争，这种斗争使他很感痛苦。他非常武断，非常自以为是，而且非常容易把别人看作傻瓜。他喜欢辩论，在辩论中对于较弱的对手毫不容情，但是他在严厉的话语中往往带有一种讽刺性的幽默感，这就使他不

于招人憎恨。他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狭隘的教条主义的。他坚信国有化的优点，对其中所牵涉的人事问题没有认识。在经济理论方面，他始终是一个老式的激进主义者，讨厌非正统的或新奇的概念。他怀着十九世纪的那种热情坚信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根本不相信工会有力量通过劳工行动取得实际利益。甚至在发生劳工大动荡的年代，他仍在告诉工人说，只有劳工立法才能使他们得到好处。这使他高出他的许多同道，成了一个似乎更加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如果社会主义可以同集体主义相题并论，混为一谈，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此外，他一直到了晚年都比大多数同道更加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这既是因为他讨厌理论上的细微区别，同时也是因为他衷心赞成建立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除了这种信念以外，他对社会主义理论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但是他的说理却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才思敏捷，思想有条理。他从不放弃一个论点，或者承认自己被驳倒；他还往往单纯通过坚持己见的作法把对方拖垮。他同麦克唐纳长期密切合作，但是彼此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好感。斯诺顿看透了麦克唐纳的肤浅和优柔寡断，而麦克唐纳则常常发现斯诺顿直言奉上的作风往往带来很大的不便。但是，命运使他们成了终身的伙伴，而且彼此又都经不起公开的争吵。

234 弗雷德·约维特（1864—1944年）始终不能同上述那批领袖人物并列，但是又不能加以忽视，因为他有一个独特的观点，这个观点虽然始终没有流行过，但有一个时期对社会主义思想却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哈迪、麦克唐纳、汉德逊和斯诺顿基本上都是全国性的人物，而约维特则只能看作是布雷德福一地的人物。他的最大兴趣是地方性的，只关心自己出生的城市及其人民的事情。当他考虑世界问题的时候，他所见到的是一系列布雷德福城，其中的居民处顺境和逆境的能力都是相同的。他希望为布雷德福改良教育、儿童膳食、住宅、劳动条件以及娱乐设备，凡属他力求为布雷德

福的人民取得的東西，他也力求为其他地方的人民取得。他的理想政府是一个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城市，它一视同仁，让大家同享幸福。因此，当他考虑国家议会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按照自己协助建立的布雷德福市议会的形象去改造它。他反对议会那套发表空洞演说，浪费时间的做法，而主张由委员会从事实际工作。他反对政党制，因为这种制度使资历浅的议员不过成了表决机器，他主张把下院分成若干个职能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一位内阁大臣主持，认真讨论实际问题。有人反对说，这种制度会破坏内阁责任制，使每个大臣都成了自己所主持的那个委员会的奴仆。他不为这种意见所动，他说这样怎么就不行呢？‘地方政府就是这样工作的，至少在布雷德福就工作得很好。当然，他希望改革后的议会尽可能由社会主义者组成，他并不希望废除政党。他是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者，信奉独立工党的论点，在党内属于左翼。但是议会程序使他感到厌恶，特别是麦克唐纳不胜向往的那些方面。他是一个本本分分的约克郡人，从来不胡闹，而且非常谦虚善良。他并不想当全国性的领导人物，他最喜欢大伙一道工作，而不愿意当集体的头头。

威尔·克鲁克斯(1852—1921年)是伦敦东区人，对那个地区的地方政府事务很有经验，是一个很能打动人的演说家。他维护 235 “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者”的事业，曾同乔治·兰斯伯雷密切合作，力图使济贫法的实施人道主义化，并改善失业者的待遇。克鲁克斯以最纯粹的人道主义方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道德呼吁，在激起中产阶级听众的同情方面表现得最为出色。他的职业是桶匠，是一个积极的工会主义者，在政治上同费边社以及该社在伦敦的事务中同进步派合作的政策有联系。1906年，他同兰斯伯雷由于济贫委员会的活动而受到官方的严厉抨击。他们不仅被指责为肆意挥霍纳税人的金钱，甚至还被指责为对管理工作敷衍塞责，肯定有

贪污行为。地方政府委员会进行的一次官方调查，在阴谋操纵下为报纸提供了大量耸人听闻的材料；虽然在委员会中工党并不占有多数，克鲁克斯和兰斯伯雷还是受到了猛烈的攻击。结果是他们企图为失业者提供足够温饱的救济款项以及重新训练失业者以从事其他工作的活动受到了指责，但是他们的廉洁却完全得到了肯定。轰动一时的舆情平息了下去，但是报纸上已经提出的指责却始终没有撤回，整个件事使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约翰·伯恩士·同社会主义者的关系恶化。

乔治·兰斯伯雷（1859—1940年）本人不能被列为这些年代的工党领袖之一。他在他所居住的伦敦东区是一个大人物，在进步事业中则是一个更伟大的战士；他虽然属于工党，但始终反对工党的妥协政策。他从1910年12月起，有将近两年时间在众议院担任他深所喜爱的东伦敦鲍区和布罗姆莱区的议员。但是，他同党的领导总是不和，1912年出于对妇女参政权运动者深抱同情，他辞去了议员职务，以便不依靠党的支持而以妇女参政权问题为主竞选议席。结果他失败了。第二年，他接任《每日先驱报》编辑；这家报纸创办于1911年，当时是印刷工人的罢工刊物，一直作为左翼舆论的喉舌惨淡经营着。它是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仅有的一家
236 日报，直到1913年工党和工会才出版《公民日报》同它直接分庭抗礼，这时它便成了各种左翼运动的家园，从战斗性很强的妇女参政权运动到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莫不归附于它。它不仅攻击上院，而且攻击国王，它有一个习惯，称国王为“英王”而不称“英王陛下”，特别喜欢出语冒犯各界体面人物。它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不断鼓舞劳工的战斗性，同时鼓动工人掀起运动，争取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改组工会运动。码头工人领袖本·提勒特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每日先驱报》澳大利亚籍的漫画家威尔·迪森（1883—1938年）最感兴趣的是攻击正统派劳工领袖，或者把资本家画成“大胖

子”。迪森也画了一些出色的反军国主义和反战的漫画。《每日先驱报》，特别是在兰斯伯雷接管以后，大力鼓吹和平。它团结了相当一批作家，例如诗人吉拉德·戈尔德（1885—1936年）、讽刺作家C·兰顿·埃维拉德（1888年生）、当时同本书作者合作的工业记者威廉·麦罗尔（1888—1942年）、脱离自由党《每日新闻》前来参加的G·K·切斯特顿（1874—1936年），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人。当时天天都对下一期是否能出版感到怀疑，因为这家报纸没有巩固的基金，常常只是依靠最后时刻的捐款，或是依靠排字工人即使领不到工资也不肯放弃报纸才维持下来的。兰斯伯雷在写这家报纸的历史时，称之为《舰队街的奇迹》；它的确是一个奇迹，不仅对劳工的反对者说来是一个最令人烦恼的奇迹，而且对工党和工会的大多数领袖说来也是一个奇迹。

兰斯伯雷虽曾做工赚取工资，但本人并不是工人，而是一个小木材商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不过不属于任何正统教派，而且认为社会主义是基督教义的应用，是体现基督登山训众精神的现代政策。他同威尔·克鲁克斯所共同宣扬的社会基督教义，不但使他成了社会主义者，而且也使他成了彻底的和平主义者。除了为反对压迫而采取的和平性质的暴力以外，他憎恨战争和暴力。基于这个理由，他支持妇女参政权运动者和罢工工人的战斗精神，但这丝毫也没有改变他彻底反对战争的态度。他的基督教观点使他同 237 《每日先驱报》和其他左翼运动中的许多共事者疏远了，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同他们合作。他极为友好善良，极为宽厚仁慈，坚信人类基本上正直的，而且只要他相信某事是正确的，就会坚持到底。在1914年以后的战争年代里，他的《每日先驱报》迫不得已改为周刊，成了许多思想流派的反战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主要中心，而且对工会的斗士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事业普遍表示欢迎。1917年，它坚决支持俄国革命，不仅在最初阶段，而且在布尔

什维克专政阶段都是这样，但是它同时又反对作为一种理论的共产主义。兰斯伯雷具有鼓舞合作者献身事业的巨大力量。他显然没有自私的打算，是被压迫者的真诚朋友，毫不热衷于权势，因此甚至当他的和平主义激怒了他的左派朋友的时候，这些朋友往往仍然愿意从他那里接受本会很鄙夷地拒绝从任何其他那里接受的东西。

极左派的另一位杰出人物是汤姆·曼恩（1856—1941年），他曾出国几年，主要在澳大利亚渡过，1910年回国领导建立运输工人联合会。曼恩寄寓澳大利亚期间，在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他带着满脑子的跨行业工会主义和工团主义思想回到英国，迫切希望置身于英国工会斗士的前列。除了铁路工人以外，运输工人的组织都很差。海员有自己的全国工会，但是大多数船主都不予承认，这些船主广泛利用港口上的工贼。码头工人、运货马车工人和其他港口工人分属于许多零散的工会，其中大多数是地方或地区性的。码头上通常总是雇用临时工人，劳动条件非常恶劣，工资也非常低。汤姆·曼恩会同本·提勒特、驳船工人工会的哈里·戈斯林（1861—1930年）、利物浦码头工人工会领袖詹姆斯·塞克斯顿（1856—1938年）以及其他一些人组成了一个联合会，把它当作一个联合谈判单位以代替各自独立的工
238 会，也把它当作主要的工具去争取资方的充分承认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其中包括变临时工为长期工这一点在内。

曼恩是一个极为有力的暴众鼓动演说家，性喜斗争。新的联合会不久就行动起来了。1911年，首先投入战斗的是约瑟夫·赫夫洛克·威尔逊所领导的海员。海员罢工迅速地从—个港口蔓延到另一个港口，使得船主措手不及，工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罢工从海员扩大到了港口工人，虽然后者在曼恩和塞克斯顿领导运动的利物浦造成了严重骚乱，并同警察发生了严重冲突，但是他们仍

然非常成功，赢得了资方的让步。此后，罢工又扩大到铁路工人，他们的工会仍然没有得到铁路公司的承认，理由是铁路业务需要准军事性的纪律。1907年，当铁路工人工会进行“各级人员运动”以争取铁路公司的承认并建立有效的谈判机构时，已经接近爆发罢工的边缘了。在政府插手干涉以后，铁路工人工会被一个极其令人失望的调停方案搪塞过去了；根据这个方案，工人得选举代表参加为某些特定等级的人员设立的若干个小组委员会，但是工会仍然没有得到承认，工会工作人员也没有资格参加委员会或代表工人提出问题。到了1911年，这个方案所引起的不满情绪大大高涨，已经达到掀起一次全国大罢工的地步，但是劳合·乔治赶忙用一个经过修正的调停方案把它平息下去了；这个方案允许工会工作人员担任各个工人委员会的书记，替工人说话，但是仍然拒绝承认工会，并且保持选举工人委员会不容工会插手的制度。1911年铁路工人罢工的一个结果是，三个铁路工人工会于1913年年初合并成为一个所有铁路工人都能参加的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并被欢呼为跨行业工会主义运动的一次巨大胜利。但是实际上，强大的火车司机工会和铁路职员工会却拒绝参加全国铁路工人工会，而后者又同一些把铁路“店员”纳入组织的行业工会发生了激烈争执，这就阻止它成为一个有效的“各级人员”工会。全国铁路工人工会虽然在1913年确曾成为结盟的一方，决定在本卷前面所说的²³⁹基础上^①，建立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三边联盟，但是在J·H·托马斯(1874—1949年)小心翼翼的领导下，这个全国性工会根本没有实现左翼的希望。

汤姆·曼恩并不满足于自己在运输工人中所取得的权要地位，已着手发动一场全国性运动，旨在使工人阶级运动转向战斗的

① 见本卷第237页。

产业工团主义。他在一系列总名称为《产业工团主义者》的小册子和《工团主义者》的刊物中，坚持不懈地宣传劳工行动先于议会行动的论点，号召工人把跨行业工会运动发展成革命力量。他决没有象某些工团主义者和跨行业工会主义者所要求的那样，走到根本抛弃议会行动的地步，但是他完全反对工党的妥协政治，而且很快就同大多数工会以及政治领袖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不久，全国各地在各种组织的主持下，举行了由工会分会派代表组成的“一般会员”会议；主持者中从曼恩的产业工团主义者教育同盟一直到另外两个对立的英国机构（分别以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芝加哥和底特律分会为基础的两个机构），各种组织都有。在一些工业中，特别是煤矿和机械工业中，发起了普通会员合并运动和改革运动；许多地方的工联理事会站在工团主义一边积极从事活动。英国所出现的工团主义理论是法国和美国影响的混合产物。受美国影响的人往往强调这样一种概念：以阶级斗争为基础，以集中的战斗纪律和日常的斗争为重点，建立“统一的大工会”或各种工业自己的联合大工会。而那些主要受法国影响的人则往往强调运动的自发性和因地制宜的自由，更加注意工厂和其他劳动场所“工人管理”的必要性，也更加瞩目未来社会的远景。在他们看来，在未来的社会

240 中，由生产者组成的自由公社将从资产阶级手中接过工业管理权。这两个集团有时候发生争吵，但是不大关心细枝末节的汤姆·曼恩却成了深受双方欢迎的鼓吹者。

《矿工的下一步该怎么走？》这本小册子中所定下的政策，对极左派具有广泛的影响^①。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们都反对矿工联合会所主张的矿山国有化的官方政策，理由是国家象煤矿的私人业主一样，是专横的老板，其力量甚至更大。与此相反，他们要求实行

^① 见本卷第 235 页。

一种战斗性的劳工行动政策，旨在通过不断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办法去使煤矿的业主无利可图。做到了这一点以后，矿工就可以把企业接收过来，在工人的控制下进行改组，使之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与此同时，其他工人团体也应该奉行类似的政策，它们的联合行动应使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运行，从而为社会革命扫清道路。《矿工的下一步该怎么走？》使反社会主义的报纸为之哗然，以为它所代表的舆论比真正支持它的力量强大得多。但是它毕竟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提出了一种劳工行动的理论，足以赢得许多工会中有实力的少数派的支持，尽管夺取其中任何一个工会以支持它的全部纲领还有一些距离。

正在这个时候，都柏林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在爱尔兰运输工人与普通工人工会的两个成员詹姆斯·拉金（1876—1947年）和詹姆斯·康诺利（1870—1916年）的领导下进行的。不久以后，康诺利参加了1916年的爱尔兰复活节周起义，于失败后遭英国行刑队枪决；当初在组织苏格兰社会主义工人党时，他办理有关英国的事务，由是知名。象拉金一样，他曾经在美国工作，同左翼爱尔兰共和运动有密切关系。他从美国回来后，就同拉金合作，建立一个战斗性的工会，在贝尔法斯特和南爱尔兰赢得了一批追随者。这个工会从运输工人方面扩大到许多其他行业，它抵制同它发生纠纷的资方，充分利用了支援性罢工。拉金曾力图把如下概念当作跨行业工会运动的一种武器加以应用：任何工人都不得处理“不干净的货物”，不得给那些拒绝工会各项要求²⁴¹的厂商运送物资或过手它们所生产的货物。当时，许多爱尔兰工人都属于总部设在英格兰的一些工会；这些工会强烈反对爱尔兰运输工人与普通工人工会未经它们的批准就号召其会员罢工。不久，以威廉·马丁·墨菲为首的都柏林雇主就决定向工人进行回击，许多公司都宣布，它们不仅拒绝同爱尔兰运输工人与普通工人

工会进行谈判，而且实际上还将辞退现在仍然属于该工会的一切工人。于是，著名的1913年都柏林闭厂拒工事件就爆发了。左翼人物宣称这次事件是反对资本家的专制和争取结社权的斗争，但是许多工会领导人则强烈反对，认为这是拉金和康诺利的顽固政策的必然结果。

英国工会的领导人这时发现自己已陷入严重的左右为难的境地。爱尔兰人呼吁英国工人给予支援，而拉金又到英国各地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反对这些工会领袖和“资产阶级暴君”。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打动人的演说家，他的革命观点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他得到了大批英国工人的支持。职工大会不得不派遣一艘粮船到都柏林去救援挨饿的工人。一个大规模的运动也开展了起来，旨在为爱尔兰儿童在英国工人家中寻找寄养所，并要求把他们养育到劳资纠纷结束。左翼团体则忙于奔走筹款，支援被拒于工厂门外的爱尔兰人。《每日先驱报》在组织这些运动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并没有能使都柏林人免遭失败。在英国收养爱尔兰儿童的运动引起了天主教的强烈反对，英国工会领袖企图进行调解，但遭到都柏林资方的断然拒绝。1914年年初的几个月，这件事就在一片指责声中逐渐消失了。在《每日先驱报》的支持下，拉金曾设法劝说英国工会会员拒绝处理都柏林方面的货物以表示同情，但是这个企图失败了，结果只是使他同工会领袖的关系更加恶化。

242 领导都柏林罢工两个人都是非常出色的人物。詹姆斯·拉金是一个富于热情的巨人。他具有强烈的革命气质，同时也有深厚的民族主义情感，这就使他痛恨英国篡夺者。他是一个鼓动家而不是一个理论家，他所掌握的那点理论都是从爱尔兰的反抗传统和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中得来的。同拉金相反，康诺利则是一个理论家兼斗士。他也深具爱尔兰人气质。尽管他痛恨天主教的教阶体制，但是他始终保持着天主教徒身分，因为对他说来，天主教

义是民族反抗传统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事实上，从任何一种神学含意着眼，与其说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倒不如说他是新教的反对者。他对爱尔兰农民和城市工人的疾苦有深刻认识。他在《爱尔兰历史中的劳工》一书中，着力描述了他们的疾苦。他还创作了一些鼓舞革命的歌曲，最有名的是“造反歌”。他也是一个有才华的新闻记者。他出生于劳工家庭，曾经干过多种非技术性工作以维持生活，把所有可用的时间都用来进行鼓动。有一个时期，他用一部手摇印刷机自写、自排、自印他那一个爱尔兰共和主义刊物。他所写的就象他所说的一样直截了当：每一篇文章和每一次演说都直接或含蓄地鼓吹反抗。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爱尔兰运输工人与普通工人工会的幕后组织力量，尽管拉金在公众的眼中是最重要的领袖。

当然，拉金和康诺利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只有表面上的关系，但是在爱尔兰自治问题的斗争中，当内战一触即发的时候，他们却把英国的极左派和爱尔兰的极左派联系在一起了。康诺利注视国际局势，看到世界大战正在迫近，于是毫不迟疑地表示相信“英国的困难就是爱尔兰的机会”。1916年，他简直就没有指望复活节周起义能取得成功，但是他深信宁可起而一试并招致失败，也不能退缩不前。强征爱尔兰人为英国打仗的主张使他愤怒不已，认为仅此一端就应该抵制到死。康诺利是一个毫不妥协的叛逆分子，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性在他的思想中奇异地结合在一起。

当人们酝酿这种或那种革命主义的时候，基尔特社会主义也 243
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并肩发展起来，而且部分地同各种革命主义结合在一起。我们知道，基尔特运动是由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缔造者阿瑟·约瑟夫·彭蒂(1875—1937年)的一本名叫《恢复基尔特制度》的书创始的。彭蒂是一个中古主义者，非常憎恶现代工业制度；他号召恢复手工业，恢复小规模生产制，由按行规办事的行业

基尔特进行监督。他步威廉·摩里斯后尘,否认大规模生产的“价廉质劣”的产品真正对消费者有利,并且力陈生产这种商品就迫使工人在令人厌烦的劳动中讨生活,从中既感不到自豪,也感不到快乐。不久以后,为了反驳H·G·威尔斯所著的《代替旧世界的新世界》,彭蒂写了一本名为《代替新世界的旧世界》(1917年出版)的书。他在提出恢复手工业的计划以后,立刻就要求发展精耕细作的农业。他相信,通过精耕细作的方法,英国很容易生产出全国人民所需的全部粮食,同时通过手工业生产的耐用物品也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其他需要,只要消费者摆脱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不断造成的新需求,这种需求只有生产越来越多的劣质商品才能得到满足。

后来,阿尔弗雷德·理查德·奥尔雷奇(1873—1934年)所主编的《新时代》接受了彭蒂的思想,并把它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改变主要出自塞缪尔·乔治·霍布逊(1864—1940年)之手,他是一个工业记者和商人,同社会主义运动渊源很深,而且一直在费边社里积极活动,力主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党。霍布逊远远不同意彭蒂的中古主义,不但赞成而且精通现代的生产技术。他曾经在美国住过,在那里干过大量新闻工作;他所主张的是工人自己掌握生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用于最先进的技术,从而消除贫困。霍布逊所设想的基尔特并不是独立手工艺者的按行规办事的会社,而是以民主方式加以管理的庞大的工业经营机构;他设想这些全国性的基尔特将从工会产生,产生的方式是扩大工会范围,把所有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全都包括在内,同时改变所追求的目标,不单纯为改善劳动条件进行谈判,而要争取实现工业自治。他认为实现工业自治的途径在于一方面开展劳工斗争,一方面促使政府遵奉“工业社会主义”。在工会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基尔特,并掌握了“劳工的垄断权”以后,就应当要求国家承认它们接管工业和公用事业的权利。国家应向基尔特颁发特许状,授予这种

权利,并规定其对公众负责的各种条件。由此看来,霍布逊并不是一个工团主义者:他没有考虑到国家会消失或消亡,让位给以工人阶级经济组织为基础的社会机构。他认为国家不适于管理工业,但又承认国家是一个代表全体公民的集体身分的机构,并且希望它在民主化的形式下继续执行立法和行政的职能。他是一个承认阶级斗争的事实并承认生产资料必须实现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者,但强烈反对官僚主义,认为人除非能在作为生产者的日常生活中享有自由并实行自治,否则他们就不能算作真正自由的公民。他同意工团主义者的看法,认为经济力量先于政治力量,但是他并不否认政治有它的作用,也不否认国家最后代表全体人民,必须享有最高的决定权。

《国家基尔特》一书是以原先在《新时代》上发表的那些文章为基础编出的,最初用的是奥尔雷奇的名字。当时霍布逊不在国内,但是他提出了抗议,于是在第二版上便添上了他的名字。实际上,这些文章是由他起草的,后经奥尔雷奇修订,最后的定稿由两人共同负责。《新时代》不是一个销路很广的杂志,但是拥有一批知识水平很高的读者,还有一批出色的撰稿人,其中包括阿诺德·贝内特(他以雅各布·汤森的笔名为它写书评)、G·H·切斯特顿、希莱尔·贝洛克以及左派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领导人物。这些文章以及以后出版的书,在工人阶级中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但是在信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却很受重视。看来,有关基尔特的各个方案,似乎在以工团主义与跨行业工会主义为一方,以及以国家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为另一方的两种理论之间形成了一座桥梁。此外,这些方案也可以随心所欲,从革命的角度或温和的立场加以解释。阅读这些方案的人可以设想,基尔特的成立需要经过一个迫使政治家予以承认的劳工斗争的过程;他们也可以从这样一点出发:寄希望于工党和其他社会主义社团的政治家转变态度,信仰“工业民

主义”，同时也寄希望于说服工党政府或社会主义政府到适当时候把工业管理权移交给“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

基尔特社会主义对于许多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特别具有吸引力，对于圣公会高教派尤其如此，他们反对国家对于教会实行“国家全能”（‘Erastian’）式的控制，并且要求恢复教会管理自己事务的自由。这个运动中有一个领袖是约翰·尼维尔·菲吉斯（1866—1919年），他是一个政治理论家和社会理论家，他的著作为左翼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提供了原料，特别是他的《现代国家中的教会》一书（1913年）。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是沙克斯泰德的“红色牧师”康拉德·诺埃耳（1869—1946年），他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写了《基督的一生》这本书，并且积极地参加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还有一个领袖是莫里斯·B·雷奇特，他在基尔特运动和教会社会主义同盟（彭蒂同这个机构也有关系）中都很活跃。R·H·托尼（1880年生）也是使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接触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物；后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坦普耳（1881—1944年）则是站在运动的边缘上的人物。

但是，主要说来，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所号召起来的是一批人数不多、但精力非常充沛的青年知识分子，大多来自牛津，其中有威廉·麦罗尔（1888—1942年）、莫里斯·雷奇特和我。在1915年以前，他们并没有正式组织。当我在1913年出版《劳工世界》时，我虽然大体上同情《新时代》集团的主张，但是还没有自称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不过到了那一年年底，我接受了这个称号。奥尔雷奇当时兴趣集中在《新时代》杂志上，并不希望成立任何组织。他宁愿让自己的思想通过文章逐渐传播。直到1915年年初，有关人员才克服了他的反对态度，成立了全国基尔特联盟。因此，它的历史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早期的各个阶段除外）的发展过程，便不属于本卷的讨论范围了。

然而,关于基尔特思想在1914年以前的发展情况及其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还需要稍作补充。共产主义的著述家通常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受到“空想主义”的坏影响,旨在模糊阶级斗争的现实,并想逃避马克思主义的必然引伸。我能了解他们的真意所在:基尔特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一种伦理性的学说,而不是唯物主义的理论。跟国家社会主义以及不久以后被称为共产主义的理论不同,基尔特社会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的极端重要性,并且断言必须尽可能使全体人民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和日常工作条件的主人,从而使全体人民分担社会责任。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力陈,工人需要克服的万恶之端不是贫困,而是奴役和没有保障。工业民主的必要基础是:免于失业恐惧的自由,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工作的自由,在自选监工和经理的管理下进行工作的权利,以及使劳动场所摆脱由上面任命的——不论是由资本家雇主还是由国家任命的——管理人员的权力;没有这些基础,政治民主就只能是一个幌子。一个人在日常的劳动中是什么样子,他在工余之暇作为一个公民也会是那个样子。“工人管理”必须从基层开始,建立在车间民主和“劳动权”的基础上。

直到后来才看清楚,提倡“工人管理”的各色人等的看法是多么互相矛盾。对某些跨行业工会主义者以及后来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工人管理”意味着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管理,通过整个无产阶级的专政来予以执行,因而这就完全符合集权化的制度和强制的纪律,只要这种纪律是由代表阶级的人来强制执行的就行。与此相反,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则强烈地反对极权主义,强烈地赞成个人主义。他们所主张的“工人管理”,首先是实际从事工作的劳动集体在政策管理的大范围内对本身事务的安排进行管理,这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应该尽可能做到民主,并使责任和权力尽量分散。

实际上,在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本身之间,在所强调的重点和理论上也存在着分歧。我们谈过,霍布逊和奥尔雷奇主张成立一种基尔特机构,根据国家颁发的特许状管理和组织生产。但是这种见解在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中间遭到日益强烈的非难,其中有许多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反对国家主权和普遍权力的整个概念。我们根据职能的概念提出政治多元论的学说来代替这种说法。这就对一般公认的民主代议制政府的学说形成了一种挑战。我们认为谁也无法真正代表其他人,一个人所能做的不过是代表他自己和其他人所共有的目的。因此,一切真正的代表权就必然是职能性的;不可能有一种单一的权威能在所有的目的上代表所有的人。这就产生了多元社会的概念,在这种社会里“最高主权”不存在,而只有分散的权力;这种权力能维护个人的自由,因为它使个人能请求一个职能机能去保护他,以对付另一个机构所提出的要求。最后的决定是从不同机构的共同意见中产生的,而不是由一个总的上级发号施令。这种主张当然遭到了反对:如果要维护社会的统一,以免沦为无政府状态,最后的法律权威就必须存在。但是多元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反驳说,他们看不到有这种必要;他们也不同意,没有这样一个为大家最后接受的唯我独尊的主宰,社会就无法维系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同意“社联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看法,而反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引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和威廉·摩里斯的见解以反对集权主义者,并且反对这样的看法:一切政治问题基本上都必须从集权的角度去考虑。

如果说多元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带有浓厚的知识分子味道,并在这一意义上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的”观点,那倒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说正因为如此,这种观点就更加糟糕了,那就绝非不言自明的评语。多元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正好在它本身出现的时候出现,而后来又走向没落,这都不是单纯的偶然现象。它出

现的时候,正好是提倡社会团体的创造性作用这一概念的人,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批驳边沁派功利主义的原子概念,批驳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依据的群众集权主义的时候;而它没落的时候,则正好是战争及其后果在沙皇被推翻后的俄国和西方世界造成一种新趋势,促使人们从群众权力的角度去考虑社会问题,并且再一次使自由主义概念受到贬斥的时候。在这方面,工团主义、跨行业工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战斗性的妇女参政权主义以及各种主张宗教脱离世俗权力控制的运动,都具有共同的特征;而且正如索列尔所着重指出的,它们同柏格森的哲学及其对活力论(*élan vital*)的强调是相一致的。此外,它们都是兼具正反两面的思想流派,因而它们既能同非常民主的理论相结合,也能同等级制度的理论相结合;因此,各个流派的倡导者在战后便互相攻讦,而整个运动也就随之崩溃了。不过,关于后期的发展必须留待本书的下一卷去讨论。

从表面上看,英国从1910到1914年所发生的事情,乔治·丹吉菲尔德的《自由主义英国的不可思议的死亡》一书已经作了适当的描述。1906年选举上的巨大胜利似乎使自由党路线获得了新生命,并使它获得了适应二十世纪条件的形式;但是在这次胜利后的几年时间内,新的自由党路线的意识形态基础就被破坏了,这倒不是由于工党的兴起,而是由于自由党和工党双方都坚持的信念——即有条不紊的社会进化这一概念——突然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事实上,这些新兴力量的确完成了摧毁自由党的工作,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也基本上耗尽了自己的精力,造成了一个真空,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则各持一词,争相要求填补这个真空。

第五章

249

德国：关于修正主义的论战

随着反社会主义者法失效，俾斯麦倒台，德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便结束了一个时代，而开始了另一个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遭受迫害达 12 年之久：它的刊物被封闭，它的组织被取缔，它的领袖受到警察的折磨。如果当初一切都按照俾斯麦的意志办，社会民主党就不可能提出帝国议会或各邦议会的议员候选人，但是帝国议会拒绝干涉选举其本身的自由，而且在某些邦里也保留了相当大的议会自由。社会民主党虽然倍受侵扰，但仍然能够参加竞选并进行竞选宣传；它的代表一旦当选，就能在帝国议会或邦议会中自由发表言论，而且只要谨慎小心，不让警察过分轻易地抓到把柄，甚至还能对选民发表演说。至于任何规模的党的集会，则只能到国境以外的瑞士去召开；瑞士也为党的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提供了出版场所，这个刊物以相当大的数量顺利地偷运进德国。

最初，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受到损失。在 1877 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它赢得了 493,000 票，1881 年减少为 312,000 票。但是此后又急剧增加：1884 年达到 550,000 票，1887 年达到 763,000 票。1890 年，社会民主党人以 1,427,000 票（将近总数的 20%）来庆祝自己获得的新自由。他们赢得了 35 个议席，而 1878 年则只有 9 席，1884 年只有 24 席。1887 年，由于反社会主义政党联合起来对付他们，议席减少到仅仅 11 席；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无论就绝对数字来说，还是就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来说，他们所得的总选票还是增加了。

250

德国民主党在反抗迫害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因而在国外

备受赞扬。事实上，正是在它被取缔为非法的时期，其他国家有人接二连三地效法它，看来它即使没有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几乎为欧洲所有各地的社会主义运动树立了榜样。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生存条件必然影响了它的活动。公开的领导权不得不交给党的议会代表，只有这些议会代表才能自由地发表言论或采取行动。党组织本身不得不转入地下，根本无法继续维持一个统属中央机构的支部体系。于是，就开始采用一种办法，选择“可靠的人”来同党员小组保持联系，这一制度在1890年以后还一直维持下来，成为党的基本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的条件要求自上而下地实行高度集中的控制和领导。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党代表大会是无法举行的；由于这一原因，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纲便一直保持下来，没有修改。党的政策在选举的时候由主要候选人宣布，而在非选举期，则由帝国议会议员或邦议会议员宣布。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是党的杰出发言人；爱德华·伯恩斯坦和卡尔·考茨基则被推许为党的主要理论家。所有四人都是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斯坦同恩格斯有深厚的友谊，他的修正主义倾向当时还没有被察觉出来。在1891年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以后，他同考茨基密切合作，共同阐释党的新政策。

在迫害时期结束以后，党很快就进行改组，并为自己制定了新的纲领。几乎就在同时，工会也着手成立自己的新中央组织；工会在1878年以后几被摧毁殆尽，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才被允许在严格的限制下慢慢恢复。以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的原则为基础的新合作运动也开始在产业工人中成长起来。这两个运动所关怀的都是争取发展上的自由、法律上的承认、以及立即实现的经济改革。社会党人如果要想保持工人阶级的忠诚拥护并扩大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就不得不向工会运动和合作运动妥协，并且对这两个运动的拥护者所要求进行的改革采取建设性的态度。这就为社会

党的领袖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在他们的党遭受取缔期间，他们自然要利用帝国议会作为宣传社会主义的讲坛。当时并不存在是否能影响政府政策的问题，他们的任务始终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同政府的政策作斗争。而今俾斯麦下了台，年事尚轻的新皇帝威廉二世正在玩弄社会改革的进步观念，而他们又赢得了进行组织的自由，选举上的胜利更使他们感到大有盼头；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就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确定一下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不失为一个革命党。在遭受取缔的年头，他们别无他途可循，而今——由于恢复了合法地位，情况究竟改变了几分？

要回答这个问题绝非易事；几乎从一开始，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各不相同的，因为德国各地的情况出入很大。就帝国议会来说，它自1867年建立以来就一直实行成年男子选举制，但是没有任何责任制民主政府存在。帝国议会对行政部门没有控制权，也不分享行政权。德皇在行政方面直接或者通过首相进行统治；受普鲁士控制的联邦参议院远比民选的联邦议院更接近于政权的要津。此外，普鲁士是个比其他各邦大得多强得多的邦，那里根本没有任何民主因素存在。普鲁士邦议会是根据一种三级选举制选举出来的，这种制度使得社会党人实际上连一个议席也争取不到，除非他们愿意同开明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选举联盟去对付保守派。在其它各邦，情况各不相同：有些邦选举区遍及各地，因而社会党人即使在受迫害的年代，也能在选区中取得进展；其它一些邦则实际上被封禁起来了。在拥有比较开明的宪法的一些邦里，存在这样一种趋势：社会党人和进步派往往在邦选举和市政选举中采取联合行动。但是在普鲁士和其他一些邦里，社会党人同自由派人士是水火不相容的，后者在工业立法和社会福利问题上大都赞成极端的放任主义政策。

在早期，在马克思和拉萨尔的信从者合并组成一个联合政党

以前，他们之间争执不下的一个大问题是：同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做法是否应该鼓励或者准许。拉萨尔派贯于说，所有非社会党人形成了一个反动集团，社会党人的使命就是对他们展开政治斗争。1875年的哥达纲领是接受了这一观点的，这也正是马克思反对这个纲领草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马克思曾一再指出有必要同进步的资产阶级采取联合行动，旨在取得进展，建立立宪民主制，尽管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通常总要加上一些东西，说什么社会党必须在取得胜利的时候转过身来对付自己以前的盟友。马克思曾经指责拉萨尔派不分青红皂白地贬斥社会党以外的一切政党，用以掩饰他们喜欢反动的帝国主义者而不喜欢开明的资本家的本来面目，不过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派一同成为迫害的受难者的年代里，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实际上也就不再存在了。不过当时仍然有更深刻的分歧存在，它同最初发生争执的原因不无关系。这问题就是：1870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究竟应该当作敌人看待呢，还是应该当作一个既成事实而予以接受呢？社会民主党的路线是不是应该不仅反对帝国政府的政策，而且也反对帝国本身呢？在社会党人的头脑里，这个问题是同他们所反对的吞并阿尔萨斯-洛林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今，也就是20年以后，他们究竟应该把这种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行动当作既成事实而予以接受呢，还是应该主张归还该地并以此为理由而反对帝国呢？后来，这个问题更构成了另一个问题：社会党议员是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为政府预算投票，从而卷入范围广泛得多的国防和殖民扩张的问题中去？不过这个问题不妨留待适当的时候去讨论。目前我们所关心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刚刚失效后 253 所面对的问题。

1869年，威廉·李卜克内西在一篇后来重印成小册子并且出了名的演说中，曾经就议会行动问题表达了一个极端革命的观点。

他说，“社会主义已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它根本是一个武力问题，无法在议会中解决，而只能象其他武力问题一样，在大街上、在战场上解决……。对人民正如同对国王一样，起决定作用的是暴力。”他接着攻击了这样一种幻想：普选权是“一把神妙的钥匙，能够为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人打开公共权力的大门”。他又说，“当然，普选权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是民主国家——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如果把普选权和公民权割裂开来，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结社自由，在警察和军人的刺刀的统治下，一句话，在一个极权国家里，普选权就只能是极权制度的玩物和工具。”他在那篇著名的演说中问到：“如果出现了几乎不可设想的事情，当选的社会党人竟然成了帝国议会的多数，”那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这个社会党议会多数打算改变德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一连士兵就能驱散这个多数。如果这些先生们不乖乖地同意离职，一小批警察就能把他们带到监狱里去，在那里他们就有时间去反省自己的堂吉珂德式的行为了”。

在1891年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李卜克内西在回答以柏林排字工人威廉·威尔纳为首的左派的攻击时，说了一番含意跟上述演说很不相同的话。他对议会制度的态度，在社会民主党人所取得的选举胜利的影响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

254 我认为——我们全都认为——我们党的活动重心不在帝国议会里面，而在帝国议会外面。只要我们在帝国议会中还不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在那里的活动就应该以宣传为主。但是能不能说正是因为我们还不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就应该谴责议会制度呢？议会制度简单说来就是代表人民的制度。如果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帝国议会中还没有取得成就，那倒不是议会制度的过错，那单纯是由于我们在全中国，在人民中间还没有具备必须具备的力量。如果我们有资产阶级政党那么多的选票、那么大的力量做后盾，那么帝国议会对我们就会象现在对它们那

样,不会是没有用处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一切问题都能够通过立法解决;但是请告诉我还有什么其他道路能够达到目的!我知道还有一条道路在我们中间的少数人看来比较简捷,那就是暴力的道路……但是那条道路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反对派没有考虑到这个后果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经过一段时间,暴力必然要向道德因素和事物的逻辑低头。俾斯麦这个专讲暴力和铁血政治的人已经屈服了,社会民主党是德国最强大的政党……。革命主义的精髓不在于手段,而在于目的。几千年来,暴力一直是一个反动的因素。只有证明我们的目的是错误的,然后你才能说,党的领导人正领导着党脱离了革命的道路。

事实上,到了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由于在迫害下进行抵抗获得成功,又由于在选举中取得显著的成就,因而感到洋洋得意,并进而相信不久以后他们就能赢得帝国议会中的多数议席,同时也相信这个多数决不是政府军队所能驱散得了的,即使这个议会多数党的领袖起而抵抗,也决不是一队警察就能把他们送进监狱的。他们成了议会政治家,因为他们已经相信,可以把帝国议会当作工具来利用,以便使社会从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转移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去。他们以前是不相信这一点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李卜克内西和爱森纳赫派是不相信这一点的。从一开始,拉萨尔派就采取一种态度,力图利用自己在帝国议会中的地位去推进社会改革。他们全力投入帝国议会的辩论,提出修正案,并投票赞成建设性的议案而反对破坏性的议案,哪怕建设性的议案距他们的要求相去很远。一些人——特别是李卜克内西本人——曾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他们的这种做法进行谴责。但是,李卜克内西的这种毫不妥协的态度究竟有什么好处,甚至在爱森纳赫派中间也是从一开始就有些人表示怀疑的。早在1869年,倍倍尔就对这种态度表示怀疑;翌年,这个问题就在党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会上通过了一项得到双方领袖支持的折中提案。其中

规定“主要为了宣传上的目的”，爱森纳赫党应该参加帝国议会的选举，此外也“应该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参加议会工作，但是总的说来，应该对议会工作采取消极态度”。由此可见，李卜克内西的意见在1870年基本上占了上风；但是现在，也就是在1891年，他似乎成了相反论点的代表人物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以后，左翼反对派退出了社会民主党，成立了独立社会党。但追随他们的人只是少数；其中有不少各种色彩的无政府主义者。独立社会党不久就瓦解了，其中的非无政府主义者重新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承认了那种不时兼带宣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已经成为党的正式政策的议会行动。不久以后，这些人就同李卜克内西和考茨基联合起来反对修正主义者。

1891年，在爱尔福特地方准备修改党章的时候，恩格斯在《新时代》上发表了原先被扣压的马克思攻击1875年哥达纲领的那封信。这是一个重大因素，促使新党纲一开头就毫不妥协地确认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但是如前所述，爱尔福特纲领对于国家的阶级性以及国家必须用武力推翻之类的问题却缄口不言。纲领要求实行包括妇女选举权在内的普选制、秘密投票制和比例代表制，要求每两年举行一次选举并为议员付薪，要求通过创制权和否决权实行直接立法，要求在帝国、邦、省和市区等各级实行行政自治。它还要求公职官员由民众选举，官员要向法律负责。总之，爱尔福特纲领包含着激进的宪法改革要求，但是这种变革究竟是以舆论压力为后盾通过议会行动来实现，还是用革命手段来实现，却没有作出定论。

256 但是，党的领袖对不久将来所应采取的正确政策却是设有怀疑的。这就是利用新获得的自由把大多数选民争取过来，让年轻的德皇及其供咨询的大臣面对一个如此强大的群众运动，以至不敢用武力去对付它。这看来是高明之见；但是用什么最好的方法去

取得所需的选民支持呢？是不是应当继续对议会采取李卜克内西以前向党建议的本质上是消极的态度，而且在议会中也采取这种消极的行动呢？这算不上最好的办法。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俾斯麦政府制定了社会保险法，无可否认这种法律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因此就不得不承认，即使是现存的国家也能通过有益的法律措施。情况既然如此，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只要在帝国议会中小心从事，就能改良这些法律，至少也能废除其中有危害性的规定。此外，发展中的工会正在要求进行工业改革，并且指望帝国议会中的社会党议员给予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在议会中采取建设性行动的政策似乎最有希望在选民中赢得愈来愈大的支持。

然而，承认这一点就引起了两个新问题。第一，社会民主党人究竟是应该继续保持完全独立于所有其他政党之外不同它们合作的政策呢，还是应该在议会中——或是为了选举上的互相支持——同它们达成协议呢？第二，党应该继续把自己当作产业工人的阶级代表呢，还是应该下一番工夫，争取在德国许多地区都构成大部分选民的农民的支持呢？

1890年，当反社会主义者法的前途岌岌可危时，社会民主党领袖在上述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上采取了决定性的态度。三年以前，也就是在1887年的圣加仑代表大会上，曾经作出决定：社会党人在自己的候选人于第一轮投票中落选后，在第二轮投票中不应拒不投票。由于党的政策是为一切可能争取到的议席提出党的候选人，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在选举中对任何其他政党的候选人都给予支持。然而在实践中，社会党人拒绝遵守党的决定，在第二轮投票中大量投自由党人或进步党人的票。1890年，由于面对着事关社会民主党整个前途的大问题，于是党的领袖便毅然宣布圣加仑决定无效，并明确指示他们的信从者投票选举那些保证采取行动反对延长反社会主义者法的候选人。这项政策收到了很大

效果，从此以后这就成了党在历届帝国议会选举中的正式政策。在其他地方，即在那些选举权相当自由的邦里，党也奉行类似的政策。但是在普鲁士，如前所述，“三级”选举制仍然有效，因而根本不可能采取同样的政策。要把任何代表选入普鲁士议会的唯一机会，就在于从一开始就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选举协议，把“三级”选票中的两级联合起来。1890年以后，社会民主党人仍然坚决反对这种搞选举联盟的政策。由于在任何其他基础上进行竞选都是毫无用处的，因此党的正式政策就是完全弃权。但是到了1893年，伯恩斯坦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攻击了这种政策，同时建议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的选举中同资产阶级进步派达成协议。同年在科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根据倍倍尔的建议，一致否决了伯恩斯坦的建议，理由是它会使党“丧失斗志”。

社会党人在邦议会的选举中取得最大进展的一个邦是萨克森，这是因为该邦实行了范围广泛的选举制，同时工业又在非常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到了1896年，这种进展突然中止了。在普鲁士的影响下，萨克森邦的其他政党联合起来反对社会党人修改选举法的企图，并重新实行了一种同普鲁士制度相类似的等级选举制，于是社会党人在邦议会中的代表被清除了，不过他们在帝国议会中所赢得的萨克森议席却增加了。这个发展和其他一些发展似乎说明，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道路并不象1890年刚取得胜利时所设想的那样畅通无阻。如果社会党在萨

258 克森的选举中所获得的进展被反动派的突然一击制止了，难道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防止社会党人在帝国议会中赢得多数吗？究竟是普选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无法推翻了呢，还是李卜克内西1867年说的话仍然有效呢？

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普鲁士邦选举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倍倍尔不顾上述危险，宣布自己改变了看法；李卜克内西则仍然持

强烈的反对态度。1897年在汉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充分辩论了这个问题，并且作出决定说，是否参加竞选的问题必须由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至于同其他政党妥协或结盟则在绝对禁止之列。这个决议对任何人都不起作用，因为不结成联盟而参加选举必然是毫无结果的。这时，党又遇到德皇可能重新制定镇压性法律的危险；在1898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赞成参加选举的人取得了真正的进展。虽然是否参加普鲁士邦选举的问题仍然由当地的党自行决定。但是大会决定凡是当地党组织决定参加选举的地方，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是准许的，条件是这些党的候选人必须保证支持普选权并投票反对可能提出的任何镇压性法律草案。

普鲁士的问题是一个争取资产阶级支援以反对专制政权的问题。而德国的某些其他地区，情况则又有不同。以巴伐利亚为例，它是一个既遵奉天主教，又以农民占主要地位的邦。那里社会党人看到，除非能争取到贫苦农民和产业工人的支持，否则就没有希望赢得多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人于1898年同天主教中央党结成了联盟。这种作法立刻遭到反对，认为它违反了社会民主党公认的独立政策。1899年的汉诺威代表大会曾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结果通过了一项重新阐明党的立场的长篇决议。

为了达到党所规定的目的，党采用一切与党的基本原则相符合而又有可能取得成功的手段。党对资产阶级政党作为现行的政治与社会秩序的代表者和保卫者的本质有清醒认识。但是在这种或那种特殊情况下，不论是为了增加党的选举实力，扩大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认真提高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努力完成对文明所负的责任，还是为了对敌视工人阶级与人民的计划展开斗争，党并不拒绝同某些资产阶级政党采取联合行动。然而，党在任何地方进行活动时都保留本身的全部独立性和自主权，并把自己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当作更接近最后目标的一个步骤。

这项决议是主张缔结选举联盟的人的显著胜利，但是决议并没有接触参加普鲁士的“三级”选举问题。最后，1900年的美因兹代表大会决定，社会党人应该普遍参加普鲁士选举，但是他们应该在预选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而且只能通过自己在这一阶段当选的代表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普鲁士邦议会的选举法是间接选举法：选民按不同等级选出代表，然后再由三级代表联合选出实际参加邦议会的代表。）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在1890年以后的10年中曾走了很长一段路程，才在选举和议会活动方面采取妥协政策。实际上，这也就完成了从革命政党转变到议会政党的过程。

在这个突出的演变中，农民问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民主党的理论非常强调企业向大规模发展以及资本向越来越少的入手中集中的历史趋势。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最受重视的是这样一个因素：生产“社会化”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来临的保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社会化”一词的意思并不是指国有化或社会所有制，而是指越来越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取代个体商业的过程，指一批工人在统一的指挥下进行合作以生产成品的过程，也是指生产活动在现代技术和集中的金融组织的影响下“社会性”或集体性越来越大的过程。在马克思的观点中，这一过程构成了社会进化中的一个必要因素；这个因素不可抗拒地导致一种局面的出现，其中的一切产品都是许多个人进行合作而取得的成果；他们之间尽管存在着阶级矛盾，但是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还是得进行合作。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的日益“社会化”就为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已显示出没有能力协调自己的行动或防止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反复出现，这时无产阶级就应夺取政权，并着手实行一种合理的“社会化”过程，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然后再从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着眼去制定工业生产的计划。

正是由于上述理论，社会民主党人便把大规模企业、托拉斯化

以及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现象看作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必须经过的阶段；小规模企业受到轻视，仅仅被目为前一个时代残存下来的东西，随着资本主义的成就达到更高的阶段，就必然要衰落而被取代。他们不仅对手工艺者、店主和小工业经营者抱这种轻视态度，而且也对农民抱这种态度，农民只用最简单的工具和最原始的分工方法去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愚蠢地固守自己的所有权，并要把自己的这份可怜的田产传给子孙后代。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附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说，在未来的社会中，小农经济将随同野蛮时代的其他遗迹一起被清除，土地将用科学的大规模耕作方法来开发，这种方法会大大降低生产成本，而大大提高产量；在资本主义的耕作方法使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生产资料被剥夺了的小农将降低到无产阶级的地位，他们会参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所进行的普遍解放事业。

但是，在这付减轻痛苦的灵丹妙药中却落下了两个苍蝇。第一个苍蝇是小农，他们顽固地坚持阵地，不肯退出。资本主义的耕作方法无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小农耕作制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大地主所没有耕种或耕种不足的土地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有一个时期考茨基也包括在内——煞 261
费苦心，要把能够到手的统计数字说成是证实了他们的论断：小农耕作制在资本主义农业的进展下必然会垮台。但是事实毕竟太顽强，无法驳倒。久而久之，人们不得不承认，在欧洲的广大地区，小农农业正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土地所有权正日益分散，而不是日益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于是，又有人争辩说，小农虽然倖免于淘汰，但是越来越沦为高利贷者和银钱业主的牺牲者，他们的生活水平也由于工业化的农业企业家的竞争以及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的剥削而日益降低。但是即使是这样，实际情况仍然使党的理论家感到为难；由于他种小规模企业被取代的速率也远比

他们信心十足地预计到的慢得多，他们就更加感到为难了。

这付灵丹妙药中的第二个苍蝇是：小农拒绝退出舞台，不肯在日益发展的工业或工业化的农庄中工作，从而变成无产阶级。这就使得社会党人更加难于单独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而赢得议会多数。当然，这种困难在德国的那些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在西德的那些小农耕作制占支配地位的地区最为严重。在东德，大封建庄园中受剥削的半农奴式的劳工倒是可以当作同产业工人相近的人看待，也可以用没收封建地主土地的纲领来号召他们。但是，这种号召却不能用来争取南德和西德的小农。他们不是劳动者，他们日益发展成为小土地所有主。议会活动家们只要答应进行改革，巩固他们的所有权和继承权，使他们更易于以不太苛刻的条件取得资本和贷款，就能站在极其有利的地位诱使他们支持自己。主要采取信贷合作社形式的农业合作社已经在西德和南德取得很大的进展，但这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功劳。扶植这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的不是社会党人，而是天主教党人和自由党人，他们把这种合作社当作巩固农民经济反对社会主义的手段。事实上，反对国家干涉的自由党人把自己的帮助大部分局限于鼓励自愿性的合作，而天主教党人则准备利用国家的帮助来保护农民，以对付资本主义农业和私人金融力量的侵害。

面对着牢骚很多而又狂热地偏爱私有制和个体耕作制的大批小农选民，社会党人应该怎么办呢？如前所述，巴伐利亚的社会党人设法通过同天主教中央党结盟的方式来加强自己的选举地位，但是这并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社会党人所需要的是找到一种办法把农民争取到社会民主党的路线上来，但是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哪怕是仅仅试一下——而又不丧失党的原则呢？为了得到农民的支持，他们必须提供农民所需要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不但不能加速取代小农经济的过程，反而必然会巩固小农对土

地的控制，也会帮助他们更有成效地同大型农户以及农产品输入者进行竞争。这样就会拖延“社会化”过程，而社会化过程正是社会民主党人赖以取胜的手段。

在1890年以后的整个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在竭尽所能，要解决这个十分尴尬的两难问题。以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1850—1922年）为首的巴伐利亚社会党人倡导这样一种理论：比较贫困的农民依靠自己家庭的劳动力即使是耕种自己的土地，无论如何在本质上应该算作无产者。他们强调说，社会党人绝对不能等待小农农业和其他小规模生产形式消亡之后才动手搞自己的事业。帮助小农，争取他们充当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非但不会削弱社会主义事业，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反而会有极大的好处。它会减轻新社会秩序分娩时的阵痛。

巴伐利亚社会党人认识到有这样一种危险存在：农民可能先接受社会党人的帮助，而在他们的地位得到巩固以后，又以怨报德，转过身来攻击社会党人。于是，他们就力图拟定一种政策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所找到的解决方案是：要求国家接管一切农业抵押，垄断农业信贷，降低农贷利率，并以相类似的方式把整个农业保险事业收归国有，此外还要求国家掌握森林采伐事业，维护全部公有土地的使用权。然后，国家就应该运用其权力鼓励某些形式的农业合作社，这类合作社不致巩固个体耕作制，而会导致发展大规模的集体耕作、农产品的集体加工以及必需品的集体采购和农产品的集体销售等制度。 263

在符腾堡、黑森和巴登，社会民主党人很快就采用了以巴伐利亚人的计划为蓝本的农业计划。1894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被提出来进行讨论。反对巴伐利亚社会党政策的人，指责这个政策的拥护者背叛无产阶级的真正盟友——农业劳动者的利益。提出这个论点的主要是东德的代表，

也就是存在大庄园的地区的代表。代表大会把这一指责搁置一旁，但也坚持必须采取特别措施以帮助农业中的工资劳动者，让他们享受充分的结社权利，并明文规定他们的工时和劳动条件。会上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拟定一项慎重的政策提交下届代表大会讨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以及福尔马尔都被选为委员会委员。

这个委员会适时地提出了一项报告，大体上接受了南德社会党人的政策。但是考茨基随即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采纳建议，请求国家进行帮助以加强农民地位，从而争取农民支持的全部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为了使建议具有社会主义特色，委员会曾强调森林必须归公共采伐，公家征用土地的权力也必须扩大，但是考茨基也攻击了这一部分建议，其激烈程度就如同他攻击那些旨在帮助小土地耕作者的措施一样。在上一问题上，他愤怒地驳斥了那种认为小土地耕作者与产业工人有任何共同之处

264 的概念。他断言，小农不过是以剥削工人为生的阶级中的一部分，他们除了消费者的身份以外，是不值得加以考虑的，而在这种身分下，爱尔福特纲领中关于改善整个消费大众（而不仅仅是工人）的处境的那些部分，必然对他们有利。考茨基断然宣称，尽管有种种相反的论证，小土地耕作者仍然正在被淘汰中，因为他们正在同美国及其他“草原”国家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农业进行一场节节败退的斗争。他说，社会党人应该欢迎他们的衰亡，把这看作是资本主义进入危机和崩溃的最后阶段时必将随之出现的“日益贫困化”现象中的一部分。考茨基说，社会民主党人除了无产阶级以外没有必要依靠任何其他阶级，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困难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肯定能获得即将到来的胜利。如果放弃以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为基础的阶级学说而把社会主义变成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政治机会主义的混合物，那纯粹是背叛党的原则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理论的行为。

虽然考茨基如此强烈地反对向小农作出任何会加强他们同资本主义耕作制和进口粮食进行竞争的地地位的让步,但是他认为,即使在“革命”以后,农民阶级既不会立刻消亡,也不应该立刻消亡。此外,在1893—1894年社会民主党有关农业政策的争论发生以后,他写了一本名叫《土地问题》的书,以鼓吹者的身份出现,大力主张采取一些在他看来有助于收到如下效果的措施:既减轻农民的贫困,为社会民主党赢得农民的支持,而又不致使农民更加固守自己的小块土地。这些措施的主要用意在于减轻农业公社的赋税,增加它们的收入,而不是把农民当作一个特殊的集团直接给予支持。伯恩施坦批评了考茨基的这些建议,中肯地指出,这些措施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实际上会远远超过对贫困农民,而对农业雇佣劳工的 265 好处则很小或等于零。同考茨基相反,伯恩施坦主张采取一种直接帮助农民的政策。他说农民的人数如此众多,他们的选票在许多选区的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党人之间起决定性作用。他说社会民主党应该承担义务,采取能立即改善小农境遇的措施,而不必担心这些措施会加强小农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这一后果。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他跟考茨基不同,他相信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人数正在增加,而决不是注定要迅速消亡。

考茨基之所以攻击党的农业委员会的报告,除了认为报告有维持小农的生存这一倾向以外,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同样激烈地谴责委员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势将增加国家权力的措施。他说社会党人不但应该增加现存国家的权力和职能,反而应该把国家当作剥削阶级的集中代表,尽一切可能去削弱它的权力。如果无产阶级已经控制了国家,那么委员会所提出的某些措施倒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如果把那些完全可以交给征服和继承资产阶级国家的无产阶级去掌握的职能让给资产阶级国家去掌握,那就后患无穷

了。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夺取政权，做到这一点以后，它就可以着手进行改组农业的工作。但是当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存在的时候，采取这些措施就必然会起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作用。此外，如果出于社会党人的建议而采纳了这些措施，这就会使社会民主党为追求利润的企业的成败承担责任，也会使党由于支持一种过了时的生产组织形式而必然会造成的损失遭到指责；同时这也会使社会党人同农村地区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剥削者结成联盟，从而失去这批无产阶级。

考茨基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委员会的报告提交1895年的布雷斯劳代表大会讨论的时候，考茨基的意见占了上风。大会以266 3比1的多数否决了这个报告；党正式否定一切支持小农农业或是把农民的利益说成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尝试。大会还采纳了考茨基的意见，主张决不采取任何行动去增加“剥削者国家”的权力，以免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设置进一步的障碍。诚然，大会还决定对土地问题进行全面的探讨，并根据这一探讨发表一系列报告。但是事实上，这项最后通过的决议被悄悄地放弃了，从后来几次党代表大会的议程上再也没有见到土地问题。虽然党当时很小心，避免使内部分歧再次成为争执的重点，但争论仍在继续。1898年，考茨基发表了长篇著作《土地问题》，重新说明并补充了自己的见解。原在1894—1895年的委员会中担任委员的爱德华·大卫，5年以后在所著《社会主义与农业经济》一书中进行了反驳。南德社会党人当时被压倒了，但是并没有被说服，他们在自己的邦里实际上仍在继续鼓吹那份遭到否决的纲领中的大部分东西。

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这时已稳稳当当地赢得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阐释者的地位。他生于布拉格，因而是奥地利人，他受教于维也纳大学，后来从事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主要在瑞士和伦敦工作。1883年，他在斯图加特创办《新

时代》杂志，但不久就被迫流亡，先后在苏黎世和伦敦继续出版他的刊物。1890年，他重返斯图加特，1897年迁往柏林，后来又迁往维也纳。他一直主编《新时代》直到1917年为止；这个刊物很快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评论性刊物，对研究马克思主义论战内容的学者来说是一个无上的资料来源。1892年，考茨基出版了一部书，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爱尔福特纲领。在此以前，他已经写了几本书，其中包括一本研究莫尔的《乌托邦》的著作；但是他所著的《爱尔福特纲领释义》是他驳斥形形色色的反对者——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德华·伯恩斯坦和尼古拉·列宁——而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辩护的一系列著作中的第一部。1914年以后，他激烈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因而同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中的独立社会党集团建立了联系。1918年以后，他被任命为德国外交部档案 267 部门的编辑，由于他有关战争起源的秘密文件才得以发表。

1887年，考茨基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是一本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的教科书。实际上这本书成了社会民主党正式的通俗读本，被翻译成若干种文字，在许多年内一直享有盛名。他的《爱尔福特纲领释义》也得到公认，其地位同上书不相上下，是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最佳指南。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时期，他在《新时代》上所发表的文章对制定党的政策具有很大影响。因而当有关修正主义的争论在十九世纪末出现时，考茨基以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主要维护人的身份出现，反击伯恩斯坦的攻击，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了。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两人在党的组织系统中地位很高，并且都反对伯恩斯坦的观点；但他们是活跃的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而考茨基则主要是理论家，除了通过他的著述以外，在政治中起作用很小。

我们将要谈到，考茨基的根本观点是马克思对社会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他的那本阐释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著作，严格地解释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没有任何批判的成分。他全盘接受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别以及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之间的区别。他也无条件地附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说法，其中包括这样的观点：危机必然会越来越严重地重复发生，并导致那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危机”。他从马克思那里接过了工人“日益贫困化”以及小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下降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的理论。他特别强调资本的“集中”这一概念，即大企业将不可避免地以牺牲小企业为代价而取得发展，使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的手里，并使生产逐渐“社会化”而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但是他非但没有看到正是由于这种趋势的存在，社会主义者才有理由支持国有化，并且加强国家的权力，反而严格区别了社会主义者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所应奉行的政策。他附和马克思的意见，认为必须把现存的国家看作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因而是工人的敌人。他论证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社会主义者应该竭尽所能去削弱国家的权威，而决不应该设法利用国家作为社会改革的建设性工具。鉴于显然难于拒绝工会要求帝国议会和邦议会中的社会党人支持改善工人境遇的措施，于是考茨基准备稍稍改变自己的态度，但只限于同意社会党人支持可以加强工人运动而又不致增加国家权力的立法。在他看来，只有在工人夺取了包括行政和立法部门在内的全部国家机器以后，建设性地利用国家的时机才算到来。他坚持说，工人必须作为一个阶级去夺取国家机器，而社会民主党则必须作为工人的阶级代表为掌握政权而战斗，决不要为了争取其他阶级的支持而以任何方式冲淡本身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他拒不承认有冲淡理论的任何必要性。在他看来，经过诱导而可能附和某种冲淡了的社会主义的其他阶级，无论如何是注定要被摧毁的，当它们在资本日趋集中的过程中沦为无产阶级的时候，它们就会倒向无产阶级这一边来。如果社会党人

为吸引这些阶级而作出任何妥协，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理论丧失逻辑上的连贯性，而沦为纯粹的机会主义。

由此可见，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考茨基是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的面目出现的，反对作出任何妥协。然而，他虽则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而且他所常用的词句似乎也使他齐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鼓吹者之林，但是事实上他在考虑推翻现存国家以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时，主要的出发点则是通过宣传和议会行动，以取得和平的进展。再者，他同意李卜克内西的看法，认为革命的实质在于所达到的目的，而不在于所用的手段。当他谈到未来的“工人国家”时，他所设想的国家是：工人的政党在人民的选票中赢得明显的多数，以党在工会和广大人民中的影响为后盾，运用它在立法机构中的权力，坚持改革社会的一切关键性制度。他认为这一点不可能通过零星改革的月积日累来实现，而只能是一蹴而就，其方式是在议会内外取得足够强大的力量，强制推行革命性变革，而这种变革是资本主义的过分软弱的维护者所无力抗拒的。他预见到这种局面必然会出现，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而阶级的对立也随之日趋尖锐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必然会带来这种局面。

这就说明了后来当考茨基跟列宁和托洛茨基发生争论时，为什么考茨基以主要的反对派理论家的面目出现，反对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和以后所设想的那种“无产阶级专政”。更甚于任何其他思想家，考茨基坚持：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大多数人民倒向社会主义以前，在任何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时机都是不成熟的；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就企图建立社会主义，那么这种尝试就必然会导致背叛民主主义的恶果，使社会主义堕落成为布朗基主义的暴政。

由此可见，考茨基实质上是一个中派分子，而不是一个极左派

人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之所以貌似左派（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也强烈反对威尔纳之流的极左派），是因为他反对右派，首先是反对以福尔马尔为首的巴伐利亚异端分子，其次是反对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

考茨基强调经济力量日趋集中的历史趋势，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相信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继承这种趋势，并将大大地发展这种趋势。他主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但又认为只有在政权转入社会主义者的手中以后才能实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的思想中始终存在两个看来互相矛盾，而且使人误解的方面。他赞扬集中和纪律；他从集中制定和集中控制的全面规划这一角度来设想未来。但是他又坚决反对在“革命”成功以前搞任何形式的足以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得到加强的集中规划。由于这一点，他往往被误认为是反国家统治论的支持者，而且发现自己暂时同自由派社会主义者站在一起，后者在原则上反对集中制，认为集中制同真正的民主制互不相容。考茨基并没有这种自由主义的观点，在他看来，集中制是进步的一个基本因素，是人类社会确定不移的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特色，也是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基本假定。这种看法是考茨基从自己对马克思的“社会化”概念所作的解释中得来的，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方面的思想状况相吻合。在受压制的年代里，党实行了严格的集中化纪律，当它能够恢复公开活动的时候，觉得仍然有此必要。人们还能清醒地记得，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有两个对立的社会党存在，德国当局便能从中挑拨，从而造成种种麻烦。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终于付出理论上的代价而实现了统一；这种统一又由于反社会主义者法的实行而得到巩固。在考茨基以及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看来，不仅是在组织上，而且在政策上，统一都是必不可少的。由于社会民主党甚至在1890年以后——特别是在普鲁士——仍然受到警察当局的严重

迫害，不得不面对一个封建势力和军国主义因素始终非常强大的国家，统一就更加有必要了。

但是，统一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统一这个概念在德国人——包括德国社会党的主要人物在内——的头脑中有牢固的位置。当时的德国人就象他们今天的情况一样，是一个有纪律的民族，宁愿听别人——或者说彼此之间喜欢——以武断的口吻吩咐应该如何如何做。在大多数情况下，说服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接受如下看法并不是难事：少数人应该作好准备，服从党纪，并承担义务，忠诚地遵守多数人的决定。事实上，当时的确存在一些十分强大而不易完全压服的异端派，特别是在南德。但是即使是巴伐利亚的社 271
会民主党人，当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不利于他们的决定时，他们总的说来还是能接受党的方针的。笼统地谈民族性格往往是靠不住的，但是我们很难否认，黑格尔哲学和民族统一运动两者的结合，曾使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德国思想的其他方面具有一种强调团结和有纪律的行动的强烈趋势，从而使德国的社会主义显然不同于拉丁民族国家或英国的社会主义。此外，德国人是一个思虑很有条理的民族，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所行所为都有牢固的哲学原则作基础，他们喜欢教条。在考茨基的手里，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死板得多的教条，而在马克思本人的手里则从未达到如此地步。具有黑格尔哲学背景的马克思为这种教条主义提供了基本因素；考茨基抛掉了马克思的全部次要的说明性词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僵化。总的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乐于采用考茨基的说法，而不愿意采用原著，因为考茨基的说法比较系统；至于他的说法比较直截了当，比较容易记忆背诵，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最后，考茨基的思想中还有一种强烈的和平主义因素，而这是同马克思的思想不相容的。考茨基憎恨战争和暴力。这促使他大力强调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国际主义。在国际主义这个问题上，他

同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看法一致，后两人在普法战争期间都证明是忠于国际主义的，而且也都继续反对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的帝国主义倾向。但是，考茨基不仅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而且也是和平的爱好者。他相信在现代的世界上，战争是资本主义的直接恶果，因而他的和平主义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他的社会主义信仰。但是，这也使他从愿望出发产生了一个信念，工人不经过内战而取得政权是实际可行的。

当爱德华·伯恩斯坦从“修正主义”立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发动攻击的时候，上述一切就是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其人的情况。伯恩斯坦确曾声明，他所攻击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只是这位大师的学说中某些同主要意义无关紧要的部分。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内容跟其中的多余部分区别开来；他认为前者是正确的，事实上还理所当然地把它接受下来，后者则是由于

272 马克思本人误解了当代历史力量的运动而产生的。如果他所攻击的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无疑会不屑一听而把他赶出去。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是由于这一原因而限制自己的攻击范围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总的思想体系来说，伯恩斯坦确实是信仰的，或者说他自以为是确实信仰的。然而，他所提出的“修正”却大大地损害了社会民主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特殊解释；这种特殊解释体现在爱尔福特纲领中，并且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感到需要有一种共同的基本哲学以及直接以这种哲学为基础的政策，而被奉为信条。

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年）生于柏林，父母是犹太人。离开学校后，从16岁到28岁，一直在一家银行里工作。然后，他就给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富有的支持者卡尔·赫希伯格当私人秘书。过了三年，反社会主义者法制定出来，他不得不离开德国，定居瑞士，在那里编辑被大量偷运进德国的党的机关报《社会

民主党人》。1888年，他被赶出瑞士，迁居伦敦，在那里担任《前进报》驻英国通讯记者直到1901年。他在伦敦同年迈的恩格斯交往甚密。他深受费边社和独立工党的影响，恩格斯曾支持后者反对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起草爱尔福特纲领时曾征询伯恩施坦的意见；考茨基在撰写那本阐释这个纲领的著作时曾得到他的帮助而对他表示感谢。当时两人似乎都没有觉察到有任何严重的分歧。但是到了1896年，伯恩施坦在考茨基所编的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这些文章在党内引起了激烈争执，而且不久就使伯恩施坦受到了正式的谴责。伯恩施坦在一本名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英文译本叫《进化的社会主义》）的书中作了答复。在接着发生的辩论中，考茨基在所著《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1899年）中代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了回答。罗萨·卢森堡也在她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9年）中作了回答。在1899年汉诺威举行的 273 党代表大会上，修正主义者正式遭到了否决；但是并没有把他们开除出党。在大会作出了决定以后，伯恩施坦仍力陈自己的观点，而且得到了力量相当强大的少数派的支持。两年以后，这个问题在卢卑克代表大会上又被提了出来。代表们指责伯恩施坦以专横的态度继续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以至“完全忽略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辩护士展开批评”，表现对党不忠诚。这次反对他的动议又是倍倍尔提出的。当这个动议被通过的时候，伯恩施坦起而发言说，大会的表决当然不可能改变他的信念，但是对他说来也决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深信这个决议客观说来对我不公正的，是以错误的假定为依据的。但是既然倍倍尔同志已经宣称，这一决议并不等于投了不信任票，因而我宣布今后我对这次大会多数代表的这一票决将完全按照代表大会的这类决议所应得到的那样给予重视和尊重。”

伯恩施坦从1900年起就一直住在德国，他非但没有被开除出党，不久以后反而得到修正主义大辩论中的正反双方的一致支持而当选为帝国议会议员。他在党内仍然很活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同考茨基在反战的少数派中重新携起手来。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1890年以后所出现的改良主义运动早在伯恩施坦参与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第一炮是慕尼黑议员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在1891年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放出的。福尔马尔说，“毫无疑问，曾经偶尔发生过大危机，历史呈现出——或表面上呈现出——跃进的局面。但是总的说来则是一个缓慢的有机的进化过程……一切政治和社会形势都具有相对性，都是过渡的形式。运用现存的形式去影响未来的形式，就是我们应起的作用。”福尔马尔接着强调立即进行改良的重要性，同时强调制定适应当前情况的纲领的重要性，他所列举的项目有：制定劳动保护法，授予充分的结社权，根据法律管理卡特尔企业，取消生活必需品的赋税以及其他一些次要的改革项目。福尔马尔在回答那些指责他的改良主义态度的批评者的第二篇演说中着重指出，先进国家的现代史清楚地说明通过这种改良措施，能够改善工人的状况，而且事实上已经改善了工人的状况。但是我们如果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拒不参与立法工作，如果我们除了公开的敌对关系以外，就拒不同国家当局或其他政党打交道，那么值得向往的改良就无法实现了。为了取得让步，除了斗争以外，还必须进行谈判和作出妥协。

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重申了自己的主张，但是倍倍尔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中宣布说，如果采纳这些主张，那就无法防止党陷入纯机会主义的泥坑。于是，福尔马尔的主张就被正式否决了。倍倍尔说，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是提出那些最易于赢得其他政党支持的要求，恰好相反，而是提出那些任何政党都不可

能支持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打击了阶级制度的基础。

翌年，福尔马尔在法国出版的《白色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国家社会主义”的文章，再次发动攻击。在攻击了俾斯麦反动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后，他接着说：这番话不仅适用于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而且也适用于“我们自己应该要求实行的若干项措施”。“人们可以把一切国家化的事业都叫作‘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把每一个从事剥削的企业从私人业主手中转入现存国家机构手中都叫作‘国家社会主义’。”他指出：社会党人曾投票赞成铁路国有化，也曾投票赞成建立各种新型的公共企业；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这是走上改善社会条件的道路所必须迈出的一步。他说，社会党人决不能仅仅因为反对现存国家的阶级性，就连自己明知本来就很可取的国家活动也反对予以扩大。在接着发生的争论中，福尔马尔说国家尽管有阶级性，但在实践中仍然不得不考虑它对公众所负的、但又为私人资本主义所完全忽视的某些责任。“在私营企业中起作用的为个人谋取眼前利益的动机在国营企业中大都消失了。”

福尔马尔在 1891 年曾经要求社会党人组成一个主张立即进 275
行社会改良的政党；现在他又补充说，应该成为一个鼓吹国有化政策的政党。这个论点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因为在德国早就有一批学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谴责阶级斗争，否认国家必须进行革命以改变其性质。这个集团对俾斯麦的社会政策曾经产生过一些影响，在社会民主党中特别遭到咒骂。当这个问题在 1892 年的柏林党代表大会上提出时，李卜克内西激烈地驳斥了福尔马尔的理论。李卜克内西说，“当现存的国家接管企业，实行国有化的时候，国家并没有改变本身的性质，只是作为雇主取代了私人企业家的地位，工人并无所获，倒是国家加强了本身进行镇压的权力和能力。”他宣称，“这种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

在这种制度下，经济奴役会扩大和加深政治奴役，而政治奴役反过来也会对经济奴役起同样的作用。”但是仅仅过了3年，李卜克内西本人就在布累斯劳党代表大会上，结合国家应该接管农业抵押事业^①这一要求发言说：如果党的农业委员会的建议被接受并付诸实施，

那么毫无疑问，国家的权力就会扩大，但是不会加强。这就象军队的情况一样，军队越扩大，参加到里面去的人民大众就越多，作为一种反人民的工具而言，军队的力量就越削弱。同样的道理，依靠国家过活的人越多，国家的责任就越重，容克地主主宰国家的力量也就越减少。

这是最缺乏革命性的语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报告是代表大会所无法接受的，代表大会否决了它，尽管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当时都是委员会委员，都要求予以通过。我之所以提到李卜克内西在这个问题上改变立场这一事实，是因为这有助于说明社会民主党公认的领袖并不象他们自以为的那样同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分歧十分尖锐。另一方面，考茨基在争论中则采取了始终如一²⁷⁶的方针，决不愿沾染任何扩大现存国家权威和力量的计划。对他说来，国有化是必要的，但这必须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而不是以前实现。

研究一下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直到伯恩施坦提出挑战的时候为止，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都在迅速地向右转。此后，伯恩施坦的挑战又使他们急剧地回过头去重申他们的基本马克思主义信念，但是在修正主义正式被否决以后，他们根本就无意把修正主义的鼓吹者开除出党。恰恰相反，他们又恢复了一度

^① 参看本卷第275页。

中断了的向右转的动向。

伯恩施坦以 1896 年在《新时代》上长篇连载的《社会主义问题》一文中的第一篇发起了他的攻击。这第一篇文章题为《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它指责党是“空想主义的”，因为党虽然断然排除了对未来社会的组织作种种猜测，但却听任自己受如下概念的支配：资本主义即将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党把在这种飞跃发生以前所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仅仅看作是治标性的，指望在夺取政权以后新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即使不能在一天之内解决，至少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这正是“假定奇迹而又不相信奇迹”。在继续发表的文章中，他特别驳斥了这样一种概念：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临近崩溃的关头，那场开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纪元的“最后危机”正在来临。他并不否认，这一信念是以马克思的学说为依据的。但是他又说马克思错了。如果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迅速崩溃，那么又将如何对待众所公认的社会民主政策呢，也就是如何对待把一切建设性的改革都推迟到“革命”以后的政策呢？难道能够指望工人无限期地等待下去，而不要求实现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资本主义国家手中争取到的改良吗？如果要求工人等待的话，党岂不正好是断送他们的支持，而把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光荣拱手让给其他政党吗？

正是结合这一点，伯恩施坦写出了他的名句，声称对他说来 277
“运动”就是一切，而通常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批评他的人特别抓住这句话，说这意味着他放弃了社会主义信仰。伯恩施坦未能参加 1898 年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因为他当时在流亡中，被禁止踏上德国国土；这次大会讨论了他的文章。他写来了一封长信，解释自己的意思。他说他根本不是不关心“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原则”的问题，而只是漠视“事物的最终安排形式”罢了：

我对未来，除了一般原则以外，从来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没有能透彻地理解任何有关未来的图景。我的思想和行动所关心的是当前和不久将来所应负的责任。单纯的远景，只有在它能指出我目前所应采取的适当行动路线时，我才会关心它。

伯恩施坦的这番话实际上是说，他同党一样不相信空想主义，不相信预先虚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任何图景。但是他实际上要说的却远不止此，翌年出版了他的《进化的社会主义》一书，这本书极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实际上说的是，社会主义不会作为社会主义者在取得政权的第二天早上所制定的一套制度而出现，它将通过社会行动，在单纯的经济发展的需要所规定的限度内，以逐步积累的零星改革的方式而实现。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不会突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前者只能逐步地过渡到后者，不能说这种巨大的变化已经在这一进化过程的某一点上发生了。

当然，这恰恰是费边主义者——尤其是悉尼·韦伯——远在伯恩施坦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十多年以前就一直在说个不停的东西。如前所述，就社会进化的总过程来说，费边社的历史哲学的决定论成份并不下于马克思的学说，而在强调经济因素的首要性这一点上，费边主义的经济观成份也不下于马克思。但是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从一个时代突然跃进到另一个时代的，而韦伯及其弟子伯恩施坦则认为是一个进化的过程，突然的跃进是例外情况，一般的规律是日积月累的逐渐的变革。在马克思看来，变革的方法有别于变革的根本原因，应该在阶级斗争中寻找，在新兴阶级推翻不再能够有效地利用生产力的没落阶级的革命中寻找。与此相反，对韦伯和伯恩施坦来说，阶级斗争虽不能否认是事实，但毕竟不是进行变革的真正重要的工具。事物之所以发生变化，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根本条件发生了变化，是由于这些条件的变化促使人们（而

不是阶级) 改变他们的制度去适应新的需要。阶级可能是涉及到的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唯一主要的因素,主要的因素倒是人使社会制度适应人本身需要的能力。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统派领袖的眼里,伯恩施坦的主要过错在于,他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即将崩溃从而给与无产阶级以夺取政权的机会;他持这种论调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阶级斗争的首要性,而阶级斗争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的整个工人阶级行动纲领的根本基础。马克思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包括在既定的进化过程之内,从而把经济决定论同革命活动调和起来,反对坐等事物本身自然发生。他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按照历史的发展趋势进行正确的组织和筹划,能够“缩短并缓和”新社会诞生时的阵痛。这句话意味着,尽管社会主义必然会到来,但是到来的方式和日期如何确定,则同无产阶级政党面对其任务的技巧和勇气并非无关。但是这句话同时也让人们认识到,不论无产阶级犯了什么错误,都无法使它招致最后失败。无产阶级到头来必将赢得胜利;它的胜利必然是一个阶级在社会革命的历史时刻实现其本身解放的胜利。这种学说自有其矛盾之处,因为如果说包 279
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的规律是严格的必然的规律,那岂不是说,每个阶级——实际上每个人——的所行所为都完全受必然性的驱使,正好是必然要做的事吗?但是这个漏洞被下面两个说法掩盖起来了:其一,人的所行所为,尤其是阶级的所行所为,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至少在次要的方面是这样;其二,阶级和群众的所行所为是由社会发展的规律无情地决定了的。

伯恩施坦也陷在同样进退两难的境地,但是他摆脱这种处境的方法是抛弃决定论。他说:“所谓哲学唯物论或自然科学唯物论是在机械的意义上说它是决定论。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是这样。它并没有说各民族生活的经济基础对这种生活所采取的形

式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性影响。”

伯恩斯坦引证了马克思的话，特别是引证了恩格斯的话，来支持这个论点；他所引证的段落有的承认非经济力量能够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有的则断言人类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影响社会适应的方式和速度。这一类的话是很容易找到的，因为无可置辩的是，马克思的确相信“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恩格斯在为唯物论概念辩护并驳斥批评者的时候，则兜了个大圈子承认包括思想在内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承认他和马克思在早期陈述自己的理论时曾过分夸大和过分简化了自己的理论。伯恩斯坦重申恩格斯已经说过的话倒没有什么违反正统说法的地方；他违反正统说法的地方也不在于把非经济因素列为真正的历史力量，而在于他否认社会决定论的中心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承认思想是次要因素的看法是合法的，只要明确无疑地说明社会进化的总过程决定于通过阶级斗争自行发生作用的经济力量就行。然而，这恰恰是伯恩斯坦所否认的，尽管他承认经济因素非常重要。他当时并没有把自己的看法说得非常清楚，也许他对自己的真意所在也不十分明白。但是不容置疑，他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整个概念提出诘难，即使他不愿完全承认自己是在这样做，情况也是如此。他有一段话说：

280

不论纯经济力量以外的其他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生活，我们客观地称之为历史必然性的规律都会随之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在这方面必须区别两大潮流。一方面，人们对进化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经济进化规律的认识看来越来越深入。伴随这种知识而来的是人们指导经济进化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这种能力的增强既是产生这种知识的原因，又是这种知识所造成的后果。自然的经济力量就象物理力量一样，随着它的性质被人们所了解，就从人类的主宰变成了人类的仆人。从理论上来说，社会在经济变革方面所获得的自由比以往任何时

期都大；只有社会中各种成分之间的利益对立——只有私人 and 集体成分的力量对立——才妨碍了理论上的自由完全转化为实践上的自由。不过，同私人利益相比，共同利益取得了日益强大的力量，而且凡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经济力量的基本规律就被废弃，其程度跟共同利益增长的程度相等。这些力量的发展已经为人们所预见，因而能够更加迅速而容易地加以利用。这样一来，个人和国家的生活就有越来越大的部分摆脱那种不按本人的意志——或违背本人的意志——而强迫他们行动的必然规律的支配。

这段文字正好打中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部分，这不仅是因为它否认了必然性的规律，而且也因为它引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是“共同利益”的意识，其中恰恰蕴涵着马克思经常指责的“社会团结”的概念。伯恩斯坦意犹未尽，继续往下说，这又进一步冒犯了马克思主义者：

现代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要比早先的社会丰富得多，而这类意识形态并不决定于经济力量，或不决定于作为经济力量起作用的自然力量。科学、艺术以及整个一系列社会关系，今天已远不象过去那样取决于经济；为了杜绝误解，我们不妨说，现在所达到的经济发展的程度已为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道德因素，留下了比过去更大的自由活动的余地。因此，技术与经济的发展同其他社会趋势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就越来越间接了，于是，前者的必然性决定后者的形式的力量也就大大丧失了。

上面这番话是十足的左道邪说，尽管伯恩斯坦依旧表白说自 281
己即使不接受“唯物”史观，但大体上还是接受“经济”史观的。这番话意在恢复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地位，否定“科学的”社会主义，至少是否定它的适当性。这就是最初几个阶段展开论战的主要问题。但是在伯恩斯坦全盘摆出自己的论点以后，又出现了许多其他问

题有待争论。他自称要做的事情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同其他仅属次要的和非基本的概念区别开来，旨在扬弃后者中的许多概念，以保住前者。但是在他下了这番工夫以后，究竟保留了多少呢？

首先，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不过，他的这一部分论点似乎无需多加申论，只要说明这样一点也就够了：他的中心论点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实际上没有用处，因为根据马克思自己的说明，剩余价值率同工人工资水平的高低没有固定的关系，而剩余价值率却应该是用来衡量他们受剥削的程度的。这一概念完全是抽象的，是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用日常生活中的事实加以证明的思想虚构。这种虚构的价值应该用它们的效用来衡量，而伯恩施坦的论断则是，根本用不着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学说去解释剥削，事实上它并不能解释剥削，反而只能使问题发生混乱。

由于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关于修正主义的论战中根本不占重要地位，因而我不再谈下去。在争论中这个问题被抛到一边去了，所谈的是其他问题。伯恩施坦的下一个主要论点是：他虽然承认资本主义集中化的趋势是存在的，但认为它实际发生作用的速度和力量决没有马克思所说的那么快那么大。他指责马克思在说明真实的事实时忽略了一切向相反方向发展的力量。他特别提出随着股分企业的兴起，股权也大量分散这一事实来反对马克思。资本的所有人不是越来越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企业毫无疑问是越来越大了，但是大企业归许多人所共有，其中大多数人只占有少量资本利息。这就意味着，即使在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的地方，小资本家所组成的中产阶级并没有消亡，中产阶级只是在改变形式而已。股票持有人正在代替小企业主，结果是剥削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此外，大企业也只是在某些部门而不是在所有部门排挤掉小

企业。即使在生产部门也留下了许多小企业；在商业中，小企业的数目还大大增加了。说土地落到少数人手里也是不真实的；恰恰相反，欧洲局部地区虽有例外情况存在，但欧洲的总趋势是小农户在增加。因此可以说，中产阶级决没有被抛进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事实上，还必须考虑到，一个依附于大规模工业的、由经理人员和监督人员组成的、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已经出现。伯恩斯坦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着手分析阶级构成的那一章并没有写完，这一点是意义重大的。

伯恩斯坦然后谈到收入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说明中等收入的数目在迅速增加。接着他追问工人是否真正陷入了“日益贫困”的境地；他的结论是并非如此。他说人所公认必需品的生产大大地增加了，如果不是他们消费了大批大批必需品，那又是谁消费掉的呢？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对伯恩斯坦的结论提出诘难，有时候也对他的统计数字提出质疑。但是在实际统计数字上，确实无法否认他所说的话是正确的。甚至连考茨基到头来也不得不修正自己过去所做的小农趋于没落的论断，尽管他还继续论证说，由于更高度资本主义化的耕作制日益见效的竞争，小农必然会“日益贫困化”。在资本主义总的说来趋于集中这一问题上，正统派越来越被迫采取这样的论点：即使资本的所有权没有落到越来越少的人的手里，控制权却是这样，因为小股份持有者对自己的股本的利用无权过问，而且小企业也越来越受到控制市场的金融资本和大企业的支配。这种说法虽然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并没有驳倒伯恩斯坦的如下主要论点：中产阶级并没有被消灭，而是以新的形式重新兴起了，结果是阶级斗争并没有越来越尖锐，而是由于中间阶级和集团的兴起而被冲淡了。 283

至于工人“日益贫困化”的问题，某些批评伯恩斯坦的人企图

论证, 不管一切表面现象如何, 工人还是越来越穷。另一些人认识到, 这种说法对德国或英国无论如何是不适用的, 于是便退后一步, 抬出这样的论点: 工人正在相对地贫困化, 这就是说他们在国民生产总额中的份额正在减少, 即使他们的消费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但是, 作为一个总结性的论点来看, 这个说法往好处说也是十分可疑的。就算这一立论真实无误, 贫困相对加剧的现象伴随着生活水平的绝对提高, 是不是就一定会加剧阶级斗争呢? 还有一些人似乎更有道理地争辩说, 由于对殖民地劳动力的剥削日益加剧, 先进国家中工人的生活水平才暂时得以保持, 甚至还提高了。最后, 结合这种论点, 往往还有另一个论点提出: 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周期性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期, 帝国主义的对立竞争更加剧了这些危机; “日益贫困化”的时期即使现在还没有到来, 也会由于这些危机而很快到来。

伯恩施坦断然否认资本主义已显示出任何迅速走向“最后危机”的趋势, 以此驳斥上述最后一个论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 当伯恩施坦正在撰写自己的著作时, 人们可以回顾一下以往十多年的况情: 这一时期并没有发生过严重性足以同前几十年相比的资本主义危机。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繁荣以后, 曾发生过经济衰退, 但那并不是危机。“大萧条”(当时还没有象后来那样加以粉饰)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生产在迅速增加; 即使在经济衰退的年代, 失业现象也远不象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样严重。贸易扩大了, 新的贸易地区正在开辟。没有真正的迹象说明, 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发展的顶峰而正在走向衰退, 当然更没有理由预测它会迅速崩溃。因此, 那些奉劝把一切建设性行动都推迟到革命性的危机已使工人掌握政权以后再采取的人, 实际上不是主张推迟几年, 而是主张无限期地推迟下去, 其期限当然是很长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等待下去是否真正有好处? 认真考虑一下除

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以外，究竟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并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尽全力争取所能得到的最大让步岂不是更好吗？

当然，实际上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因为伯恩施坦的论点要求社会民主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进行根本的改变。这不仅要做好准备，承认现存国家是良好的社会法律的制定者，能够为人民大众带来好处，而且也要准备改变对待工会运动和集体谈判的态度。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就倾向于认为，工会主要是社会主义运动征集新成员的场所，是发展工人阶级觉悟的助手，而对工会同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可能取得成就这一点不寄厚望。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告诉工会主义者说，工会运动的力量是绝对不够的，因为它始终要面对统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联合力量，这种联盟只有在推翻资产阶级国家以后才能打破。这里，伯恩施坦对这种联盟的不可避免性表示怀疑，同时力主工人运用本身集体行动的力量，一面同雇主进行谈判以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同时也迫使国家制定保护劳工的法律。他说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于取得零星的收获，而不在于发动革命；这一论点如果是正确的话，那就既适用于政治行动所取得的好处，也适用于工会所取得的好处。这样就会把工会抬高到同党平起平坐的伙伴地位，而不再仅仅是一个辅助组织了。对正统派领袖说来，这决不是一个符合心意的概念，因为他们抱有偏见，怀疑工会总是想把各自的局部利益置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之上。在他们看来，工会只代表某部分工人，唯有党才体现了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使命。

德国的工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遭受了 1878 年以后施加于 285
社会党人身上的迫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工会运动迅速得势，但仍不够强大，而且它还由于分裂成为三个互相对立的运动而削弱了力量。这三个运动是“自由”工会运动（实际上几乎完全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基督教工会运动（主要是天主教的）以及希尔施-敦

克尔派工会运动（自由主义者的）。在这三者中间，“自由”工会是最强大的一派，但是在1898年它只有40万左右会员；基督教工会大约有10万会员，希尔施-敦克尔派工会的会员更少。两年以后，“自由”工会会员增加到68万人，基督教工会会员增加到15万人左右，而自由主义工会的人数则有所减少。如前所述，“自由”工会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于1890年成立了一个中央机构，叫总委员会。当时有个小团体受到当代法国工会发展的影响，鼓吹工人管理和直接行动的“工团主义”政策，而且要求脱离社会民主党而独立，但是它没有什么影响。德国的工人阶级倾向于政治而不倾向于工业行动主义。除了天主教地区以外，城市工人几乎完全是社会民主党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准备把改善境遇的希望推迟到“革命”以后。他们不仅希望社会民主党帮助自己废除结社方面残存下来的限制（主要是涉及工会间进行联盟活动的），而且希望党支持自己在劳工立法方面的要求，其中包括承认集体谈判权以及在劳资纠纷中实行仲裁制。实际上，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把这些措施列入当前的纲领中去，尽管他们继续告诉工会说，不取得政权就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就。

伯恩施坦驳斥了资本主义即将发生“最后危机”的概念以后，就进而考虑最近将来不可能发生严重危机的原因。1896年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曾经通过一项决议，力促各国工人着眼于这种危机很可能已经临近的情况，学会掌握有效行使政权所需的各种方式方法。伯恩施坦对大会的空想主义进行了指责。他指出恩格斯曾经说过，由于新国家的经济发展，市场一再得到扩大，这已经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处境，尽管恩格斯也曾坚持，从长远着眼，其后果是造成更加严重的危机。伯恩施坦同意其中的第一个论点，但认为第二个论点并没有得到证明。他认为，无论如何没有迹象表明，经济扩展的阶段已经临近尽头。

这是罗莎·卢森堡投入论战,反对伯恩施坦的主要问题之一。她着重指出金融资本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加剧了帝国主义的对立和冲突,随之也加紧了对廉价的殖民地劳动力的剥削,并利用这种劳动力来降低先进国家的劳工生活水平。卢森堡的论点所强调的是:经济对立可能导致战争,而战争给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带来的压力则将为革命行动造成机会。这个论点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论点多少有些不同,后者认为资本主义有一种固有的趋势,即资本工具增加到本身的产品超出现有市场可以吸收的程度,就会造成危机。事实上,马克思关于危机的学说的实际内容是什么,是很不清楚的。马克思在当时新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说:危机的最后原因是消费者没有能力购买越来越多的产品——这是一种“消费不足论”。但是恩格斯曾一再否认马克思是一个“消费不足论者”;他说这是西斯蒙第和洛贝尔图斯的学说,而不是马克思的学说。在《资本论》的第二卷中,马克思驳斥了“消费不足论”的学说,他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①这似乎是说:上涨的工资——甚至是实际工资——也无法避免危机。此外,马克思在这一卷中还系统阐述了一种理论,把危机的发生同固定资本设备的周转时期联系²⁸⁷起来。第三卷中关于消费不足的段落虽然见之于书的时期比较晚,但实际的写作日期却早于第二卷。伯恩施坦同意恩格斯的意见,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把危机归因于“消费不足”,只有在如下特殊意义上除外:广大群众的消费量下降造成对立的资本主义集团进行争夺,以求加强本身控制有限市场的力量。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不管造成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危机注定会愈演愈烈,而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7页。——译注

恩施坦——如上所述——则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是以神秘的论断而不是科学的论断为依据的。

事实上，伯恩施坦论点中的主要部分是这样一个论断：所谓科学是以研究事实为依据的，从这个意义来说，马克思的理论有很大一部分是根本不科学的，而是庞大的理论结构的一部分，事实是后来按上去的，而在按不上去的地方，事实就被弃之不顾了。我认为，他并没有意识到道破这样一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结构必然会产生多么致命性的损害，而他还声称他仍然接受其中的基本部分。

伯恩施坦在所著《进化的社会主义》的第三章中，接着便攻击这样一个概念：工人只要能取得政权，立刻就能有效地运用政权。正统的社会民主党有一个观点是，由于工业的集中化和托拉斯化，一批经济机构创办起来了，获得胜利的工人从共同的利益出发，很容易把这批机构接收过来并加以管理，这样就为社会主义铺平了道路。伯恩施坦对这一点并没有提出质疑，但是他指出到那时必须予以接收和管理的独立企业的数目会是多么庞大。他嘲笑那种满以为在革命政变获得成功以后马上就能做到这一点的看法。他说，事情很明显，即使工人确实掌握了政权，这批企业的绝大多数仍不得不暂时留在知道如何经营管理的人的手里，把它们转为公有和国营必然是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这种看法使伯恩施坦考虑到利用合作企业以代替国家经营的可能性。他大力赞成消费合作社，而反对一向大受社会党人赞许的各种形式的生产合作社。他以赞同的口吻引证了比阿特里斯·韦伯所著的《合作运动》。比阿特里斯·韦伯在这本书里把生产合作社当作已经证实了的失败看待，同时强调了罗契台尔类型的消费合作社的巨大成就。伯恩施坦步比阿特里斯·韦伯后尘，赞扬消费合作社，说它是真正以民主的方式解决“生产用于消费”这一问题的方案，同时贬低生产合作社是结伙牟利的典型例子，而且即使在这方面也是失败的典型例子。伯

恩施坦要求党认真支持尚在襁褓中的德国消费合作运动，承认它为社会所有制和社会管理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但是他并没有说这能解决突然取得政权后管理工业的问题。他认为那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而便放弃了整个设想，而用另一种想法来代替：通过工会和消费合作社的活动，通过国家、地区、市等各级政治活动的经验，逐步培养民主地行使政权的能力。

伯恩施坦在《进化的社会主义》一书的这一部分中，继续追随比阿特里斯·韦伯的思路，否定在工业中实行自治的主张。伯恩施坦写道，“经理竟然要成为他所管理的人的雇员，他的地位竟然要取决于这批人是不是高兴，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安排已经一劳永逸地证明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它总是导致这类协作工厂的组织形式发生改变。”他又说，企业规模越大，工人就越不想参加企业的管理。他得出结论说，国家、地区和市的管理机构应予扩大，并应以消费合作社补充之。但是他说，不能专为填补空缺人为地建立这种合作社，而必须让它自发地成长。“凡是社会本身——不论是国家、地区、市各级中的哪一级——掌管不了的事项，最好是听之任之，特别是在动荡的时期。”由此可见，伯恩施坦主张把大部分企业留在私人手里，直到某个代表集体的机构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而且在接管后能够得到某种实际利益时为止。他当时所鼓吹的是至少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现在所谓的“混合经济”。289

接着，伯恩施坦在他的著作中进而讨论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关系。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说它不符合民主原则。在他看来，民主主义意味着一视同仁，公公道道地对待所有的人。因此，这就要求限制多数人对少数人作威作福的权利。即使无产阶级在人民中占有多数，这也没有使无产阶级享有蔑视公道的权利。民主主义意味着取消阶级政府，而不是用一种形式的阶级政府去代替另一种。“社会民主党最好是毫无保留地维护民主主义的理

论——维护普选权的理论以及由于普选的策略而许下的全部诺言。”实际上，这就是社会民主党所做的事情，不仅要求普选权，而且要求比例代表制和通过人民投票的方式直接制定法律的权利。这些要求同“专政”都是完全互不相容的。如此说来，老是死抱着过了时的词句又有什么意思呢？就这样，伯恩斯坦又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教条，接着他以向社会党人提建议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这一论点，他建议对“自由主义”的攻击要放缓和一些。他说不错，现代自由主义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兴起的，自由主义党派干脆成了“资本主义的卫护者”。

但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伟大的历史运动来说，社会主义是它的正式继承者，不仅在时间的先后方面是如此，而且在精神的实质方面也是如此。这一点可以从社会民主党必须表明态度的每一个原则问题上看出。

伯恩斯坦接着宣称，“我认为中产阶级——德国的也不例外——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道德上都是相当健康的。”这番话是一个章节的引言，这一节谈的是官僚政治的种种危险以及在全国统一规划的大框框内实行分权管理制的必要性。伯恩斯坦不仅引证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而且也引证了蒲鲁东的著作来支持社会的联盟结构说，同时也宣扬了市有化的优点。他说社会主义的任务是“组织自由主义体制”。他又说，“民主制度如果要比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滋生更多的官僚机构，那就必须建立在组织严密的自治政体上，一切行政单位和成年公民都应负有相应的个人和经济的责任。”

这一段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话实际上是说，社会党人不应该着手去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结构，而应该去修补它。

任何地方的封建制度及其僵硬的机构和市镇自治体，几乎都必须用暴力去摧毁。现代社会的自由化机构之所以不同于封建主义的机构，恰恰就在于自由化机构是灵活的，能够改变和发展。这类机构不需要加以破坏，只需要进一步发展。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组织和强有力的行动，但不一定要革命的专政

然后，伯恩施坦又从西班牙社会党领袖帕布罗·伊格列西亚斯以及代表英国社会主义观点的《劳工领袖》和《时代号角报》引证了类似的意见。他接着说，“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这一点要比通常所认为的重要得多，它不仅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手段，而且也是它的实质。”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还不仅限于此，他在《进化的社会主义》一书的下一节里从《共产党宣言》中援引了“工人无祖国”一语，并作评论如下：

这句话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工人来说，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适用的，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政治权利，完全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时至今日，尽管国际交往有了很大发展，这句话已丧失其大部真实性。随着工人凭借社会主义的影响从无产者变成公民，这句话将继续越来越丧失其真实性。工人在国家和地方的选举中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因而也就是国家共同财富的主人之一；他们的子女由社会进行教育，他们的健康受到社会保护，他们的安危由社会给予关照；他们有祖国，但并不因此而不再是世界公民，正如同各民族关系日益密切，但并不因此而不再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一样。

这一段话又引出了另一个论点：德国的社会党人对国家的命运不能再漠不关心，或者说，对保卫国家的事业不能再推卸任何责任。

正如同任何其他文明大国丧失其独立并不是值得向往的事一样，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德国在国际事务上是否应该受到压制也不能是漠不关心的问题。德国对开化世界的伟业已经尽到而且也正在履行自己的光荣职责。

伯恩施坦的这一段话自然让人家指责他抱有沙文主义思想。他回答说，德国的军队越是庞大，就越是要用工人来组成，而政府利用它来对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也就越小。

如果(或者由于)英国、法国或者俄国的沙文主义者责怪德国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并不要求社会民主党声明主张德国现在或将来放弃自己的利益不加保护……我认为德国帝国政治的正当职责是确保在讨论这种问题〔影响均势的国际问题〕时有发言权。我认为，从原则上反对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需采取的步骤，并不属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范围。

这些话很危险；伯恩施坦接着把这些话具体地同德国的殖民政策联系了起来，从而加重了这些话的含义。他为以租借方式取得中国的胶州湾一事辩护。事实上，这就是公开出面支持殖民扩张政策。

有人认为殖民扩张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实现，这种说法根本是以这样一个完全过了时的概念为依据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取决于逐步缩小富有者的范围，取决于穷人的日益贫困。

伯恩施坦否认殖民扩张可以用来防止资本主义危机，也不承认它对德国的政局会产生不利影响。他承认“海军沙文主义”同殖民政策有一定关系，但是他断言这种沙文主义早在殖民主义出现

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在取得了殖民地以后，仔细研究一下殖民地的价值和前景，并对移民工作、土人的待遇以及其他行政事务进行控制，是有几分道理的。这 292 并不能构成理由，认为取得殖民地的行为是天生应当受谴责的。

诚然，伯恩施坦否认德国目前需要殖民地，但是他说将来还是必须考虑的，到时候从自己的殖民地取得某些进口产品对德国可能是有好处的。他否认欧洲人占领热带国家通常总是使当地土人受害，而且断然声称：“只能承认野蛮人对所占有的土地只享有有条件的权利。说到底，文明越高，所能要求的权利也就越高。具有历史根源的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不是凭借武力征服获得的，而是凭借对土地的耕作获得的。”^①他甚至援引了马克思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他从《资本论》第三卷中引证了这样一段话：

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象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②

伯恩施坦著作中的这一部分，更甚于任何其他部分，使他的整个纲领必然遭到社会民主党的反对。但是也有支持他的人，甚至连他为德国的国家权利与殖民政策所作的辩护也有人支持。他的国家主义理论触犯了社会民主党反对德意志帝国军国主义本质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它使人想起了马克思指责拉萨尔派是俾斯麦和容克地主的帮凶的那些话。当然，伯恩施坦实际上并无意支持德

① 这当然是萧伯纳的论点。参看本卷第 202 页及以下。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875 页。——译注

国的军国主义，他非但不愿意站在容克地主一边去反对资产阶级，反而对资产阶级极有好感，同时他也非常痛恨军国主义的权威和耀武扬威的作风。但是，他却相信德国人民负有普及教化的使命，并把这种使命加以美化，承认“文明大国”有权推广自己的文化，甚至是通过强迫“劣等民族”在先进国家的统治下开发自己的领土的方式去推广。我们必须为他的这一立场稍作解释，在他撰写自己的著作的时候，民族主义还没有对不发达民族产生很大影响，当时英国、法国和其他殖民国家仍在大力瓜分非洲，而把德国排除在外。前面已经说过，英国的萧伯纳反对两个布尔共和国的论点同伯恩斯坦的如下说法是无大区别的：一个民族除非能把土地适当地用于生产，否则对土地就不享有权利。无论如何，伯恩斯坦为殖民兼并行动辩护，为德国凭借武力维护自己在欧洲事务中的地位这一作法辩护，触犯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深蒂固的反帝国主义的情绪。社会民主党人只是最近才摆脱帝国政府的长期迫害和压制，即使他们有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也仍然不愿意受这些情绪的驱使，把德国人民同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混为一谈。

在这些问题上，伯恩斯坦走得太远了，以至他的意见在提出的那个时期根本没有被党接受的任何可能。他自己的后期经历说明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他并没有放弃国际主义去接受一部分国家主义的观点。他所说的话在某些方面同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并没有很大区别。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深切感到俄国的威胁而受到激励，正如同马克思本人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一样。党的领袖认为沙皇制甚至比普鲁士帝国主义还要坏无数倍，同时认为俄国人是威胁西方文明的野蛮东方人，东德（伯恩斯坦就是那里的人）是边防前哨站。奥古斯特·倍倍尔本人就曾宣称，德国社会党人同心协力，保卫祖国，以抵抗俄国的侵略是正当

的；许多德国社会党人对于吞并阿尔萨斯 - 洛林感到内疚，这使他们更加害怕俄法联盟。这种恐俄感形成了一种背景，使得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不愿意坚持在帝国议会中反复投票反对军事预算案的政策。伯恩施坦是以一种必然会招致反对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论点的。但是在反对者中，有许多人同情他的论点中的很大一部分，尽管他们不愿意在理论上得出伯恩施坦根据自己的论点所推出的那些结论。 294

在《进化的社会主义》一书的最后一章中，伯恩施坦进一步开罪了正统派，因为他从黑格尔引证到康德，并且旧话重提，搬出了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1828—1875），说他是社会民主党的前辈。他认为朗格“一方面具有正直和大无畏的精神，愿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而奋斗，同时又充满着科学精神，摆脱了偏见，随时准备承认错误，接受新的真理。这两种精神在他身上卓越地结合在一起了”。伯恩施坦以赞同的口吻说：“我们在朗格的著作中所见到的那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也许只有那些缺乏敏锐的洞察力的人才会具有，而这种洞察力正是马克思这样的开路先锋的过人之处。”但是他指责马克思根本是不科学的和教条主义的，他说：

他〔马克思〕找到了一个现成的脚手架，然后在脚手架的框框里着手建立一个庞大的结构，而且只要建筑科学的法则同脚手架的形状所限定的条件相符合，他就在脚手架的格局中严格地遵守这些法则。但是只要脚手架不允许他遵守这些法则，他就弃而不顾或者躲过这些法则。当脚手架限制建筑工作的时候，他不是拆掉脚手架，而是改变建筑，不惜牺牲正确的比例，使得建筑更加依靠脚手架。他一再停下手来，不去结束他的工程，而去修补其中的个别部分，其原因是不是就在于看到了这种不合理的关系呢？

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李嘉图和黑格尔框架的尖锐批评。伯恩施坦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叫作“行话”，并且抬出伊曼努尔·康德来反驳它（双关语是伯恩施坦自己用的^①）。伯恩施坦说，“社会民主党需要一个康德，他会已被接受下来的观念进行判断，并用极其敏锐的眼光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他会指出社会民主党所持的那套表面的唯物主义在什么地方是最为高妙的——因而也是最容易骗人的——意识形态，同时也会警告说：轻视理想，并把物质因素一直夸大成为无所不能的进化力量，乃是自欺之谈，持这种论调的人的行动每一次都暴露了这一点，今后还将继续暴露出这一点。”伯恩施坦呼吁社会民主党抛却这种陈腐的行话，“下定决心以目前的本来面目出现——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党”。

伯恩施坦就这样投身到新康德派中去了，列宁等人后来对这一派人进行了十分猛烈的抨击。伯恩施坦以鲜明的彻底态度抛弃了社会主义的革命概念。

一个国家一旦出现一种局面，少数有产者的权利已不再是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而政治行动的消极任务又不如积极任务那么迫切，这时号召使用革命武力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谈了。

伯恩施坦在这句话下面，还加了一个脚注，援引英国独立工党在其《新闻》月刊上所发表的话说：“幸好，革命一词在这个国家里已经不过是一种装腔作势的空话了。”（1899年1月）但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当听到有人说他们国家里的“少数有产者的权利已不再是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时，他们是感到吃惊的。而且这也肯定与事实不符。

^① “行话”的原文是“cant”，同“Kant”（康德）谐音，因而说是双关语。——译注

以上所述就是伯恩施坦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修正主义”论辩的实质。他简直无法指望任何一次党代表大会能全盘接受它，哪怕是其中主要纲领性的东西。他的论辩提出的问题太多，原来受到珍视的教条而今需要放弃的也太多，而且对待“导师”的态度也太粗暴，不可能不严重地得罪人。党进行了大规模的往往是辛辣的辩论，最后决定不以党的名义对伯恩施坦所提出的问题发表任何意见，而仅限于对他提出论辩的态度进行温和的谴责。当时表明，这种谴责并不意味着开除出党，甚至也不是禁止今后进一步讨论已经提出的任何问题。提出正式提案的倍倍尔非常明确地表示，尽管伯恩施坦提出了种种异端邪说，但并不是“坏同志”或叛徒。这种情况说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认识到党内支持他的人多么众多，他们所支持的与其说是整个修正主义，还不如说是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正统理论所提出的许多批评。实际上，代表大会否296决了修正主义，但是并没有完全排除它。此后，党作为一个整体就稳步而又迅速地朝着伯恩施坦所希望的方向发展。1900年，威廉·李卜克内西逝世了，死在第二年卢卑克代表大会对修正主义进行最后表决以前很久。党的新领袖开始出头，其中的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如他们的前辈那样忠诚。考茨基的理论影响正在下降。党的巨大左翼新兴力量罗莎·卢森堡在青年一代中处于少数地位。修正主义没有能够改变正式的信条，但是它对党的行动方式以及党的领导人的实际思想却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第六章

修正主义论战后的德国：外表和实际

从修正主义者遭到失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段时期里，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处的地位是很奇特的，它在理论上具有毫不妥协的独立性，而在实践中却又日趋怯懦。实际上，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自己所获得的成就的害。它在选民中建立了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是反对当时仍然支配德意志帝国事务的专制和军国主义政权的主要对手；它非常希望，坚持不懈的宣传活动和组织活动到时候能使它在选民中赢得显著多数的支持，甚至希望这些活动能使它竞选获胜，在帝国议会中占显著的多数，尽管议席的分配对它并不利，而有利于农业区。它并不幻想仅仅赢得这个多数就能使它自然而然地控制住国家，不过它坚信德皇及其大臣会发现违抗帝国议会的意志进行统治是行不通的，而且相信占有这个有利地位，就能对整个政府系统推行大规模的改革，根本不管是否会被迫利用违反宪法的手段去实现这种改革。由于有了上述想法，它便不去考虑可能需要采取违宪行动的问题，而把这一问题推迟到赢得人民的多数并掌握帝国议会的权力以后去了。此外，事情很明显，如果得不到大多数产业工人的支持，同时也得不到来自农村地区和来自商业与自由职业阶级的分子的支持，上述想法就不可能实现。于是，党便一心希望不同这类可能的支持者闹对立，而且又切盼能一方面表现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同时又表现为一个改良派政党，它的当前的政治目标基本上是温和的。

在1914年以前的德国政局中，德皇的政府在帝国议会中远远

没有掌握可靠的多数。它要通过法律和批准预算，就必须在一串反社会主义党派的议会联盟中得到支持，其中有保守党分子、激进进步党分子一直到天主教中央党占支配地位的中央党分子。1910年在弗里德里希·纳乌曼的领导下组成进步党的激进派常常站在反对党地位，但并不是始终如此；中央党有时候参加联盟，有时候又置身于联盟之外；自由党分子往往站在政府一边，而保守党分子则始终如此。有时候，社会民主党人一面同进步党人结成联盟，一面又同自由党人或中央党人携手，因而能使政府处于少数地位，也许还能说服大多数议员投票赞成各党本身的纲领上已经列出但没有其他政党的支持又无法实现的改良措施，有时甚至还能推动一些选举方面和政府组织方面的改革，使国家机器朝民主化方向迈出几步。资产阶级政党都在不同程度上希望国家制度自由化，特别希望建立立宪政府，规定大臣向帝国议会负责而不是向德皇负责；自由党人和进步党人还主张对议席进行一定程度的重新分配，以便削弱土地所有者集团的势力。但是社会民主党却坚持自己的看法，不但认为绝不应在帝国议会中同任何其他政党合作，而且认为永远不应投票赞成任何非社会党内阁的预算，哪怕预算所要求的款项将用于社会党所同意的目的，或是所提出的筹款办法会把负担加在富有阶级身上。社会民主党作为一项原则规定：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现行制度及维持现行制度的国家，因而必须拒绝采取任何支持政府维护现行制度的行动。

上述态度只有在如下假定成立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社会民主党对单独赢得帝国议会中的多数已经有了很大把握，不久就 299 可以处于有利地位，阻止现存政权继续发生作用。如果拒绝同任何其他政党结盟就能十分可靠地加速中间党派的衰亡，就能使反动派即使被迫联合起来反对社会党人，也会沦为少数而无法继续维持政府，那么拒不结盟就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社会民主党庞

大党员中有许多人对选举前景的这一判断表示怀疑；还有人认为，只要这种局势有出现的可能，德皇及其反动支持者就会毫不犹豫地改变选举条件，使社会党人处于不利地位，甚至于发动军事政变，以阻止他们取得政权。于是便有人主张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以便争取比较自由的宪法，他们所持的理由或则是，根据现行宪法，没有资产阶级政党的帮助就不可能赢得多数，或则是，军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对资产阶级和社会党人的联盟发动政变要比单独对付社会党人困难得多。

在德国内部，普鲁士的宪法同一些小邦的宪法差别很大，因而使整个形势大大复杂化了。在普鲁士，等级选举制使得社会党人根本不可能在邦议会中赢得多数，甚至也不可能取得任何有效的代表权，而其他一些邦的选举制则同帝国的选举制相似，其中还有些邦右翼政府或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府是否能掌权，往往要取决于社会党人采取什么方针。后一种情况在巴伐里亚和巴登尤其存在。在这些和某些其他邦里，社会民主党人早就抗拒党的顽固方针。我们在前面的一章里已经谈到^①，早在伯恩施坦发动修正主义运动之前，巴伐里亚人在福尔马尔的领导下是怎样就这一问题展开争论的，同时也看到他们是怎样支持修正主义的，因为这符合他们想同那些主要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结成选举和议会联盟的愿望。修正主义基本上是一种从理论上探讨问题的学说，决不能把它同改良主义混为一谈，后者是由于权衡政治上的得失而产生的。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伯恩施坦的主要支持或是来自那些希望能够自由建立政治联盟的改良主义者，或是来自工会的温和派。

在帝国议会中，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愿意，就可以在对付非责任

^① 参看本卷第 285 页。

制政府的联盟中成为最大的党，至少在 1912 年获得巨大的选举胜利以后是这样。另一方面，在巴伐利亚，天主教派的地位十分稳固，以致使社会党人不可能保持支配地位。一般说来，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党人在其他邦议会中比在帝国议会中强大得多，因而联盟就必须在相当平等的条件上建立。当然，除普鲁士和萨克森以外，各邦的责任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存在的，尽管其权力和职能有限。如果在这些限度内就共同纲领达成协议，党派联盟就能够使共同纲领付诸实现，不管社会党人是参加了政府，还是仅仅从旁给予支持。实际上，社会民主党人在一些属于这类的情况下，虽然没有参加进步的邦政府，但的确给予了支持，而且也的确通过这些邦政府制定了一定数量的进步法律。但是党的全国领导机构甚至对这种支持也表示不满，理由是这损害了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推迟了一心向往的社会党多数的取得。

于是，矛盾的局面产生了：社会民主党越是坚持它的革命目标，越是坚持保持完全的独立，以便夺取国家机器，它在实践中就越是需要温和，以便从其他政党手中把资产阶级选民和农民选民争取过来。为了选举，它不仅在社会纲领中，而且在反对天主教会的态度上，都不得不把调门放低，而在反对专制政府和贵族军国主义的斗争中，也不得不以人民领袖的面目出现，而不以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斗士的身分出现。实际上，它无可避免地要支持大多数 301 拥护者——特别是工会中的拥护者——所要求通过的社会改革议案。但是这样一来，它就必须在会中会同天主教中央党和进步党一道发言支持这类议案，一面又在投票时反对这类议案，因为投赞成票就意味着赞成现存制度。在帝国的政治活动中尤其需要这样做；帝国的政治不同于分立的各邦。但是即使在各邦，党的中心政策也是在最后阶段反对邦政府所批准的议案，以求避免支持现行制度的责任。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始终存在一个重大的弱点，那就是一直没有能够就任何土地纲领取得一致意见。这一点未能办到的一个原因是，德国各地的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条件和农林就业情况差别很大。大致说来，西德和南德是小农场的小农耕作制的地区，有一部分富裕农民，而东德——也是大致说来——则是实行封建大庄园制的地区，有大批深受压迫的没有土地的农业劳动者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分界线是易北河。在小农地区，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决定究竟是同小农耕作者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妥协，还是反对他们，盼望他们作为一个阶级会由于无力同大规模耕作制的产品竞争，尤其是无力同新世界的草原农场的进口产品竞争，而逐渐消亡。当然，这就引起了农业保护问题。土地持有阶级支持保护方案，但大多数社会党人则表示反对，因为这种方案会提高生活费用，加强德国社会中的封建因素。尽管如此，还是有少数社会党人转变态度，支持农业保护方案；不过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在南方——主张由公家向农民提供低利信贷，并减轻地租和赋税负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一主张，认为这种帮助主要有利于最能从中取得好处的富裕农民；他们还认为，这种帮助会使过了时的小规模耕作制存在下去，这种耕作制应该用资本主义耕作方法来代替。这一点先后在福尔马尔那一派巴伐利亚人和北德人之间，
302 后来又在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之间，成了争论的问题。我们已经谈过^①，1894年的党代表大会曾通过一项有利于小农的土地纲领的大纲，但对东德的无地农业劳工则没有提供任何好处。不过，这个大纲经过一个特别委员会的补充修订后，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被否决了。此后，党先后任命了许多委员会草拟土地纲领，但都没有达成协议，最后的决定被一再推迟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

① 见本卷第297页。

说，要紧的是争取农业工资劳动者而不是小农，但是不论在德国的小农地区还是在封建地区，他们实际上都没有能在农业工资劳动者中间建立任何实力雄厚的组织。除了在南德的某些地区以外，他们的党是一个具有城市观点的党。在他们看到一切证据都同自己的看法相反之后，其中大多数人便死抱住一个教条不放：小规模耕作者在经济上注定要灭亡，只是统治阶级和教会要把他们当作反社会主义的堡垒，才把他们维持下来。

总的说来，除了在普鲁士为争取选举改革而进行鼓动以外，社会民主党一般都很谨慎，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同警察当局或法院发生直接冲突的行动。它在理论上越是革命，就越是觉得必须在实践中温和行事。它看到在前方的某个地方隐然出现了一个新型国家和新社会制度，它想只要它在帝国议会中赢得多数，迫使德皇和反动派让步，从而“夺取了政权”，就能够使它们变成现实。在赢得这场胜利以前，社会党人仍然面对着一个敌视他们，对人民不负任何责任的国家政权；既然现存国家的特性是这样，因而凡足以扩大国家权力的行动，都被看作是错误的危险的。国有化主张不得，因为这意味着把更大的权力交给现存的国家。基于这个理由，社会党人反对把帝国银行收归国有。他们并不排除为保障工人的利益而鼓吹工业立法和社会立法，但是就连提出这种主张，也不得不说明这不会增加当作敌人对待的国家的权力。事实上，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强调社会立法，这基本上是由于受到工会的压力。但是在取得政 303
权以前，它无法根据这种立法进一步提出任何建设性的社会化纲领。社会党的全部本钱都下在选举方面了；这就是说要尽可能争取选民的最大支持。它必须争取中间集团投社会党的票；而这就意味着需要冲淡理论，冲淡的程度实际上甚至要比它准备同左翼资产阶级分子暂时结盟时更高。

此外，还有一个复杂情况：除了南德以外，自由主义的力量都

十分软弱而缺乏独立性。民族自由党跟进步党不同，前者基本上是一个由银行家、商人和工业家组成的大规模资本主义政党，这个阶级正从德意志帝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它虽然也希望改变专制制度，特别是削弱支持农业保护措施的地主集团的势力，但是它并不想对现存政权采取强烈的行动，而且总的说来也支持这个政权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政策。一个强大的德国，再加上一个主张扩大贸易和工业，主张发展殖民事业的帝国政府是符合这个阶级的利益的。即使在它批评立宪制度不够完善的时候，它也愿意支持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因此，德国便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运动能够为代议制政府发挥其他经济先进国家中的自由主义所发挥的那种作用。社会民主党人发现自己不得不代替自由主义者去充当自由主义民主制的主要鼓吹者，并设法把这一任务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使命结合起来。实际上，这意味着一面空喊社会党的口号，一面又把推行社会党的政策放在鼓动自由主义改良这一行动的后面。

特别重要的是，1871年宪法改革以后，社会党的政策规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党的团结，作为一个完全统一的选举和宣传机器进行活动。导致分裂的纠纷会使一心向往的在帝国议会中取得多数的前景完全归于破灭，因此必须有一个统一战线和集中的党纪。但是党的纪律又决不能严格到把党内任何相当强大的派别开除出去的程度，因为如果这样做，就可能象其他国家一样，出现对立的社会党。因此，在实践中就不得不允许持反对意见的人享有很大的自由，哪怕他们是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持反对意见。伯恩施坦是不能开除出党的；福尔马尔及其巴伐利亚信奉者、以及后来的路德维希·弗兰克及其巴登信奉者也必须留在党内，让他们有很大的自由去解释党的决议。于是在左翼方面，也就不得不容忍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留在党内，否则他们会成为一个革

命性和国际主义更强的政党的中心。除此以外，当时要求统一的民族情感异常强烈；而且反对既定政策的人大多集中在某些地区（尤其是南德）这一事实，也构成一个原因，不能听任他们脱党，从而危害作为民族统一的象征的社会党统一。

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两点是感到自豪的：它是国际主义者；它不但在其他地区而且也在德国展开反对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斗争。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的杰出领袖除少数人以外，都不是言不由衷的，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又具有多么强烈的民族主义。他们的民族主义在针对国界以外时，事实上主要是反对俄国的，不过也存在相当强烈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因素，英帝国主义在许多地区都妨碍了德国。上述情绪最重要的起因无非是，害怕威胁帝国东部边境的、同帝国在东南欧的扩张野心相竞争的沙皇俄国的野蛮力量。在社会党人看来，不论是成为对头，还是结为盟友，俄国都同样是危险的，因为它只能成为帝国内最可憎的分子的盟友——那就是同普鲁士的反动势力结成一伙来反对西方较开明的力量。当国防问题在德国社会党的辩论中提出时，辩论者最关心的问题始终是防御俄国的问题。有一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对待国际事务的态度上突然向左转，甚至达到在原则上投票赞成总罢工的地步，这是因为1905年俄国革命的消息使他们受到了305震动；俄国革命失败后，他们立刻又恢复了以前的态度。

总的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一再重申自己对未来革命所抱的信念，但却是一个拘泥于宪法行动的政党。它一直担心自己在选举方面所获得的显著进展，会由于再度实行俾斯麦过去用来对付它的法律镇压而遭到破坏。甚至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失效以后，德国社会党人的会议仍不得不经常受普鲁士警察当局的监视，只要它认为会上出现反叛或颠覆的情绪，它随时可以中止会议的进行。当时还有一个压制性的出版法存在，它给社会党的编辑和

新闻记者很大的压力；合法行为的分界线究竟划在什么地方，当时始终是摸不清的。社会党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开反抗当局的，但是他们随时留神当局的态度，这对他们的行为无疑产生了影响。事实上，党越是发展了自己的组织，越是拥有印刷机、俱乐部、办公室以及其他贵重的财产，就越是担心触犯压在头上的法律这种恐惧心理影响工会领袖的程度甚至比政治家还严重，因为工会积累了基金，发展了广泛的福利事业。随着工会的力量日益壮大，财力日益雄厚，它们对党的影响也增加了，而且也日益促使党小心谨慎，按法律办事。

社会党人在担心遭受压制或法律迫害的同时，又担心选举制会发生不利于自己的改变。在普鲁士，帝国议会同邦议会之间的情况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在帝国议会的选举中，就象在德国其他地区一样，也需要争取站在边缘上的选民；由于整个普鲁士制度的性质非常反动，因而更有希望赢得他们的支持。进步的自由主义力量在普鲁士很薄弱，因而社会民主党人在这里更甚于在全国任何其他地区，成了反对派的主要力量。但是在邦议会的政治中，普鲁士宪法使得社会民主党人即使同非社会党集团结成联盟，在选举上也根本没有获得较大成就的机会。1906年以前，社会民主党一直没有人选入普鲁士邦议会。到了这一年，在资产阶级选民的帮助下，才有三人当选为议员，但是面对着反动政党的巨大优势，这个小小的议会党团无能为力。因此，社会党人在普鲁士的政治活动几乎完全集中在要求宪法改革上。1906年，普鲁士邦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增加议员人数，并对选举制作了某些细微的修改，把议席重新分配了一下，但是主张实行成年男子选举权和秘密投票制的激进主义修正案却被压倒多数的反对票否决了。1908年，邦议会中的激进分子再一次提出改革选举制的建议，但是遭到了冯·毕洛夫的严词拒绝，并再一次被否决了。于是，社会民主党人就展开

广泛的街道示威运动，结果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时的輿情是，尽管范围狭窄的选举权和等级投票制给社会民主党人造成了阻碍，他们仍然有7人在那些被政府的态度激怒了的激进派选民的支持下当选为议员。1909年，改革选举制的提案再次在邦议会中提出，并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和骚乱，随之又再次遭到居支配地位的政党的否决。7名社会民主党议员中有4名以技术方面的理由被撤销议员资格，不过后来又重新当选；骚乱从柏林蔓延到其他普鲁士城市。1910年，德皇在这一压力下宣布改革选举制，但是当政府提出改革草案时，人们看出政府并没有真正进行改革的意图。等级投票制仍然保留了下来，投票仍需公开进行。唯一的修改是，在某些情况下以直接选举代替间接选举，并在减少富有的资产阶级——不是地主——的名额的前提下增加了职业等级的代表名额。这个草案一经宣布，重新引起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最后，政府同意给予天主教中央党以秘密投票权，同时又根据保守党的要求撤回了直接投票的建议，于是选举改革草案便在两党的支持下获得通过。虽然骚动仍在继续，但是直到1914年爆发战争，普鲁士宪法并没有进一步修订。

其他各邦的形势比较好，但是在社会党的根据地萨克森邦，³⁰⁷ 1896年的反动选举法仍然有效，这使社会民主党人注意到反动势力曾经修改选举法，重新实行等级投票制，从而成功地阻挠了党的进展，这种投票制使他们无法在邦议会的选举中获得他们在帝国议会选举中所取得的那样巨大胜利。社会党人担心萨克森邦所做的事情其他地方也可能照搬照抄。他们的领袖所能看到的上上之策，莫过于在现行宪法的规定下在一切地方扩充党的队伍，除非当地的规定没有给他们留下发展的余地。

在普鲁士和萨克森，就邦议会的选举来说，不修改宪法就不可能有多大作为，或者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于是，社会党人便在

这两个邦里发动群众运动，要求改革选举制。鼓动主要是在当选的议会外面进行的，同时也谋求议会内部所能找到的进步人物给予支援。这些运动取得了成果，社会党人在两个邦里都得到了修改宪法的保证，但是所提出的议案却证明几乎是毫无用处的。在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赢得了一些新议席，但是在普鲁士，专制制度和等级投票制使他们在1918年以前迄未取得任何进展。由于普鲁士支配着帝国议会的联邦上议院，这就足以为帝国宪法走向责任制政府设置无法逾越的障碍。

因此，德国社会党的工作是很艰巨的；全国经济的日益繁荣更增加了党的困难。繁荣的经济使生活水平得以迅速提高，并使工会得以在工资和劳动条件方面取得巨大的胜利，而没有遭到非常顽强的抵制。此外，政府的一部分政策是改善社会服务事业和劳工立法，以此来对抗社会党的宣传。这项政策虽未获成功，未能使工人抛弃对社会民主党的忠诚，但毕竟大大影响了工人以及代表他们的工会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所采取的态度。1906年，当俄国革命的失败显然已成定局的时候，工会领袖同党的领袖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如前所述，这次会议是前一年建议举行的，旨在通过一项认真考虑举行总罢工的可能性的决议案。党的领袖在工会的压力下同意，事先不征得工会运动的同意决不举行总罢工；这项协议后来经党代表大会通过。一般认为，这标志着工会对党的政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的时期从此开始；产生这种影响的是工会的中央领导机构，而不是全体工会会员，这种影响始终是倒向改良主义一边的。

1900年，威廉·李卜克内西逝世后，党的领导权毫无争议地落到了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年)手里，他曾经同李卜克内西一道创立了社会民主党的前身——埃森纳赫派。倍倍尔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是老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所了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支柱。他在晚年以前，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是党的左翼人物；这种说法大致说来也是正确的。他强烈反对南德方面希望同资产阶级进步党妥协，并支持进步党邦政府的改良主义者。当有关修正主义的争论产生时，他激烈反对伯恩施坦，并同考茨基联合起来，驳斥修正主义者在经济上的异端邪说，驳斥伯恩施坦打算以康德的理论为基础，而不是以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重新阐释社会主义哲学的企图。倍倍尔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在精神上完全满足于早期从威廉·李卜克内西那里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在社会民主党内，他继续发挥李卜克内西的传统。但是，他在实践中决不象他在理论上所表现的那样左；虽然他反对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但并不愿走到把这些人开除出党的地步。他衷心相信必须团结一致，并且愿意让弗兰克和伯恩施坦之流分裂分子和异端派继续不受干扰地进行宣传，条件是不时予以驳斥。倍倍尔对社会主义文献的主要贡献是《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他在书中回顾了两性关系的历史，并且主张男女平权。他的三卷本自传《我的一生》是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幕史的一个丰富的资料宝库。

在这些年代里始终同倍倍尔保持亲密关系的是奥地利人卡尔·考茨基。一般认为在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他同倍倍尔一样，也是正统派传统的伟大维护者。直到1914年前几年，他也同样被认为属于左翼，原因是他激烈反对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并且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会从资本主义企业日益集中化和托拉斯化的过程中产生。考茨基理论的基本内容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没有必要再说一遍。我们这里要谈的是，自从在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格奥尔格·累德堡和弗兰茨·梅林的领导下出现战斗性的左派的时候起，考茨基就成了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派之间的中派，而且当革命派在1914年以前的几年中力

图使党脱离日趋严重的改良主义倾向时，他同革命派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

考茨基是一个理论家，而不是主持党务的实际领袖。在倍倍尔周围主持党的领导机构的人中，最重要的是伊格纳兹·奥艾尔（1846—1907年），他是一个老资格的埃森纳赫派，早在1875年举行哥达代表大会时就是党的书记，而且终生担任此职。此外还有保尔·辛格尔（1844—1911年），他在1890年担任党的主席。奥艾尔是南德人，原是马鞍匠。奥艾尔曾参加1870年的战争，并且负过伤。他积极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主要以组织者和精明的策略家著称，而不是以思想家著称；他的著作很少，唯一的一本名著在1889年出版，叙述了德国社会党受俾斯麦反社会主义者法的迫害，流亡在外时的命运，因而很有价值。保尔·辛格尔是一个更能干的人，他是柏林的犹太商人和工业家，在企业中赚了很多钱，后来大部分都捐献给社会主义事业了。1884年，他当选为柏林区的帝国议会议员，1887年他成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890年当
310 选为主席。他也是作为组织者著称的。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有高度严密的组织，大多是他和奥艾尔的功劳。在“国际”中，他常常在重要的时刻担任主席，但是他根本不善于讲演。他对社会主义思想也没有任何重大的贡献，他在政策问题上往往愿意接受倍倍尔的指导，而在理论问题上则愿意接受考茨基的指导。他的确是一个天生的中派分子，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十分希望把党团结在一起。

这4人中，有3人——奥艾尔、辛格尔和倍倍尔——很快相继谢世，结果使社会民主党的中央领导出现了一个空白；在1914年以前的几年，新人物很快出现。继倍倍尔成为党的领袖的是胡果·哈阿兹（1863—1919年），1915年他同伯恩施坦、考茨基一起跟主战派决裂，两年以后同他们一道成立了独立社会党。哈阿兹是一

个律师，来自东普鲁士，在帝国议会中代表柯尼斯堡。他积极参加了第二国际的和平运动以及促进法德谅解的各种运动。1914年，他在党的会议上反对为战争预算投赞成票，不过他暂时接受了多数人的决定。他始终是一个稳健派，从来也不是左派。

其他的新领袖有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870—1925年）和菲力浦·谢德曼（1865—1939年），艾伯特是海德尔堡的一个裁缝的儿子，他本人是一个马具匠，早在1912年当选为帝国议会议员以前，在社会民主党中就很活跃。他肯定属于党的右翼，1914年以后成为赞成参战的多数派领袖。1918年的德国革命使他成为魏玛共和国的总统。谢德曼在战争年代是艾伯特的主要助手，战前由于态度左倾而有一些名气，当时他拒绝朝觐德皇而被解除了帝国议会副主席的职务。但是他始终更接近于右派而不是左派。1918年，他成为德国第一届共和国政府的总理，第二年就由于不满意和 311 约而辞职，放弃了政治，成为他的故乡卡塞尔的市长。他的《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英译本1929年出版）是研究该党历史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关于战争年代尤其如此。

在1914年以前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巴登社会党人领袖路德维希·弗兰克（1874—1914年），他肯定属于党的右翼。弗兰克是南德方面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进步党人结成选举联盟的政策的主要代言人和执行者。他同他的信从者坚持这项政策，并且投票支持资产阶级左派政府，尽管社会民主党的几届代表大会曾一再表示不同意，并曾遭到倍倍尔的申斥。弗兰克在第二国际中很活跃，曾参与领导一些旨在促进法德谅解以及促使法德两国工人采取联合行动以反对战争的运动。他认为，要摧毁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使帝国制度自由化，最大的希望在于建立一个以南德各邦、法国和阿尔萨斯—洛林为基础的民主集团。为达到这一目的，他曾发起运动，要求在阿尔萨斯—洛林（1912年割让）实

行成年男子选举权。他以持有和平主义主张而著称，然而他在1914年仍坚决参军，他说普鲁士的自由化会是战争的结果。这一年尚未结束，他就在战争中阵亡了。

态度更右的是爱德华·大卫(1863—1930年)，大卫是黑森人，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社会民主党，鼓吹一种同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说尖锐对立的土地政策。他的最重要著述是《社会主义与农业经济》(1903年)，他在书中驳斥了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取代小农经济的意见，他要求实行一项维持小农阶级，并分散大庄园以扩大这个阶级的政策。他认为自耕农所有制本身就是好的，而且也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这使他同考茨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修正主义的论战中，他自然是站在伯恩施坦一边的。

312 1903年，他首次被选入帝国议会，是一个有影响的右翼议员。1918年，他在马克斯亲王的巴登政府中担任外交部次官，接着又在共和国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他在起草魏玛宪法的工作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另一个右翼人物是巴伐利亚的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1850—1922年)。他对土地问题的观点以及对社会党同其他政党合作的问题的观点，我们在前面的一章中已经讨论过了。但是在他同倍倍尔发生一系列的激烈冲突(以1903年德累斯顿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所发生了那场著名的论战为最高潮)以后，他在党内的活动就大大减少了。他的身体很坏，他把这场争论留给别人去进行，但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意见。

最后，在右翼的领袖中还必须一提工会主义者。其中最主要的是卡尔·列金(1861—1920年)，他是德国工会委员会的难以对付的主席，曾任工会国际书记。他原是汉堡的一名木工，1890年反社会主义者法失效以后，各工会所建立的中央组织大部分出于他的努力。他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极力反对使工会从属于

党或利用工会实现政治目的的任何企图。他坚决反对群众性的罢工，认为工会应该一心一意地从事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工作；只要雇主愿意讲道理，就应该同雇主建立友好的关系来达到这一目的。他的理想是建立“立宪式的工厂”，由工人同雇主一道进行管理，到后期再由社会主义国家代替私人业主。同样，他在政治方面也希望通过君主立宪政体逐步过渡到那种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共和国。在党内，他站在极端的改良主义方面。在工会工作中，他是一个严格的讲究纪律的人，喜欢用激烈的语言和强硬的手段来对付左翼激烈分子；他最感得意的事莫过于训斥反对者，叫他们认识服从命令的义务。工会国际哪怕只是考虑一下总罢工的问题，他也坚决反对，他也反对社会主义者国际考虑这一问题。³¹³ 1905年以后，工会对德国社会党的影响之所以能增加，得力于他的地方比任何他人人都大。说来矛盾的是，1920年，居然轮到他来号召举行反对卡普叛乱的总罢工。^①

列金的一个亲密的合作者是雪茄烟工人阿道夫·冯·埃尔姆(1857—1916年)，他在工会、合作运动以及社会民主党内都是一个杰出的人物。1883年，他成为汉堡雪茄烟拣叶工人工会的领袖，在这以前，他曾在美国工作过。8年以后，他主办营业兴隆的汉堡烟草工人合作社。1889年，他带头建立了现代德国消费合作运动的先驱——汉堡消费生产合作社。他后来担任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盟的主席；劝说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这个运动，并敦促所有社会党人协助开展这个运动，主要是他的功绩。与此同时，冯·埃尔姆也继续在工会运动中积极从事活动。在党内，他支持修正主义者；在帝国议会中，他始终属于右翼，直到1906年退休为止。不过，他

^① 1920年3月13日，德国的叛乱分子占领了柏林，并组织了以卡普为首的新政府。柏林的工人用总罢工回答了这次政变。在工人的猛烈打击下，卡普政府于3月17日垮台。——译注

主要关心的是以充足的资金建立强大的工会，同时建立消费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完全独立于社会民主党之外，但同党进行合作。

社会民主党的左翼，特别是在1905年以后，是由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克拉拉·蔡特金、弗兰茨·梅林和格奥尔格·累德堡等人领导的。在1914年以前的年代里，左派同中派的论争大体上代替了中间偏左派同右派之间的论争；发生争执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即反军国主义和总罢工的问题。德国人通常把后者称之为“群众性罢工”以便同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总罢工区别开来。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年）带头要求德国社会党人积极开展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包括直接向武装部队发出呼吁。1907年，他出版了自己所写的小册子《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结果被送入一个要塞，服刑18个月，而这篇文章也立刻遭到社会民主党否定。1912年，他在波茨坦当选为帝国议会议员；1914年，他是公然违抗大多数人的意见，第一个投票反对战争预算的议员。大战期间，他组织了斯巴达克运动^①，1919年同罗莎·卢森堡一起被杀害，成了魏玛共和国的牺牲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具有极大的勇气和坚定不移的革命思想。战争期间，他作为军人被送上前线，曾尽全力在武装部队中鼓动叛乱；他在脱离军队、从监狱中出来以后，就致力于在工厂工人中建立反抗组织。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理论家，他是一个厌恶战争的斗士，愿意毫不妥协地根据自己的原则行事。

在社会民主党的左翼领袖中，弗兰茨·梅林（1846—1919年）是党的历史学家，也是党的最活跃的著述家之一，因而占有重要地

^① 斯巴达克运动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卡·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蔡特金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起的革命运动。他们出版署名“斯巴达克”的《政治书信》，因此又称斯巴达克派。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揭露德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译注

位。他原是一个自由主义新闻记者，反对俾斯麦，1890年他信仰了社会主义，并立刻参加了最进步的一派。他所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最初于1897-1898年出版，实际上是一部有关社会党运动兴起的整个历史背景的著作，既强调文化因素，也强调经济和政治因素。他的卓越之处在于：对拉萨尔及其信从者以及对马克思和埃森纳赫派都立论公允，不偏不倚；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抱着客观批判的精神对待整个学说。他是1914年以前被选入普鲁士邦议会的少数几个社会党议员之一。在那些年代里，他同罗莎·卢森堡密切合作；战争期间，这种合作关系更加强了。梅林是斯巴达克运动的鼓舞者之一，所著《马克思传》始终是远远高于他人的最优秀著作。

跟罗莎·卢森堡关系同样密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妇女部的领袖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年)，她从1892年起担任社会党女权运动的机关刊物《平等报》的编辑多年，在党的教育和文化工315作的每一方面都很活跃。她是一个热忱的国际主义者，一个深信国际工人阶级革命的人，跟罗莎·卢森堡一样，反对党内日益严重的国家主义倾向。她强烈反对修正主义，相信群众性罢工是社会革命的先声。1914年，她积极反对战争；1917年，她参加了独立社会党。战争结束后，她参加了共产党，但不久就参加了保尔·列维的反对派。但是当列维被开除出共产党时，她却得到准许——或者说被说服——留在党内。晚年她主要住在苏联。

格奥尔格·累德堡(1850—1947年)不象梅林或蔡特金那样左，但是他和他们同属一派，而不属中派。1914年，他在帝国议会内属于反对战争的集团，是1916年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首席德国代表。独立社会党成立的时候，他就加入了该党，而且始终留在党内直到结束；1922年，独立社会党人同意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他仍拒绝重回社会民主党。

罗莎·卢森堡(1871—1919年),也是一个鼓吹反军国主义的人。对卡尔·李卜克内西来说,这是一个集中精力,全力以赴的问题,面对她则只是一个广泛得多的以革命反对改良的问题中的一部分。她同社会民主党领袖——同中派和右派——的冲突,主要是从讨论群众性罢工及其基本革命性质这一问题开始的。我们将在后面的某章中充分讨论她的见解^①,这里就不必详加论述了。她并不主张仅仅为了取得成年男子选举权之类的个别让步,就把群众性罢工当作大肆宣扬的政治示威行动来利用,而是主张把它当作革命武器来利用,旨在发动群众采取行动以推翻现存秩序。1905年,德国的工会领袖满心不愿意地面临一种仅仅有可能要他们宣布群众性罢工的局面,而这时他们竟完全没有作好考虑这类问题的准备。在他们的设想中,所能办到的事情充其量不过是让自己的工会会员起来罢工,而这在工人阶级中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排除了国家不准许组织工会的公务员和铁路工人,也排除了由于受资本家老板的阻挠而不能加入自由工会的矿山和重工业中的大批工人;此外,也排除了同天主教中央党有联系的基督教工会会员、在教会直接监督下工作的天主教工会联合会会员、自由主义希尔施-敦克尔派工会会员。于是,他们满意地指出,仅仅由自己的会员举行群众性罢工,其效果将是非常有限的,远不足以使全国瘫痪。他们最后说,发起这种罢工等于是邀请政府来没收自己的经费和建筑物,并摧毁自己的运动。在1905年俄国革命所引起的激情的影响下,社会民主党领袖虽曾在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考虑有可能举行群众性罢工,但绝不是赞成卢森堡所设想的那种罢工。他们接受群众性罢工,仅仅是把它当作一种可能在政府破坏现存宪法权利的情况下采用的武器。即使是这样,倍倍尔谈

^① 见本卷第506页及以下。

到这项决议时还着重指出：这种罢工，只有事先作好非常周密的准备和组织工作，才有获得成功的希望——这恰恰是卢森堡认为绝对办不到的事情。她和倍倍尔所考虑的事实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罢工。倍倍尔所考虑的是，一种以停止工作的形式出现的有秩序的示威行动，旨在实现某项有限的具体目标；而卢森堡所设想的则是发动群众，造成社会结构的大规模脱节，运转失灵，以此作为发动起义的出发点。

但是，甚至连社会民主党对可能利用群众性罢工作为自卫武器的问题所抱的这种极其谨慎的态度，也引起了工会领袖的恐惧。为了安慰他们，党的领袖保证一旦决定为政治目的利用群众性罢工317时，不仅事先会同他们商量，而且党会把号召罢工的实际责任承担下来。这样，工会对罢工就没有责任了，而且据说政府也就没有理由对工会采取法律行动了。根据这项谅解，这个问题就暂时平息了下去。当时党的领袖宣称，1905年工会代表大会反对群众性罢工的决定，与同年社会党代表大会有条件地赞成群众性罢工的决定并没有矛盾。在1906年曼海姆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由于保证不取得工会同意就不举行群众性罢工，因而“群众性罢工”的政策实际上也就被埋葬了。

从本质上说，“群众性罢工”并没有什么革命性，只是卢森堡对群众性罢工的解释有革命性罢了。奥地利人和比利时人在选举改革运动中都曾利用过群众性罢工；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曾相继运用过群众性罢工。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根据地。只有德国工会和大多数德国社会党人反对利用群众性罢工，哪怕是极其有限的以和平方式举行的群众性罢工。唯一的可能是，用它来对付反动派取消现行选举权或结社权的政变。他们深信，如果举行罢工，德国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开枪，而他们最不愿见到的事情就是假普鲁士军队以开枪射杀他们的口实。他们嘲笑卢森堡

的如下看法：如果选择适当的时机号召工人——不仅是工会会员，而是全体工人——举行罢工，那么铁路工人、矿工、重工业工人、公务员以及所有其他非工会会员就会一同起来掀起一次自发的大规模暴动，而且会扩大到武装部队，从而使反动派束手无策。他们深信德国人不会这样做，我认为他们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到了1907年就有一段经历说明，同坚决捍卫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相对抗究竟会落得什么后果，这一年他们听任自己陷入一个不得不就一个问题竞选帝国议会议席的境地，从而直接同国家相对抗。1906年，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以及波兰人曾经联合起来反对通过政府为加紧镇压德属南非的赫列劳人所作的预算。冯·毕洛夫首相解散了帝国议会以示报复。于是，资产阶级政党便联合起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在1907年年初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虽然总的票数略有增加，但在原有的81个议席中竟丧失了38席。当时之所以得出这个结果，是因为在第一次投票中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显著的多数，接着又举行第二次投票，这时其他政党便以爱国者的面貌联合起来对付社会党人，指责他们是保卫祖国和殖民扩张事业的敌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向斯图加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提出报告的时候，显然认为自己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因为它不仅明确地承认保卫祖国的责任，而且还承认殖民事业是名正言顺的，同时又拒绝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人站在一边。它反对德国对赫列劳人进行战争，其用意根本不在于全面攻击殖民主义或放弃保卫祖国的责任。它发现自己上了当，陷入了自己的领袖决不愿陷入的境地。研究一下选举的结果就可以看出，它的工人阶级选票虽然增加了，但却失去了大部分薪金阶层和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这批选民是许多城市选区的决定性因素。在议席的分配自1871年以来始终未变的情况下，党在工业区所掌握

的多数无法弥补第二次投票中站在边缘上的选民背弃党所造成的损失。社会民主党领袖所得到的教训是：在争取多数以求实现改变德国社会的目标时，绝不可冒犯中产阶级的民主分子。从这一推断出发，他们着手重建自己的力量。1912年，他们在选举中得到了报偿：在大大增加了的中产阶级选民队伍的帮助下，赢得了不下于110个议席，而1907年则只有43席；得到的选票是425万张，而1907年只有325万张。这一次，他们把原有的国际主义观点放到次要地位上，而主要在国内问题上竞选，这对他们说来要适合得多。

显而易见的事实真相是，国家的扩张事业在大多数选民中得到拥护，而社会民主党本身——至少是党的领袖和工会——对这一问题的支持也越来越大。1906年以来，党一直在稳步地向右转，因为自俄国革命失败和党在1907年的选举中遭到惨败以来，中派就一直在向右转。不仅是考茨基和哈阿兹，还有伯恩斯坦及其他一些修正主义者，在1914年以后都将表明自己保持了国际主义观点，但这在当时并不妨碍他们为维持党的团结而向右转，党在选举上经得起同左派争吵，而远远经不起同右派争吵。1914年以前的那几年，社会民主党的中派越来越成了右派的俘虏：战争越是临近，他们就越维持不住自己的立场。社会主义者国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名义上要求各国社会党采取断然行动去对付战争威胁，而战争一旦爆发则要使战争成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良机。但是各国党的领袖很少有人认真对待这一点，德国党的大多数领袖尤其没有认真对待这一点。1914年以后，甚至连中间偏左派也冲淡这一点，争取通过协商实现和平。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派成了一个人数极少的少数派，一直残存到1917年以后。

然而直到1914年，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始终保持着声势壮大的面貌。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仅人数最多，而且组织也

最严密。德国的工会运动，同党的关系密切，正在迅速成长，而且组织也极其严密。合作运动，特别是在消费者中间，也正在迅速发展，而且大体上受社会党的影响。社会党人拥有阵容十分壮观的报纸和刊物，并且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和小册子。他们的教育活动分布得很广；他们开办党校来训练党的干部领袖。在文化领域，他们也非常活跃；他们有自己的剧院和音乐厅，还有讲究的会议场所和俱乐部。尽管普鲁士的法律对妇女参政限制很严，社会民主党的妇女组织仍然是强大的。党拥有一个广泛的体育组织；党的青年部门也非常活跃，尽管这些部门在显示左倾偏向的迹象时曾受到党的严格控制。1907年以前，负责领导党的青年组织的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他发表了关于反军国主义的小册子以后，他的职务便被解除了，接替他的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与此同时，青年组织也进行了改组，置于党领导机构的严格控制之下。事实上，凡是单凭组织的效率就能办到的事情，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都办到了。这一点不仅它们本身引以自豪，而且也博得全世界的赞赏。

然而，社会民主党人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呢？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肯面对事实。他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赢得大批大批选民的支持这一前景上，满以为自己不仅能在帝国议会中成为多数，而且能利用这种多数在德国建立责任制政府，迫使普鲁士进行宪法改革，让自己在普鲁士也当政，从而取得充分的余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造国家。他们以为，单凭选举中的团结一致和有纪律的组织就能达到这些目的。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这样一个难题：不取得大批站在两可地位上的选民的支持，就很难得到所希望的多数，而这批选民只有在他们冲淡自己的正面纲领以迎合选民的愿望时才会投他们的票；如果同帝国政府的武装力量摊牌，是不能指望这批选民的支持的。他们一心计算人头，而没有问问自己，这些投社会

党人票的人中究竟有几个愿意在他们同国家政权进行决定性的斗争时为他们采取行动。他们是共和主义者，但从来也不敢把共和政体写在自己的纲领里；他们在理论上是革命者（通过多数票去反对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革命者），但是他们却把革命推迟到取得选举胜利以后。如果他们真正是革命者，他们就会懂得，革命至少需要很大一部分人民以革命的精神来支持它，但是他们非但没有鼓励信从者发扬革命精神，反而在革命精神出现的时候尽全力去消灭它。他们实质上是改良主义者，但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³²¹因而也不能充分利用他们在实践中所奉行的改良主义政策。他们踌躇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既不能抛弃前者，而在实践中又无法逃避后者，结果两头落空。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德意志帝国已经成了国家统一和伟大精神的象征，这一形象社会民主党人既不能接受，也不能全心全意地反对。他们不能接受帝国，是因为它是专制的、半封建性的、军国主义的，而且是反对他们的全部社会目标的。但是，他们也同样不能全盘否定它，因为它体现了他们对国家统一的愿望，迎合了他们对协调一致的权力的爱好。他们喜欢“大”，这一点可以从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托拉斯化的资本主义的继承者这一看法上十分明显地看出来，也可以从他们本能地不喜欢农民，对任何无纪律或无政府主义性质的事物都感到厌恶等方面明显地看出来。一方面，这种喜欢集权的偏好使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这又使他们窃窃赞赏普鲁士邦，哪怕是在憎恨它的时候。常常有人讲，说到底，他们是拉萨尔派，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又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实际获得胜利的不是埃森纳赫派，而是拉萨尔派。这种说法是有些道理的，但是1871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和拉萨尔派的势力实际上并没有继续分道扬镳。帝国的统一已经确立了普鲁士的优势

地位，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把它当作既成事实而同它妥协。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采取这种态度要比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容易得多。对南德的改良主义者来说，这一步最难走。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构成了正统的社会民主党理论。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最要害处发生的这些矛盾，在德国以外的地方，特别是在法国，当然为许多批评家观察到，并且提出了评论。尽管如此，从组织和选举的成就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就毕竟是十分巨大的，足以使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深为所动。这些成就就深深地打动了从英国进行观察的恩格斯，同时也打动了法国的盖得、西班牙的伊格列西亚斯、瑞典的布兰亭、英国的海德门、美国的希尔奎特和伯格爾、奥地利的阿德勒、意大利的屠拉梯、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以及许多其他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也是有动于衷的——不仅是普列汉诺夫，连列宁也不例外。这幢大厦的确是巍然可观的；它崩溃的时候也恰似山崩地裂。

第七章

323

1905年以前的法国

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尽管内部存在分歧,但从1875年以后毕竟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庞大的政党,而且由于俾斯麦的迫害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与此相反,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1871年几乎完全归于消亡以后,虽然又恢复了生命,但一如既往,很快就呈现出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直存在着许多互争不已的宗派,直到1905年才告一段落。这一年,在社会主义者国际的训示下,至少合并了6个全国性集团以及一些地区性组织,成立了统一社会党。甚至到了这个时候,法国工人阶级也没有实现统一,因为最近才在总工会中统一起来(1902年)的各个工会,是完全独立于社会党人和所有其他政党之外的,并且宣布了自己的工团主义信条和直接行动的方针以对抗统一社会党的议会政策。

本书的第二卷曾经简略地谈过法国的工会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经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衰落以后再次复活的情况。我们在第二卷中看到,正当政府赦免巴黎公社社员的时候,1879年的马赛劳工代表大会决定成立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并宣布这是“工人的政党”。茹尔·盖得是这一运动的推动者,他在1877年创办的刊物《平等》有助于为这一运动铺平道路。盖得在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国外,定居瑞士,在那里同许多社会主义团体——包括无政府主义团体——建立了联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回到法国创办自己的刊物时,曾得到威廉·李卜克内西以及西萨尔·德·巴普的支持。1878年,在巴黎举行了一次

324 国际博览会，巴黎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决定为此召开一次国际劳工代表大会。政府不允许举行这次大会，参加筹备会议的大多数团体都接受了这一禁令。盖得和其他一些人拒绝服从，公开违抗警察当局，召开大会。结果大会被解散了，领袖被投入监狱。他们从监狱中发表了一项宣言，号召建立一个有实力的全国性劳工和社会主义组织。这就为第二年举行马赛代表大会的决定作好了准备。从这时起，盖得就不断向马克思主义方面靠拢，他要求按照德国的方式在法国建立一个统一和集中的社会党。马赛代表大会以后，他于1880年前往伦敦拜访马克思，征求他的意见。回到巴黎以后，他同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1842—1911年)共同为拟议中的新党拟定了一份党章草案和关于奋斗目标的声明。这两个文件大致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为基础，在1880年6月巴黎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批准。这是一次区域性的会议；马赛代表大会已经建立了一些区域性的联合会，这些联合会后来举行会议，为同年后期在勒阿弗尔举行的一次全国性代表大会作好了准备。这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代表们来自形形色色的工人阶级团体，代表着许多互相矛盾的倾向。一方面，互助论者，即主张社会和平及阶级合作的右翼，愤然离去了；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也毅然退出了。互助论者建立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决定举行一次国际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于第二年在伦敦如期举行。^①但是这两部分人的退出根本没有使剩下来的人团结一致。马赛代表大会曾经宣布“首先，无产阶级应该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并且主张把“土地和矿山、机器、运输机构、建筑物和累积资本”收归集体所有。勒阿弗尔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报告中说，这些要求是针对政府禁止原定于1878年举行的

① 见本书第二卷第320页及以下。

国际代表大会开会，针对资产阶级激进派拒绝支持工人的要求而作出的反击。勒阿弗尔代表大会曾否认合作运动是解放无产阶级的适当手段，并采取了明确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但是赞成这些意见的社会党多数是由各种各样的分子组成的。除了反对政治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外，还包括以下各种派别：希望组织革命暴动的布朗基派；希望建立一个拥有广大追随者的强大社会主义政党的盖得派；认为政党应该从属于劳工运动而居于次要地位的工会主义者；以及赞成联合使用政治和劳工等一切方法，既不排斥改良主义活动又不排斥革命活动的“整体主义者”。此外，在那些希望建立工人政党以竞选议会议席和其他公共机构代表的人当中，关于当选的工人阶级代表究竟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方针的问题也是存在着对立意见的。采取德国社会党路线的盖得派，强调利用议会作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反政府斗争的手段，根本不重视利用议会来实现眼前改革的主张。实际上，如果不同资产阶级左翼政党合作，要实现后一主张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另有一些人不久就在保尔·布鲁斯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他们认为，即使不能在议会中，至少也能在地方政府内利用工人阶级的代表权来实现积极的改革；而且尽管有马赛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并不真正反对同资产阶级团体进行任何谈判和合作，至少在地方事务和省的事务中是这样。

盖得派本身也不愿意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产业无产阶级身上。1878年的盖得派宣言大力强调受到金融资本和不公平的赋税剥削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疾苦。他们希望争取这些阶级支持工人政党，而且也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提出论点说，由于大企业和金融资本的迅速发展，这些阶级正在被消灭，只要唤起它们的不满和遭受挫折的情绪，就能使它们转而信仰社会主义。因此，盖得派既宣传阶级斗争，同时又主张同左派缔结一项联合协议。他们的

这种中派立场一方面得罪了比较温和的主张从事政治活动的社会党人，另一方面又冒犯了左翼工会主义者，后者不愿同小资产阶级发生任何关系，赞成把农业工资劳动者争取到工会中来，而不谋求同农民取得任何妥协。

1881年，保尔·布鲁斯出面鼓吹“可能主义”，带头反对盖得。所谓“可能主义”就是主张采取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取实现当前的改良的政策，而不把一切建设性行动都推迟到取得政权以后去。布鲁斯特别强调必须积极参加地方政治，以便尽量夺取工业区的市自治体（地方议会）的控制权，取得省（郡）议会的代表权。法国的情况同德国有所不同，德国的地方选举制使得工人的政党几乎不可能在地方政府中成为一支有实力的力量，而在帝国议会中却比较易于取得议席。在法国，工人阶级领袖很有希望当选为工业城市的市长或议员；担任这种职务的工人已经不在少数，不过其中许多人来自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分裂出去的右翼团体。布鲁斯希望，主要从地方一级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工人党，他说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使党为当前的要求说话，同时又提倡全面的社会变革。由于持有这种观点，布鲁斯主张实行高度的地方自治，而反对盖得派以德国为蓝本的高度集中的政策；布鲁斯的政策的这一面使他在右翼和左翼都得到了支持。

这一争论在1882年圣亚田代表大会上终于严重化了。结果发生了分裂，从而产生了两个对立的政党。可能派多数仍然控制了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并把它改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盖得派则另自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集权方式成立了法国工人党。常常有人把这一分裂纯粹说成是左派同右派的分裂，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主张成立组织紧密的政党的马克思主义者既同比较温和的政治行动派的分裂，又是同地方自治论者的分裂。后面这两种人包括相当多的左翼人物，特别是那

些重视劳工行动而反对议会行动，并希望工会在制定社会党的政策方面享有很大的独立发言权的人。

保尔·布鲁斯(1854—1912年)是医学博士，巴黎公社失败后离开法国，首先到西班牙，然后到瑞士。他在瑞士遇见了巴枯宁，并同汝拉总支部合作。后来，他又在英国逗留了一个时期，在赦免巴黎公社社员的大赦令宣布时回到法国，同盖得和拉法格携手合作。他把他的刊物《无产者》变成可能派运动的机关刊物，并于1883年在一本名为《集体财产和公用事业》的小册子中阐述了自己的政策。他放弃了准无政府主义观念，而改信强调控制地方政权的渐进主义社会主义。他认为，在工业和公用事业进入大规模管理的阶段以后，实行社会化的时机就逐渐成熟了，第一步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由市、地区或全国的公共机构接管主要的公用事业。他反对盖得的主张，既是由于他坚持地方的自治权和创制权，也是由于他认为工业和公用事业在时机成熟时必须予以接管，而无需等待新的“工人国家”去管理它们。他反对集权制，因而许多不赞成他的渐进主义观点的社会党人也支持他。

如前所述，茹尔·盖得(1845—1922年)与保尔·拉法格两人同布鲁斯派决裂后，建立了法国工人党。同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结婚的拉法格生于古巴，象布鲁斯一样，当过医生。他在马德里建立了第一国际马克思主义支部，同西班牙各主要支部的无政府主义者相对抗，并以该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加第一国际的活动。1882年，他长期定居法国，在建立工人党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既是宣传家，也是活跃的作家。

上述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和工人党刚刚成立，蒙索莱明的罢工事件和所谓的里昂密谋就导致许多法国无政府主义领袖受审和入狱。^①但是第二年，法国政府改变了政策，在皮埃尔·瓦尔德-卢

^① 见本书第二卷第325页及以下。

梭(1846—1904年)的影响下通过了一项法律,给予工会以较大的结社自由,但同时要求工会向警察局登记,并交存工作人员名单。结合这项新法律,瓦尔德-卢梭以内政部长名义通令各省省长鼓励成立工会,希望说服工会采取和平政策,包括通过仲裁解决劳资纠纷在内。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离间革命的工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跟温和派的关系,并尽量削弱工人阶级对前者的同情,从而使政府更易于继续镇压前者。但是这项法律的一个后果是,工会的中央机构得以合法建立,这同仅仅偶尔召开代表大会是不同的。盖得派所控制的1884年里昂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全国工团联盟。这必然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因为当时法国简直就没有全国性的工会。每一行业都有自己的地方工团,这些工团主要组织在地方工会之内或联合各行业工团的集团之内。1884年,只有印刷工人有一个真正能起作用的全国性组织,这个组织的领袖是奥古斯特·克费(1851—1924年),他后来成了法国工团主义运动温和派的杰出领袖。制帽工人和制革工人也有全国性的联合会,但是只有印刷工人联合会是一个拥有充足的基金和严密的组织的全国性团体。因此,全国工团联盟就事所必然地主要是由各行业的地方工团或组织松散的地方团体所组成。为了撙节开支,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往往一个人代表好几个工团。整个运动的财力不足,使它很难争取到具有代表性的代表团前来参加,甚至连成立一个有代表性的委员会或理事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行使职权也难于办到。这就使联盟有被积极从事活动的少数派控制的危险;事实上,盖得派就设法控制了它。

里昂代表大会坚决反对新法律有关登记的规定,但是这项法律对于工会运动的成长无疑发生了有利的影响。布鲁斯派和盖得派都敦促自己的信从者参加工会,在工会的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这两个对立的党派对待工会运动的态度却显示出重大的分

歧，盖得派象德国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对工会的日常工作并不感兴趣，倾向于否认工会能给工人带来任何实际的经济利益。他们受如下思想的支配：资本主义注定要使生活境况日益贫困，只有取得政权才能够改善工人的处境。因而，他们认为工会不过是一个让工人学习阶级斗争并转而投入政治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学校。另一方面，布鲁斯派则包括“可能派”和革命派，前者希望加强工会，以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有效的集体谈判，后者则认为工会是工人阶级采取革命行动的潜在工具。因此，布鲁斯派愿意帮助工会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而不是设法去支配它们，而盖得派则不断设法强使工会主义者吞下他们那种牌号的马克思主义。

从长远来说，盖得派的政策产生了不良后果，但是在短时期内，它由于组织严密而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就。1886年，全国工团联盟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虽然宣布为了阶级团结，应该抛开政治分歧，但仍通过了一系列本质上代表盖得派见解的决议，宣布赞成生产资料公有制，支持法国工人党的纲领。但是恰恰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使盖得派感到伤脑筋的问题——总罢工的问题。

总罢工决不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它是威廉·本鲍和欧文派的英国全国复兴协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所鼓吹的主张，并且以“神圣月”的名义，为1839年的宪章派会议所采纳。^①此后，总罢工在 330 法国和比利时便常常有人谈起，而且在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以什么方式发动社会革命的设想中成了一个构成因素。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总罢工这一概念随同争取8小时工作日制运动，在美国又占据了重要地位。欧文派在1834年曾建议，工人应该联合起来，一致拒绝在工作8小时以后继续工作，以此争取8小时工作日制；到八十年代初，美国也在酝酿类似的建议。巴黎的著名暴众演说

① 参见本书第一卷第146页及以下。

鼓动家无政府主义木匠约瑟夫·托特利埃(1854—1928年)从美国人那里接过了这个概念,主张举行总罢工以争取8小时工作日制;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的工会主义者,又把这个主张发展成为一种本身必然会变成革命并导致资本主义的复灭和胜利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总罢工。盖得派指责这个计划纯粹是胡闹。盖得说,我们甚至无法说服工人投社会党候选人的票,要他们为社会主义参加革命性罢工更是绝对不可能的了。但是他无法说服工会联合会放弃这个概念,联合会在1885—1886年第一次讨论了这个主张,此后相继召开的每一届代表大会上都纠缠这个问题不放。

就在这个时候,社会主义者方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团体。1885年,边诺阿·马隆(1814—1893年)创办了《社会主义评论》,并脱离盖得派而建立了社会经济学会,想把它办成一个研究社会主义的独立机构,走伦敦刚刚成立的费边社的道路。马隆曾参加巴黎公社活动,后来逃往瑞士,此后又从瑞士前往意大利,在那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回到法国以后同盖得一起建立了工人党。在流亡意大利和瑞士期间,马隆曾同许多外国的社会党人建立了联系。从1882到1885年,他连续发表自己的多卷本巨著《社会主义史》,其中编入了各国社会党人所提供的许多叙述本国运动情况的资料。马隆从革命主义发展到半马克思主义,然后又发展到自己称之为整体社会主义的进化论观点,力图以此说明:争取社会主义的运动不单纯是经济力量的运动,而是整个社会的运动,它既是经济因素的问题,也同样是法律和道德因素的问题。这套理论使他在某些方面同可能主义发生了密切关系,但他并不是布鲁斯派。他采取了置身于各个对立的社会主义宗派之外的立场,力图罗致一批不抱党派偏见的兼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他的手里,《社会主义评论》成了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杰出刊物;他的社会经济学会很快就吸

引了许多能力很强的支持者，其中有亚力山大·米勒兰和让·饶勒斯。前者后来在1899年参加瓦尔德-卢梭的政府担任部长，从而导致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危机；后者后来则成了统一社会党的领袖。

马隆的社会经济学会会员始终不多，也没有广泛的号召力。它基本上是一个知识分子团体，所吸引的是一批雄心勃勃的青年律师和从事他种职业的人，这批人对于各个社会党派所持的互相对立的正统学说感到厌恶，希望在接受社会主义原则的同时能保持行动自由。事实证明，社会经济学会对那些力图以社会主义者的身分进入议会，而又不接受任何党纪约束的人特别具有吸引力。因此，学会是作为一个议会集团而不是党派组织发展起来的。学会会员是独立的社会主义者，一批没有正式组织的议员，直到德莱福斯事件造成危机才被迫建立了一个组织。在此期间，《社会主义评论》是一个讨论社会主义思想和政策的公开讲坛。

1876年，马隆在卢加诺出版了《社会问题》，他的基本思想就是在这本书里发挥的。1882—1883年，他分两卷出版了《新党》，支持盖得在广泛的基础上成立社会党的尝试。他同盖得分裂后的见解，在1886年出版的《社会道德》一书中有说明，后来在他的主 332
要理论著作《整体社会主义》（分两卷分别于1890和1891年出版）中又有更详细的说明。

边诺阿·马隆发起创办杂志和学会的作法对于事态的发展暂时并没有什么影响。1886年，格雷维总统下令释放被监禁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始了比较温和的统治。于是，可能派内部的分歧加深了：布鲁斯派主张采取渐进主义政策，而前巴黎公社社员让·阿勒芒（1843—1935年）则领导左派，独树一帜，主张一种直接采取工会行动的政策，大力反对议会方法，号召无产阶级彻底摆脱资产阶级而独行其是。这一论争在1890年达到了严重关头，阿勒芒的信

从者同布鲁斯派决裂，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不久以前，可能派却从自己的组织名称中取消了“革命”字样。阿勒芒的党接过了可能派同工会所建立的大部分联系，极力鼓吹革命色彩浓厚的总罢工。

当可能派内部发生争执的时候，法国由于出现了布朗热运动，暂时转移了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布朗热将军最初是由于主张改革军队，支持普通士兵改善待遇的要求而出名的。他得到克里孟梭的支持，极力反对德意志帝国，主张采取复仇政策，因而广受欢迎。他的主战论调使他一时成了民族英雄；尽管他同激进派有关系，但波拿巴党人和保皇党人，实际上还有全部敌视第三共和国的人都极力鼓动他出来干。在这些势力的影响下，他出面要求修改宪法，以便组成一个更强大的政府。当时共和国出现了一系列牵涉到政界要人的财政舞弊案，共和国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于是布朗热的纲领就更加为人们所支持了。他先后当选为诺尔区和巴黎市的下院议员，在下议院积极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威胁要发动政变。出于对
333 现政权的仇视，团结在他周围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他愿意，就有力量废除宪法，通过公民投票当权。但是他贻误了时机。当政府最后决定逮捕他，而不是号召全国起来支持他的时候，他出走布鲁塞尔，而整个运动也就崩溃了。他以叛国罪受缺席审判，并被定了罪。这是1889年的事；两年以后，他就在自己的已故情妇的布鲁塞尔墓地上自杀了。

布朗热事件在社会党人的队伍中和其他方面都引起了很大的骚乱。有少数社会党人，其中包括布朗基的一些主要信从者，根据布朗热原先同激进派的关系而支持他。盖得派打算置身于整个事件之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内部争吵，同革命的无产阶级没有直接关系。特别是看到不久前揭发出来的舞弊案，他们就更加不愿意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一边，这一情况有助于说明他们采取置身

事外的态度的由来。然而，这种态度却使他们丧失了一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与此相反，布鲁斯派却更倾向于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就加速了可能派的分裂，并有助于主张总罢工的那一派争取到新信徒。这一派认为以总罢工为工具，无产阶级就可以独立地发挥本身的力量，而无需受议会政治的腐蚀性影响，也不必纠缠于同自由资产阶级建立的联盟中去。

我们已经谈过，1889年，当布朗热事件即将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的时候，在巴黎举行了两个对立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一个是盖得派召开的，另一个是当时还没有分裂的可能派召开的^①。在这里同我们有关的是，两个大会都把五月一日定为劳动节，并且特别把这个节日同确立8小时工作日制国际性要求联系起来。作出这一决定的近因是美国工会所采取的行动，它们一直在利用五一节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在巴黎率先提出倡议的是盖得派的雷蒙·拉维涅（1851—1930年），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代表马克思主义者所召开的大会上的主要集团——德国社会民主党表示支持。当时决定，与会各国都应该在1890年举行全国性的示威来庆祝五一节，并以8小时工作日制作为当前的主要目标。至于庆祝的具体形式，大会没有明确说明，有些人主张完全停止工作一日，也就是说举行一天总罢工，但是德国代表则坚持每个国家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运动所应采取的措施。

于是，一个集团就可以自由地把庆祝五一节的主张同举行革命性总罢工的概念联系起来，而另一个集团则急忙把庆祝五一节的主张当作反对上述想法的手段。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盖得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决地反对总罢工，而法国工会中反对盖得派的人，则着手使新的庆祝活动成为总罢工的准备。实际

^① 见本卷第一章第16页及以下。

上,1890年法国所有工业区都普遍地举行了五一节示威,并同警方发生了一系列严重冲突。第二年,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诺尔省的富尔米,雇主招来军队向工人的示威队伍开枪,打死了一个18岁的女孩。这一件事引起了一阵轰动,有助于加强工会中的战斗派。全国工团联盟的年度代表大会(事实上,它向所有愿意派代表参加的工会团体敞开大门),更甚于以往任何时候,成了盖得派和反对派的论战场所,争论的主题是总罢工。早在1888年,全国工团联盟的布斯加特代表大会就曾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工团主义者“同欺骗他们的政客脱离关系”,同时宣布,局部罢工只能作为鼓动和组织的手段,“只有总罢工——即完全停止一切劳动和革命——才能引导工人走向解放”。

在这项决议通过后不久,阿里斯蒂德·白里安(1862—1932年)就成了鼓吹总罢工的强有力的新人物;他后来成了工人运动的死敌,但在当时却是工人运动的极左派。1892年在马赛劳工代表大会上,白里安就总罢工和发动总罢工的方式发表了一篇全面的报告;同年,法国工团主义未来的领袖斐南·佩洛蒂埃也鼓吹了同样的主张。此外,随着职业介绍所联合会于1892年建立,从此工团主义运动也真正开始了;第二年,佩洛蒂埃就担任了该联合会的书记。

1884年的工会法规定了结社自由,1888年巴黎建立了第一个职业介绍所。这是巴黎工会的一个联合组织,主要目的是作为工会控制的职业介绍所,用以对抗为了老板的利益而组织的私人职业介绍所。这些机构不仅在替工人寻找职业时向工人收取费用,而且歧视公开的工会会员。斗争性强的工人对这些机构是极为仇视的。作为鼓励温和工会,提倡劳资协调的政策的一部分,瓦尔德-卢梭曾敦促地方行政长官和地方当局帮助工会建立机构,以便在职业训练和就业之类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希望借此使它们放弃

战斗性行动。由此可见，巴黎职业介绍所的目的在于引导工会组织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不久以后，其他一些城市也成立了类似的职业介绍所，它们在组织劳动力供应和安排工业训练的条件方面通常都能得到地方当局的津贴。我们已经谈过，可能派在地方行政事务中非常活跃，他们大力支持这个新兴的运动。

在1892年以前，职业介绍所彼此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有一些介绍所派代表参加全国工团联盟所召集的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代表大会。1892年，正是佩洛蒂埃作为圣纳泽尔职业介绍所的代表参加了图尔代表大会，并在会上提出赞成总罢工的提案的。因为这时大多数职业介绍所非但没有实现政府的愿望，反而被工会的好斗分子控制了。实际上，它们成了反对盖得派控制全国工团联盟的工会主义者的集合场所。1892年，当他们建立独立的联合会，336同全国工团联盟决裂的时候，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佩洛蒂埃这样一个完全了解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而且又有组织天才的领袖。

斐南·佩洛蒂埃（1867—1901年）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受的是古典教育。他一生多病，34岁就去世了。他开始是一个激进派，最初是白里安手下的新闻记者，然后又加入了盖得的党，他同这个党的联系一直保持到1890年；这一年他生了重病，有两年无法参加工作。复原后他就同盖得派决裂了，并且宣布对所有政党都完全感到幻灭。他不号召工人采取招致本身分裂的政治行动，而号召他们采取劳工行动以建立新社会。他同意把总罢工当作未来革命的目标和工具，但是同其他许多鼓吹者不同，他不相信时机成熟革命就会自然发生，也不相信只要起来革命就必然会取得成功，除非工人为夺取政权和行使政权预先作好了准备。他对盖得派和许多工会的好斗分子所共有的如下看法也是不同意的：苦苦思索那个将在资本主义的虚墟上出现的新社会会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是无谓的空想。恰恰相反，他对自己希望工人建立什么性质的

社会以及为建立这种社会创造条件时所必须具备的手段都有明确的设想。他的设想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无政府主义 - 共产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 - 共产主义的特点在于，不论在为实现新社会而战斗的过程中，还是在革命成功以后管理新社会的时候，工会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实际上，佩洛蒂埃创造了工团主义，他从1895年起至1901年去世，一直担任职业介绍所联合会书记，为法国工会运动的工团主义阶段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在他患病死去，过早地丢下了领导工作以后才发展到顶峰。

佩洛蒂埃关于未来社会的中心概念是生产者的地方公社。无政府主义 - 共产主义者把公社看成是自由公民的一般组织，而他
337 则把公社当作生产者的联合组织。每种工业都组织在包括各种职业的地方工团中，并将由地方上的生产者代表公社进行管理。如果任何所有制的概念将来还保留的话，则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各种工团的代表将组成公社的管理机构，管理当地公社的一般事务。凡属范围较大的管理工作在必要时都由生产者的联合公社办理。这些思想同西萨尔·德·巴普在第一国际时代所鼓吹的主张非常相似，^①但是佩洛蒂埃跟德·巴普不同，前者极力强调工团（即地方工会），把工团当作未来自由社会的基本社会组织。他是一个毫无保留地提倡“工人管理”的人，相信工人有能力实行劳工自治，反对这样一种看法：为了使管理工作取得效率，工厂工人必须继续在并非由他们自己选出的经理手下工作。然而，佩洛蒂埃也十分清楚，工人根本没有为承担这些职责作好准备，也就是说根本不具备条件；因此，他认为工会当前的重大任务就是为实现“自我解放”而教育自己的会员。在他看来，职业介绍所是达到这一目的必然要加以利用的工具。他极力主张工会必须完全接管供应劳动力的工作，

^①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八章。

从而垄断生产中的劳动因素。同样，工会必须接管学徒的培训和各种职业的训练工作。也必须从自己的队伍中培养出能够胜任技术和经理职务的人才。此外，工会必须学会掌握社会和经济知识。每个职业介绍所都必须有自己的图书馆和学习小组，每个积极的工会主义者都应该把充分利用这些设施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如果职业介绍所的维持费能从市政经费中拨出，那当然更好，就能使职业介绍所做更多的工作，教育工人为革命和行使政权作好准备。但是工会决不应为取得市政当局的补助金而降低自己的目标或策略。工会必须是战斗的组织，因为只有在当前奉行战斗性的和富有生气的政策，才能使自己具备夺取政权的正确思想。必须举行局部罢工，为总罢工创造条件，只有在工会作好准备时才能举行总罢工。 338

佩洛蒂埃最出名的著作《职业介绍所史》是在他死后的第二年——1902年出版的。他在这本书里叙述了他所创立的运动和自己的思想。他还同他的兄弟摩里斯·佩洛蒂埃合作，后者后来在一篇出色的叙述性著作《法国的工人生活》中写出了前者的传记，这本书于1900年出版。此外，斐南·佩洛蒂埃本人还写了一些小册子和手册，用于推进他为职业介绍所拟定的教育计划。1899年春，他的健康情况恶化，不得不退居乡间，专门从事写作，而把组织工作交给他人，但是直到他过早地离开人间为止，职业介绍所联合会始终受他的支配。

法国工团主义运动的鼓舞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并不是一个无产阶级出身的鼓动家，而是一个好学的知识分子，坚信教育和自我克制是有效地行使政权的必要条件，坚信“工人阶级具有实行自治的能力”，关于这种能力，蒲鲁东早在一个世代以前就在他的《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鼓吹过了。佩洛蒂埃死后，工团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便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维克多·格里甫埃勒

的手里。他是一个倔强的无产阶级分子，他所关心的是革命斗争，而远远不是工人取得胜利后的新社会的性质。但是工团主义运动在失去了佩洛蒂埃这位伟大的鼓舞者以后仍然保持着他的空想主义成分。他死后，职业介绍所联合会便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存在，而成为改组后的总工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时他的空想主义也就成了综合许多影响因素而产生的理论中的一个因素。

1892年，也就是职业介绍所联合会成立的那一年，发生了触
339 发一系列新的无政府主义暗杀行为的拉伐科尔事件^①，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形形色色的社会党人在1893年全国和各地的选举中取得相当大的胜利。同年，巴黎劳工代表大会在政府封闭了巴黎职业介绍所以后，建议全国工团联盟同职业介绍所联合会合并。第二年，佩洛蒂埃同昂利·日罗合作，发表了小册子《什么是总罢工？》，并就任职业介绍所联合会的副书记。几个月以后，也就是在1895年他担任了总书记。在此期间，1894年的南特劳工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一个享有独立经费与行动权力的特别委员会来接管动员工人举行总罢工的准备工作。这时，盖得派肯定已经失去了全国工团联盟的控制权，他们已经逐渐退出这个组织。在控制全国工团联盟和总罢工委员会的新人物中有阿勒芒派分子和一些布朗基派分子，但也有以埃米尔·波盖为首的一批实力强大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职业介绍所联合会自然会接受巴黎代表大会的劝告，同意和全国工团联盟合并。但是，职业介绍所在佩洛蒂埃的领导下拒绝了。佩洛蒂埃及其一伙对全国工团联盟存有戒心，而且对它的无能也有反感。佩洛蒂埃看到自己的那套教育计划可以通过职业介绍所加以推广，同时认为如果职业介绍所联合会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教育计划大概就会遭到破坏。

① 参见本书第二卷第329页。

面对职业介绍所联合会的拒绝，全国工团联盟决定进行改组，并号召各个职业介绍所退出联合会而加入联盟。在1895年的利摩日劳工代表大会上，全国工团联盟改组为法国总工会，其下分设两个部门：一个代表全国的和地方的工团，或具体行业与工业中的地方工团联合会，另一个部门代表职业介绍所和地方工团联盟（工会理事会）或者类似的组织。这次，职业介绍所联合会又被邀请参加，但又一次拒绝了。于是，这两个组织就成了对头。这种对立状态一直持续到1902年，中间只间断了一个很短时间，当时职业介绍所联合会加入了总工会，但随后又退了出来。在1896年以前，还有第三个组织，叫作全国劳工书记处，它也打算成为一个统筹机构。这个机构是根据1891年国际劳工代表大会的倡议成立的，大会建议在所有国家成立这样的机构，旨在把各国的运动联合在一起。这一倡议没有获得成就：法国的全国劳工书记处始终没有得到多大支持。它于1896年解散，让总工会和职业介绍所联合会分占了阵地。 340

同年，阿勒芒的党分裂，要求采取更坚决的革命政策的分裂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革命联盟。这样，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党派就不下6个：盖得派、布鲁斯派、阿勒芒派、布朗基派、共产党人和独立社会党人。它们互相争吵不已，尽管有些派别有时在某些特殊场合下也携手合作，而且大多数派别在1896年还达成了一项协议，商定在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中彼此可以展开竞选，但在第二轮投票中则应一致投票支持那些保留下来的社会党候选人。除了这些党派以外，还存在一些无政府主义团体、总工会中的工会激进派和职业介绍所联合会；这些团体又在不同程度上跟上述6个党派有关系。在1879年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退了出去的温和的互助论派已经不存在了，它的领袖巴布雷特已经成为主管劳工新闻机构的政府官员。温和主义的衣钵已经传给了以亚历山大·米勒兰为首的

独立社会党人（即马隆集团的继承者）。1896年，社会党人在圣蒙德举行了一次宴会，参加宴会的有许多社会党领导人如盖得、饶勒斯、甚至还有布朗基派领袖瓦扬等。在宴会上，米勒兰发表了一篇后来很出名的支持改良主义政策的演说。这次宴会是为了庆祝社会党人在市政选举中获得胜利，并增进社会党之间的了解而举行的；米勒兰发表演说的目的在于明确各个社会党集团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

亚历山大·米勒兰（1859—1943年）自1885年以来就担任下院议员，是独立社会党人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1896年，他主编《小共和国报》，同饶勒斯一道大力鼓吹社会党人应当团结一致。仅仅过了三年，他就在一个激进派内阁中担任了职务，但是在当时并没有人料到会有这种发展。不过，他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当时已经非常右倾了。他在演说中嘲笑了这样一种看法：社会党人应该设法采用宪法规定以外的方法或者在不争取大多数人民支持的条件下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他热烈地谈到了成年男子选举权的种种优点，并且公然提到布朗热将军，谴责政变和觊觎独裁权位的人。米勒兰宣称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使人民普遍享有自由和财产，并且宣布他忠于共和国。此外，他以一种纯粹渐进主义的语调否定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能够一蹴而就的看法，同时说这是社会党人无能为力的必然趋势，只能配合社会进化中必然存在的力量加以引导。在这部分演说中，尽管他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其含义却更接近悉尼·韦伯的费边主义演化论。米勒兰列举了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把发展大规模生产中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点放在首位；他的意思显然是说，这种渐进的社会化过程应该在现存的国家之下推行，而不是象考茨基所主张的那样，推迟到工人取得政权以后。就象费边主义者一样，他非常强调市有化企业，主张把主要的公用事业首先收归公有。他说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国家或地方

就应把工业或公用事业一个一个地接收过来。正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费边主义者一样，他的立论基础是走向资本主义垄断的必然趋势会为公有制和公管制铺平道路。他断言小资产所有者无需害怕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的资产不会被接收。关于农民问题他没有特别提到。

在演说的最后一段，米勒兰讨论了国际主义问题。他宣称自己相信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但是同时又自称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愿意在必要时献身于保卫祖国的事业。这样，他就完全驳斥了法国总工会的领袖们所崇奉的理论——反军国主义的国际主义，而且同伯恩施坦的说法相一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工人无祖国”这一句话是胡说八道。

值得注意的是，米勒兰在圣蒙德发表的演说非但没有激起听众的愤怒抗议，似乎还受到了热烈欢迎，它促使各主要社会党之间的行动比较统一，这些党派中有盖得派，甚至还有很难同意这篇演说的布朗基派中的一部分人。必须记住，这篇演说是在共和国发生危机的时候发表的。不过在几年以前，甚至连共和国本身的生存似乎都受到布朗热的威胁，当时一部分布朗基派支持布朗热运动，从而促使其余人更加强烈地感到必须团结在共和国的民主政治结构的周围。即使情况是这样，圣蒙德演说的听众所抱的默许态度仍然是很突出的，这种态度更加深了法国大部分工人阶级对政客所抱的很不信任的心理，从而也就加强了日益壮大的工会运动中的工团主义倾向。

米勒兰的演说是在共和国暴发新危机前不久发表的，这次危机的起因是德莱福斯事件，后来危机趋于严重，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主义统一运动。1897年快到年底的时候，随着艾米尔·左拉的《我控诉》一书的发表，很多人参加了德莱福斯案件的斗争。法国陆军的一名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莱福斯上尉被控告出卖军事

文件给一个外国情报人员，并被定罪，送往魔鬼岛监禁，而判罪所根据的证据经证明是捏造的。这是1894年的事，但是他的支持者发起的抗议运动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聚集力量。最初，社会党人对此似乎并不注意。不过，这件事倒引起了一个披着爱国主义伪装的反犹太主义运动。在法国的反动集团中，反犹情绪已经很强烈，而且一直受到爱德华·德吕蒙(1844—1917年)所领导的一个有组织的集团的煽动，他在1884年出版了臭名远扬的著作《犹太人的法国》。从1892年起，德吕蒙一直主编反犹太刊物《自由言论》；他在这个刊物上特别攻击那些同舞弊案有牵连的犹太人，尤其是1892

§43 年的巴拿马运河舞弊案。在这些年里，舞弊案本是司空见惯的事。当德莱福斯案件发生的时候，德吕蒙充分利用这一事件煽动反犹爱国情绪。左拉起而为德莱福斯辩护，他由于对陆军当局提出指责，受到控告并被判罪，不得不逃出法国。但是为时不久，替德莱福斯辩护的那一派人就得以揭露，那纸据说证明德莱福斯有罪的文件是伪造的，陆军部和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参与了这一伪造事件。政府不得不下令进行调查，这使得反对德莱福斯的人大为恼怒，他们一口咬定德莱福斯有罪。以保尔·德罗赖德为首的一批狂热分子甚至还策划了一次反共和国的暴动。反对德莱福斯的那一派态度顽强，势力强大，以致在重审他的案件时，尽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原来的罪证是伪造的，他仍然被重新判了罪。不过，这时，他的支持者的情绪也十分激昂，致使鲁贝特总统立刻赦免并释放了他。然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的无辜仍然没有得到承认，军职也没有得到恢复，当初他公开受到羞辱，被开除军籍。直到1906年，最高上诉法院才开庭重新审理这一案件，宣判德莱福斯完全无罪，并且恢复了他的军阶。

这一非同寻常的可耻的事件对社会主义产生了两大主要影响。它一方面促使社会党政治家群起维护受到威胁的共和国，并

使大多数社会主义党派建立了和解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又在许多法国人中引起了深刻的反政治和反国家的情绪，从而在工人中加强了革命的工团主义。因此，这等于在社会主义党派和工会之间打进了一个新的楔子。1898年，各社会主义党派组成了联合警戒委员会来保护共和国；布朗基派把他们的中央革命委员会改组为正式政党，采用了革命社会党的名称，实际上他们的革命主义已经大大冲淡了。

同年，即1898年，工会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败。德莱福斯事件所引起的普遍激愤情绪曾影响到工会，但是它除了利用这一事件来说明政治和政客的腐败以外，本身并没有插手。自1894年以来，南特劳工代表大会所成立的总罢工委员会就一直在进行宣传，力图使工人熟习以普遍停工为主要助力去完成革命的概念。当时流行的看法是，确定一个明确的日期策划或安排总罢工并不有利。只有在工人阶级受到教育，渴望总罢工，并且把总罢工用于革命这一条件下，总罢工才会在适当的时候发生。一般认为，总罢工会以某种工业或某个地区的大罢工为开端，而其他工业或地区的工人则很可能在最初的罢工工人同调来支持老板镇压抵抗行动的警察或军队之间所发生的某种意外事件的刺激下，自动停工不干。当时，索列尔还没有提出总罢工是“社会迷信”的看法；人们预料总罢工实际上会发生，并且会触发革命。但是在这一运动的领导者看来，预先准备好和组织好的总罢工必然会失败，停工和随之举行的群众性示威必须是表达工人阶级情绪的自发的行动，否则就会缺乏不可或缺的群众热情。

1898年，总工会的领袖相信他们的时机来到了。当时建筑业正在举行一次广泛的罢工；铁路工人联合会也制定了一份列举各项要求的纲领，并且准备举行罢工以争取实现各项要求。一次包括国营铁路政府雇员在内的全国性大罢工引起了一个重大的法律

问题，因为 1884 年得到承认的结社与罢工权不适用于政府雇员。因此，铁路工人罢工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并且肯定会招致政府对罢工者采取强硬措施。鼓吹革命性总罢工的人预料：政府对付罢工工人（估计他们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去防止工贼的破坏活动）的措施，会激发工人阶级的反抗情绪，使得其他工业的工人纷纷起来罢工以支持铁路工人。总工会中央委员会决定发出一封密信，
345 要求所有工会准备随时支持铁路工人；但是政府得到了风声，并且截获了这封密信。到了行动的时候，铁路工人罢工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撤职以及取消工会的威胁下，大部分铁路工人都没有放下工作，只有极少数人除外，于是整个运动瓦解了。在事后进行的追究失败原因的调查中，总工会书记拉盖尔斯有把总工会的计划出卖给政府的重大嫌疑，被撤了职。总工会在更强大的左翼领导下着手重新组织自己的力量，但是它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1899 年，当总工会还在抚摸自己的创伤时，德莱福斯事件造成的危机使皮埃尔·瓦尔德-卢梭为首的保卫共和国的内阁得以上台。新总理希望把社会党人纳入共和国各种力量的大团结之中，于是便把工商部长一职给了独立社会党人亚历山大·米勒兰。米勒兰既没有同社会党人联合警戒委员会商量，甚至也没有同自己的那一派的同事商量，就接受了这个职位。自 1848 年以来，邀请社会党人担任内阁职务这还是第一次。当然，路易·勃朗在 1848 年的共和政府内任职是革命的结果，而不是议会权力变动的结果。米勒兰接受内阁职务一举，立刻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本人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这是挽救共和国所必需的，并且宣称仍然忠于自己在圣蒙德的演说中所提出的原则。让·饶勒斯和其他独立社会党人都支持他，其中有一些人怀着不安心情，而另一些人则全心全意地支持他。社会主义者的团结遭到破坏：盖得派和布朗基派指责米勒兰的行动背叛社会主义，并且成立了一个

社会主义革命联盟来同他对抗。独立社会党人、布鲁斯派和阿勒芒派(1896年分裂后失去了右翼)则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同盟,名叫法兰西社会党,但是各派仍然保持独立。盖得派和爱德华·瓦扬的布朗基派信从者也在类似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成立了法国社会党。

上述分裂到1901年举行里昂代表大会时达到了彻底决裂的程度,这次大会表明对立的观点无法调和。与此同时,米勒兰提出了一个劳工改革纲领,并宣称自己是改良主义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希望改变工团的地位,把工团组成既可以控告他人,也可以受他人控告的法人,他希望赋予工团以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力。他还想鼓励订立“集体劳工合同”,根据这种合同,工团将集体承担义务,按议定的工资提供和组织完成工作所需要的劳动力。米勒兰还打算在劳资纠纷中实行强制仲裁制,并且规定罢工行动只有经所涉及的工人的多数同意后才能采取,票决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而且每隔一个短时期就要表决一次,凡未经多数同意的罢工都是非法的。他还希望在各种工业中建立劳工理事会,改组早在1891年成立的最高劳工理事会,使工会获得更充分的代表权;他还想在所有较大的企业中成立工厂理事会,以改善劳资之间的关系。

当这种社会和平政策在1899—1900年首次提出以及在1906年由米勒兰再次提出时,都遭到工会领袖的强烈谴责。法国总工会态度坚决的发言人维克多·格里甫埃勒就说:“他们想驯服我们。”当时有人指出,让工会成为法人就会使工会因罢工行动所造成的损失在法律上受到控告(差不多就在这时,英国所发生的塔夫·维尔案就是这种情况);当时还指出,建议制定的有关罢工行动的规定会使工团主义者最乐于使用的武器“突然罢工”成为非法。职业介绍所联合会一如总工会,也谴责米勒兰的计划完全是非法地干

涉工会自由安排自身事务的权利。

暂时并没有出现什么动向，但是米勒兰驯服工会的企图却成了一个重要因素，终于促使两个中央劳工组织联合起来，在这一问题上另一个因素是佩洛蒂埃的去世。1902年，总工会和职业介绍所联合会合并成一个机构，所属各工会和各职业介绍所成为平等的伙伴，同时成立了一个平等地代表两大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到了这时，职业介绍所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政府提供的补助金，不再同市政当局合作，甚至在社会党人控制市政府的地方也是这样。在某些情况下，地方职业介绍所成了整个省或一群邻近工业中心的工团联合会的分支机构。佩洛蒂埃曾经作出巨大努力，要把职业介绍所的影响扩大到农业地区去，主要方式是组织小村镇的手工业者，让他们向农业中的工资劳动者进行宣传。但是除了一些种植酿酒葡萄的地区以外，这种政策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合并后的总工会，一部分由职业介绍所以及地方或者省的工团联合会组成，另一部分则由行业或工业的全国工团联盟和没有全国性组织的独立的地方工团组成。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总工会不再接纳地方工团。总工会的会员资格分两种：一种是通过职业介绍所或工会联合会而取得，另一种是通过全国性或地区性工团联盟而取得，不过通过地区性工团联盟而取得的情况很少。总工会的政策是鼓励各工团在工业而不是在行业的基础上组成联合会，因为如果工人即将接管工业的管理权，这显然是正确的基础。但是实际上不可能在所有情况下都强制推行工业中的统一；总工会不断受到压力，促其改变做法，因而不得不允许行业联合会在总工会内存在。

在混合总工会成立以前，它的前身曾在1900年创办一个机关刊物——《人民呼声》，编辑是以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埃米尔·波盖（1860—1932年），他过去在主编笔锋犀利、内容生动的刊物《贝纳

老爷报》^①时曾取得很大的成就。总工会的领袖是以前的布朗基分子维克多·格里甫埃勒(1875—1922年),他是一个工人,富于战斗精神,有阶级觉悟,直率到了粗鲁的程度,对于觊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深怀戒心。跟佩洛蒂埃不同,格里甫埃勒不为有关未来社会的理论而伤脑筋,他所感兴趣的是日常的斗争。在他看来,这种斗争可以教育工人敌视资本主义,并采取战斗性的行动,而战斗性的行动总有一天——为时不会太久——会发展成为革命性的总罢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格里甫埃勒对于普通工人取得政权的能力或意志抱有任何幻想。他老是骂多数群众“愚不可及”,他的信念不是以群众采取行动的意志为基础,而是以群众的暗示感受性为基础。他相信,“少数有觉悟的人”的坚定领导可以引导群众采取革命性行动。这是他从布朗基那里得来的思想,随着工团主义理论在他所领导的总工会中得以发展,这种思想就成了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总工会采取强硬的反军国主义路线,特别强调以国际总罢工作为防止战争的手段,大部分是出于格里甫埃勒的主张。他的主要助手波盖担任总工会工团部门的书记,而佩洛蒂埃的第二把手乔治·伊维多(1868—1942年)则接管了总工会的职业介绍所部门。总工会不再同职业介绍所对立,从而加强了地位,具有新的战斗精神,进入了爱德华·道勒安所说的“英雄时代”。348

但是在我们讨论工团主义理论1902年以后的发展情况以前,还必须回过头来谈谈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在米勒兰参加瓦尔德-卢梭的内阁以后的情况。米勒兰入阁后,盖得派、布朗基派以及脱离了阿勒芒的党的共产主义联盟立刻发表了一项宣言,反对他的行动,宣布他除了代表本人以外,不能代表他人承担义务,同时宣布它们退出下院的社会党人联盟。这些党派劝说社会主义工人联盟

① 见本书第二卷第325页及以下。

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向所有承认阶级斗争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的工人阶级团体敞开大门，代表大会应该就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发表意见。但是当代表 1,400 个有组织的团体的 800 名代表举行会议的时候，却没有人来指出明确的方向。大会以 818 票对 634 票的表决结果宣布，阶级斗争的原则不允许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但是大会接着又以 1,140 票对 240 票通过第二项决议，承认例外情况有可能促使社会党设想“这种入阁行动是适当的”。大会还作出决议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现状下，应该专门考虑怎样赢得选举中的优势地位，因为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这一任务应该在革命以前完成。”

大会在发表这些含糊其词的论断以后就着手把本身改组成一个“政党”，其方式不是把各个成员组织合并起来，而是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由各个团体分别派代表参加。盖得派的工人党是最大的团体，在总委员会中占有 12 席，布朗基派的革命社会党占有 6 席，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占有 3 席；此外工会有 4 席，社会主义合作社有 1 席，参加代表大会的自治区联合会有 7 席。这些团体合起来组成了法国社会党。但是由于每个团体都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组织，因而它们的联盟并没有多大力量，只有在它们的成员作为一个集体进行活动的下议院和其它民选公共团体中除外。在另一方面，独立社会党人、布鲁斯派以及阿勒芒派的残余分子和一些其他团体也同样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法兰西社会党，支持瓦尔德-卢梭的政府为保卫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并以保卫共和国的需要压倒一切为理由替米勒兰开脱。

这个问题从国家一级转到 1900 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去了。我们已经谈过，在那次代表大会上，著名的考茨基提案（由考茨基起草，实际上由艾米尔·王德威尔得在大会上提出）力图对米勒兰的行动所引起的问题作出答案，其方式既要明

确表示绝大多数社会党人不同意这一行动，但实际上又不把大门关死，让社会党人在一切情况下都可以入阁。这项决议的原文本卷已经引过^①。

这项决议出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首要理论家之手，当时他正在同修正主义者展开论战。整个说来，决议是反对米勒兰的。米勒兰当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法国社会党人的支持，而且可以肯定他甚至不能代表愿意赞成他入阁的党派，作为它们的“委托代表”³⁵⁰行事。然而在原则问题上，决议并没有作出盖得派及其盟友所要求的明确决定，也没有规定把曾经表示赞成或拒绝谴责米勒兰的行动的政党从“国际”中开除出去。在辩论中为米勒兰辩护的饶勒斯最后宣布接受“国际”的决定。但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裂缝并没有得到弥合：国际又用了三年时间施加压力才使它归于统一，而在统一实现的时候，分歧也只是勉强地马虎过去了，而不是得到了和解。

在法国，两个对立的党派集团从1901年到1905年各自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并制定自己的纲领。法国社会党宣称自己是“革命党”，主张以国内和国际的阶级斗争来夺取政权，剥夺有产阶级。它反对“同资产阶级的任何部分达成任何妥协”，要求把“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社会化”，宣称这是“使资产阶级社会转变为集体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它说，推行“可能改善工人阶级斗争条件的改革”虽然是它的一部分任务，但是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通过参加中央政权、投票赞成预算或者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从而提供任何手段，使无产阶级的敌人——资产阶级的统治得以延长”。

法国社会党在1902年的图尔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一项宣言。

^① 见本卷第49页及以下。

宣言一开头就强调了社会主义同民主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政治制度(这是〔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同经济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生产资料的进化已经使世界处于资产阶级力量的统治之下。只有无产阶级采取行动才能根治普遍存在的混乱状态。但正确的道路是既不否定爆发革命的假说,也不忽略通过合法途径施加压力的巨大潜力。社会主义是共和主义的,它就是共和国本身,因为它是共和国向财产制度和劳动制度的延伸。”然后这个纲领宣布赞成国际团结以反对战争,接着便列举了应该在现存的政治结构内争取实现的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国家民主化、宗教与教育分离、发展教育、改革赋税、实行劳动保护制和社会保险法等。

在1902年的大选中,两个对立的集团得到的总票数几乎相等,每个集团得到40万张。但是法国社会党只赢得12个议席,而法兰西社会党则由于同资产阶级集团结成选举联盟而得到了37席。1904年,前者正式登记的党员大约有18,000名,后者大约有10,000名。每一方都拥有自己的报纸,但是温和派不久就占了便宜:《人道报》于1904年创刊,立刻就成为了出色的社会主义报纸。

米勒兰参加瓦尔德-卢梭的政府以后,并没有结束他同社会主义的联系。他仍然认为自己属于“社会党”——法国人已习惯用这个名词来称呼构成政治性社会主义运动的各个党派与集团的整个复合体。他在去职后,于1903年把自己的一些演说汇编成书,开头的一篇是1896年的圣蒙德演说,他给这本演说集取名为《法国的改良主义社会主义》。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米勒兰总结了自己的观点。他附和这样的看法:把社会主义事业同共和国的事业以及民主选举制度视为一体。他宣称:社会党人迫切需要的并不是同共和国以及当代的法国生活隔绝,而是要在全国和地方政府的当前事务中积极地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凡是需要同资产阶级左派结

盟以保卫和扩展民主制或制定有效的改革方案的地方，就不要害怕结成这种联盟。他明确表示支持工会和合作社；但是他说，他希望看到目前经济事务中的混乱状态的结束，而把工业组织起来，使之在国家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要求工人共同分担提高生产效率的责任，不要老是同雇主争吵不休，而要同他们和解。为此，他重申他相信由工厂理事会同厂方谈判并订立集体合同的做法是 352 有价值的。他重申对仲裁制和劳资和平的信念。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不是一种预先规划好的制度，他攻击那些相信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突然建立的人。他所设想的同伯恩斯坦一样，是一个逐渐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而不是在遥远的将来达到一个社会主义目标。这个渐进过程不仅以公众逐一接管主要的公用事业为标志，而且以广泛发展保护工人措施和社会立法为标志，其中包括改善保健和教育设施以及建立社会保险制度。随着这种法律的制定，地方政府的活动也会随之进展。于是，法兰西社会党于 1904 年通过了一项广泛的市政纲领。

米勒兰大力强调社会党人有责任扩大个人自由，有责任促进生活资料产权的均分。他说，社会党人非但不希望废除私人财产权，反而主张把产权扩展到每一个人，非但不希望减少自由，反而热烈拥护人权。他说，在这些方面，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应该设法充分利用这些共同之处，以便使自己的思想为人所接受。他说，不管社会党人宣称自己的行动原则是什么，实际上议会和地方当局中的社会党人之所以能取得现有的成就，都是由于他们同其他进步分子合作，而没有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把自己孤立起来。

最后谈到国际问题，米勒兰更加大力重申他原先在圣蒙德宴会上所发表的意见：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不相矛盾的。他一面驳斥沙文主义，一面断言有必要建立国防。他把法国说成是“站在

最前哨”为社会主义者所信奉的理想“而战斗的战士”，单方面的裁军就是对这种理想犯罪。接着在演说结束的时候，他号召法国社会党人抛弃含糊其词而令人误解的“革命的”这个词，公开宣布自己是“改良主义者”——“因为我们是改良主义者”。

这些原则自被米勒兰这样应用以后，很快就使得他退出了社会主义运动队伍，回到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担任要职，这个政府同瓦尔德-卢梭的政府不同，它的执政基础并不是共和国已经受到威胁，急需立即进行保卫。米勒兰主张不仅在例外的危机中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而且要把这一点作为一项确定不移的政策，而这一主张是法兰西社会党的大多数支持者所决不能接受的。他们过去愿意把他在1899年所采取的行动当作一种不愉快的必要行动来辩护；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完全不愿意支持他那种彻头彻尾的阶级调和与劳资合作的纲领。但是在独立社会党人中米勒兰并不缺乏地位显要的支持者：1914年战争爆发时担任总理的雷纳·维维安尼(1863—1925年)就始终跟他同进退；此外还有阿里斯蒂德·白里安(1862—1932年)。白里安直到不久前还在极力鼓吹总罢工，但接着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米勒兰和维维安尼的伙伴，担任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官职。但是饶勒斯率领法兰西社会党的大多数信从者同他一道加入了1905年的统一社会党；改良主义社会主义只是作为一个议会派别(一批盘踞要津的政治家，在国内并没有有组织的信从者支持)的信条而残存着。法国社会党人，即使大部分实际上奉行改良主义也不愿意担当这个名称，其情况就好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愿意采纳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作为他们的公开信条一样。但是法国的形势同德国大不相同。在德国，工会会员个人虽然独立于党以外，但工会本身过去和现在始终是温顺地追随社会民主党。在法国，工会把工团主义当作自己的哲学和纲领，重新规定以“革命”为目标，并把所有政客混为一谈，

一概称之为“骗子”，因为他们企图用议会方法来进行活动，被迫走“阶级合作”的道路，而不是在经济这一自然领域中以阶级为基础进行阶级斗争。

第八章

1905年以后的法国。统一社会党和工团主义者。饶勒斯和索列尔

当法国社会党人在让·饶勒斯的领导下于1905年统一他们的政治力量的时候,有一些人希望,新的形势会促使工人阶级运动中的政治行动派和劳工行动派团结起来。工会中的“反政治派”往往反对同各个社会党建立任何联系,理由是这样做的结果会在政治方面和工业方面使工人分裂成为互相斗争不休的派别,从而使他们无力去保护会员的眼前利益,而追求更广泛的目标也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当社会党人同意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党(相信联盟很快就会瓦解的人当然不在内)的时候,这个论点就站不住脚了。事实上,显而易见的是,统一并没有能消除右派和左派之间的分歧,而且要把互相冲突的分子团结在一起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可以说总工会的情况也是这样,其中同样有革命派和改良主义派之分,而在两派之间又有一个意见摇摆的集团时而倒向这边,时而倒向那边。毫无疑问,在工业领域内,要求统一的呼声甚至比政治领域更为迫切,因为除非工会能够建立统一战线,否则在谈判或罢工中就没有多大希望能获得成功;另一方面,根据法国当时所实行的两轮投票制,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互相对立的社会党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彼此斗争,而他们的支持者却在第二轮投票中联合一致。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的确为社会党带来了一大批新的支持力量。按理说,统一的必然结果应该是,统一的社会党和工会运动之间取得一致。

但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出现，也没有接近于出现。恰恰相反，总工会在1906年的亚眠代表大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个会章，宣布工会运动完全独立，并拒绝同一切政党结盟。以纺织工人联合会的V·雷纳尔为首的一小部分人企图说服代表大会同社会党结盟，但遭到革命工团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一致反对，他们的意见被抛到一边去了。改良主义者的主要发言人是印刷工人联合会的奥古斯特·克费；改良主义者希望工会完全从事经济活动，避免卷入任何政治问题中去。与此相反，革命派却希望工会采取政治行动，但主张通过直接行动实现这一点，而不参与任何议会事务。他们高呼，“我们能够直接争取有用的法律”，因为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不反对甚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设法争取有利于工人的立法。他们所坚持的是，工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示威和罢工——来赢得这种立法，而不是依靠任何政党政客为他们效力。因此，温和派和革命派就能联合起来否决关于总工会同社会党缔结任何联盟的建议；许多社会党党员支持这种意见，因为他们担心强制建立这种联盟的任何企图都会破坏工会运动的团结。饶勒斯本人就始终很小心，表明自己拥护工团的自治。

在总工会中，革命派是多数，压倒改良主义者，但是少数派的力量也相当强大。此外，多数派的成分也决不是纯一的，成员是一批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鼓吹激进的罢工行动的人，但是他们当中又分成无政府主义者、纯粹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人。最后一种人尽管十分重视直接行动，而且认为工会作为有组织的团体应该置身于竞选活动之外，但并不反对议会行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属于社会党；总工会亚眠代表大会已经表明，他们如果愿意，完全有权利从事议会活动，并成为积极的政治家，只要他们不设法把工会拉进政党政治中去就行。总工会的领袖虽然有些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它本身始终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就要求会员反对议会这一点

来说，它甚至不是反对议会的。就它的理论或政策来自索列尔这位十分不可靠的鼓吹暴力的哲学家这一点来说，它甚至更不是索列尔主义的。总工会发展了自己的基本理论：工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必须自己进行主要的斗争，而不依靠任何人的帮助。这种理论同索列尔完全没有关系，而是继承了经过裴南·佩洛蒂埃重新解释的革命遗产，这一革命遗产可以通过欧仁·瓦尔兰和巴黎公社时代一直追溯到1848年乃至1796年的传统上去。

1902—1909这几年往往被称为法国工团主义运动的“英雄时代”。这个运动在这个时期的杰出人物是维克多·格里甫埃勒(1874—1923年)，他于1902年担任总工会书记。他是一个杰出的人物，职业是女鞋鞋匠，甚至在他主持总工会的工作时，只要有空仍坚持干他那熟练的手艺活。他粗鲁到了村野的程度，甚至对于那些必须亲密无间一道工作的人说话也是率直生硬的，因此他在总工会内外都得罪了很多人。从信仰来说，他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布朗基派，非常蔑视普通人的愚蠢，从来就毫不犹豫地谴责自己的信从者的懦弱和愚蠢。他一面采取这种态度，一面又非常厌恶企图干涉工人阶级事务的知识分子。他的阶级觉悟很高，但他主要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中坚分子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阶级的。他认为中坚分子的任务是以如下方式来领导群众：争取解除群众的切身疾苦，从而在行动中培养他们的革命作风。起初，他相当瞧不起佩洛蒂埃坚持对工人进行教育的主张，并且以鄙夷的口吻谈论那种把工会运动变成学习团体而不引导它走向斗争的危险性。后来，在他卸下总工会的职务以后，他便在阿尔芳索·梅兰(1871—1925年，冶金工人联合会领袖，在革命工团主义运动中是地位仅次于格里甫埃勒本人的杰出人物)的影响下，转变了思想，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工人，至少是他们的积极分子，终究有必要理解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并为在未来的社会中管理工业这一任务接受训

练；教育和行动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但是从气质上来说，他不是
一个教育家，而是一个鼓动家。他相信工人和雇主之间的争执越
多，双方就越有斗争性，而“呆气”也就越少。因为他既欢迎富有战
斗性的工人，也同样欢迎富有战斗性的雇主。雇主越是不讲理，他
就越高兴；雇主越是请求政府派军队来破坏罢工或者射杀示威者，
他就越觉得革命临近了。实际上，格里甫埃勒始终是一个布朗基
派，不过后来他在看待社会革命时，把劳工行动当作暴动的先声。

格里甫埃勒、梅兰、埃米尔·波盖、乔治·伊维多和保尔·德
勒萨尔（1870—1948年）（这里只是举出“英雄时代”总工会左翼的
主要领袖的名字）等人认为，工人阶级运动所面临的巨大危险是
“被驯化”的危险。在他们看来，从1899年瓦德尔-卢梭内阁的时
代起，改良主义社会主义者就蓄意地提出华而不实的让步和欺骗
性的社会改革来驯服工会。

当然，这恰恰是亚力山大·米勒兰想要做的事。在他的眼里，
革命运动是愚蠢的，对工人来说正确的道路是断然摆脱革命传统，
而采取他在1896年圣蒙德演说中所概述的改良主义政策。米勒
兰希望工会不再举行群众示威，不再号召罢工，而要争取国家的协
助，以劝使资方同他们谈判，签订具有约束性的集体合同，并在无
法达成协议时接受国家主持的仲裁。同时，他希望国家制定劳动
保护法以改善劳动条件，并以雇主和工人的捐献为基础实行各种 358
形式的社会保险，特别是发给养老金。而工团主义者则拒不接受
这种劳资双方和平相处的政策，在他们看来，这纯粹是欺骗。对
他们来说，资产阶级国家是一个敌对的代理机构，不可能转变为福利
工具；雇主也同样是应与之斗争而不应与之妥协的敌人，除非是在
不断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偶尔休战。任何集体合同，只要它使工人
受到资本主义的束缚，并使工会成为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利益而约
束会员的代理机构，他们就予以反对。

由此可见,当时在原则上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很快就变成各种力量之间的正面冲突。起因是工人执行“直接行动”的政策,举行罢工,并拒绝接受政府或地方公共当局充当公正的仲裁者的建议,而雇主则请求这些当局对罢工者的无理行为采取行动以维持治安,请求它们出面使制止罢工者得以继续工作,并在主要的公用事业中由当局自行派遣工兵队充当制止罢工者接替罢工者的工作,从而保证生产继续进行。激烈的冲突接二连三地发生,示威者和罢工者挨了枪弹或者挨了大棒,许多人被杀害。工会发表了抗议声明,号召士兵不要开枪,当局逮捕了要为这些声明负责的领袖。于是又发生了更多的抗议示威,有更多的人或死或伤。这种暴力行动有漫长的历史背景,的确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区别在于:在1900年以后的那个时期中,这种暴力镇压行动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些人的主持下采取的:这些人过去是或不久以前是社会主义者,现在虽已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当上了部长,仍然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在米勒兰事件以后,发生了维维安尼事件,因为雷纳·维维安尼继米勒兰之后,在1906年担任克里孟梭内阁中的劳工部长。接着又发生了更为轰动的白里安事件。如前所述,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跟米勒兰和维维安尼不同,他过去是极左派的著名人物,曾带头鼓吹总罢工,而这时他竟突然倒戈,当上了激进派内阁的总理,不仅用军队占领火车站,派出工兵接替罢工工人的工作,而且还征召陆军后备役的铁路工人入伍,命令他们去破坏自己的罢工,从而使1910年铁路工人的罢工归于失败。白里安早于1906年因参加克里孟梭政府而被统一社会党开除;在下议院,以白里安、米勒兰和维维安尼为中心结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社会主义者“联盟”派,同统一社会党尖锐对立。1910年,在白里安出任总理以前,这一派已经在下议院正式组成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议会党团,主张奉行“共和集中制”以及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的政策,并激烈谴责总工会的

反社会态度。

除了劳资和平相处的问题以外，工团主义者和改良派社会主义者之间还有两大争执存在：反军国主义问题；公用事业中的结社与罢工权问题。1884年使工会合法化的法令不适用于政府雇员，他们被划在集体谈判和罢工行动的范围以外，因为国家被看作是高于一切的权力机构。实际上，政府雇员的结社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宽容，但是这并不包括承认他们有权进行集体谈判，集体谈判毕竟同派代表团去见部长或陈述本身疾苦以影响下院的作法不同。政府一直保持着一种权力，可以把任何逾越一定限度的公务人员团体视为非法而予以解散。在这些多事的年代里，总工会开始控制邮政工人和小学教员这类的团体，于是政府便一再使用这种解散的权力。这个问题在1909年达到了严重关头。这年3月，邮政工人举行罢工，主要是要求撤换非常不得人心的主管部长。克里孟梭遇到这个出其不意的事件后，提出了令人半信半疑的保证，罢工工人根据他的保证复工了。后来，许下的诺言并没有实现，而邮政部那位不得人心的部长也仍然留职未动，因而罢工又爆发了，但这次所得到的支持却远不及原先那样广泛。总工会要求其他工会支持罢工工人，但应者寥寥。克里孟梭觉得自己力量十分强大，足以采取大规模解雇积极分子的办法来破坏邮政工人的组织，而总工会则无能为力。这件事所留下的不满情绪，为第二年白里安处理铁路工人罢工时所引起的更大不满情绪准备了条件。

在发生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总工会本身也处于危机之中。1908年，德腊韦尔和维尔纳夫圣乔治两地的劳资纠纷在工人和军警之间引起了激烈冲突，克里孟梭政府因此而逮捕和监禁了维克多·格里甫埃勒、埃米尔·波盖、乔治·伊维多以及总工会的其他领袖，于是就由一批第二流的新领袖来暂时接管这个组织。我们已经谈过，格里甫埃勒因采取战斗性的政策，对待反对派的态度粗

暴，而树敌甚多。在他被拘留期间，有人控告他在管理总工会经费的工作中不轨行为，他的对头坚持对这一情况进行调查。格里甫埃勒一怒之下辞去了他的职务。调查的结果使他完全摆脱了不诚实的污点，充其量不过是发生了一些会计手续不清的事情。在他被释放以后，总工会代表大会虽然表示完全信任他的廉洁，但是他并没有恢复总书记的职务，选出来接替他的是一个名叫路易·尼尔的右翼分子。这是1909年的事。这一年春天，当邮政工人斗争进入紧要关头时，尼尔正担任总书记。他处理这一事件十分软弱无力，以致左翼立刻卷土重来，撤去了他的职务。梅兰的密友、工团主义左派分子莱里昂·茹奥(1879—1953年)接替了他，从此开始了法国工会运动杰出人物的漫长生涯。

1910年的铁路工人罢工牵涉到一个新问题。我们已经看到，白里安当时调来了军队，并征召后备役的罢工工人入伍，从而破坏了这次罢工。这时，法国的铁路线中只有一条是国有的，发生罢工的
361 诺尔线是一家私人股份公司所拥有和经营的。罢工工人并不是政府雇员，但是政府却提出理由说，不能引伸法律，允许在十分重要的公用事业中举行罢工，为了公众的利益，政府完全有权采取非常措施来镇压罢工。下院中的社会党人以及工会方面都强烈反对这种观点，尤其反对征召罢工工人入伍，但是白里安悍然不顾他们的反对，改组了政府，继续执行镇压政策。总工会在政府手下遭到一连串失败以后，严重地动摇了，但它的力量并没有瓦解。1910年以后，总工会着手在更稳固的基础上重建组织，但工会的战斗精神却削弱了。所谓工团主义的“英雄时代”已告结束；它不仅激起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而且促使雇主的冶金工业委员会和其他主要代表重工业的团体团结一致，从而大大巩固他们的组织。总工会力图说服所属行业工会按工业合并起来，以便在比较势均力敌的基础上对付资方，应付新的形势；它还改组了地方组织，把数目大大

增加了的地方职业介绍所联合起来,组成省职业介绍所联盟,在法国的每个省设立这样一个组织。地方职业介绍所是联盟的成员,但不再有权向总工会联合委员会单独派出代表。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因为职业介绍所数目增加,削弱了全国行业或工业联合会的力量,而日益加强了自己对联合委员会的控制。当时,行业和工业联合会正日趋集中,要求加强自己对总工会政策的控制,而总工会的新章程改变了力量对比,有利于它们,这就削弱了左翼,而使比较温和的集团占据有利地位。但是总工会的最高权力仍然保留在代表大会手里。总工会代表大会是由每一个地方工团派代表一人组成的,不管工团组织的大小,对于投票者所代表的工人人数没有作出规定,对于职业介绍所、职业介绍所联盟或全国联合会的代表权也没有作出规定。曾经有人一再作出努力,打算改革这种表决制,使每个工团所享有的表决权同它所拥有的人数成比例。所有这些建议都在原则上遭到了反对,理由是每个地方性生产单位,不论大小,都对社会生活作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因而在最后决定政策的时候应该享有直接代表权。当时还一致认为,很难决定究竟应该根据何种会员资格,才允许每个工团投票。法国的工会会员在定期缴纳会费方面向来是很糟糕的,因此工团的实际追随者往往大大超过交纳会费的会员。此外,有些工会会员认为,只应该使有阶级觉悟的斗士团结在一起,成为正规会员,在需要采取积极行动的时候,就依靠他们的影响去吸引大多数群众附和。 362

当全国行业或工业联合会的力量加强时,特别是在它们发展了福利事业,筹集了集中的抵抗基金的地方,全国性的领导人自然就开始要求提高会员资格,并且要求更加经常地交纳会费。但是总工会的正式传统则反对工团发展成为互助组织,极左翼的人物甚至反对集中的罢工基金。只有印刷工人联合会之类的少数团体才发展了互助福利救济金;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在举行罢工的时候,

候也不定期付给罢工工资，至少是不付给足以维持基本需要的工资。总工会的大多数人仍然依靠筹措紧急基金的办法来支持个别的斗争，或是依靠“公社汤”的办法，后一办法是向罢工工人及其家属直接提供膳食和其他必需品。他们很少能够维持长期的斗争。除非能够迅速取得胜利，否则他们通常只能号召复工，然后又立刻开始准备一遇机会再次重新举行罢工。他们之所以反对订立约束性的协议以及按正规程序进行集体谈判，原因之一就在这里。他们基本上是游击战士，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公共当局——进行丛林战。在1914年以前的那几年里，当雇主加强他们应付罢工的组织，当职业介绍所联合会设法运用更加集中的工会方法来应付这种局面的时候，上述态度就逐渐有了改变。但是在总工会的大部分分会中，地方主义依然存在；甚至在主张集权的人中间，也有许多人一方面认为高度的集中是必要的，但又决心不让这种集中化危害运动的战斗性。冶金工人和建筑工人是这种意见的主要代表，他们一方面反对温和派的印刷工人与纺织工人，另一方面又反对某些职业介绍所中根基稳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极端地方主义。

在这些年里，总工会还有一个大问题是反军国主义问题；对社会党来说，这个问题也存在。这是一个几方面互相牵扯的问题。首先，当时欧战的威胁日益严重，其特点是大国之间的矛盾引起了一系列危机。对法国工人阶级的领袖来说，这种威胁表现为两个方面：在基本方面，这些危机是由于英德两国争夺经济霸权的斗争而引起的；在次要方面，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是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对东南欧和中东的野心互相发生冲突；而英德之间的矛盾以及英奥与英俄在东地中海权益上的矛盾又使这些冲突复杂化。法国反军国主义者的思想中最害怕的是，法国很可能作为英国的盟友被卷进对德战争，从而为英国的帝国主义目的服务。因此，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同德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取得谅解，以便建立一个反对

战争和反对备战的统一战线。当然，他们也希望把其他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包括英国的，都拉入这个统一战线。但是他们往往认为，这个战线首先取决于法国和德国运动的联合行动，而对英国人则深表怀疑，因为英国人既没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党，也没有一个坚决遵奉社会主义或阶级斗争理论的工会运动。他们主要希望法国和德国的工人阻止这两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把他们投入互相残杀战争；他们觉得，如果自己能够跟德国人就共同行动取得明确的谅解，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十之八九就会相继加入。

然而，法德两国工人阶级的谅解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形式以及 364 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去对付战争威胁，仍然是个大问题。总工会中的工团主义者按照自己的完全独立于政党之外的政策，希望跟德国的工会运动就共同政策问题进行协商，使政策得到确认，并通过 1903 年的国际工会会议所成立的国际工会书记处予以推广。这种纯工会性质的第一次国际会议是 1901 年根据德国的倡议在哥本哈根举行的。1903 年在都柏林举行第三次会议时，德国中央工会委员会总书记卡尔·列金被指定担任国际书记职务。不过所建立的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国际通讯联络局：关于新国际的具体职能以及它同两年前建立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关系，都没有作明确的规定。大多数与会者也丝毫无意赋予它制定政策的权力。而这正是法国总工会的领袖所希望的。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精神的最高体现是工会运动而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应该把工会运动当作主要因素来创造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精神，并利用这种精神作为反对战争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武器。当然，他们所选择的武器是总罢工，工人应该利用这个武器来防止战争，并在适当的时机为暴动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扫清道路。他们希望诱导其他国家的工会运动——特别是德国的工会运动——保证举行国际性总罢工以对付战争的威胁。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又不希望各国社会党

政客参与,他们认为社会党政客同自己国家的议会关系太密切,无法采取形势所要求的非宪法行动。

因此,法国总工会便提出一项动议,准备在下届国际工会会议上讨论进行反军国主义活动和利用总罢工来防止战争的主张。列金作为“国际”的书记,拒绝把这项动议列入议程,理由是动议所提出的政治问题完全不属于工会的职权范围;如果要讨论,也完全应该由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去讨论。法国人既无法动摇他的坚定态度,所以没有参加1905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工会代表大会。第二年年初,格里甫埃勒特别到柏林去会见列金和其他德国领袖,希望就反军国主义和反战活动问题同他们达成协议,允许在工会国际的下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格里甫埃勒发现列金及其同事完全不为所动。在他们看来,工会虽然应该作为社会民主党的非正式同盟军而采取行动,但应该把自己的活动严格地限制在工业方面,而政治问题则应该留给社会党去处理。他们坚持说,法国人如果希望提出反军国主义和总罢工的问题,就应该通过法国社会党在社会主义者国际的会议上提出,德国工会将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一部分参加会议。当然,这根本没有满足格里甫埃勒及其总工会同事的愿望,他们正打算在亚眠章程中重申,工会完全独立于政党之外,实质上具有革命性,因而也具有“政治”性。当时表明,德国人不仅反对把总罢工问题提到工会国际中讨论,同时也反对总罢工本身,而不论以什么名义举行的都一样。列金及其同事强调,工会有必要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以免遭到迫害,并应为会员的眼前经济利益服务,这一点特别使格里甫埃勒感到烦恼。在德国领袖们看来,工会基本上是谈判机构,其任务就是在会员实际面对的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下保护他们的利益。工会没有革命任务,社会革命是社会民主党的事,工会应帮助和鼓励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但是工会最好是独立于社会民主党之外,在法

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日常的活动。格里甫埃勒在柏林的时候会见了 366 了一些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工会活动家，但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反应并不更好。他们愿意继续在议会内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愿意投票反对战争预算，而且也愿意在全国为这些问题发起运动，但是他们决不同意由法国和德国的工人阶级共同保证以总罢工为手段去对付战争威胁这一想法。

法国的工会活动家碰了这个钉子以后，并没有放弃说服德国人改变想法的企图。后来，他们又重新参加工会国际会议，在1909年巴黎会议上曾力图改变工会国际的组织，以期改变它的态度。他们希望工会国际会议成为各国工会会员直接选出的、享有制定政策权力的代表所组成的大会，而不是全国性工会中心组织所选出的代表的聚会场所。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否决。直到1914年，工会国际始终不过是各国工会运动领袖偶尔举行会议和交换情报的书记处。此外，工会国际又由于英国职工大会拒绝同它发生联系而遭到削弱。代表英国参加工会国际的不是职工大会，而是小得多的工会联合会，许多较大的工会都没有参加这个组织。职工大会当时还没有成为工业方面的中央统筹机构，而仍然是一个代表工会向议会施加压力的机构。实际上，它宁愿派遣代表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而不愿参加工会的会议，因为关于劳工立法之类的问题主要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讨论的。

在工会国际中，法国总工会形成了一个处于劣势的左翼。在1911年的布达佩斯会议上，法国总工会的代表曾经设法使美国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按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同等地位加入工会国际，但未获成功。当时还曾企图成立一个工团国际，由意大利、荷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工团主义者与产业工会主义者少数派的代表，会同法国总工会以及西班牙人组成，不过结果并没有成立实际的组 367 织。

在此期间，反军国主义和以总罢工反对战争的问题，实际上已从工会方面转到政治方面去了，相继召开的几届社会主义者国际代表大会都热烈地辩论了这个问题。本卷前面有一章讨论了“国际”就持续的战争危机所采取的行动这一整个问题，其中已经叙述了这些辩论的情况^①。在这里，我们最好是讨论法国所进行的反军国主义运动的其他方面。

法国总工会在设法争取工会国际采取反战行动时，实际上是力图把它在亚眠会章中宣布奉行的工团主义政策扩大到其他国家去。这就是依靠工人阶级直接采取行动，而不要任何政党插手帮助的政策。但是在法国，反军国主义的使徒决不是全都支持总工会的政策。总工会领导集团的左翼是一批纯粹的暴动主义者，他们主张工人回答战争威胁的方式不应该仅仅是总罢工，而应该是彻底的暴动。这个团体大多是以古斯塔夫·爱尔威（1871—1947年）为首的宣传极端反爱国理论的人。后者把“工人无祖国”以及国界对受剥削的无产者没有意义等理论发展到了极端。他们主张积极反抗义务兵役制，完全放弃一切有关国籍的概念。总工会的领袖们虽然大体上同意他们的理论观点，但不愿意做得那样过火。在左翼的压力下，总工会的领袖们所采取的做法不过是“士兵的小铜币”——即工会送给服兵役的工会会员一小笔补助金，要他不要忘记自己同本阶级的其他成员的团结，并加深认识这样一个告诫：不让自己被人利用来破坏罢工，或开枪射击那些举行示威以支持本阶级要求的工人。总工会及其所属机构和刊物用这些内容向军人积极展开宣传，而且常常因此而触犯了法律。不过，它们并没有企图煽动工人抵制兵役或者拒绝服从命令，除非是命令他们对自己的工人兄弟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出，

^① 见本卷第二章。

要成功地号召一次总罢工以反对战争，就必然要号召军人不采取破坏罢工的行动，从而也就必然要求他们不去服从势必会得到的命令。事实上，反战总罢工的整个概念涉及到一点：除非政府及时让步，否则就准备把总罢工变成暴动。至于当一个国家的工人罢工而与之交战的另一个国家的工人不罢工时究竟会出现什么局面，则始终没有明确说明，尽管那些反对整个政策的人理所当然地充分利用了这种反对意见。

在此期间，法国的社会党人也一直在发展自己的反军国主义方案。在饶勒斯的影响下，他们所确定的中心政策是采用非职业性的民兵来代替征兵制的正规军，也就是说，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正规军，武装的人民并不连续服役几年，而只是通过短期的军事训练来学会如何使用武器，这样就不会使他们长期脱离正常的环境。这些法国社会党人说，在这种制度下，军队就不会成为政府可以用来反对工人的工具，而会成为人民自己所掌握的力量，能够用来反对追求军国主义目的或其他反社会目的政府。此外，如果国家遭到攻击，这支军队必然勇于卫国，但对发动侵略战争来说，它却几乎是没有用处的。这就是饶勒斯在所著《新军队》一书（1910年出版）^①中所持的论点。法国社会党绝不愿意接受爱尔威及其信奉者的反爱国主义理论，也不愿意在法国本身遭到攻击的时候放弃自卫的权利。它所希望的是制定一种方案，既能保持防卫手段，同时又能排斥侵略他国和殖民地的战争，后者是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一个必要部分。饶勒斯书中所建议的那种军队既不能用来征服殖民地，也不能用来驻防被征服的殖民地。由此可见，饶勒斯的计划似乎满足了政治要求，尽管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军事专家的反对。军事专家认为，这样一支军队实际上无法有效地抵抗装备

^① 这也是社会主义者国际的政策，在历届代表大会上都予以重申。见本卷第41页与46页及以下。

重武器的现代机械化职业部队。饶勒斯的主张，即使没有其他原因，单单由于这一点，就已经没有多大希望为社会党圈子以外的人们所接受，除非能够“推销”给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德国人的社会主义运动。因此，法国的社会党人就必须在国际上竭力鼓吹这一主张。

刚刚提到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观点，在法国人关于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的讨论中起了重要作用。在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看来，战争危险主要来自帝国主义的敌对竞争，这种竞争说到底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大资本家为本身的利益而发生争吵，其目的在于争夺权利以占有和开发不发达国家的资源，并在销售消费品和购买廉价劳动力方面剥削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法国人的眼里，北非问题显得最重要，依次涉及到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但是如前所述，他们往往认为，整个问题主要涉及英德两国之间的帝国主义冲突，而解决途径首先在于提倡法德两国的工人阶级采取反帝国主义路线的共同行动，希望这种谅解能加强英国和其他地方反帝国主义者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大多数其他问题上一样，工团主义者也远远走在社会党前面，对“殖民主义”提出谴责，这不仅是由于殖民主义造成战争危机，而且也是由于它加剧了对殖民地人民的经济剥削。

1912年，兵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的建议成了一个直接的政治问题，这时服兵役以及工人阶级运动如何对待服兵役也就成了特别尖锐的问题。在服役三年的兵役法通过以后，布列斯特代表大会于1913年召开。大会重申了以国民兵代替常备军的要求，决定发起一场运动来反对三年兵役法，主张国际仲裁，主张同德国达成协议，同时对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人以及工会主义者在阿加迪尔危机中所采取的行动表示特别满意。当时，法国总工会组织英、法、德工会采取联合示威行动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于是德国工会委

员会便邀请一个由 45 名代表组成的法国代表团访问柏林，代表团成员向柏林的规模巨大、情绪激昂的反战示威集会发表了演说。后来，德国的莫尔肯布尔和古斯塔夫·鲍威尔前往巴黎进行回访，并向类似的示威群众发表了演说。与此同时，阿尔萨斯-洛林的社会党人宣布反对旨在恢复 1871 年丧失给法国的省份的任何复仇战争；法国的社会党人热烈欢迎这种态度。事实上，德国人非常愿意举行示威，而且诚心诚意地反对眼看已经迫近战争。但是这丝毫也没有使他们更加愿意保证，同法国工团主义者共同安排一次总罢工以对付战争威胁，因为他们对法国工团主义者能否成功地发起这种运动深抱怀疑。事实上，他们对自己能否采取群众行动以反对可能涉及俄国、法国和英国的战争也同样怀疑。

当然，在这以前很久，社会主义者国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早就通过了一项著名的决议，各国代表团力图按照这一决议制定一项集体政策，以便采取行动对付任何当前的战争威胁，或对付战争无法防止而终于爆发时的局面。社会党人认为，1911 年法、德代表团是本着这一决议的精神互相进行访问的，当时大家还没有明显地看出这项决议起不了作用，尽管有许多法国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在 1906 到 1914 年整个时期内，法国社会党始终为总罢工问题所苦恼，这不仅是就总罢工作为反对战争威胁的武器来说是这样，而且就一般含意来说也是这样。由于占压倒多数的人都赞成亚眠章程及其关于工会同政党政治完全脱离关系的声明，法国社会党不得不决定对这一独立宣言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章程”³⁷¹开宗明义就分别针对个人和组织所应采取的行动说明了两点。其中的头一点说：会员个人在工会组织以外完全有自由参加任何符合其哲学或政治观点的斗争，但不得把他在其他地方所表示的意见带到工会中来。第二点规定，“为了使工会运动尽可能获得最大

的力量,应该对雇主阶级采取直接的经济行动,工会的联合组织不应同政党或者宗派发生关系,后者可以在工会以外自由地进行自认为适合的社会改革。”

亚眠章程在这两点声明以前还有一段引言,规定总工会不问一切政治思想流派,团结“所有认识到必须进行斗争以争取废除工资制度的工人”。引言接着强调,本宣言“承认阶级斗争;以经济为基础的阶级斗争促使工人起而反抗资产阶级在物质与精神方面对工人阶级所进行的一切剥削和压迫”。接着引言又以下述各点更加明确地阐释了上述理论:

在日常要求方面,工会运动(工团运动)旨在协调工人的行动,力求实现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等当前的改善步骤以增进工人的福利。

但是这仅仅是工会运动的工作的一个方面,它正在为那种只有消灭资产阶级才能实现的彻底解放铺平道路。工会运动赞成把总罢工当作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并且认为工会目前以抵抗为任务,将来则要负责管理生产和分配,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

372

大会宣布,上述涉及日常活动和未来前途的双重任务,是根据工资劳动者的实际境况决定的,这种境况使每个工人都受到压迫,迫使所有工人不论其见解如何,政治或哲学思想倾向如何,都不得不参加工会的基层组织(工团——也就是地方工会)。

亚眠章程就这样规定了总工会以阶级斗争为工会行动的基础,完全独立于政党和哲学宗派之外,同时以总罢工为武器。亚眠章程还进一步确定,在未来的社会中,工会将接收生产和分配的管理工作,但是没有明确指出:国家将消失还是会继续存在;如果继续存在,它同工会的关系又将如何。章程由于既必须得到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的支持,又必须得到既不附和与无政府主义,也不拥护社会党的工团主义中派集团的支持,所以这种含糊其词的写

法便是必要的了。

当时，章程以压倒多数票获得通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必须决定：究竟是接受章程并尽量加以利用，还是提出反对论点；力主运动中的政治行动派和劳工行动派必须携手合作，以此向章程提出挑战。1906年，在社会党人召开于利摩日的代表大会上，盖得派的基本组织和党内两大宗派之一的诺尔省联合会赞成采取上述的第二条道路。盖得派以外的杰出领袖几乎全都持相反意见，他们的发言和投票都赞成以饶勒斯为代表的塔尔纳联合会所提出的另一项提案。前独立社会主义者饶勒斯、布朗基分子瓦扬、让·阿勒芒以及极端反军国主义者古斯塔夫·爱尔威联合支持塔尔纳提案，其内容如下：

代表大会认为，只有通过政治行动和工会行动的联合力量，也就是通过以总罢工为目标的工会运动以及通过旨在普遍剥夺资产阶级而全面夺取政权的行动，工人阶级才能彻底解放自己；

大会深信，如果政治机构和劳工机构享有充分自主权，这种双重行动将更加有效；

大会注意到，亚眠决议确认工会运动独立于一切政党之外，但同时又为工会运动规定了一个只有社会党才承认和追求的目标；

373

大会认为，无产者的政治和经济行动之间的这种基本一致性，必然会在没有混乱，没有从属关系，也没有互不信任的情况下使两个机构实现自由的协调；

为此，大会吁请积极分子尽最大努力消除总工会和社会党之间的误解。

投票的结果很接近。塔尔纳提案以148票通过，而盖得派所得的票数则为130票。后者所主张的观点大体跟德国社会民主党相同。由此可见，法国社会党不仅保证承认工会独立，而且保证支持作为一种工会行动的总罢工。至于党所想到的是哪一种总罢工，

其用途是什么，都没有具体说明。毫无疑问，承认这一点部分是出于策略上的理由。社会党最不愿意做的莫过于在实现统一以后立刻就同总工会发生激烈冲突，至少饶勒斯是不愿意这样干的。这种冲突几乎不可能不使党重新陷于分裂，盖得派既居于少数地位，自然经不起与党分裂而同时在两条战线上跟总工会以及社会党多数派作战。于是盖得派便仍然留在党内，形成一个十分强大的少数派，足以对党从精神和文字上执行多数派决定的能力施加很大的限制。此后，在法国以及在社会主义者国际就总罢工进行辩论时，法国代表团始终由于严重的内部分歧而受到影响；饶勒斯竭尽全部才智进行和解，才使互相争执的派别团结在一起。

从1905年社会党统一一直到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被暗杀时为止，饶勒斯始终是法国社会党内的杰出人物，也是第二国际历届代表大会上唯一的最伟大的人物。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对于用辞和声调的掌握十分到家；他也是一个卓越的著作家，特别是在历史方面，而最关紧要的是，他最善于巧妙灵活地起草决议案和报告，能够赢得互相争执不休的集团和派别的拥护。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如何在一场激烈的争论中提出一项建议，把双方最喜爱的词句全部写进去，从而使与会者全都在一个取得协议的报告上签字，或是投票赞成一项共同的提案。在这种场合下，往往有人指责他玩弄花言巧语来促成虚假的协调，从而掩饰了分歧而不是调和了分歧。事实上，他的确是一再这样做的，但是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或是扩大自己的权力，而是因为他认定法国社会党人必须成为一个统一的党并保持团结，在国际方面他认为参加国际的各个组织应该团结一致，而不应该成为互相敌对的思想阵营。这种保持社会党人内部的团结以及社会党与工会之间良好关系的概念，是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首要原则，他几乎愿意使一切其他东西都服从于这条原则。为此，他首先为米勒兰和

改良主义者辩护,至少是不愿意看到他们被开除出党;直到他相信唯有开除他们才能使党的主体保持团结他才同意这样做,并表示反对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拒绝与之合作。因此,当工会接受亚眠章程并拒绝同统一社会党结盟的时候,他不仅接受工会的决定,而且特意要求党明确表示赞成这一决定,因为他看到只有表示赞成运动的两翼事实上才有和好相处的机会。同样,他说服党置盖得派的反对于不顾,赞成总罢工的政策,因为他看出反对这一政策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分裂。有人也许会说,这是一种机会主义者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受到明确原则鼓舞的人的态度。对于这一点必须回答说,机会主义正是饶勒斯的原则;这里所谓的机会主义的意思是: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不管什么事情,只要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共同意识”(the common sense)(而不是常识[the commonsense])指明它是使工人阶级保持为一支统一的力量的最好办法,他都乐意去干。当然,他所抱的坚定信仰为他所愿做的事情划定了一个范围。从最高尚的意义来说,他是一个热诚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者。375

他相信,社会主义的使命是继续伟大的法国革命的工作,是完成而不是破坏法国革命的事业。在他看来,共和国不是一个应予敌视的实体,而是一个应予捍卫的组织,因为它体现了伟大的“法国大革命的观念”。他虽然是一个革命者,但他的宗旨是继续进行一场已经开始了很久的革命,而不是谋求发动一场新革命。因此,他的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是完全一致的,而同任何以否定资产阶级价值为依据的破坏性的暴力学说完全相左。事实上,从天性来说,他是一个行动温和的人,但是他又决不会比他着手领导的工人更加温和,或者说决不会温和到足以削弱工人需要具备的战斗性的程度——这就是说工人需要具备足够的战斗性,迫使敌人重视他们。他对当前实现的一些改良措施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不愿在“驯化”工人运动的条件下接受这些改良,因为他完全意识到“驯化”会

破坏工人运动的力量这一事实。

最重要的是，饶勒斯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当古斯塔夫·爱尔威这样的人物对他说工人无祖国的时候，他就激动地回答说这种说法绝对错误。他说，法国工人的“祖国”是法国的整个文化生活，其基础不仅是伟大的革命传统，而且也包括法国的语言宝藏以及无穷无尽的法国文学和法国在一切艺术方面的自我表现。饶勒斯的事业是从当哲学教授开始的，这一点对他并非没有意义。即使在从事政治和新闻工作时，他也始终热诚信奉人道主义哲学，并极力使工人成为社会各个方面的真正主人，而不仅仅是国家或经济事务的主人，他本着这种精神主编《人道报》，力图使每期报纸不仅仅刊载当天的消息，而且还传播更加重要的社会和文化解放事业的信息。报纸的第一版非常出色，令人赞叹，特别是他那才思出众的社论所传播的东西远远超过狭隘的政治理论。在他的主持下，
376 《人道报》成了一支伟大的教育力量，在教员和社会党“积极分子”中特别有影响，他的文笔朴实无华，平易近人，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当然，这不是饶勒斯一人的成就，他大大得力于爱德华·瓦扬的帮助，后者同样热心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此外，投稿不及瓦扬经常的还有安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年）之类的大作家。但是，主要的鼓舞力量毕竟仍然是饶勒斯，他年复一年地坚持下去，一直到他过早地死去为止。

这些优秀的品质并没有使饶勒斯成为独具创见的伟大政治思想家。他对社会主义政策的积极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提出了以人民武装为基础建立新军队的设想，二是力图解决社会主义理论应用于农民的问题。在第一个问题上，他得到了党的支持，在社会主义者国际中也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至于另一个问题，法国社会党虽在代表大会上几经辩论，到1914年仍未能作出决定；但是在这方面，它并不比面对同样问题的其他社会党更糟，而且饶勒斯的设想

无论如何要比我们在前面某一章中讨论过的考茨基的设想现实得多。

《新军队》一书中所提出的政策尽管得到了大力支持，但是否同样现实则大可怀疑；不过这一政策并不一定因此就黯然失色。这一政策使得饶勒斯能够把古斯塔夫·爱尔威所领导的极端反爱国主义的少数派的人数压低。这个少数派对于一切形式的效忠国家的措施——包括一切形式的国防在内——全都反对，并且提出以工人不分国界举行暴动的政策来代替国防。饶勒斯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一样，维护捍卫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的权利。他所遇到的难题是，用什么办法既能行使这一权利，又能防止现存国家得到可以用来对付工人的武器，或者得到可以用来侵略他国和发动帝国主义的殖民战争的军队。他认为掌握武器的民兵可以随时响应捍卫国家的号召，他们不是被隔绝在军营或营房里，而是过着平民生活，从事日常职业。在他看来，这种军队似乎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答案。毫无疑问，瑞士的实例说明，甚至连民兵也能被用来破坏罢工^①，但是也可以举出抵消这种危险的事实来：罢工工人同其余的人民一样，也是有武装的，所以军队既是国家的，也是人民的；如果发生革命，它可以站在人民一边，就如同它可以站在反对人民的一边一样。当然，这个计划要求全军上下都具有民主信念，而饶勒斯则力图制定实现这个目标的办法。他的计划如果不孤立起来看，而是作为各国社会党取得一致协议的建议的一部分来看，而且建议的目的又是把军备裁减到纯防御性的水平，并普遍承认仲裁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那么它才会显得非常有前途。困难在于从这个角度去设想这个计划，首先就要求社会主义——至少是反军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在所有的主要国家而不仅仅是在法

① 见本卷下册第十五章。

国取得胜利。如果这个计划作为法国单方面行动的建议提出来,那么它是否能同有效地捍卫国家这一点并行不悖就值得怀疑了,即使是在1909年的时候也是这样;而当各大国增加军备并提高其技术水平的时候,就更加值得怀疑了。这也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法国社会党人认为,在有关民兵的建议同力争与德国工人阶级运动达成谅解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在土地问题上,饶勒斯始终不能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如下正统看法: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耕作法发展的过程中,注定要迅速归于消灭。他很了解,拥有土地的人是如何顽固地死抱住土地不放,而那些在平分租佃制下耕种他人土地的人又是如何普遍地希望拥有所耕种的土地。他不愿意同某些社会党人站在一起,这些人认为小农跟农村的工资劳动者不同,是一个反动阶级,不主张采取任何行动去巩固小农的地位,从而为社会主义的进展设置新的障碍。恰恰相反,饶勒斯则坚持不仅不应该违反小农的意愿,剥夺他们的土地,国家反而应该出面实行减租办法,并以有利于佃农的方式改变分享土地产品的条件。他主张大土地所有主自己雇人耕种的、出租给佃农的以及在平分租佃制下出租的土地全部予以剥夺,并且用降低地租或产品份额的所得建立一笔资本基金,在公众主持下用来改良农业。他认为大规模耕作制会越来越发展,并且会以公有制为基础在合作社的体系中组织起来,但是小规模耕作制会持续下去,与大规模耕作制并存。小规模耕作制中,有些是部分时间在集体农庄工作的农业劳动者所经营的极小规模农业。他强调指出,农户虽无正式组织,但已在很大程度上进行合作,比如互相帮助收割,互借牲畜大车和农具等。他认为这些习惯是自然合作制的迹象,在一个友好互助的社会环境里,这种合作制会大大发展,农户在这种环境里不会再被地主或者高利贷者剥削,也无法为自己的利益去剥削农业劳工。他从工人

自治而不是从他所厌恶的国家官僚管理机构的角度去设想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因而他认为农业的前途在于把农业工人管理的合作社耕作制同残存的个体耕作制结合起来，后者会在供销方面得到合作社的帮助。他在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初期就形成了这种思想，后来也始终没有放弃。但是法国社会党始终既没有接受也没有否定这种思想，它拿不定主意，把这个问题从一次代表大会拖到下一次代表大会，没有作出决定。

饶勒斯对于土地问题的看法显然存在着机会主义的成分，在大多数其他实际政策问题上也是这样。他不愿与农民阶级为敌；他非常了解，虽然自耕农在农业生产者中只占少数，农业雇工、平分租佃制佃农以及佃农的人数比他们多，但是如果社会党反对他们，他们却能给社会主义的进展造成严重障碍。但是他的态度绝不是完全机会主义的。他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不是推翻而是完成大革命的事业；因而他认为攻击农民，不让他们有公平的机会去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就是一种背叛。此外，他反对官僚主义和集权制，这也使他反对剥夺农民的财产，只希望把他们纳入合作计划的格局中去，让他们在这里面自由地管理自己的事务。 379

饶勒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用语，这种用语是第二国际各个党派所通用的，他还接受了马克思的很大一部分经济理论。但是他始终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强调社会主义的道德因素及其在民主制中的根源。他认为民主制是现存民主趋向的实现，而不是任何一种阶级专政。他强烈反对布朗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专政理论。他天生是一个议会政治家，绝不愿意承认国家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属于立宪派的右翼。他坚持说，工人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不能让自己被局限在资产阶级法制的范围内。他同意工人很可能不

得不采取违反宪法的行动去反抗法律或发动起义，但是他并不象天生的革命者那样欢欣鼓舞地看待这种前景，而是认为这是一种应该尽可能避免的不愉快的必然趋势，因为他非常迫切地希望，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痛苦不致破坏值得带入新社会的人道价值和文化价值。

在1905年以后的年代里，法国社会党中的第二个杰出人物是茹尔·盖得。他开始时是一个激进派。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他在瑞士和意大利曾经经历过一个半无政府主义者的阶段，后来同保尔·拉法格一起忠实地仿效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了法国工人党。盖得是一个完全没有创见的思想家，他把精力放在组织工作上，并一心忠于当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他坚信集中制，坚信整个工人阶级运动应当服从以严格的纪律为基础并遵照既定路线办事的党的领导。他也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一样，深信社会主义的到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权力越来越集中的必然后果。380 他主张采取议会行动，赞成利用议会来实现当前的部分改良。但是他始终强调，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以这种方式所能取得的真正利益是很有限的，同时他坚持，推翻资本主义这一基本任务不利用革命手段就无法完成。他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国家是阶级的代理机构，因而强烈反对以保尔·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通过发展市有企业与公营公用事业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企图，因为他认为这种公共企业受资产阶级国家控制，并被用来反对工人。他也同样反对工团主义，认为工团主义会使工人在追求工业自治体的利益时陷于分裂，而不能使他们团结起来去争取实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目标。

当然，所有这一切在德国中派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中都是普通的常识，但是在法国却远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接受。它在法国北部，也就是在始终是盖得派主要据点的地方，反应最好。在工团主义

兴起以前，盖得派有一个时期对工会运动握有相当大的控制力量，但是除了少数地区以外，这一派始终没有能恢复这种控制。1914年，盖得立刻起而报效国家，在战时联合内阁中当了部长，尽管他相信马克思主义。他的著作，除了他的回忆录《浪迹天涯》（1914年）以外，都没有什么重要性，主要只是对马克思主义作通俗解释的小册子。但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新闻工作者。从他在完全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前，于1877年创办《平等》杂志的时代起，一直到他长期担任《人民呼声》和其他刊物的主编的时期为止，他一直积极从事新闻工作，这些刊物宣扬的是他那套严格的正统派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

第三个主要人物是前巴黎公社委员、布朗基的信从者爱德华·瓦扬。他在各社会主义派别统一以前一直领导布朗基派的社会党，此后就参加了统一的党。瓦扬（1840—1915年）受过医学和 381
科学教育，在米勒兰事件时期曾经同盖得联合起来反对饶勒斯，坚决反对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但是跟盖得不同，瓦扬没有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他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多从革命中坚分子的角度出发，而远远不是从有纪律的群众性政党的角度出发。因此，他在态度上比其他议会领袖更接近于工团主义的积极分子。他极力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第二国际讨论社会党人反战行动的问题时，他是积极参加的，比如他曾经同凯尔·哈迪共同提出1910年的哈迪-瓦扬联合提案^①。他的据点在巴黎。他在当选为议员前9年，也就是在1884年，就已经当选为巴黎市政委员会的委员了；他的最出色的建设性工作是在发展巴黎的教育事业方面。他是社会党主要的教育专家。在社会党统一以后，尽管他在理论上持革命主义，但同饶勒斯却进行了亲密无间的合作，远比盖得同饶

^① 见本卷第93页及以下。

勒斯合作得好，后者对饶勒斯的卓越地位愤愤不平。尽管瓦扬的革命热情日渐衰退，但他在巴黎的左翼中间仍然很受欢迎。

在其他社会党领袖中间，还可以提到保尔·拉法格，他是马克思的女婿，同盖得一同创立了工人党。1911年，拉法格同妻子劳拉一道自杀。他1842年生于古巴，在法国受医学教育，后来由于从事政治活动而去英国避难，并在那里遇见了马克思。他受马克思委派，前往西班牙，企图在那里建立第一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支部^①，同巴枯宁派对抗。1882年以前，他一直住在国外，这一年他回到法国同盖得合作，一同起草了工人党纲领。他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法国的主要阐释者，写过一系列著作，说明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并批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关于财产和宗教。但是除了作为盖得的盟友以外，他在盖得党的初期以后就不再是一个具有任何巨大影响的活跃人物了。

可能派的领袖保尔·布鲁斯生于1854年，他最初具有半无政府主义思想，后来主张社会主义的市有企业，并且主张积极参加地方政府以加强社会主义的力量。他死于1912年，此后并没有出现新的领袖来接替他的地位。另一个巴黎公社成员让·阿勒芒生于1843年，在社会党统一以前，他那一派最接近于工会左翼，他在1905年以后就不再具有多大影响。

其余需要略加考虑的人物是同工团主义关系最密切的理论家，特别是若尔日·索列尔和胡伯特·拉加德勒。我们已经谈过，如果认为索列尔对于工团主义运动的发展，甚至对于这一运动的思想发展具有任何重大影响，那便是十分错误的。工团主义领袖从来没有接受索列尔所认为的总罢工是“社会神话”的想法。虽然他们同意他代表工团主义运动所发表的大部分言论，但是他们毕

^① 见本卷第338页。

竟正确地认识到他的思想是从运动中来的，而不是强加给运动的。

若尔日·索列尔(1847—1922年)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思想家，除非用否定的字眼，否则简直就不可能确定他的思想内容。有一些事情他根本不相信或者不予信任；我们从他的著述中所能找到的那种一致性主要就是由这种否定的说法构成的。他不相信民主或进步，不相信把理性当作社会行动的基础是可靠的，也不相信达成协议的作法有任何价值。他对资产阶级所抱的反感远远超过他对工人所抱的好感，事实上也超过他对任何人所抱的好感。如果说有任何事情是他真正喜欢的，那就是做一个悲观主义者。在许多方面，他同蒲鲁东很相象，他非常崇拜蒲鲁东，常常加以引证。在蒲鲁东的思想中，他认为最相投的一点是，不把矛盾当成应予消除的弊端而加以接受，而是当成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所固有的东西而加以接受。有一个长时期，他也钦佩马克思；他也曾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实际上他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中，他所喜欢的是关于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思想，也就是大无畏地宣布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的思想。但是关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把无产阶级推向胜利的说法却同他的观点完全不相合。在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喜欢设想无产阶级正从事一场英勇的斗争，而斗争的结局如何则是完全模糊不清的，因为他认为进 383
行这场斗争的世界随时可能倒塌在战斗者的身上，把他们淹没在共同的灾难中。对他有吸引力的是斗争，而不是胜利的前景；只有在他不把胜利当作胜利看待，而是当作对方的失败看待的时候，胜利的前景才对他有吸引力。

我曾说过索列尔不相信发展，但是这一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就严格的技术含意来说，他的确相信发展。他受过工程技术方面的教育，在成长为成年人的岁月中，他就从事土木工程方面的工作，后来才成为某种理论的宣扬者；他从工程师的角度着眼，把发

展看成是一个技术事实。他所补充的一点是，从人和道德的观点来看，这种发展不过是一种幻象。它并不能使人有所提高，而只能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让人们进行斗争，从而激励他们的英勇性格——如果他们还具有一点这种性格的话。他鼓动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战斗，但是他也希望资本家改进自己的组织，以便使工人有一个能够考验本身才能的对手。他对所有政党的政治家都轻视，其主要依据是，他认为这些人极力追求平静的生活，老是设法进行妥协并取得一致协议的解决方案，或者至少是求同存异，而不是全力进行斗争。他痛恨“合情合理的”人，他认为这种人总是把问题弄得模糊不清，而不是使每个分歧都变成无法让步的原则问题。当政治家变成教条主义者的时候，他也同样严厉地谴责他们是制造普罗克拉斯提斯式的床^①来束缚人类精神的人。

索列尔的早期社会著作曾受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②的影响，而在他为时短暂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则受贝奈戴托·克罗齐^③的影响。有若干年，他一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从事写作，而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流。他的工团主义时期是从1898年发表《工团社会主义的前途》一书的时候才开始。他在这本书里宣称：“从现在起，无产阶级应该努力摆脱一切不是来自内部的指导。它应该通过运动和行动取得从事司法和政治工作的能力。它的首要行动准则是保持工人阶级的纯洁性，也就是说应该排除知识分子。让他们指导工人阶级，其后果就会是恢复等级制度和分裂工人阶级的主体。知识分子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上面这段话中所用的“能力”一词，显然是附和蒲鲁东的说法。索列尔继续说：

① 按希腊神话，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开黑店的强盗，他劫人后令身长者睡短床，砍去其伸出床外的部分，令身矮者睡长床，拉长其身体使与床齐。——译注

② 见本卷下册十九章。

③ 同上。

“如果把我的整个思想总结为一条公式，我便会说，这条公式是社会主义的整个前途取决于工人联合会的独立自主的发展。”

两年以后，索列尔写道：“社会主义运动结束了”，那就是说，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结束了。然后他接二连三地发表了《现代经济学概论》(1903年)、《进步的幻想》(1906年)、《马克思主义的剖析》(1908年)、《论暴力》(1908年)以及《德莱福斯革命》(1909年)等书。所有这些著作都是法国总工会在格里甫爱勒、波盖和梅兰的领导下进行最富有战斗性的活动的时期写出的。后来，随着“英雄时期”的结束，索列尔的著作也就不再潮涌而出了，于是他开始寻找愿意接受他的“暴力”论的新英雄。有一个时期，他在极端保守派和保皇党中间找到了这种人，并同法兰西行动派发生了争执，认为他们“过分民主”。当布尔什维克掀起革命的时候，列宁的战斗性品质使他在《论暴力》一书中附加了一个颂扬列宁的附录，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墨索里尼把他列为法西斯主义思想的主要启示者之一。

索列尔最痛恨的事情，有一桩是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他往往把现代世界的一切错误都归咎于这个运动。在他看来，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已引导世界走入歧途，产生了一种虚幻的乐观主义和方向错误的理性主义，并且武断地相信按人数决定大計的办法，他们称这种办法为“民主制”。他们犯了致命的错误，把知识界当成工具去启发人类取得意见上的一致，而实际上人类所需要的却是因意见上的分歧而产生的刺激，以便在行动中激发他们的道德品质。有些人同饶勒斯一起把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看成是意识形态的基础，不断推动社会发展；索列尔则认为这些人完全误解了这个运动，把它歪曲成自由主义运动。他坚持说，当前的任务并不是为完成自由主义革命而使这一革命社会主义化，而是要立刻摆脱自由主义传统。在他鼓吹工团主义的时期，他不断要求无产阶级不

385

要误入歧途，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并设法使资产阶级思想适合自己的需要，而是要立即摆脱资产阶级的传统，并通过行动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基础只能建立在日常斗争的经验之上。这种新意识形态，更恰当地说，是一种新生活方式，因为他并没有要求或希望无产阶级从理论上系统叙述它的性质，因而它的性质始终没有弄明确。事实上它也不可能是明确的，因为它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产生。当总工会没有能实现他在该工会的“英雄年代”所见到的成功希望时，他就丧失了兴趣。如果天假以年，让索列尔看到共产主义的发展，他对于共产主义究竟会有什么想法，我不敢妄加论断。他大概会从旁忖思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战斗一场，而不关心哪一方会获胜。事实上他会欣赏这场战斗，并且把“不断革命”和“在一个国家内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当成“社会神话”中的绝妙例证。

索列尔最出名的著作是《论暴力》，事实上这也是他唯一被广泛阅读的著作。关于“暴力”的创造性作用的想法以及“社会神话”的概念都是他在这本书里提出的。他为之辩护并加以赞扬的“暴力”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的说法虽然也包括有形的暴力，但并不一定是指这种暴力；他所说的基本上是指拒绝妥协的态度和遇到反对后更加坚强地采取行动的决心。单纯的空谈他是轻视的。他要求行动，并强调指出，促使人采取行动的并不是理性的信念，而是本质上并非理性的信念，虽然它看上去也具有理性的愿望和计划的外表。他在宣传工团主义的阶段深受柏格森的“活力”说的影响，并且自认为是柏格森哲学的社会学说的阐释者。索列尔认为，人类本性中所存在的这种活力必须用行动计划来表现，而不能用理想来表现。对二十世纪的工人阶级来说，它的具体的行动公式是总罢工，这不是任何种类的总罢工，而是当作工具以彻底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总罢工。奥地利人和比利时人曾经利用“政治性总罢工”

作为争取普选权的工具，其他人也企图加以利用；他对这种罢工极为轻视，认为这是政客歪曲了崇高的革命愿望。在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思想中，总罢工实质上是一种起义行动，是对一切权威的反抗。如果这种总罢工实际上始终不发生，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结局，而在于它对战斗行动所给予的鼓舞。在那种鼓舞下会发生许多行动，而且只要行动所根据的是正确的战斗精神（也就是使行动具有圣战性质的战斗性道德精神），行动所采取的是什么形式就不是主要问题。索列尔特别喜欢拿战争作比喻，他一再坚持说，阶级斗争是一场战争。他赞扬军人的美德，把战争看作是一种使人崇高的经历，特别是为某种“事业”而进行的战争。在他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提出的指控中，重要的一项并不是他们发动了战争，而是他们始终在弥合分歧，而不通过战斗打出个分晓来。

读者在前面大概已经看到，我非常不喜欢作为思想家的索列尔，尽管我对他在某个时期所主张的工团主义是非常同情的。有时候，战斗是必要的，不肯战斗就是懦夫；但是战斗往好处说也永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邪恶，它并不具有使人崇高的性质。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完全有可能推崇主动、活力和决心，而又不落到为战斗精神而颂扬战斗精神的邪恶地步。我们也完全有可能象蒲鲁东那样，承认“矛盾”是社会生活中的必要因素，而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把每一种“矛盾”都看作是导致互相消灭的斗争的原因，或者看作是毫无目的地表现英雄品质的机会。我认为索列尔尽管大谈“道德主义”，而实际上却正是毫无目的地表现英雄品质。格里甫埃勒也有这种毛病，其结果往往是宣扬这种论调的人并没有把自己的崇拜者训练成干出越来越多的英雄业迹的人，到头来反而使他们感到厌倦，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和法国的总工会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格里甫埃勒和海伍德至少还相信自己是有

387 目的的，他们追求的不是一种“社会神话”，而是他们认为可以实现的目标。他们不象索列尔，不是哀呼要流血的悲观主义者。

当然，索列尔的悲观论同他的非理性主义有密切关系，这一点使他的社会思想同维尔弗雷多·帕里托的社会思想发生了联系，因而使他们两人都成了法西斯理论的泉源。帕里托把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最后都追溯到他所谓的“残存力量”（“residues”）——一种非理性的动力，它按照支配统治阶级骨干分子的动力力的具体类型而驱使社会向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他认为，这种支配作用的形成是一种循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新人物以及具有“综合”才能的新官场阴谋家掌握了社会组织时，一种残存力量——或者不如说几种残存力量的综合——就会被另一种所代替，如此循环不已。与此同时，罗伯特·米歇尔斯在自己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政党》（1912年）一书中，揭露了政治行动的腐败倾向以及骨干分子加以操纵的过程，这些人使得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目为正常的那种民主行动成了一幕滑稽剧，其作用只是掩盖一下官场摆布容易上当受骗的人类的内幕而已。米歇尔斯曾经在瑞士、意大利和德国从事工作和写作，他参加了以胡伯特·拉加德勒的刊物《社会主义运动》为中心的团体，并且使这一刊物在二十世纪初期成为鼓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观念的杰出机关刊物。象索列尔一样，他也激烈地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尤其是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说它是“巨大的自动机器”……“禁锢在阴沉而僵硬的国家主义中……对人民的呼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避而不言”。在米歇尔斯和所有的工团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似乎在瓦解和衰落，这种理论由于害怕触犯群众的情绪和放松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不敢号召广大的信从者起来行动。

胡伯特·拉加德勒于1899年创办《社会主义运动》，并把它一

直办到 1914 年。他是这个时期反对议会社会党人而站在工团主义一边的知识分子团体的中心人物。他的文笔非常出色；他的著述虽然语气坚决，但基本上并没有索列尔那种“制造神话”和单纯颂扬暴力的说法。他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都有深刻的研究，建有许多国际联系，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根基很深，远非索列尔所能比拟。当边诺阿·马隆的《社会主义评论》在继承者的手中丧失了大部分动力以后，拉加德勒便使自己的刊物成了这一时期大量激烈争论的中心。这个刊物的主要理论对手是《人道报》。后者是让·饶勒斯于 1904 年创办的日报，在社会党统一以后，成了社会党的机关报，仍由饶勒斯担任主编。从一开始，饶勒斯就把《人道报》办得至少象重视新闻报道那样重视理论和舆情，其中包括效法维也纳《工人报》的作法刊载长篇论文。但是不久之后，为了扩大销路，这项办报政策就被修改了，但是原有的大部分特色仍然保持了下来，在建立统一的社会党方面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很自然，它是工团主义阵营中的好斗分子经常攻击的目标。

拉加德勒在 1911 年出版的论著《工人的社会主义》最充分地说明了他的观点。他还收集了一些国家的稿件，编辑了一些专题论文集，其中有《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1908 年）以及《总罢工和社会主义》（1904 年）等。在前一个集子中有米歇尔斯、格里甫埃勒、阿尔图洛·拉布里奥拉和 B·克里切夫斯基的论文。拉加德勒跟某些工团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彻底反对社会党，他认为作为工人阶级的工具来说，社会党暂时是用得着的，尽管在工会加强了力量，并使议会行动（事实上是整个“政治活动”）成为不必要的时候，社会党就注定要被取代。他写道：“无可争辩的是，工人阶级民主制为了本身的建立和发展，暂时还需要政治民主制，但是它利用政治民主制只是为了更好地消灭它。”他又说：“社会党在议会中的任务只能是通过法律来帮助无产阶级以自治的方式把自己

组织起来。”他说：“工团主义并不否定政党，而只否定政党改变世界的能力。”他坚持说：“工团主义始终作为一项原则指明，资产阶级制度只会随着它被工人阶级组织所取代而被消灭，被取代多少就被消灭多少”；他还说，工人的重大任务是建立自己的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以合作生产共同消费的概念为基础，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拉加德勒的这种态度得到总工会冶金工人领袖阿尔芳索·梅兰的大力支持。梅兰不断强调工会有必要统一，有必要掌握并在工人中普及有关资本主义工业和金融实际运行情况的精确知识，因为这不仅是顺利地日常斗争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所必需的，而且也是作好准备以便接受控制权所必需的。拉加德勒具有建设性思想，他跟许多工团主义者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坚持工会必须配备更多的专职人员，成立任期更加稳定、力量更加强大的委员会组织。他虽然非常激烈地批评工会中的改良主义倾向，但也认识到只要大大加强工会组织，并改变它们对自发性活动的许多想法，就能使它们成为新社会的管理机构。他相信争取改良是有价值的，而不论法律是否予以支持。他反改良主义的依据是这样一 个批评论点：“改良主义者在改良主义中所看到的没有别的，只是改良”，而实际上，看待改良的出发点应该是，确定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母胎中”建立工人阶级的管理机构这一问题上，改良是否作出贡献。他把工团主义叫作“讲究制度的社会主义”，用以说明上述概念，这个概念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

在《社会主义运动》这个团体的其余成员中，值得一提的还有爱德华·伯尔斯，他的著作《知识分子的恶行》于1914年问世。伯尔斯多年经常向《社会主义运动》投稿。他所宣传的一个观点是，新社会的建立必须完全以生产为中心并以“生产者”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他攻击社会民主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半资产阶级哲学”，是一种“搞政治活动、搞议会活动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理

论,这种理论把无产阶级看成是一种物质武器,要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参谋部所体现的思想来加以支配”。他要求无产阶级发展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哲学,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同索列尔一390样,也反对总工会把破坏活动当作劳资斗争的一种武器。他坚持说,从事正当工作的自豪感,必须是新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让工人养成习惯,把搞不正当工作和蓄意破坏当作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就必然会使工人不适合接掌工业的管理权。因为这会使他们的品格堕落,并且会导致人类文明的衰落而不是发展。索列尔也运用了同一论点,但这一论点对格里甫埃勒或波盖却毫无影响,后二人认为在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中,任何武器都是合法的。格里甫埃勒不大关心未来的社会,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斗争上。波盖倒是关心的,但他是一个善作预言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革命会改变人的本性,因而现存社会制度下所沾染的坏习惯并没有被带到新社会中去的危险。

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1905年统一以后,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来说,虽然是连成一体,但是由于参加议会的社会党人同工团主义者之间的不断争吵而受到了很大损害。在背叛了社会主义运动以后,米勒兰的所行所为,尤其是白里安的所行所为,给反议会派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饶勒斯虽然已经完全不再支持同资产阶级合作的作法,但仍需作很多事情去洗刷过去的污点。他非但必须同工团主义者周旋,而且也必须同盖得派对阵。工团主义者坚持“阶级斗争必须在阶级的水平上进行”,这也就是说,必须在工业领域内进行;而盖得派则打算对工会自治的原则提出挑战,他们不喜欢饶勒斯讨好劳工行动派的作法。与此同时,饶勒斯还不断受到以古斯塔夫·爱尔威为首的极端反军国主义派的攻讦。爱尔威的著作《他们的祖国》(1905年)和《我的罪行》(1912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在1907年创办的刊物《社会斗争》拥有广泛的读者。

他那些激烈的造反思想在党的历届代表大会上始终没有接近于赢得多数，而是被饶勒斯和盖得的信从者的联合票数压倒。但是爱尔威及其团体完全否认工人有任何国家可以捍卫，或者有任何理由可以向民族精神让步，这种态度始终使主张区别对待的国际主义者感到烦恼。³⁹¹ 1914年，爱尔威突然转变了态度，成了爱国者，态度之坚决就如同他原先谴责一切形式的爱国主义一样。但是在1914年以前，他毕竟为饶勒斯制造了难题，因为他使右翼社会党人产生了顾虑，更加难于在维护国家自卫权的同时采取如下立场：不支持加强军备的政策，不放弃同德国社会党人达成谅解并使“国际”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和平力量的企图。

第九章

392

1905 以前的俄国

第二国际在其全部历史中，始终主要是西欧社会党人的聚会之所，他们主要致力于建立社会民主党，以便参加政治斗争以取得议会权力。在某些国家里，这就涉及到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即赢得投票权，例如比利时和奥匈帝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凡属在第二国际中起主要作用，并为国际提供了杰出发言人的国家，某种形式的议会代表权已经存在，因而社会党直接关怀的是，想办法把关键性的代表机构掌握在自己手中。事实上，在取得议会权力以后究竟如何加以运用的问题，往往是不明确的。对于利用议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工具的可能性，对于通过议会手段所能取得的改革的性质、限度和价值，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是他们都一致希望取得议会的控制权，不管他们在取得控制权以后希望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也是他们经常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的问题，后者正是由于反对这种形式的政治行动而被赶出了第二国际的。甚至连西班牙也有议会，为正统的社会党提供了一个奋斗目标。

另一方面，俄国却没有议会让社会党人去征服。沙皇的政治机构的专制程度远非普鲁士或奥匈帝国所能企及。当然，俄国人可能要求建立西方形式的议会，而且也可能相信有朝一日立宪政体会出现在俄国，正如同随着各国的文明生活方式的发展，立宪政体已经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在这些国家出现一样。但是当时 393 在俄国，并没有以任何代议制原则为基础的制度存在，让俄国的社

会党人能够通过或根据这种制度进行活动。俄国的社会党人不得成为革命主义者，这不仅是从他们必须把革命的道路看作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一意义上说来是如此，而且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来也是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跳出纯思想的圈子，唯一能采取的行动方式就是革命。事实上，只要他们进行思考（至少可以说，只要他们表达或交流思想），就很难不暴露自己，从而有被目为革命者的危险，甚至还会违背他们本人的意志而被转变为革命者。

正是由于这一点，俄国人不可能适应第二国际的气氛；或者在它的工作或辩论中起实际作用。即使在他们所使用的字眼和哲学概念同西方社会党人一样的时候，他们也是局外人，所面临的是自己那一堆问题，跟西方社会党人完全不同。毫无疑问，由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长期在西方流亡，吸收了许多西方习惯和思想，有一部分基本分歧被他们自己以及同他们交谈和辩论的西方人士掩盖起来了。甚至在他们同西方人士长期相处以后，他们对西方人士也往往容易得出错误的看法。特别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中都有强烈的西方化倾向，对于支配第二国际并以继承和发扬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革命传统为己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真正性质，很容易抱有很大的幻想。这些幻想在1917年以后将产生极其重要的后果，因为它们使俄国人相信西欧在德国人带领下，必然即将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同托洛茨基一样，完全成了这种错误信念的牺牲者，当列宁在1920年设法强行通过波兰，旨在同他认为已经成熟的德国革命取得联系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一点。1917年以后，列宁在小册子论战中之所以猛烈攻击考茨基，主要就是由于他痛苦地认识到他误以为跟自己同为革命者的领袖们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性质。

在俄国，社会党人不得不成为革命者，舍此别无他途，至少是在

亚历山大二世甫登皇位的那个短暂时期过去以后，情况是这样。在那个短暂的时期，亚历山大二世看来曾有可能象赫尔岑在农奴解放时期在《钟声》杂志上所要求的那样，成为推行改良主义的沙皇。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除了革命以外就绝没有结束专制制度的任何希望。真正的问题不过是：当前的任务究竟是立刻掀起革命，还是在不可能办到这一点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进行恐怖活动，抑或是应该优先进行思想和社会方面的准备工作。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有些知识分子想到人民中去，生活在他们中间，同他们打成一片，结果却立即遭到残酷的迫害。这说明专制政权不允许采取任何公开的措施去打破少数开明人士同人民主体之间的隔阂。除非把一切推翻政府的含义都小心谨慎地掩盖起来，否则连知识分子谈论政治问题也是非常危险的事。车尔尼雪夫斯基虽然没有直接攻击传统制度，但是他的进步思想就使他受到惩罚：饱尝铁窗风味于先，去西伯利亚过流放生活于后。彼得·拉甫罗夫是非常温和的，而其著作则是在流亡中写出的。在发展民粹派思想的重要人物中，只有米海洛夫基设法使自己的著作通过了检查，没有成为政治警察的牺牲者。他的做法是把自己所要说的话主要写成哲学和社会学评论，用来评述西方地位崇高的伟大著作家。即使是这样，当局放过了他这一事实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俄国实行高压的一个后果是，知识分子的主体同“人民”之间断绝了联系，于是除了采取最极端的形式以外，思想便同一切形式的行动彻底分了家。在恐怖主义的地下组织中，少数知识分子还有可能同少数工人携起手来采取行动，但是这种团体必然人数很少，而且非常秘密。局部的农民起义以及一些城市中的罢工运动，大都是在没有任何知识分子参加的情况下发起的。聚在一起谈论政治的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团体，大多同农民或城市工人没有联系，只能空谈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势必只有在社会的真空中

进行,而且具有很大的纯理论性成分,因为没有任何办法能使这种讨论落到实处。就当时来说,在任何有组织的基础上发起人民运动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于是,这就给革命者(实际上是知识分子)争论如下问题留下了更大的余地:究竟应该着手建立什么样的有组织的运动。

赫尔岑在很久以前提出的重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在走向解放的征途上,俄国人究竟是必须遵循西方的道路,通过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的阶段从而走向以产业工人阶级的政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呢,还是应该吸取西方的教训,通过不同的道路走向以农业为主、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而无需实现工业化或接受其他国家因工业化而出现的“资产阶级专政”呢?社会党人究竟需要提出什么性质的号召,这种号召究竟应该向哪个社会集团提出,都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唯一能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掌管下的工业发展,那么社会党人似乎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去促进资本主义和工业的发展,哪怕他憎恨这两者,而且他的主要号召应该向产业工人提出,哪怕他们人数很少,显然太软弱,无法依靠自己去取得多大成就。另一方面,要是果真有可能利用古老的俄国农村组织的公社成分作为农业社会主义的基础,而俄国农民又能在其中发挥西方工业无产阶级所起的那种作用,那么就非常有必要去反对当时正在迅速破坏旧农村组织的资本主义发展了,同时也非常有必要在农民中间建立社会主义思想感情的核心,用以沟通和指导农村群众的不满情绪。即使是这样,宣传工作也许仍需基本上在城市里进行,因为要把讯息传到农村去几乎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在城市进行宣传的目的在于使居住在城市里的产业工人变成宣传者,让他们在回农村时向农民展开宣传。他们原是从农村到铁路上或其他城市行业中工作的,常回农村去。

然而在实践中，不管上述基本问题是怎样解答的，互相对立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集团主要都是在城市里进行宣传并接触“人民”的，原因是农村无法接近。但是他们进行鼓动时，立场是对立的，而且对社会主义和对俄国的命运也具有不同的看法。此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俄国的工业很落后，而当局又防范严密，工人组织只要一出现，几乎就立刻加以破坏，因此甚至连知识分子在城市中接触也很困难。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大多只能满足于本身之间的探讨辩论，或是研究那些通过了当局检查的文件，以及那些自动出国或从国内流放地外逃的流亡者团体所偷运进来的文件。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下狱，拉甫罗夫流亡以后，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年)在留居俄国国内的著作家中就跃居首位了。他从1869年起至1883年止连续不断地为合法刊物《祖国纪事》写文章。后来从1890年起至去世时止主编《俄国财富》月刊。从1879年到1883年，他还常常为民意党的非法刊物写文章，民意党是1881年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恐怖组织。在整个时期，他始终能设法逃过逮捕，并能使自己的著作通过检查，当然，他的文章并非没有遭到删节，而且他也大量使用了遁词，并故意避免评论危险的题目。他的社会思想分散在大量的文章中，其主要形式是文艺批评和一般的社会学论述，从来也没有正式汇总在一起过。要全面地把他的思想整理成首尾连贯的理论体系并非易事，但其主流倒是很清楚的。

在一些已经发表的论述中，米海洛夫斯基往往同拉甫罗夫一起被列为“主观社会学”俄国学派的创始人；为了正确评价他的影响和围绕他的学说所引起的争论，有必要尽可能弄清楚这一提法的含意。所谓“主观”在这里当然是同“客观”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就被当成同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主义相对

立的“客观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客观的”，就是因为它把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影响归之于客观力量，主要是“生产力”，而不归之于思想家个人的主观思想。米海洛夫斯基则是一个主观主义者，这倒不是因为他否认这些客观力量的影响，而是因为他强调个人的创造性活动同人类头脑中所形成的观念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依的关系。此外，当他谈到那些他自己认为是客观的因素时，他坚持把经济因素仅仅当作是客观环境中的一个因素，而客观环境则把本身的特性加在人的社会组织和行为上。除此以外，就另一个意义来说，米海洛夫斯基也是一个主观主义者，他大力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中所能找到的唯一有知觉的存在就是作为个人的男男女女，一切社会团体说到底无非是许许多多在一起活动的个人而已。除了组成团体的个人的客观真实性以外，他否认团体还有任何客观真实性；此外，至少是根据这一提法的含意来看，他也否认社会阶级作为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因素的真实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的确是他的谬误的症结所在。

然而米海洛夫斯基在其他时候好象又说，社会团体的确具有一种不同于成员个人的客观真实性。这番话是他在论述人类社会生活的生物基础并利用恩斯特·海克尔^①的生物分类法的时候写出的。他利用这种分类法把他所谓的“集体”或“群落”，也就是社会团体，当作有机发展的最高阶段——就好象人或者动物凌驾于本身的各个器官组织之上，并把它们统一起来，受共同的控制一样，社会团体也是凌驾于人(或动物)之上的有机体。在其他地方，米海洛夫斯基一再否认社会或任何团体是“有机体”，而在这里他似乎是在说恰恰相反的话。原因是米海洛夫斯基并不否认，从生

398

^① 恩斯特·海克尔(Ernest Haeckel, 1834—1919年), 德国的大自然科学家, 卓越的达尔文主义者, 著有《人类起源说》、《有机体普通形态学》、《宇宙之谜》等。——译注

物学的观点着眼,社会可以具有凌驾于单独成员的有机体特性。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事,而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运用创造性的意志去维护个人的独立,社会就能够避免这种命运。米海洛夫斯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独立个性有被剥夺的危险,因为他仅仅成了超个人的“集体”的一个器官,这种“集体”强使他接受劳动分工,剥夺他完整地满足自己的天生倾向的机会。米海洛夫斯基认为个人有能力同这种趋势作斗争,使自己的要求同对自己也是不可少的社会要求调和起来。由于他认为社会在发展中受到人类创造意志的影响而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心理组织,而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组织,所以他也认为,运用个人的推理和创造能力乃是摆脱单纯服从那种牺牲个人而构成生物整体的力量的方法。

当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错误的。的确,马克思关于经济决定论的概念在马克思自己的思想中丝毫不排除人的作用。他坚持说“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马克思把有创造性的个人当作阶级的代表看待,并把阶级本身当作具有创造性作用的客观的历史力量。他这样做是想把经济唯物主义同人的能动性调和起来。就米海洛夫斯基这方面来说,他也提出了一种决定论以及一种科学的和反形而上学的史学观点;但是对他说来,必然性的概念是主观的。支配社会发展的是心理必然性,而不是经济必然性;历史的巨大推动力是个人为了满足肉体和精神的需要而做出的努力。

这种心理学的观点还同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不喜欢的另一种观点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坚持伦理抱负具有创造性的意义。米海洛夫斯基象拉甫罗夫一样,反复强调进步的概念除非以伦理评价为基础,否则就毫无意义。特别是在批判赫伯特·斯宾塞和达尔文主义者(也就是批判那些企图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概念当作社会理论的基础的人)的过程中,他发挥了这个论点。他论证说,一个有 399

机体或社会日益复杂并不能证明它的优越性；适合于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也绝不等于有生存的价值。有教养的个人认为好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好的东西并不是“自然”有所嘉惠的东西，因为“自然的”偏爱同人的抱负并不是一致的。人的使命是征服自然，使自然为人的目的服务；这些目的本身包含伦理因素在内，是以个人思想所认可的价值为依据的。当然，这种评价仅仅是相对的，受评价者生活所在的具体环境的影响很大，但是这种主观的相对性并没有使评价失去作用或妨碍它们成为历史的动力。

在原始社会和先进社会之中，在动物和人类之中，米海洛夫斯基都找到了这些心理动力以及它们的伦理内容的证迹，拉甫罗夫更是如此。但是米海洛夫斯基认为，心理动力在未来的社会中注定会具有更加全面的形式。在他看来，社会上善于思维的个人的任务，就是找出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的方式，把整体和整体以内的团体的要求同个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过自己的生活的个人——的需要协调起来。他认为，在比较原始的社会中，劳动的社会分工所采取的主要形式是，由一些人进行合作以完成类似的工作，其中的每一项工作都仍不失为一种同自由协作的意识相符合的自我表现的完整手段。与此相反，在大规模工业社会中，劳动的再分工却使工作失去了表现个人的价值，从而使个人失去了完整的个性。在这里，“工作”这一概念应该理解为，不仅包括产业方面的雇佣关系，而且也包括现代世界中日趋普遍的过分专业化的趋势。比如，米海洛夫斯基在讨论两性关系的问题时便运用了同样的概念。他说爱和被爱的愿望是一种基本的冲动，在比较原始的社会中，这种愿望在家庭群体里得到圆满的表现，其中两性的职能没有作不适当的划分。这种职能划分得越鲜明，丈夫和妻子在共同的工作中的共同之处就越少，每一方为了找到圆满的关系而有待于另一方的地方也就必然越大。因此，在现代社会最先进的群体中就普遍存在

失望和男女关系不贞的情况，这种流弊的补救之道只能是减少职能的人为划分，并使男女再一次在更高的水平上在两性关系和社会活动中都成为伴侣。所有这一切都是米海洛夫斯基的“个人主义”中的一部分；这使他强烈主张在大社会中实现小群体内部的社会合作，而极力反对那些把分化过程本身误认为是进步的人，同时也拒不承认工业化是人类解放道路中必然阶段。他偏爱农业而不喜欢工业，偏爱手工艺而不喜欢工厂生产，因为农业和手工艺符合那种排除大规模操作所引起的瓦解性再分工的劳动分工。

强烈反对把分化过程推崇为进步的标准，并不是米海洛夫斯基同当代倡导进化论的人进行争论的唯一根据。他还大力反对这些人错用生物学的类比来说明和评价社会现象。他坚持说，心理学不是生物学的一个部门，而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但社会学作为评价社会的一门学科来说，却必须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这番话是他在批评孔德的实证哲学时说的。他同意，在讨论某些生物法则时，可以运用适合于确定无情事实的那种实证的归纳法，而且这类生物法则在其本身的适当范围内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一旦我们把人类当作个人来进行研究或是从他们的社会关系出发来进行研究，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领域，在这里主观价值和客观事实必须同样加以考虑，而且事物“应该怎样”和事物“实际怎样”这两个问题完全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达尔文从自然选择和偶然差异的角度来解释生物发展过程的观点在这儿是不适当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米海洛夫斯基，就象他的大多数同代人（其中包括斯宾塞）一样，相信的是拉马克派的进化论，而不是达尔文派的进化论。他相信后天习得性可以遗传，相信有机体个体有能力通过努力适应环境的改变。即使他认为这一点在生物学上是不正确的，他也仍然认为它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上是正确的。他的主要论点不是生物学的，他的论点是：人类具有智力，能使自己适应社会环境并塑造社

会环境，同时还可以把自己对适于生存和适于繁荣发展所具有的伦理标准加之于社会。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攻击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偏重拉马克的主张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倒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适者生存”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的竞争条件下也同样适用，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唯物史观是生物学方面的达尔文主义在社会方面的相关理论。恩格斯曾反复宣称，马克思为社会科学做了达尔文为生物学所做的事情。达尔文学说的决定论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似乎是相符的，同从“经济物种起源论”的角度去研究历史的观点似乎也是相符的。这种说法是非伦理性的和非理想主义的。它强调客观环境的形成力量，而不强调个人思想的创造能力。这看来同先有“物质”，然后才由物质产生思想的想法是一致的。此外，虽然达尔文本人并没有完全贯彻其逻辑推理，因而没有成为无神论者，但是上述论点却提供了一种有关大自然运行的说法，使得宇宙摆脱了上帝，并使人们易于把宗教说成是阶级观点的表现——说成是统治阶级所提供的“人民的鸦片”，当作现政权的辅助工具。然而米海洛夫斯基从自己的心理学观点出发，却把宗教当作一种精神事实看待，它满足了个人的实际的——因而也是真实的需要，所以不能仅仅把它解释为建立在经济关系的基本现实之上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米海洛夫斯基不是一个“宗教信徒”，他对宗教的看法接近孔德，而孔德的看法又来自圣西门，圣西门则是吸收了孔多塞观点的消极部分。米海洛夫斯基一方面看到科学知识的进展不断把宗教中的超自然因素抛向后面；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宗教冲动在人身上是根深蒂固的，而且不断在寻求符合于变化中的社会关系的新表现方式。他说，从历史上来看，每一种新形式的社会关系的出现，都伴随着新宗教思想的传播。他解释这一点说，宗教是“事物的实

际情况同它的应有情况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换句话说，他把宗教看作是使科学知识和指导行为的伦理原则统一起来的手段。他写道，“精神生活中的这两个不相关的部分必须统一起来，而做到这一点就是宗教的职能”。自然，马克思主义者是根本不相信这一套的^①。他们完全否认伦理信条的独立性。但是这种宗教职能观同米海洛夫斯基相信个人有责任不断去发现伦理价值的信念配合得天衣无缝。

米海洛夫斯基把这种发现伦理价值的过程看作是个人的任务，这些人能先于时代想出一些概念，并能使自己的同胞模仿和采纳这些概念。他大力强调个人得出新伦理概念的创造性能力以及群众接受“英雄”的规劝的感受性。这种“英雄”相当接近于马克斯·韦伯后来提出的“具有感人的超凡魅力”的领袖这一概念。但是米海洛夫斯基所设想的“英雄”并不限于感化人行善的领袖人物。他写道：“所谓‘英雄’就是以本身的榜样打动群众，使他们行善或行恶，从事崇高或堕落的活动、采取理性或非理性的行为的人。”他明确地否认自己说这番话是为了恢复托马斯·卡莱尔等人所传播的“伟人”创造历史的学说。他说，“英雄”或“伟人”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在当代环境的影响下在地上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高度体现了社会形势中所包含的又是群众愿意起而响应的情感、思想和愿望。“一个为非作歹的人、一个白痴或者一个疯子，只要群众追随他，死心踏地地信服他，模仿他和崇拜他，这个人就可以象一个举世闻名的天才一样重要。”米海洛夫斯基接着又说明，暴众是怎样不管好歹选择自己的“英雄”的。他断言每个人都渴望一种理想，这种渴望会在一个人的身上寻求体现，此外当普通人的生活越是单调而不能令人满意的时候，他就越是

^① 虽然卢那察尔斯基集团后来说了一些与此很相象的话。

愿意服从有才能成为代表人物的人。他还论证了演说的催眠作用，并试图用一种半数学的方式去解释群众情绪的强度。他特别根据中古时代的群众很容易接受跳神者、苦鞭会修士和其他煽动群众情绪的人的影响这一特性来说明他的总的理论。

因此，根据米海洛夫斯基用字的含意来看，“英雄主义”既是善的源泉，也是恶的源泉。他对英雄主义产生有利作用的希望以两点为依据：一个是人能够对道德上非理性的和理性的影响作出反应；其次是启蒙作用的传播是一个促使道德改革家击败其对手的因素。但是他认为，行善的“英雄”所需掌握的群众如果主要是由一些习惯于进行有意义的合作工作而使生活完美的个人组成的，则英雄获得成功的希望就非常大；如果过细的再分工使得个人仅仅成了一个“人手”，从事本身毫无意义的琐屑劳动而不能在全体工作者都能理解的完整工作中直接同伙伴合作，则英雄成功的希望就非常小。当然，这种看法同他对工业制度的憎恨以及如下信念是相一致的：农民和手工艺者，不管多么贫困，都仍然能从完整的有意义的活动中得到满足。

同样明显的是，米海洛夫斯基想象中的“英雄”——我们现在应该称之为“精华人物”——同他那个时代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是符合的。那些知识分子是新思想的提供者，他们的任务是以人民群众所能接受的方式提出这些新思想，以便在办得到的时候使自己成为英雄。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关于再分工和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对人类思想的影响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知识分子的进步思想在农民和手工艺者中间所得到的反应就会比在大规模企业所雇用的工人中间更好，除非后者仍然具有农民思想，并且同自己的故乡保持接触。即使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纯粹由于在农村中进行宣传很困难而不得不主要在城市里工作，他们也应该向仍然保存在产业工人中的手艺工人和农民呼吁，而不应该向工业无产阶级本

身呼吁，他们非但不应该促进俄国的工业化过程，反而应该尽最大努力去阻挠这种过程。

由此可见，米海洛夫斯基的理论就直接引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最有希望的前途不在于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发展工业结构，而在于建立一支革命的中坚队伍，他们一心直接跃进到农业社会主义，而不经过资本主义的中间阶段，也不要农业本身的资本主义化。这就意味着保持农民的财产权，但又设法使衰落的农村公社组织——米尔——获得新的生命，从而使农民的财产权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还要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鼓励农民发展合作事业，这种合作事业必须通过农民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而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强加给农民。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知识分子需要同“人民”中比较明智的人接触，从而扩大那支能够逐渐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中坚队伍，农民接受新思想是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

显然，这些走向社会主义的总的思想，实际上可以作一些完全不同的解释。从一个极端出发，这些思想可以解释为：足以证明有理由采取恐怖行动去动摇沙皇专制制度的信心，破坏这种制度的效率，从而鼓励自发性的农民暴动。有些人最重视米海洛夫斯基所强调的个人的创造性作用，他们可以认为恐怖主义的个人行动同为善的“英雄主义”的条件相符合。如前所述，米海洛夫斯基本人就经常给民意党的秘密刊物投稿。但是只有少数鼓吹恐怖主义的人具有这种极端的看法。大多数人则认为，只有在运动别无其他出路而迫不得已的时候，或是为被捕后遭受酷刑或被处决的革命者进行报复的时候，或是对特别残酷的沙皇官吏给予制裁的405时候，采取恐怖行动才是有理由的。诚然，有许多人实际上反对把恐怖行动当作一种政策，但却拒绝坦率地谴责这种政策，因为他们不愿意反对实行这种政策的理想主义者，或是同反革命者一道对

这些政策大肆攻击。

从另一个极端出发，又可以得出结论说：正确的作法是忍耐，利用政府的高压行动所没有扼杀的一切机会来建立社会组织，以帮助在农民中间发展新的合作活动的精神，并同比较开明的地主进行合作以保持农村中的公社因素，设法通过地方自治局^①促使农村地区的地方政府开展普及教育的工作，尽最大努力阻挠大规模工业和金融事业的发展。

在上述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中间道路。民粹派的主体既不是由采取实际行动的恐怖分子组成的，也不是由那些持进化论的合作派人物组成的。组成这一主体的男男女女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去发展一个主要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认为革命的唯一希望在于农民不满情绪的增长和建立一支有组织的中坚队伍，其人数和力量要足以成为兼顾各方的领导。

在流亡中从事写作的彼得·拉甫罗夫(1823—1900年)，是上述中间类型的民粹主义的杰出理论家，而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则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立场更左，但并没有站在恐怖主义的极端立场上去。在本书第二卷^②里，我们已经略略谈到了拉甫罗夫。我们在那一卷里看到，1870年，他逃到了国外，后来在巴黎定居下来，创办了《前进》杂志，这个杂志成了民粹派运动的主要理论刊物。起始，拉甫罗夫赞成渐进论。他要求进行长期的教育和道德宣传工作，认为这是必须为革命做的准备。但是在沙皇的专制主义封闭了和平鼓动的一切道路以后，他的看法就逐渐发生了变化。他虽然在民意党针对沙皇发起恐怖运动的时期并没有参加这个党的活动，但1881年以后却支持在国外重建这个党的

^① 地方自治局是农村的地方行政机构，受地主和官吏的控制。但是在1905年出现时，其中有相当多的“开明”人物。

^② 见本书第二卷第56页及以下。

尝试,而且在1884—1886年间,同列甫·吉霍米罗夫一道在伦敦合编《民意》杂志。然而,拉甫罗夫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的历史著述:在于他离开俄国以前所写的《论史信札》,也在于他在1900年出版的《思想史中的主要时机》等等。拉甫罗夫是用一些笔名写这些著作的——《论史信札》用的是米尔托夫,《重要时机》用的是A·道兰基,其他著作用的是阿诺尔迪和舒金。他计划在一部综合的《思想史》中系统地叙述自己的主要思想,而把所有已竟篇的著作当作导论,但是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述始终没有写成。

正象米海洛夫斯基一样,拉甫罗夫特别强调事实同价值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重视科学同道德之间的关系。他坚持许多真理具有绝对性,不管人是不是了解这些真理,它们都是真实的,即使人们完全忘记了也仍然是真实的。但是他把这些真理同另外一些真理对立起来,后者包括主观因素,只有在一定的时候和一定的社会形势下对问题构成正确的答案时才是真理。他认为,制定历史法则的尝试就属于这一类相对真理的范畴,其中包含大量的主观因素。历史学家——他指的是史学理论的制定者——并不仅限于确定事实,他们还选择事实,并以特定的方法对事实进行分类,以便解答具体的问题,至于那些在他们看来对所提问题无关宏旨的事实就被忽略过去了。因此,他们所得到的真理实质上是选择性的,而不是普遍的,他们进行选择时,受到他们自身道德观的引导。拉甫罗夫论证说,历史学家无法逃避这种必然性,否则就只能满足于作一个编年史作家。因为如果不作出选择,或者不提出决定问题性质的道德概念,历史学家就不能使事实具有意义。但是这项工作不能漫无章法地进行,而是应该在客观地研究某些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这些事实属于那个可以用绝对真理加以说明的范畴。

上述区别使拉甫罗夫陷入了无尽无休的有关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争论之中。他认为,宇宙是一个从机械论的观点来看已被确

定了的结构,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科学研究,旨在确定那些可以加以验证的法则。但是他也认为并不是一切事物都能用这种方法加以研究,尤其认为,社会现象必须结合它的历史发展加以研究,结合人类日益考虑本身的行为并在考虑的过程中改变本身的行为这一事实加以研究,否则就无法理解。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规范问题的学科,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的幸福,它的课题就是要找出社会群体的团结和个人的行动自由这两者之间的正确平衡,这种平衡必须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地重新加以讨论和调整。他认为,团结的本能——也就是组成群体的要求——在人类之中是普遍存在的;不但为人类和高等动物所共有,甚至也为人类与低等动物所共有。他从生物学的观点出发,把一切有机体都看作是从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相同单位所构成的“群落”发展出来的。他跟米海洛夫斯基不同,认为社会是个有机体,在心理上是休戚相关的,以群居共处的快慰或满足为基础。人类社会的特点就在于有能力把这种来自休戚与共的关系中的原始快慰感发展成为高级的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在习惯中形成,在宗教仪式中得到承认。但是人不仅形成习惯来加强他们的团结,而且还改变他们的习惯——说来这是矛盾的,因为习惯的本性就在于抵制改变。那么改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基本上在不知不觉中积累起来的小变异中形成的;这种变异在实践中逐渐被接受,然后便在人类的思想中取代了旧习惯的地位。因为适应不断改变的环境的必要性虽然促使人类在实践中采取对应办法,从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但毕竟是团结的本能使得这些行为的改变被承认为传统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种本能也使具有批判能力的思想家力图把一个民族的整个生活方式组织成一种没有矛盾的制度,比如希腊人在哲学方面、罗马人在法律方面,以及中古时代的教会在经院哲学方面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现代的世界,至少是西方,曾力图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构思出

一套包罗一切的团结思想,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这种思想就形成了阶级团结的思想,为民主制度成为有意识的团结的最终表现形式铺平了道路。

但是拉甫罗夫认为,这种建立社会团结关系的历史趋势不过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方面。与它并行的是争取个人自由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生物和心理基础就在于发现人类需要一种神经上的刺激,这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的共同特性,它促使同一种或同一群体中的个体采取不同的行为。人类的个性和高级生活的整个基础就在于此。物种越高,其中的个体就越不会同意单纯地成为一员而服从于社会的压力。个体来自集体,而且为集体所塑造,但是个体也违抗集体的支配而表现出自己的好恶。于是,个体由于反对社会并在反对的过程中改变了社会,便在历史上成为发挥作用的社会力量。在这一点上,拉甫罗夫的思想同米海洛夫斯基是一致的,因为拉甫罗夫说,从事革新并教导和说服同时代的人乃是具有批判精神的开明人士的责任。拉甫罗夫学说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开明人士对社会负有责任,他们必须从事革新和宣传,这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给同胞谋福利。

拉甫罗夫认为,从历史上来看,这种革新精神实际上常常既造了福也为了害,因为它被误用来促进人数有限的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但这却是进步的唯一泉源;因此,人们的课题便是怎样发挥它的用途,以便达到值得向往的社会目标。首先,这就需要改革者认识到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实际限度,也就是说,他们必须理解那些决定社会变革的总进程的法则,并设法在这些法则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工作,而不应凭主观臆断去工作。第二,这也需要改革者认识到社会团结的必要性,认识到如果这种团结遭到破坏,如果他没有能和一批同道共同工作,他自己的幸福就会受到威胁。他必须在一个大体上具有相同思想的群体内找到自己

的位置并进行工作；他同这个团体中的其余的人一样，必须认识到有必要在整个社会的大统一的范围内展开工作，还必须同整个社会大体上协调一致，哪怕当他设法在某些方面来改变它的时候也是这样。拉甫罗夫认为，整个社会具有维系团结的坚强纽带，而社会内部也存在着促成变革的活跃的精神活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矛盾之处。事实上他认为，历史证明唯有团结同社会批评协调一致的社会才是进步的社会。

这里关于拉甫罗夫社会学说的简要叙述，应该同我以前在本书第二卷中所作的有关他的说明结合起来阅读。我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他的关于个人的创造性作用的概念以及他是怎样力图把这一概念同经过修改才予以接受的社会决定论调和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里，他的严重错误在于他的理论根本不重视阶级是社会改革的工具这一点；更确切地说，当他确实从这一角度谈论阶级时，他认为阶级往往会使革新走入歧途，不是去增进社会的总体利益，而是去增进部分利益。当然，拉甫罗夫的关于团结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的整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激烈谴责的。他们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否定社会阶级的创造性职能的说法。这种反对阶级观点的说法后来成了民粹派许多思想的特色，再往后又成了社会革命党许多思想的特色。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俄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认识。六十年代，赫尔岑曾在《钟声》杂志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俄译本。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获知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持续不断的活动，主要是通过马克思同巴枯宁之间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斗争。巴枯宁本人曾作过一些事情，向马克思的俄国门徒宣传马克思；我们已经谈过，在《资本论》于1867年问世以后，巴枯宁实际上已经着手把《资本论》翻译成俄文。马克思同俄国的流亡者，特别是同尼古拉斯·吴亭及其在日内瓦的反巴枯宁小集团

有过一些接触。但是在俄国不仅没有马克思主义运动存在，而且 410
连深受马克思思想影响的集团也没有。至于马克思本人，我们已经谈过，他对俄国的反感是多么强烈：他不仅厌恶沙皇制度，而且也厌恶俄国人的气质。1870年，当日内瓦的吴亭集团请他在第一国际的总委员会中担任俄国的代表时，他感到非常吃惊。他接受了这一委托，并且说服总委员会接纳吴亭集团加入。后来《人民事业》报发表了他接受邀请的信，他在信中力主俄国的社会党人努力把波兰从俄国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他写道：“俄国以暴力侵占波兰，是对军事统治在德国的存在，因而也是在整个大陆的存在的极有害的支持，并且是这种统治存在的真正原因。因此，俄国社会主义者在致力于粉碎束缚着波兰的锁链的同时，也就担负起消除军事统治的崇高任务，而消除军事统治乃是欧洲无产阶级共同解放的一个十分必要的先决条件。”^①

马克思在把这次通信告诉恩格斯的时候，进一步写出了他的真实思想：

做一个青年俄国的代表，这种地位对我来说可真滑稽！根本不知道会把你引向何处去，会使你掉进一群什么样的怪人的圈子里。在正式答复中我……强调指出，俄国支部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波兰工作（就是说，把欧洲从它自己的邻邦解放出来）。我认为，不管是在公开信里，还是在机密信里，都只字不提巴枯宁是较妥当的。^②

马克思同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联系就是这样开始的，这种联系又由于如下事实而得到发展：1872年出版了尼古莱·F·丹尼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3页。——译注

② 同上书，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2页。——译注

森(1844—1918年)所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俄文本。丹尼尔森更出名的名字是尼古-逊,后来成了民粹派的首要经济学家之一。他也经常同马克思通信,并且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继续同恩格斯通信。马克思曾经为了根据原文资料研究俄国的土地问题而学习俄文,后来他为维拉·查苏利奇所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本写了序言,其中有一段很著名,涉及到是否有可能把米尔变成更高级的村
411 社形式,从而使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毫无疑问,马克思写这段文字时曾受到丹尼尔森的影响。

丹尼尔森写了大量关于俄国经济情况的著作。他的主要著作是《农奴解放后的俄国经济发展史》(1893年),已经有法文译本。在这本书里,他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认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正在迅速地破坏传统的农民公社的残余,而资本主义又决无希望成功地代替这种公社,因为俄国的国内市场很有限,而且在工业生产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落后于西方国家。他论证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会破坏农民和手工艺经济(这种经济往往依靠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互相配合),从而也就把它唯一有希望出售成批生产的商品的市场破坏掉了。他相信,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银行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方法的渗入农村,只会在原来一片贫困景象的农村中建立起生产力很高的孤立区。他强调工厂生产的趋势将是以工资低廉的女工和童工去取代成年男子的手工艺者,从而扩大城市失业人数,降低城市生活水平。他的结论是工业化只会成为一种瓦解的力量,最大的希望就在于这种瓦解会导致以农民为主的革命,并在已经岌岌可危的但还没有完全破坏的农村公社的基础上重建俄国经济。

这些见解代表民粹派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最初,这些观点给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留下深刻的印象,促使马克思在1877年写

道：“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①后来，到了1882年，马克思在为《共产党宣言》的俄文本所写的序言中对这个问题又这样说道：

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②

恩格斯在同丹尼尔森的通信中发挥了马克思的答复，并根据此后十年俄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修改了这个答复。恩格斯论证说，如果俄国人掀起革命的话，他们只有在比较先进的西方所取得的革命胜利已经提供了一个共产主义农村农业的模型供他们效法时，他们才能成功地建立所要求的俄国农村的共产主义结构。他又说，事态的实际发展并没有证明，丹尼尔森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范围狭窄的结论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保护性关税的支持下，建立起吸收产品的市场。恩格斯进一步着重指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破坏旧的农村公社方面所采取的长远步骤为民粹派的解决方案设置了更多的障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9页。——译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页。——译注

在这个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本身有了发展，丹尼尔森又碰上了其他对头。他遭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彼得·司徒卢威以及普列汉诺夫的攻击；此外，列宁在自己早期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著作中也对他进行了攻击。十九世纪后几十年，俄国农民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以及使人不堪重负的赋税而趋于贫困，这一事实使丹尼尔森的见解受到了影响。他把农民趋于贫困这一现象既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一条“法则”，阻碍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足够的市场，又看作是那场俄国的资本主义太虚弱而无力予以抵抗的农民革命的起因。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农产品价格的趋势扭转了，资本主义的确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此外，在敌视工业制度的观点中，丹尼尔森过分估计了它的瓦解作用。他的民粹派同道瓦西里·巴甫洛维奇·沃龙佐夫(1847—1918年)就曾经指出这一点。早在1882年，沃龙佐夫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命运》一书就出版了。总的说来，沃龙佐夫的看法跟丹尼尔森相同，认为俄国的资本主义由于存在着国内对其产品的需求太少这一固有的趋势，以致不依靠出口市场就无法生存，而面对着基础比较稳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它又无法打入国外市场，因而资本主义在俄国无法得到成功的发展。沃龙佐夫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能够发展到一定程度，但是他认为这毕竟是一种依靠高度保护措施维持的病态发展；即使是这样，也还要依靠狠狠剥削廉价劳动力，而且要遭到严重的周期性危机。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指责这些看法，认为这不过是西斯蒙第的已经破了产的小资产阶级消费不足论的复活罢了。

除了关于资本主义的著述以外，沃龙佐夫还写了许多关于俄国农业、俄国手工业、以及手工业行业组合的著作。他是合作事业的一个主要鼓吹者，他相信俄国的农业耕作法所固有的合作趋势可以作为技术发展的基础，足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无需

资本主义插手。他认为，农村就能够使生产和消费实现高度的平衡，不需要依靠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的交易活动和金融活动。他的《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技术》(1892年)一书提出了他对这方面所抱的希望，这是他在广泛调查了实际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提出的。在政治上，他站在民粹派的右翼。他原先学医，最初在地方自治局中当官员，后来成为一位职业统计学家。他曾经向拉甫罗夫的《前进》杂志投稿，但是当民粹派主张采用他本人认为徒劳无益的恐怖方法时，他就同民粹派的主体决裂了。

当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作为一个运动严肃地发展起来的时候，丹尼尔森和沃龙佐夫是民粹派两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这个运动的初期发展情况是很难追溯的，这既是因为它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而且在一开头只是一股势力，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此外，这也是因为它的初期历史曾被大大篡改，以求符合党的正确路线。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运动在俄国出现，现在一般可以追溯到土地与自由党分裂的时候。当时包括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在内的一部分人决定反对热里雅鲍夫的恐怖主义政策，成立了一个土地重分社，建社纲领是把解放农奴时交给地主的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这一点当然只被当作第一步，是在农民和城市中具有农民思想的工人中间进行宣传的依据。这样的纲领显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在内；土地重分社之所以能同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普列汉诺夫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俄国的主要宣扬者。不管怎么说，这个社并没有存在多久；1880年，普列汉诺夫流亡国外，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直接联系，很快就完全转变态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接受了关于产业无产阶级以及这个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夺取政权的斗争这一重要的中心论点。

格奥尔基·瓦连庭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7—1918年)，后

来很快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主要阐释者，而且不久又在西欧的社会党人中间成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1875年，他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时成了民粹派，他的事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既积极参加地下活动，同时又担任好几家秘密刊物的编辑。在热里雅鲍夫集团成功地暗杀了亚历山大二世以前，他就离开了俄国，流亡国外，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才回国。他基本上是一个理论家，而不是一个组织者或革命领袖。后来他又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的主要说教者和马克思主义左派的主要捍卫者。他不仅反对民粹派，而且也反对马克思主义教门之内的形形色色的敌人，从彼得·司徒卢威类型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之流的哲学异端。他还极力攻击这样一些人：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以及他们的社会学理论；马尔丁诺夫之流的所谓“经济主义者”（他们希望集中精力进行工人的日常斗争以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人的状况）；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崇拜者；克鲁泡特金之流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普列汉诺夫攻击了所有反对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或异端，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主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中的表现而得来的。必须记住，当普列汉诺夫开始了解德国人的时候，德国人仍然在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者法的压制下工作，这个法律迫使他们走出国境，在瑞士建立党的总部，而在德国国内则组成地下党，尽管他们能够竞选帝国议会的议席，并能在帝国议会的辩论中自由发言。虽然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的情况同俄国大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公开搞社会主义组织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就使德国的党有了一个令人产生误解的革命面貌，并且使它的理论家如考茨基之流使用了并非完全真诚的很容易被误解的革命词句。普列汉诺夫本人后来就表现出，他的那套革命主义在十九世纪八十

年代和九十年代看来虽然非常坚定,但事实上却更接近于考茨基,而不是更接近于后来被称之为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但是直到俄国社会民主党发生争吵,从而在1903年以后出现分裂时,他作为左翼马克思倡导者的地位始终没有受到过怀疑。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普列汉诺夫跟一些同样过流亡生活的同道携手合作,其中包括巴维尔·波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5年)和维拉·查苏利奇(1851—1919年)。阿克雪里罗得是一个犹太旅馆老板的儿子,年轻时曾追随巴枯宁,后来又经历了一个民粹派阶段,接着便受到拉萨尔思想的强烈影响。他在土地重分社里同普列汉诺夫合作。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个三人小组的第三名成员维拉·查苏利奇为了替政治犯博哥列波夫所受的体刑报仇,曾在1878年暗杀圣彼得堡地方长官特列波夫,后来被一个陪审团无罪释放。她的无罪开释使得沙皇政府从此不再用陪审团去审讯政治犯;她在开释后便悄然离开了俄国。1883年,上述三人同列夫·格里高尔维奇·捷依奇(1885—1941年)、瓦·尼·伊格纳托夫(1854—1885年)以及一些其他人成立了劳动解放社。第二年,劳动解放社发表了一个大体上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为基础的纲领。在这以前,普列汉诺夫从1883年就已经开始一长串著作的写作工作,旨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系列著作的第一部是《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第二年又写了《我们的分歧》,在后一著作中他力图清算民粹派的论点。普列汉诺夫的这两部著作既反对恐怖主义,又反对无政府主义;他也反对“雅各宾派”,这一派认为革命就是由武装起来的少数人夺取政权,无需依靠有觉悟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支持。普列汉诺夫坚持说,只要广大工人还没有觉醒过来,这样的军事政变就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他已经完全转变了态度,相信必须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以德国人为榜样,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为即将来临的革命

作好准备。

1887年，劳动解放社发表了一个经过修正的纲领，力图解决产业工人同农民的关系问题。这个纲领显示了民粹派学说继续起作用的痕迹，也显示了这个社企图摆脱这种影响的痕迹。他们宣称，“专制制度的主要堡垒在于农民对政治的冷漠态度和他们在知识上的落后。”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说法，结束这种局面的希望在于农村和工厂之间当时仍然存在的联系。“无产者当初是作为公社的一无所有的社员被赶出农村的，而现在则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鼓动者回到农村去。无产者以这种身分出现，就使公社前此毫无希望的命运发生变化。只有在公社的瓦解本身能够产生一支足以结束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的群众力量时，它的瓦解才是必然的。”

417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外都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同民粹派相对抗。但是运动的性质仍然没有明确；组成运动的各个团体，在国内和在流亡者中间不断在瓦解，又不断重新组织起来，而且出现和消失的速度之快都使人眼花缭乱。八十年代是俄国的资本主义获得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主要得力于法国财源的支持。凡是工业形成大规模企业的地方，社会主义者很快就着手工作，组织战斗小组，其中有些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有些由民粹派领导，但是还有许多团体在理论上根本没有明确的从属关系。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工会在七十年代已经开始出现：1875年以敖德萨为中心成立了俄国南方工人协会；1878年在圣彼得堡成立了由斯切潘·哈尔士林和维克多·奥勃诺尔斯基领导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①。大约在1880年，谢德林和柯瓦尔斯卡娅在基辅组织了一个新的南俄工人联盟。所有这些团体都是短命的，警察逮捕了它们的大多数领袖之后就使它们瓦解了。十九世

^① 见本书第二卷第319页。

纪八十年代，尽管进行镇压，罢工仍然更加频繁起来。从1881到1886年，共发生了48起罢工，参加罢工的有80,000工人，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885年奥列霍沃祖耶沃城的莫洛佐夫纺织厂的罢工，领导这次罢工的是北方工人协会的前会员彼得·莫伊先科。当局调来了军队进行镇压，逮捕了600多人。在这些年里，举行罢工主要在于反对经济萧条时期削减工资的作法，这场危机出现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行将结束的时候。

这个时期的罢工主要是社会主义者领导的，但是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宗派能一手操纵这些罢工，当时兴起的短命的工会也没有任何明显的政治从属关系。存在于大多数城市中的秘密团体彼此之间也都没有能在政治上建立经常的联系，尽管大多数团体同国外的流亡团体都有一些接触。这些流亡团体不断把非法的期刊和小册子偷运入境。最活跃的中心是乌克兰的基辅，黑海上的敖德萨、莫斯科及其周围的地区（纺织业的主要中心），而特别突出的则是圣彼得堡，当时它正开始发展成为重工业中心。铁路的修筑使交通比以前方便了，也使社会主义的鼓动者得以遍布全国，但是圣彼得堡同外界的联系毕竟更加密切，因而成了社会民主党宣传的主要中心。1885年，N·V·沃多沃佐夫在这个市组成了据说是第一个明确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第二年，另一个团体在托切斯基的领导下成立，此人活了下来，参加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并在革命中牺牲。但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国内最重要的两个团体却是布拉戈耶夫和勃鲁斯涅夫所分别领导的团体。季米特·布拉戈耶夫^①曾出版过一个非法的刊物《工人报》，1887年他的组织遭到警方的破坏。他在自己的团体遭到破坏时逃往保加利亚。后来成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位领袖。他死于1924年，继他而

^① 见本卷下册第十四章。

起的是工程师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勃鲁斯涅夫（1866—1937年）。勃鲁斯涅夫所领导的组织存在于1888—1892年间。上述两个团体同日内瓦的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都有联系。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开始情况就很不妙，1891年广大地区发生饥荒，霍乱到处蔓延，嗷嗷待哺的农村以及城市骚乱纷起。这一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企图组织一个国民权利党，把开明分子和革命主义者团结起来，从事宪法改革的共同斗争。他们出版了一份报纸和一些小册子，但是在1894年遭到取缔。大约在1892年，民粹派在俄国北部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印发了一系列秘密传单，名叫《快报》；但是各个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的成长却迅速得多。1893年，一个新的罢工运动开始了，1896年发展到高峰，出现圣彼得堡纺织工人大罢工。这时列宁第一次以社会民主党鼓动者的身分出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年）——更为人们知的名字是列宁——在喀山大学求学时代就已经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由于暗杀亚历山大三世失败而于1887年被处决，这促使他的弟弟投身革命事业。列宁被开除出喀山大学后，最初到了萨马拉，在那里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1893年底又前往圣彼得堡。两年以后，他把自己在那里成立的二十来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组成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斗争协会很快就同普列汉诺夫在国外的解放社以及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其他流亡团体建立了联系。在这一时期，列宁出版了第一本内容充实的小册子《什么是人民之友？》（1894年），以鲜明的论证的方式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论点，反驳民粹派。同一年，彼得·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评述》问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同后来被称之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批知识分子之间的长期争执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第二年，列宁在圣彼得堡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900年。在此期间，他

刻苦地从事研究和写作，并同其他社会主义流亡者建立联系，同时也尽可能密切地注视俄国欧洲部分的革命运动的前途。

列宁突然离开圣彼得堡运动的领导岗位并没有使运动丧失活力。运动已经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同工厂工人建立联系，并且以专门写出的传单和口头宣传支持罢工。列宁被捕入狱后写了《论罢工》一文，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带头组织工人，并且为他们的经济要求进行斗争，以便把他们争取到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在他离去以后，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1896年的大罢工中发挥了作用。这次罢工导致工厂法于第二年通过，把成年男工的工作日限制为 $11\frac{1}{2}$ 小时，并且还进行了其他改革。以后几年，圣彼得堡和其他地方继续举行相当规模的罢工运动；社会民主党人在其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他们之间在政策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有几分是由于1897年的维特工厂法所造成的结果。有一派人（后来被称为“经济派”）认为，正确的道路在于把精力集中在经济斗争方面，建立工会，组织罢工运动，以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同时使政治运动隶属于这些努力，直到在经济领域420中建立起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为止。这一派人说，政治鼓动非但没有能赢得群众的支持，反而把工人分裂成为敌对的宗派，而不是使他们团结起来。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主体则极力反对这种观点，坚持必须进行鲜明的革命宣传，必须成立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政党来领导工人阶级和准备革命。在这个阶段，论点多少是混乱的，因为在“经济派”中间，既有革命派，也有稳健派，前者希望劳工行动具有革命性，而后者则希望结社得到合法承认，确定正常的集体谈判形式，并促使政府通过进一步的劳动保护措施。稳健派以“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得·司徒卢威（1870—1934年）和米海伊尔·伊万诺维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865—1919年）为首；革命派于1897年在圣彼得堡创办了《工人思想》杂志，以塔赫

塔列夫和洛霍夫为编辑，这一派的见解就是在这家杂志上发表的。

社会民主党各派的思想，不但在俄国有反映，而且在流亡者中间也有反映。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离开俄国的那些人士中，有B·N·克里切夫斯基(1866—1919年)，他同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接触一个时期以后，于1895年同其他人组成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盟，成为国外一个对立的中心。这个团体于1898年开始出版刊物《工人事业报》，并设法使外界承认它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机关刊物。A·S·马尔丁诺夫(1865—1935年，后来成了首要的孟什维克分子)和V·P·阿基莫夫(1875—1921年)，跟克里切夫斯基一起，是这个刊物的编辑。

克里切夫斯基集团同普列汉诺夫派立刻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普列汉诺夫派指责克里切夫斯基的刊物为“经济派”和其他有害的理论提供了太多篇幅，并着手创办一个态度更加坚定的刊物来表达劳动解放社的观点。当然，两个集团都迫切希望赢得俄国国内的支持，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打算把对方革出教门。事实上，两者都说它们是那个还没有正式成立的社会民主党的支部。这一时期在
421 俄国国内，以列宁的圣彼得堡组织为蓝本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许多城市出现，这些协会是从人数不多的秘密社会民主党小组发展起来的。它们拟定计划，要秘密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性组织。在俄属波兰和立陶宛，特别是在犹太工人中间，也有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活动。1895年，成立了一个波兰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同皮尔苏茨基的民族主义的波兰社会党针锋相对，后者同奥地利的波兰人有密切联系。两年以后，成立了一个犹太社会党，即所谓的“崩得”^①，旨在把整个地区的犹太工人都组织起来，也就是说

^① “崩得”是俄文“Бунд”的译音，即立陶宛、波兰、俄罗斯工人总同盟，也就是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的简称。——译注

把白俄罗斯以及波兰和立陶宛的犹太人全都组织起来。在此期间，组织广泛罢工运动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崩得都认为属于那个中心设在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并且商谈召开建党代表大会的问题。1898年，在普斯科夫秘密召开了一次人数不多的代表大会，此后被认为是第一次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总共只有9名代表，包括崩得的代表在内，其中没有一位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举行了三天会议，决定向俄国工人发表一个宣言，并且成立了一个三人委员会来进行组织工作。但是所有的与会代表以及整个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团体的许多其他领袖，在代表大会举行以后，几乎立刻就被捕了。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司徒卢威所起草的宣言发表了，但是组织消失了，只留下了某些决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按照1896年伦敦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定，宣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决权。

新的社会民主党的中央组织在俄国国内遭到破坏，这就使国外的团体继续处于对立的状态。1898年代表大会曾决定以基辅发行的俄国国内刊物《工人报》作为党的中央机关报；但是由于这一点办不到，于是国内的团体就决定在国外创办一个中央机关报。克里切夫斯基的《工人事业报》争取这一地位，但是俄国国内的大多数团体不愿意承认它，并且商讨是否能由普列汉诺夫集团为主，创办一个刊物。 422

1900年年初，列宁从西伯利亚的流放中被释放，回到了俄国欧洲部分，并立刻积极投入创办新刊物和重建社会民主党的计划工作。当局不准许他在圣彼得堡安身，他定居在普斯科夫，在那里会见了一些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代表，讨论拟议中的刊物的问题，会见的代表中不仅有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而且有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此后，列宁又秘密地前往一些地方，同当地的团体进行磋商。这一年7月，他出国去会晤普列汉诺夫

及其解放社同人,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参加创办新刊物,条件是新刊物独立,除了本身的编辑委员会以外,不受任何团体控制。在德国,他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阿道夫·布劳恩的帮助,为该刊做好安排,由斯图加特的社会民主党出版商J·H·W·迪茨承印。

当时计划出版两种刊物,一种是报道和宣传性的,另一种是“科学性的”。前者将称为《火星报》,因为它的报头题词是“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第二种刊物将称为《曙光》,将刊登有关理论问题的长篇文章。直到筹备工作的后期,列宁都在不断同持有各种不同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团体和个人进行磋商。差别逐渐缩小了。从他的信札里可以看出,他不仅对司徒卢威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对包括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盟在内的巴黎和伦敦的流亡团体,都极其不信任。最后,《火星报》成员主要是六个人,其中有三人是劳动解放社的老人,另外三人是曾经参加那次在俄国国内举行的讨论的人。解放社的三名成员是普列汉诺夫、维拉·查苏利奇和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另外三人是A·N·波特列索夫(1869—1934年)、马尔托夫和列宁自己。在后面的三人中,波特列索夫(别名斯塔罗维尔)曾经同列宁一道积极参加圣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并曾在1898年被放逐到俄国北部。这次他同列宁一道出国。马尔托夫(1873—1923年)的真名字是乌利·奥斯洛维奇·别杰尔巴乌姆,当列宁在圣彼得堡的时候以及离开该市以后他都曾与列宁合作。在1903年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上述两人都站在孟什维克一边,阿克雪里罗得和维拉·查苏利奇也是这样,但是在1900年,他们在运动中似乎全都很左,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则代表极右派,“经济派”的主要成员代表中间偏右派,克里切夫斯基以及D·雅佐诺夫(1870—1945年)所领导的巴黎集团则居于中间地位。

《火星报》的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出版,《曙光》杂志则步其

后尘,于1901年3月问世。早在这两个刊物出版以前,理论上的争执就已在那些组成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盟的流亡者中间达到了高潮。1900年3月,这个集团中强烈反对“经济主义”的那部分人分裂了出来,成立了对立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同火星派建立关系。争执达到严重关头的部分原因固然在于创办《火星报》所引起的分歧,但是普列汉诺夫发表《理论手册》(1900年)所起的作用甚至更大。这是一本文件选集,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集子里揭发了经济派及其同情者在策略上所耍的花样和在理论上所犯的错误。1898年曾发表过一个宣言,叫做《信条》,由I·D·库斯柯娃(生于1869年)执笔,旨在说明经济派纲领的要点;同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发表了《俄国工厂的过去和现在》一书,支持经济派的观点。接着,俄国国内外的社会党报纸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国内各社会民主党团体的意见是很混乱的。有人开始要求召开一次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来决定党的政策,但是谁有权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却根本不明确。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盟可能提出由它召集,劳动解放社也可能要求出面召集。俄国国内还有几个团体也都希望成为总运动的核心。列宁同火星派的意见一致,反对过早召开正式代表大会。他说这样一次代表大会只会使情况更加混乱,最好留出一段⁴²⁴时间让意见得到进一步澄清,然后再作出约束性的决定。他的真正目的在于清算经济派,把他们赶出代表大会,同时利用《火星报》草拟一个纲领,并向大会提出制定纲领的议案,然后就可以要求大会予以批准。

然而,即使是单纯为了防止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盟召开一次可能挤满经济派支持者的代表大会,也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于是,火星派便于1901年在日内瓦和苏黎世召开了两次与会人数不多的筹备会议来讨论召开代表大会的问题。在第二次筹备会议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们同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盟多数派的分歧扩大

了。于是，同盟就力图抢先采取行动，于1902年会同俄国的一些团体在比亚韦斯托克召开了预备会议，发出召开一次正式代表大会的通知，并任命了一个筹备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被警方逮捕了，各项安排也就随之落空。因而火星派就又恢复了领先地位。一份分别由普列汉诺夫起草和列宁修订的纲领草案在《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上发表了，它成了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的主要讨论项目。经多方奔走设法，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在1903年7月在伦敦召开。

因此，这次大会尽管在名义上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实际上却是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举行这次会议以前，党已经在许多同反对沙皇专制统治这一主要斗争毫不相干的方面发生了争执。出于下述共同的信念，代表大会在反对民粹派这一点上倒是团结一致的：俄国注定要经过工业发展的过程；而且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不能在俄国的土地上生根和成长。大会还一致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工业无产阶级身上，工业的发展会造成产业无产阶级，使它处于受剥削的境地，生活朝不保夕，因而易于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大会也一致相信，产业资本主义是一种产生“矛盾”的制度，到一定时候会导致毁灭，同时这种制度由于使生产过程“社会化”，从而也就为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以及为整个社会的利益集体管理生产资料这两点铺平道路。但是关于过渡阶段所应采取的形式以及实现过渡阶段的速度问题，大会的意见是分歧的；关于农民或知识分子在过渡阶段中或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意见也是分歧的。社会民主党人跟民粹派不同，民粹派是从“人民”而不是从阶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他们认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关键因素，而知识分子是用社会主义理想来引导广大群众掀起运动的火花；社会民主党人则一致认为，建

设新社会的主要责任必然要落在产业工人的肩上，由愿意同他们打成一片的知识分子给予帮助，同时还要在他们的领导下争取农民（至少也要争取贫农）同他们站在一起。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对这种学说提出了各种出入很大的解释；此外，关于过渡阶段的形式必然是产业工人针对资产阶级掀起革命暴动的问题，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甚至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事实上，困难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心目中所设想的并不仅限于一次“革命”。首先，他们想到要进行一次旨在推翻沙皇政权的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敌人是专制制度——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以及许多并非社会主义者的人的共同敌人。其次，他们想到经济革命，这种革命将结束有钱有势的人对穷人的剥削。前者包括地主、金融资本家、官僚、军国主义者、商人和企业老板（也就是一些常常彼此冲突的分子），也许还包括在斗争的某些阶段可能成为盟友的人。即使一场政治革命是推翻专制制度所必需的，这并不等于说它也是一场经济革命，至少不能说它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甚至也不能说，必须发动经济革命的意义同必须发动政治革命的意义有丝毫相同之处。可以认为，政治革命使在新政权下通过和平手段完成经济“革命”成为实际可行的事。因此，那些持一种极端看法的人士便说，政治革命的胜利者必须立即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把两次革命结合起来，毕其功于一役；而持另一种极端看法的人士则主张，政治革命只要做到建立立宪政府就行了，此后就要依靠政府在全国和各地所采取的法律行动，依靠工会、合作社和其他工人阶级机构所进行的进步活动，在那部分具有建设性才能的进步知识分子（包括投向社会主义阵营的技术人员）的帮助下，逐步向社会主义前进。

伯恩斯坦向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宣传的修正主义，事实上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绝不是毫无影响的。但是在俄国的条件下，修正

主义必然会多少采取不同的形式，这既是因为俄国的专制程度要严重得多，也是因为俄国的工业落后。前一原因否定了在政治上搞渐进主义的主张，除非首先通过革命实现第一步；后一原因则排除了成立一个得到大多数人民支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可能性，而且这似乎也排除了伯恩斯坦与考茨基之流预期会在西方出现的那种社会化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制度的早日出现。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理所当然地把工业资本主义当作是经济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结构，因而只关心用什么方式去使这种结构社会化。另一方面，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却希望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因而不得不考虑是否能既反对这种制度剥削工人，同时又积极支持这种制度，把它当作发展经济、培养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创造条件的手段，也就是说是否能把这种对立的立场和积极的支持调和起来；而且如果可以的话，又要用什么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以彼得·司徒卢威为首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愿意积极支持资本主义，同时又主张迫使资本主义为工人的利益接受改革，并同工人联合起来反对专制制度和地主制度。在政治上，他们主张革命，把革命当作建立立宪政府的手段；同时他们设想政治革命会为资本主义企业的迅速发展扫清道路，而且就象西方一样，工人阶级的组织也会同时得到发展，从而对资本家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并会在一定时候强大到向社会主义过渡。

如前所述，列宁在1900年忙于筹备《火星报》的时候，曾会见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并同他们进行了磋商。在采取这一行动的时候，他承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尽管当时他已决心把他们清除出去。实际上，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他们已经被清除出去了。但是这一举动却使人数大得多的经济派安然留在运动内部，他们不愿象司徒卢威那样同资本家携手，而是认为政治斗争暂时应该从属于经

济斗争，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建立工会，鼓动罢工行动，说服工人提出要求，并力争在劳资关系中取得以下各种让步：如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厂中的卫生条件、改善工人住宅、授予选举产生的工厂委员会同资方谈判与磋商的权利。支持“经济主义”的人不一定是右翼分子，也不一定是跟革命主义者相左的改良主义者，只是其中有些人是右翼分子或改良主义者而已。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鼓动工人对当前事物抱不满情绪，从而建立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而不在宣传中提出社会主义思想，以免人们对这种群众性的号召产生反感，同时也不直接攻击沙皇或宗教，以免造成对立。他们认为，首要任务是尽量把工人组织在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由社会民主党人出任领导，而不是建立一个庞大的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党充其量只能把少数人吸收进来。

1901和1902年爆发了新的罢工，一些地区的警察当局开始扶植由警察内奸和坐探所领导的工会，这时经济派就更加希望集中精力建立工会。当时警方所采取的方法因地制宜，有的是故意煽起骚乱，制造逮捕煽动分子的机会，使工人运动夭折，有的是扶植驯服的工会，允许它们倾诉工人的真正疾苦，条件是不得超过警方认为合法的范围。警方扶植的后一种工会使雇主感到烦恼，其程度就如同前一种工会使其中比较反动的人感到满意一样。但是警方并不一定因为雇主的反对而有动于衷，雇主在许多情况下就反对专制制度，并要求宪法改革。这种驯服的工会主要是由莫斯科政治警察保安局首脑祖巴托夫扶植的。此后，这种手法就叫做“祖巴托夫主义”。1902年年初，祖巴托夫在机械工业里成立了受到警察严格监督的工人互相协会；这个组织居然还针对特别不得人心的雇主举行罢工，其中包括外国资本家所拥有的一些企业在内。法国政府提出了抗议；老板们组织了自己所控制的工厂委员会或“本厂工会”作为对策。1903年行将结束的时候，祖巴托夫被撤职；

但是他的方法在莫斯科被弃而不用并没有妨碍其他地方使用类似的方法，比如1905年加邦神父在圣彼得堡搞的组织就是一个例子^①。

祖巴托夫主义以及警方在其他地区所使用的更极端的方法，促使社会党人更加希望组织真正的工会，旨在把工人从警方操纵的团体中争取过来。但是除了这个理由以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理由：尽最大努力在工厂工人、运输工人和其他工业团体中推进工会工作，以求日后把他们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社会民主党人的主体并不反对这样做，但是他们坚持，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加以指导并提供领袖，就无法把工会置于社会党的有效领导之下。但是他们之间是有分歧的，有些人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劳
429 工行动的革命发展上，因而在思想上更接近于西方的工团主义者；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工会运动就象德国和奥地利的情况那样，仅仅能成为社会党行动的辅助工具。此外，更左倾的社会民主党人还担心，经济主义在实践中会导致完全由熟练工人组成的组织，建立一种仅限于为少数人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工会，从而发展成为一支反革命力量。他们举出了英国和美国工会的实例，恳切告诫人们提防这种发展的危险性。

列宁在西伯利亚流亡期间，除了翻译悉尼·韦伯和比阿特里斯·韦伯合著的《工会运动史》，完成自己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一书以外，早在1898年库斯柯娃的《信条》发表的时候，就开始对经济主义倾向发动攻击。他在流亡中还写了一本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7年），系统地叙述了自己关于集中制革命党的概念。在他亲身感受到1900年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以后，他除了在《火星报》和《曙光》

^① 见本卷第456—457页。

杂志上发表著作以外，还在《怎么办？》一书中对经济派和右翼展开了全面攻击，这本书出版于1902年，是为未来的代表大会进行准备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他在这本书中论证说，集中搞经济斗争就是把工人永远贬为奴隶，因为他们需要的是摧毁资本主义，而不仅仅是为了改善本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条件而进行斗争，而且只要专制制度阻止他们对资本主义展开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继而攻击这样的概念：单凭工会组织就能引导工人自发地把社会主义当成自己的目标。他说，如果没有革命理论的动力去加强工会运动，去启发工人的觉悟，工会运动就会一事无成。他写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①他驳斥“工团主义者”说，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科学知识问题，而不是自发性的阶级意识问题。如果社会主义者不能用科学的社会主义去教导工人，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这块空地。他极其鲜明地对比了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他否认，在两者之间任何中间理论有存在的余地，或存在任何中立地带。他反驳说，经济主义到头来必然会成为道道地地的改良主义，把革命精神摧毁无遗。他指责说，俄国的经济派相当于修正主义者，后者正在西方千方百计地破坏马克思主义。

1902年，俄国不仅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业罢工（其中有巴库和敖德萨两地斗争激烈的总罢工），而且还有许多迹象说明，农民中间的骚乱也日益严重。当然，这一切都为民粹派造成了可乘之机，这时他们已经改组成一个松散的社会革命党，积极反对社会民主党。我们根本不可能精确地查明社会革命党成立的日期。看来该党是以1898年俄国中部民粹派团体所举行的一次会议开始的，会上成立了一个组织不严密的联盟，并创办了一个名叫《我们的任务》的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译注

刊物，作为运动的机关报。俄国的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运动在发展，特别是北部地区，1900年刊物《革命的俄国》问世。这一年举行了一次代表性更加广泛的秘密代表大会，并且决定建立全国性的社会革命党。在这一时期，国外还成立了一个土地学校来训练鼓动者；社会革命党人还派了两名代表参加巴黎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I·A·鲁巴诺维奇(1860—1920年)成了他们参加国际事务的常任代表。但是该党仍然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党内有许多宗派，坚持各自的地方和地区组织应有高度的自治权。他们的信从者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的是旧式的恐怖分子，有的是稳健派，一心想建立农民合作社，并同农村的地方自治局中比较进步的分子合作。在这个时期，除了鲁巴诺维奇以外，社会革命党人中杰出的人物还有维克多·切尔诺夫(1876—1952年)，流亡在西伯利亚的凯塞林·布列什科夫斯卡娅(1844—1934年)；还有右翼的弗里克斯·沃尔霍夫斯基(1846—1914年)和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柴可夫斯基(1850—1926年)，后两人在1914年都成了积极的反革命分子。

431 社会革命党——一称“社会革命派”——成立以后立刻就恢复了恐怖活动，这是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各派都反对的。农民的骚乱也跟着迅速蔓延开来，这与其说是社会革命党人煽动起来的，还不如说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取得农民支持的机会。这时，社会革命党人对大城市产业工人的控制已大部分丧失了，但是他们在手工艺者以及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比较分散的产业工人中间仍然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他们的领导仍然几乎完全来自知识分子。在农村中，他们所吸收的往往是较富裕的农民，特别是向往某种合作社的农民。即使在涉及土地的问题上，他们的政策也是不明确的，但是在1903年以前，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也是如此，事实上社会民主党人往往忽视农民。当然，社会革命党人要求进行土地改革，把更多的土地

交给农民，特别是在解放农奴时交给地主的土地。一般说来，他们主张恢复和改良农村公社，在这个结构内实行小农耕作制，并希望在这个范围内大规模发展合作事业，但是他们并不是单纯的改良派。他们主张政治革命，把政治革命看作是建设农村公社不可或缺的前奏；他们主张实行分权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主张那种接近巴枯宁派的社联主义。其中有些人类似克鲁泡特金派，接受近似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还有些人则是社会主义者，认为必须成立某种形式的政府。在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外围，他们在城市和乡村都有追随者，同经济派中的极端工团主义派有联系。

鼓吹农民合作事业的并不仅限于社会革命党人。赞成这种事业的还有一部分开明地主、某些同地方自治局有关系的官员、以及许多赞成土地改革的经济派自由主义者。最后提到的那部分人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有联系，但是后者希望资本主义方法在农业中得到发展，因而赞成大规模发展农业资产，并建立信贷银行去支援农业投资。同这些支持比较富有和进步的农民的集团不同，社会革命党人力图争取农民的各个阶层，而社会民主党人则日益倾向于在富农和不兼营副业就无法生活的贫农之间画一道鲜明的界线。社会革命党人也很清楚，资本主义农庄主以低廉的工资去雇用小农打零工比雇用长工往往更为有利。但是他们不愿意在农村中划出鲜明的阶级界线，因为这会帮助摧毁古老的农村公社的残存部分。

1902年，司徒卢威在同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断然决裂以后，便在俄国国外创办了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在斯图加特发行，叫做《解放》。从这个时候起，“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就有了自己的组织，同社会民主党完全分了家。他们自己在1903年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在会上同地方自治局运动中的自由主义者联合起来。不久

以后，在1905年的革命中，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立宪民主党。

因此，当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1905年举行的时候，这一派就再没有代表参加；经济派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在党内也不复存在了。我们已经谈过，提交代表大会的党纲草案是普列汉诺夫预先拟就的，列宁在初稿上作了重大的删节。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很久，《火星报》就发表了纲领草案的修正本，其内容在许多文章中和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中都作了阐释。出人意料，纲领草案在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没有遇到什么反对，火星派联合一致支持，其中包括不久以后成为孟什维克派的杰出领袖的那些人。社会民主党分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分裂，并不是为了这个纲领，而是为了党的组织问题。不过在这种表面上的意见一致的背后却隐藏着早先在幕后发生的许多争执。

这些讨论的全面记载直到1924年才在《列宁札记》中发表出来，这场争执中的最大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尽管普列汉诺夫不愿意，列宁仍然成功地把它当作一个主要问题坚持了下来。在代表大会上，这也是争执最激烈的问题，但是它毕竟在下列显然十分明确的形式下获得通过：

社会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说：无产阶级取得使它可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抵抗的政权。

会上接着就要求直接平等的普选权，要求成立制宪议会制定宪法，要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的权利以及废除任意逮捕的做法等等。有些代表认为这些要求同专政的主张是矛盾的。出面答复反对者的是普列汉诺夫，他说：

革命的胜利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如果革命的胜利要求暂时限制这种或那种民主原则，那么，不进行这种限制就是犯罪。我认为，甚至是普选的原则也必须根据我所提到的关于基本民主原则的观点加以考虑。我们可以假设社会民主党人在某种情况下会反对普选权。有一个时期，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曾剥夺了贵族分子的政治权利。革命的无产阶级可能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正如同上层阶级限制无产阶级的权利一样。

这一段话说明，普列汉诺夫是把彻底的专政当作紧急时期所采取的例外措施来考虑的，而不是工人在正常情况下采用或始终坚持采用的持久的政府形式。毫无疑问，列宁所考虑的并不仅限于此，尽管正如他后来所表明的，他也认为经过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革命的必然结果。在代表大会上，列宁倒乐意让普列汉诺夫对纲领的条文作出自己的解释，并满心高兴地让主张专政的宣言 434 被采纳为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一部分。

在纲领中，除了这个问题以外，争执得最激烈的部分是涉及土地问题和民族自决问题的部分。土地问题，原先在讨论普列汉诺夫的草案时，也曾发生争执。大家一致认为，1861年交给地主的农民耕地（割地）应该交还给农民，以便通过公社委员会重新分配。如前所述，社会革命党人也提出了这个要求。列宁驳斥了《火星报》委员会的反对意见，坚持纲领还应该号召把一切土地收归国有；这一点不仅要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实行，而且应该作为最低要求的一部分，向革命的第一阶段（预料会使资产阶级当权）过去以后当权的任何政府提出。列宁坚持自己的论点在这里又获得成功了，这同社会革命党纲领中的一个类似要求是一致的。不过，社会革命党并没有把革命划分为两个阶段——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这一点在列宁的坚持下则载入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如前所述，1898年的第一次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

决议，确认民族自决权。这一点在纲领草案中又提了出来，这是火星派所一致同意的；实际上，大多数代表也都一致同意。但是以阿道夫·瓦爾斯基为首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在会上却激烈反对^①。我们已经谈过，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同皮尔苏茨基所领导的对立党派——波兰社会党——有尖锐的矛盾，他们反对后者，坚持波兰工人在争取解放的共同斗争中必须同俄国工人共命运。他们的反对意见在代表大会上被搁置一旁，他们最强有力的发言人罗莎·卢森堡没有参加大会。不过，他们却得到犹太崩得分子的支持。

435 在大会议程的最后一阶段，当党纲已经讨论完毕，正在辩论党章时，崩得分子由于要求被承认为全俄犹太工人的唯一代表又同大多数代表闹翻了。这时，大家已经同意党应当在集中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各地支部应当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活动。大会否决了崩得的要求，认为同上述组织原则相矛盾。于是，崩得的5名代表就退出了大会。当大多数代表根据相同的理由拒绝承认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盟为国外支部的时候，其他3名代表也退出了大会。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退出，由于改变了大会的均势，发生了重大影响。

在代表大会结束以前，又发生了一场大辩论，使得其余的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了分裂，而且实际上很快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政党。这场辩论不是为了党纲，其争端首先是党员资格的基础，其次是党的负责人选的问题。以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为一方，以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为另一方，进行了第一场大论战，争论的问题是规定党员资格的那一条的措词。列宁希望规定：“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党内某一组织者均得为党员。”马尔托夫希望删去“参

^① 见本卷第501页及以下。

加党内某一组织”的字样。争执的焦点从措词上完全无法看清，但是在词句的背后对党的概念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列宁所希望的是，由一批经过挑选并愿意接受本身所属的党组织的命令进行工作的人，组成一个有纪律的党。他希望这些组织成为党的正式地方支部，在中央指导机构的指示下进行工作。这就是说，他希望取消当时所实行的做法。按照那种做法，任何一小批社会民主党人都可以自由地组成自己的团体，然后再参加自下而上组成的大团体。他希望用另一种组织原则来代替这种组织原则，权力将由中央向下传授，以排除要求平等权利的敌对宗派。他还希望约束知识分子独立行动的倾向，把各个知识分子团体合并到也有无产阶级分子的支部中去，以制止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他认为这同灌输正确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不同。 436

在代表大会上，列宁尽管得到普列汉诺夫的支持，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却以微小之差被击败。马尔托夫的草案得到通过，托洛茨基站在马尔托夫的一边进行辩论，起了显著的作用。然而事情很明显，党实际所采取的路线将取决于列宁的意见占上风的党纲以及党在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出任领导的人选，而不是取决于规定党员资格的精确措词。这个领导人选的问题是很麻烦的，因为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机构，一个负责俄国国内的党组织，另一个负责党在国外出版的刊物。除此以外，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两个机构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一旦发生分歧，究竟谁说了算。同时还要考虑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盟要求对俄国以外的工作——包括在国外出版的刊物——享有总的监督权，而这个设在国外的同盟却掌握在与列宁集团为敌的人的手中。我们已经看到，代表大会拒绝了最后这项要求，决定把党的总控制权交给主要由俄国国内的党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并把在国外出版的刊物的监督权授给就驻外人员中特别选出的《火星报》委员会或编辑委员会。此外还规定成立一个

联合委员会，由上述两个委员会各派两名代表组成，主席则另由代表大会直接选出，负责处理它们之间的争执，必要时还可以决定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的政策。

这个计划获得通过以后，激烈的论战又转移到《火星报》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上去。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旧委员会，由普列汉诺夫、维拉·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三个老资格，加上《火星报》创办时从俄国国内来的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三个新人组成。列宁建议撤掉维拉·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波特列索夫（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基本上都反对列宁的意见），并把委员会的人数减少，只留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他自己，因为他认为这样会使他和普列汉诺夫对马尔托夫形成明确的多数。由于崩得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盟的代表退出，列宁的建议被采纳了。因此，支持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的人，包括托洛茨基在内，都深感恼怒，拒绝同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提名问题发生任何关系。于是，一个完全由列宁的支持者组成的委员会被选了出来，后来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就这样结束了，让少数派——此后被称为孟什维克——深感愤怒；让多数派中的许多人——包括普列汉诺夫——深为忧虑。他们所担心的是，这将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为软弱无能的敌对宗派。托洛茨基也有这种苦恼情绪。在举行代表大会以前的一年中，托洛茨基同列宁以及火星派关系密切，而且同阿克雪里罗得和维拉·查苏利奇生活在一起，友情甚笃。托洛茨基1902年夏天才从西伯利亚逃出，到了秋天，应列宁之召前往伦敦，报告他逃出后访问俄国国内各团体的情况。列宁很喜欢他，并且不顾对他感到厌恶的普列汉诺夫的反反对，把他介绍到《火星报》。当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朋友从委员会中赶出去的时候，他感到震惊，并且对列宁力图在严格的集中的纪律下组织一个狭隘的政党一事深有反感。这些感觉驱使他投入孟什维克阵营，

尽管他在大多数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要接近得多，而且不久以后，他就象反对列宁那样强烈反对孟什维克的宗派主义。

不过，在当时，举足轻重的是普列汉诺夫的态度。当他看到代表大会的结果不是建立一个他所希望的统一的政党，而是使党彻底分裂时，他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开始充当调解人，把孟什维克邀请回来。他力图说服列宁同意让《火星报》委员会被撤职的委员复职，但是列宁坚持代表大会的决定。这时，马尔托夫已经辞去委员会的职务，以示抗议，因而只留下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继续工作，但是普列汉诺夫同时担任联合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党内的权力比列宁大。他自己负责邀请4名旧委员重新加入委员会，从此列宁就辞去了委员的职务。就这样，《火星报》便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控制，成了普列汉诺夫后来正式参加的孟什维克的机关报。列宁被增选为当时仍然在布尔什维克掌握中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联合委员会干脆就不见了。

因此，从1903年起，实际上存在两个对立的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而一些想起调解作用的人，包括托洛茨基，则郁郁不乐地来往于两者之间。但是尽管争执很激烈，每一派都不愿意承认有两个党而不只是一个党存在。两派都抱有一个主要的信念，那就是只能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存在，这个党是阶级的先锋队，而不是一个宗派。因此，每一派都自称是那个唯一的党的真正代表，从而也就保持一种虚假的统一。在1905年革命的影响下，两派迫于形势曾再次暂时联合起来，不过几乎立刻又分裂了。它们的纠纷一直持续到1912年，而在表面上它们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党的两部分。从1903到1905年，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俄国上下支持它们的人都为之困惑不解，这些人很难理解争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不久，俄国的中央委员会开始动摇了。它的一些委员遭到逮捕；补选出来接替他们的新委员，有些希望和解，有些则倾

向于孟什维克。于是俄国国内支持列宁的人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的权力挑战。在列宁同一些对立的社会民主党团体之间不断有言词疾愤的函件来往。几乎从开始分裂时起，列宁就义愤填膺地要求举行一次新的代表大会，重新把问题彻底搞清楚，但是他也决心确实把握住多数。事实上，哪一方都不愿意参加另一方党徒所召开的代表大会，双方也不能同意让调和派召开一次双方都可以参加的代表大会。当以后几次代表大会确实举行的时候，这些会议都是由互相论战的派别主持的对立的集会。

439 1904年，列宁发表了他的著名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为他在前一年的代表大会上所主张的政策辩护。他劈头就攻击孟什维克所主张的党可以让所有宣称同意党的原则的人参加的概念；同时力图明确，阶级和党之间以及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同其他自称为社会民主党的政党之间的主要区别。他说，阶级和党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对所要走的道路有明确的认识，掌握科学的意识形态，因而居于领导地位。党不应该争取整个工人阶级参加，甚至连工会也不能这样做。党更不应该不考虑阶级，把全部表示同党一致的人吸收进来。这种做法只会为不正常不可靠的知识分子敞开大门，这些人会打着“自由”的旗号，蔑视一切纪律，用宗派的纷争把党搞垮。知识分子在党内是受到欢迎的，但条件是他们愿意服从党的纪律，参加党所承认的一个组织，并且服从那个组织的一切命令，而那个组织则必须服从党中央指导机构所下达的命令，也就是服从代表大会以及代表大会为行使其权力而成立的一个或几个机构所下达的命令。列宁坚持说，党必须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对所有党员一视同仁地执行无产阶级纪律，绝不能偏爱知识分子。列宁坚决指出，工人理解纪律的必要性，并且会主动地服从纪律。知识分子也必须这样做，否则就不要参加党。列宁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他称之为“无政府主义的”偏

好非常鄙视，这批知识分子正盘踞在这时已沦为孟什维克据点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盟中。列宁说，他们同俄国国内所发生的情况完全脱了节。他们不懂得，党虽然基本上不同于阶级，但必须扎根于阶级之中，而且必须在阶级内部进行工作，以便领导阶级。

与此相反，马尔托夫及其友人（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也在其内）⁴⁴⁰则认为，列宁关于党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他们并不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或者认为能够把整个工人阶级都吸收到党里来，但是他们的确主张象德国那样建立群众性的党。党应该向所有工人开放，实际上应该向任何愿意加入、愿意接受党所声明的原则并愿意缴纳党费的人开放。他们认为，唯有这样一个党才能保证只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算数，而不是存在许多敌对的宗派。他们辩论说，要行动取得一致，就必须象德国那样，不是把持分歧意见的人排除出党，而是让所有分歧意见在党内辩个明白，并且坚持少数应该接受多数的决定，否则就自动退出。马尔托夫希望有一个有纪律的党，普列汉诺夫则更是如此。但是他们的纪律概念是以德国为榜样的，跟列宁的概念不同。如果把党设想成一个群众性组织而不是一个中坚分子的集团，如果在事实上和在思想上只能有一个社会党，而不是——举例来说——象法国那样有几个主张不同政策的社会党，则必然要以德国为榜样。我认为，普列汉诺夫之所以那样迅速地从布尔什维克阵营进入孟什维克阵营，首先是因为他深深崇拜德国人，而且害怕有两个对立的社会民主党存在。

马尔托夫的看法同普列汉诺夫不尽相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尔托夫的态度要宽容得多，同时也远不象列宁或普列汉诺夫那样认定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且自己又确实无疑地知道这条道路。就象托洛茨基一样，他是犹太人，而且不论就天性还是理性的信念来说，都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远不象列宁或者普列汉诺

夫那样具有俄国人的好则全好、坏则全坏的思想方法，而且所受西方社会主义时代思潮的影响也要深刻得多。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极端集中主义本身并不反对，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列宁站在一边。直到看到列宁政策的后果不是加强党的有机的统一，而是分裂和破坏党的统一时，他才起而反对。当然，列宁并不是有心要分裂党，只是希望在如下条件下在党内贯彻自己的意见：只有个别人退党，并不足以构成一个敌对的党。不过，当事实证明孟什维克很强大，实际上足以组成一个对立的党的时候，他并没有被吓倒。他相信自己能赢得社会民主党中的无产阶级主体以及俄国国内拥护这一主体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支持。他还相信，在这些人的支持下，他能够使孟什维克流亡分子无能为力，而自己则能成为实际领袖，领导运动中真正举足轻重的部分，也就是俄国国内的部分，而且如果要发动革命的话，那也必然要由这部分来发动。后来，他看到孟什维克在国内有追随者，而且更糟的是他所依靠的国内许多团体和个人都希望同孟什维克妥协，或者不愿参加在他们看来是不必要的宗派斗争，这时他感到非常不安，不过他仍然没有被吓倒。这一点从他在1904和1905年所写的信件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时分裂还没有发展到举行两个对立的代表大会，每个代表大会都自称代表社会民主党的地步。

在这个时期，俄国国内的事态发展也很迅速。1903年8月，沙皇撤换了一直设法奉行温和而开明的政策的谢尔盖·维特伯爵。在这前一年，在学生巴耳马晓夫暗杀了内政大臣西皮亚金以后，尼古拉三世就任命前警察首脑维雅切夫斯拉夫·普列韦继任内政大臣。此人是狂热反犹的反动分子。他没有继续推行鼓励顺从的工会的祖巴托夫主义政策，而是采取了一种狂暴的挑衅政策，着手把罢工和农民暴动所引起的日益严重的骚乱情绪引向反犹屠杀。在他的指使下，警方蓄意组织了反犹秘密社团和示威运动，

抢劫犹太人的店铺和礼拜堂，并且百般虐待和恣意屠杀犹太居民。普列韦从被任命为内政大臣之日起就逐步排挤维特，使他丢官失宠，同时执行一种简直毫无节制的加紧镇压的政策。但是他并没有能阻止以地方自治局为基础的开明运动的蓬勃发展。地方自治局已经组织成联盟，开始通过决议，极力要求政治改革和农业改 442 革，并且得到司徒卢威的解放社分子的大力支持。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集团在国外出版了自己的刊物《解放》，而在国内则组织成解放同盟。普列韦在进行反犹太屠杀的同时，也加紧进行反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无分轩轻）的运动。1904年7月，他受到了惩罚：一批社会革命党人暗杀了他。在暗杀的密谋中一个名叫阿捷夫的特殊人物起了主导作用，此人是警方的坐探，同时又是社会革命党人中央恐怖组织的主要成员。实际上，那枚致命的炸弹是社会革命党人萨宗诺夫扔的，他在爆炸中受了重伤。

到了这时，日俄战争的灾难已经发展到足以动摇沙皇统治的基础，而且1905年的革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展。1904年8月间，列宁在瑞士召集俄国国内的支持者开了一次筹备会议，准备在第二年举行一次正式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同时完成发行新刊物《前进报》的准备工作，这个刊物将用来代替当时已经落在孟什维克分子手里的《火星报》，成为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1905年1月，这个刊物的创刊号问世。实际上，布尔什维克的筹备委员会除了邀请自己的团体以外，还邀请孟什维克参加1905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代表大会。但是孟什维克拒绝了邀请，并于同时在日内瓦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或会议）。不过当这两个会议举行的时候，俄国革命已经开始，因而会议的情况看来最好还是留待以后再讨论。

第十章

第一次俄国革命

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日俄战争的直接结果。如果沙皇政府没有投入战争，前几年的动乱无疑仍然会继续下去，但是可以正式称之为革命的局面却决不可能出现。罢工是会发生的，但决不可能在全国各地普遍发生接近于总罢工的罢工；这种活动会以常见的方式出现，并且会由于军队或警察采取行动，或者是因为罢工工人缺乏经费支持而只能停工几天，从而迅速结束。农民起义也会发生，但是这种起义将是季节性的，因为农民经不起耽误播种或收割的农时，因而当局也能轻而易举地把这些起义镇压下去——只不过无法防止在下一个适当的季节里重新发生这样的起义罢了。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鼓动，自由主义分子的抗议以及宪法改革的要求也会继续下去，说不定还会越来越起劲。但是如果没有发生战争，或者不如说，如果在战争中没有遭到失败，自由主义改良派的主要团体就肯定不会梦想到要直接向沙皇政府的政权提出挑战。当时在一个短时期内，除了地主、官僚和虔诚的东正教信徒以外，几乎所有的人之所以全都坚决要求采取某种断然行动，其原因首先是战争，其次是战争的失败。

必须采取断然行动！但是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断然行动却完全不明确；各个集团所要求或希望的事情也不相同。农民所希望的是不要把他们从田地里拉出去当兵，而在拉走以后则希望重返家园。他们希望减轻苛捐杂税，降低消费品价格，扩大个人自由，多得到一些土地。他们希望根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农奴解放时的规

定一直在向他们征收的偿金得以废除；他们希望把政府指派的不断插手农村事务的村长撤掉。但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希望得到更多的自由，以便结束村社，并且使自己成为殷实而具有借款信用的个体农民，而另一些人则希望恢复村社的权力，在农村中实行一次土地均分，而不要扫清道路让那些迫使他人为其利益干活的富农阶级更上一层楼。

在土地问题上，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发现彼此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大多数自由主义者要求，在农奴解放时交给地主的土地应该发还给农民，根据农奴解放法支付的偿金应该停付。但是有些人则希望地主额外损失的土地应当给予偿金，而另外一些人却主张分文不给。有些人希望在信贷和销售合作社的帮助下继续保持小农耕作制，另一些人则希望发展资本主义农业，打破传统的小农结构。社会主义者不仅分裂为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是分裂为农业的社会主义者和主张工业化的人，而且两党内部也陷于分裂。有些人要求立即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有些人则希望目前暂时只把在解放农奴时作为地主的一份交给地主的土地社会化。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要求进行土地改革；但是甚至象社会化和没收这样的字眼在不同的情况下也具有非常不同的含意。

还有，在宪法问题上，所有自由主义者和所有社会主义者都要求结束专制政府。但是在1905年以前，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只要求沙皇改革政府，而没有要求成立一个民选的制宪议会来决定未来的政府形式，更没有要求成立共和国。当然，社会主义者的确全都要求成立共和国；但是他们当中也有分歧，有些人把这一点当作公开的直接目标，有些人则准备帮助自由主义者成立某种形式的立宪政府，哪怕暂时这意味着保持沙皇或皇族的某个其他成员为立宪君主也行。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人都要求成立共

和国；但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左右两翼，对于革命的结果不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问题，都完全作好了准备。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比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对这个中途歇脚站更有准备。情况也自然是这样，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并不认为俄国的经济落后，因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恰恰相反，他们一心想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没有破坏在农村公社组织和手工艺行会的基础上建立农业社会主义以前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互相攻击，前者指责后者不仅甘心情愿支持资本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且乐于充当他们的盟友去统治这个共和国，后者则指责前者拒绝同资产阶级革命者携手；但是社会民主党的这两个集团却联合起来攻击社会革命党，指责它实际上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因而即使在同反动派作斗争的时候也是为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战争改变了上述局面，首先是由于战争使人们强烈地抗议当局征兵——这种抗议在波兰以及其他非俄罗斯地区最为激烈，特别是在波兰和白俄罗斯还扩大到了产业工人和农民中间。甚至在军事上的失败产生影响以前，对波兰人的残酷镇压就成了一个重要因素，激起了革命情绪。当然，只要战争还在继续、政府还在不断把越来越多的军队投入远东以图挽回颓局，征兵工作就得继续，并激起越来越多的地方骚乱。沙皇政府参战时完全没有准备，于是便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把征召来的人匆匆推向前线，从而大大加剧了部队部署不当的状况，这也就使战争的后果更加严重了。事情很清楚，沙皇及其咨议大臣们根本没有料到俄国进军朝鲜和建立满洲的控制权，日本会以武力进行抵抗。1904年2月，日本舰队在旅顺口突然袭击俄国舰队一举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此后，在海上和陆上，灾难接踵而至。到了1904年8月，俄国在远东海面的全部舰队已经被击沉、击溃、扣留或封锁在旅顺口

内。1905年1月，旅顺口也投降了；同年3月，经过一系列血战，俄国军队被彻底击败，被迫从沈阳撤回国内。到了5月，在原先的海战败绩以后，从欧洲调来增援的舰队也被击溃了，到此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1905年10月，根据各大国强加在日本身上的条件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战争正式结束。这些大国既不希望俄国，也同样不希望日本成为远东无与争议的霸主。

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以1月的“流血星期日”开始的，当时加邦神父领导着一支手无寸铁的庞大游行队伍向沙皇请愿，要求解除民众疾苦，他们在圣彼得堡冬宫的外面遭到枪击，并被驱散，有几百人死亡。到了10月，在遍及全国的总罢工声中，革命达到了高潮：在铁路工人和邮政工人加入罢工行列以后，城市生活几乎陷于停顿，一时之间，政府又无法调动军队去镇压反叛者。此后，反革命势力又抬头了。在疯狂的镇压中，当斯托雷平的绞刑手行动起来的时候，暴动逐渐平息下去了。留下来的是一个为反动集团所控制的经过严格挑选的杜马，以及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这种改革破坏了旧村社的残余，迅速地造成了一个庞大的运用改进生产方法的个体农民阶级，从而竖起了一道阻碍农民革命的屏障。

“流血星期日”——按沙俄旧历是1905年1月9日——是恢复改头换面的祖巴托夫警察政策的结果。格奥尔基·阿波洛诺维奇·加邦神父(1870—1906年)在圣彼得堡当局的鼓励下，于1904年2月建立了俄罗斯工厂工人大会，以此作为工具拉拢人民脱离社会主义者以及受他们支配的地下工会的引诱。工人大会的目的是为圣彼得堡的工人提供各种福利事业，并组织教育活动。为此，该会从公款中得到相当大的补助。但是它不久也开始作为一个工会发展起来。日俄战争爆发以后，物价急剧上涨，而工资有一个时期实际上却下降了。工人参加工人大会的人数很多，大多数较大的工厂都成立了分会。但是补助并没有撤销，活动也没有受到当

局的干涉，甚至在雇主开始要求制止加邦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当工人大会开始谈论政治问题、当社会主义党派的一些追随者开始积极参加它的工作的时候，警察也没有加以干涉。姑不论工人大会的起源如何，它总不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而是一个得到允许用非革命的方式提出十分广泛的要求的组织。加邦本人也不是反动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真诚的改良派人物，他希望能够劝使沙皇撤换反动大臣，向人民作出真正的让步。他所领导的庞大示威队伍希望向沙皇递交请愿书，请愿书不仅陈诉了工人的经济疾苦，要求予以解除，而且也要求分配垦殖土地和改革宪法。这次示威准备了好几个月，并同司徒卢威的“解放”派集团磋商过，但没有明显地同警察当局进行磋商。这时，警方是袖手旁观的，让比较温和的改良派出头，希望利用他们去反对比较革命分子。

1905年1月9日，加邦率领他那庞大的游行队伍到冬宫去递交请愿书。路上发生了一些骚乱，其中有一次使加邦本人从马上摔了下来，受了伤，因而没有再参加游行。但是示威者的主体一路无阻地到达了冬宫广场。不过，广场事先已有大批军队围守；当广场上挤满了人的时候，军队突然向广大的人群开火，造成了几百人的伤亡。人群四散奔逃；但是示威者在全城各处打开了枪炮匠人的店铺，寻找武器，同军警发生了多次零星战斗。有许多单身的军官和警察受到了袭击和殴辱。街垒在一些工人阶级的住宅区中筑了起来。军警费了几天时间才完全恢复了控制。

这些情况只有假定当局内部自相矛盾才能解释。政府中有一部分人在民情日益激愤的局面下希望奉行安抚政策，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加邦的示威游行是一个绝妙的机会，可以用来教训工人。出事的那一天，沙皇不在圣彼得堡，大权掌握在谢尔盖大公手里。此人极端反动，看来调集军队和下令开火都应由他个人负责。到了下一个月，他就受到了惩罚，社会革命党人卡列亚也夫把他暗杀

了。毫无疑问，社会革命党人深深地打入了加邦的运动，并帮助扩大示威队伍，但是看来群众在开始时完全没有武装，动武的显然是军人而不是示威者。

大屠杀发生以后，加邦就逃出了俄国，在国外发表了《我的一生》（1905年）。他始终是一个多少有些象谜一样的人物。他并不打算隐瞒他同警方有密切关系，而且在建立他的组织时曾得到警方的帮助。但是他又表明自己是一个真诚的基督教改良派，希望劝使沙皇出面领导宪法和经济改革的运动。他在国外受到了热烈欢迎，但是他的行为很快就使曾经欢迎他的流亡革命者感到厌恶。1905年秋，他回到了俄国，令人惊讶的是，又恢复了同警方的关系，显然答应供给他们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密谋活动的情报。他同社会革命党的一个领导人平卡斯·M·鲁滕堡联系，企图拉他合作，鲁滕堡假装同意，并约定同加邦会见，同时做出安排让躲在隔壁房 449 间里的其他党员能够听到他们的谈话。接着这些革命者就把他当作一个奸细干掉了。

如果要对加邦下任何结论，就必须把他的情况同伊夫诺·阿捷夫（1870—1918年）的情况联系起来看。我们已经谈过，阿捷夫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扮演过两面的角色。毫无疑问，阿捷夫是警方的一名坐探，而同时实际上又是社会革命党中央恐怖组织的主席，在该党的工作中非常活跃。他无疑是暗杀那个控制着警察局的反动头子——内政大臣普列韦——的主谋者之一。事实上，他好象同样真诚地或者说同样不真诚地把革命者和警方坐探这两重身分结合于一身了。原因实际上可能是这样：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痛恨屠杀运动的主谋者普列韦；不过这很难全部说明他的所作所为。看来他是一个多重性格的实际病例。加邦的情况可能也是这样，但是看来他更可能仅仅是一个有些神经病的煽动家，相信自己命定是人民的领袖，为了得到金钱来加强自己的势力，完全不

惜出卖与自己对立的领袖。在不习惯恐怖行动或比较极端的警察刺探与挑衅活动的国家的气氛中，象阿捷夫和加邦这样的人物是很难理解的。50年前透露阿捷夫的行径时，特别使人感到震惊，但是今天，这种人在西方已经不再是那么难于理解的了。1908年，俄国社会革命党流亡者弗拉基米尔·L·布尔采夫(1862—1936年)的著作揭露了阿捷夫的情况，布尔采夫当时是设在巴黎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同盟的领袖，专门揭发警方坐探和煽动分子，他所揭发出来的阿捷夫行径使得社会革命党内部有关恐怖活动的争论达到了严重阶段。

450 圣彼得堡在举行加邦示威游行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大罢工；在庞大的普梯洛夫工厂中，有3名工人大会会员被解雇并同厂方发生了冲突，这就在该厂冶金工人中引起了罢工。罢工从普梯洛夫工厂扩大到全市其他机械工厂。1月9日以后，在一阵巨大的罢工风潮中，罢工扩大到了其他城市，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不满情绪以及群众对大屠杀的抗议在这里都起了作用，但起作用最大的也许要算反战情绪。1904年11月，中产阶级日益强烈的反政府情绪已经露头，他们公开组织起来，提出了改革要求。地方自治局中比较进步的成员同“解放”派集团合作，举行了一次公开会议，决定向沙皇请愿，要求成立立宪政府，增加地方自治局和市政当局等地方政府的权力。他们在这个运动中仿效法国的榜样，在许多地方举行了政治宴会，于是一个组织专业团体的广泛运动开始了。各个职业阶层纷纷参加组织，这些组织名义上是为阅读论文和讨论技术问题而建立的，但却公开辩论政治问题，并且通过决议主张实行宪法改革和土地改革。沙皇对这些现象感到恐惧，于是便在1904年12月特别颁发了一道诏书，其中并没有许下任何明确的诺言，只是谈到他愿意建立法制，给人一些模糊的希望。这些希望使得自由主义分子相信立宪政府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1月

9日的事件以及谢尔盖大公的遇刺使沙皇改变了主意，他在周围反动派的压力下，于1905年2月又发表了一个宣言，宣布他立意维持专制制度不变。与此同时，警察闯入一些职业团体的集会，强制闭会，并且勒令其中的许多团体解散。接着又颁发了一道诏书，这是由布里根大臣草拟的，宣布沙皇打算建立杜马（或称议会），由受非常严格的限制的选民选举产生，旨在确保地主集团的优势地位；杜马只享有咨询的职能，而不享有立法或控制大臣的权力。这些情况使自由主义改良派发生了严重分歧，其中许多人已经被罢工和压制职业团体的行动吓坏了。司徒卢威的“解放”派集团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发生了分裂。左翼从多数派中分裂了出去，后者同地方自治局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新党——立宪民主党，由保尔·米留科夫（1859—1943年）领导。米留科夫及其集团当然并不满意所建议的咨询性议会，但是愿意把它当作第一步接受下来，并愿意参加它的会议；而左翼自由主义分子则希望抵制它，这特别是因为产生议会的选举形式极为不民主。451

后来称为“布里根杜马”的正式计划一直到8月间才公布。在此以前，形势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1月以后，工人中的罢工运动平息了。一时之间，中产阶级要求改革的鼓动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而且社会主义者也关切地注视着它，对它寄以很大的希望，认为它预示专制政治的崩溃。但是对于这种鼓动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们却有分歧意见。在俄国国内，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迫切希望发生革命；这种态度的一个后果是驱使每个政党内部的敌对宗派都接近起来。后来成为苏联工业主要组织者之一的基辅工程师列奥尼德·N·克拉辛（1870—1926年）当时是俄国国内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杰出领袖。他不同意列宁坚决反对孟什维克派的态度，并尽量设法使两个派别采取联合行动。事实上，俄国地下组织中这两派的分裂并不象国外流亡领袖中的分

裂那么彻底。托洛茨基虽然同孟什维克合作，并且经常为《火星报》撰稿，但当他在1905年2月秘密回到俄国的时候，立刻就同克拉辛联合起来，并且立刻开始为克拉辛指导下的中央委员会写宣言和传单。正如托洛茨基在《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明的，他对1905年最初几个月的形势的判断是：起义活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掌握起义，并把它导向胜利的力量。

452 另一方面，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马尔托夫虽然也希望发生革命，但认为革命将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帮助中产阶级集团取得政权，并作为他们的盟友。因此，托洛茨基更接近布尔什维克，而不那么接近孟什维克。实际上，他走在列宁所领导的集团前面，预见革命将从资产阶级阶段直接进入无产阶级阶段。主要在帕乌斯的影响下，托洛茨基事实上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构思出“不断革命”的概念。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卷后一部分^①加以讨论。俄国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大多比较倾向于他的意见，而不是马尔托夫的意见，并且愿意在即将来临的革命斗争中合作。在此期间，社会革命党则由于中央恐怖委员会在谢尔盖大公被暗杀后委员全部被捕，并且忙于重新组织自己的力量和辩论是否继续恐怖活动的问题，发生了一些混乱现象。

1月和2月的骚动过去以后，局势暂时平静了下来，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于1905年5月都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会议地点分别为伦敦和日内瓦。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规模要大得多，与会代表有些后来在1905和1917年的革命中起了杰出的作用——其中有克拉辛、加米涅夫、李可夫、李维诺夫、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总论调是极其敌视自由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后者愿意同自由资产阶级一道采取行动，但是大会

^① 见本卷下册第二十八章。

远不是那么敌视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承认在即将来临的革命大动乱中，有必要同他们联合行动。大会主要关心的是重新制定有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方面的政策。大会认识到，仅仅要求把农奴解放时被地主夺走的土地——“割地”^①——交还给农民并停止向农民索取偿金，即使作为一项当前的措施，也已经不够了。于是，大会要求完全没收地主的财产，在临时革命政府的监督下，由选举产生的农民委员会重新加以分配。大会要求立刻进行这种重新分配，而不是象孟什维克代表大会所主张的那样，先等待临时政府召集制宪议会批准这一步骤。此外，布尔什维克这时宣布，农民必须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伙伴，为此在农村必须特别依靠贫农和工资劳动者，建立农民组织。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中，还大致谈到了农村中半无产阶级分子同富农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概念（这种斗争相当于城市里的产业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同时还提到了同时进行两种斗争的问题：一种斗争是同资本家和富农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另外一种是对抗资本家和富农，在经济上解放工人和农民。决议明确说明，代表们预料到资产阶级革命者会同沙皇政权妥协，而不是推翻这个政权，他们会想方设法使城市和农村的革命半途而废；决议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尽力制止同沙皇政权妥协，不让革命因此而受到阻挠。决议指责孟什维克和自由主义者有心制止革命。

然而，这两个敌对派别所鼓吹的政策，并不单纯是一个主张采取坚决态度，而另一个则愿意妥协。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可能有必要同资产阶级集团一道参加临时政府，以防止后者阻挠革命的发展。而孟什维克却反对参加临时政府，理由是这样做会使社会民主党人为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政策承担责

① 见本卷第 470 页。

任,并使自己丧失工人的信任。实际上,孟什维克认为临时政府将不得不奉行一种资产阶级的政策,因为就实现社会主义来说俄国还不成熟,社会主义者应该站在政府的外面支持政府执行这种政策;而布尔什维克则认为,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实际可行的最大限度,454 特别是在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共和国以及彻底摧毁地主权力这两个方面,就可能需要参加政府。

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还讨论了党组织的问题以及准备迎接起义的问题,大会认为起义已经迫在眉睫。大会废除了前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马尔托夫的动议而通过的关于党员资格那一条规定,代之以列宁的措词^①。大会还规定:将来,真正工人在党的各个委员会中所占的比例应该大得多——列宁建议最低限度应该有四比一的优势。这种改变已经成为实际可行的事,因为在过去几个月中,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人数主要由于罢工而大大增加了。大会之所以有此强烈要求,还另有原因在:很多知识分子在要求改革的鼓动中一直同职业团体合作,这就更加使人担心他们可能向沙皇制度妥协。

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这种强烈的反孟什维克语调,乍看上去同两个派别在俄国国内友好相处的倾向很难调和。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能够就举行共同的代表大会的条件达成协议(孟什维克知道,在这样的代表大会上,他们的票数会居于劣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以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和克里切夫斯基为首的孟什维克流亡集团控制着孟什维克会议,但是主要原因还在于列宁个人的影响对代表们产生了作用。利用代表大会使自己的主张得到完全支持的首先是列宁;而那些在大会上站在列宁一边投票的代表并没有始终一成不变地按照他的路线行事,这是因为他们回到俄国

^① 见本卷第450—451页及以下。

以后发现，社会民主党组织即使不是清一色的孟什维克分子，其中至少仍有许多人依然相信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党，同时认为革命大动乱迫在眉睫，这种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克拉辛从伦敦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同托洛茨基决裂。他们两人继续合作，尽管俄国内部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正式协议已经由于有关代表大会问题的分歧而告结束。

春天——在播种以后——发生了新的农民动乱，也发生了一些产业工人罢工。5月，在莫斯科以南200英里的巨大纺织业中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发生了总罢工，结果建立了被认为是俄国的第一个苏维埃组织——也就是建立了第一个由工厂以及各种类型的工业中的类似团体派代表组成的总机构。6月，哥萨克骑兵在俄属波兰的罗兹向工人的示威队伍开枪射击，接着便发生了暴动，但是这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差不多就在同时，敖德萨发生了大罢工，而且蔓延到俄国东南部的其他城市；当罢工正在进行的时候，铁甲舰“波将金”号（船上的人员主要是新征入伍的人）哗变；不久以后，派去镇压的舰队中的“圣乔治”号也参加了哗变。这次哗变是在俄国的最后一支舰队在远东对马海峡战役遭到覆灭以后几天之内爆发的。对马海峡一役实际上结束了日俄战争。

海军哗变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进一步的罢工和骚乱。但是参加哗变的海军没有领导，也没有操纵舰只的技术能力，不知道该怎么办。粮食和煤都快耗完了。“波将金”号开到了罗马尼亚港口康斯坦萨，但是罗马尼亚当局拒绝供给物资。经过一段漫无目的航行以后，它又回到康斯坦萨，向罗马尼亚人投降了。“圣乔治”号在此以前就已经向俄国的海军将领投降，哗变的带头人被处决。

原来希望和计划的是一次规模大得多的海军哗变，并准备把黑海各港口的罢工变成起义。但是这些事都没有发生。不过，已发生的哗变已足以使沙皇感到惊恐，并对自己应当走哪一条路更

加举棋不定。他一方面鼓励一个名为“黑帮”的反动联盟组织搞出新的屠杀暴行，从而让反动派出头，另一方面又同比较温和的自由主义分子妥协。他允许各职业团体重新组织起来，并成立职业团体联合会，联合会重新提出了改革宪法的要求。地方自治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准许召开了，大会决定向沙皇提出一项改革请愿书。456 原先对各大学实行的严格控制也放松了，各大学参与提出关于改革的要求。但是沙皇仍一心继续推行他的计划，决心仔细挑选一批议员成立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咨询议会。8月，布里根的计划正式公布了。即使在大多数立宪自由派看来，这个计划也显然是没有用的。9月，地方自治局举行了另一次代表大会，否决了布里根的计划，并重新提出了制定宪法的要求；10月，立宪民主党举行了制宪代表大会。

在此以前，早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劳资纠纷。8月，华沙发生了总罢工，当局宣布了戒严令，严加镇压。9月初，巴库油田发生了大罢工。“黑帮”被动员来对付罢工工人，整个地区发生了内战。油井被烧了，许多犹太人都在屠犹运动中被杀害。就在这个月较晚的时候，莫斯科的印刷工人开始罢工，不久其他行业也加入了罢工行列。当时罢工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警察无法镇压。街上还发生巷战，枪炮匠的店铺遭到抢劫，大学学生参加了战斗。罢工运动开始蔓延到其他地区，年初成立了工会的铁路工人也开始罢工，瘫痪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的交通，这时罢工运动开始具有新的性质。其他铁路线上的工人也罢工了，继之而起的是邮政工人和其他政府雇员。到了10月，运动扩大到圣彼得堡，那里成立了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来进行指挥。罢工运动迅速蔓延到俄国的大部分地区，统治阶级为之惊恐万状。军队无法调动，邮件未予投递，政府工作几乎完全陷于停顿。农民对地主发动了新的攻势，他们在8月间主要在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下已经成立了全俄联盟；

在某些地区，他们的造反采取了新的形式。特别是在“黑土”地带，有许多庄园被烧毁；在拉脱维亚，“波罗的海男爵”^①同被剥削的农业劳工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在圣彼得堡，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报纸开始公开发行。苏维埃并不完全是一个代替当局的政府，但是在某些方面，它的所作所为已俨然是这样的政府。沙皇已经认真地考虑逃出俄国的问题；他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应该退位，颁布宪法，还是动员他的全部力量来把运动镇压下去。有一个时候，他决定采取最后一种做法，但是他的兄弟尼古拉大公劝阻了他，后者报告说，当时一直服从命令的军队随时都可能叛变。沙皇决定作出让步，把维特伯爵召来供咨询。10月较晚的时候，他根据维特的意见下了一道新诏书，明确保证成立立宪政府。布里根的计划被放弃了，将建立一个有立法权的民选杜马，而不仅仅是一个咨询机构，选民的范围将扩大，把农民和整个中产阶级包括进去，细节没有列举。这一建议使中产阶级陷于分裂。在1905年11月举行的第4次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上，立宪民主党拒绝了新计划，要求成立制宪议会。另一方面，主要以企业和金融业集团为基础的右翼却接受了这个计划，并组织了一个新政党——十月党，以便为即将来临的选举竞选。与此同时，反动派在“爱国的”俄罗斯人民同盟中聚集起来，着手以更大的规模组织黑帮。

10月行将结束的时候，总罢工达到了最高潮，到了这时罢工已经基本上成为政治性的了，它的主要口号是成立制宪议会，不过同时也提出了其他要求，其中包括八小时工作日制普遍要求。但是总罢工自然无法持续很久：要么发展成为暴动，要么罢工工人就必然会由于没有饭吃而不得不复工。工人还没有暴动的准备，沙

^① 指德国剥削阶级在波罗的海沿岸霸占土地后，被沙皇封为男爵的贵族而言。——译注

皇保证成立有立法权的杜马，有助于使工人复工。在工人复工以后，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几乎立刻就哗变了。这次哗变被镇压了下去；当这次哗变的领袖被判处死刑的时候，圣彼得堡的工人再次罢工以示抗议，预定要执行的处决便拖延下去了。接着黑海舰队中又发生了第二次哗变，结果又被镇压下去；随后驻扎在莫斯科的罗斯托夫团也发生了哗变，其后果还是一样。在此以前，政府鼓足了勇气逮捕了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律师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选出来接替他的是托洛茨基。到了12月中旬，当局更加胆大起来，逮捕了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正在开会的全体苏维埃委员。没有被逮捕的积极分子力图举行一次新的总罢工以示抗议，但是工人群龙无首，而且很厌倦，因而反应冷漠。就圣彼得堡来说，革命的最高潮已成过去，预计要发动的起义并没有完全发动起来。

但是在莫斯科，革命高潮则方兴未艾。11月底，那里建立了苏维埃，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成立了一个联合组织来领导斗争。12月中，莫斯科苏维埃决定举行总罢工；社会党的联合机构决定以此作为实际起义的起点。两个社会党这时已经得到少量的小型武器，障碍物也已经建立起来，大街上发生了街垒战，有好几天全市大部分地区掌握在革命者手里。但是只有一部分工人有武器，而政府这时已经能把相当多的军队调来——主要是从帝国的其他地区调来的，旨在减少军队同叛乱分子站到一边的危险。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被镇压下去，革命获得成功的希望实际上也就随之消失。格鲁吉亚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有一个独立共和国存在，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也被征服了。政府军队对波罗的海各省的农民起义也开始占上风。严冬的来临使帝国其他地区的农民运动消沉下去。反动派在各地都处于能够发动反革命攻势的地位。

事实上，从沙皇宣布答应建立享有立法权的杜马时起，反动派

就已开始发动反革命进攻。沙皇的诏书刚一发表，立刻就爆发了新的屠犹运动，黑帮已经在非常广泛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从12月起，镇压还可以采取合法的形式。紧跟在军队的后面，政府又派出了惩戒委员会到各省去对罢工工人和骚乱分子以及任何可能抓到的革命嫌疑分子进行无情的报复。许多社会党领袖逃往国外，或者躲藏起来，许多人躲藏在芬兰，当时芬兰仍然处于俄国警察组织的管辖范围以外。政府的迫害使得那些没有被逮捕的人团结起来；特别是在罢工的最后阶段和莫斯科起义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就曾联合行动。12月，布尔什维克在芬兰举行了一次会议，主张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包括进去；孟什维克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接着双方商谈联合的基础，并达成协议，参加联合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普通党员选出，而不是象列宁所希望的那样由地方党委员会选出。这就使一大部分新党员享受到选举权，结果也使孟什维克和中派集团在代表中取得了多数。因此当1906年4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统一代表大会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发现自己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票数居于劣势。他们暂时不得不承认失败，在党的新的领导机构中接受孟什维克的多数，但是他们立刻开始重建自己的独特组织，力图扭转颓势。孟什维克在统一代表大会上之所以获得胜利，主要是由于革命暂时已难望取得胜利。客观环境既经改变，看来要紧的是使党的残存力量团结起来，而不是去强调大多数普通党员所不了解的理论分歧，使运动遭到削弱。诚然，布尔什维克保住了列宁关于党员资格那一条规定的文字形式，因为面对当前的革命形势，大多数孟什维克都乐于承认有必要大大加强党的纪律。另一方面，孟什维克却能够不顾布尔什维克要求明确宣布党领导工会的愿望，通过一项决议，赞成在非党的基础上建立工会。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最后撤回了自己的建议，投票赞成孟什

维克的提案，决议的措词承认有必要加强工会和党之间的思想联系，虽然不是组织形式上的联系。

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政策以及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是讨论得最久的问题。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讨论似乎是相当不实际的，因为当时两派大体上都同意为了使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同农民有必要建立联盟。他们还一致希望在新的党纲中载明完全剥夺地主的财产，而不仅仅是“割地”。但是孟什维克希望把地主的产业交给地方自治局重新分配，以便使地主的产业“市有化”；而布尔什维克则希望把地主的产业“收归国有”（也就是说，把产业交给那场盼望中的起义能使之掌权的新革命政府），并且宣布赞成农民在革命农民委员会的监督下直接占有地主的土地。在这个问题上，孟什维克的“市有化”主张占了上风。他们辩论说，在实践中，“国有化”作为一项立即实行的政策，意味着把地主的土地交给一个资本家控制的国家，而这个国家会利用它的权力把大部分土地交给农业资本家去剥削佃农。但是，布尔什维克坚持，党纲应该宣布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不向被剥夺所有权的业主支付偿金；这一点他们得到了胜利。

关于城乡必须建立合作关系来进行革命的问题，在表面上取得协议的背后，在合作关系应该具有什么性质的问题上，两方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当时两派在农村都没有众多的追随者，而每一派又都迫切希望得到这种追随者。但是列宁所设想的是，在布尔什维克的思想领导下，实行工农联合专政；而大多数孟什维克则反对专政的概念，主张自下而上地在普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广泛的党，他们担心让农民站在同无产阶级平等的地位上，就可能导致党被没有知识的农民党员所控制，从而使党反对工业化，并走向社会革命党人所主张的农业社会主义。

在策略问题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一个重大问题是：究竟

是应当认定革命暂时已成过去，并想办法逐步重建革命力量呢，还是应当不顾当时已经签订和约、因战争败局而引起的骚乱已归于平息这一事实，寄希望于早日重振群众运动呢？跟这个问题有牵连的是，对即将召开的新杜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就社会民主党的两翼拒不提出候选人这一点来说，实际上是抵制了选举，尽管他们当中大概有许多人投了票，他们选的是劳工候选人、农民候选人或立宪民主党人，所反对的是反动派。但是，在孟什维克中却有人反对这种政策；同时有许多没有参加宗派的社会主义者当选了，不久之后他们就在相当暧昧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劳动团，这些人大都比较接近社会革命党人，而不那么接近社会民主党人。至于列宁，他之所以希望抵制杜马，主要是借此防止社会民主党人陷入不得不同立宪民主党人携手的境地，也就是说，防止他们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携手。他正在设法使社会民主党人同这批人分开。另一方面，孟什维克之所以主张抵制杜马，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选举条件，而且他们在许多情况下都要求自己的追随者如有选票，就投给立宪民主党人以反对更反动的政党。代表大会上的多数人的决议是反对继续进行抵制，有些来自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代表大会散会以后就被选入了第一届杜马。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余下的一个大问题是，重新统一的党对于民族自决以及崩得所提出的文化自治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我们谈过，1903年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因为拒绝接受俄国党主张民族自决的决定而同俄国党决裂了，他们认为这一决定会妨碍自己跟敌对的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作斗争。自那以后，在拉脱维亚和乌克兰，还有在格鲁吉亚，都出现了新的社会民主党，并且在1905年的革命运动中起过巨大作用，而崩得也在白俄罗斯、波兰和立陶宛大大增加了徒众。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由于希望实现全面的团结，同意在广泛自治的基础上接纳全国性的政党为成员，并把

崩得作为适合犹太工人的独立组织接纳入党，但该组织在吸收犹太工人方面不享有任何垄断权。这些决定同列宁所提倡的纪律严明、实行集中制的政党概念相去很远；列宁即使不得不暂时接受它们，也决不可能就此甘休；除非把这些决定全都推翻，重新采纳自己的主张，他是不会罢手的，哪怕使党再次分裂也在所不惜。

在斯德哥尔摩大会上新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中，孟什维克占7名，布尔什维克只占3名——那就是克拉辛、李科夫和德斯尼茨基-斯特罗夫。后来在俄国内部展开工作的就是这个机构。在国外后来设立了一个独立于党中央委员会以外的编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清一色的孟什维克——马尔托夫、A·S 马尔丁诺夫、波特列索夫、F·I·唐恩以及 P·P·马斯洛夫（1867—1946年），后者是孟什维克土地政策的主要阐释者。就这样，布尔什维克暂时完全丧失了对党组织的控制。

托洛茨基没有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在1905年革命的几个关键性月份里，他曾是圣彼得堡的杰出人物。举行斯德哥尔摩大会时他在监狱里，不久以后就被解往西伯利亚；1907年初到达那里之后，很快就逃走了。他既然不属于社会民主党中的任何一派，而且对两派都很有意见，因而当党处于1906年动荡不定的局面时，他在左右党的政策方面本是可以起重要作用的。他在被捕以后，的确还能继续写作，但是他的离去却使那些徘徊于两个敌对派别之间的人变得群龙无首了。在迅速增加的党员中，这种人大概显然占多数，党员人数从1904年的几千人一跃而增加到1906年初的150,000人以上。1905年以前，俄国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基础是地方委员会，而地方委员会是自上而下任命的，不是自下而上选举的。在这些委员会下面，有工厂小组、学生团体和各种各样的特别团体；至少在理论上，所有这些组织都由地方委员会领导，而地方委员会则听命于代表大会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甚至连这个中

央委员会也曾在委员被逮捕或不得不逃往国外时，通过增选来填补空缺。但是到了1905年，自上而下任命的地方委员会被小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代替了，因而这种委员会也就是自下而上选举出来的；在基层小组和地方委员会中，通过公开投票解决的问题也比以前多得多了。此外，有些重大问题或是提交大型会议，或是通过基层组织，让全体党员去解决。列宁那种自上而下实行集中制的政党概念，在实践中已经大部分落了空；当时发行的刊物大大增加，其中有些还是相当公开地发行的，这也提供了一个讲坛，可以继续就党的问题展开讨论。在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沙皇的检查制度完全瓦解了，因为印刷工人拒绝印刷任何必须经过检查的刊物；社会党人强占了敌人的印刷厂来为自己印报纸，每天从一个印刷厂搬到另一个印刷厂，从而弥补了印刷机的缺乏。党的性质和组织所出现的这些变化，大体上说明了孟什维克为什么会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这不仅是由于大多数新党员喜欢民主制的组织，而不喜欢集中制的组织，而且也是由于许多老社会民主党人接受革命中群众行动的经验，倾向于群众性政党的主张：任何“同志”，只要愿意入党，而且看来愿意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就可以吸收他入党。

当布尔什维克1905年12月会议投票赞成同孟什维克联合的时候，其成员对联合究竟会引起什么问题看法不同。有些被称为“调和派”的人相信，联合能够维持下去，而且相信，在一个按照民主原则组成的统一政党内，容许有很大的分歧存在。另一些人，尤其是列宁，则认为这纯粹是梦呓。这部分人之所以愿意接受联合，仅仅是因为这让他们得以在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中，而不仅仅是在一个派别中继续宣传集中制，继续宣传他们的革命概念和专政概念。在布尔什维克于统一代表大会以后所采取的行动中，后一种态度占了上风：他们立刻成立了自己的委员会来集聚力量，而且毫无顾忌

地违抗代表大会上所选出的、以孟什维克为主的中央委员会所规定的纪律。列宁的意志占了上风，他完全用不着西方所了解的那种形式上的民主。在他看来，集中制意味着服从一个采取正确总路线的党所作出的集中决策，而不意味着向背离正确信仰的“异端派”多数让步。

在1905年的社会民主党人中，对于党和阶级的正确关系看法是非常混乱的。当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最初成立的时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参加了，而布尔什维克最初却拒绝参加，等人家劝说了一番才参加。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参加以后还继续说，自己看不出苏维埃存在的理由，党应该为工人阶级提供统一的领导；又说苏维埃可能成为危险的敌人，可能轻易地落在坏人的手里。提出这种批评的人往往主张成立一个群众性的党，以工厂小组和类似的基层组织为基础，并且吸收当时存在的工会，或使这些工会完全隶属于党。同列宁站在一起反对他们的人则希望由坚定的革命者组成一个人数不很多的党，并且强调党必须帮助建立和指导工会之类的群众性组织，从而同群众保持接触并领导群众。这批布尔什维克分子支持参加工人苏维埃，并且希望在农民和武装部队中建立类似的苏维埃，但是他们也坚持说，布尔什维克应该走在前面，倡导对工人群众最具有直接和切身吸引力的运动，从而把最后决定权掌握在党的手里。还有第三个集团同这两个集团对立，这个主要得到孟什维克支持的集团认为，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劳工党，足以容纳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或左翼团体，同时要求召开一次全面的工人代表大会来成立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组织。鼓吹第三种政策的人主要是阿克雪里罗得和Y·拉弗林(1882—1932年)，后者的小册子《广泛的劳工党和劳工代表大会》于1906年秋问世。

465 苏维埃绝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创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也没

有特别予以重视。在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看来，苏维埃不过是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特别组织，它之所以出现主要是为了协调罢工运动，而且举行总罢工时也显然需要它把那批还没有在党的控制下组织起来的工人投入运动。甚至在圣彼得堡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在1905年爆发的革命运动中分别起了杰出作用以后，布尔什维克仍在一定程度上抱着这种态度，只是对莫斯科苏维埃的态度好一些而已。布尔什维克不喜欢圣彼得堡苏维埃中的杰出人物托洛茨基，因而也就特别怀疑圣彼得堡苏维埃。事后看来，布尔什维克对莫斯科苏维埃的态度比较好，因为他们对这个机构的控制有把握得多，而在圣彼得堡则是由孟什维克起主导作用。能够预见苏维埃后来在1917年所发挥的作用的人，即使有也为数极少；或者说，除了看到苏维埃是工会联合会的一种形式以外，能够重视它在制定发动下一次革命的计划中所起的作用的人，即使有也为数极少。事实上，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为了要使托洛茨基声誉扫地，便对1905年圣彼得堡苏维埃的所作所为多方苛责，而且越来越严厉，尽管在列宁的言论中找不到这种批评的痕迹，据我个人所知，在当时任何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言论中也找不到这种批评的痕迹。

事实上，圣彼得堡苏维埃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组织。它最初是从领导印刷工人罢工的组织发展起来的，当罢工运动从一个工业部门扩大到另一个工业部门时，又有新的组织加入；后来由于社会党以及其他各种团体相继加入，它便成了当地工人阶级运动中一个代表性很广泛的机构。在10月的大规模总罢工过程中，它实际上成了一个地方行政当局，基本上取代了市政机构，在某些事情上甚至取代了警察当局。必要的工作由它下令批准，市政命令由它签署，并且贯彻它自己的纪律。如前所述，它指令印刷工人不去印刷必须受新闻检查的刊物，从而使新闻检查名存实亡；它征用印

466 刷厂印刷自己的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的刊物。在一个短时期内，它实际上毫无阻挠地进行了所有这些工作，因为当局不敢违抗它。它甚至能阻止喀琅施塔得海军兵变的领袖所受的立即行刑的判决；在这以前，它还取得了一项赦免令，使大批政治犯——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释放出狱。只是到了12月中，当圣彼得堡工人精疲力尽的时候，当局才逮捕该市苏维埃第一任主席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试了试自己的力量，并确实弄清楚起义的危机已成过去，然后才敢于封闭苏维埃，并逮捕了它的委员。

后来对托洛茨基的领导所进行的攻击，主要是根据这样的看法提出的：他和圣彼得堡苏维埃本应该使总罢工成为起义的起点，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办。而对莫斯科苏维埃给予表扬所根据的事实是，它最后确曾设法发动一次起义，而圣彼得堡却没有起而支持。事情很清楚，到了莫斯科起义的时候，圣彼得堡确实没有掀起类似的大规模运动的可能性，那里的运动已经耗尽了力量。如果说圣彼得堡应该起义的话，那也应该在较早的时候行动，也就是在10月总罢工的时候，至迟也要在11月初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都没有把罢工当作发动起义的机会。这两个城市为起义进行准备的领袖都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他们都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军队中出现严重不满情绪的迹象，以便给自己带来机会，因为除非有相当一部分军人倒向自己一边，或者至少是拒绝开枪，否则他们就无法希望取得胜利。托洛茨基一再劝告耐心等待，希望形势会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这种形势却始终没有出现。毫无疑问，圣彼得堡的左翼集团在苏维埃的支持下，本可以发动一次小规模起义，但是这样做就等于是招来一场屠杀。看来，上上之策是等待时机，而在等待的过程中，还要防止工人过分频繁地举行总罢工，以致消耗自己的力量。托洛茨基正是这样做的，后来他竟由于这样做而被斥为反对革命的孟什维克分子。孟什维克实际上是不论

在什么情况下都反对起义，对托洛茨基提出这种指责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明摆着的事实是，1905年的形势实际上始终没有发展到起义可能获得成功的地步，因为革命者在海军中的势力虽然相当强大，⁴⁶⁷但是在陆军中却远不够强大。陆军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当局谨慎地把他们散布到各地去，让大多数军队都在远离本乡人的地方服役，因为他们大概都会拒绝开枪射杀本乡人。即使做了这样的安排，当局仍然非常害怕兵变；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在竭尽所能把自己的宣传送进兵营里去，并组织军队小组。当时的形势很可能一触即发，但是两党对自己的力量都没有十分把握，都不敢在10月里拿自己的力量进行考验。于是两党都在盼望对自己有利的时机，而到头来时机却变得对政府有利。

当然，在这些关键性的月份里，人们始终在怀疑，不举行起义，沙皇是否就不可能作出真正的重大让步，以至于退位。当尼古拉颁布他的10月宣言，保证成立一个有立法权的杜马时，自由主义分子就满怀希望，孟什维克也是这样。后者所希望的不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一个由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有了这样的政府，社会党人就能够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式的群众性政党，成为这个政府的立宪反对派。这正是列宁所最担心的事情：从此列宁便以粗暴的语言对待立宪民主党以及希望捧立宪民主党上台的孟什维克。列宁决不排除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可能性，甚至也不排除帮助这样的政府上台以反对沙皇的可能性。他所反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立宪民主党同沙皇达成协议，取得政权，而孟什维克则支持这一协议，并放弃革命而去充当立宪反对派的角色。列宁所要求的是推翻沙皇制度，而不是同它妥协。只要立宪民主党人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协议取得政权，他就愿意同立宪民主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孟什维克是反对联合政府的，因为他们想象中的

联合政府是一个会保持沙皇当立宪君主的政府，而要加入这样一个政府，是不符合他们的共和主义原则的。正是由于孟什维克指摘联合政府，他们才往往听起来似乎比布尔什维克还要左，但是他们所指摘的联合政府跟列宁认为合法的联合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同年10月，当布里根骗人的杜马被放弃，而提出了一个真实得多的杜马时，自由主义分子和右翼孟什维克都满怀希望。但是在实际建议分阶段公布出来以后，他们的希望便都成了泡影，这不仅是因为重新组成的帝国议会（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机构）将同选举产生的杜马具有同等的权力，而且也是因为杜马的选举制度将具有很大的偏向，使地主和农民肯定会居于有利地位。选举是间接的，通过各地区的选举人团进行，而选举人团本身又要以阶级为基础，由三个阶级（地主、城市居民和农民）分别投票产生，其方式将使大地主和富有公民得到特权地位，而农民代表则需要再通过另一个间接选举程序产生，同时又把产业工人划入特别低微的一类人里去。此外，俄罗斯人地区的代表人数将比非俄罗斯人地区多得多，而最重要的是，沙皇保留了否决自己所不喜欢的任何杜马决议的权力。沙皇的大臣不对杜马负责；政府也不是以任何方式从杜马中产生的。沙皇任何时候都可以解散杜马，杜马将以非常不确定的身份悬在那里。

我们已经谈过，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人及其盟友曾要求召集制宪议会制定一部新宪法。但是在这一建议遭到拒绝以后，他们便决定参加竞选，尽管12月公布的选举计划是反动的，尽管后来又进一步规定了种种限制，而且大多数都是在快要选举的时候才公布的。社会民主党的两翼以及在年底以前分裂成为最高纲领派和最低纲领派的社会革命党人，都决定抵制杜马。这就使立宪民主党人在城市里几乎进行一场清一色无外人的竞选，而农村

则不存在有效的领导。无论如何，地主必然会选举纯粹的反动分子或十月党人，以及一些在地方自治局运动中很活跃的立宪民主党人。结果，立宪民主党在第一届杜马里是最强大的党，虽然它并没有占明显的多数。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因为原来估计更右的党会获胜。这项计划的主要负责人维特不得不辞去大臣职务。他以俄国正在成立立宪政府，国外可以安全进行投资为理由，取得了大批法国贷款，从而完成了沙皇要求他完成的任务；在贷款稳稳到手以后，沙皇周围极端憎恨维特的反动近臣鉴于维特没有能够建立一个顺从官方愿望的杜马，于是就不再需要他效劳了。 469

于是，沙皇便在7月中旬颁布一道诏书把杜马解散了。与此同时，斯托雷平被任命为首相；他立刻对起义农民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派出战地法庭进行审判，有的被判处死刑，有的被判处较轻的徒刑。立宪民主党人拒不承认沙皇解散杜马的权利，率领一批愿意跟随他们的议员前往芬兰维堡，打算到那里去继续开会。在左翼政党的支持下，这批人从维堡发表了一份呼吁书，要求成立新杜马，并号召人民在召开新杜马以前拒绝纳税和应征入伍，但是他们却小心谨慎，没有号召进行武装革命。实际上，解散杜马的做法，不仅重新激起了层出不穷的农民骚乱，而且也重新引起了喀琅施塔得的海军兵变和一些小规模陆军兵变。但是这些兵变都被顺利地镇压下去了。社会党人发出了总罢工的号召，但是罢工的规模远不如前一年秋天那样大，而且社会党人也没有打算把罢工当作起义的起点。工人运动的力量肯定无疑地削弱了；农民起义的规模尽管空前壮大，但彼此之间没有配合，在缺乏持久的城市运动或铁路工人罢工的声援的条件下，就很容易相继被粉碎。斯托雷平的战地法庭在9月份加强了，很快把1906年的农民革命镇压了下去。

11月，斯托雷平公布了政府的土地改革方案。他断言无需没

470 收私人产业,就有充分的土地可以供给那些需要土地的人。政府将从皇家的产业中提供土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缺乏土地,而在于土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他说改进土地使用的道路在于使土地摆脱传统的限制,巩固土地所有权,容许土地自由买卖,并且通过信贷银行提供资金去开发土地。斯托雷平着手培植一个庞大的能够获得资本和贷款的进步农民(富农)阶级,这种农民将能用工资雇佣人数多得多的贫农以及无地劳动者。他的法律扫除了旧村社的残余,并且建立了土地自由买卖制。其目的一方面在于鼓励改进耕作法以增加生产,另一方面又在于新建一个农民阶级,作为防止社会主义鼓动的堡垒,并且同地主联合起来,维护既定秩序,免遭贫农的破坏。他的措施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以后的几年内,这些措施的确为耕作方法带来了相当大的改进,而且在许多地方,确曾使农村产生了内部分裂。

然而在当时,斯托雷平纲领中最明显不过的部分却是他针对农民运动及其鼓舞者所采取的严峻行动。“斯托雷平的领带”为这位发明战地法庭、把反可怕的镇压行动能推广到全国各地的人赢得了誉满全世界的臭名。西方各国的许多团体为之震惊不已,纷纷提出了抗议。

但是当时仍然存在着怎样对待杜马的前途的问题。斯托雷平决定举行一次新的选举,希望可怕的镇压行动能给他送来比较听话的多数。社会党人又一次必须决定,在选举中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在4月的代表大会上决定改变抵制杜马的政策。他们肯定打算提出候选人;但是究竟应该单独竞选、还是设法缔结某种选举联盟的问题仍有待决定。在后一问题上,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供选择:一种是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跟政府进行斗争;另一种是同劳动团和社会革命党组成左翼集团,以反对政府和立宪民主党。1906年11月,社会民主党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来

471

考虑这个问题，会上孟什维克多数同布尔什维克发生了严重分歧。孟什维克希望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布尔什维克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一些拉脱维亚人的支持下，要求结成左翼联盟去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前一种政策虽经布尔什维克强烈反对，仍获得通过。但是布尔什维克赢得足够的支持，因而能够坚持：虽然上述主张将成为中央的政策，但不得强迫持相反意见的地方委员会接受。于是，凡是孟什维克占上风的地方，他们就和立宪民主党人互相支持，而在少数地区，社会民主党人就同劳动团分子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站在一起。在圣彼得堡出现了分裂：当地的社会民主党拒绝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尽管如此，孟什维克仍然同立宪民主党人联系，但遭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拒绝。当地的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结成了左翼联盟进行斗争，而孟什维克的分裂分子则要求其追随者在投票中弃权。列宁在他所写的一本笔锋最犀利的小册子中，就这个问题攻击了孟什维克。

在这个展开激烈辩论的时期，社会革命党也分裂成为最高纲领派和最低纲领派。1906年行将结束的时候，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决定停止恐怖活动，这主要是由于警方坐探在其中捣鬼使这种行动名声很坏。被开除出党的分裂分子之所以被称为最高纲领派，是因为他们不同意推迟影响更为深远的要求，而为一个最低纲领工作。除了主张不断进行恐怖活动以外，最高纲领派在社会革命党运动内部还鼓吹采取直接行动为革命筹措经费的政策，即主张抢银行和金库，拦劫他们探知携有金钱的国家或企业人员，以暴力对个人或产业集团进行勒索。这些方法，除了暗杀以外，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大量采用；其合法性的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都曾引起过激烈的辩论。孟什维克的主体在取得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控制权以后，宣布反对这些方法；但是有一些孟什维克团体，特别是格鲁吉亚人，却

持不同的见解。尽管统一代表大会做出了决定,但在某些地区,这些方法仍然继续为社会民主党人所采用;社会革命党人采用这些方法的甚至更多。

最高纲领主义作为社会革命党运动左翼的信条,可以追溯到民粹派的极端主义。它往往能吸引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社会阶级中牢骚特别大的人;而它的恐怖活动和抢劫银行的行为则显然对犯罪分子有吸引力,其中弄钱的方法显然特别能吸引罪犯;有一些以非法手段弄来的钱常常中饱私囊。社会革命党运动的左翼始终是一个大杂烩,里面有理想主义者、半疯的狂热分子、罪犯和警方坐探;有些人有时还不止具有其中的一种身份。格黎戈里·涅斯特罗耶夫于1901年在巴黎出版了《一个最高纲领派的日记片断》,由V·L·布尔采夫作序,这本书鲜明地表达了这种信条的理想主义方面。涅斯特罗耶夫对革命的看法具有高度的伦理性质和理想主义性质:他看到了即使从最高尚的动机出发从事罪恶活动并同罪犯厮混,对一个人的性格也是很危险的,但是他又不能因此就放弃自己认为必须为革命干的工作。在他看来,革命者的中心任务不仅是扩大阶级觉悟和促进阶级组织,而且还要根除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拜物教崇拜以及对法律的尊重,后者经常使被剥削阶级的行动陷于瘫痪。涅斯托罗耶夫远不是虚无主义者或涅恰也夫式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心肠很软,而且对出于自自动机的犯罪行为会毫不犹豫地加以谴责。他同列宁一样,把革命事业放在一切之上,只是对他说来革命是个人在道德上必须履行的责任,而不是历史的必然性。

第二届杜马的选举结果根本不符合斯托雷平的心愿。立宪民主党人丧失了地盘,议席从187席减为123席。比他们右的是34名十月党人和63名十足的反动派人物;比他们左的是大约100名劳动团分子和14名人民社会党人(比社会革命党人右),34名社

会革命党人,以及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共66名(其中包括33名孟什维克,15名布尔什维克,和16名不能划归这两派之中任何一派的人)。第二届杜马在成分方面肯定比第一届更为激进,但也同样没有力量。当第二届杜马在1907年3月举行会议的时候,革命的潮流肯定已经被击退。政府已经抛弃了在立宪问题上同立宪民主党人妥协的一切想法。斯托雷平对土地问题有他自己的解决办法,他打算贯彻这套办法,根本不要立宪民主党人帮忙。当局让第二届杜马从3月开到6月,并且听任社会主义者把杜马当作向人民讲话的讲坛。但是斯托雷平不过是在等待一个方便的时机除去杜马,而且已经制定了计划,以确保不会再有同样性质的杜马在这一届杜马之后出现。

在第一届杜马中,除了人数众多的一批立宪民主党代表以外,还有实力雄厚的劳动团代表。劳动团由于社会主义政党拒不参加,成分非常复杂,其成员主要是从农民选举人团中选出来的,但是也有少数人来自城市工人。这批代表将近有100人,联合成为一个没有十分明确的纲领或政策的政党,在宪法问题上主要支持立宪民主党,但力主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和制定社会法。其中的大多数成员更接近社会革命党人而不接近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还有少数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格鲁吉亚人),他们来自党参加竞选的非俄罗斯地区。

劳动团在社会主张方面态度是激进的,力主土地由地方选出的、主要成分为农民的机构来分配,而不是由圣彼得堡派下来的中央委员会来分配。在政治方面,他们是极端民主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还是相当幼稚的民主主义者。他们的领袖有阿列克赛·阿拉季因(生于1873年),此人以前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学生,曾经被流放过,后来成了职业革命者;另外还有斯捷潘·安纳钦(1869—1946年),他是农民出身的乡村教师。但是在劳动团的领袖中也

有一些非农民出身的左翼知识分子。劳动团的代表在杜马中竭力推动土地问题；但是在早期，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立宪民主党人领先提出了实行普选制和建立西方式的责任代议制政府的要求。

474 第一届杜马从1906年4月一直继续到7月。它是在普遍重新爆发罢工(主要是为了经济目的,大多数获得了成功)和农民骚乱的浪潮中开始工作的。当时一眼就可以看穿,政府根本无意对立宪的要求作出让步,尽管在幕后曾就某些立宪民主党人参加政府的问题进行过谈判,而且立宪民主党人最初甚至希望被邀请组织一个由米留科夫领导的内阁。不久以后,杜马就开始注意另一个非常迫切的重大问题——土地改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是立宪民主党和更右的政党之间,而且是立宪民主党和劳动团之间,都存在相当大的分歧。立宪民主党人主张把相当大一部分地主土地交给农民,并不象大多数劳动团分子所要求的那样,全部予以没收。正当这两派设法达成协议的时候,右翼团体却说服已经受斯托雷平控制的政府宣布,不管杜马做出什么决定,都不剥夺私人所有的土地,甚至连荒地也不剥夺。于是,立宪民主党人决定公开发表一个“告人民书”,抗议政府的行动,但是措词温和,而且告诫人民保持冷静,不要采取非法行动——提出这一告诫时,正值农民起义普遍蔓延开来,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说明,军队中也存在着不满情绪!当立宪民主党的“告人民书”交付表决的时候,只有立宪民主党议员投票支持。右翼政党和社会民主党人投票反对,劳动团议员弃权。政府抓住杜马中的这一分裂当作解散杜马的好时机:立宪民主党人同左翼政党的分裂看来使它们不可能采取联合行动。

第二届杜马召开的时候正值社会民主党召开第5届党代表大会。这届党代表大会最后是在伦敦开成的,在这以前代表们跑遍

了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寻找开会场所，而且把钱花光了，以致不得不向亨利·乔治式的石脑油商人约瑟夫·费尔斯借钱付帐。这是一次与会人数众多的代表大会，会上布尔什维克（105名）只是略多 475 于孟什维克（97名），其余的代表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44名，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29名和崩得代表57名。后几个集团在不同的问题上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但是总的说来，大多数人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大会明确地谴责了同立宪民主党人结盟的政策，并批准了同劳动团和社会革命党人在选举中进行合作。阿克雪里罗得和拉弗林联名提出的举行一次全面的会议来组织一个包容各方面的劳动党的建议遭到了否决。关于工会问题的一项决议强调，党必须领导工会，党和工会之间必须建立明确的组织关系。布尔什维克虽获得了这些胜利，但反过来代表大会也谴责了抢劫公款或袭击银行之类的“党派”活动，并且下令解散“战斗”组织——也就是解散专门负责准备起义、夺取武器和训练巷战战斗人员的机构。起义问题没有列入议程，因而没有直接加以讨论。多数人都认定革命已经暂时丧失作用，今后将开始一个新的地下工作时期。布尔什维克力图说服大会谴责党的杜马代表同立宪民主党人合作过了头，特别是在土地问题上没有奉行应有的战斗性政策。但是他们的意见被否决了。波兰人和崩得分子，还有大多数拉脱维亚人，反对任何可能使党分裂的作法，而且在产业工人同农民之间的正确关系上，他们也和孟什维克一样，认为农民只居于次要地位，跟布尔什维克的看法不同。用后来的著作家的话来说，以罗莎·卢森堡为首的波兰人在对待“农民革命”的理论上犯了“托洛茨基的偏向”的错误，倾向于认为产业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革命力量。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参加了伦敦代表大会，但是斯大林没有说什么话，而托洛茨基则谈了很多。他对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进行攻击，企图以责骂双方的方式使他们联合起来，从而招致了

476 很大的恶感。他猛烈攻击孟什维克的“取消派”——这是给那些希望取消战斗组织、按照德国的方式把党建成一个群众性政党的人起的名称；他同意列宁的意见，认为必须建立工农联盟，不过他认为产业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应起主导作用。除了这些意见以外，他攻击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双方只追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坚持自己的“不断革命”论，认为这种革命在所有各个阶段都将依靠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力量来进行。在“党派”活动问题上，托洛茨基也反对布尔什维克，同时主张根据自下而上的民主方针组织党，反对列宁的集中制以及坚持严格纪律的态度。但是与此相反，他赞扬地下斗争，并且强调党必须准备在时机到来时领导新的起义。他时而投票赞成这一派，时而赞成那一派；他拒不承认两派之间的争执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同时告诉双方不要在彼此之间筑起一道“纸墙”，这种态度使双方都感到恼怒。他说，“如果你们认为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那也至少要等到实际事件——而不仅仅是一些决议——迫使你们不得不分手的时候再说。不要跑在实际事件的前头。”

这是不中听的劝告，哪一方都没有理会。在代表大会期间，两个对立的派别不断单独举行会议，以便在举行正式辩论以前决定自己的态度；在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布尔什维克立刻重建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同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一起存在。

6月，斯托雷平采取行动了。他首先要求杜马同意逮捕某些议员，他指控这些人在武装部队中搞鼓动宣传。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时，他就解散杜马，并且把所有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成员和一些其他人全都逮捕起来，只有逃往国外或躲藏起来没找到的人除外。这些被捕的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中大多数在那里一直呆到1917年革命使他们获得自由时为止。斯托雷平就这样处理了第二届杜马，随后便着手进行安排，以保证自己准备召集的第三届

杜马不再象第二届杜马。他利用沙皇的诏书，改变了整个选举制度，使之保证反动派的优势地位。波兰人和其他非俄罗斯居民被剥夺了选举权；士绅阶级在选举人团中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城市居民 477 的比重则减少了。9月底和10月初举行的选举使立宪社会党人减少到53席，而十月党人则得133席，极右派得145席。社会民主党人减少到14席，劳动团也减少到14席；社会革命党人完全被排除了出去。残余的反对派包括波兰人、穆斯林，以及各色各样的“进步分子”，总共65名。1912年选出的第四届杜马的组成情况同第三届杜马大致相同。在这两届杜马中，包括十月党人在内的右派超过中间派和左派的总和的比数达二比一以上。

就这样，在1907年以后，杜马甚至连温和的立宪改革作用也无法起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再次开始依靠地下宣传。第三届杜马俯首帖耳地认可斯托雷平的各项政策，它在新的屠犹恶浪中开会。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在继续推行：许多温和派的改革者不再拥护立宪主义，而赞成政府的措施，认为这些措施促进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健康发展并改良了耕作法，从而为国家的经济生活提供了一个新的稳定因素。动乱和零星的骚扰，以及不时发生的恐怖行动仍然在继续。1911年，斯托雷平本人也遭到暗杀。但是第一次俄国革命毕竟已经过去。

俄国在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在1907年以后的几年中几乎完全消失了。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都衰微到几乎不复存在，工会也仅仅是一息尚存。罢工活动寥寥，而且在斯托雷平一手搞镇压一手推行某种改革的局面下，农民骚乱也平息下去了。只有小型的社会主义团体依然存在，他们被捕乃是家常便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也大不乏人。尽管如此，专制制度和警察统治都有了相当大的缓和（除了对付肯定被目为危险的集团以及伺机准备发动新的革命起义的集团以外），这是斯托雷平在杜马中和上

478 升的资产阶级以及十月党人携手合作，并且在农村中推行扶植富农分子的政策的结果。那些愿意顺应改革后的沙皇统治的人得到了较多的言论自由。新闻检查也放宽了，那些仍留在杜马中的小型左翼集团也能进行一些合法鼓动。在这些情况下，许多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开始相信，正确的政策是解散地下组织，集中力量在法律界线内抓住机会采取行动。

当然，法律界线绝不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当局可以任意突然袭击自己认为有颠覆活动嫌疑的团体，可以封闭冒犯当局的刊物，而且作为最后一着，还可以随心所欲采取任何严厉手段进行镇压。但是，斯托雷平有一部分政策是留出一些余地，让人进行合法宣传，并且设法使“温和派”同极端派分家。在工业领域，他让大家搞某种类型的工会，但不允许成立超出地区范围的全国性混合工会，或者把各种不同行业和工业的联合组织纳入工会理事会或苏维埃。工人或农民的政治组织仍然遭到取缔，但是比较温和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却可以自由行动了。

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事实上，从1906到1914年的整个期间是党派之争激烈的时期；激烈的党派之争不仅在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发生，而且也在这两个敌对派别的内部发生，在两者同所谓中派（不要同集中派^①混为一谈）之间发生，在它们同企图为它们进行调解的“调和派”之间发生。其中最重要的斗争有以下几个：（1）布尔什维克和中派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也就是反对那些希望取消地下组织，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合法宣传的孟什维克和其他右翼团体的斗争；（2）列宁派同“左翼异端派”的斗争，后者希望把社会民主党人从杜马中召回来，集中进行地下活动，而不进行合法的活动，

① 按指后来以萨普朗诺夫等人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即民主集中派。——译注

“左翼异端派”又分裂为“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3)列宁派同“经验批判论者”以及“经验一元论者”的斗争，这些人希望根据“新康德主义”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4)列宁派同卢那察尔斯基集团的斗争，这个集团想在社会主义同宗教的关系方面搞出一套修正理论；(5)列宁派和右翼孟什维克反对托洛茨基的中派集团(通常被称为“调和派”)的斗争，中派主张建成一个广泛的党，承认意见分歧的合法性，不强制执行严格的纪律，但拒绝放弃“暴动主义”或地下工作；(6)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反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斗争，这种民族主义的主要宣扬者是崩得，但也表现在格鲁吉亚人以及俄罗斯帝国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身上；(7)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主张民族自决而反对罗莎·卢森堡和多数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后者在波罗的海各国也得到一些支持。

群众运动衰退了，立即爆发革命的前景也完全消失了，于是剩下的积极分子便在自己身上做文章，而且有充裕的时间在理论问题上进行争论。这几年的党派之争，其部分原因固然在于行动的愿望受到了挫折，但是在大多数争执的背后，却潜藏着以列宁为一方、以他的大多数反对者为另一方的深刻分歧：前者坚持集中主义，反对各种自由主义；而后者则主张比较富于自由主义和平民民主主义精神的概念。正是列宁蓄意地毫不畏缩地挑起了大部分争吵，而且拒绝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妥协，尽管他偶尔为了跃进而暂时后退一步。

如果稍加详尽地叙述社会民主党各派在各种会议上展开上述争执的过程，那会是极其枯燥乏味的。在1906年的统一代表大会以后，社会民主党只举行过一次正式代表大会，那就是1907年的伦敦代表大会。在此以后，只举行了一些会议。代表大会同会议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有权进行辩论，而无权作出有约束性的决定。它可以提出意见，但根据统一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在代

表大会休会期间，政策的决定权属于中央委员会。在1912年以前，这些会议至少曾打算代表整个社会民主党，但是在那一年，布尔什维克召集了一次会议，只邀请了少数经过挑选的孟什维克团体参加。这一次会议擅自行使了代表大会的权力，驱逐了右翼孟什维克，使社会民主党最后彻底陷于分裂。从1908年开始，孟什维克一直在日内瓦出版一种刊物，名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托洛茨基则一直在办自己的《真理报》，这个刊物先在利沃夫、后来在维也纳出版。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机关报大部分时期是《无产者报》，它自称是全党的正式机关报。另外有一些刊物时出时停，其中有秘密出版的报纸，也有公开发行的报纸，还有一些舆论性的刊物。1908年12月，在巴黎举行了一次有来自两个主要宗派的16名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承认俄国的形势已经起了改变：政府同资产阶级言归于好了，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思想衰落了，群众运动一蹶不振了，而且还出现了列宁所说的“取消主义”趋势。会议着重指出中央委员会有权监督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议会党团；它通过投票决定恢复党在革命时期放弃的集中制。在这些问题上，孟什维克少数派的票数居于劣势：布尔什维克完全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召回派在会上也遭到了否决。1909年夏，《无产者报》编委会和一些地方委员会的若干名布尔什维克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恢复了对“左翼异端派”的斗争。列宁说服会议谴责左派集团的活动，也就是谴责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召回派主张社会民主党人撤出第三届杜马；最后通牒派以波格丹诺夫为领导，要求向社会民主党议员（其中大多数是孟什维克）提出一项最后通牒，通知他们必须服从中央委员会，否则就开除出党；“造神派”由卢那察尔斯基领导，他们说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宗教，因而受到严厉指责。

异端派并没有俯手帖耳地听人指责。这一派的各个团体联合

起来在卡普里创办了一所宣传员培训学校，一直办了好几年。他们还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前进报》，同《无产者报》以及控制这一刊物的列宁派分庭抗礼，展开激烈的争论。这所学校的教员有小说家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年)、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年)、A·波格丹诺夫(又名A·A·马利诺夫斯基, 1873—1928年)、G·A·阿列克辛斯基(生于1879年) 481和M·N·利亚多夫(生于1872年)——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运动中的著名人物。

在这一时期，孟什维克内部也发生了争执。在国外的大多数领袖——其中有马尔托夫、阿列克雪里罗得和唐恩——已经急剧地向右转。实际上，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以至普列汉诺夫同他们分了手，退出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并开始出版一种与之相抗衡的报纸。普列汉诺夫仍然不愿意看到社会民主党最后分裂，或者放弃为新的革命进行准备的地下工作。他同布尔什维克恢复了关系，为党的刊物写了若干篇文章。但是不久，他又反对列宁重申在党的行为中实行严格集中制和排斥异己的政策的做法。从此以后一直到1914年，他一直心神不定地徘徊于党内斗争的边缘上，一方面希望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党，另一方面又不喜欢极权主义的控制。

列宁于1908年写出了一本独特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是向波格丹诺夫及其一伙展开辩论的一个文献。他在这本书中严厉批判了那些背离纯粹的唯物主义，企图在新康德主义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列宁不是哲学家，除了通过马克思主义以外，并不熟悉专门的哲学。但是由于有人想把自己从奥地利科学哲学家恩斯特·马赫(1838—1916年)以及德国哲学家理查德·阿芬那留斯(1843—1896年)那里学到的东西搬进社会民主党里来，使他感到怒不可遏，于是他开始学哲学，特别

是学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以便武装自己,打倒他们的那些异端邪说。经验批判主义这个名称实际上是阿芬那留斯为自己的哲学体系所取的名称,这套哲学的基础在于力图沟通思想和行动之间的联系,同时阐明知识同得自环境的经验之间的关系。阿芬那留斯就象马赫一样,宣布了思想中的“经济原则”,但是阿芬那留斯的途径是通过科学,而不是通过哲学冥想。马赫主要是一个生理学家,但在早期阅读过康德的著作,受到他的影响;按照马赫的解释,康德的现象论的含意是:感觉是经验的唯一内容。马赫从自己的生理学研究出发,对各门科学中所用的方法进行了精密的研究,力图消除一切形而上学的因素。同粗浅的唯物论者相反,他驳斥了“实体”的整个概念,认为这不属于可能认知的范畴。在心理学领域中,他就心理过程发展了一套纯感觉论,内容同阿芬那留斯的理论十分相近。按照马赫的理论,科学法则并不是事实的最后陈述,而只是进行观察的方便工具。在俄国,波格丹诺夫及其一伙坚持这些概念。他发展了一种理论,自称为经验一元论。按照这种理论,构成可认知的世界,而且应该当作实在看待的是经验的感受内容,而不是物质客体。

在列宁看来,这种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似乎具有破坏性,对唯物史观尤其如此。这种理论似乎否认了人类历史是由客观真实的力量(即生产力)决定的,从而沦为“主观主义”,这正是米海洛夫斯基和彼得·拉甫罗夫的民粹派理论的绝大错误。在列宁看来,马赫主义或波格丹诺夫主义同贝克莱主教的唯心主义即使有任何区别的话,那也是微乎其微的。在列宁的眼里,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简直是洪水猛兽。在反对这两种主义的过程中,他几乎肯定了粗浅的唯物主义,而这正是马克思曾经煞费苦心使自己的理论与之分家的东西。实际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一本非常拙劣的书,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如

此。这本书准备不足，写得外行，显示出根本没有能力领悟比较细腻的问题。然而从论战的角度着眼，这本书却成功地指明了新康德主义、经验批判主义和经验一元论是不能容许的异端学说，它们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并且为伦理概念闯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打开了大门。虽然马赫把自己的概念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但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两人同马克思主义或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丝毫没有关系。他们所关心的是人类知识的性质和内容。但是在列宁看来，唯物主义概念必然肯定物质客体的最后实在性；只要是否认这一点，或者否认物质客体的可知性，那就打击了唯物主义的根本基础，因而也就是打击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基础。

在1908和1909年，这一争论一直在布尔什维克内部激烈地⁴⁸³进行着，而且部分地转移了他们对自己同孟什维克的争论的注意力。1908年，社会民主党没有举行代表大会或会议^①；1909年也只举行了一次《无产者报》编委员的扩大会议。不过到了1910年1月，社会民主党却举行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调和派”再次做出尝试，想把各派团结起来。令人奇怪的是，这次会议竟利用每一派都能各执一说的含糊词句，设法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代表们同意取消一切宗派集团，并且把《无产者报》同右翼孟什维克的刊物《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合并，给予托洛茨基的《真理报》一笔补助费。这次全会任命了一个新的编辑委员会，由列宁、季诺维也夫、马尔托夫、唐恩以及波兰人瓦尔斯基组成——这是一个最没有希望搞好的班子；全会还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代表所有主要的集团，其中包括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和崩得。

毫不足怪，这个计划始终没有实行过。一部分孟什维克拒绝

^① 在这里作者显然有误，因为本章前面已经说过，社会民主党在1908年12月在巴黎召开过一次有来自两个主要宗派的16名代表参加的会议。——译注

合作；《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也在继续出版。在俄国国内，被提名的孟什维克大都拒绝参加新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普列汉诺夫和一部分孟什维克设法实现所达成的协议，但是实际上孟什维克分裂出去了——这也许正是列宁所一直希望的。不过有一年多时间没有进一步采取明确的步骤。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和崩得分子逐渐退出了中央委员会以及党的其他组织，而自行其是。到了1911年6月，布尔什维克决定结束这出统一的滑稽剧。他们会同波兰人和普列汉诺夫集团，断绝了同一年以前设立的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关系，而且以自己的追随者为主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去代替它，同时还责成它召开一次党的会议。但是这个新组织几乎立刻就分裂了，因为普列汉诺夫在发现布尔什维克决心同右翼孟什维克彻底决裂以后便退出了这个组织。因此，布尔什维克决定既不要普列汉诺夫集团，也不要波兰人，自己干自己的。他们成立了另一个基本上由新进人物组成的组织委员会，并且决定召开一次由他们自己的支持者和来自俄国国内的少数左翼孟什维克参加的党会议。组织委员会于1912年1月在布拉格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把右翼孟什维克开除出党，并且宣布他们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的唯一真正代表。于是，布拉格会议就把正式代表大会的权力揽到了自己手里，而且实际上成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成立大会。

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和崩得分子都被邀请参加布拉格会议，但是他们拒绝出席。崩得大体上赞同孟什维克的意见；波兰人主张和解，并且谴责列宁集团分裂党；拉脱维亚人则正进行自己的宗派斗争。这次会议无疑是一次布尔什维克的会议。它谴责俄国政府以及与之合作的自由主义分子，谴责右翼孟什维克放弃了革命，同时重申自己发动起义的目标。关于下一阶段，它通过了一条包括三点的口号，即党将领导工人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争取实现

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产业。会议还完全恢复了1905年以前的实行集中制和严格纪律的党组织结构;会议绝没有放弃合法活动,事实上还采取措施发展这种活动,但也同时大力强调必须建立一个肯定具有革命性的地下组织。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调和派”和被开除的孟什维克自然感到非常愤怒。1912年1月,他们成立了一个对立的组织委员会,任务是召开一次向一切集团开放的党的“全体”会议。普列汉诺夫拒绝参加这个组织,超然地站在一旁。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了会议,但是几乎立刻就退出了。拉脱维亚人、崩得分子和“前进派”集团同意参加。但是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前进派”集团退了出去,而且恢复了它效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拉脱维亚集团也由于内部发生了变动而退出了会议。这样一来,托洛茨基便感到狼狈不堪,发现自己被扔下来同中派以及右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唐恩)所控制的会议周旋。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在合法的范围内拟定了一个纲领;建立了一个实际有效的新孟什维克党,许多不同意“取消主义”(这也是托洛茨基和“调和派”⁴⁸⁵所不同意的政策)的孟什维克分子则被布尔什维克党吸收去了。

当孟什维克-调和派举行会议的时候,俄国国内的形势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罢工行动重新发生了,陆海军中的骚乱又开始出现了。1909年以后,贸易和工业一直很繁荣。这时,工人终于组织起来,要求得到自己应该享有的一份。1912年4月,连纳金矿爆发大罢工,示威的罢工工人遭到了枪杀。俄国各地纷纷表示抗议,举行多次罢工。五一节这一天,圣彼得堡和许多其他城市都举行了罢工和示威。布尔什维克立刻采取特别措施去控制复活的工会运动,并且把自己的人安插到大多数工会的关键岗位上去,只有顽固地保持孟什维克立场的印刷工人例外。同一年实行新的国家保险制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成功地掌握了为这一制度而设立的工

人委员会。早在4月，他们就已经在圣彼得堡创办了一个合法的日报——《真理报》，发行额比敌对的孟什维克报纸《光线报》大得多。在连纳大屠杀之后，罢工运动由于重新提出了宪法改革的要求而开始具有政治性。在以后的几年中，罢工运动继续举行，于1914年五一节举行大罢工和示威时进入了最高潮。接着就爆发了战争，从而开始了一个不属本卷讨论范围内的新阶段。

有待稍加说明的是在以上的叙述中所没有涉及的社会民主党的某些内部争执，这些争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民族主义问题，另一个是“不断革命”的概念的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最好不作为俄国所特有的问题来讨论，而应该在一个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也就是在整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内来讨论。

第十一章

486

波兰——罗莎·卢森堡

在1918年告一段落的那个时代中，凡是存在革命运动的地方，绝大部分时间都有波兰人参与其事。波兰人帮助了英国的宪章运动者，波兰人为巴黎公社输送了军事领袖。在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波兰人都很活跃：不仅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和美国，而且在拉丁美洲和印度，都有波兰人的社会主义团体。凡是需要进行战斗的地方，波兰人总是为被压迫者的利益进行英勇的战斗，但是不幸得很，他们彼此之间也发生斗争，这不仅发生在贵族同下层阶级之间，而且也发生在社会党人同社会党人之间。

波兰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其中最大的一部分，即波兰王国，连同立陶宛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西部的波森为普鲁士所管辖；而南部的加利西亚则归入了奥匈帝国的版图。这种分裂的局面使波兰人面临一个问题：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在三个地方有很大的差别，统治他们的三个大国是争夺中欧和东欧统治权的冤家对头。在俄属波兰，1863年的起义说明波兰贵族同人民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两者始终不能参加一个共同的运动，而且由于彼此对立更容易遭到镇压。在1863年起义以后，俄属波兰就丧失了原有的自由。沙皇的政策是俄罗斯化，消灭波兰的语言和文化，这项政策特别是针对波兰贵族而采取的。在镇压了起义以后，沙皇立刻就解放农奴，其做法比俄国国内彻底得多，目的在于削弱波兰地主的势力。这样，无需取消大庄园制，就有可能兴起一个人数众多的自耕农阶级，这个阶级得到机会在经济上取得发展，但条件是接受沙皇的统

487

治,接受俄国的教育和行政管辖,使自己同化。

在同一时期,日耳曼人统治下的波兰人,由于日耳曼人在波兰的土地上定居,而经历了一个殖民的过程。当地居民同移民之间曾发生长期的斗争;尽管普鲁士政府千方百计使波兰日耳曼化,但波兰人仍然基本上成功地保持住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加利西亚,波兰人在奥地利的统治下所受的待遇最好,至少上层阶级是这样。奥匈帝国是一个多民族杂处的国家,不可能使国内的许多民族都日耳曼化。奥匈帝国的日耳曼族统治阶级必须在捷克、波兰以及匈牙利的贵族当中寻找盟友;当它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被德国打败以后,更明确地拉拢加利西亚的上层阶级;这些上层阶级通过自己在奥地利帝国议会中的议员成了帝国统治的堡垒。诚然,它们所得到的并不是自己所想望的回报——在一个三元帝国内占有平等伙伴的地位,但至少在地方事务中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自治。这对它们非常合适,因为这使奥地利的波兰人能作为一个优越的种族去独断独行地统治主要由小俄罗斯或乌克兰农民组成的居民;对这两者本身的民族权利要求,甚至连这个地区比较民主的波兰人也不那么深表同情,其同情程度并不比他们在边界那边俄属波兰的乌克兰或小俄罗斯地区中的波兰同胞更深。

波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确始终是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但是这一支力量不仅在贵族和民主主义之间,而且在奥地利、德国和俄国所统治的波兰臣民之间,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实际上,有的人梦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和重新统一的波兰——其假想的基础一般都是,在自己一厢情愿为这个新国家所划定的版图中,恢复波兰人对被奴役民族的统治。但是在1863年起义失败以后,同时跟三个占领大国作斗争以赢得民族自由的前景,有很长一个时期看来根本不存在。于是就有人计划在奥匈帝国范围内为大波兰取得一种自治的地位,甚至取得第三伙伴的地位。另一些人计划建立一个自治

的波兰，仍然依附于俄国。还有一些人则指望德国成为波兰的解放者，不过这种人为数寥寥。奥匈帝国同俄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德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激烈竞争使整个形势复杂化了，因为这一竞争同波兰问题有关，使波兰的民族主义者和他们的统治者都发生了分裂。 488

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不受到这些分裂的影响。加利西亚的社会党人——也就是说他们中间的波兰人——大都怀有强烈的反俄情绪，其程度绝不下于在维也纳同德国以及捷克的统治阶层分享统治权的加利西亚波兰贵族。另一方面，俄属波兰的社会党人却鲜明地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强烈反对俄国，倾向于同奥地利波兰人合作；另一集团认为，波兰获得自由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同俄国社会党人合作，以推翻沙皇制度为目的。后一派人士往往希望德国和俄国的社会党人帮助他们进行解放斗争，因为这一派的领袖非常怀疑俄国革命如果没有西方的无产阶级帮助是否能获得成功。所谓西方，主要是指德国，他们把德国当成西方最先进和最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故乡。因此，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几乎从刚一出现的时候起就是一支分裂的力量，姑且不谈由于波兰有大量的犹太居民，由于许多波兰民主主义者甚至也抱有强烈的反犹态度，以致运动内部后来又出现进一步的分裂。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波兰并不存在。在这以前，早就有个别的领袖以至团体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曾在1830—1831年担任临时政府委员的中古史学家约阿希姆·列列韦（1786—1861年）就接受了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许多思想，尤其是傅立叶的思想。1831年以后，他在流亡中定居于布鲁塞尔，在那里写了《波兰史》，建立了一个民主协会，并且给左翼刊物写文章。他的关于公社土地所有制和耕作制的著作对比利时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有影响的，但是他并没有在波兰发起一个运

489 动。在 1848 年的革命运动中，波兰人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波兹南地区在 1846 年的一次流产的起义中把力量耗尽了。1848 年，奥地利消灭并且占领了当时仍然保持独立的克拉科夫共和国；在加利西亚，奥地利人鼓励小俄罗斯农民发起叛乱去反对他们的波兰主人，从而制止了一次波兰人的起义。1863 年，主要由贵族领导，掀起了一次起义，但社会主义也没有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在这次起义中发挥任何作用。直到七十年代，才在卢德维希·瓦伦茨基(1856—1889 年)和斯坦尼斯拉夫·孟德尔逊(1857—1913 年)的领导下，第一次进行尝试，有志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运动。瓦伦茨基的社会主义生涯是在圣彼得堡求学时开始的。为了同工人建立联系，他曾在华沙的一家机械工厂工作，后来遭到逮捕的危险，便逃到加利西亚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879 年，他从奥地利被驱逐出境，前往日内瓦。1881 年，他回到华沙，帮助成立了地下组织“无产者”，这个组织搞了许多次罢工。1883 年，他再次被捕，6 年以后死于狱中。瓦伦茨基同俄国的恐怖组织民意党有联系，并且同情该党的理想，但是他不赞成暗杀，而赞成掀起罢工去瓦解经济和政府的工作。虽然他从事实际活动的时期很短，但是他的思想在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还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实际上已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痕迹。

到了 1885 年，俄国当局逮捕了“无产者”集团的大多数领袖，其中有四人被绞死，从而破坏了这个组织的力量。但是有一批残余力量留了下来，而且第二年这个组织还吸收了一个杰出的新成员，那就是罗莎·卢森堡(1870—1919 年)，当时她只有 16 岁。她立刻积极从事活动。两年后，“无产者”改组，并再次着手组织工会和煽动罢工。但是第二年，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分了家，当时成立了一个波兰工人同盟来负责工会工作，而“无产者”则集中精力进行地下政治活动。同年，卢森堡遭到了被捕的危险，于是便在社会主

义同志马丁·卡斯普尔扎克的帮助下逃到了瑞士，并定居在苏黎世求学。她在苏黎世遇到了一批俄国社会主义流亡者，其中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帕乌斯，还遇到一些波兰人，其中有她未来的合作者朱利安·马契列夫斯基和阿道夫·瓦尔斯基。她从普列汉诺夫及其朋友那里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第二年，利奥·约吉赫斯（又名杨·梯什科，1867—1919年）加入了这一伙，同卢森堡成了终身朋友。约吉赫斯小有钱财，曾因从事社会主义活动被捕入狱，后来逃出了波兰。他同普列汉诺夫曾作出计划，要创办一个马克思主义刊物，但在刊物的控制权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计划告吹。1892年，俄属波兰（特别是在罗兹和华沙）举行了五一节大罢工；罗兹的罢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时遭到了哥萨克骑兵的射击。由于这个运动，“无产者”、波兰工人同盟以及一些其他团体，合并成为波兰社会党，主要领袖是约吉赫斯和瓦尔斯基。新党创办了一个刊物《工人事业报》，由瓦尔斯基主编，一直发行到1896年。 490

卢森堡当时仍住在苏黎世，曾代表这个新成立的党参加1893年在该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但是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分裂。1892年，巴黎的波兰流亡者组成了一个波兰国外社会主义者联盟，也派出代表参加苏黎世的代表大会；它的代表对波兰社会党代表的代表资格提出了质疑，该党代表中的朱利安·卡尔斯基（1866—1925年）就未获批准出席。但是卢森堡却被允许在代表大会上就俄属波兰的情况提出报告。她充分利用这个机会，阐述了她和约吉赫斯已经考虑成熟的见解。她主张成立一个秘密的、但又是以民主方式组成的党，党应该提出工人的经济疾苦，组织罢工，从而在工人中间发起一个群众运动；同时还应该在政治上展开斗争以争取民主自由，但是党应该完全独立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之外。

她在这段发言中强调完全独立的必要性，无非是要着重指出

工人运动不同争取波兰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发生任何关系的重要意义。对立的波兰国外社会主义者联盟主张民族主义；而罗莎·卢森堡、约吉赫斯和瓦尔斯基则认为，俄属波兰社会主义者的正确道路，乃是参加俄国工人和俄罗斯帝国内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团体的斗争，同他们一道投入革命，推翻沙皇的统治。在卢森堡等人看来，这场革命本质上是国际性的。这就是“无产者”集团和瓦伦茨基的纲领，他的继承者把这个纲领带进了新的波兰社会党。但是这个政策既不合奥地利波兰人的胃口，也不合俄属波兰的许多社会主义者的胃口，其中有瓦伦茨基的一些老伙伴，如孟德尔逊和H·雅诺夫斯卡等。于是发生了分裂；约吉赫斯那个集团成立了一个新党——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也就是说，该党自称只代表俄国统治下的旧波兰王国地区。但是1899年，它扩大了自己所代表的范围，把立陶宛也包括了进去；而这里在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1877—1926年)的领导下，已经成立了一个单独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后来在俄国和波兰的运动中都起了杰出的作用。

波兰社会党的争执在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上又重新爆发。波兰社会党的代表，特别是加利西亚波兰人领袖伊格纳西·达辛斯基(1866—1936年)，甚至提出指控说，卢森堡和瓦尔斯基是警察的坐探，接受了破坏运动的任务。由彼德·拉甫罗夫主持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已经确认对瓦尔斯基的指摘毫无根据，但是这并没有能阻止他们重新进行指摘。正当达辛斯基再次指控他们的时候，波兰社会民主党已经由于许多积极分子被捕而遭到破坏。这个党基本上丧失了活力，直到1899年才有相当大的起色。这一时期，即1896和1897年，卢森堡住在法国；1898年，她出版了第一本重要著作，这是一本关于波兰工业发展的博士论文。不久，她同古斯塔夫·吕贝克(一个同她家庭相熟识的朋友)结婚，为的是取得

德国国籍而不是俄国国籍，以便于为社会主义工作。这不过是以友谊为基础而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法律形式上的结婚。早在这以前，她已经钟情于约吉赫斯，但他们没有结婚。实际上，由于医疗上的错误，她从童年时代起腿就有点瘸；在她那忙碌的一生中，她的健康状况始终很坏。

卢森堡结婚以后定居在德国，并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非常活跃，特别同俄国人 A·L·赫尔芳德（更出名的名字是帕乌斯）进行合作；赫尔芳德当时正在德累斯顿为《萨克森工人报》写社论，猛烈攻击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方案。卢森堡也为编辑《莱比锡人民报》的布鲁诺·舒恩兰克（1859—1901年）写文章。1898年，帕乌斯被赶出萨克森，卢森堡接替他担任《萨克森工人报》的社论撰稿人。她继续他的政策，其中包括大力强调工会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她几乎立刻就因激烈攻击主编格奥尔格·格拉德瑙尔而惹起了麻烦，此人是德累斯顿的社会党议员，属于右翼。于是她辞去了编辑职务，移居柏林，仍然为舒恩兰克的刊物写文章。在柏林，她成了考茨基的密友，并经常为考茨基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理论性机关报《新时代》写文章。她继续激烈攻击修正主义者；1900年，她把自己的一些文章编成一本小书重新发表，名为《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本书把她提高到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极左翼的主要发言人的地位。她还激烈攻击那些为米勒兰加入瓦尔德—卢梭内阁的行为辩护的人，其中包括让·饶勒斯。尽管如此，饶勒斯仍然是她的一个亲密朋友，她是非常赞赏饶勒斯的才华的。同时，她继续对波兰和俄国的问题感兴趣，支持列宁反对经济派的运动，并为波兰和德国的刊物撰稿。在1902年比利时举行未获成功的总罢工时，她攻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艾米尔·王德威尔得，指摘他使罢工仅仅成了帮助比利时工党的示威，同自由党妥协。在她看来，他应该唤起工人天生的战斗性，从而大大加强罢工运动的革命性。

当第二国际在以后的几年中就总罢工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她把上述观点发挥得更加透彻。

493 1903年，在修正主义者在德国党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卢森堡同德国党的领袖们发生了分歧，其中包括考茨基和倍倍尔。象考茨基一样，她主张对修正主义者采取激烈行动，如果他们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直至把他们开除出党。但是党的领袖们相信必须首先维护党的团结；在这个问题上，她和考茨基没有从这些人得到支持。

卢森堡同考茨基的争执，是在另一个不同但又有关的问题上发生的。她认为，党的责任是积极为革命进行准备，而不是空谈革命；她完全反对这样的想法：“革命”可以推迟到党赢得议会多数以后再说，到那时通过协商劝使旧政权投降，不必使用暴力就能完成革命。她不相信存在这种投降的可能性；她认为更大的可能是，只要社会民主党看来接近于取得多数，党就会再次遭到取缔，成年男子选举权也可能会被剥夺，就象萨克森已经发生的那样。因此，她要求党明确无误地为采取非法行动做好准备，在武装部队中进行宣传，蔑视政府的镇压。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党的领袖们甚至更加不愿意考虑她的建议。他们对法制深表尊重，而且决心尽可能在法律的范围内开展运动，以便把徘徊不定的选民争取过来，不给政府以重施俾斯麦的迫害手段以口实。^①

在这以前，卢森堡曾于1902年担任《莱比锡人民报》的社论撰稿人，但是那次她也没有工作多久。她同新闻检查当局发生了争执，拒绝接受删节而辞了职。她的左派同事弗兰茨·梅林(1846—1919年)接替了她的位置，梅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家。

1904年，卢森堡以侮辱德国皇帝的罪名第一次入狱。第二年

① 关于德国党的“革命主义”的深入讨论，参看本卷第六章。

年初，她在释放后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报纸——柏林《前进报》的编辑部工作。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的时候，她正在该报工作，她在那里写了三本小册子中的两本，这三本小册子后来用统一的书名《革命业已爆发，今后如何行动？》出版。革命的爆发使她非常兴奋，渴望投身到革命中去，但是她在生病，于是就想到自己的首要责任是向德国人宣传俄国革命。直到1905年12月，她才克服很大困难设法进入波兰，而等她到达华沙时，波兰人已经失败了。实际上，华沙在1904年是以一系列大规模罢工和农民骚乱来迎接革命的到来的，这主要是日俄战争爆发后征召波兰人参加武装部队引起的。这些遭到残酷镇压的运动导致波兰人同俄国军队发生了相当规模的零星战斗；1904年11月，波兰社会党决定发动真正的起义。这个月华沙发生了激烈的巷战，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到了1905年1月，罗兹和一些其他城市再次爆发大罢工，其中有些发展到半起义状态，但也遭到了血腥的镇压。为了进行这些斗争，波兰社会党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收集武器。1904年，皮尔苏茨基代表波兰社会党于日俄战争爆发之际前往日本，力图游说日本政府提供武器，但无所获而归。然而他在1894年创办的波兰社会党刊物《工人》却仍然主张集中力量组织战斗团体。卢森堡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曾指责这一政策注定要遭到失败，除非在这样做的同时，或者最好在这以前，就组织充满革命意志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卢森堡所阐明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是，尽一切可能致力于发动大规模罢工以瓦解政府：使工业和运输陷于混乱状态，用激励工人投入实际行动的办法使他们具有更坚强的革命思想。卢森堡指出，只有军人拒绝服从命令，起义才会成功，而波兰有俄国军队驻守，因而在武装部队中进行宣传是很困难的。在战术上，她并不反对发动起义，但是她要求事先为这一战术开辟道路，并且要求稍事等待，以期俄国的兵变会自动地蔓延到波兰的驻军中来，

从而为革命胜利创造所必需的条件。在她看来，波兰的革命并不是针对俄国的民族革命，而是俄国革命本身的一部分。大体上说来，波兰社会党对革命的看法也就是这样。

作为一个主张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波兰的政党，波兰社会党自称不仅代表俄属波兰，而且代表德属波兰和奥属波兰。它的第一位领袖是波勒斯劳夫·利曼诺夫斯基(1837—1935年)，但是他后来流亡国外，先后寄居在巴黎和瑞士，已经不再从事活动。1908年，他竟然回到了波兰，而且得到准许不受干涉地定居在那里。他在俄属波兰的地位为约瑟夫·皮尔苏茨基(1867—1935年)所取代。后者在哈尔科夫求学时就已经成了社会主义者，188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92年，他获准回到维尔纳，在那里帮助组成了波兰社会党。两年后，他创办了《工人》杂志，并一直担任编辑到1900年。这一年他被逮捕，但越狱逃到了伦敦，然后又在1902年到了奥属波兰的克拉科夫，在那里一度同达辛斯基过从甚密。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他继续领导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民族主义派。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的那段经历属于这段历史的后一部分。

在俄属波兰，1905年就是以一次大罢工开始的，波兰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支持这次罢工。不久以后大罢工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主要由于经济上的具体不满而爆发的小罢工；波兰社会党不愿意同这些罢工发生关系，因为这些罢工并不能直接为该党的民族起义服务。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则支持这些不断发生的罢工，认为这是唤起工人的手段，并且力图通过提出八小时工作日制口号来统一协调这些罢工；卢森堡也竭尽全力去煽动农民闹事，以加速瓦解的过程，她认为这是取得成功所必备的先决条件。波兰社会党的领袖则反唇相讥，说社会民主党人是罢工贩子，鼓动工人去消耗力量而不是为民族起义保存力量。来自加利西亚的达辛

斯基甚至走到完全谴责罢工的地步，因为罢工有使波兰的工人斗争同俄国的工人斗争合为一体的倾向，而不是把波兰工人团结在波兰民族运动的背后，利用俄国国内的困境达到自己的目的。达辛斯基所想的显然是：如果俄国革命将要取得胜利，那么波兰人就应该抓住俄国政府崩溃的机会宣布独立，但是波兰人并不是作为获胜的革命伙伴宣布独立的，如果出于必需甚至可以反对这场革命。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对俄国的仇恨太深，甚至连同一个革命的俄国政府合作的想法也不考虑。

1905年6月，华沙又爆发了一次总罢工，对此波兰社会党表示反对。到这个阶段，波兰社会党所得到的支持无疑比波兰社会民主党大得多，波兰社会民主党实际上非常弱。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对罢工运动的支持为他们赢得了很多追随者，特别是在工厂工人中间；而波兰社会党则继续在手工艺工人以及左翼知识分子和商人中间得到大力支持。这些阶层中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在崩得中有很多代表；一般说来，崩得是支持社会民主党的，自然反对波兰社会党的强烈的波兰民族主义。

皮尔苏茨基的追随者所主张的起义战术，随着整个俄国的革命潮流日趋低落，也越来越行不通了。波兰社会党的武装组织一直在利用俄国的战斗小组所采用的同样方法——袭击银行、官厅和政府建筑物抢钱，一找到机会就破坏政府的行政管理。正象俄国的情况一样，革命低潮的到来使这种游击战堕落成为不易同赤裸裸的盗匪行径区别开来的举动；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则象俄国的孟什维克一样，强烈谴责这种做法。所有这些分歧所造成的后果是波兰社会党在1906年分裂了。有一派同直接要求民族独立的主张分了家，并且承认有必要同俄国的革命者密切合作。这一派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改组后的社会民主党决定归属俄国社会民主党。另一派追随皮尔苏茨基，把党改称为波兰革命社会党，并指

摘敌对者是民族革命事业的败类。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暂时回过头来谈一下奥属波兰的形势。在1911年以前，加利西亚的波兰人是联合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集团。就象奥地利统治下的其他民族一样，他们有自己的自治组织，他们在帝国议会中的代表在联合的社会党议会党团内部也形成一个集团。1911年以后，这些联合的安排消失了。奥属波兰的社会党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党，仅仅同其他全国性的党互派友好代表参加各个党的代表大会。他们的领袖在分裂以前和以后都是达辛斯基，达辛斯基在1891年第一次当选为奥地利帝国议会议员；他们一度同皮尔苏茨基的波兰社会党有密切关系，但是后来发生了分歧。我们已经谈过，俄属波兰革命失败以后，皮尔苏茨基于1907年把他的总部搬到加利西亚。达辛斯基及其追随者同皮尔苏茨基一样，是强烈反俄的。他们站在奥匈帝国的一边，反对俄国渗入巴尔干半岛，有些人还设想，把波兰补充为奥匈帝国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在加利西亚，他们有自己的问题。这里雇佣了许多奥地利其他地区的工人；这里土生土长的居民中有一大部分不是波兰人，而是乌克兰人，波兰人很容易把这部分乌克兰人看成天生的奴隶民族。虽然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区以农业为主，但奥地利的乌克兰人从1897年起就拥有自己的某种社会主义组织，而且从1899年起又组织了乌克兰社会民主党，领袖最初是米科达·汉基耶维兹，然后是西蒙·维提克和农民出身的贾科·奥茨塔普楚克，还有伊万·瓦茨尼亚克，——前三人都曾当选为奥地利帝国议会的议员。这个党同边界那边俄属乌克兰的乌克兰革命党合作，并且主张同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求解放的政策。在1911年以前，奥地利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党是奥地利党中的一个派别。

以上是题外话，现在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谈俄属波兰的情况。

1906年3月，一直用假名住在华沙的罗莎·卢森堡和利奥·

约吉赫斯被捕下狱。卢森堡设法写了几本小册子，并且偷运出了监狱；但是她的身体垮了；几个月后，俄国当局对她的德国国籍感到头疼，把她放了，交警察加以监视。不久后她获准离开波兰前往芬兰，并在那里写出了第二本重要小册子《论群众性罢工、党和工会》，阐释她的有关革命性群众运动及其作用的理论。同时，约吉赫斯被解往西伯利亚，但很快就逃了出来并恢复了革命工作。

我们已经看到，1907年，卢森堡以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伦敦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①她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在会上那场有关社会党遇到战争应采取什么态度的著名辩论中起了主导作用。我们也谈过，大会最后通过的决议的结尾那一段，也就是说明战争实际爆发时所应采取的方针的那一段，主要就是由她和列宁跟考茨基密切磋商后起草的。考茨基当时所关心的是，决议的措辞不应促使德国政府解散代表大会或者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镇压行动。^②

第二年，卢森堡回到德国，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07年成立的党干部训练学校的教员，接替了因奥地利国籍政府勒令解职的鲁道夫·希法亭的工作。她讲授的是政治经济学，她的最著名的著述《资本的积累》大部分就是根据她在该校的治学所得而写成的。这本书于1913年问世，接着就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起了激烈争论，因为她批评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中的某些部分，尤其是有关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部分。1919年出版了第2卷，她在本书里直截了当地回答了批评她的人。她的未竟篇的《政治经济学导论》虽然是根据她在学校的讲课内容写的，实际上到1916年才写出来，到1925年才根据没有校订的草稿出版。

① 见本卷第502页。

② 见本卷第77—78页及以下。

罗莎·卢森堡除了在训练学校教学以外，一直到1914年都继续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的事务，而且始终是极左观点的代表人物。1908年以后，社会民主党人积极开展运动，争取改革普鲁士所实行的极端反动的等级选举制，对此她大力主张采取更有战斗性的措施。1910年，德国总理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提出建议，打算修改选举制度而不丝毫改善工人阶级选民主体的地位，这时她同另外一些人一道主张举行总罢工，旨在迫使普鲁士政府结束等级投票制，实行平等的普选权。在这方面，她决不是孤立的：运动内部的舆论压力十分强大，迫使党和工会领袖召集特别会议来考虑这个建议。他们决定反对这个建议；工会领袖甚至比党的领袖更不愿意全力反对普鲁士国家的专制权力。此后，卢森堡发现自己不仅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分歧越来越大，而且同中派以及大多数一直被目为左翼的人日益不能一致。1910年，她要求党公开宣布反对君主国家，提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她同考茨基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最后考茨基拒绝在《新时代》上发表她那篇已遭
500 到《前进》拒绝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答辩考茨基在1909年发表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一文。于是她跟《新时代》决裂，并同梅林以及波兰的老伙伴朱利安·卡尔茨基共同创办了一个新刊物《社会民主党通讯》，用以阐述左派的政策。该刊的创刊号于1913年问世。

第二年年初，卢森堡又触犯了法律——这次是由于演说，而不是由于著作。1914年2月，她以在一次反战演说中鼓动士兵发动兵变，而被判处徒刑一年，但是又以健康状况不佳而被缓刑。后来她再次触犯刑章，再次被判刑，但是直到战争爆发以后很久才被捕。1915年2月，她终于身系囹圄；除了几个月时间以外，她始终是一名犯人，直到1918年后期德国发生革命，她才获释出狱。她出狱后只活动了几个月就在第二年年初被反动军官杀害了。但后

来几年的情况不属于本卷的讨论范围，而属于本书的最后一卷。

正如本卷所说明的那样，罗莎·卢森堡基本上是一个国际人物，而不能划归某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她在波兰、俄国、德国以及第二国际中都很活跃；在第二国际中，她是1914年以前的那十年中的杰出人物之一。她在德国社会党的事务中比她在波兰社会党的事务中一贯更加积极。但是她曾同约吉赫斯一道领导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大部分人脱离民族主义立场，基本上以国际主义观念为基础同俄国工人携手合作。在这方面她无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她是犹太人，这在决定她的态度方面无疑是个重要因素，特别是面对着波兰人（其中包括许多波兰社会党人）中间的强烈反犹潮流。她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而且她父母所受的教养也是西方色彩多于东方色彩；从精神上来说，她呆在柏林或巴黎比呆在华沙或圣彼得堡更感到自在。就象托洛茨基一样，她能理解西方的社会党人，在精神上同他们相处得来，哪怕她并不同意他们的见解。她发现自己经常同列宁站在一边反对他们，但是她始终不能接受列宁关于党或专政的概念。在许多方面，她同托洛茨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尽管他们两人都同帕乌斯（关于这个人我们下面还要进一步谈到）交往，然而她同托洛茨基从来也没有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同她交往最密切的有约吉赫斯、考茨基、考茨基的妻子露意莎、克拉拉·蔡特金以及精神文化方面的好友饶勒斯。她同约吉赫斯的关系一直维持到斯巴达克运动最后结束时为止，同考茨基维持到1910年发生争吵时为止，同露意莎则一直维持到底。

罗莎·卢森堡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贡献可以分为三部分：她的关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的看法；她的关于社会党在群众行动和总罢工中的作用的概念，以及她在《资本的积累》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修改的尝试。在头两个方面，她得力于约吉赫斯的地方无疑是很大的，她不仅代表自己说话，而

且也代表约吉赫斯说话；关于第三方面，她可能有受惠于希法亭的地方，但主要贡献基本上是她自己作出的。

在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卢森堡的态度显然一方面受到自己的犹太血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波兰民族主义的排外特性的影响；这种民族主义不仅反对犹太人，而且也反对小俄罗斯人和德属波兰的德国人。波兰人自命不凡，自以为比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其他民族都优越，而且往往以统治阶层自居，这些卢森堡都由衷地感到厌恶。她乐于指出，波兰的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尽管如此自命不凡，但在经受考验的时候，只要自己人民的下层阶级的任何解放运动一露头，又是怎样迫不及待地去乞求俄国、奥地利或者德国来帮助镇压。波兰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使她鄙视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尽管如此，她也同样勇于反对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日耳曼化政策，为德属波兰的波兰人辩护，1900年在波兰出版的她那本小册子《民族辩》正表明了这一点。当然，她也同样敌视沙皇政府在俄属波兰采取俄罗斯化措施。同样，她很鄙视每个民族都享有自决的基本权利这一主张，也瞧不起列宁所阐释的这种权利包括脱离权的提法，这一方面是因为她希望建立一个超越国家疆界的国际工人权威，同时也是因为她对那些居住在被某一国家宣称为其传统领土的范围内的种族或语言群体的问题非常关心。波兰除了存在所有这些问题以外，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波兰的民族主义运动需要明确本身对犹太人、对小俄罗斯或乌克兰农民、对立陶宛人，以及对俄国、德国和奥地利的统治者所应采取的态度。她认为阶级的划分远比种族或语言的划分具有根本的确定性的意义。同马克思一样，她认为民族主义是实现阶级团结的最大障碍。

我们已经看到，波兰的那种社会主义，也就是寄希望于受沙皇奴役的各族人民联合起来结束俄国专制统治的那种波兰社会主

义，并不是由卢森堡创始的。在卢森堡参加运动以前，瓦伦茨基就已经代表“无产者”这一组织提出了那种理论，而且成为该组织同民意党发生联系的部分基础。对瓦伦茨基说来就象对卢森堡一样，波兰人发动进攻的主要敌人应该是沙皇统治，而德属或奥属波兰人的主要敌人则是普鲁士或奥匈帝国的专制制度。他们两人都要求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把工人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既反对使他们陷于分裂的专制制度，也反对那场正驱使分裂的各部转变为对立的集团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是要这样做就不可能不被指摘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敌人。不过在波兰毕竟要比在只有一个民族受外族统治的国家方便一些，因为在波兰，单凭纯粹的民族主义运动就无法同犹太手工艺者和商人或是小俄罗斯农民携手合作，然而却能够号召这两部分人同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以及俄罗斯帝国内的许多其他民族联合起来，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向工人以及农民发出呼吁，原是卢森堡所不断坚持要求的，但这种呼吁无法在波兰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有效地发出，而只能在反对剥削穷人、反对维护剥削者的警察国家的阶级基础上发出。

于是，卢森堡便在民族自决的问题上同列宁发生了分歧。列⁵⁰³宁是在寻找一种方法把俄罗斯帝国内受奴役的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向沙皇统治进军；他认为民族自决和脱离权对争取各民族的支持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口号。他同卢森堡一样鄙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是他相信，为了团结受奴役的各族人民去反对专制制度，在民族自决权的范围内接受民族主义的口号是必要的。就象卢森堡一样，列宁也认识到，当考验的时刻到来，民族主义的贵族老爷和大资本家就会站在沙皇政权一边去对付工人和农民。但是他也相信，如果他能够把追随民族主义者的广大群众争取过来，参加反对沙皇政权的斗争，将来到了摊牌的时候，他也能够得到他们的拥护去反对贵族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这些民族主义者在广大

群众开始威胁到财产权的时候马上就会出卖他们。列宁所考虑的并不仅仅是——甚至也不主要是——波兰的民族主义，他更加关心的是乌克兰人、外高加索人、亚洲各地区的穆斯林，最后还有——但不是最不重要的——芬兰人。此外，他还受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信念的影响。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已经接受了民族自决权，这就使他掌握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可以在自己愿意的时候用来指摘西方帝国主义大国社会党的帝国主义倾向，而且也可以用来争取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在有这种运动存在的地方）成为自己的盟友，向处于最高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资本主义展开斗争。在列宁看来，这些论点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因而对那些反对这些论点的人很难不光火。但是列宁也看出为什么波兰社会党人痛恨波兰的民族主义，而且也很同情他们的这种心情；然而列宁在捍卫自决权的时候，对“人文民族主义”表现出强烈的憎恨。在他看来，在同意为民族自决展开斗争的同时，又致力于组织各国无产者反对其剥削者，从而使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各国民族革命的继续，是完全办得到的。另一方面，列宁认为，人文民族主义（也就是主张

504 每个地区或跨越国界的地方的种族或语言群体有权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则会使工人阶级，在每个有不同种族或语言群体的成员并肩工作的地区，违反本阶级的利益，陷于分裂。因此，列宁绝对反对崩得在任何犹太工人居住区享有单独组织犹太工人的独占权利，不过他不得不同意一个较低的要求，那就是可以在犹太人占多数的地区另行建立不享有独占权的犹太人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卢森堡同列宁是一致的。她虽是一个犹太人，但属于波兰社会民主党，而不属于崩得。

卢森堡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二大贡献在于社会党和工人群众的关系方面。今天，任何认真研究列宁著作的学者都不大会否认——虽然在过去是矢口否认的——在列宁的看法中包含着许多有

时被称之为“布朗基主义”的成分，也就是说相信那些搞密谋活动的中坚分子的革命作用。我并不是说列宁是布朗基主义者，而只是说，就象马克思在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一样，列宁受到了布朗基的某些思想的影响。列宁当然不是布朗基主义者，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强调党必须同工人的群众运动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参加他们的日常斗争。他的思想中的布朗基主义因素，有一部分在于他坚持必须成立一个纪律严明的党，党从一个单一的中心组织起来，而且在选任党的地方委员会和代理机构时可以不考虑民主选举程序；布朗基主义因素的另一部分在于他的关于专政的概念：必须由一个以阶级名义行事的实行集中制的党来执行专政，而不是由直接选举出来的阶级代表执行，无论如何，在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中应该这样办。

这就是卢森堡同列宁意见相左的两个问题。她也要求建立一个强大而有纪律的党作为群众运动的先驱，在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充分发挥作用。但是她坚决认为，除非党的内部机构尽可能保持民主，并始终直接向普通党员负责，同时还通过他们 505 向工人阶级运动中所有有觉悟的群众负责，否则就不能向群众提供正确的领导，也无法不沾染上不负责任的弄权恶习。此外，她只根据以下条件赞成专政：专政不是党对群众的统治，而是一个按照群众愿望办事的党代表群众实行的专政。布尔什维克常常指摘她把信任寄托在工人群众的“自发性”上，并且否认有必要对工人群众进行领导，比如季诺维也夫就曾在一次著名的论战中向她提出这样的指摘。还有人指摘她复活了巴枯宁关于自发性的全国革命只等待人去振臂一呼的概念。事实上，这根本不是她的思想。她的确坚信不疑，革命决不能由一小部分同群众舆论和感情没有联系的坚定的革命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如法炮制，而且相信，革命有机会获胜的条件无法由革命领袖创造，他们只能等待这种条件自己

出现。但是她也同样相信，如果没有一个组织良好的党同群众密切接触并始终注意利用出现的机会，那么这种机会就会被错过或者被糟踏掉。

在上述基础上，卢森堡跟列宁一样支持党参加工人争取部分改革的日常斗争，条件是（同样也是列宁的条件）应该做出一切切实可行的事情来使这种要求具有共同性——比如说，利用八小时工作日之类的共同口号使这类要求普遍化。她跟列宁一致指摘经济主义，经济主义仅仅限于提出改良主义的经济要求，不把这些要求当作跳板去达到更具有革命性的目标。她甚至比列宁更加强调纯经济斗争的教育价值，特别是当这种斗争引起政府采取镇压行动，从而使工人认识到，要求成立立宪政府的资本家跟面对着罢工而要求当局进行镇压的同一资本家之间没有什么区别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但是她更甚于列宁，认为罢工的作用接近于革命的作用，因为她不象列宁那样在两种不同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划出严格的界线，也不象列宁那样肯定，必须有资产阶级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

关于上述“两种革命”的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谈到。这里所谈的主要是革命同罢工的概念、特别是同总罢工概念有关系的部分。一般说来，在1914年以前那几年的大辩论中，卢森堡总是被划为主张总罢工的有力人物之一。事实上她确是这样，但是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她却以强烈反对由代表大会负责发动反战总罢工这一建议的身份出现。她以惯有的激烈态度指出：根据有关国家工人阶级的舆情现状来衡量，这种建议纯属不着边际的胡闹；这种号召如果发出，也不会得到响应；如果工人有意做出响应，那么政府面对这种情绪，也会慎重将事，避免走向战争。她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并不是由于她反对总罢工，远非如此，而是因为她认为：反战罢工必然是一种革命性的总罢工，这

种罢工不可能按照定好的方式如法炮制，而只能从高涨的群众情绪中产生，不过群众情绪则要到一定的时刻才会达到高潮，它无法由一批领袖或一个政党随心所欲地呼之即来，不论这种政党的组织多么强大都一样。她严格区分了奥地利、比利时和其他地方为宪法改革而举行的总罢工同另一些基于群众的情绪而爆发出来的社会性总罢工，后者在正确的领导下可以成为成功的革命的起点。她并不反对前一种总罢工，她认为这种罢工不过是组织非常严密的群众示威的一种形式，其目标是有限的，她否认其中存在着革命潜力。至于另一种总罢工，她也是热烈欢迎的，不过只有当它自动发生，而且党又做好了准备，能够掌握它并为之提供正确的领导时，她才欢迎它。她认为，这种总罢工不能自上而下地制造出来，也不能预定在某个具体的日期举行：工人会自动地举行，但需要党帮助他们使罢工取得胜利。

这种理论不是工团主义的理论，虽然人们常常把它说成是这样。我们已经谈过，当工团主义的总罢工理论把罢工看成是现实 507 而不是社会神话^①的时候，就把一切都寄托在群众的自发性上。另一方面，卢森堡则把这种自发性当做罢工是否实际可行的条件，而决不把它当做成功的保障。

卢森堡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三个主要贡献，包括在她所著的两卷《资本的积累》中，在这部书里，她直接打算做的是修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矛盾”的理论，但她的实际目的则是回答伯恩斯坦，而不是驳斥马克思。这部书的第二卷是为了回答批评她的人，主要是在战争期间被关在监狱里写的，她把那次战争看做是她所要分析的资本主义过程的直接产物。除了那些非常精通马克思著作的人士以外，《资本的积累》不是一部容易理解的书。这部书主要

① 见本卷第 392—393 页。

涉及《资本论》的第二卷，而这一卷却是三卷中最少为人阅读，也是技术性远远强于其他两卷的一卷。卢森堡的这部书是从马克思所做的如下说明出发的：资本主义生产为什么必然会陷入周期性危机，这些危机为什么必然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到头来会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论点的主要内容是：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劳动不断为机器所代替，因而在所生产的每一件商品中，直接的劳动就趋于减少，而资本货物的利用（当然还有它的损耗）就趋于增加。因此，纵使不考虑人口的增加，劳动也会不断被代替，只有在商品需求量的增加速率达到重雇被排斥的工人而仍有利可图的程度，才有可能使他们重新受雇。然而失业的工人会丧失购买力；因此，除非资本家以足够的速度增加奢侈品的消费，消费品的需求就会趋于下降。但资本家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们愿意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投资以取得更大的利润，而不愿用于消费。但是如果新的
508 投资超过了需要用来补充已损耗的资本货物的数目，那就会无利可图，除非能够为新投资本身所增加的产品找到市场。技术的进步不断使生产提高，但是技术的进步又由于取代了劳动而缩小了产品的销售市场。于是资本主义就陷入了周期性的危机，只有大量抛弃不能再用来谋利的旧资本货物才能逃避这种危机。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就在于这种危机本身就是破坏过剩的资本资产的手段。在这一过程完成以后，新的循环又开始了，这时所使用的生产力更高的新资本货物只会使形势更加严重，到时候就会引起毁灭性更大的新危机。

当然，这种分析必须假定已增加的产品并不能由于工资的增加而被工人消费掉。马克思在叙述这个问题时就假定实际工资是固定不变的——这就意味着劳动被代替后会减少因劳动而带来的总的消费量。他认为这一点是从以下事实得出的：机器代替劳动就会增加工人求职的竞争，从而减少他们争议工资的力量。

事实上，他在其他地方也曾论证：资本主义的进展必然会由于求职竞争而使实际工资趋于下降。但是在他有关危机的著述中，他的论点却是：即使不出现下降的工资使差距更加扩大的局面，资本主义也必然会陷入下列两个方面的日益严重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生产力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日趋增加；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市场日趋缩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资本货物的唯一最终用途就是生产消费品，而这些消费品除非能够销售出去，否则对资本家就不能产生利润，于是扩大生产新的资本货物当然就只会迫使越来越多的现有资本货物弃而不用。

在如此论证了资本主义具有破坏它自己的产品市场的固有趋势以后，马克思就不得不答复有人说他的论证言过其实的说法。如果马克思说得对的话，那么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早就崩溃了呢？为什么在暴跌之后又会有新的进展呢？既然新的投资只会使资本家的处境更加困难，那么他们为什么还继续投资呢？关于最后一点，马克思回答说，资本家是不能不继续投资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按其本性就是要谋求扩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在彼此竞争，为了不在竞争中落后，他们就必须不断购买最新式的机器。关于上述其他问题，他的答复有一部分就在于他就资本资产在每一次危机中受到破坏的情况所说的那番话；此外，他的论点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是一种不断扩大的制度的概念：这种制度不断取代比较原始的生产方式，从而创造了可以出售不断增加的产品的市场，于是也就不断找到了新的出路。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并没有提出这一部分论点，这一卷集中探讨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曾毫不怀疑地预计这些矛盾会导致越来越恶化的危机接二连三地发生，而且不久就会出现一种工人有可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面。他在第二卷中力图用科学的方法证明这种崩溃的不可避免性，这一卷在他逝世时并没有最后

定稿。

卢森堡从事著述的时候马克思已经逝世将近 30 年了，她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崩溃并没有发生，而且危机非但没有越来越严重，反而缓和了下来。此外，实际工资非但没有下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反而有显著的上升；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改善，包括每周劳动工时的减少在内。许多经济学家一直在嘲笑马克思的预言，并且预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许多改良主义者也一直在大力说服工人不要追求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而要集中力量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和制定社会性法律，尽量从资本主义制度中争得最大的好处。许多社会主义者，其中首推爱德华·伯恩斯坦，一直在论证说：期望资本主义崩溃是一种幻想；托拉斯和联合企业通过节制生产和销售的过程完全能防止崩溃；社会主义不会通过旧秩序的崩溃或用暴力推翻旧秩序的方式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如下道路来实现：在民主选民的支持下，由社会党制定法律，逐步向集体主义制度过渡。

我们已经看到，罗莎·卢森堡采取的是强烈反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方针；她也同旁人一起反对俄国的修正主义者彼得·司徒卢威以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她绝不愿意抛弃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因其固有的矛盾而必然要崩溃的预言，但是她觉得有必要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并没有早就崩溃，反而越发展越壮大。她在马克思自己所指出的一种发展中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在世界上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的地区为资本主义产品找到了出路，扩大了市场。她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克服一再发生的危机，继续扩大，是因为它不断侵入新的地区，取代更加原始的生产方法，排挤农村手工艺者，发展铁路和航运事业以开辟新的地区，把资本主义方法引进农业，开发新的原料来源，并且普遍地向非资本主义世界倾销它在国内无法卖给自己的雇员的剩余消费品以及在国内投资

中找不到充分出路的资本货物。从长远来说，资本主义的这些冒险行径肯定只能加深矛盾，因为每当一个新地区采用资本主义方法的时候，都会以越来越大的规模重新产生同样的需求不足以及劳工为机器所取代的问题。此外，现有的资本家在使新地区工业化的时候，只会给自己造成额外的竞争，同时由于利用不发达国家庞大的廉价劳工资源，而使旧资本主义地区情况更加恶化。但是，所谓“从长远来说”可能指非常遥远的未来，而在目前，拥有最先进技术条件的资本家则能捞到巨大的利润，并能在新开辟的地区为他那越积累越多的资本找到出路。罗莎·卢森堡说，马克思的错误不在于他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在于他所估计的时间：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只要仍然存在新地区能够出卖剩余产品并进行有利可图的新投资，资本主义就可能继续发展。 511

这种论点同人们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这一问题上一一直在进行的大辩论结合起来了。我们已经谈过，民粹派的经济学家曾经论证，除了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以内，俄国无法成功地建立资本主义，因为它既无法在面对着贫困的人民的条件下在国内找到足够的市场，它又无力同其他国家早就参加竞争的效率更高的资本家展开竞争以输出它的产品。比较起来，它在国内找到市场的可能性更小，因为在迫使手工艺者失去谋生之道以后，农村就会进一步贫困化，不论采用什么样的高度保护政策，都不会有多大作为，所能办到的仅仅是迎合有限的奢侈品市场而已。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温和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内，都驳斥这种看法，他们说俄国的工业完全有可能发展国内市场，在俄国国内从事资本建设的机会是很多的——比如修建铁路就是一例，而且手工业生产的破坏也为动力机械的产品提供了市场。从生活资料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整个过程，完全能够在俄国完成，正如同这一过程已经在其他地方完成一样。俄

国的工业化论者，对于这一过程完成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意见各有不同。有一派人同意伯恩施坦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市场组织的改善（包括提高工资在内）显示出它有解决本身矛盾的力量。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则坚持马克思的理论，预料俄国的资本主义就象世界其余地区的资本主义一样，到时候就会沦为马克思所揭露的固有矛盾的牺牲品。

512 结合俄国的情况，罗莎·卢森堡当然同工业化论者站在一边，而反对那些持有俄国式的修正主义观点的人。她认为，从长远来说，资本主义制度注定要崩溃。但是她认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如果在沙俄帝国范围内，恰恰做出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一直在做的事情，如打入市场、开辟国界以外的不发达地区的资源、征服他国、进行殖民以及开展和平贸易等，那就可以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完全能够取得很大进展。象列宁一样，她认为现代帝国主义正是这些资本主义扩张形式的表现。

对帝国主义的这种看法，当然还包括一个论断，即应该把现代战争看做是经济扩张的后果。“殖民”战争是资本家打入不发达地区的形式；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争夺这些领土的占有权和开发权的敌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随着资本家开发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以谋取利润，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矛盾就必然越来越尖锐，而战争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花在军备上的钱已经在高速增加。卢森堡认为这笔开支是提高赋税后让工人付出的，资产阶级政府能够上下其手，使赋税落在穷人身上而不是落在富人身上，从而使广大人民进一步贫困化，加深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

从上面可以看出，卢森堡的这部著作是想证明资本主义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期望而崩溃，因为它一直能够渗透那些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地区和生产部门而继续得到发展，但是她的著作

也证明马克思的预言正确地说明了当这种渗透超过某个阶段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她认为这种渗透不可能继续进行到全世界都被开发并受资本主义控制时为止。她说，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对立早在这一天到来以前就会引起战争，使资本主义自取灭亡，并使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她虽然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总概念是正确的，但攻击了他的学说中的某些部分，并指摘他对时间所做的全部估计都是错误的。

我认为，这就是卢森堡的这部著作的要点，但是书中有很大一部分用来揭示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有关资本积累过程的说明是不正确的。在这一卷里，马克思在“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的题目下 513 讨论了这个过程；“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这一名词是同资本主义阶段以前的“简单再生产”经济相对立的。在实行“简单再生产”的地方，一般的产品都是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用来更换已损耗的资本货物，因而相同的生产过程就年复一年地重复下去。这也就是说，这种情况所假定的是生产技术和受雇的人都保持不变。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并不是保持不变的；即使抛开技术或人口的变化，它也能扩展，因为资本家不会把全部纯收入（补充了已损耗或陈旧的资本货物以后的纯收入）用于消费，而是另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投资，以扩大生产而谋取利润。这新增加的投资一部分用于增购资本货物，另一部分用作增雇新工人的工资。但是资本家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是什么东西诱使他们这样做的呢？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为已经生产的全部商品找到买主，而且还必须考虑到能为新投资所生产出来的更多商品找到买主。这些买主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在某种限度内，由资本家自己购买这些产品——不如说一个资本家购买另一个资本家的产品——也能为他们的额外产品造成市场。但是如果资本家不断购买更多的资本货物，从而增加总产量，最后就必然会陷入这样一种困难的境

地；资本货物的唯一最终用途就是生产产品以供消费，而消费品扩大供应以后，除非消费者的需求增加到足以从市场上买走所增加的产品，否则就只会使竞争加剧。换句话说，除非消费者的需求量也随着有足够的增加，否则高度的资本积累就是自己拆自己的台。

遗憾的是，马克思在分析“扩大再生产”过程的时候，用了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明再生产的过程在一些年内是继续的，显然没有遇到上述消费市场发生限制的问题。在这个范例中，马克思理所当然地认定资本家愿意继续投资，同时认为资本家之所以从事消费品生产纯粹是由于这种投资所生产的产品为人所需。由此可见，⁵¹⁴ 马克思似乎是同意正统经济学家所习知的一个理论，即所谓“萨伊定律”。这条定律说：每一种生产行为都在生产过程中分配了购买其产品所需要的购买力，于是便为它的产品创造了市场。当然，马克思的意思并非如此。他只是提出一个非常抽象的典型例子，说明在资本家愿意继续投资的条件下，会发生什么情况，根本没有考虑到消费市场的最终限制。但是他被自己的论点纠缠住了，做了一系列努力来解释维持这一过程的资金来自什么地方——就他进行解释的形式来看，这种解释并没有说明任何问题。我认为，他完全陷入了混乱，正如我早先说过的^①，他之所以没有能够在生前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可能是由于他意识到上述论点不大对头。事实上，这一卷并没有写完，他给自己提出的一些问题也没有加以讨论。于是马克思的某些继承者，尤其是俄国的司徒卢威、S·N·布尔加柯夫和杜冈-巴拉洛夫斯基就抓住了他的“典型例子”，认为这说明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有可能无限制地继续扩大，不会由于受到消费品市场的限制而陷于停顿。

卢森堡看到了，而且也彻底揭露了马克思的陈述中的弱点。实

① 见本书第二卷第 297 页。

实际上，她说马克思根本没有回答他自己提出的基本问题。她认定，资本家只有在能够找到市场的条件下才能够而且愿意继续投资，增添生产资料；同时她坚持，正是由于他们迫使国内消费品市场萎缩而不是扩大，从而也就间接使供应消费品的资本货物市场起同样变化，于是唯一可能得到的解决办法是把产品卖给“第三方”。这种“第三方”的论点过去曾以不同的形式提出过。司徒卢威和其他人士就曾说过，剩余产品是卖给既非资本家又非工人的人（比如自由职业阶层）而脱手的。罗莎·卢森堡嘲笑这种形式的“第三方”的说法；她问道：这种“第三方”的收入除了从资本家所捞到的剩余价值中得到以外，还能从什么地方得到呢？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又已经包括在他们那部分总需求之中了。不过她也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第三方”论点：她说所需要的额外需求来自资本主义结构以外的地区，特别是来自资本主义的产品所渗入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和集团。

我们已经谈过，这个论点也并不完全是新的，比如布尔加柯夫就曾反驳这个论点。他说，资本家并不是把自己的产品白白送给不发达地区的人民，而是交换这些地区的人所生产的商品——主要是粮食和原料。这样，就不得不把这些进口的货物加到正在市场上寻求出路的国内产品的供应中去。因此，消费品的总有效需求量的限制——也就是资本货物的有效需求量的限制——仍然一如既往，是个极大的难题。但是运往国外的商品如果是用来投资而不是用来交换输入品的，这种反驳意见就不适用了。卢森堡的主要论点是，资本输出为资本家的投资愿望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出路，从而推迟了资本主义的崩溃，而其代价则是加剧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对立，并且从长远来说使这个问题比以往更加难于解决。

她的这部著作所得到的反映有好有坏。在她的社会党同志还没来得及消化她的论点的时候，世界大战就爆发了，这就使他们不

得不去考虑其他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她的密友弗兰兹·梅林由衷地欢迎她的论点，但是许多首要的理论家都不愿意接受她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修正，并且否认向世界经济结构中的非资本主义部分倾销资本主义工业的剩余产品能够充分解释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有些人，比如奥托·鲍威尔，认为资本主义继续扩展主要是由于人口的增加，人口的增加使市场和生产力都不断得到扩大。而另一些人则力图说明，尽管表面上在扩展，而资本主义的矛盾实际上在日益加剧，工人的处境也在日益恶化。因此，可以预期下一次经济危机——至迟也不可能超过再下一次经济危机——就会把问题推向最后关头，为社会主义胜利开辟道路。还有一些人认为，依靠工会和社会主义行动通过社会立法和工业立法来提高工资和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就什么矛盾都能解决。

当然，《资本的积累》一书还有许多内容是我在这短短的叙述中所没有提到的。在我从一大堆同马克思的本文交错在一起的次要论点中抽出其基本概念的过程中，那些内容是一定要予以省略的。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阐释资本积累这一问题时，他所强调的是生产资本货物而不是生产消费品的工业投资过程。事实上，前一种工业投资的相对增加是所有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认为这种投资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而消费品工业的投资则尾随其后乃是很自然的事。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就是遵循马克思以及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说明的资本发展形式，而不是仿效英国工业革命的早期纺织业阶段所实际出现的资本发展形式。但是即使在这个阶段，英国对铁工厂、煤矿，还有运河也进行了相当大的投资，就象对动力机械纺织厂进行投资一样。

对罗莎·卢森堡来说，在她力图重新阐释资本积累的理论的时候，就牵涉到两个关系重大的实际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资本主

义作为一种世界制度是否由于内部原因而有很快崩溃的危险，因为革命论者针对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战略显然一定会受到它是否能倖存下去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她的结论是：修正主义者朝一个方向走得太远了，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则有朝另一个方向走得太远的趋势。资本主义有朝一日注定要崩溃，但是它的纯经济性矛盾现在还不致于要它的命，因为它仍然能够到国外去投资。但是它能够继续推迟经济崩溃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实际上可以生存下去，而只意味着自杀比善终更有可能——或者不如说，通过革命及早结束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希望，就在于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爆发战争。这种看法并没有促使她去为战争进行活动，同样也没有促使其他具有相同见解的国际主义者这样做。但是这的确使他们把战争威胁看成是工人加紧进行革命的信号。这就是她和列宁在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战争”决议中所加进去的最后一段的意义。 517

第二个重大的实际问题是，在革命以后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来确保按照正确比例充分地利用生产资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全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必须把当前的工业生产分为三部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据马克思的公式，这三部分是 $C + V + S$ 。其中 C 代表不变资本产品，用它来替换已被消耗的原料和生产工具，以便保持资本货物不变。 V 代表用来支付工资和工人消费项目的数额。 S 是剩余，从中扣除维持经理人员和职员等非生产性工作者的必要开支以后，就用来为剥削阶级提供地租、利息和利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第三项就不再付给以前的所有主；其他两项保持不变，不过它们同整个产品的比率可能改变。但是这时会产生一种新的 S ，其中的一部分可能要用来提供新的资本，以便在社会所有制之下维持“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另一部分则将付给老年人和丧失劳动力的人，或者用于儿童福利，或者为全体人民而用于社

会服务事业，而不再付给地主或资本家。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有必要保证不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存在的矛盾。马克思的“核算范式”在这里就用上了：赋予S以新的涵意，就可以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核计范式。在V和S都为集体所控制以后，就不再需要寻找国外市场来平衡国内需求量的不足了。国际贸易也就能够具有正确的形式，富有成果地交换产品，互通有无。

最近，《资本的积累》一书已经译成了英文，但只是其中的第一卷，译本中附有琼思·罗宾逊夫人的绪言。罗宾逊夫人的结论是：今天我们对于这本书可以作出的辩解远远超过了社会党人和反社会党人在它刚问世的时候所认识的程度。在谈到当代经济学家时，罗宾逊夫人写道：“没有什么人会否认，资本主义向新领土的扩张正是某位理论经济学家所谓的近二百年来‘巨大的世俗繁荣’的主要泉源；许多理论经济学家主要用全世界‘边界的封锁’来解释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不稳定状况。”罗宾逊夫人批评卢森堡在分析中忽略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实际工资的增加，因而提出了一幅不完整的画面，但是她认为卢森堡的著作出色地预先提出了一些概念，这些概念只是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时期才广泛为人所了解，因为这期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使有关资本主义制度早日崩溃的可能性的讨论有了新的现实意义，而且也推动人们进一步去研究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

THE PRINCIPAL CHARACTERS

主要人物表

姓名年代	出现章次
[Engels, 1820—1895]①〔恩格斯〕	—
Lavrov, 1823—1900②拉甫罗夫	9
W·Liebknecht, 1826—1900② W·李卜克内西	5
Tolstoi, 1828—1910 托尔斯泰	—
Longuet, 1833—1901 龙格	7, 8
[Morris, 1834—1896]③〔摩里斯〕	—
Bebel, 1840—1913②倍倍尔	5, 6
Vaillant, 1840—1915②瓦扬	7, 8
Malon, 1841—1893②马隆	7
Greulich, 1842—1925 格雷利希	15
[Hyndman, 1842—1921]②〔海德门〕	—
[Kropotkin, 1842—1921]③〔克鲁泡特金〕	—
Lafargue, 1842—1911 拉法格	7
Mikhailovsky, 1842—1904 米海洛夫斯基	9
Ant. Labriola, 1843—1904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	19
Brousse, 1844—1912 布鲁斯	7
Danielson, 1844—1918 丹尼尔森	9
Singer, 1844—1911 辛格尔	6
Guesde, 1845—1922②盖得	7, 8
Mehring, 1846—1919 梅林	5, 6
Nieuwenhuis, 1846—1919 尼文海斯	17
Sorel, 1847—1922 索列尔	8
Axelrod, 1850—1925 阿克雪里罗得	9
Bernstein, 1850—1932 伯恩施坦	5
Iglesias, 1850—1925 伊格列西亚斯	20
Ledebour, 1850—1947 累德堡	6

姓名年代	出现章次
Vollmar, 1850—1922 福尔马尔	5
Blatchford, 1851—1943 布拉奇福德	3
Zasulich, 1851—1919②查苏利奇	9
V·Adler, 1852—1918 V·阿德勒	12
Costa, 1852—1910 科斯塔	19
De Leon, 1852—1914②德·里昂	21
[Cunninghame Graham, 1852—1936]②〔肯宁汉·格雷姆〕	—
Stepniak, 1852—1895 斯特普尼亚克	9
[Malatesta, 1853—1932]③〔马拉特斯塔〕	—
[Bax, 1854—1926]③〔巴克斯〕	—
Kautsky, 1854—1938②考茨基	5, 6
Debs, 1855—1926②戴布斯	21
Anseele, 1856—1938 安西尔	16
Bertrand, 1856—1943 贝特朗	16
Hardie, 1856—1915 哈迪	3, 4
Mann, 1856—1941 曼恩	3, 4
Shaw, 1856—1950 肖伯纳	3, 4
Plekhanov, 1857—1918②普列汉诺夫	9, 10
Turati, 1857—1932 屠拉梯	19
Zetkin, 1857—1933 蔡特金	6
J·A·Hobson, 1858—1940 J·A·霍布逊	4
B·Webb, 1858—1943 比阿特里斯·韦伯	3, 4
Burns, 1859—1941②伯恩士	3, 4
Champion, 1859—1928 钱皮恩	3
Jaurès, 1859—1914 饶勒斯	7, 8
Lansbury, 1859—1940 兰斯伯雷	4
Millerand, 1859—1943 米勒兰	7
S·Webb, 1859—1947 悉尼·韦伯	3, 4
Branting, 1860—1925 布兰亭	18
Pouget, 1860—1932 波盖	8
Troelstra, 1860—1930 特鲁尔斯特拉	17
W·Lane, 1861—1917 W·兰恩	23

姓名年代	出现章次
Legien, 1861—1920 列金	6
Briand, 1862—1932 白利安	7, 8
David, 1863—1930 大卫	6
Haase, 1863—1919 哈阿兹	6
Henderson, 1863—1935 汉德逊	4
Snowden 1864—1937 斯诺顿	3, 4
Scheidemann, 1865—1939 谢德曼	6
Macdonald, 1866—1937 麦克唐纳	3, 4
Vandervelde, 1866—1938 王德威尔得	16
Sun Yat Sen, 1866—1925 孙逸仙	26
Wells, 1866—1946 威尔斯	4
Pelloutier, 1867—1901 佩洛蒂埃	8
Pilsudski, 1867—1935 皮尔苏茨基	11
Gorki, 1868—1936 高尔基	10
Connolly, 1870—1916 康诺利	4
Krasin, 1870—1926 克拉辛	10
Lenin, 1870—1924 列宁	9, 10
Luxemburg, 1870—1919 卢森堡	6, 11
K·Liebknecht, 1871—1919 卡尔·李卜克内西	6, 11
Merrheim, 1871—1925 梅兰	8
Bogdanov, 1873—1928 波格丹诺夫	10
Martov, 1873—1923 马尔托夫	9, 10
Frank, 1874—1914 弗兰克	6
Griffuelhes, 1874—1923 格里甫埃勒	8
A·Thomas, 1878—1932 A·托马斯	8
Jouhaux, 1879—1953 茹奥	8
Trotsky, 1879—1940 托洛茨基	9, 10
O·Bauer, 1881—1935 O·鲍威尔	12

① 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中谈到。

② 在第二卷中也谈到。

③ 见第二卷的讨论。